

風暴歷程

文革中的人民解放軍

下冊



余汝信 著

THROUGH THE STORM:
The PLA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UME 2

新世纪出版社
NEW CENTURY PRESS

下册 (全二册)

ISBN 978-988-13296-7-7



9 789881 329677 >

HK \$ 468 (二册)

風暴歷程

文革中的人民解放軍

下冊

余汝信 著

THROUGH THE STORM:
The PLA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ume 2
by Yu Ruxin

新世紀出版社

NEW CENTURY PRESS

書名： 風暴歷程—文革中的人民解放軍
下冊（全二冊）
作者： 余汝信
封面設計： Renee Chiang
出版社： 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
聯絡方式： editors@newcenturymc.com
國際統一書號： 978-988-13296-7-7
定價： 港幣 468 圓（精裝版 兩冊）

香港出版，2021 年 8 月。

版權聲明

沒有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 {New Century Media & Consulting Co. Ltd.} 的書面同意，本書的全部或任何一部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在任何媒介中複製或傳播。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English Title: Through the Storm: The PLA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ume: 2 of 2
Author: Yu Ruxin
Cover Design, Layout
& Production: Renee Chiang
Publisher: New Century Media & Consulting Co. Ltd.
editors@newcenturymc.com
ISBN: 978-988-13296-7-7
Price: HK \$468 (hardback, 2 volumes)

Published in Hong Kong, August 2021.

Copyright ©2021 by New Century Media & Consulting Co. Ltd., Hong Kong.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hatsoever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Image credits:

All images courtesy of the author. Images in the public domain are used as permitted. All efforts have been made to respect the copyright holders of images; please contact the publisher if any credits are missing and they will be corrected in future editions.

Printed in Hong Kong.

第七章

1967-69・上：日星隱曜

第五十七节 黑龙江：北疆前线的三支两军

一、黑龙江驻军简况

1967年1月至1968年12月，黑龙江省内军以上单位4个，即陆军第二十三军、黑龙江省军区、铁道兵大兴安岭林区指挥所和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全省三支两军以省军区为主，第二十三军为辅。另驻吉林的陆军第十六军等亦参与了黑龙江大庆地区的三支两军。

（一）陆军第二十三军

领率机关驻哈尔滨市，代号3026部队。军长游好扬，政委张午，副军长孙云汉、翟仲禹，副政委谷凤鸣、傅奎清、夏光亚（1968年5月任），参谋长江运发，政治部主任夏光亚（1968年5月免）、陈承恩（1968年5月任）。^{【1301】}辖陆军第六十七师、第六十九师、第七十三师。

陆军第六十七师，师部位牡丹江市，代号3027部队。师长黄浩，政委汪涛，副师长偶正安、姜克忠（1968年9月免）、王叶青（1968年9月任），副政委朱平，参谋长陈思岐（1968年9月任），政治部主任俞克。辖步兵第一九九团、第二〇〇团、第二〇一团及炮兵第三四七团。

陆军第六十九师，师部位齐齐哈尔市，代号3057部队。师长袁俊，政委段铭，^{【1302】}副师长刘登富、陈震，副政委金炬、许惠民（1968年9月任），参谋长任奇，政治部主任许惠民（1968年9月免）。辖步兵第二〇五团、第二〇六团、第二〇七团及炮兵第三四八团。1968年12月，移驻哈尔滨地区。

陆军第七十三师，1965年4月改编为黑龙江省军区独立师，调出二十三军建制。1968年2月恢复为陆军第七十三师，归还二十三军建制。师部位哈尔滨市，代号3065部队。师长张斌，政委陈承恩（1968年5月免）、沈平东（1968年5月任），副师长王吉泉（1968年8月免）、宰纪来（1968年9月任），副政委沈平东（1968年5月免）、李万平，参谋长王世广（1968年9月免）、陈增祥（1968年9月任），政治部主任路荣朝。辖步兵第二一七团、第二一八团、第二一九团及炮兵第三四九团。1968年12月，移驻齐齐哈尔地区。

该军军史称：

【1301】游好扬，1955年授衔少将。张午，1964年晋升少将。孙云汉、翟仲禹、谷凤鸣、傅奎清、夏光亚，1965年大校军衔。

【1302】袁俊、段铭，1965年大校军衔。

一九六七年

一月

- 二十五日 我军派出八个半连队，七十六个班，共七百九十五人（其中干部一百四十五人，战士六百五十人），去黑龙江省三个市、十六个县的六十三个军管点（工厂九个、仓库五十四个）执行军管、警卫任务。
- 二十七日 奉沈阳军区命令，我军第二〇〇团第三营赴伊春执行三支两军任务。
- 二十九日 奉沈阳军区首长转周总理的指示，我军与黑龙江省军区联合组成前指，率第二〇五团（欠重炮连），开赴伊春林区执行三支两军任务。

二月

- 八日 六十七师前指率一九九团团部及两个营开赴苇河林区执行三支两军任务。

三月

- 一日 全军抽调干部二百〇三人（内有班干十九人），组成七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一个医疗队，分赴黑龙江省七个县、二十六个公社、四十八个生产队执行支农任务。
- 三日 毛主席对《沈阳军区组织机关干部到工厂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情况简报》作了重要批示：“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沈阳军区派遣大批人员进厂宣传和做调查的办法是很好的。二十七军在无錫、五十四军在重庆、二十三军在伊春、苇河等处也有好经验。总之，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
- 十一日 六十九师前指率二〇六团全部和二〇七团一个营开赴牙克石林区执行三支两军任务。
- 十四日 军抽调干部战士一百五十人，组成训练团，到哈尔滨工农兵大学（哈尔滨师范学院），进行军政训练试点。

八月

- 十七日 我军奉命派出部队，进驻滨绥、哈佳、滨洲铁路沿线，执行护路任务。

十月

- 二十一日 军党委作出《关于向黑龙江省军区学习的决定》。

一九六八年

二月

一日 黑龙江省军区独立第一师恢复为陆军第七十三师，归还我军建制。炮三四九团和第七十三师高炮营归还第七十三师建制。

本月 全军派出干部战士一千〇三十人，分别对五所大学、九十二所中学、二十五所小学实施军政训练，促进革命大联合。受训师生共一万一千八百一十九人。

十月 全军接收地方大专院校毕业生八百四十七人，分别去各师、军直农场劳动锻炼。^{【1303】}

(二) 黑龙江省军区

领率机关驻哈尔滨市。司令员汪家道，第一政委潘复生（1967年5月后沈阳军区政委兼），政委郭强，副司令员谢长华、曹子平、杜国平、王明贵、张万春、王中军、安怀，副政委任允中、黄明清，参谋长马锐锋，政治部主任张多树。^{【1304】}

辖牡丹江、合江、黑河、嫩江、绥化、松花江6个军分区和哈尔滨市人民武装部、伊春特区人民武装部，省军区独立第一师、独立第二师。

独立第一师，1965年4月由陆军第二十三军第七十三师（不含炮兵三四九团及高炮营）改编为黑龙江省军区独立师，移归黑龙江省军区领导。师部驻哈尔滨市，代号3065部队。1966年6月改称独立第一师。师长张斌，政委陈承恩。1968年2月1日起，恢复为陆军第七十三师，归还二十三军建制，代号不变。1968年9月，根据总参指示，重新组建黑龙江省军区独立第一师，师部驻绥化县绥化镇。师长王云进，政委武守端。

独立第二师，1966年6月30日，黑龙江省公安总队改编为黑龙江省军区独立第二师，7月1日起正式启用新番号。师部驻哈尔滨市，代号3385部队。师长江礼洪，政委黄廷廉。

据省军区组织史资料称，“从1967年1月23日开始，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省军区成立了‘三支两

【1303】陆军第二十三军军史编审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二十三军军史附件（初稿）》，1980年，页205-208。

【1304】汪家道、杜国平、王明贵、张万春，1955年授衔少将。郭强，1964年晋升少将。曹子平、王中军、安怀、任允中、黄明清、谢长华、张多树，1965年大校军衔。

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先后派出7,457人（其中干部3,292人，占干部总数的41%）进入黑龙江省及所属地（盟）、市、县（旗）党政机关和公安、电台、铁路、大专院校、工厂、矿区、油田等，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并选派1,300多名干部参加各级革命委员会。1968年2月8日和1970年3月28日，省军区领导汪家道、刘光涛先后任黑龙江省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1972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后，参加‘三支两军’人员陆续撤回部队。”^[1305]

（三）铁道兵大兴安岭林区指挥所

领率机关驻加格达奇镇，代号总字505部队。司令员何辉燕（铁道兵参谋长兼），副司令员沈鸿林，副政委苏超，参谋长宋瑞章，政治部主任徐诚之。^[1306]

该指挥所主要负责大兴安岭特区的三支两军。

（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1968年6月30日正式成立。详见本书第八十节。

（五）陆军第十六军等负责大庆军管

早在2月13日，周恩来在接见哈尔滨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代表时即称：搞乱大庆，这是很危险的。大庆太重要了，不能不由军队来接管。^[1307]大庆军管延至3月下旬方落实。3月23日，周恩来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对大庆油田实行军管的决定稿。在送毛泽东批阅时注明：“对于这样一个带全国性的大企业的军管，并由一个师的兵力驻在大庆，我们认为应由中央、国务院、军委发布这一决定。”毛泽东批：照办。^[1308]决定稿的主要内容是：一、自1967年3月27日起，由沈阳军区派驻大庆地区的部队，组织大庆油田军事管制委员会，并向油田所属各生产指挥部、各重点单位、各重要居民区派出军事代表，实行军管。二、油田军管会受沈阳军区和石油工业部双重领导，主要任务是接管油田的党政权力，统一领导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工作；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以便最后实现革命的“三结合”；镇压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油田的生产和基本建设。当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下发了这个决定。^[1309]

【1305】黑龙江省军区政治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省军区组织史资料》，1996年，页113。

【1306】何辉燕，1955年授衔少将。沈鸿林，1964年晋升少将。宋瑞章、徐诚之，1965年大校军衔。

【1307】《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页126。

【1308】《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页140。

【130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295—296。

3月27日，沈阳军区派出部队进驻大庆油田。油田军管会主任由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安怀担任，陆军第十六军副军长褚传禹、军政治部副主任周的民任副主任。^{【1310】}

黑龙江驻军分布图(1967-1968)



二、1967-1968年黑龙江文革进程与军队^{【1311】}

1967年3月1日—6日，省红色造反革命委员会、省军区联合召开抓革命促生产春耕工作会议。这是省红色造反者革委会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省工作会议。潘复生、范正美、张万春在会上讲了话。

3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齐齐哈尔铁路局实行军事管制。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齐齐哈尔铁路局。

【1310】褚传禹，1965年大校军衔。

【1311】资料来源：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黑龙江省志·大事记》，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页935-950。

4月2日，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召开炮轰赵去非（原省委常委、政法部部长，现任省革委会委员）大会。哈军工、黑龙江大学等十几个大专院校造反团中一些人反对赵进省革委会的人参加。会上决定成立市炮轰联络站（后称之为炮轰派）。与此同时，哈工大、省委机关红色造反团等另一些人组织与炮轰派相对立的捍卫革命三结合总指挥部（后称之为捍联总）。从此，在黑龙江省掀起了捍、炮两派斗争以至发生多起大型武斗。

6月1日，省革委会举行全体会议，确定省革委会委员暂定185名。其中：革命群众组织代表92名，占50%；解放军代表37名，占20%；革命领导干部56名，占30%。常委33人，其中：革命群众组织代表12名，占36.4%；解放军代表8名，占24.3%；革命领导干部13名，占39.3%。3日，省革委会举行第一次常委会议。决议由潘复生、汪家道负责全面工作。

6月5日，省革委会向中央文革小组并中共中央、东北局呈送《关于增加省革命委员会委员名额和常委名单的请示报告》。建议省革委会设委员185名；常务委员33名，现已选出29名，他们是：潘复生（原省委第一书记，现任省革委会主任委员）、汪家道（省军区司令员，省革委会副主任委员）、赵去非、关舟（原省委委员、副省长）、燕文卿（原省商业厅厅长，现任省革委会委员）、陈俊生（原省委常委、副秘书长）、解云清（原省委常委、财贸政治部主任）、于杰（原省委书记处书记）、陈剑飞（原省委常委、副省长）、王逢源（原副省长）、陈海山（原省总工会副主任）、王维之（原松花江地委第一书记，现任地区革委会主任委员）、余弘达（原巴彦县委书记，现任省革委会委员）、于军（女，原绥化县半脱产副县长，现任县革委会副主任）、唐金枝（原宁安县半脱产副县长）、范正美（哈尔滨师范学院学生、院造反团负责人，省革委会委员）、刘雪峰（哈尔滨石油配件厂职工业余学校教员、厂造反团负责人，省革委会委员）、宋振业（东北农学院学生、院造反团负责人，省革委会委员）、聂世荣（哈尔滨锅炉厂工人、厂造反团负责人，省革委会委员）、孙保生（哈尔滨伟建厂技术员、厂造反团负责人）、王文国（齐齐哈尔北满钢厂工人、厂造反团负责人，市革委会委员）、韩潮（原省林业厅管理员、厅造反团负责人）、郭强、游好扬、张午、张万春、张多树、张魁印（省军区副参谋长）、毛远新（原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生）。在常委人选尚缺4名，正在从贫下中农、大庆油田工人、大专院校革命师生中物色。8日，中共中央批准省革委会的请示报告。

7月6日，省革委会决定，《黑龙江日报》从今天起开始公开点名批判“我省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欧阳钦。指其为“中国赫鲁晓夫”在东北地

区和黑龙江省实行资本主义复辟、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理人。同日,《黑龙江日报》发表社论《打倒欧阳钦!》。

12月1日,省“捍联总”、“炮轰派”代表为实现大联合在北京达成《关于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的协议》(即“十二条协议”)。周恩来接见了双方代表并同他们谈了话。16日,省革委会决定,组成贯彻《协议》监督小组,由郭强为组长。

1968年1月12日,齐齐哈尔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由于造反组织先后发生大规模武斗,造成3人死亡,51人重伤,省革委会决定对该厂实行军事管制。

13日,根据中共中央1967年12月9日《关于公安机关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黑龙江省对公安、检察、法院机关实行全面军管,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省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省军区副司令员谢长华为军管会主任。此后,全省各市、县均相建立了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

2月8日,根据中共中央1967年10月27日发出的关于在已成立革委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通知精神,潘复生、汪家道向中央作出《关于建立中共黑龙江省核心小组请示报告》。建议由11人组成省核心小组,潘复生任组长,汪家道任副组长。

3月30日—4月2日,省革委会举行常委扩大会议。学习了毛泽东关于革命委员会的最新指示,分析了本省阶级斗争形势,强调革命委员会要成为“阶级斗争的指挥部”,提出目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思想”。潘复生在会上作了报告和总结,提出要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进攻。还说,全省65个县以上革委会,“至少有百分之十几的权不在我们手里”。在此期间,潘复生亲自抓了哈尔滨市滨江区和平一队“右倾翻案事件”,逮捕23人,批斗几十人,8%的区、公社革委会干部,60%的大小队干部被反掉。这一“经验”推广后,在全省开展了“反右倾、反复旧、反复辟”运动,抓了数起阶级报复案件,许多刚刚被“解放”的干部又以“漏网走资派”的罪名重新被打倒,全省共有5万多名干部被揪斗。

4月14日,省革委会向毛泽东、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并沈阳军区呈报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罪行材料(之一)。4月16日、5月11日、21日,省革委会又连续向中央呈报宋任穷罪行材料之二、之三、之四。5月24日,省革委会举行批判“东北地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宋任穷电视、有线广播大会。

29日,省革委会召开第34次常委办公会议。决定:彻底揭发杨易辰^[1312]的“三反罪行”,打退“右倾翻案风”,查清为其进行翻案活动的集团,揪出“黑手”。

【1312】杨易辰,原黑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黑龙江省副省长。

5月2日，省革委会第75次常委会议指出，黑龙江省当前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集中表现是“右倾翻案风”。

5月5日，省革委会召开第76次常委会议。批准成立黑龙江省革委会柳河“五七”干校（因毛泽东“五七”指示而得名）。7日，柳河“五七”干校正式成立，首批140多名学员都是省直党政机关干部。10月5日，《人民日报》以“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为题，发表了编者按，称赞黑龙江省“五七”干校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经验，并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此后，全国各地都相继办起了“五七”干校。

5月25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要求各地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此后，黑龙江省各级清理阶级队伍组织相继建立，在不断反右倾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出现“清队”工作的严重扩大化。

5月30日，省革委会第81次常委会议，决定对全省体育系统实行军事管制。

同日，省革委会批准，成立大庆特区革委会。至此，全省地、市、特区、县82个单位全部建立了革委会。6月1日，《黑龙江日报》发表社论：《红太阳普照黑龙江——热烈欢呼全省实现革命三结合一片红》。

6月10日，省革委会第38次常委办公会议决定：（1）同意对新华社黑龙江分社实行军管。（2）同意为北京、上海、天津3市安置知识青年3.5万名，其中北京1.5万名，上海1万名，天津1万名，全部安置到生产建设兵团所属单位。

8月13日，潘复生在省直机关干部大会上说：“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不断出现右倾和不断反右倾，是阶级斗争的一条基本规律。”又说：“现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主要是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具体表现是翻案和反翻案，破坏和反破坏，分裂和反分裂的斗争”。提出“揪漏网走资派”口号。

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27日，哈尔滨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万多人举行誓师大会，进驻学校和其他一切还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翌日，工人宣传队开始进驻14所大专院校。

8月，潘复生去嫩江、黑河地区视察，沿途大反右倾。嫩江地区结合到革委会的5名地委书记和专员全部被罢官，38名局级干部被撤掉31名；黑河地区6个县革委会主任被撤职，2,160名农村生产大、小队干部被撤换。

11月24日，欧阳钦之子欧阳湘化名“洪新建”给汪家道写信，揭发潘复生问题，被公安机关侦察逮捕。11月30日，哈尔滨市革委会召开“坚决镇压反革命，掀起对敌斗争新高潮”大会，宣布逮捕“现行反革命分子”“洪新建”。12月19日，欧阳湘被押回长春305研究所批斗，后含冤而死。

12月9日，齐齐哈尔军医学院和齐齐哈尔市公安机关军管会，根据逼供的线索，成立“05”专案组，以“国民党齐潜小组”特嫌为由拘留19名医务人员。此后又有41人被隔离审查，并株连了200余名干部群众。在刑讯逼供下，造成9人死亡，1人双目失明，1人精神失常。

12月，潘复生为在全省打一场反右倾“总体战”，亲自去双城县参加全县党员干部会议。会期由5天延长到21天，人数由5,000人扩到7,000人，批斗了已调出的两名县委书记，1名县革委会主任，1名武装部长。后在全省推广双城县经验，揪斗大队以上干部中的“漏网走资派”2.9万人。

三、各地、市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1967年下半年，黑龙江省辖6地区、9省辖（地级）市、1特区。1967年11月9日。省革委会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报告称，“我省的嫩江、松花江、牡丹江、绥化、合江、黑河等六个地区，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双鸭山、伊春等5个市和哈尔滨铁路局，先后在一九六七年的三四月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1313】}1968年，原省辖的佳木斯市划归合江地区，牡丹江市划归牡丹江地区，安达市改大庆特区，省辖6地区、6省辖市、2特区。1968年6月26日，省革委会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报告并报沈阳军区称，“我省至五月底各地、市、特区、县已全部建立了革命委员会。”^{【1314】}

（一）哈尔滨市

1967年2月16日，哈尔滨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在红卫兵广场举行。大会宣读了公社的《宣言》和《第一号通告》。《宣言》称，“公社是各革命左派组织、人民解放军驻哈部队、市党政机关协商推举组成‘三结合’的临时委员会行使领导权力，”“废除原市委、市人委一切职权，一切权力归公社。”2月26日，哈尔滨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召开哈尔滨市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命名大会。大会通过了《关于哈尔滨人民公社更名为哈尔滨市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公告》。4月11日，市红

【1313】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黑龙江省六个地区、五个市和哈尔滨铁路局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情况报告》，1967年11月9日。

【1314】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我省最后一批市、特区、县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备案报告》，1968年6月26日。

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改称为哈尔滨市革命委员会。8月22日，市革委会全体委员会议宣布：由省军区副参谋长王文贞主持市革委会工作。^{【1315】}

（二）松花江地区

1967年1月23日，地直机造反团首领陈云生等串联农业办、财贸办等5个造反组织的头头开会，决定杀出联合总部单独夺取地委、专署领导权。第二天，陈云生等人去松花江军分区汇报了夺权经过，得到了军分区领导的支持。陈云生又串联成立了新总部，选出班长陈云生，副班长张志祥（专署司机）等。夺权以后成立了临时接管委员会，新总部正副班长为接管委员会正副班长。2月27日，松花江军分区派薛兰岗（军分区政委）、凡涛（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秦国枢（军分区机关协理员）、冯英举（军分区动员科科长）、王景衡（军分区干部科科长）5人到地专机关支左，介入了地专机关文革运动。3月25日，经省革委会批准，成立松花江地区革命委员会。地革委举行了首次全体委员会议，会上选举原中共松花江地委书记王维之为地革委主任委员，薛兰岗为副主任委员。^{【1316】}

（三）绥化地区

1967年1月24日，绥化地区接管委员会成立，夺了地委、专署的领导权。3月26日，经省革委会批准，绥化地区革委会成立。绥化军分区司令员丁子峰为主任委员。^{【1317】}

（四）双鸭山市

1967年2月4日，市红色造反团接管市委、市人委。成立双鸭山市红色造反者临时接管委员会。2月12日，市武装部表态支持市红色造反团，并开始筹建市革命委员会。3月27日，双鸭山矿区实行军事管制。3月29日，召开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省革委会为此发来贺电。市革命委员会发布第一号《通告》，撤销市接管委员会，一切权力归市革委会。^{【1318】}市革委会主任卢泽民（原双鸭山市委第一书记），副主任袁维（市武装部政委）、邓永泰（原市人事局副局长）。

【1315】哈尔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哈尔滨市志·大事记》，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269-273。

【1316】松花江地区志编辑部：《松花江地区志》，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页10-11。

【1317】绥化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绥化地区志》，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40-41。绥化地区革委会成立日期，《绥化地区志》为5月26日，根据《黑龙江省政权系统、地方军事系统、统一战线系统、群众团体系统组织史资料》，更正为3月26日。

【1318】双鸭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双鸭山市志》，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91年，页23-24。

(五) 牡丹江地区

1967年1月18日，地直机关造反团总部等组织夺了地委、专署领导权。1967年3月30日，经省革委会批准，成立牡丹江地区革委会。主任何承华（原副专员），副主任张春和（牡丹江军分区司令员）、李文奎（原地委监察组组长）。1968年2月6日，地革委根据省革命委员会决定，将地、市机构合并，撤销牡丹江市领导机构，仍称牡丹江地区革委会。主任张春和。^{【1319】}

(六) 齐齐哈尔市

1967年1月26日，当日午夜，北满钢厂、热电、东重、化校、市第八中学的造反派，联合夺了市委、市人委的权，自称为齐齐哈尔市临时接管委员会（亦称革命造反接管委员会筹委会）。后称“一二六夺权”。

2月9日，齐市工农兵学商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总部成立夺权指挥部，总指挥张喜臣，副总指挥李富勇。当晚10时左右，重机厂红色造反团、东重红色造反团、化校红色造反团等组织，共300余人到市委机关夺权，即“二九夺权”。次日凌晨驻齐3057部队介入反对这次夺权行动，当场逮捕了夺权指挥者李富勇、马维金等7人。

4月4日，齐市三结合的革委会成立。省革委任命市武装部部长张宝增为市革委会主任，驻齐3057部队副政委金炬、建华机械厂党委书记李在长为副主任。当日在市工人文化宫广场召开25万人参加的大会。省革委的代表向大会宣读了《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齐齐哈尔市革命委员会的批准书》和贺电。大会宣布“砸碎市委和市人委的机构”，并当场烧毁市委、市人委的两块牌子，竖起了齐齐哈尔市革命委员会的牌子。同时，大会还宣读了市革委会成立的公告和市革委会发出的“第1号通令”。“通令”宣布红色立新军、红旗军、东重金猴、电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团为“反革命组织”立即取缔。

1968年8月30日，省革委决定，段铭任齐市革委第一副主任。^{【1320】}

(七) 黑河地区

1967年1月27日，黑河红旗中学、黑河师范、黑河地委机关3个红色造反团联合夺取了地委、专署领导权，成立了黑河地委和黑河专署接管小组。4月9

【1319】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黑龙江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政权系统、地方军事系统、统一战线系统、群众团体系统组织史资料》，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页230-231。

【1320】齐齐哈尔市地方志办公室：《齐齐哈尔大事编年（1674-1985）》，1988年，页238-239、248。

日，省革委会全体会议批准，成立黑河地区革委会。^{【1321】}主任刘祖裕（原黑河地委副书记），副主任彭绍先（黑河军分区政委）。

（八）嫩江地区

1967年4月16日，经省革委会批准，成立嫩江地区革委会。主任史治平（原嫩江地委副书记兼副专员），副主任程跃德（嫩江军分区政委）、黎悦林（原嫩江地委副书记）。

（九）牡丹江市

1967年1月16日，市造反组织联合夺了市委、市人委的领导权，成立市人委接管委员会。4月19日，经省革委会批准，成立牡丹江市革委会。主任缺，第一副主任童德山（市武装部部长），副主任罗士良（原牡丹江市副市长）。1968年2月6日，地、市机构合并，撤销牡丹江市革委会和工作机构。^{【1322】}

（十）伊春市

1967年1月28日，第二十三军对伊春特区实行军事管制。5月5日，省革委会批准撤销伊春特区建制，设立伊春市，组建伊春市革委会。主任谷凤鸣（1967年5月-11月）、孙云汉（1967年11月任）。

（十一）合江地区

1967年1月28日，专员公署被地专机关接管委员会夺权。4月25日，经省革委会和省军区批准，成立合江地区革委会筹委会。9月15日，正式成立合江地区革委会。代理主任李清正（合江军分区司令员）。1968年4月8日，省革委会决定并于同年7月30日开始，将合江地区革委会与佳木斯市革委会合并为合江地区革委会，对外仍保留佳木斯市建制，8月30日开始合署办公。主任李清正。^{【1323】}

（十二）佳木斯市

1967年5月26日，市委、市人委被造反组织夺权，6月7日，成立了佳木斯市红色造反者接管委员会。7月28日，经省革委会批准，成立了佳木斯市革委会筹备小组，同年11月22日，成立佳木斯市革委会。主任和子明（合江军分区副司

【1321】黑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黑河地区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页41-42。

【1322】《黑龙江省政权系统、地方军事系统、统一战线系统，群众团体系统组织史资料》，页237-238。

【1323】《黑龙江省政权系统、地方军事系统、统一战线系统，群众团体系统组织史资料》，页229-230。

令员)。1968年7月30日,根据省革委会决定,合江地区与佳木斯市两个革委会合并,称合江地区革委会,撤销市革委会。对外保留佳木斯市名义。^{【1324】}

(十三) 鸡西市

1967年1月,市党政机关被夺权,陷于无政府状态。4月,鸡西市实行军事管制。同年8月21日,经省革委会批准,组成鸡西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11月25日,经省革委会批准,成立鸡西市革委会。^{【1325】}主任缺,副主任姜文远(原鸡西矿务局局长)、黄程飞(原鸡西市委书记)、吴雅麟(鸡西市武装部政委)、韩玉喜(省军区独立一师步兵第一团政委)、刘玉保(原鸡西市委农工部部长)。1968年7月,李万平(陆军第七十三师副政委)任市革委会主任。

(十四) 大兴安岭特区

1967年2月9日,铁道兵总字505部队和特区人民武装部,根据中央军委《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和群众的决定》和沈阳军区的命令,成立联合支左办公室。由总字505部队参谋长宋瑞章、宣传处长梁青、组织处长吕新川、保卫处长冯进祥、青年处长丁宪帮、办公室副主任周逸隆、特区武装部副政委郑洪文、部长陈殿元、副部长王惠文等人组成。总字505部队和武装部负责特区机关;铁道兵三师负责松岭林业公司;六师负责新林林业公司;九师负责塔河林业公司。以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名义,陆续进驻各单位。

6月5日,特区机关红联等36个造反团、队,在支左部队的支持下,联合“夺了特区党委、人委和林管局党、政、财、文等一切大权”。宣告:大兴安岭特区革委会筹委会正式成立。宋瑞章为主任。

11月16日,经省革委会常委会讨论,省革委会发出通知,批准成立大兴安岭特区革委会,宋瑞章为主任委员。^{【1326】}

(十五) 鹤岗市

1967年2月12日,市内各单位夺权斗争全面展开,各级党、政机构逐渐被迫停止工作。3月28日,3026部队奉命对鹤岗市实行全面军事管制。1968年5月22日,鹤岗市革委会经省革委会批准宣告成立。^{【1327】}主任汪涛。

【1324】《黑龙江省政权系统、地方军事系统、统一战线系统,群众团体系统组织史资料》,页238。

【1325】《黑龙江省政权系统、地方军事系统、统一战线系统,群众团体系统组织史资料》,页239。

【1326】大兴安岭地区史志鉴编委员会:《大兴安岭历史编年》,北京:方志出版社,2001年,页677-683。

【1327】鹤岗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鹤岗市志》,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页52。

(十六) 大庆特区

1968年5月31日,大庆特区革委会成立,主任褚传禹,副主任周的民、李荆和(原大庆工委第一副书记)、齐健敏(第十六军四十六师副师长)、张绳武(第四十六军一三七师副师长)、王进喜(原钻井指挥部副指挥)、张洪池(原钻井指挥部测井中队指导员)、陈俊(原会战机关计划处处长)、刘淑媛(原采油一部工会干事)。^{【1328】}大庆革委会成立后,军管会与革委会同时行使党政权力。1969年10月,沈阳军区党委决定将大庆军管会的领导权移交黑龙江省军区,11月,免褚传禹主任职,翌年4月,省军区副司令员丁继先任中共大庆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军管会主任。1973年2月,根据中央精神,黑龙江省委、省军区批准撤销大庆油田军管会。

1968年7月前,以上16个地、市、特区革委会,除1个第一把手空缺不作计算外,其余15个,由地方干部任第一把手的5个,占33%;由军队干部任第一把手的10个,占67%。军队干部中,省军区系统6个,占40%;二十三军2个,占13%;铁道兵大兴安岭林区指挥所和十六军各1个,各占7%。1968年年7月后,地、市、特区革委会调整为14个后,由地方干部任第一把手的4个,下降至占29%;由军队干部任第一把手的10个,上升至占71%。其中省军区系统5个,占36%;二十三军3个,占21%,铁道兵大兴安岭林区指挥所和十六军不变,仍各1个各占7%。

第五十八节 山东：济南军区与王效禹的斗争

一、山东驻军简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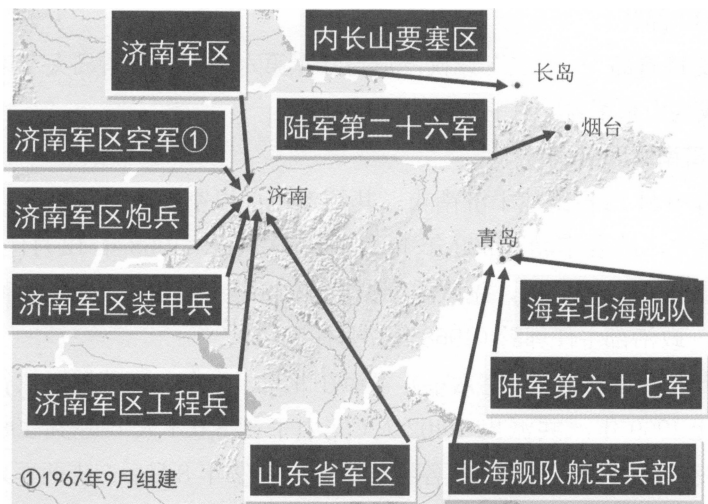
1967年1月至1968年12月,山东省内军以上单位数量11个,即济南军区,海军北海舰队,济南军区空军,陆军第二十六军、第六十七军,山东省军区,内长山要塞区,济南军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北海舰队航空兵部。另陆军第六十八军所辖1个陆军师及所领导指挥1个守备师驻山东境内。

(一) 济南军区

领导和指挥山东全境和江苏徐海地区所属武装力量。领率机关驻济南市。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谭启龙(1967年5月免),第一政委王效禹(1967年5月任),第二政委袁升平,副司令员范朝利、杨国夫、陈庆先(1968年7月免)、王建安、

【1328】大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大庆市志》，南京：南京出版社，1988年，页24-25。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我省最后一批市、特区、县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备案报告》，1968年6月26日。

山东驻军分布图(1967-1968)



张仁初、傅家选、刘昌毅、李水清(1968年1月任)、陈宏(1968年11月任),副政委李耀文、陈美藻、何柱成(1968年7月免),参谋长陈宏(1968年11月免)、熊作芳(1968年11月任),政治部主任李耀文(1968年1月免)、陈继德(1968年1月任)、李勃(1968年10月任)。^{【1329】}

(二) 海军北海舰队

领率机关驻青岛市。司令员刘昌毅,政委丁秋生(1967年9月免),第二政委卢仁灿(1968年2月免),副司令员易耀彩、张元培、邓龙翔、邓兆祥、马忠全、潘炎(1968年11月免)、赵汇川,副政委宋景华(1967年8月任),参谋长张晓冰(1967年10月免)、苏军(1968年11月任),政治部主任李镜如(1968年10月免)、辛国治(1968年10月任)。^{【1330】}

1967年10月,北海舰队领导班子调整,党委代理书记易耀彩,代理副书记宋景华。

【1329】杨得志、王建安,1955年授衔上将。袁升平、范朝利、杨国夫、陈庆先、张仁初,1955年授衔中将。刘昌毅,1955年授衔海军中将。李水清、陈宏、李耀文、陈美藻、何柱成、熊作芳,1955年授衔少将。陈继德,1965年大校军衔。李勃,1955年授衔空军少将。

【1330】丁秋生,1955年授衔中将。卢仁灿、易耀彩、张元培、邓龙翔、邓兆祥、马忠全、宋景华,1955年授衔海军少将。潘焱,1955年授衔少将。赵汇川,1961年晋升海军少将。张晓冰、李镜如,1964年晋升海军少将。辛国治,1964年晋升少将。

所辖师以上部队在山东境内有北海舰队航空兵部(4100部队)、青岛水警区(4015部队)、威海水警区(4006部队)、潜水艇第十二支队(4041部队)、快艇第一支队(4042部队)。

初期支持青岛“一二二”夺权，后与陆军第六十七军在青岛支左诸问题上产生分歧，成为山东军内反对王效禹的主要力量。

(三) 济南军区空军

1967年9月15日组建于济南市。其领率机关以空军第六军机关人员组成。司令员吴宗先，政委李勃(1968年10月免)、关盛志(1968年12月任)，副司令员王定烈(1968年11月任)，副政委李振声(1968年7月任)，参谋长谭有富(1968年7月任)，政治部主任郭黔(1968年7任)。^{【1331】}

1967年1月后，济空(空六军)奉命在北京、山东、江苏地区执行三支两军任务。截止1969年，共派出4,402人(其中干部3,031人)驻到498个单位；至1971年底有208名干部参加了各级革委会。1972年8月后三支两军人员陆续撤回。^{【1332】}

(四) 陆军第二十六军

领率机关驻烟台市，代号6003部队。军长赵峰，政委程世清(1968年2月免)、魏伯亭(1968年2月任)，副军长栗亚、杨栋梁(1968年2月免)、陈福胜、亓谦斋(1968年2月任)，副政委魏伯亭(1968年2月免)、张宗华(1967年8月任)、许洪云(1968年2月任)，参谋长亓谦斋(1968年2月免)、曾永华，政治部主任张志(1967年4月免)、韩友庆(1968年2任)。^{【1333】}

辖陆军第三十三师、第七十六师、第七十七师、领导指挥守备第六师、第二十五师。第三十三师师长尹书信，政委王立升。第七十六师师长张元和，政委许洪云(1968年3月免)、孙好贞(1968年5月任)。第七十七师师长刘学山，政委韩友庆(1968年2月免)、刘迺晏(1968年7月任)。

该军军史称：

1967年1月21日，毛主席发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此后，我军奉济南军区命令在烟台地区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军、师成立了“支左办公室”，整个三支两军工作由军党委集体领导，分工魏伯亭具体负责，并任烟台地区革委会主任，陈福胜任副主任。第33师负责文登县；第

【1331】吴宗先、关盛志、李振声，1955年授衔空军少将。王定烈，1961年晋升空军少将。

【1332】《中国共产党空军组织史资料丛书》第1集，页386-387。

【1333】赵峰，1964年晋升少将。魏伯亭、栗亚、亓谦斋、张志、张宗华，1965年大校军衔。

76师负责莱阳、莱西、招远县；第77师负责福山、栖霞县；守备第6师负责乳山、荣成县；守备第25师负责威海市、牟平县，烟台市由军直接负责。全军抽调大批干部战士赴“第一线”，落实紧迫的春耕生产。2月，军又抽调部分干部战士赴胜利油田、华东石油学院“支左”，后实行“军管”。3月底，根据军区党委决定，军指派第33师（机关2/3、炮兵第558团）、第77师（机关2/3、第230团）分赴德州、惠民地区执行三支两军任务。

6月，军委命令我第76师赴江西执行三支两军任务。该师（欠炮团、坦克团、第228团2营）于7月16日从莱阳、马格庄站乘火车开进，7月22日全部到达指定地点。全师分布于南昌、青云谱、宜春、九江等5市、3专区、36个县、261个厂矿企业。部队广大干部战士在社会秩序极为混乱、情况极为复杂、斗争极为激烈的情况下，坚持“四不”政策，为制止武斗，稳定局势，恢复生产做了大量工作。

……

1968年，根据军区指示，我军又派出部分干部战士赴胜利油田、淄博煤矿、青岛海军三校及北京、济南、泰安等部分工厂、企事业单位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同时，部分军、师、团领导干部作为军队代表，参加了地方“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1334】}

（五）陆军第六十七军

领率机关驻青岛市，代号6037部队。军长李水清（1968年1月免）、齐威（1968年1月任），政委陈继德（1968年1月免）、王金泉（1968年1月任），副军长齐威（1968年1月免）、孔瑞云（1967年7月免）、秦镜、温安仁、陈新华（1968年1月任），副政委王金泉（1968年1月免）、陈英华（1968年2月任），参谋长秦镜（1968年2月免）、康成山（1968年2月任），政治部主任张健（1968年1月免）、林之岐（1968年1月任）。^{【1335】}

辖陆军第一九九师、第二〇〇师、第二〇一师。领导指挥守备第十九师、第二十师。第一九九师师长陈英华（1968年5月免）、李万恒（1968年5月任），政委王德高（1968年5月免）、林东（1968年5月任）。第二〇〇师师长陈新华（1968年2月免）、翟宪明（1968年5月任），政委李永昌（1968年5月免）、周庆（1968

【1334】陆军第二十六集团军：《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二十六集团军军史（1937.12—1988.12）》，1989年，页354-356。

【1335】孔瑞云，1964年晋升少将。齐威、王金泉、秦镜、陈新华、张健，1965年大校军衔。

年5月任)。第二〇一师师长张宗惠(1968年5月免)、葛志华(1968年5月任),政委史坦。

青岛“一二二”夺权及王效禹在山东军内的最坚定支持者。1967年3月16日,《人民日报》以“驻青岛某部党委会”名义,发表题为“识别革命派,支持革命派”的文章。6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李水清、陈继德载于《红旗》杂志1967年第十期题为“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文章。1968年1月11日,经毛泽东、林彪批准,军委任命李水清为济南军区副司令员,陈继德为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齐威、王金泉分别继任军长、军政委。^{【1336】}

1968年12月,二〇一师与六十八军二〇四师对调防务和改变建制领导关系。对调后,二〇一师驻山东临沂地区原二〇四师营房,二〇四师驻原二〇一师山东胶南县营房。

该军军史称:

一九六七年

一月,遵照济南军区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转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对仓库进行军事管制的问题》的电示,我军从一月二十日起,先后派出干部、战士二千九百三十三人(其中干部三百零九人),对一市(青岛)、六县(崂山、即墨、海阳、诸城、胶县、胶南)一百二十三个重要仓库和目标实行了军事管制和警卫。

一月二十四日,表态支持了青岛市“一二二夺权”。并派主要领导同志参加了青岛市革委会的工作。

二月,我军遵照济南军区的指示,先后投入了三个团(五九五团、五九六团、五九七团)进入青岛市执行三支两军任务。

二月,根据毛主席“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的指示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我军于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派出五百一十三人(其中干部三百七十四人)担负对青岛市北区、崂山县、即墨县、胶南县、诸城县、海阳县的大中学校师生的训练任务,共大中学校四百四十八所,训练师生五万零七十八人。另外还协助友军对聊城地区八个县和胶县大中学校的师生进行了训练,一九六七年五月,军训人员全部撤出军训点。

【1336】李水清后历任国务院一机部革委会主任、第二炮兵司令员,中共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陈继德后历任总参政治部主任、副总参谋长、湖北省军区政委、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

二月，军相继派出了六个团共 174 个连队赴聊城、昌潍、烟台地区、青岛市十五个县二百零六个公社支农。

四月，军成立了军代表领导小组。

五月，军代表领导小组改为三支两军办公室，下设秘书、政工、接待、军训、军管、军代表六个组。

六月，根据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济南军区党委、山东省军区党委六月十三日联合作出《关于昌潍地区三支两军工作同意由六十七军负责的决定》，由一名军的领导同志率步兵五九九团、炮兵五七九团进驻昌潍地区执行三支两军任务。

一九六八年

二月，五九五团奉中央军委一九六八年二月六日命令，赴江苏省徐海地区，在六十八军（后为坦克二师）领导下，担任以徐州为中心，南至符离集，北至利国，东至连云港，西至碭山的铁路警卫任务。于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一日奉命返回。

二月，根据中央《关于对全国公安机关实行军管的决定》，山东省革委和济南军区二月五日正式宣布对青岛市政法部门实行军管。我军负责对青岛市政法部门实行军管，共有军代表八十一名。

八月，遵照济南军区《关于接收地方大学毕业生到部队农场锻炼的指示》，我军接收了属四机部领导的，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南京等十四个省市四十七所大专院校一千一百二十三名毕业生，到军胶县沽河农场、即墨县金口农场，组成八个学生连，分别编入担任生产任务的五九六团、六〇〇团、炮兵五八〇团学习锻炼。

十一月十九日，表态支持了青岛市搞的“反复旧”。

一九六九年

十一月，鉴于中央军委确定我军编入统帅部战略预备队，军区决定我军撤出青岛、昌潍两地区的三支两军工作。

十二月三十一日，军三支两军办公室撤销。^{【1337】}

【1337】陆军第六十七军：《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六十七军军史》，1984年，页317-319。

(六) 山东省军区

领率机关驻济南市。司令员童国贵，第一政委刘秉琳（省委第三书记兼，1967年5月免）、王效禹（省革委会主任兼，1967年5月任），第二政委何志远，第三政委唐健如（1968年7月任），副司令员黄玉庭、冯仁恩、傅健吾、易积贵、阮帮和、陈忠梅，副政委孙芳圃、曾广初、彭嘉珠、龚纪明（1967年11月任，未到职），参谋长刘鹏，政治部主任袁天枢（未到职）、葛群（1967年8月任）。^{【1338】}

辖济南市、青岛市、淄博市、枣庄市人武部，昌潍、烟台、济宁、秦安、德州、惠民、临沂、菏泽、聊城军分区。并辖山东省军区独立第一师、独立第二师。

山东省军区独立第一师（4788部队），1966年6月组建，辖步兵第一、第二、第三团。师长顾良，政委郭勃然。

山东省军区独立第二师（6221部队），1966年8月，由山东省公安总队改编，辖步兵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团。师长姜昆（1967年6月任），政委龚纪明（兼，1967年11月任，1968年10月免）。

(七) 内长山要塞区

领率机关驻长岛县，代号6094部队。司令员翟毅东，政委曹普南，副司令员曾昭林、马达卫、刘佐、王法山（1968年2月任），副政委李兰芳，参谋长胡铁成（1968年2月免）、王法山（1968年2月兼），政治部主任徐尧田。^{【1339】}执行军级权限。辖大钦、北长山、蓬莱3个守备区。

(八) 济南军区炮兵

领率机关驻济南市。司令员颜伏，政委张辑光，副司令员张志毅、王均、王大田，副政委杜季伟，参谋长李达九，政治部主任李益亨（1968年4月免）、崔清福（1968年4月任）。^{【1340】}辖炮兵第八师（6167部队）、第十二师（6185部队）、第三十二师（6210部队）、第六十七师（6205部队）、第六十九师（6179部队）。

【1338】童国贵、何志远、唐健如、黄玉庭、陈忠梅，1955年授衔少将。冯仁恩，1961年晋升少将。傅健吾、易积贵、阮帮和、孙芳圃、曾广初、龚纪明、刘鹏、彭嘉珠，1965年大校军衔。

【1339】翟毅东，1964年晋升少将。曹普南、王法山、李兰芳、刘佐、马达卫、徐尧田、曾昭林、胡铁成，1965年大校军衔。

【1340】颜伏、张辑光，1961年晋升少将。张志毅，1964年晋升少将。王均、杜季伟、李达九、崔清福，1965年大校军衔。

(九) 济南军区装甲兵

领率机关驻济南市。司令员刘涌，政委罗通，副司令员罗杰、简国湘，副政委胡华居，参谋长杨金山，政治部主任张俊西。^{【1341】}辖坦克第二师（师部江苏徐州，6057部队）、坦克第八师（1967年9月在山东莱阳组成，6228部队）。

(十) 济南军区工程兵

领率机关驻济南市。主任冯志湘（1968年12月任），政委熊飞，副主任冯志湘（1968年12月免）、马连辉，副政委李大清，参谋长马连辉（兼），政治部主任杨文会。^{【1342】}

(十一) 海军北海舰队航空兵部

领率机关驻青岛市。司令员解长泰，副司令员李树荣、陈士珍、马溪波，副政委毕德林，参谋长马溪波兼，政治部主任郭宝恒。^{【1343】}

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辖海军航空兵第一师（4101部队）、第三师（4103部队）、第四师（4104部队）。1968年2月，海航第四师与第二师（4302部队）对调防务，组建海航第十师（4194部队）。1968年7月，组建海航第十二师（4106部队）。均归北海舰队航空兵部建制领导。

(十二) 陆军第六十八军所属师级部队

陆军第六十八军两个师（陆军第二〇四师、守备第二十六师）驻山东境内。

陆军第二〇四师，1968年12月前师部在山东临沂县，代号6085部队。师长李炳智，政委孙子斌。第二〇四师在临沂地区支左中抵制王效禹及其支持的造反派组织，以至到1967年10月20日，二〇四师党委常委不得不在压力之下低头，在《关于在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中称，“我们在临沂地区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政治、立场、方向、路线错误。犯下了扶植、支持保守势力，压制、打击、镇压红卫兵小将、革命群众，对抗中央指示，挑动农民进城武斗，围剿六大革命组织，煽动部队‘造反’、绑架、毒打省‘三结合’的代表团，公然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造成临沂‘武汉’事件的严重罪行。……我们向毛主席请罪，向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两级军区、三大组织请罪，向临沂六大革命组织请罪，向全体指战员请罪。”1968年12月20日，根据军委批复，第六十七军第二〇一师进驻临沂，接替第二〇四师防务，归第六十八军建制；第二〇四师进驻胶南县薛家庄，接替第二〇一师防务，归第六十七军建制。

【1341】刘涌、罗通、胡华居，1955年授衔少将。罗杰，1964年晋升少将。简国湘，1965年大校军衔。

【1342】熊飞，1955年授衔少将。李大清，1964年晋升少将。冯志湘、马连辉，1965年大校军衔。

【1343】李树荣，1964年晋升海军少将。李学昌、解长泰、毕德林，1965年海军大校军衔。

守备第二十六师，师部位山东日照县，代号 6152 部队。

二、1967-1968 年济南军区与王效禹的关系

在青岛、山东夺权后，王效禹得到以毛为首的中央及中央文革的鼎力支持，出人意料地轻易取得了山东军、政一把手的地位，连济南军区一千老资格的上将、中将、少将们都不得不自叹弗如！文革结束多年后军方出版的《济南军区史》，从军方立场反映了此一时期济南军区与王效禹的关系称：

1967年3月，时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王效禹，为排除异己，实现由他那一派独揽大权的目的，也趁机在山东全省发动了所谓的“反逆流”运动。他一面指使受其控制的造反组织在济南和各地加快夺权，一面把由另一部分群众组织夺权成立的革命委员会说成是“假夺权”、“大杂烩”，指使受其控制的造反组织实行反“夺权”，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各群众组织之间的对立，也加剧了他与许多“支左”部队和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在“反逆流”运动中，大批被结合的各级领导干部再次遭受造反派的无端批斗，已经联合起来的群众组织再度分裂和走向对立，由此引发的全省各地派性之争和武斗事件接连不



右起：王效禹、谢胡与杨保华，青岛，1967年10月6日。

断。与此同时，王效禹借“反逆流”运动，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攻击“山东部队一介入‘支左’就搞了逆流”，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与“二月逆流”的后台相勾结，是山东“反革命逆流的支持者”，并点名批判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和副司令员杨国夫。一段时间内，“揪出保守势力的黑后台”、“打倒杨得志”、“打倒袁升平”、“打倒杨国夫”、“打倒李耀文”的大幅标语张贴于全省各地(市)的大街小巷。全省凡有三支两军单位的干部战士无一幸免的受到冲击，绝大部分军代表被赶出革命委员会，“三结合”的领导机构陷入瘫痪瓦解，初步得到恢复和发展的工农业生产再次遭到破坏。

对王效禹发动的所谓“反逆流”运动，军区一开始就持反对态度并设法抵制，杨得志曾当面向王效禹转达了军区对“反逆流”运动的不同看法和意见。王效禹口头上接受，并表示要纠正不当的做法，但在实际行动上却依然如故。为此，军区不得不于4月19日以《当前济南地区文化大革命情况简报》的方式，向“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和中央军委报告：“济南地区，自3月24日起，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斗争急剧展开。……但是在‘反逆流’和大批判中，出现了不是团结大多数，打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不断发生学生斗学生，学生冲工厂，造成学生之间、学生和工人之间的严重对立，发生了一系列规模较大的武斗现象。山东省作战部、济南市‘反逆流’办公室，对他们认为是保守派夺权的单位，不是发动内部群众去解决，而是一律组织学生重新串联，要学生冲出学校，杀向社会，用打、砸、抢、抓的办法将其摧垮，进行反夺权。他们的最终矛头是指向解放军的。上述问题，完全是省革委某些负责人决定的。军队事前不知，连参加‘三结合’的军方代表也不了解。在此情况下，如果军队出面，则将使军队和省革委公开对立。因此，军队处于困难的地位。”4月28日，军区党委向毛泽东、中共中央发电报，反映了山东当时出现的混乱局面和军区领导与王效禹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原则分歧，感到这些分歧靠自身的努力难以解决，请示党中央派人来济南帮助解决山东的问题。

山东的情况引起了中央的关注。4月30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张春桥、姚文元到济南。他们来济后，表面上声称“要做各方面的工作”，“正确解决山东问题”，实际上却站在派性的立场上，为王效禹撑腰打气，指责军队“支持保守派”，“站在保守派一边”。要求部队“调屁股、转弯子”，“同造反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他们还支持王效禹制造的拘押干部群众388人的济南最大的镇压群众事件——“五七事件”，称“王效禹打了大胜仗”。

张春桥、姚文元回到北京后，给毛泽东、林彪和中共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写了《关于处理山东问题的报告》。《报告》偏袒、美化王效禹，攻击、诬蔑杨得志和袁升平。

这期间及其以后，又连续发生了三件事情，使军区领导不得不重新考虑怎样对待王效禹的问题。第一件事，张春桥、姚文元在济南期间的5月4日晚，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从北京给正在参加军区党委常委会的杨得志打电话说，“我刚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回来，中央‘文革’要我给济南军区领导打电话，要济南军区坚决支持王效禹，支持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支持革命‘左派’、支持革命的‘三结合’”。第二件事，中央军委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于4月30日命令，免去谭启龙济南军区政治委员职务；接着又于5月8日，任命王效禹为济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山东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这两件事的发生，给军区领导以很大震动，遂于5月16日以军区党委的名义，向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上报了《对“支左”工作初步检查的情况报告》。在《报告》中，军区党委检查了“支左”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分析了原因，承担了责任。第三件事，即5月28日，山东省军区少数领导未经省军区党委多数常委研究同意，也未向济南军区报告，就以山东省军区的名义发表了《五点声明》，公开检查“支左”工作中的错误，并于5月31日向中共中央上报了《关于向革命群众公开检查“支左”工作中的错误的情况报告》。6月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中央军委、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批转了这个《报告》，对山东省军区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指出“《报告》提出的三条体会：（一）公开检查比不公开检查好。（二）高姿态检查比低姿态检查好。（三）早检查比晚检查好。这些都是正确的”，“中央的批语和山东省军区的《报告》，请济南军区发到连队，向全体指战员宣读”。中共中央批转山东省军区的《报告》，并给予高度评价，迫使军区党委不得不进一步作出决断。6月7日，军区党委发布了《济南部队党委给山东省革命群众的一封信》，公开检查了军区部队“支左”的错误，按照“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指示，明确表示了坚决支持王效禹，坚决支持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坚决支持革命的“三结合”。6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济南军区党委的公开信。为了统一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6月19日-7月3日，军区党委召开扩大会议，进行开门整风，检查“支左”工作中的错误，总结经验教训。

6月26日，中共中央通知，批准王效禹为济南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此，王效禹身兼山东省和济南军区、山东省军区的最高职务于一身。

7月10日，军区党委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上报了《关于纠正“支左”工作的错误的情况报告》。8月3日，林彪在北京接见了杨得志。林彪讲，“对主席的指示，最好是思想上能理解，如不能够理解，就照办。如果什么都理解了再办就迟了。……你们早检讨早转过来是好的。迟转不如早转好”。8月9日军区召开电话会议，杨得志向各大单位领导干部传达了林彪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带头“转弯”，深入部队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帮助部队尽快“转”过来。

实际上，军区和山东省军区的公开检查和“四个坚决支持”的表态是违心的，也是违背大多数干部战士的意愿的。这一做法，曾一度遭到广大干部战士不同形式的激烈反对。后经反复的说服教育和纪律约束，反对的声浪才逐渐平息下来。

这场与王效禹“反逆流”的斗争，由于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和制约，未能获胜。军区党委和军区领导只好委曲求全，违心检查，并不得不表示“坚决支持王效禹”。此后，王效禹愈加有恃无恐。

1968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王效禹利用学习、贯彻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的时机，于11月主持召开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第五次全体扩大会议上，正式作出了“反复旧”的决议。自此，在全省组织发动了所谓的“反复旧”运动。^{【1344】}

三、各地、市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1967-1968年，山东省辖9地区，4省辖市。各地、市革委会的建立（以建立先后为序）及与军队的关系简况如下。

（一）青岛市

1967年1月22日，青岛东方红等23个造反团体在汇泉广场举行夺权大会，宣告成立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正式接管中共青岛市委、市人委的一切权力。1月24日，参加夺权的23个群众组织负责人召开会议，讨论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的组成问题，确定各组织派出委员的名额，由杨保华等任常委。3月1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改名为青岛市革命委员会。1968年2月10日，省革委会、济南军区同意杨保华任青岛市革委会主任，王金泉、易耀彩、何传修等任副主任。^{【1345】}

【1344】《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史》第一卷，页289-292。

【1345】杨保华，青岛明胶厂工人造反派。何传修，时任青岛市人民武装部部长。

(二) 济南市

1967年1月24日，济南革命工人造反派总部、红卫兵济南指挥部等9个组织组成济南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夺权委员会，勒令被批判的当权派当场签字交权，以济南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夺权委员会名义发表《告济南市人民书》，宣称夺了中共济南市委、济南市人委的权。2月6日，夺权委员会改名为济南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2月26日，大联合革命委员会改称济南市革命委员会。1968年3月28日，省革委会批准了调整后的济南市革委会领导成员，傅建吾任主任。同时由傅健吾等组成中共济南市革委会核心小组，傅健吾任组长。^{【1346】}

(三) 济宁地区

1967年2月5日，山东济宁红色劳动者造反派总部、济宁地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等7个组织在驻军的支持下，联合召开夺权誓师大会，冲击中共济宁地委、济宁专员公署机关，夺了印章，成立了山东省济宁地区革命造反派委员会（后改称山东省济宁地区革命委员会），刘书明（工人）任主任。12月15日，济宁军分区奉命停止支左，官兵调济南整训。17日，炮兵第十二师奉济南军区命令，组建济宁驻军支左指挥部进驻济宁。1968年1月22日，中共济宁驻军支左指挥部党委决定成立济宁驻军支左指挥部生产指挥部。该指挥部为地革委改组前临时负责抓生产的权力机构。4月6日，济宁军分区官兵奉命返回济宁，恢复执行三支两军任务。4月29日，省革委会批准成立新组成的济宁地区革委会，康俊玉任主任。^{【1347】}

(四) 烟台地区

1967年2月12日，在驻军支持下，群众组织、驻军和机关干部代表联合成立山东省烟台地区红色造反者大联合革命委员会，并得到省革委会承认。2月27日，改称烟台地区革委会。主任魏伯亭。^{【1348】}

(五) 德州地区

1967年2月21日，建立临时权力机构——德州地区革命委员会，军队代表曹通三任主任委员。4月4日，经中共山东省核心小组批准，建立德州地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邓和山。9月，6210部队（炮兵第三十二师）到德州地区参

【1346】济南市史志编纂委员会：《济南市志》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页246-250。

【1347】济宁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济宁市志》，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页56-57。康俊玉，时任炮兵第十二师副政委。

【1348】烟台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烟台市志》，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94年，页45、223。

加三支两军工作。1968年6月6日，山东省革委会批示：同意改组德州地区革委会，韦锦章任主任。^{【1349】}

(六) 惠民地区

1967年2月27日，全区部分群众组织联合夺了地委、专署的权，成立了惠民地区革命委员会，宣布由地革委掌握惠民地区党政财文一切大权。葛东任主任。1968年2月22日，省革委会鲁革发[68]第29号文件，批准惠民军分区党委报告，同意改组惠民地区革委会，葛东仍任主任。^{【1350】}

(七) 聊城地区

1967年3月12日，成立三结合的聊城地区革委会，由朱品文（聊城军分区第二政委）任主任。6月，朱品文回军分区机关，张身敬（原专署机关群众组织代表）接任地革委主任。9月，高炮六十七师（6205部队）、聊城军分区奉命在聊城地区执行三支两军任务。1968年7月14日，省革委会对聊城革委会进行充实调整，由6205部队原政委、济南军区炮兵政治部主任崔清福任主任。

(八) 昌潍地区

1967年3月13日，以昌潍地直机关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为主，联合其他一些群众组织夺了地委、专署的权，组成昌潍地区革委会。5月27日，省革委会作出“关于处理昌潍地区问题的决定”，要求以东方红总部为主改组昌潍地区革委会。6月7日，6037部队进驻昌潍地区，代替原驻军、军分区及各县（市）武装部，实行三支两军。9月，昌潍地区革委会筹备委员会成立，秦镜任主任。原地区革委会和大联合造反组织解体。原革委会主任、昌潍军分区司令员韩进忠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苗长松被大会揪斗。1968年2月14日，昌潍地区革委会第二次建立。秦镜任主任。^{【1351】}

【1349】山东省德州地区史志编纂委员会：《德州地区志》，济南：齐鲁书社，1992年，页38-40。曹通三，时任德州军分区副司令员。邓和山，时任德州军分区司令员。韦锦章，时任炮兵第三十二师副师长。

【1350】滨州地区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滨州地区志》，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页38。葛东，时任惠民军分区司令员。

【1351】潍坊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潍坊市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页58-59、1153。

(九) 泰安地区

1967年1月26日，泰安地区造反派大联合总指挥部夺了地委、专署的权。3月14日，泰安地区革委会成立，由房众夫任主任。1968年11月，李毅之任主任。^{【1352】}

(十) 淄博市

1967年1月29日，淄博市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夺取中共淄博市委、市人委的权。3月16日，淄博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权委员会在张店体育场聚集2万人举行夺权大会。宣布成立淄博市革委会，这是淄博市第二次夺权。1968年5月21日，淄博市革委会、淄博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公布：淄博市革委会由73名委员组成，其中群众代表37名，军队代表13名，4个区代表8名，革命干部代表15名，主任顾良。^{【1353】}

(十一) 菏泽地区

1967年3月，成立了菏泽地区革委会，但省革委会未批复。1968年1月，省革委会批准了调整后的菏泽地区革委会。主任白光（菏泽军分区副参谋长）。

(十二) 临沂地区

临沂地区八大革命组织联合总指挥部1969年10月编印的《临沂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情况》称：“临沂地区六七年一月夺权，四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主任庞世泽（临沂军分区政委）。五月份革命群众组织内部由于对革命委员会和驻军支左工作发生分歧，而形成成为两大派，一派是六大组织要砸烂地革委，揪出孙庞二贼（孙指六〇八五政委孙子斌，庞指军分区政委庞世泽）；一派是八大组织，支持革委会，支持解放军。驻军主张两派搞大联合。但在山东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支一派灭一派的错误思想指导下，调动四十三个连队及全省‘援临’的数万群众对八大组织实行武装镇压，使八大组织失去合法地位，至今还有被赶出外地的数千人有家不能归。驻军因两派都支持，被说成支了‘老保’，孙、庞二政委被六大组织揪斗数日之久。部队中除一边倒支持六大组织的少数人被封为‘支左模范外’，绝大多数指战员被说成是‘老保’。八大组织被武装镇压，孙、庞二政委被公开揪斗后，地革委彻底解体，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重新成立了由六大组织一派掌权的‘地区革命委员会’^{【1354】}。由于一派掌权，一派受压，掌权的是少数

【1352】山东省泰安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泰安地区志》，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页31、447。房众夫，原中共泰安地委副书记。李毅之，时任泰安军分区副政委。

【1353】淄博市志编纂委员会：《淄博市志》，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页49-50、548。顾良，时任山东省军区独立第一师师长。

【1354】主任孔世军（时任临沂军分区副司令员）。

人，受压的将近80%的工农群众，所以，尽管新建地革委大搞武装统治，临沂形势仍然不稳。”

（十三）枣庄市

1968年3月6日，枣庄市革命委员会成立，马茂宗（炮兵第十二师政委）任主任。

上述13个地、市级革命委员会，以1968年调整后（或无需调整）至1968年底的第一把手计，群众组织代表1人，占8%，其余12人为军队代表。其中省军区系统6人，占46%；军区炮兵系统4人，占30%；陆军第二十六军及第六十七军各1人，各占8%。军队代表合共占92%，占绝大多数。

四、对王效禹的揭发批判和处理

进入1969年，济南军区与王效禹的关系更趋紧张。《济南军区史》称：“王效禹‘反复旧’的所作所为，激起了部队广大干部战士和山东广大干部群众的极大愤慨，军区党委下决心要把王效禹的问题彻底揭开。为寻求解决问题的稳妥办法，1969年初，军区党委常委专门开会研究斗争策略。到会的常委认为，从目前的情况看，军区党委面临三种选择：一是王效禹无论对错军区都支持。其结果，军区党委肯定要犯错误，这显然不行。二是同王效禹对着干。这样势必将军区与王效禹的分歧公开化，不利于局势的稳定，同样会犯错误。三是将王效禹的问题在适当时机向中央军委反映，请中央军委帮助解决。最后，与会的军区党委常委委员一致认为，第三种选择比较稳妥。同年3月，杨得志、袁升平利用去北京的机会，将王效禹的主要问题向中央军委办事组负责人作了汇报。军委办事组对此极为重视，要求他们将王效禹的主要问题写成文字报告，报送毛泽东、中共中央。杨得志、袁升平的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1355】}

惟毛泽东初时对王效禹仍采取了偏袒的态度。1969年4月24日，王效禹在中共九大上仍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4月28日，在第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被通过为中央军委委员。同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讲话谈到团结问题时举了山东的例子称，“为了胜利，就是要人多一点了，是不是呀？各方面的人，不管你是哪个山头或者哪一个省的，或者是北方、南方的，还是多团结一点人好，还是少团结一点人好呢？总是多团结一点人好。有些人的意见不一定跟我们一致，但是，不是敌我关系。我就不相信，比如具体来讲，说是什么杨得志跟王效禹是敌我关系。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是敌我关系，还是人民内部的关系呀？据我看

【1355】《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史》第一卷，页293。

是人民内部吵吵架。中央也是有点官僚主义，没有大管你们，你们也没有提向中央来讨论。山东这么一个大省，是人民内部矛盾，乘此机会，你们谈一谈嘛，好不好呀？”^{【1356】}

转机是在九大闭幕后。5月4日至28日，中央将山东省革委会和济南军区在京的27人集中时间进行了学习。5月20日，中央同意增补与王效禹不咬弦的济南军区领导干部袁升平、李水清、李耀文及穆林、张富贵为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1357】}5月24日，以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三人名义给中央报告，不点名地批评王效禹称：“山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总的形势是大好的，……但由于省革委主要负责人的错误思想指导，在前进的道路上，也出现了一些严重问题，特别从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以来，暴露的更加突出，一种不相信不依靠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怀疑一切的错误思想，进一步发展起来，在全省错误地发动的‘反复旧’运动，实质上是干扰清理阶级队伍，把矛头指向了解放军，指向了革委会，指向了革命干部，指向了广大群众，破坏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背离了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带方向性的错误。这一错误，不仅对山东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失，而且波及到一些兄弟省，直接影响了‘九大’精神的贯彻，后果是不好的。必须认真加以纠正，接受这一经验教训。”

报告提出，“为贯彻‘九大’精神，妥善解决存在的问题，经大家反复研究，拟采取以下措施”，其中第（二）点及第（四）点称：“（二）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紧跟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对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切指示，必须原原本本地传达，认真贯彻执行。坚决反对对中央指示阳奉阴违，适合自己口味的就执行，不适合自己口味的就抵制、封锁甚至歪曲的实用主义态度。加强组织纪律性，工作情况要经常地、如实地向中央请示报告。特别是重大问题，必须报请中央批准后再执行。反对自以为是，另搞一套。彻底批判反动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坚决反对搞独立王国的倾向”。“（四）要加强革命委员会的一元化领导，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一元化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一定要自觉地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在革命委员会内部，要把无产阶级党性原则，提得高高的。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坚

【1356】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69年4月28日。中发[69]21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1969年5月12日发出。

【1357】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山东省档案馆：《中共山东历史大事记》，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页548、550。穆林，原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富贵，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

决支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坚决斗争。要加强集体领导，重大问题一定要集体讨论决定，反对个人说了算，个人不能推翻集体制定的决议。有不同意见，要当面讲，允许保留，可以向上反映，但不准搞‘小动作’。在集体领导下，领导成员要有适当分工，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每个成员都要勇于负责，大胆工作。”

报告最后提出，“为了既解决问题，又不致引起反复，对这次学习情况，控制传达范围，绝对不允许传到社会上去。学习的基本情况，目前只在省革委常委和济南军区党委中传达。”^{【1358】}

5月25日，经毛泽东批示“照办”，中共中央同意王、杨、袁三人的报告。5月2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以中发[69]26号中共中央文件将毛泽东的批示，中央对王、杨、袁三人报告的批示及报告原文印45,000份，发至山东省、县、公社、独立营以上革委会、党委、军管组织，又印700份发至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各军兵种，中央直属各机关，军委各总部，政府各部委，等于在相当大范围内公开了王效禹的问题。

5月29日-6月2日，山东省革委常委会、济南军区召开联席会议批判王效禹。会议传达了中央负责人对山东问题的批示，揭发批判了王效禹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后发动“反复旧”、抵制清理阶级队伍的错误。认为他的目的是以此搞乱军区党委，达到改组军区党委的目的。王效禹在会上检查了自己的错误，有关常委也检查了自己的问题。^{【1359】}

6月23日，中共中央批准建立中共山东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核心领导小组由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李水清、李耀文、穆林、赵修德七人组成，王效禹任组长，杨得志、袁升平任副组长，张子石任秘书长。^{【1360】}王效禹虽保留了省革委会主任、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组长职务，山东省的权力实际上转到了杨得志、袁升平等军区领导人手中。

6月22日-10月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山东班。参加学习的有山东省和济南市革委会部分成员，党政机关、大型企事业单位领导、群众组织负责人和解放军支左干部代表，共570人。李水清为学习班领导小组组长、临时党委书记。学习班以大量的事实，揭开了王效禹策划的所谓“反逆流”、“反复旧”的真相。一些跟着王效禹犯了错误的人，绝大多数开始醒悟，逐渐与

【1358】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三同志给中央的报告，1969年5月24日。中发[69]26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1969年5月27日发出。

【1359】《中共山东历史大事记》，页550。

【1360】《中共山东历史大事记》，页551。赵修德，时任山东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张子石，康生之子，文革前任青岛市教育局局长，时任山东省革委会常委。

王效禹划清界限，并揭发批判了王效禹的错误，检查、交待了自己的问题。^{【1361】}10月20日，山东省革委会办公室印发《中央首长重要指示和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山东班学习情况传达汇报提纲》。

1970年4月6日，济南军区党委向毛泽东、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上报了《关于王效禹疯狂反对人民解放军妄图篡夺军权的主要罪恶事实的报告》，建议撤销王效禹济南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治委员和山东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的职务。4月26日，毛泽东视察途经济南，在专列上接见了杨得志、袁升平，听取了他们关于当前工作和王效禹错误情况的汇报。当汇报到军区即将召开党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不会选举王效禹为军区党委委员时，毛称：“不要选他。我也不选他。对他的问题，早有个别人向中央反映。他的事我早已知道。你们不好讲，你们党委也不好讲。”接见结束时，毛幽了一默称：“你们这里升平，过去不平，现在平了嘛！得志了嘛！”6月12日，中共中央撤销了王效禹济南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和山东省军区第一政委职务。13日，军区党委作出决定，撤销王效禹山东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职务。^{【1362】}

1971年3月30日，中共中央批准：杨得志任山东省革委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省革委会主任；撤销王效禹省革委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省革委会主任的职务。4月7日，中共中央批准杨得志为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袁升平为第二书记。4月14日，中央组织部电话通知：中央已批准王效禹下放到辽宁省盘锦农场劳动锻炼，对他的问题的审查和生活供应，仍由山东省委负责。^{【1363】}

第五十九节 贵州：李再含上下台之间

一、贵州驻军简况

1967年1月至1968年12月，贵州省内仅有军以上单位1个，即贵州省军区。另由贵州军区代管的陆军野战部队1个师。以省军区为全省三支两军的主干力量。

（一）贵州省军区

领率机关驻贵阳市。司令员何光宇，第一政委贾启允（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兼，1967年5月免）、李再含（1967年5月任），第二政委石新安，副司令员吴荣正、陈捷弟、张量、韩国锦，副政委李再含（1967年5月免）、张心田、田

【1361】《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史》第一卷，页294。

【1362】《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史》第一卷，页295-296。

【1363】《中共山东历史大事记》，页572-574。王效禹文革结束后从辽宁回到山东，1979年2月被开除党籍，1995年3月3日在山东青州病逝。

化一，参谋长吴昌炽（1968年6月免）、阎秀文（1968年6月任），政治部主任薛光。^{【1364】}辖贵阳、遵义、铜仁、安顺、毕节、凯里、都匀、兴义军分区及贵州省军区独立师。

贵州省军区独立师，1966年6月由贵州省公安总队整编而成，归省军区领导，总编制5,681人。下辖步兵第一团、第二团、第三团，直属步兵营。1967年3月组建高炮营。原各专州公安支（大）队，整编为各军分区独立营。师长刘世明，政委刘金池，副师长张子玉、高生贵，副政委黄怀生、孙光辉，政治部主任刘绍贤。师部驻贵阳市外环城东路，代号7578部队。整编后部队任务不变，担任省级机关、机场、电台警卫，省级监狱、劳改厂矿（农场）罪犯看押，守护铁路、城市警卫等任务。

（二）常驻陆军野战部队

1. 陆军第四十九师

1952年以原二野五兵团留在贵州的三个步兵团为基础组建的轻装师，下辖步兵第一四五团、第一四六团、第一四七团和炮兵第三〇七团。师直属分队有三个独立营和四个独立连，全师共10,158人。1957年全师移防四川，隶属于成都军区。1958年6月，全师回防贵州，隶属昆明军区，由贵州军区代管。师部驻贵阳南厂，1962年后代号7611部队。1968年10月与驻滇西的陆军第四十一师对调，调防滇南，归第十四军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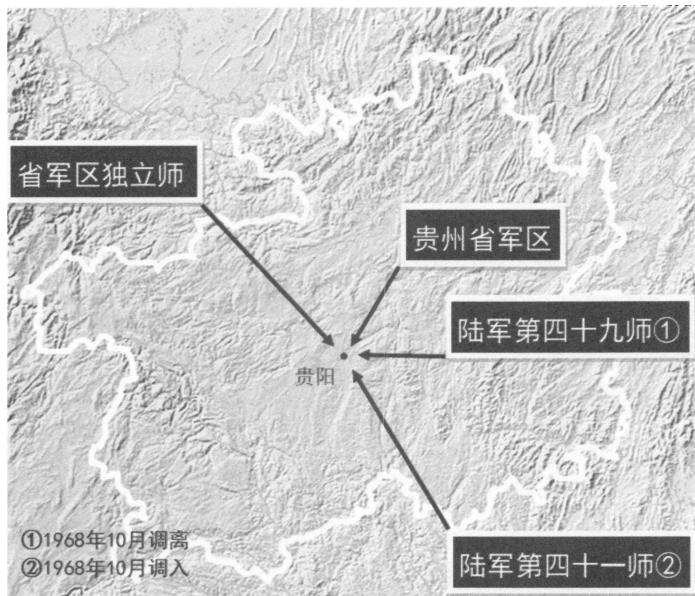
2. 陆军第四十一师

1968年10月，由云南调防贵州，原属第十四军建制不变，由贵州省军区代管，在贵阳、遵义、安顺、毕节等地区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下辖三个步兵团和一个炮兵团，师部驻贵阳南厂，代号改为0276部队。师长王有福，政委张琦。

1969年9月24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在呈送毛泽东的报告中指出，由于李再含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使省军区领导人之间长期以来分成两派，四十一师和独立师，军分区、人武部内严重对立，各支一派，这是贵州问题长期未能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1970年1月，李再含在检查中称：“对41师，态度非常恶劣。对两师调防不满意。对41师错误地认为，他们是来夺权的，所以千方百计挑起41师、独立师的矛盾，拉拢独立师，排斥41师，还千方百计地向中央施加压力，想让中央把41师调出贵州。表面上说，41师刚到贵州，他们人地两生，要很好地关怀这个部队。实际上，想把41师调出贵州，这是非常错误的，并且为达到这

【1364】何光宇、石新安、吴荣正，1955年授衔少将。张量、吴昌炽、韩国锦、陈捷弟、阎秀文，1965年大校军衔。

贵州驻军分布图(1967-1968)



个罪恶目的采取种种错误做法，怂恿、挑动支红派同志给41师出难题，搞变相围攻，我要承担完全的责任。”^{【1365】}

二、1967-1968年贵州文革进程与军队^{【1366】}

1967年4月3日，贵州省革委会向中央请示，要求在报纸上公开点名揭露和批判贾启允。5月28日，中共中央批复贵州省革委会，同意在贵州省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贾启允，并通知也可以在西南地区的地方报纸上公开点名批判李井泉。6月3日，省革委会发出《重要通知》，确定从4日起在《贵州日报》上公开点名批判李井泉和贾启允。

4月11日，贵阳地区部分大中学校的学生冲击贵州省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会议，被称为“四一一”派。5月上旬，“四一一”派由学校逐步发展到社会。6月8日，贵阳地区“四一一”战斗兵团成立，部分工人则成立支持“四一一”联络站。

【1365】邓振新：《贵州风云——地方文革民间实录》，香港：中国国际文艺出版社，2014年，页275、303。

【1366】资料来源：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大事记》，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页494-511。

5月6日，贵州驻军奉命支左，随后又进行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并相应成立支左办公室和军训办公室。

5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任命李再含为昆明军区副政委兼贵州省军区第一政委，免去贾启允贵州省军区第一政委职务。6月4日，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决定，李再含任中共贵州省军区委员会第一书记。

8月28日，省革委会、省军区作出《关于热烈响应〈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的决定》，要求各地热烈响应并开展热烈的拥军爱民群众运动。《决定》指出，关于武装革命群众的问题，必须严格遵照中央指示，一定要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并经省革委会、省军区报请中央批准，然后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所有群众组织和各级革命委员会、军队组织均不得以任何借口擅自自动用一枪一弹。个别地区群众组织现有的武器和军用物资，一律立即交当地驻军。

12月2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贵州省革委会领导核心小组成立。小组由张明、李立、孙昌德、刘安民、康岩中、徐英年、李再含等7人组成。李再含任组长。^[1367]

1968年2月21日，省革委会、省军区发出《关于对地（州）、县（市）公安机关实行军管的决定》，将全省各地（州）县（市）公安机关（包括公、检、法）分为三类，采取不同形式对其实行军管。对已夺权并成立了比较健全的保卫领导小组的，增派军代表，进一步完善和加强保卫领导小组；其余地区（州）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县（市）成立军事管制小组。监狱和劳改单位也一律实行军管。

4月22日，省革委会、省军区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把暗藏的叛徒、特务、党内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

7月23日，省革委会常委、中共贵州省军区委员会常委召开联席会议，针对一些地方出现的严重武斗或变相武斗事件，提出：一、一切革命群众组织严禁武斗或变相的武斗，严禁打、砸、抢、抓、抄、冲，严禁私设监狱、公堂，严禁逼、供、信；二、无条件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连；三、必须无条件交出打、砸、抢、抄和非法占用的一切物资，收归国家所有；必须无条件交出抢劫军队和民兵的武器、弹药，交出外地流入的武器、弹药。

【1367】张明、李立、孙昌德、刘安民、康岩中、徐英年均贵州省革委会副主任。七人中李再含为唯一的现役军人。

8月2日，针对铜仁地区江口、石阡、沿河等县两派夺权发生一系列武斗流血事件，省革委会、省军区作出六点决定：一、立即全面停止武斗；二、各群众组织应立即将用于武斗的一切凶器和物品送交军分区；三、放回互相抓、扣人员；四、占用的生产车辆一律送回生产单位；五、不准拦路、拦车、拦船，不准破坏交通工具，打死人的要偿命；六、罢工、停产和煽动者和幕后操纵者，要负政治和经济责任，应受到国家法律制裁。

8月17日，省革委会、省军区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决定》。决定由各级革委会和各革命群众组织组建一支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一些地区、学校、单位，特别是到那些“老、大、难”的地区和单位宣传毛泽东思想。8月23日，首批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5,000人，开进贵阳80所大中学校和老大难单位。9月3日，省革委会、省军区发出《紧急通知》决定：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的单位，原有的军代表都参加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9月13日，省革委会批转省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领导小组《关于省和各地、州（市）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领导关系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各地、州（市）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各地、州（市）革委会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到10月中旬，全省已有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万多人进驻400多个单位帮助斗、批、改。

9月18日，省革委会负责人李再含、徐英年、康岩中等调动部队（两个连、一个排）和贵阳“八一八”兵团以及兴义、兴仁、安龙等县的武装人员共计划600余人，大、小汽车10辆，土坦克1台，制造了武装镇压安龙县群众的龙广事件，打死9人，逼死1人，重伤致残12人，700多人被关进学习班，200多户贫下中农被抄家。

三、各地、州、市革委会的建立

1967年中，贵州省辖5地区，2自治州，1省辖市。1968年4月，建立六盘水地区革委会，地区增加至6个。

（一）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1368】}

1967年3月8日，黔南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宣布夺取黔南地区的党、政、财、文大权。3月10日，临时权力机构毛泽东思想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革命委员会在都匀成立。由都匀军分区政委张梓任州革委会主任委员，干部代表赵世

【1368】资料来源：中共黔南州委党史研究室：《中共黔南州历史大事记》，1996年，页193-216。

康、李书善任副主任委员。8月17日，根据省革委会通知精神，州革委会常委会决定将“毛泽东思想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革命委员会”改为“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革命委员会”。

1968年1月13日，州革委、都匀军分区党委，确定州、县（市）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军管小组，对州及13个县（市）公安、检察院和法院等机关实行军事管制。都匀军分区司令员陈春堂任州军管会主任。2月19日，省革委会领导核心小组正式批准张梓任州革委主任委员，赵世康、李书善为副主任委员。6月18日，省革委负责人李再含、刘安民就黔南地区文革作了指示，认为黔南的问题主要是“右倾”，“黔南的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盖子没有彻底揭开”。还建议对已解放的干部要进行“复查”，对“没有转变过来的要补课”，李还点了都匀军分区、县市武装部“内部阵线不清，要补这一课”。还认为黔南“不乱一下不行”，“没有一点战斗气氛”，是“死水一潭”等。李再含的指示揭开了黔南“三反一粉碎”的序幕，使已经逐步趋向稳定的形势又开始混乱了起来。一些已“解放”并被结合到领导班子的干部又重新被“补课”。或“回炉”，再次受到批判斗争。

（二）贵阳市

1967年1月25日晚上，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宣布“接管了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的一切领导权”，并于次日发出通告。3月9日，毛泽东思想贵阳市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由贵阳军分区副政委朱德兰担任主任，原中共贵阳市委书记处书记杜竹林、市商业局局长梅合祥任副主任。是月，贵阳形成支红派和四一一两大派，从此斗争不息。8月1日，毛泽东思想贵阳市革命委员会改名为贵阳市革命委员会。1968年2月10日，贵阳市和南明、云岩、花溪、乌当等地区以及开阳特区的公安机关（包括公、检、法）实行军事管制，分别建立军事管制小组。7月29日，贵阳市革委会发出《关于清理阶级队伍中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革委会建立“对敌斗争的专门班子”，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把“清理阶级队伍和革命大批判结合起来”。^[1369]

（三）遵义专区^[1370]

1967年2月17日，遵义地区14个造反组织，于本日零时夺了遵义地、市委和专署、市人委一切权力。由造反组织的负责人、遵义军分区的负责人和地委机关中的领导干部组成遵义地区革委会筹委会。3月13日，经省革委会批准，成

【1369】贵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阳市志·大事记》，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页213-222。

【1370】资料来源：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遵义地区志·概况、大事记》，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69-71。

立毛泽东思想遵义地区革命委员会（8月10日改为遵义地区革命委员会），由军分区政委朱先任主任。6月8日，遵义军分区已派出军人328名，参加三支两军工作，已夺权十县（市）革委（革筹）主任，都是武装部的负责人。10月4日，地区农村文革办统计：全区104个区（镇），需夺权的87个，已夺权的56个。共有公社701个，需夺权的326个，已夺权的152个。全区区、社干部2,447人，其中结合的1,059人，占43.2%，团结靠拢的852人，占34.8%，打倒的536人，占21.9%。11月17日，依据李再含对干部提出的“抓、罢、提、留、调”方针，全区不完全统计，原属省委管理干部398人，列入专案审查，重点是“党内走资派”，原地委管理的干部70%得到“解放”。

（四）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1371]

1967年3月18日，凯里地区一百多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凯里地区毛泽东思想黔东南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总指）。3月19日，在支左部队的支持下，总指利用召开庆祝其成立大会之机，夺了中共黔东南州委、州人委、凯里县委、县人委党政财文大权。3月21日，毛泽东思想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革命委员会成立。董英祥（时任凯里军分区党委副书记，1968年5月任凯里军分区副政委）任主任委员，王晋卿（干部）任副主任委员。3月下旬，凯里地区反对3月19日夺权的群众组织联合成立凯里地区毛泽东思想黔东南革命造反派红色总指挥部（红总）。从此，红总与总指所属两派群众组织围绕夺权问题进行了激烈斗争。9月18日，毛泽东思想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革委会改名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革命委员会。

1968年1月24日，省革委正式批复成立黔东南州革委会，董英祥任主任委员。12月26日至31日，州革委、凯里军分区召开全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经验交流会。会上统计，全州共挖出所谓“四种阶级敌人”6,157人，其中“叛徒”360人，“特务”401人，“走资派”1,224人，各种“反革命”4,172人。在“四种人”中，有省、州管干部，有一般职工，也有社会群众。

（五）安顺地区

1967年3月22日，毛泽东思想安顺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全面夺权，接管了安顺地委、专署及安顺市委、市人委的党、政、财、文大权，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安顺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为安顺军分区政委郭绪昆。1968年2月19日，中共贵州省革委会领导核心小组批复：安顺地区革委会由郭绪昆任主任委员。4

【1371】资料来源：中共黔东南州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黔东南州历史大事记》，贵阳：贵州省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217-237。

月23日，安顺地区革委会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成立。全区共清理“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分子”等“阶级敌人”2,069人。7月12日，地革委、军分区决定，对地区及各县（市）公安机关（包括公安、检察院、法院）实行军管，地区成立军管委员会，各县（市）成立军管小组，并撤销地区及各县（市）保卫领导小组，原公安机关的职责由军管会或军管小组行使。^{【1372】}

（六）兴义地区

1967年3月19日，毛泽东思想兴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总指挥部在兴义军分区支持下，宣告胜利夺取中共兴义地委和兴义专员公署的一切权力。3月29日建立了毛泽东思想兴义地区革命委员会（同年8月24日改称兴义地区革命委员会，简称地区“前革委”）。主任为兴义军分区副政委张树德。11月13日，李再含发表关于解决兴义地区问题的讲话，认为兴义地区地、县是“保守势力夺权，是死水一潭”。讲话提出对兴义地区的地、县革委会分别采取“改组、无效、否定、重建、接管”的十字方针。从此兴义地区地、县革委会一个个被“改组”、“重建”。

1968年4月，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批准兴义地革委“调整”方案（实为改组），成立第二个革委会（简称“后革委”）。主任为兴义军分区副政委蔡坤。“后革委”领导干部少，群众代表多。实权掌握在李再含的亲信手里，实际上也是一派掌权。

据不完全统计，从1967年群众造反组织夺权建立地、县各级革委会，到1969年解放军奉命执行中央解决贵州问题的指示进驻兴义地区制止武斗以前，全地区各派群众在武斗中伤亡约300人，其中被打死的59人。59人中，在李再含1967年11月13日关于解决兴义地区问题的讲话后被打死52人。^{【1373】}

（七）铜仁地区^{【1374】}

1967年2月7日，铜仁城区31个群众造反组织联合夺取中共铜仁地委、铜仁专署和中共铜仁县委、铜仁县人委的党政财文大权。12日，《新贵州报》刊载铜仁夺权消息和夺权《通告》。是日，铜仁地区无产阶级造反委员会成立，封昌举（职工）为主任委员，苏华（铜仁军分区副政委）、艾昌权（工人）为副主任委员。3月4日，召开铜仁地区无产阶级造反委员会会议。会议决定：铜仁地区无

【1372】贵州省安顺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安顺地区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页82-84。

【1373】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史志办公室：《中国共产党黔西南州历史》第一卷，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页160-163。

【1374】资料来源：铜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铜仁地区志·大事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页211-215。

产阶级造反委员会更名为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铜仁地区革命委员会。同时，对革命委员会进行改组。次日上午，地革委举行第一次全委会议，选举曲光（铜仁军分区第二政委）任主任委员，韩国锦（省军区副司令员）、刘鹤亭（干部）为副主任委员。5月29日，铜仁军分区党委召开地革委常委和部分委员列席的扩大会议，对地革委组成人员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地革委主任委员曲光，副主任委员韩国锦、刘鹤亭、吕克强（铜仁军分区司令员）。6月3日，毛泽东思想铜仁地区革委会成立。9月3日，更名为铜仁地区革委会。

1968年2月20日，铜仁军分区对地、县公安、法院、检察院机关实行军管，公、检、法职能被军管会取代。

（八）毕节地区^[1375]

1967年3月18日，毕节地、县两派群众组织联合建立毛泽东思想毕节地、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在支左部队的支持下，一举夺了中共毕节地委、县委、毕节专署、毕节县人委的党政财文大权。3月29日，经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批准，毛泽东思想毕节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梁革心（毕节军分区副政委）任主任。同年8月，更名为毕节地区革委会。3月，毕节军分区抽调300名现役干部、战士，分赴全区100多个单位参加三支两军，或担任联络员、观察员、军代表。1968年1月23日，毕节地革委、毕节军分区联合向省革委、省军区作出《关于对全区公安、检察、法院实行军管的报告》。

（九）六盘水地区

1967年1月27日，大华农场（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对外名称）领导机关被夺权，六盘水地区工业建设指挥部陷于瘫痪，夺权之风随之遍及六盘水矿区。是月，开始在特区各县及厂矿实行军事管制。10月29日，省革委会、贵州省军区决定建立六盘水地区革委会筹备小组，为地区一级权力机关。周亚（军代表）^[1376]任组长。地区革筹小组的成立标志六盘水开始成为一个政区。11月7日，中共贵州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省军区批准成立六盘水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周亚（军代表）任组长。1968年4月7日，省革委批准成立六盘水地区革命委员会。4月18日，六盘水地区革命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周亚任革委会主任和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1377]

【1375】资料来源：毕节地区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毕节地区志·大事记》（征求意见稿），1998年，页224-229。

【1376】周亚，当时军内职务不详。1970年9月任贵州省军区后勤部政委。

【1377】六盘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六盘水市大事记（619-2013）》，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页119-122。

综上所述，贵州省9个地（州、市）级革委会，第一把手全部由省军区系统现役军人担任。

四、周恩来称对李再含还是“一批二保”

李再含从寂寂无闻的省军区副政委，直接提为一个省的第一把手——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甚至越级提为昆明军区副政委，实际上是德不配位，是不称职的。从1969年2月始，中央不得不着手解决他的问题。



李再含在贵州省革委会成立大会上，贵阳，
1967年2月14日。

1969年2月中旬至3月6日，中央召开解决贵州问题的“二月会议”。周恩来在“二月会议”上批评李再含称：

这次会议解决军队关系问题，从解决贵州问题开始，联系到云南问题，重要是贵州问题。这次会议是经过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批准的。解决贵州问题，首先从军队问题解决起。毛主席讲地方问题在军队，军队问题在工作，还告诉我们要做军队工作。解决问题是这样，解决效果更好。军队问题解决了，就可以巩固两省领导。军队之间、两省之间、大军区和省军区的关系也就好了。

这次会议开得比较好，最后各自都作了自我批评，基本上达到了目的。自我批评程度虽不同，但有重点，贵州问题就是重点，李再含同志就是重点。现在贵州出现了落后现象，我们是有发现，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就知道，没找来谈，这次出了事才找来。李再含同志骄傲自满，沾沾自喜，站在一派很不

好，应该按毛主席指示办事，但你不是，搞多中心论，以我为核心，以我为中心，支持我就好，有了不同意见就是错的，对中央是报喜不报忧，甚至不请示不报告。我们有责任，但不能减少你李再含同志应当承担的责任，这一点李再含同志作得很不好，更多的是把责任推给下边。你看在十二中全会上，毛主席为徐海东问题都承担责任。对的全是你的，不对的全是下边的。你也不对嘛！毛主席总是给下边承担责任。从你李再含同志的发言就可以看到，说自己的错误时声音很低，勉强强，说到成绩和别人反对你时，声音很高，声声有理。你的问题康老谈了，还是一批二保，担子还是你担。李再含同志的中心问题是缺乏党的生活作风。你也承认你水平低，不称职，担负工作很吃力，的确是这样。但你昏昏然，骄傲自满。要求你回去要传达中央精神，要有步骤，要逐步传达和群众见面。首先军区党委和省革委传达。何光宇同志的检查态度明朗。何光宇同志要互相监督，不要一团和气，有问题吵一吵，吵完了就轻了。总要集体领导，不要个人说了算，要集体商量。军区党委、省革委核心小组都应这样。我们从贵州的报纸、文件看到你李再含同志总是个人说了算，就连你的插话也当成指示下发，要下面学习。毛主席的指示还要再三考虑才形成文字发表。你们那里有国防师，要参加革委会，国防工业、三线建设也要参加。首先希望你们要加强集体领导，中心问题是党的生活问题，要形成集体领导，在林副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在贵州军区形成集体领导。要多听取不同意见，不要有了不同意见就是“四一一”，姿态要高。李再含同志，对你有不同意见就压，这是不对的。

情况是在不断变化，不能说哪派革，哪派保；哪派好，哪派坏；要以哪派为主，哪派为次。毛主席指示，到一个工厂、学校、部队去，不要急于表态，什么保啊！到去年情况就变了嘛！李再含同志的电话是错误的。为什么要站在陈康一边？你了解情况吗？你不应当干涉云南的事。既然云南问题解决了，就不应该召开会议。部队为什么气那么大，当然要解决问题，就不应提不适当的口号。但陈康同志、李再含同志也不应该听到喊几句“打倒”就那么计较，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江青：我们这些人也有人要打倒、油炸、火烧）反动的多中心论，这是李再含的主要错误，李再含同志要作自我批评。不仅李再含同志，我们在座的都要注意这个问题。以我为核心，不能自封核心，自己一切都对，自以为是，不请示报告，就要犯错误。军队有党委领导，有政治委员制度，要集体领导，军队有首长制，西南离中央远，更要警惕这个问题。

……

对群众的态度问题，李再含检查不深，你压人家，你说这个问题你检查，你没检查，你总压对方。据何光宇说，全省对立面群众有二三十万。（江青：毛主席对几十几百人都很重视）几十万人你镇压，是对群众的态度问题，是大问题，不能检查一次就算了，你走向反面的危险并未取消。人家有意见，毛主席讲不能清一色，只要是内部矛盾，就想办法吸收到革委内来。还有你随便定一个组织为非法的，把革委会翻过来，这都是很错误的。过去你就是倾向一派掌权。四十一师，有群众问你们，你们可以答，支持革委会，支持李再含同志，但不支持他的错误。李再含应当了解，中央是不准这样定的，这是多中心论。因此不能过多地责备它。方针还是归口大联合。（姚文元：主席从贵州发现归口大联合，可你们就是不执行。）云南问题解决了，贵州问题还差得远。你李再含还是两种可能性，你还有“八一八”，走向反面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当前警告你一下，你检查你的组织性、纪律性的问题很严重，调部队不请示就发枪，相当严重，不符合林副主席的三性，你不要辩护，你的报告由军委办事组严格审查。^{【1378】}

3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发出《对贵州省当前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和《给贵州部队的指示》（简称“两个红五条”）。《对贵州省当前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是：（一）要继续巩固和发展已有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二）要坚决支持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拥护新生的红色政权。（三）驻贵州部队要坚决贯彻伟大领袖毛主席“拥政爱民”的指示。（四）贵州各级革命委员会和一切革命同志要爱护自己的子弟兵人民解放军。（五）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给贵州部队的指示》是：（一）一定要顾全大局。（二）军队内部一定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三）军队一定要拥护、支持、帮助革命委员会，走拥政的路。（四）军队一定要认真做好群众工作，促进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五）要加强对复员军人的教育。4月20日，贵州省革委会发出《关于进一步贯彻〈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对贵州当前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的通知》。^{【1379】}

4月24日，由于中央的“一批二保”政策，李再含仍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

【1378】《贵州风云——地方文革民间实录》，页250-252。

【1379】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历史大事记》，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423。

5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贵州省革委会、省军区《关于落实“九大”提出的战斗任务和毛主席批发的两个“红五条”的意见》和贵州省军区《对解决贵州问题提出的五条措施的报告》。中共中央指出，贵州省各级革委会、省军区、各军分区、各县（市）人武部、各驻军、各地革命群众，要根据“九大”精神，响应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号召，加强部队内部、群众之间和军政、军民的团结，广泛宣传中央两个“红五条”的指示，纠正各方面所犯的缺点错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稳定贵州局势，搞好抗旱斗争，加快三线建设，实现毛泽东“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部署，争取更大的胜利。^{【1380】}

6月7日，经中央批准，增补何光宇、张琦、刘金池、张健民、罗锡康为贵州省革委会副主任，并为贵州省革委会领导核心小组成员。^{【1381】}

五、李再含下台，蓝亦农上台^{【1382】}

1969年8月23日-9月下旬，中共中央将贵州省革委会、省军区及各地（州、市）革委会、军分区的主要负责人（含部分群众组织负责人）集中到北京开会，解决贵州问题。9月24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向毛泽东主席呈报《关于解决贵州问题的请示报告》称：毛泽东批发的两个“五条”和中央两次解决贵州问题的指示，都是符合贵州实际的，是正确的。但由于李再含等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派性，对中央指示采取两面派态度，拒不执行，使贵州形势越来越严重，全省出现了较大的反复。《报告》称，贵州问题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地方的问题在军队，军队的问题在工作。”《报告》还就充实和调整贵州省的领导班子，加强领导力量，增加支左部队，迅速解决贵州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

9月21日凌晨，周恩来等第二次接见全体贵州赴京人员。周恩来再次严厉批评贵州的工作及李再含：

贵州省这三年的工作，开始造反是对的，推翻了李井泉、贾启允，这是成绩，是按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定办事的，后来也有好事要肯定，如归口闹革命，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归口，一月风暴之后，贵州叫“西南春雷”，伟大领袖毛主席首先在你们那里推动了典型贵阳棉纺厂，但是你们自己把它否定了，把好事变成了坏事，就是说，即使有成绩，也没有坚持下去，我们中央也

【1380】《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历史大事记》，页424。

【1381】《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历史大事记》，页424。何光宇，时任贵州省军区司令员。张琦，时任陆军第四十一师政委。刘金池，时任贵州省军区独立师政委。张健民，原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处书记。罗锡康，时任贵州省革命职工代表大会常设委员会勤务组组长。

【1382】除特别注明者外，本小节资料来源自《中国共产党贵州历史大事记》，页424-426。

抓得不紧，今年抓了二月一次，五月一次，但是后来有人说，好像是中央抓坏了，不抓反而可以搞好。其实不是这样。走资派打倒了，内部发生不同意见，用群众的话说是不同观点，这要用毛主席的指示来解决，不能拉一派压一派。压不垮的，不解决问题。铜仁最严重。不是中央抓坏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中央抓得不紧应该负责任，但主要是你的错误。即便是这样，我们还是肯定了革命委员会的成绩。只要把中央的精神这样和群众见面，结合起来，春雷就可以再响。现在要准备打仗，贵州是三线。贵州问题不能再拖了，时机成熟了，大家认识了，贵州出了那些问题，独立王国，个人主义，两面派呀，都是错误的。消灭一派，镇压群众呀，都揭发出来了。

.....

贵州出了个小领袖，有一个什么“小太阳”。红太阳只能有一个嘛。贵州天无三日晴，太阳不那么红，但总还是只能有一个太阳啊！不能搞什么“小太阳”，云雾总是要吹散的。毛主席的红太阳总是要普照大地的。^[1383]

10月26日，中共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对贵州省核心领导小组〈关于解决贵州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的批示》（即中发[69]71号文件）。中央决定：（一）调昆明军区副政委蓝亦农^[1384]兼任贵州省军区第一政委，李再含在北京学习期间，由蓝亦农代理省核心领导小组组长，主持贵州工作。调军长张荣森担任贵州省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并统一领导全省驻军支左工作。何光宇、石新安、李立、张明、罗锡康、张健民、刘兴胜、鲍德金、张琦、朱德兰、刘绍贤、徐英年^[1385]等为核心小组成员。（二）调6908部队^[1386]进驻贵州，担任支左工作。（三）中央为贵州举办一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将省革委会办事机构的工作人员，省军区、

【1383】《贵州风云——地方文革民间实录》，页285-287。“小太阳”指李再含。

【1384】蓝亦农，1967年7月-1969年4月任五十四军政委，1969年4月-1975年8月任昆明军区副政委。曾任重庆市革委会主任、昆明市革委会主任；1969年10月-1971年5月任中共贵州省核心领导小组代组长，兼任贵州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党委第一书记。1971年5月-1973年9月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1973年8月至1980年7月下放工厂学习、劳动。1983年5月至1985年6月任昆明军区顾问。中共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

【1385】张荣森，时任陆军第四十三军军长。石新安，时任贵州省军区第二政委。李立、张明，时任贵州省革委会副主任。刘兴胜，时任陆军第四十三军副军长。鲍德金，时任陆军第一二九师师长。朱德兰，时任贵阳市革委会主任，贵阳军分区副政委。刘绍贤，时任贵州省军区独立师副政委。徐英年，时任贵州省革委会常委。

【1386】6908部队为陆军第四十三军第一二九师的代号。1969年10月，全师（欠炮兵团）奉调贵阳地区三支两军，及担任贵阳警卫治安工作。步兵第三八六团、第三八七团分别在铜仁和安顺、兴义地区三支两军。该师1973年2月奉调离黔归建。

军分区、人武部的部分干部，省工代会及三线重要厂矿两派群众组织的部分头头调北京参加学习。

11月25日-1970年4月17日，中共中央为彻底解决贵州问题，在北京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其间，中央领导人五次接见贵州班临时党委领导小组成员。

1969年冬-1970年春，中共贵州省核心领导小组，贵州省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对全省53个县、273个企事业单位进行了补台工作，增补了一批军队干部，解放了一批地方领导干部进各级领导班子，撤免了一批造反派头头，对各级革委会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

六、李再含的检查^{【1387】}

1970年1月9日下午及10日上午，在北京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贵州班大会上，李再含作了检查，“交待自己反党、反毛泽东思想、反党中央的严重罪行”。李再含称，“我是一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典型的个人野心家、两面派、伪君子。”具体表现为：

第一、我在贵州没有突出伟大领袖毛主席，而是极其反动地突出我自己。不是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中心，而是以我为中心。由于我在夺权以后，大权在手，头脑膨胀，忘乎所以，热衷于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资产阶级派性，因此，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党中央的指示，采取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态度，心中忘记伟大领袖毛主席，走向突出我个人，以我为核心，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罪恶道路。

较长时间内，在贵州流传着一些赞扬我的话，什么“贵州有个小太阳”、“地方出了个王效禹，军队出了个李再含”、什么“有了李再含是贵州人民的幸福”等等，在一片赞扬声中我昏昏然、飘飘然，心里热乎乎的，乐滋滋的，还觉得拥护我的人还不少啊！因此，自己恬不知耻地经常说自己是“不倒翁”；在会议上听到这些赞扬时，也假惺惺地说“受之有愧”，实际上内心高兴得很。

贵阳文展馆收集展出了我的一些材料和照片，我是知道的，当有人直接向我要材料时，我表面上说不要搞，但实际上并不制止。我自恃有功，以“功臣”自居，以“西南春雷”“当然主人”自居，因而有恃无恐，认为搞一点也可以，让群众知道我的所谓“功劳”。更严重的是，自认为既然主持全省工作，也需要树立个人的权威，这就完全背离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权威和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的伟大教导。

【1387】本小节资料来源自《贵州风云——地方文革民间实录》，页297-301。

听说有些地方在早读时间读我的所谓“讲话”和“插话”，我是默许的，错误地认为我的“讲话”和“插话”是联系实际、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大家读一读也是可以的，真是狂妄之极，反动透顶，竟敢把我的臭不可闻的奇谈怪论同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相提并论，分庭抗礼，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吗？否。很多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如赤水问题，我说赤水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根子在武装部，完全是胡说八道。把矛头指向武装部、革委会，自己搞垮革委会。最典型的是我在省革委常委第六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和“插话”，通知全省要“原原本本”地传达贯彻，通知中还说什么我的“讲话”和“插话”给贵州文化大革命指明了方向。为了显示自己高明，把“讲话”和“插话”刊印成册，通过交流方式，流毒全国。是谁指明了方向？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指明了方向。我指了错误的方向，害了大家，把贵州文化大革命搞坏了。我的原原本本是明目张胆的搞资产阶级的多中心。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需要有统一的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我在贵州用我的错误的反动的思想统一大家的思想，和毛泽东思想抗衡，唱对台戏。

李再含又称：

去年二月，党中央看到贵州问题，召集41师、49师、昆明军区领导同志开会，帮助我认识和改正错误，中央通过何光宇同志向我提出了四个问题：一、要我检查对中央的态度；二、对军队的态度；三、对群众的态度；四、组织纪律问题。听了以后，使我大吃一惊，当时我想如果我存在这四个问题，我不完蛋、垮台了吗？我根本不去想是不是这些问题，根本不接受中央对我的批评，根本不接受对中央、对军队存在一个态度问题。而且十分错误地认为这是“整我”，认为是大军区“整我”。非常错误地认为贵州是由于部队调防搞乱的，根子在大军区。因而思想不通，毫无自我批评之意。我在中央首长面前非常勉强地敷衍了几句，说话声音比蚊子声还要小，一句话要讲五分钟。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要我写出书面检查，由于自己的思想不通，为了蒙混过关，写了一个搪塞、敷衍的假检查。根据中央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精神，我起草了一个《十条意见》，得到中央同意后就带回贵州。由于思想上对抗中央召开的这一次会议，回省后既不传达会议精神，又不作自我批评，把传达贯彻任务推给何光宇同志，还散布不少荒谬的言论。我对一个同志没头没脑地说：“秀才见了兵，有理讲不清”，我自己就是在军内工作，这个话是非常反动的。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我忘得一干二净，并对一些同志说，这次会议是“九比一”，官司怎么能打得赢呢？我又在省革委常委、省军区党委联席会上说：“我在纠正错误中又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不该同意撤销818。”对抗中央二月会议对贵州的处理，对这次会议，我耍了两面派，在中央是一套，回到贵州又是一套。后来我和张明同志到中央参加九大预备会，九大期间，听说省内很乱，我一方面大为不满，认为是何、石等同志在家里搞右倾翻案。另一方面又幸灾乐祸，我没有在家，搞乱了你们负责，把责任嫁祸于何、石和41师，甚至联系到昆明军区党委。我参加了九大，听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伟大领袖毛主席还亲切地握了我的手。可是我回到贵州后就忘记了毛主席的指示，完全背离了毛主席指引的“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政治方向。

九大后学习九大文献、毛主席指示、新党章，代表们给我提了些批评意见，自己基本听不进去，在十分混乱复杂的心情下，一方面不得不搞点自我批评，装装样子。一方面又认为中央发了两个“红五条”，中发25号文件，自己又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自己得意忘形，摆出一付“胜利回朝”的姿态回到贵州。心里想，九大召开了，大局已定，更打不倒我了。并且念念不忘省军区党委召开的三月会议。听说有的同志喊了打倒我的口号，我怀恨在心，认为这是搞右倾翻案。我思想上想的不是贯彻九大精神，而是搞自己的一套，我认为三月会议是右倾翻案，就决心把这个案翻过来，回去后就办了一系列坏事。不该传达的传达了，自己在有的问题上加油加醋，扩大化，从花溪、磊庄会议一直发展到七二九事件，破坏了团结，把广大军民引上了邪路。特别在九大期间，我干了破坏团结，分裂中央的罪恶活动，散布了分裂中央的流言蜚语。九大以后，充分表现出我是典型的两面派。九大上我举手赞成毛主席指示新党章，回去就干背离九大精神的坏事，是一个言行不一，表里不一，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会上一套，会下一套的典型的两面派。

1971年2月3日，省革委会发出《关于省革命委员会补台协商代表会议工作方案》，提出了对省革委会成员的撤、免、增补原则和调整意见以及补台的方法、步骤。5月20日，中央军委发出命令，撤销李再含昆明军区副政委、贵州省军区第一政委职务。5月23日，中共中央批准贵州省革委会补台意见：（一）同意蓝亦农等205人为贵州省革委会委员。（二）同意蓝亦农、张荣森等34人为贵州省革委会常委。（三）同意蓝亦农为贵州省革委会主任，张荣森为第一副主任，石新安、贾庭三、李立、何光宇、张明、张健民、张琦、刘兴胜、马扶增、陈行庚、李庭桂、罗锡康、田子明、孙昌德为副主任。（四）同意撤销李再含贵州省革委

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贵州省革委会主任职务；免去刘安民、刘金池、康岩中贵州省革委会副主任职务；免去李再含等8人的贵州省革委会常委职务；免去李再含等44人的贵州省革委会委员职务。至是年底，全省各级革委会的“补台”工作基本结束，解放了一大批领导干部，补进了革委会。这对稳定贵州局势，恢复正常的生产工作秩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388】}

第六十节 山西：夺权后驻军支左综述^{【1389】}

一、山西驻军简况

1967年1月至1969年12月，山西境内先后驻过8个军级单位或军级单位的下属部队，即山西省军区、陆军第二十一军、陆军第六十九军、总后大同办事处、空军第十军、陆军第一军（下属部队）、陆军第二十八军、陆军第六十三军。山西省军区及第六十九军为山西三支两军主力。

（一）山西省军区

司令员陈金钰（1968年11月免）、谢振华（1968年11月任），第一政委卫恒（省委第一书记兼，1967年1月去世）、刘格平（1967年5月任），第二政委张日清，副司令员赵冠英、谢国仪、曹玉清、张纯德、张一波、王祥云、徐绍华、李金时、秦永寿，副政委李佐玉、智生元、刘世洪、高世平、郭永彪、范普权、徐守恒，参谋长王祥云（1968年8月免）、袁涛（1968年8月任），政治部主任洪达。^{【1390】}

辖雁北、忻县、晋中、晋东南、晋南5个军分区，又辖1个师级的太原市人武部（1968年8月改建为太原警备区）及1个独立师，省军区独立师（4540部队）师长张耀，政治委员贺华胜。该师辖6个团：步兵第一团（4541部队）驻雁北、朔县，第二团（4542部队）驻晋中，第三团（4543部队）驻原平，第四团（4544部队）驻太原清徐，第五团（4545部队）驻太谷、介休，第六团（4546部队）驻晋东南和长治。

【1388】《中国共产党贵州历史大事记》，页428-435。贾庭三，原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马扶增，陆军第四十三军副政委，1971年7月任贵州省军区第三政委。陈行庚、李庭桂，原中共贵州省委常委。

【1389】主要资料来源：余汝信、曾鸣：《1967-1969年山西驻军“支左”综述》。《昨天》2020年3月30日第149期。

【1390】陈金钰、赵冠英、曹玉清、徐绍华、李佐玉，1955年授衔少将。谢国仪、智生元、刘世洪、范普权，1964年晋升少将。张纯德、张一波、王祥云、秦永寿、高世平、郭永彪、洪达，1965年大校军衔。

（二）陆军第二十一军

该军 1967 年 2 月调离山西，详见本书第三十六节。

所辖陆军第六十一师（4731 部队）师部驻大同。在 1967 年 1 月雁北和大同市夺权过程中，该师没有表态。1967 年 2 月奉命移防。

陆军第六十三师（4558 部队）师部驻榆次县。1966 年 12 月，为避免造反派组织抢“黑材料”，根据省委文革办公室的指示，晋中地委副书记苗枫、地委保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弓国栋与该师领导联系，提出将地委机密档案和干部人事档案暂时放在该师，师领导陪同他们在营房内寻找放置档案的地点，因为没有找到合适之处，只得离开师部另觅其它地方。^{【1391】}1967 年 1 月 18 日，晋中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总部声称夺取了地委、专署的领导权，遭到晋中其他组织的强烈反对，导致这次夺权破产。对此，该师未表态。同月 31 日凌晨，晋中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晋中总司）宣称夺取了地委和专署的“党、政、财、文大权”，该师虽然没有表态支持这次夺权，但派出部队在榆次街头巡逻维持社会秩序。师政委魏宏武和该组织保持联系了解情况。晋中军分区坚决支持这次夺权。2 月 11 日，省核心小组召开研究晋中问题的会议，师长孙玉水参加会议并发言，称这个组织是革命造反派组织，支持晋中总司的夺权行动。从而使省核心小组和刘格平肯定了晋中总司“夺权大方向是正确的”。1967 年 2 月，支左工作移交给第六十九军第一〇七师。

（三）陆军第六十九军

1967 年 2 月移驻山西，详见本书第三十六节。

1969 年 11 月，军部由太原移驻大同市，军代号由 4642 部队改为 1650 部队。

所辖陆军第二十八师（4641 部队）1969 年 11 月改称第二〇五师（1654 部队），移防至内蒙古集宁。师长罗保田，政委刘一元。

1969 年 6 月，陆军第一〇七师（4655 部队）师长丁汝勤、政委刘新田一行四人乘军用吉普车由榆次到军部请示工作，途经北营时被内燃机车撞翻，丁汝勤牺牲，刘新田等 3 人负重伤。这是六十九军进入山西后因公殉职的最高领导干部。1969 年 11 月改称第二〇七师（1660 部队），移防至大同和雁北地区。师长靳万起，政委李华。

1969 年 10 月，北京军区工程兵第六工区改编为陆军第二〇六师，归第六十九军建制，由河北石家庄地区移防至内蒙古丰镇地区。守备第三十三师改称

【1391】弓国栋：《回忆苗枫》。《晋中文史（“文化大革命”时期专辑）（总第十编）》，晋中政协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2015 年 7 月，页 327。

北京军区守备第一师，隶属北京军区建制，由第六十九军领导，在内蒙古化德、土牧尔台地区担负要点守备任务。

（四）总后大同（太原）办事处

代号后字 202 部队。负责组织实施后方基地建设和管理储备战略物资等，负责全军华北地区的战略后方基地建设。1969 年 1 月，由大同迁至太原市，改称总后太原办事处。办事处主任李文光（1968 年 2 月免）、白振华（1969 年 10 月任），政治委员丁力。^{【1392】}曾派出部分下属部队参加山西的三支两军工作，丁力曾出任山西省革委会常委。

（五）空军第十军

1969 年 1 月 6 日在大同组建。军长张宪章，政委高德襄，副军长李永泰、刘志田、鲜才文，副政委杜镜秋，参谋长张家荣，政治部主任萧鸿云。^{【1393】}空十军组建后，奉命在山西大同市、内蒙包头市、陕西西安市等地 40 多个单位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共派出 1,279 人（其中干部 972 人）参加三支两军工作，有 104 人被结合在革委会。^{【1394】}

（六）陆军第一军（下属部队）

1968 年 2 月，驻河南安阳地区的陆军第一师步兵第一、第三团奉命到山西晋东南地区和长治市制止武斗。次年 7 月至 12 月第一师三个团又在师长张霖的率领下到晋南地区落实“七二三布告”，制止武斗，收缴武器。张霖任中共晋南核心小组组长、晋南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晋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组长等职。

（七）陆军第二十八军

1969 年 11 月，奉命调防山西。军长康林，政委徐光友，副军长黄冠亭，副政委董立芳，参谋长唐诚，政治部主任孟子英。^{【1395】}从 11 月 20 日起，军部率陆军第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师、军直炮兵团、独立坦克五团，分两路乘火车北上，至 12 月 9 日，全军顺利到达山西洪洞、临汾、侯马、运城一线。军代号改 1670 部队。具体布署是：军部率直属分队驻临汾市；第八十二师（1675 部队）师长李毓田，政委宋振春率师部及直属分队驻洪洞县城；第八十三师（1680 部队）师长高希山，政委王善基率师部及直属分队驻运城县城；第八十四师（1685 部队）师长王毅、代政委周立学率师部及直属分队驻侯马市；军炮兵团驻浮山县，独立坦克五团驻河南省郑县。该军参加了晋南部分地区的支左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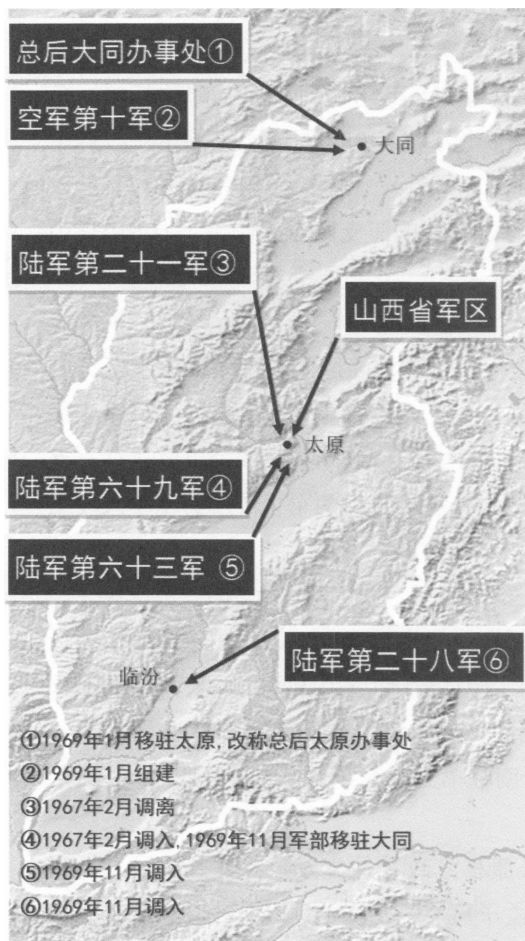
【1392】李文光、丁力，1965 年大校军衔。

【1393】张宪章、高德襄、杜镜秋，1965 年空军大校军衔。

【1394】《中国共产党空军组织史资料丛书》第 2 集，页 300。

【1395】康林、徐光友，1961 年晋升少将。董立芳，1965 年大校军衔。

山西驻军分布图(1967-1969)



(八) 陆军第六十三军

1969年11月, 遵照军委命令, 由河北移防山西, 接替第六十九军防务。军长徐信, 政委刘炎田, 副军长曹步墀、阎同茂、余洪信, 副政委宋双来、刘信、田荫东, 参谋长张枫, 政治部主任李立。^[1396]军领率机关改代号1577部队驻太原。

所辖陆军第一八七师(1561部队)驻榆次地区, 师长余洪信, 政委曲凤图。第一八八师(1567部队)驻忻县地区, 师长王根成, 政委杨书兴。1969年10月, 北京军区工程兵第二工区改编为陆军第一八六师, 隶属第六十三军建制, 同年11月改称第一八九师(1572部队)。师部及直属分队驻原平地区, 师长房淑瑜, 政委徐世忠。

该军参加了太原市和晋中地区的支左工作。

二、省军区主导的支左工作

在山西, 最先介入当地文革的是山西省军区第二政委张日清, 其为军级领导干部中第一个站出来参与和支持地方省级夺权的主要负责人。有关其支持山西夺权的详情, 见本书第三十一节。

1967年1月后, 山西省军区首先成立了支左办公室, 其下属各军分区、人民武装部也成立了相应机构。驻晋各部队团(含团)以上单位均成立了支左办公室。后来, 毛泽东提出军队要管工业交通, 要对大中学校实行军训, 各部队的支左

^[1396] 徐信, 1964年晋升少将。刘炎田、曹步墀, 1965年大校军衔。

办公室遂改名为三支两军办公室。实际上，对各级银行、邮电、电台、仓库和铁路、交通等部门都实行了军管。经省核心小组批准，成立山西省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行使省公检法的权力，张日清任主任。这个委员会陆续发布了一个通告和六个布告。^{【1397】}

因为张日清支持夺权的行动受到毛泽东、林彪的肯定，当时山西虽没有成立全省统一的支左领导机构，实际上三支两军工作是以省军区为主，其它部队为辅。1967年7月以前，山西驻军支左的挂帅人物是张日清。

然而，事情在发生变化。1967年7月，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主持会议的是康生和关锋。这是中共高层第三次召开有关山西问题的会议。与前两次会议不同，虽然这次会议名为“座谈会”，实际上张日清及其下属晋中军分区领导人崔冰等人却成为批判对象；被批判的还有核心小组组员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和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兰敏（时任省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副主任）。毛泽东批示“照办”的《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扩大会议纪要》指控张日清“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没有把斗争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反对挖卫恒、王谦、王大任的二三线，错误地支持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压制革命群众运动，甚至在军内进行反对刘格平同志。在晋中问题上，他不支持陈永贵同志，不支持王振国、任井夫、张怀英等同志，反而支持军分区执行错误路线的少数负责人”，“没有接受中央对他的批评及时改正错误，使错误越来越严重”，在“支左工作中同样犯了方向路线错误”。^{【1398】}《纪要》还指责山西“某些军分区、人武部的少数负责人，犯了一些错误，有的犯了严重错误”。对于在派性斗争中陷入一派的空军第十航空学校（空字025部队）和空军第十二航空学校（空字027部队），《纪要》则认为他们“在支左中，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会议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1399】}

康生、关锋及杨成武、吴法宪、郑维山等人给张日清罗织的“严重错误”主要是：（1）批准、支持刘志兰派人到天津揪李雪峰，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破坏天津的文化大革命；（2）成立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取缔革命群众组织，逮捕他们的负责人，打击、迫害革命干部、群众和十月事件受害者；（3）支持钻进省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坏人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4）在部队内反对刘格

【1397】山西省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通告，1967年2月26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集》，介休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1967年4月，页143-145。

【1398】《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扩大会议纪要》，1967年8月6日。中发[67]263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1967年8月23日发出。

【1399】《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扩大会议纪要》，1967年8月6日。

平、陈永贵，将自己凌驾于核心小组之上，未经中央批准成立省军管会；(5) 支持执行错误路线的某些军分区负责人；(6) 在张日清错误影响下，有的军分区和人武部调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山西有重演“武汉事件”的危险。一句话，康生、关锋的结论是张日清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1400】}

会议进行中的7月19日22点35分，康生、关锋向参加会议的人员宣布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六十九军在山西文化大革命中地位很重要，要跟六十九军同志们说一下，要站在刘格平同志一边，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1401】}

七月会议以刘格平及其支持派取得胜利结束。张日清作为失败者被要求回山西到群众和省军区及其所属部队中“错误检查，接受批评”。第六十九军被明确指示“要站在刘格平同志一边，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会后的8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发出中发〔67〕263号文件即毛泽东批示“照办”的《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扩大会议纪要》，由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办公室翻印10万份，地方发至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军内发至基层连队。

七月会议后，省军区机关内部成立了“揭批张日清联络站”，它和十航校造反组织总部以及社会上的造反组织串联，在军区大院张贴揭批张日清的大字报，张日清被抄家被批斗，一段时间内被控制失去人身自由。在十航校总部一次揭批张日清的大会上，与会者扒掉张日清的领章和帽徽，高喊“打倒张日清”的口号，校长霍冰沉听之任之，置之不理。赵冠英、兰敏等一批干部受株连被批判斗争。

七月会议令张日清失去在山西的话语权和支左中的主导权，被要求接受“革命左派”的批判斗争。省军区系统支左办公室有的改组，有的撤销，不少军分区、人武部的负责人被批判斗争，机关被冲击，档案被抢走。也导致了支持张日清的群众造反组织惨遭镇压，支持刘格平、陈永贵的群众造反组织扬眉吐气。

三、六十九军走向山西支左第一线

七月会议后的山西虽然有短暂的平静时期，但是很快两派的斗争又风起云涌。红联站充分利用《纪要》钦定的“‘红联站’是革命组织”和“对‘红联站’的广大革命群众，要积极热情地帮助和团结”这两条自以为有利的东西，再次将斗争矛头对准红总站、杨承孝的决死纵队及其支持者刘格平。1967年9月5日，红联站部分成员以“要求刘格平政委解决问题”为由，在省核心小组驻地大

【1400】《中央解决山西问题中型座谈会》、《中央解决山西问题大型座谈会》，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办公厅，1967年8月15日。

【1401】《中央解决山西问题大型座谈会》，中共晋中核心小组办公室、晋中批刘邓联络总站，1967年8月28日。

门外拦截其乘坐的小卧车，被省革委、省军区和第六十九军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事件”，引发了决死纵队、红总站等组织对在驻地太原十中红联站的武装围攻，打死该校学生孟玲玲等人。这一事件再度诱发了山西省的派性斗争。晋东南、运城、临汾、大同、阳泉等先后发生了规模不等的武斗。特别是晋东南专区和长治市的两派武斗，更是动用了现代化的杀伤性武器，造成了人员伤亡和公共财物的破坏。

在张日清失去支左的主导地位后，1968年1月3日，毛泽东签发中央军委命令：“北京军区、山西军区、六十九军、各军种：根据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势，为了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山西支左应该有统一的领导，由六十九军党委具体领导，召集在山西的其他部队统一安排。”^{【1402】}

由此，第六十九军走向山西支左第一线。山西核心小组会议决定经中央批准，增补谢振华为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陈金钰为组员；并决定在省革委会和第六十九军党委的领导下，成立省支左委员会，由谢振华、曹中南、张日清、陈金钰、萧选进、曹西康、郭永彪、智生元、李凯夫（军事学院系主任）、后字202部队首长一人、罗国斌、刘新田等十二名军队干部组成，谢振华任第一主任，曹中南任第二主任，张日清任第三主任，委员会下设若干办事机构，主要任务是统一领导全省的支左工作；调整军队部署，充实支左力量，抽调3,000到4,000名干部分赴全省各地进行三支两军工作；关于各地的支左领导分工，大同、雁北以二十八师为主，晋中、晋南、阳泉以一〇七师为主，忻县以军分区为主，均成立支左委员会；晋东南以晋东南军分区为主，并由省军区副政委智生元在长治统一领导；成立太原警备司令部统一领导太原地区的三支两军、社会治安和民兵工作；对太原市公检法三机关和山西日报、山西人民广播电台以及煤炭、铁路、国防工厂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厂矿，均实行军管。^{【1403】}

会议还决定，迅速加强军分区、人武部的工作，第六十九军派一批干部帮助他们工作，每县派10至15名干部帮助人武部；对现在军分区、人武部继续工作有困难的干部在全省范围内调整。^{【1404】}

据此，全省各地、市、县也成立了新的支左领导机构，各地、市支左委员会主要负责人是：太原市支左委员会主任曹西康，雁北支左委员会主任张广有，大同市支左委员会主任罗国斌，忻县支左委员会主任朱光，晋中支左委员会主任

【1402】中央军委命令，1968年1月3日。

【1403】[68]3号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文件。

【1404】[68]3号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文件。

丁汝勤，晋东南支左委员会主任武天明，晋南支左委员会主任刘新田，形成了以六十九军为主的从省到县（区）系统完整的支左体系。^{〔1405〕}

1968年2月17日，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向红字号、联字号群众组织发出通知称：“为了尽快解决长治地区目前两派群众组织之间存在的问题，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指定由六十九军政治委员曹中南同志、副军长萧选进同志带领部队，前往长治地区担任支左任务，并负责主持两派进行谈判。望你们立即派出代表，在指定的地点进行谈判。要求双方立即停止武斗，释放互抓的人员，拆除工事，封存和上缴武器，恢复交通和革命秩序。”^{〔1406〕}

曹中南、萧选进手持这道“圣旨”，指挥由陆军第一师、高炮六十一师3个团、第六十三军、第六十九军各一部、军委工程兵一部、省军区独立师一部、晋东南军分区独立团等组成的支左部队，开赴长治地区。在曹中南、萧选进的主持下，红字号、联字号派出各自的代表进行谈判。从2月18日至28日的长时间谈判，双方达成《关于收缴武器弹药的协议》、《关于释放互抓人员的协议》；曹中南、萧选进就恢复交通和社会秩序、抓革命促生产等重要问题对两派代表提出要求。通过军方奉命采取的一系列行动，红字号组织土崩瓦解，晋东南局势暂时平稳。

可是，对刘格平、陈永贵及其支持派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灾难。因为此前刘格平、陈永贵多次表态支持红字号和晋东南革命委员会主任、核心组组长程首创。面对这样的情况，他们不得不转弯，表示“坚决贯彻落实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指示”。

四、中央对军队负责人横加指责

然而时隔不久，“杨余傅事件”以后，林彪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对北京军区、山西省军区和六十九军的负责人兴师问罪，横加指责。4月9日，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接见曹中南、谢振华等第六十九军军师两级领导干部和郑维山、张日清时，重提晋东南问题和山西问题，江青称：“郑维山同志，你向中央要开枪权、要扫荡权，可以看出你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几万人的大组织有群众问题，我说你们对九五讲话的宣传不怀好意，你们不爱护群众，晋东南暴露了一个大问题，你们就是不爱护群众，你突然袭击了我，你郑维山要作自我批评，你光宣传九五讲话，不爱护红卫兵小将，你们要很好地作个书面检查”，

〔1405〕〔68〕3号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文件。

〔1406〕中央文革、中央军委联合通知，1968年2月17日。山西省壶关县革命委员会1968年3月1日翻印件。

“你们要检查一下，在山西你们到底干了些什么”，“军队是实力派，你们对准谁谁能受得了！两派搞武斗，有人操纵，没有黑手那才怪呢！刘格平、李雪峰是北京军区政委，中央接见你们未通知刘格平、未通知李雪峰，中央并没有撤他们的职嘛！”此时林彪插话问：“你们通知人家了吗？我听说山西有拥护革命委员会和反对革命委员会、拥护解放军和反对解放军的说法。”江青又称：“要有群众观点，抢枪有什么关系！张日清你对革命委员会退半步就解决问题了，山西成立革委会最早，是两层政权。”林彪称：“有两层政权一定要打内战的，你张日清要主动找刘格平谈，找陈永贵谈。陈永贵同志最顾全大局，他是最正确的。凡是不符合拥政爱民的做法都是很危险的，解放军反对群众就不是子弟兵啦！军队要拥政爱民。山西联合不起来，你们山西的军队起了坏作用。中央的态度很明确，不搞两层政权，要支持革委会，有缺点也得支持。军队要支持革委会，你们反对刘格平、反对陈永贵，实质上是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你们要采取措施，很快联合起来，否则很被动。”“北京军区、山西军区、六十九军都要检查错误，悬崖勒马，急流勇退。主要是军队大方向不对就要搞武斗。过去军队作用不那么大，现在搞好了就是执行中央路线，搞不好就是反中央路线。一滴血可以看全身，这是解剖麻雀。从解决山西问题可以联系北京军区问题。当然不是说你们都错了，但是对河北、内蒙也是有影响的。”^{【1407】}

这是中共高层对军队在山西支左的彻底否定，也是对北京军区、山西省军区、六十九军的严厉警告，令郑维山、张日清、谢振华、曹中南等人如履薄冰。他们在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山西班全体学员会上检查，谢振华、曹中南、张日清在省核心小组会上检查，在山西省的有关会议上检查。检查内容无非是没有坚决支持刘格平、没有坚决支持陈永贵，表示要坚决贯彻落实林彪等人的指示，要拥政爱民，要坚决支持刘格平、坚决支持陈永贵、坚决支持省革委会等等；严令下属不准有任何不利于革委会和刘格平、陈永贵的言行，要顾全大局，转变态度。

更令这几位军方大佬雪上加霜的是，同年5月16日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对他们当面劈头盖脑的批评指责。江青称：“个人野心家是无底深渊，谁要是掉进去就出不来了。”“你们对坏人阶级敌人不动手，我们动手”（指抓太原重型机器厂党委书记罗枫奇）。周恩来称：“刚才陈永贵讲的是无产阶级派性。”江青接着称：“陈永贵、刘格平都是联系群众的，你们有事要和陈永贵、刘格平好好商量。”陈伯

【1407】山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集小组：《毛主席、林副主席及其他中央首长对山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重要指示（汇集）》，1968年4月9日，页10-11。

达插话：“在山西你们要多听陈永贵的话。”江青又称：“你自己毁灭一个新生的政权怎么行！”“不要再干扰大方向了，再干扰我们就不客气了。”康生称：“全国学大寨，你们反陈永贵、反大寨。”“对彭、薄、安、陶，你们毫无仇恨，对自己人恨得你死我活。”黄永胜插话：“支持革命委员会谁也不敢提了，军队成了什么军队了？”姚文元称：“革委会、解放军应有权威，你们不团结都没权威了”。康生又称：“在晋中区大反陈永贵、大反任、王、张，你们知道不知道任、王、张是受陶鲁茄、薄一波迫害的？你们和薄一波划清界限了没有？这是大方向问题。如果不改，你们就和薄一波搞到一起了。”周恩来称：“你们对好多反动的东西不管。”他又称“你们要站在正确的立场上，要有好的态度，问题还是会解决的。”^[1408]

这些所谓的“讲话”被称为“中央首长五一六指示”，传遍了山西全省，成为支持刘格平陈永贵派的有力武器，再次掀起了攻击谢振华、曹中南、张日清等军队干部的浪潮。两大造反派组织斗争有增无减，十分激烈。

面对此种情况，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1968年6月2日写给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军委办事组并北京军区的报告称：“经我们核心小组反复研究，一致认为：必须认真贯彻执行林副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最近数次接见我们时的指示，制止太原地区武斗，收交各群众组织的武器、弹药，迅速稳定局势，是我省当前急需解决的一个大问题。为此，我们建议从本省驻军内调集五至六个团的兵力到太原地区，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制止武斗，收交武器，揪出坏人，促进革命大联合。执行这一任务的部队，建议除在太原地区集中两个团以外，拟从一〇七师在晋南搞生产的两个团中抽调一个（或两个团各抽一半）；从太谷调炮兵五八六团；从晋东南抽调步兵五五九团（临时来太原执行任务，尔后转调阳泉煤矿支左），晋东南支左任务全部交给高炮六十一师负责。另外，拟请军委总后批准临时动用驻太原和太谷的两个工程团的大部分（最近因施工材料不足，他们工程任务不多），参加这一任务。”

五、诡异政局面前的莫衷一是

事物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正值谢振华、曹中南、张日清及其支持者郑维山承受巨大政治压力之际，山西局势出现了微妙变化：1968年5月26日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接见参加全国煤炭会议直属矿和地方矿代表时，阳泉煤矿六二八（支持刘格平陈永贵派）代表梁宝贵发言指责军队“不支持我们的造反派

【1408】中央首长接见山西省核心小组成员时的讲话，1968年5月16日。刘格平政委在北京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山西地区班全体学员会上的讲话，1968年6月7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政宣组印，1968年6月26日。

组织，不支持刘格平，不支持陈永贵，不支持省革委”。当即受到江青的“严厉批评”并说“当着这么多人你控告解放军，态度很不对，我们要团结，要打倒刘、邓、陶、彭、罗、陆、杨，我是戴红五星、红领章的，你这样控诉解放军，我是决不允许的！”周恩来、康生也对梁宝贵进行了“严厉批评”。^{【1409】}阳泉煤矿老工人王体因为在发言中不同意武斗、要求恢复生产，受到周恩来、康生、江青的称赞，在中共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这些所谓的“严厉批评”没有改变山西文革的实质，但是在当时却减轻了北京军区、第六十九军和山西省军区的政治压力，山西政局走向悄然变化。6月17日周恩来、康生、李富春、张春桥、吴法宪等人接见参加煤炭会议的山西阳泉、河南平顶山部分代表和山西省核心小组全体成员的时候，发出了有利于军方的信息：“大同经验也很好，大同是六十九军搞的嘛。”第六十九军在“晋东南搞得不错，在阳泉、在晋东南六十九军做了很多工作”；“你^{【1410】}把六十九军搞得灰溜溜的，六十三军一去，就和六十三军干上了，哪是工人阶级的感情，工人阶级那有这样的感情！”“要斗私批修，要大批判，把矛头对准敌人，不要搞自己人，要维护解放军，张日清有了错误，已经检讨了嘛！对张日清怎么能叫他灭亡呢！军队要拥护革委会，而革命委员会要拥护军队。主席是不轻易讲话的，接见时当面给你^{【1411】}讲要拥军。”“我们要再说一次，六十九军做了几件好事，如处理大同、平遥，还有晋东南都很好嘛！”^{【1412】}谢振华、曹中南趁势推进该军在山西的支左工作：要求第一〇七师加快在阳泉、晋中、晋南以及部分大型工矿企业的制止武斗、收缴武器，大联合和三结合的步伐；要求第二十八师巩固和发展大同抓革命促生产的“大好形势”。

文革局势变化多端，政局走向难以捉摸。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召开，在山西再掀恶浪。会议的公报还未公开发表，陈永贵迫不及待在大寨传达“开除刘少奇党籍，批判二月逆流，召开九大”等内容。在太原，红总站负责人抢在新华社发布公报前出动宣传车高调宣扬“彻底批判反动的二月逆流”、“揪出二月逆流在山西的代理人”、“坚决拥护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定”等口号。

【1409】山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集小组：《毛主席、林副主席及其他中央首长对山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重要指示（汇集）》，1968年6月17日，页16-18。

【1410】此处的“你”指中共阳泉市核心小组副组长安克。

【1411】此处的“你”指刘格平。6月3日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沈阳、南京军区干部学习班时在主席台上对刘格平讲“要拥军”。

【1412】《毛主席、林副主席及其他中央首长对山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重要指示（汇集）》，页19-20、页24。

虽然此举受到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严厉谴责，但是不甘心“对等掌权”的总站派以杨承孝为代表于1969年1月5日用“太原工人”名义发表“宣言”，号召“彻底批判反动的二月逆流”、“坚决揪出二月逆流在山西的代理人”、“砸烂镇压造反派的‘对等掌权’”，“宣言”呼吁造反派联合起来，恢复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誓与反动的二月逆流及其在山西的代理人血战到底”。在“宣言”的煽动下，已经大联合三结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太钢公司、第十三冶金公司、太原重型机器厂、太原铁路系统以及远在晋南的中条山有色公司、第十二冶金公司等大型企业原总站派的部分负责人重拉队伍，另立门户，打出的旗号五花八门：太原工人、山西工人、产业工人、铁路工人、冶金工人等等。而且，杨承孝等组织几万人上街游行，进驻山西日报社查封报纸。与此同时，原兵团红联站派纷纷成立所谓“护厂队”、“护校队”之类的组织，摆出一副“保卫红色政权”的架势。

在晋中，原总站派打出晋中总站留守处旗号，用武力占据原榆次县委办公楼，与晋中地区革命委员会对峙；在晋南，原“三一八”派负责人以侯马为基地，同驻临汾城的晋南地区革委会对立，并在侯马以南开通以“三一八”命名的列车，中断和临汾、太原的铁路交通。

山西又一次出现了混乱局面，两派开始新的武斗。

针对这些情况，1969年1月30日晚至31日凌晨，周恩来在接见第十二、第十三冶金建设公司出席冶金工业部抓革命促生产会议代表时发出了明确要求：“山西夺权是第二名，紧接上海‘一月风暴’，现在是落后了，落后了就要赶上去。”他要求两派搞“五不协议”：“不动气，不动口吵架；握手不动手；不带枪；不动抢。要按照毛主席、林副主席教导的‘五不’去执行”，重申：“你说他保，他说你保，我都不管。我看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要团结。”“两派不管什么派，反正我看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周恩来避开杨承孝等人早前提出的“彻底批判反动的二月逆流”、“揪出二月逆流在山西的代理人”等口号，反复强调“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要团结”。他当面指示杨承孝等人，必须放行被拦截在十三冶给西山地区运送粮食的一百余辆汽车，要求占领设在榆次525军用仓库的群众组织一把火必须撤出来。^[1413]然而，以杨承孝为代表的总站派将周恩来的要求当成耳边风，继续我行我素。周恩来为主持人的文革碰头会成员不得不再次接见参加冶金会议和“八一五”会议的山西代表，耳提面命地“教育”和指责有关人员。随后，周恩来

【1413】总理接见冶金部第十二、十三冶金建设公司出席冶金工业抓革命促生产会议代表时的重要指示（记录稿，未经首长审阅），1969年1月30日。冶金会议办事组整理，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翻印。

让参加会议的陈永贵、曹中南发言，他们做了自我批评。周恩来等人如此长时间面对面地同山西领导人和造反派头头讲话，在山西文革史上实属“空前绝后”。

可是，这些人对于周恩来等人的讲话置若罔闻，一意孤行。在太原，红总站、山工总、太司、左联等组织在厂矿、机关、学校、招待所等处设立武斗据点，构筑武斗工事。兵团、红联站、兵团工总司等组织以“自卫”为名，也设立武斗据点，构筑武斗工事。两派武斗频发。

同年5月，中共中央召集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成员在北京开会，决定处理山西问题的方针和政策。在高层的掌控下，会议认为：由于刘格平、张日清两同志是长期不团结，闹分裂，搞资产阶级派性，各支一派压一派，使九大提出的各项任务和省核心小组向中央的六项保证、十项措施，不能得到落实，太原市、晋中、晋南地区的问题长期不能解决，而且情况越来越严重。会议根据中央负责人指示的精神，提出解决山西问题的13项措施：1、加强省核心小组领导，建议增加李顺达、王体、韩英、萧选进、徐守恒、汪治平（独立师师长）、罗国斌为省核心小组成员。2、改革省革委会办事机构。为了深入进行机关的斗、批、改，决定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把现在省革委会办事机构人员和原省委、省人委机关人员全部调出来学习，学习后另行分配工作：请求中央或北京军区帮助山西办一个大约6,000人的学习班，其余2,000人由省革委在雁北的山阴办学习班，也请北京军区派一部分干部，加强学习班的领导机构。建议从军队调300名比较优秀的干部，组成精干的省革委会办事机构。除从山西驻军独立师和二十八师调120名干部外，请求军委办事组和北京军区派180名干部。办事机构下设办事组，汪治平负责；政工组，徐守恒负责；保卫组，张纯德负责；生产组，韩英负责。3、坚决执行毛主席亲自签发的由六十九军党委统一领导全省支左工作的命令。建议由各总部和各军种、各兵种驻山西部队的负责人组成省支左领导小组，由曹中南任组长，谢振华、萧选进任副组长。……13、为了迅速制止武斗，彻底解决山西问题，请求中央再派一部分部队协助山西驻军完成这一任务。同时请求中央发一个布告。^{【1414】}

对此，毛泽东批示“照办”，中共中央以“中发[69]42号文件”下发，山西传达到县团级领导班子。7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九大以后的第一个布告：《中国共

【141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263；《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关于解决山西问题具体措施的报告》（1969年7月22日）和中共中央7月23日为解决山西闹派性、搞武斗等混乱现象的布告稿，经毛泽东23日审阅并分别批示“照办”，随后，“报告”以中发[69]42号文件发出；“布告”所署日期七月二十三日，通称“七二三”布告，以中发[69]41号文件发出。

产党中央委员会布告》(七二三布告),以中发[69]41号文件下发全国。在山西,这个《布告》用飞机散发全省,并在不少城市的大街小巷张贴。第六十九军等山西驻军和第一军、第六十三军等派往山西支左的部队,手持这道“御批”深入到太原市、晋中、晋南地区的大小单位、武斗据点,执行《布告》规定的任务。到8月13日,仅太原、晋中、晋南三地收缴枪支近50,000条、2,000门炮,以及大量的弹药和其它装备。^[1415]

为了贯彻落实中发[69]42号文件,中央政治局决定在北京空军第二高级专科学校举办“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山西地区班”,要求太原、晋中、晋南三个地市的两派负责人和省核心小组、省革委会各机构人员,原省委、省人委,原太原市委、市人委机构人员共八千余人到这个学习班“斗私批修”、落实“七二三布告”、“批判刘格平、张日清的严重错误”和“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刘格平、张日清、袁振等人和山西省军区支左办公室全体人员以及任井夫、王振国、张怀英等人被要求参加这个学习班的一切活动并接受学习班的领导,参加这个学习班的还有太原、晋中、晋南革命委员会的三结合地方领导干部等人。根据周恩来等人1969年7月的指示,谢振华主持山西省核心小组和革委会的全面工作。

谢振华,曹中南不仅掌握了山西支左的领导权,而且取代了刘格平、张日清在山西的领导地位,^[1416]成为山西名副其实的实权派。至此,全省从省党政军领导班子到县(区)的党政军领导班子,第一把手几乎全部是军人,而且班子里的成员军人占近一半。地、市级第一把手的配备:刘世洪(省军区副政委)担任太原市核心小组组长、市革委会主任;周运涛(一〇七师政治部主任)担任阳泉市核心小组组长、市革委会主任;刘秀杰(一八七师副师长)担任晋中核心小组组长、地区革委会主任,晋中地委书记;武天明(晋东南军分区司令员)担任晋东南核心小组组长、地区革委会主任,晋东南地委书记;张霖(一师师长)担任晋南核心小组组长、地区革委会主任。只有徐志远、王金贵、康伯成、赵连胜四名地方干部分别担任忻县地区、大同市、雁北地区、长治市的党政一把手,但是给他们配备的第二把手均系军方人士:忻县地区核心小组副组长、革委会副主任朱

【1415】陈永贵同志在平遥县六万人大会上的讲话,1969年8月14日,山西省革委会核心小组,1969年8月15日。

【1416】刘格平1969年9月离开山西,下放劳动。1971年4月被正式免去中共山西省革委会核心小组组长、省革委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兼山西省军区第一政委职务。1976年解除劳动,调回北京。1983年被提名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92年3月11日在北京病逝。张日清1971年4月被正式免去中共山西省革委会核心小组副组长、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北京军区副政委兼山西省军区第二政委职务。文革结束后于1977年12月任武汉军区顾问。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4年10月14日在武汉病逝。

敏仁（忻县军分区政委）；大同市核心小组副组长罗国斌（二十八师政委）；雁北地区核心小组副组长刘明溪（雁北军分区政委）；长治市核心小组副组长赵成旺（长治市人武部政委）。

1971年4月，谢振华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曹中南与陈永贵、张平化三人任省委书记。1974年春，因受晋剧《三上桃峰》被批判一事牵连，谢、曹被揭发、批判、斗争。谢振华被迫于同年6月离开山西，翌年被正式免除在山西的一切职务，回军队工作。

第六十一节 内蒙：从“挖肃”到全面军管^{【1417】}

一、挖肃决策经过

在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成立前后，1967年10月至1968年3月，内蒙所辖2市7盟革委会全部成立。除2市革委会主任由地方干部担任外，7个盟的革委会主任全部由军人担任：呼和浩特市革委会主任由原内蒙区委监委副书记高增贵担任；包头市革委会主任由原包头市委书记、自治区人委副主席李质担任；锡林郭勒盟革委会主任为锡林郭勒军分区政委高万宝扎布（蒙族）；乌兰察布盟革委会主任为北京军区工程兵第一工区政委周发言；巴彦淖尔盟革委会主任为骑兵第十五团（4927部队）副团长刘恒礼；呼伦贝尔盟革委会主任为呼伦贝尔军分区政委尚民；哲里木盟革委会主任为哲里木军分区司令员赵玉温；昭乌达盟革委会主任为昭乌达军分区副政委巴图（蒙族）；伊克昭盟革委会主任为伊克昭军分区政委陈维周。

1968年1月6日至18日，自治区革委会召开第二次全委扩大会议。会议认为，“内蒙古自治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阶级斗争的盖子还没有彻底揭开”，“乌兰夫反党集团的残余势力和流毒还没有挖尽肃清”。会议号召“要打一场挖乌兰夫黑线，肃清乌兰夫流毒的人民战争！”^{【1418】}

1月17日，滕海清在自治区革委会二次全委扩大会议上称，“乌兰夫集团是一个由多种反革命势力组成的反党叛国集团。一股是乌兰夫的老班底，包括奎璧、吉雅泰这些坏家伙，还包括潮洛蒙、布赫之流一些‘少壮派’，王逸伦、王铎、刘景平实际上是乌兰夫的老搭档。第二股是以哈丰阿为代表的反动势力。……第三股基本上是蒙绥合并以后形成的，主要成员是一些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个人野心家，阴谋家，……这三股势力同流合污，形成了以乌兰

【1417】本节主要资料来源：阿拉腾德力海：《内蒙古挖肃灾难实录》，自印本，1999年。

【1418】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内蒙古大事记》，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页608-609。

夫为代表的一大股反革命势力。”滕海清又称，“乌兰夫的黑线又粗又长，流毒全区。”“内蒙干部三分之一要调换。”滕海清的结论是，“反革命势力遍及全内蒙”，因此，“我们的中心任务，就是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彻底摧毁乌兰夫司令部。”^{【1419】}

挖肃运动重点中的重点，是挖乌兰夫的“暗班底”——“新内人党”^{【1420】}。

提出存在新内人党的第一人，是时任内蒙古大学党委书记的郭以青。早在文革前的1965年5月，郭就向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人多次写密信报告“我怀疑东部蒙族干部中有一二百人的民族分裂集团，也就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这是有新内人党之说的首次出现。1967年滕海清到内蒙上任，也是郭以青第一个向滕讲“内蒙古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内人党有长期搞民族分裂活动历史，和日帝、蒙修关系都很深，他们是有很长历史和国外势力一直有联系的民族分裂集团。解放后其骨干、首脑还在，这个势力还在，必须加以彻底揭露和清理。”^{【1421】}

炮制新内人党假案的第二人，是作家、内蒙古文联副主席乌兰巴干。乌于1967年9月建立内蒙古揪叛国集团联络站并任站长。该联络站组建后，大量搜集所谓内人党的历史和现实材料。1968年2月，乌兰巴干到北京，向“滕办”秘书李良递交了《苏蒙修情报系统及叛国集团分布图》、《锡盟苏蒙修特务叛国集团分布图》，两图中标有情报据点、电台线索、越境方向等198处。乌等绘制报送的《内外蒙合并图》、《蒙修情报系统在北京活动简图》，捏造了蒙古大使馆通过北大、外贸学院留学生与呼市、锡盟、呼盟、海拉尔等所谓叛国集团相联系的活动情况。4月12日，乌给“滕办”主任李德臣、被滕海清委以专管挖肃重任的自治区革委会常委李树德写信报送《内蒙反动党团及敌伪情报系统简介（一）》，列举了76个组织，点了1,351人的名，其中不少是内蒙各级领导干部。4月13日，上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现行叛国罪行的报告》，称“在乌兰夫和王再天的直接庇护

【1419】《内蒙古挖肃灾难实录》，页224-225。

【1420】内人党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简称。历史上的内人党，于1925年由白云梯、郭道甫等人所组织，后停止活动。1945年，哈丰阿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东蒙本部名义，发表《内蒙古人民解放宣言》，提出“内外蒙古合并”，称“内蒙古从此加入在苏联和蒙古指导之下，成为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并成立“内蒙古临时共和国政府”，但不被外蒙当局所承认。后哈丰阿等接受了中共中央东北局和西满分局的领导。1947年4月20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内蒙自治问题给东北局的复示》，内人党解散。文革中所指的“新内人党”，指的既不是1925年的内人党，也不是1945年的内人党，而是被主观推测出来的所谓1947年以后有计划地转入地下，潜伏十三年进入组织大发展时期的、以乌兰夫为总头目，表面上是共产党，实际上是内人党，党政军各界都有的庞大的、系统的、全区性的，上有中央，下有支部的反动的民族分裂组织。

【1421】《内蒙古挖肃灾难实录》，页7、11。

下内人党党魁和骨干也纷纷钻进了公、检、法掌握了政法大权”，“在我区形成叛国集团、苏蒙修情报系统、内人党，及其它反动党三位一体的反革命网，直到现在仍猖狂活动。”4月15日，报送《内蒙反动党团及敌伪情报系统组织简介(二)》，特意注明所指反动组织的时间是1946年4月3日至1962年。^{【1422】}

4月14日，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中共自治区革委会核心小组副组长高锦明主持核心小组会议(时滕海清、吴涛不在呼市)，研究内人党问题，根据郭以青、乌兰巴干提供的材料和原内蒙古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鲍荫扎布高压下被迫交代的口供，决定对16名蒙古族负责干部进行秘密隔离、拘留，组织专案突审。4月26日，利用刑讯逼供的假口供，凭空捏造的伪证据和一直未有破获的“206”案件^{【1423】}作依据，由高锦明签发，向中央作了《关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叛国案件的报告》，报称“206”案件已“初步突破”，证明“内人党”是存在的，“而且长期与我们为敌，大搞民族分裂主义”。此电报抄给了滕海清。^{【1424】}

从5月20日到7月1日，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多次研究“内人党”问题。7月，滕海清、吴涛主持召开自治区革委会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了“新内人党”问题，由李树德作了有关“内人党”的“性质及如何对待的说明”。会议通过《关于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处理意见》、《关于“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斗争中几个具体政策问题的意见》和《关于在牧区划分和清理阶级成份的几项政策规定(草案)》等文件。决定重点打击支部委员以上的骨干分子，一般党徒进行登记。会后，全区上下组织力量，办学习班，搞登记站，大挖“新内人党”。^{【1425】}

9月25日，自治区革委会常委、党的核心小组成员权星垣主持召开自治区机关干部大会，高锦明在大会上讲话称，停止挖肃，转入斗批改。10月，高、权被滕海清打成“九月暗流”、“右倾机会主义”，停止工作。^{【1426】}

11月3日至19日，自治区革委会召开第四次全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会议由滕海清主持。这是一次大反“右倾”，狠挖“新内人党”的会议。会后，严重刑讯逼供的恶劣作法由点到面，逐步扩大，不断升级。滕海清竟然称，“十二中全会以后有些单位搞得凶一点，搞了点武斗，逼供信都有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用不着大惊小怪。”“出现一些问题并不奇怪。一点代价不付是不

【1422】《内蒙古挖肃灾难实录》，页22-23。

【1423】1963年2月6日，在集宁邮检中发现寄往乌兰巴托蒙古大呼拉尔主席团的一封信件，信的落款是“内蒙人民革命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公安机关立案为206号。

【1424】《内蒙古挖肃灾难实录》，页213、225。

【1425】综合《内蒙古挖肃灾难实录》，页213、226，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内蒙古大事记》页609等有关内容。

【1426】《内蒙古挖肃灾难实录》，页219、221。

可能的。有右倾的人，他对敌人没抓出来并不怕，死了几个人就特别痛心。”“死几个坏人就哇哇叫。敌人在那破坏，你看不见，这是立场问题。”^{【1427】}

二、挖肃惨状

1979年11月内蒙给中央的报告承认，“全区共挖出所谓‘新内人党’346,000余人，造成了当时死亡和因严重伤残以后陆续死亡16,222人，致伤残的87,188人。”^{【1428】}1980年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亦称，“内蒙古自治区因‘内人党’等冤案、有三十四万六千多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被迫害致死。”^{【1429】}

（一）锡林郭勒盟

挖肃打死、逼死1,863人。刑法多种多样，低头、拷打、吊打、舌头扎钉子、光脚在火上跳舞、用铁钳子拔牙等几十种。在逼供信中，很多妇女被奸污。

锡盟军分区司令员赵德荣在1968年5月开始挖肃时就称，“内蒙部队上上下下坏人最多，特别是政治机关一个好东西没有，在这次运动中把所有的蒙古人狠狠地整一整，蒙古人没有一个好的。”深挖以后又称，“把蒙古人百分之百打成内人党没错，这些家伙死几个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没有什么了不起，死一个少一个。”在他指挥下，内蒙古军区骑兵二团（4947部队）排以上干部全部打入新内人党学习班，通过逼供、诱供、劝供各种方式都打成“内人党”，打完之后以复员转业为名处理了343人，其中蒙族210人。^{【1430】}

（二）伊克昭盟

据1978年6月内蒙全区牧区草原建设工作会议简报第11期称，伊盟组讨论、整理了一份挖新内人党的材料：“全盟有十五万人被打成‘新内人党’，占当时七十四万人的百分之二十一。全盟因挖‘新内人党’致死、致伤、致残的八千五百九十八人，其中：致死一千二百六十人，致残的二千三百二十二，致伤五千零十六人，因残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和工作能力的七百三十九人，……在致死中：有旗县委书记十一人，多数是参加革命几十年的老同志，如乌审旗旗委副书记杨生祥是一九三五年的党员。杭锦旗旗委书记奇治民是民族学院的学生，

【1427】《内蒙古挖肃灾难实录》，页227。

【1428】内蒙区党委：《关于滕海清在内蒙所犯严重罪行和处理意见的报告》，1979年11月13日。启之：《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10年，页495。

【1429】根据1969年4月19日滕海清、吴涛、李树德三人的书面检查，全区清理阶级队伍前后挖出38万多人，这些人中并非全部被诬为“内人党”。

【1430】《内蒙古挖肃灾难实录》，页78、88。

十二、三岁就参加了革命。鄂托克旗副书记宋峰山同志是一九三九年参加革命的，活活打死。还有东胜县委副书记郭致祥同志和伊旗副旗长赵建国同志也是被活活打死的。全盟致死的科级干部一百五十多人，大小队干部五百多人。杭锦旗全旗受害者四千多人，致死一百一十八人，其中三名旗委书记死亡。乌审旗全旗致死一百四十九人。图克公社全社三千多人，百分之七十被打成内人党，致死四十三人。”^{【1431】}

（三）乌兰察布盟

乌盟死1,686人，伤8,628人，残4,650人。察右后旗是挖“内人党”的“先进”单位，打死二百多人。这个旗的乌兰哈达公社赛汉塔拉大队，在进驻的军宣队、贫宣队指挥下，十八天内死了18人，打残33人。凶手都是外地人，军宣队、贫宣队，还有知识青年以及盲流人员，打完抬屁股就走了，造成的后果无人收拾，生活困难由生产队负担。^{【1432】}

（四）哲里木盟

《哲里木盟清算赵玉温的“挖肃”罪行》材料称，赵玉温（原哲盟军分区司令员、盟革委会主任）“在哲盟无中生有地制造了所谓‘乌（兰夫）、石（光华）、云（署碧）反党叛国集团’和‘新内人党’两大冤案。哲盟人民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使三千四百多人死亡，万余人致伤致残，后果极为严重。”

材料称，赵玉温“他把哲盟看成‘洪洞县里没好人’，把各级干部的绝大多数都要打倒。对哲盟委第一书记石光华、书记色音巴雅尔、副书记云署碧等同志进行了长期关押，专案审查，百般摧残。十四名盟委委员中有十一名被长期关押，其中两人被迫害致死。盟直处局长以上干部被长期关押审查的达八十三人，占这级干部的百分之七十。旗县市主要负责干部被关押审查的四十九人，占百分之六十七点六。”

材料又称，“从一九六八年十月到一九六九年五月的一段时间里，全盟被挖‘新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的成员达四万八千五百多人，其中农牧民一万二千多人，普通工作一千一百多人，许多人被搞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样还没有实现赵玉温的挖肃计划，他在北京参加内蒙革委会召开的盟市负责人会上说：‘哲盟要把坏人揪的差不多，五万人以下不行，得五万人以上。’”“原哲盟军分区政委阿古达木、副司令员胡和哈达、参谋长巴达荣贵等同志也是在赵玉温直接迫害下致死的。文化大革命初期，军内进行正面教育时，赵就把这几个同志打成‘三反分

【1431】《内蒙古挖肃灾难实录》，页126。

【1432】《内蒙古挖肃灾难实录》，页78、131-132。

子’，夺了权。后来，内蒙军区下令给阿古达木等同志复了职，群众批评了赵的错误，赵就怀恨在心，借挖‘新内人党’之机，指使一些人把阿古达木同志活活打死。巴达荣贵同志被打挺刑不过，含冤而死。胡和哈达同志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不久也死去了。仅军分区在‘挖肃’期间就死亡二十九人（包括家属），这是在赵玉温直接指挥下制造的一大血案。”“在赵玉温的错误思想支配下，挖‘新内人党’中，蒙族干部、群众受害最深。全盟被揪四万八千多人，百分之七、八十是蒙族，死、伤、残一万四千多人，有七千多是蒙族。科左中旗蒙古人较多，赵玉温把它作为重点，亲自抓，全旗三十五万人口中被挖一万多人，致死八百三十二人，是全盟的重灾区。”^[1433]

（五）呼伦贝尔盟

1979年3月26日《呼盟关于尚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罪行的调查报告》称，1978年10月经军委同意，黑龙江省委决定对原呼伦贝尔军分区政委、呼盟革委会主任尚民的问题立案审查。

该调查报告摘要称，尚民“制造假案：奇、杰、王反党叛国集团；布、官、李反革命三人同盟；全蒙古民族统一党。打出来的假案：新内人党、米吉斯共和国、成吉思汗党、共和党、自由党、内外蒙合并小组、政变小组等二百零二个。”“当时全盟人口131万，干部4万，共产党员三万一，县团以上干部一千人，被挖人数达40万，惨遭迫害的47,590人。在一千名副局处、副旗县以上干部中有806人受到伤害。三万一千名党员中有14,891人受触，占百分之五十。被关押的14,329人，被判刑的57人。死亡总数2,307人（不包括划出去的几个旗，其中仅前旗就死亡500人），伤残16,000人。盟委八名书记，七名被打倒。十七名常委被打倒十五名。副书记官布被打死，副书记布特格奇屁股打烂溃成瘰管，终身不治。”“呼盟‘统一党’比挖‘内人党’要早，这是尚民的独创。尚民在‘统一党’前边还加了‘蒙古民族’四个字，这就变成了‘蒙古民族统一党’较为完整了，并于1968年9月13日直接向林彪、江青报告邀功。”^[1434]

（六）内蒙古军区

内蒙古军区打“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235人，挖“新内人党”3,567人。军区机关挖“新内人党”：司令部160人，政治部195人，后勤部217人。

王继壮自1968年10月至1969年5月，担任内蒙古军区政治部“挖新内人党学习班”临时党支部书记和主任。1968年11月中旬，他曾说：“内人党这个组织

^[1433]《内蒙古挖肃灾难实录》，页142-146。

^[1434]《内蒙古挖肃灾难实录》，页148-149。

很庞大，不仅地方有，在我们内蒙军区从上到下也有一套组织”，“政治部的领导大权被内人党掌握了”，“实际上政治部是借共产党之名搞内人党活动”，“对待内人党，我们必须要有狠字当头，才能突破”，等等。他还亲自布置对原干部部副部长莫德勒图进行隔离审查。开始，专案组提出没有证据，王称：“别人揭发就是证据，你们搞吧，没错。”经过几天审讯，不见成效，王批评专案组人员右倾，给他们介绍了“经验”。之后，又对莫连续两个晚上搞“车轮战”，王见仍无结果，又批评专案组右倾，致使对莫的刑讯逼供越来越严重。莫因不堪忍受折磨，遂于1968年12月1日晚，在军区幼儿园用鞋带勒颈自尽。对此，王继壮非但不接受教训，反而说：“反革命死个算啥，吓不住我们。”继续鼓动和亲自组织挖所谓“新内人党”，致使伤害面不断扩大。王领导政治部“学习班”半年多时间内，使128名干部被伤害，在精神和肉体上遭到了严重摧残。其中原秘书处副科长牧人和莫德勒图、齐木德、浩斯布林、阿迪雅、陈文章、白云蛟等七人被迫害致死，73人被迫害致伤致残。^{【1435】}

（七）自治区公安厅

早在运动初期，就把厅长毕勒格巴图尔、副厅长云世英打成“乌兰夫黑帮”。挖肃开始“砸烂公检法”，以打倒原政法书记王再天作为夺权象征。滕海清调京字411部队^{【1436】}开展挖肃，公安军管会主任是这个部队的副政委任家骥，他又兼任自治区专挖内人党的内蒙革委会第二专案办公室主任，挖内人党专家丁振声^{【1437】}任副主任。公安厅职能转成全区挖肃工具。1968年12月2日开始深挖，任家骥宣布内蒙公安厅是“内人党指挥部”、“内人党保卫部”、“苏蒙修情报机构”、“国际间谍组织”，接着又宣布在公安厅挖出“新内人党”12个支部，68名骨干，200余名党徒，“内人党组织已经摧毁。”^{【1438】}

三、毛泽东：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内蒙已经扩大化了

1969年2月4日，中央文革碰头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接见滕海清。据滕2月8日在内蒙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传达，周恩来在接见时称，“内蒙很复杂，内部有敌人，外部有修正主义，乌兰夫在内蒙搞了二十年，他要搞独立王国。内蒙问题，要全部解决，有个时间问题，你们时间不长，搞得不错么，你

【1435】《内蒙古挖肃灾难实录》，页8、79、138-140。

【1436】北京军区工程兵第七工区的代号。1967年11月，第七工区领导机关及直属分队调驻呼和浩特，归内蒙古军区领导。

【1437】丁振声，原公安厅政保处帝国特侦察科科长。原政保处处长滕和已被隔离审查，丁将政保处绝密档案资料交给乌兰巴干使用，又首创“内人党变种组织”的说法。

【1438】《内蒙古挖肃灾难实录》，页91。

们不要太急了，中央从来没有催你们。有些地方，我们说他们，怕步子太慢了。你们那儿，我们怕步子太快了。清理阶级队伍，要注意学习政策，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1439]周恩来还称：对“内人党”的首要分子，也要做争取教育，总会有个别分子起义。江青称：“内人党”一般党徒，只要登记清楚就行了，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周恩来又称：你们在北京开会，对“内人党”问题要很好的研究一下，你们搞了个文件，还不够，要搞一个好的文件给我们看一下。康生接着称：对一般党徒，要教育，蒙古族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他们加入“内人党”，多数是受蒙蔽的，要教育他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对蒙古族干部要培养，革委会要吸收一些贫下中农、贫下中牧参加进来。^[1440]

对于北京方面防止扩大化的提醒，滕海清似乎并不在意。2月6日，他在北京汇报会上仍旧坚持称，“当前领导思想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右倾。一是对敌情的严重性估计不足，特别是对‘内人党’这个反革命组织估计不足，不少领导同志在关键时刻就犹豫动摇，持怀疑态度，怀疑有没有‘内人党’，因此就不敢勇敢地领导群众向敌人作斗争。二是看支流多，看主流少。我们有的领导同志在群众运动中出现的某些问题指手划脚、批评指责，一个劲反对，泼冷水。”2月16日，滕在内蒙革委会常委扩大会上称，“‘内人党’有没有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有多少？要相信群众，把群众发动起来，什么角落都冲到，揭发出来就好办了。要弄清有多少，没有什么必要，有多少挖多少。是否面宽了？谁有数字可以说明，谁能肯定我那个单位五百个挖出来一千个。如果‘挖肃’斗争按高锦明那样做，那时就刹车，这几十万坏人就抓不出来。”^[1441]

到了4月19日，经北京多次严肃督促后，滕海清、吴涛、李树德不得不以书面检查的形式，检讨在前一个时期挖肃（清理阶级队伍）中所犯的严重扩大化错误。书面检查称，“这个错误是逐步发展起来的。一九六八年十一月革命委员会第四次全会以后，发展成为全区性的。在革委会四次全会以前，内蒙就挖出了十三万多人，这时已发现个别单位有武斗和逼、供、信的现象；革委会四次全会反右后，在农村、牧区、街道等普遍展开清理阶级队伍工作，这时本应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在群众已经认真发动起来和已经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防止左倾’，但仍继续开展反右斗争，结果造成了扩大化和逼、供、信的错误。从去年十一月到

【1439】以后有材料称，滕海清在传达时将周恩来“要吸取江西苏区打AB团、鄂豫皖打改组派的教训”的指示作了隐瞒。

【1440】中央首长二月四日接见滕海清同志时的指示，1969年2月4日晚8时-12时。《内蒙古挖肃灾难实录》，页50-54。

【1441】《内蒙古挖肃灾难实录》，页33-35。

今年三月十五日又挖出了二十五万多人（包括‘内人党’六万八千四百多人），其中有极少数是坏人，但误伤了很多好人，蒙族干部和群众被伤害的面更大，造成民族关系比较紧张的局面。多数人是在逼、供、信的情况下打成‘内人党’的。例如，集宁市一个不足二百人的机关学习班，就挖出‘内人党’一百四十四名，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出身很苦的干部和共产党员（已平反）。据对内蒙古军区机关、骑兵五师、独立二师等单位了解，蒙族干部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都被打成了‘内人党’。”“中央早已多次提醒我们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注意扩大化的问题，我们本应认真遵循，可是直到今年二月初，在北京开的一次有各盟市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小会上，滕海清同志仍错误地提出：主要地还是反右，右倾仍是主要阻力。以致使‘左’倾思想继续泛滥，造成人人怕被说成‘右倾’的局面。”^{【1442】}

5月13日下午，周恩来电召高锦明、权星垣、李树德、李质四名内蒙地方领导干部到京汇报情况。5月16日，中央又召滕海清、吴涛、萧应棠、何凤山、刘树春、李德臣六名军队干部到京。^{【1443】}从5月13日到19日，中央负责人接见四次，头两次四名地方领导干部参加，后两次十人参加。5月19日，中共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核心小组成员滕海清、吴涛、高锦明、权星垣、李树德、李质六人联名向毛泽东、林彪、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报送《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内蒙当前工作指示的几点意见》。意见中称，“滕海清同志从一九六七年四月到内蒙后，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做了大量工作，是立了新功的。但是，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以来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我们领导核心中资产阶级‘多中心即无中心论’的滋长，违背中央多次对内蒙工作的指示，尤其是关于清理阶级队伍方面要注意防止扩大化的指示，严重的骄傲自满，自以为是，宁‘左’勿右，在这种‘左’倾思想的指导下，错误地把高锦明同志防‘左’的正确意见当做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全区进行了批判，助长了‘左’倾错误的发展，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夸大乌兰夫的影响，过重地估计敌情，特别是在挖‘内人党’的工作中，产生了‘左’的倾向，犯了严重的逼、供、信和扩大化的错误，在宣传工作上也犯了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左’倾错误；对待群众，犯了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在领导制度上，犯了破坏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错误，等等。”^{【1444】}

意见又称，“必须迅速地、坚决地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当前我区挖‘新内人党’的工作应立即停下来，对误伤的好人要彻底平反，并做好善后

【1442】《内蒙古挖肃灾难实录》，页65。

【1443】何凤山，时任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兼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1965年大校军衔。刘树春，时任内蒙古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1444】《内蒙古挖肃灾难实录》，页60-61。

工作；因‘内人党’问题被关起来的，除确有证据和少数有重大嫌疑的要继续审查外，其余都要立即放出来。该解放的干部要迅速解放出来。”^{【1445】}

5月22日，经毛泽东批示“照办”，中共中央作出批复称，“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内蒙古军区党委：中央同意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核心小组《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内蒙当前工作指示的几点意见》。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根据‘九大’精神，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迅速纠正前一段时期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所犯的扩大化的错误，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稳定内蒙局势，总结经验，落实政策，争取更大的胜利。”

在中共中央作出批复的同一天，吴涛在呼和浩特传达中央对内蒙当前工作的指示时称，“在滕海清同志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内蒙犯了严重的逼、供、信，扩大化，违反政策的错误，比延安整风的时候还严重。滕海清同志也参加过鄂豫皖苏区打改组派，但是这个沉痛的教训他没有吸取。中央对内蒙要注意防左和扩大化的问题，曾有多次指示。第一次，一九六八年二月，在怀仁堂接见滕海清同志时指出过，你们要进行阶级分析，注意面不要搞宽了；第二次是六八年国庆节前，总理接到一个下放到内蒙边境的知识青年来信，说在十几户的人家里，只有三户不是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的。总理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北京军区陈先瑞同志，陈先瑞同志告诉了滕海清同志，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扩大化；第三次是康生、江青、姚文元同志对呼伦贝尔盟清理阶级队伍一个报告里边，曾经批示要注意防止扩大化。这个批示曾经由北京军区给内蒙军区发了一个电报，后来又派北京军区张副政委到内蒙检查落实政策的情况；第四次是六九年二月四号接见滕海清同志又谈了这个问题，并指出要吸取苏区、江西苏区打AB团、鄂豫皖打改组派的教训。第五次在‘九大’期间，中央负责同志找滕海清、吴涛同志谈话，严肃地批评内蒙犯了严重的逼供信和扩大化的错误。同时也谈到了关于高锦明同志的问题，并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内蒙已经扩大化了。对中央屡次指示，滕海清同志，没有全部传达，没有坚决地贯彻执行，滕海清同志几次向中央汇报内蒙的问题，没有检查，反而企图说明自己是正确的。所以中央领导同志说，毛主席多次教导我们，谈话不要只找一个人，要多找几个人同时在场，以前只找一个人谈，要吸取这个教训。”吴涛又称，“中央领导同志说，滕海清同志的工作作风很不好，独断专行，违反民主集中制，不听核心小组集体的

【1445】《内蒙古挖肃灾难实录》，页63。

意见，不听军区党委的意见，搞秘书专政，只听滕办几个小家伙的话。你的滕办要取消，把几个秘书调北京军区学习班学习。”^{【1446】}

滕海清是军人主政时期一个十分恶劣的典型。对于内蒙人民来说，滕的极其严重过失实难以原谅！惟其迟于1971年5月方正式调离内蒙，却仍保留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一职至1975年。1975年至1980年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滕曾于1969年至1980年间三次为其在内蒙的极其严重错误作过检查。文革结束后，内蒙区党委及其第二书记廷懋本人，均主张对滕追究政治或法律责任，然未果。滕还于1988年获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7年以88岁高龄逝于北京。

四、对内蒙实施分区全面军管

1969年2月4日，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在接见滕海清时，当江青称，“你们边防线那么长，骑兵到处跑，怎么得了？”康生接着称“内蒙就像拉丁美洲的智利那样长，打起仗来怎么指挥？”周恩来回答：“已经有了个决定，准备把两头划出去。”康生问，“有这个决定？我还不知道。”^{【1447】}

中央在制止了内蒙挖肃扩大化的趋势后，对内蒙仍然不放心。为此，1969年7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变更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划的决定。内称：“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为了便于领导和加强对苏（蒙）修作战的战场准备，以便战时更好地支援对修作战，将内蒙古自治区东、西两段的部分行政区划作了跨区调整，即：东段的呼伦贝尔、哲里木、昭乌达三盟全部划归东北；西段的巴彦淖尔盟的额济纳旗、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划归甘肃、宁夏。”“整个交接事宜，责成北京军区负责召集兰州、沈阳军区及有关省、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省军区共同研究商定，并将交接情况报告中央。”“全部交接工作，应争取在一九六九年八月底前完成。”同时，内蒙古军区奉命将呼伦贝尔、哲里木、昭乌达军分区和所属部队，分别移交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军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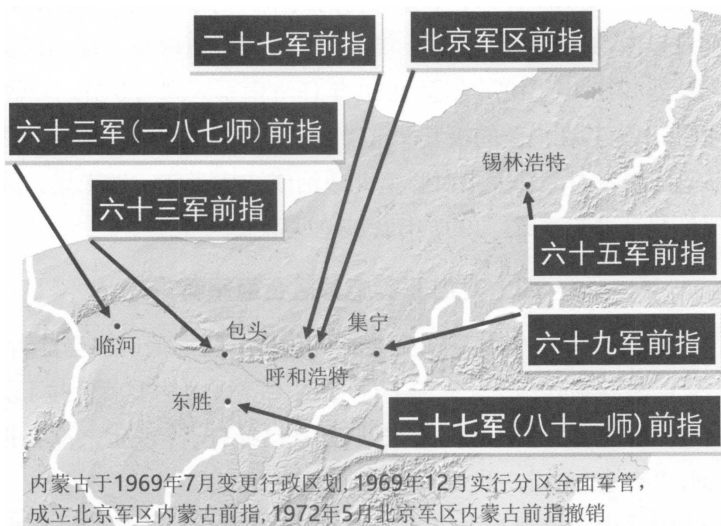
1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内蒙实行分区全面军管的决定》，对将“两头划出去”后保留的四盟二市实行分区全面军管。该决定全文如下：

鉴于内蒙古地处防修前线，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很快落实备战动员，实现五个统一，搞好斗、批、改，加速“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进程，而内蒙古目前工作并不能

【1446】吴涛同志传达中央对内蒙当前工作的指示，1969年5月22日。《内蒙古挖肃灾难实录》，页71-73。

【1447】中央首长二月四日接见滕海清同志时的指示，1969年2月4日。《内蒙古挖肃灾难实录》，页51-52。

内蒙古分区全面军管态势图(1969-1972)



适应这一需要，自治区各级革命委员会领导同志的思想状态又不统一，因此，中央决定：责成北京军区对内蒙实行分区全面军管，并由北京军区组成前线指挥所，领导这一军管。其具体部署如下：

北京军区由郑维山司令员、杜文达副司令员、黄振棠、张正光副政委组成前线指挥所，进驻呼市。以上四人组成前指党的领导小组，以郑维山为书记，黄振棠、杜文达为副书记，实行对内蒙的一元化领导。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在前指的领导小组领导下进行工作。从北京军区抽人组成前指办事机构。

在北京军区前指的统一指挥下，包头市、巴盟、锡盟、乌盟、呼和浩特市、伊盟等地区的革命委员会和军分区（警备区），分别由六十三军、六十五军、六十九军、二十七军组成前指，实行分区全面军管。所有军管单位，均以战备为纲，抓好革命和生产。

六十三军由曹步墀副军长、田荫东副政委，组成精干的领导班子，负责包头市、内蒙铁路局、乌达、石拐子两煤矿、河西公司的全面军管工作。

六十三军一八七师的原定部署不变。由六十三军副军长余洪信和一八七师副政委王雪，并加强干部四十至五十人带五六〇团三营负责巴盟地区的全面军管工作。巴盟革命委员会和军分区从磴口迁到临河。

六十五军由耿淑明副军长、靳甲夫副主任和一九五师崔毓秀副政委组成精干的领导班子，带领一九五师五八三团，进驻锡林浩特，负责锡盟地区的全面军管工作。

六十九军由周衣冰副军长和周发言副政委组成精干的领导班子进驻集宁，带领一个团负责乌盟地区的全面军管工作。

二十七军由向孝书副军长、蔡云璞副政委组成精干的领导班子，带领四个连负责呼和浩特市全面军管工作。

二十七军由八十一师常道德副政委、郭学泮副师长组成精干的领导班子，带领必要干部和部队，负责伊盟地区的全面军管工作。

各部队进驻后，要以毛主席关于“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教导和林副主席关于“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指示为指针，以“七二三”布告、“八二八”命令为武器，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坚持“三条原则和九个一样”，过细地做群众工作，团结内蒙各族人民，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力争“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全面胜利。^{【1448】}

对内蒙宣布实行分区全面军管，标志着1967年11月诞生、在1968年2月至1969年5月一年多时间里制造了挖肃惨剧的以滕海清为首的内蒙革委会寿终正寝。分区全面军管的范围，不止于地方各级革委会，还包括各军分区（警备区），这种情况，在全国是独一无二、未有先例的。^{【1449】}

第六十二节 甘肃：兰州军区直管下的支左工作

一、甘肃支左改由兰州军区直接负责

在中央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的翌日，1967年1月24日，驻兰部队和甘肃省军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游行和誓师大会，表态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同时，甘肃省军区发出“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的号召。

【1448】《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实行分区全面军管的决定》，1969年12月19日。中发〔69〕85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1969年12月30日发出。杜文达、黄振棠、张正光，1955年授衔少将。曹步墀、耿淑明，1965年大校军衔。余洪信，1972年5月在太原六十三军军部行凶杀人后携枪外逃，次月被发现自杀于山西榆次南郊。

【1449】内蒙分区全面军管历时一年半。1971年5月随着内蒙革委会“补台”，中共内蒙古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尤太忠任内蒙革委会主任、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而宣告结束。

甘肃省军区除辖庆阳、平凉、天水、武都、定西、武威、张掖、酒泉、兰州、临夏、甘南 11 个军分区外，还兼兰州卫戍区^{【1450】}，并辖省军区独立师。1967 年 1 月，司令员詹大南，第二政委龙炳初，副司令员胡正平、张忠、侯世奎、胡定发、张介民，副政委王玉昆、张西鼎，参谋长张频藩，政治部主任张西鼎兼。^{【1451】}

1967 年 2 月 5 日，在兰州七里河体育场举行由群众组织、甘肃省军区和驻兰部队指战员约十万人参加的甘肃省红色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宣布成立甘肃红色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简称红联），并接管原省委、省人委、兰州市委、市人委的党、政、财、文一切大权；宣布了《甘肃红色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第一号通告》。会上，揪斗了省委、省人委、兰州市委、市人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1452】}

甘肃省军区对红联的夺权采取了支持的态度。詹大南以军队代表身份参加红联的工作。惟该次夺权一直没有得到中央的承认。

3 月 22 日，根据中央关于建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的指示，由甘肃省军区龙炳初、张介民、原副省长李培福、王国瑞、冯直等组成的甘肃省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正式成立。负责组织全省生产和日常工作。^{【1453】}

四五月间，中央认为，詹大南在支左问题上“严重无组织无纪律”，“有严重错误”，遂决定甘肃地区的支左工作改由兰州军区直接负责。时任兰州军区政委的冼恒汉后来回忆称，“1967 年 2 月 12 日，军委指示要各大军区立即停止‘四大’，准备参加‘支左’。但实际上军区的‘四大’停不下来，我们说话没有人听，‘四大’的余震一直持续到 4、5 月份。当时，兰州军区‘四大’还未完全平息，我和张达志还都来不及洗澡换衣，便被专机接到北京领受任务。”“关于兰州军区‘支左’的安排，具体人员分工是毛主席亲自定的，文件也是毛主席圈阅批示的，但布置任务是周总理亲自谈的。”“总理先对刚从批斗会场上下来不久的我和张达

【1450】1961 年总参指示，全国各重点城市设立卫戍区。是年 5 月，甘肃省军区重新成立，年底兰州军区决定兰州卫戍工作由甘肃省军区负责，兰州卫戍区随即成立。1967 年 9 月总参通知：为了统一警备和卫戍机构的名称，除北京卫戍区外，其余一律改称警备区。据此，兰州卫戍区从当年 10 月 1 日起，改称兰州警备区，仍由省军区兼。

【1451】詹大南、胡正平、张忠、侯世奎，1955 年授衔少将。龙炳初，1961 年晋升少将。张西鼎，1964 年晋升少将。胡定发、张介民、王玉昆，1965 年大校军衔。

【1452】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甘肃大事记》，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年，页 206-207。

【1453】《中国共产党甘肃大事记》，页 207。

志表示慰问，问我们身体情况怎么样？然后，总理对我们表示坚决的信任。总理说：‘你们都是好同志，老实人，过去都对革命做出过很大的贡献。这次军队机关‘四大’，受到冲击，受了些委屈，希望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嘛……党是信任你们的，毛主席是信任你们的，希望在支左工作中再立新功。’”“总理又说：‘经毛主席批准，由兰州军区负责组织陕、甘、宁、青的‘支左’工作。张达志同志分管军队的工作，冼恒汉同志分管地方的工作，要立即行动起来。现在国家有困难，各地武斗那么严重，工厂都不生产了，造反派不搞联合，需要人民解放军出来做工作。你们要为党分忧，为毛主席分忧。西北是工业重镇，国家有许多大项目在那里，一点差错都不能出，全靠你们了……’”^{【1454】}

1967年5月，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原政委刘澜涛本月被免职，政委冼恒汉，副司令员杨嘉瑞、徐国珍、胡炳云、康健民、刘贤权、李书茂、詹大南，副政委高维嵩，参谋长李书茂兼，政治部主任刘瑞方。^{【1455】}军区所辖师一级部队驻甘肃境内的有3个：炮兵第十五师、骑兵第二师及陆军第六十二师。

炮兵第十五师，师部驻永登县，代号8110部队。1967年5月师长铁锋，政委许冲波，副师长李德胜，副政委徐捷，参谋长李福田，政治部主任刘亭章。辖炮兵第一团、第八团。

骑兵第二师，师部驻临夏市，代号8083部队。1967年5月师长张桂金，政委徐志亮，副师长邢道山、张世昌，副政委黄世渊、赵国成，参谋长缺，政治部主任高俊杰。辖骑兵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团。

陆军第六十二师，师部驻平凉县，代号8037部队。1967年5月师长姜玉安，政委李天冲。该师1967年2月由兰州军区返还陆军第二十一军建制，其三支两军任务由兰州军区直接领导，所属部队除步兵一八一团在兰州支左外其余驻于宁夏。8月，师部移驻宁夏银川。

除上述师级部队外，另陆军第六十三师步兵第一八九团驻天水地区，代号8165部队，其三支两军任务由兰州军区直接领导。

【1454】冼恒汉：《风雨八十载》，<http://blog.116.com.cn/?uid-618-action-viewspace-itemid-57322>，最后访问：2015年1月10日。

【1455】刘瑞方，1964年晋升少将。

甘肃驻军分布图(1967-1968)



二、中央关于甘肃问题的三个文件

1967年5月11日，周恩来将拟发出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军委文革小组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报送林彪、毛泽东审阅。周并批示称，“即送林彪同志审阅后再送请主席批示。这个意见经五月十日扩大的碰头会议上通过，大家都认为在目前，甘肃以实行军管为好。张达志在这次军区会议上检讨较好，而冼恒汉从去年十月工作会议以来，态度总是明朗的，故以冼主持军管会，张主持大军区工作，妥否，请主席批示。”周的意见，毛、林均同意。^{【1456】}落款日期虽署5月12日、其实当时并未发出的《几点意见》，要点如下：

（前略）

（二）甘肃省军区司令员詹大南同志，以军队代表身份参加《甘肃省红色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的工作中，有严重错误。主要是在《红联》处理《七一战斗队》问题上，没有掌握大方向，不做团结工作，轻率地开除了《七一战斗队》，造成了《红联》的分裂，使甘肃省革命左派大联合受到挫折。在处理这样重大问题上，詹大南同志严重无组织无纪律，不请示报告兰州军区，当兰

【1456】中发[67]230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1967年8月4日发出。

州军区采取措施加以纠正时，还竟然错误地进行抵制。这是不能允许的。现在詹大南同志已经检讨了错误并决心改正，我们欢迎这种态度。^{【1457】}

甘肃省军区广大干部，战士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做了很多工作，甘肃省军区在支左工作中发生的错误，他们是没有责任的。

(三) 军队的支左工作，在当地最高军事领导机关统一领导，统一安排下进行。甘肃省军区的支左工作要服从以张达志、冼恒汉同志为首的兰州军区党委的领导，重大问题必须请示报告。要严格组织纪律，不得自行其是。

(四) 鉴于当前甘肃省成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还不成熟，中央决定对甘肃省实行军事管制，以冼恒汉同志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徐国珍（兰州军区副司令），詹大南同志为副主任。甘肃省军区要全力参加军管工作。^{【1458】}

以上《几点意见》未发出的原因，在于两天后毛、周对甘肃军管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5月13日中午12时，兰州军区党委向中央军委、全军文革小组并中央文革（并转在京的张达志、冼恒汉）请示表态支持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事称：

兰州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五月八日、九日，“红色长征团”、“工联”等真正的革命左派相继杀出“红联”后，当前已形成以“革联”保守派为一方，以“火车头”、“中南海”等革命群众组织为一方，以“工联”、“长征团”、“七一”等革命左派组织为一方的三足鼎立的形势。我们认为，当前的形势仍是大好的形势。

兰州文化大革命，由于以汪锋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破坏及“红联（指）”在“二五”夺权后，没有掌握好斗争的大方向，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虽经我们做了大量工作，但终因是属于两条路线斗争的性质，难以成效。因而造成了“红联”的分裂，使兰州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新的反复。在这种情况下，“工联”、“长征团”等革命左派组织杀出“红联”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必然结果，是革命的行动，是符合兰州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的规律的。

【1457】詹大南虽受到中央批评指责，但没有影响其在军内的地位。他仍以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任甘肃省军区司令员（1969年8月免兼），1970年12月调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直至1982年12月。

【1458】《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军委文革小组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1967年5月12日。中发[67]230号中共中央文件。

以“工联”、“长征团”、“七一”、“兰铁红司”、“大专院校三司”、“省级机关遵义公社”、“市级机关三司”、“赴兰红卫兵联合战斗队”等为核心的革命组织，已组成“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旗，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甘肃省以汪锋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认为，他们的斗争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原甘肃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胡继宗等革命领导干部已公开表态支持“红三司”，“红三司”决定结合他们。

“红三司”是甘肃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联合，我们认为，应该以“红三司”为核心通过进一步对“火车头”、“中南海”、“红鹰”等革命群众组织及“革联”的广大革命群众进行工作，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促进“三结合”，建立甘肃省革命委员会。

“红三司”定于五月十四日召开大会，发表宣言，革命领导干部讲话，举行盛大规模的游行。他们要求兰州军区表态支持。经军区党委讨论，一致认为应该明确表态支持。以上报告是否妥当，请速示。^[1459]

对于兰州军区党委的请示，毛泽东、周恩来5月14日分别作出批示。毛泽东当日三时批告林彪、周恩来称，“此件请阅。所见似有理由，请与张、洗、詹大南诸同志商处。胡继宗同志等既已站出来，所见与军区一致，积极支持三司，是否可不实行军管，而照军区意见，做一时期工作之后即可成立省革命委员会。以上请商酌。”周恩来批告林彪称，“本件已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传观过。张达志、洗恒汉、詹大南三同志已于十三日回兰州，拟与他们通电话后，如得他们同意，将甘肃军管会改为革委会筹备小组，吸收胡继宗同志参加。本件另印发给碰头会各同志。”^[1460]

6月12日至7月22日，兰州军区、甘肃省军区有关负责人和胡继宗在北京举行“甘肃文革问题座谈会”。会后，形成《关于甘肃问题座谈纪要》，要点如下：

《兰州市红色造反派联络委员会》（简称：“红联”），“二五”夺权大方向是正确的。兰州军区、甘肃省军区支持《红联》和“二五”夺权，也是正确的。但是，夺权以后詹大南同志以军方代表的身份，在《红联指挥部》工作期间，

【1459】兰州军区党委：《请示表态支持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事》，1967年5月13日。中发[67]231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1967年8月3日发出。

【1460】中发[67]231号中共中央文件。

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没有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以汪锋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是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左派组织，开除了《七一战斗队》，排斥《工联》、《红色长征团》、《赴兰红卫兵联合战斗队》；压制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又开除了《红战》；错误地结合了王世泰，打击了胡继宗同志，并在甘肃日报上大肆宣传；轻率地开除了已结合的领导干部。这就造成了《红联》的分裂，破坏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詹大南同志处理上述重大问题，不请示报告兰州军区，当兰州军区批评、纠正其错误时，还错误地进行抵制。

五月，中央、军委听取了张达志、冼恒汉、詹大南、张忠同志的汇报，提出《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四条”），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了照办。詹大南同志对“四条”竟然进行抵制，并给中央施加压力，企图改变“四条”。

这次来京，经过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领导同志谆谆教导，认真学习文件，詹大南同志认识了错误，进行了检讨，并表示决心改正，我们欢迎这种态度。詹大南同志应向机关、部队和革命群众，做公开检讨，挽回影响。甘肃省军区在支左工作中发生的错误，广大干部、战士是没有责任的。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照办的《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和对《兰州军区请示表态支持“红三司”报告》的批示，是解决甘肃问题的指针，必须认真传达学习 and 坚决贯彻执行。建议党中央批准把这两个文件印发给营以上的党员干部，并把这两个文件的基本精神在广大干部、战士和革命群众中口头传达，使广大干部、战士和革命群众牢记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对解决甘肃问题的重要指示，并落实在行动上。在传达学习中，甘肃省军区要检查前一段的支左工作，提高认识，总结经验，整顿纪律，保持机关的正常工作和部队的绝对稳定。兰州军区要教育机关、部队要更好地同甘肃省军区干部、战士加强团结；要主动检查在支左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我们相信，两级军区的分歧，一定能够消除，在完成“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中，会更好的团结起来。对于个别屡教不改坚持错误的人，要按情节轻重给予纪律处理。

鉴于《红三司》成立和胡继宗等同志已站出来，兰州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越来越好。大家认为甘肃省可不实行军事管制，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建议由冼恒汉同志任组长，徐国珍、张忠、胡继宗同志任副组长。小组成员，预计二十名左右，其中包括军方代表、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和革命领导干

部。小组成员的具体人选，拟回去以后，经同群众协商，再确定上报。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组织以左派为核心的广泛的革命大联合，筹建革命“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领导甘肃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组织抓革命、促生产的班子，把工农业生产、财贸工作管起来。

正确对待三大派群众组织。坚决支持《红三司》；积极热情地帮助和团结《红联》；积极地、艰苦地说服教育《革联》端正大方向。……^{【1461】}

7月29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名义拟定的对《关于甘肃问题座谈纪要》批语称：

兰州军区、甘肃省军区：

中央认为《关于甘肃问题座谈纪要》是正确的，可行的。中央同意《纪要》中的六条意见。

中央要求两级军区、广大指战员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团结，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兰州军区统一领导下，把“三支”“两军”工作进一步做好。

甘肃省军区和当地驻军，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批准照办的《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对《兰州军区请示表态支持“红三司”报告》的批示和《关于甘肃问题座谈纪要》，并积极引导群众贯彻执行，坚决反对省市机关和甘肃省军区内个别人抵制中央指示的一切行为。

此件连同《纪要》可发至连队和人武部干事。

林彪当日将上述拟稿呈毛泽东批示。7月30日，毛批示称：“退林彪同志：此件已阅，很好，照办。”^{【1462】}

8月3日至5日，中央分别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军委文革小组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兰州军区《请示表态支持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事》、《关于甘肃问题座谈纪要》及毛、林、周相关批示相继下发。兰州军区党委办公室8月5日在传达中央关于甘肃问题三个文件有关事项的通知中，借关锋的话对前两个文件为什么五月份没有即时发出作出解释称，“关锋同志说，‘需要说明一下，前两个文件为什么没有正式发下去需要解释，责任不在大军区，是中央办公厅办事机构压下来的。为什么压？第一个文件

【1461】《关于甘肃问题座谈纪要》，1967年7月22日。中发〔67〕229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1967年8月5日发出。

【1462】中发〔67〕229号中共中央文件。

是说的军事管制，第二个文件是说成立革委会筹备小组，办公厅认为两个文件精神不一致，没有发。大家这次来了后，查到了文件，‘七一’印发给大家，这次纪要也写上了两个文件。’”^{【1463】}

三、甘肃临时权力机构中的军人

1967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复同意兰州军区党委《关于成立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报告》，筹备小组由冼恒汉、徐国珍、李书茂、张忠、龙炳初、胡继宗、王国瑞、白学光及群众组织代表9人组成。^{【1464】}冼恒汉任组长，徐国珍、张忠、胡继宗任副组长。11月9日，省革筹召开成立大会。11万多人参加了大会，会后举行了游行。大会发布了省革筹第一号公告，宣布省革筹正式成立，并从即日起，甘肃省的党、政、财、文一切大权统归于省革筹。^{【1465】}

1968年1月9日，兰州军区党委、省革筹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上报《关于成立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称，目前“五代会”已经成立，干部阵线已基本分明，中高级干部已“解放”60%以上，认为成立甘肃省革委会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报告》同时提出了报请中央审批的革委会组成人员名单。23日，中共中央批示同意成立甘肃省革委会。省革委会由冼恒汉任主任；徐国珍、张忠、胡继宗、邱裕民、萧泽民等5人任副主任。^{【1466】}原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等被定为“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中国赫鲁晓夫”在甘肃的代理人。24日，甘肃省革委会成立暨庆祝大会在兰州举行。^{【1467】}

兰州军区、省革筹上报中央的报告，附已选出的省革委会委员名单，其中军队代表16人，另革命领导干部中军人1人，共17人。他们是：冼恒权、张达志、徐国珍、李书茂、郭时胜（兰州军区司令部军训部部长）、齐振兴（兰州军区司令部通信兵部主任）、孙炳先（兰州军区政治部群众工作部部长）、姚树荫（兰州军区党委办公室主任）、刘金泉（兰州军区司令部直政部干事）、龙炳初、张忠、田浩（甘肃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冯进开（甘肃省军区司令部军训处副处长）、密亚光（甘肃省军区独立师师长）、铁峰（炮兵第十五师师长，兰州市革筹小组组长）、谢松柏（兰州军区天水分校校长）及张桂金（骑兵第二师师长，临夏回族自

【1463】兰州《大专三司》，1967年8月5日。

【1464】王国瑞，原甘肃省副省长。白学光，原中共兰州市委书记处书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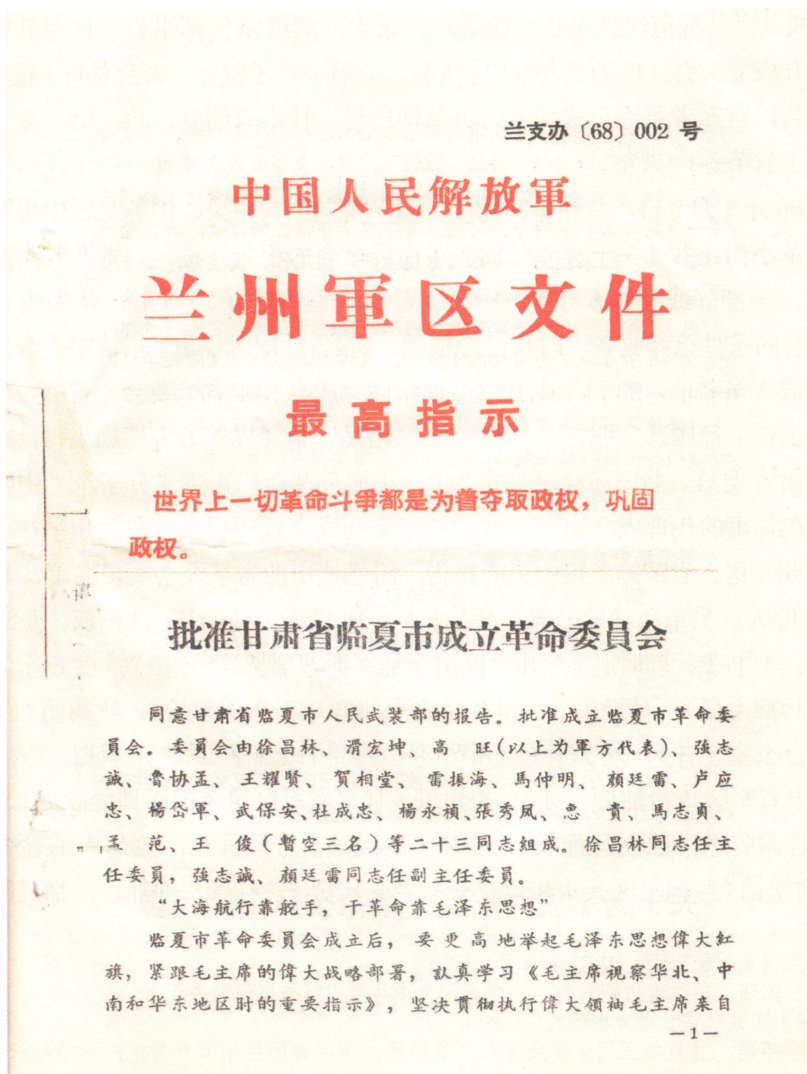
【1465】《中国共产党甘肃大事记》，页209。

【1466】邱裕民，甘肃红三司主要负责人。萧泽民，原共青团兰州市委书记，甘肃红三司负责人。

【1467】《中国共产党甘肃大事记》，页211。

治州革委会主任)。军队代表 17 人在省革委会 105 名委员中仅占 16%，看似比例偏低，惟省革委会委员在当时的权力架构中仅为装饰实际并不起什么作用。在真正起作用的省革委会常委及正副主任中，军队代表则分别占了 33% 及 50%。

甘肃省革委会下设办公室、政治部、保卫部和生产指挥部四大部门，部门负责人全部由军人担任。其中办公室负责人为姚树荫，政治部负责人为郭时胜，保卫部负责人为藺进生（兰州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生产指挥部负责人为龙炳初。



兰州军区批准临夏市成立革委会的文件，1968年1月。

1968年1月至8月，甘肃11个专、市、州全部成立革委会，其中7个专区、1个省辖市、2个自治州革委会主任为军人，占90%。具体情况如下：临夏回族自治州革委会主任为张桂金；天水专区革委会主任为步兵第一八九团（代号8165部队）政委盛学仲；定西专区革委会主任为定西军分区司令员孙继力；甘南藏族自治州革委会主任为原甘南州委代理第一书记烽野；平凉专区革委会主任为平凉军分区司令员向汉生；兰州市革委会主任为铁峰，1968年7月后为胡定发；张掖专区革委会主任为张掖军分区司令员王广义；酒泉专区革委会主任为工程兵建筑第五十四师（8342部队）原副师长吴占祥；庆阳专区革委会主任为甘肃省军区独立师副政委封元笃；武都专区革委会主任为武都军分区司令员高维新；武威专区革委会主任为兰州军区工程兵第一工区（8114部队）^[1468]政委鲁治安。

在省革委会成立后，4月5日，由兰州地区工代会、大专院校红代会等联合发起，在兰州举行“狠斗二套班子总头目裴孟飞”大会。称裴孟飞（原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犯有“动摇、颠覆革委会”和“三反”罪行。提出了“打倒裴孟飞，揪出变色龙，砸烂公检法，找出小爬虫”的口号。8日，省革委会向全省各地、县革委会下发《常委会纪要》，把裴孟飞说成是“刘、邓在甘肃经营反革命政变据点第二套班子的总头目”。18日，省革委会召开“彻底摧毁甘肃反革命第二套班子”誓师大会。洗恒汉作动员讲话称，“同二套班子斗争的性质，是颠覆与反颠覆、夺权与反夺权、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20日，《甘肃日报》发表社论《彻底砸烂中国赫鲁晓夫在甘肃的第二套班子》称，这次大会“是一次向二套班子发起总攻击的誓师大会，是清理阶级队伍的动员大会”。此后，揪所谓“二套班子”代理人波及到全省，受此株连遭受迫害的干部、群众达千人之多。7月12日，省革委会政治部印发的《省级机关几个数字的统计》显示：省级56个厅、局，总人数5,064人（其中：高干215人，中干734人，职工4,115人）。揭出“有问题”的718人，占机关总人数的14.2%（其中：高干141人，中干217人，职工360人）；在“有问题”的718人中，除了“叛徒、特务、三反分子、走资派”外，还有新揪出的46人是“二套班子”的。^[1469]

最后，说一下时为甘肃一号人物的洗恒汉。洗自1964年6月至1977年6月，在军内历任兰州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1969年4月至1977年6月任中央军委委员。军队介入文革后，自1967年7月起

^[1468] 1968年2月，军委命令沈阳军区第一工区调归兰州军区建制，称兰州军区工程兵第一工区，辖工程兵建筑第一三二团、第一三四团。

^[1469] 《中国共产党甘肃大事记》，页212-214。

任甘肃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组长，1968年1月至1977年6月任甘肃省革委会主任。1970年5月至1971年2月任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1年2月至1977年6月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文革结束后于1977年6月被免除在兰州军区和甘肃省的职务。1982年12月被令退出现役，降为按地师级干部政治、医疗待遇。1985年6月，中央指示改变以前的处理决定，改按正军职待遇离休安置。1988年7月被降格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1年11月19日在兰州病逝。

冼恒汉离职后撰写回忆录《风云八十载》，内中为其在文革中的经历申辩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是十年‘支左’，我想我的后半生也许是顺理成章地盖棺定论了。但是‘文革’使我们这些奉命‘支左’并被历史推向‘文革’大混乱中第一批站出来主持工作的人，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有争议的人。十几年来，尽管我为顾全大局保持沉默，尽管我为了协助组织上搞清问题而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写材料，向上级申诉反映情况，但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我已经是将近八十岁的人了，有着很严重的心脏病，风烛残年，日薄西山了。我从六十多岁等到现在，不可能再等一个十几年了。考虑再三，觉得有些东西还是应该写出来，一吐为快。当然，我只是讲事实，况且这是我的私人回忆录，并不打算公开发表。这是一段历史，等我们这些人都去见马克思了，也就无从考证了。写在纸上，记录下来，或许将来有一天，在不影响党和国家大局的前提下，如果有人有兴趣研究这段历史的话，那么可以供他们去判断、去分析，总是个依据吧。至于孰是孰非，还是让历史去裁决吧！”^[1470]

第六十三节 河南：省军区改组前后^[1471]

一、河南驻军简况

1967年1月军队介入地方文革时，驻豫军级单位2个，陆军及空军师级单位多个，简况如下。

(一) 河南省军区

1967年1月，军区司令员张树芝，第一政委刘建勋，第二政委何运洪，第三政委王全国，副司令员赵复兴、王才贵、刘大坤、陈桂昌、杨树元，副政委钟生

【1470】冼恒汉：《风雨八十载》节选 <http://www.doc88.com/p-0512639228568.html>，最后访问：2020年3月1日。

【1471】主要资料来源：河南二七公社、中国人民解放军赴豫调查团、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郑部队支左联合办公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央首长关于河南问题的指示及赴京汇报纪要汇编》，1967年8月。

溢、李文堂、余嗣贵，参谋长东传钧，政治部主任李善亭。^[1472]军区工作，实际由党委第二书记何运洪（第一书记刘建勋）以第二政委名义主持。

辖商丘、开封、洛阳、安阳、新乡、许昌、信阳、南阳、郑州、周口、驻马店共 11 个军分区及 2 个独立师。省军区独立第一师 1966 年 9 月 1 日由原省军区独立师改称，代号 4789 部队。师长南海，政委赵永安，副师长程毓庭，副政委刘太然，参谋长王树勋，政治部主任边保山。辖步兵第一、第二、第三团。独立第二师 1966 年 9 月 1 日由原河南省公安总队整编，代号 8202 部队。师长彭辉^[1473]，政委孙焰，副师长曾纪桂、罗绍福，副政委郭海瀛，参谋长何万选，政治部主任曲仲生。辖步兵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团。

（二）陆军第一军

领率机关位开封市，代号 8172 部队。军长徐文礼，政委聂济峰，副军长赵静生、王时军，副政委夏伟，参谋长阴允，政治部主任张光汉。^[1474]辖陆军第一师、第二师及第七师，直辖炮兵第一〇二团（8173 部队）。

该军军史称：1967 年 1 月后，军领率机关在开封、炮兵一〇二团在许昌等地区执行三支两军任务。该军军史还称：自 1967 年 2 月至 1968 年底，一军先后调动八个团、五个营、17 个连共 3.7 万余人，分别进驻河南、湖北、山西、河北、江苏等五省的 11 个地区、13 个市、21 个县的机关、学校、商店、厂矿、铁路部门，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以后又参与了各级革命委员会筹建工作，一部分干部还以军代表身份参加了“三结合”革命委员会。^[1475]而群众组织资料则称，一军在介入地方文革后，对开封造反派群众组织八二四革命造反委员会（开封八二四）进行了压制。在“二月黑风”中，开封八二四有 57 人被逮捕坐牢，103 人被打成反革命，600 多人被抓去劳改。^[1476]

【1472】刘建勋为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文革爆发后于 1966 年 9 月调华北局及北京市委工作，1967 年 8 月调回河南。张树芝、何运洪、王全国、王才贵、钟生溢，1955 年授衔少将。赵复兴、余嗣贵，1964 年晋升少将。刘大坤、陈桂昌、李善亭、杨树元、李文忠、东传钧，1965 年大校军衔。

【1473】彭辉，1965 年大校军衔。

【1474】聂济峰于 1966 年 10 月任中组部文革筹委会顾问，他的政委一职虽未变动，实际已脱离一军工作。徐文礼、聂济峰，1964 年晋升少将。赵静生、王时军、阴允、张光汉，1965 年大校军衔。

【1475】陆军第一集团军军史编审委员会：《陆军第一集团军军史》，第一部历史卷，第一军分册（B），2006 年。

【1476】开封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千锤百炼对毛主席的赤胆忠心》。《八二四评论》第 37 期。

陆军第一师，师部位安阳市，代号 8300 部队。师长侯润陶，政委刘玉年^{【1477】}，副师长张霖、张国发，副政委娄殿英，参谋长缺，政治部主任王保振。辖步兵第一团（8301 部队）、第二团（8302 部队）、第三团（8303 部队）、炮兵第三〇一团（8304 部队）和坦克自行火炮第二〇六团（8180 部队）。1967 年 2 月，一师师直、二团、炮兵三〇一团和坦克自行火炮二〇六团在安阳地区、一团在汤阴、鹤壁、滑县地区，三团在焦作地区执行三支两军任务。据第一集团军军史：1967 年 8 月初，二团奉命进驻郑州铁路局执行铁路扩路任务。1968 年 2 月初，河北磁县地区发生大规模武斗事件，三团奉命紧急赶赴该地制止武斗。2 月 17 日，奉军委命令，一师师部率一、三团相继赶赴山西长治地区，配合六十九军执行制止武斗，收缴武器，恢复秩序的任务。5 月 17 日，返回驻地。9 月 12 日，炮兵三〇一团奉命赴焦作矿务局执行军管任务。1969 年 7 月，晋南地区武斗又起，7 月 28 日至 12 月底，一师三个步兵团再度奉命开赴晋南临汾地区八县及重要厂矿企业，迅速完成了制止武斗任务。^{【1478】}

陆军第二师，师部位商丘市，代号 8181 部队。师长王健斌，政委刘保生，副师长李芝敬，副政委刘济舟、张佑臣，参谋长王作军，政治部主任马骥良。辖步兵第四团（8184 部队）、第五团（8185 部队）、第六团（8186 部队）、炮兵第三〇二团（8182 部队）和坦克自行火炮第二〇七团（8187 部队）。据第一集团军军史：1967 年 2 月至 1969 年 2 月，二师四团先后派出 114 名干部、1,084 名战士分赴河南郑州、开封、商丘和湖北武汉、宜昌等地区，五团先后派出 146 名干部、1,215 战士分赴河南郑州、洛阳、开封、商丘和湖北武汉等地区，执行三支两军任务。1967 年 2 月至 1968 年 7 月，二师师直和六团、炮兵三〇二团、坦克自行火炮二〇七团分赴河南商丘、开封、确山等地区，执行三支两军任务。1968 年 1 月至 3 月，炮兵三〇二团 160 迫击炮营奉命担负了民权至于城和商丘至郑州铁路护路任务。1969 年 2 月上旬至 4 月中旬，五团奉军委“二六命令”，紧急赶赴江苏徐州执行三支两军任务。^{【1479】}

陆军第七师，师部位信阳县明港镇，代号 6090 部队。师长孙锡成，政委赵文星，副师长刘现君，副政委孟令芳，参谋长张文彪，政治部主任耿万恒。辖步兵第十九团（6091 部队）、第二十团（6092 部队）、第二十一团（6093 部队）、炮兵第三〇三团（8189 部队）和坦克自行火炮第二一二团（8190 部队）。1967 年 2 月，

【1477】刘玉年，1965 年大校军衔。

【1478】《陆军第一集团军军史》，第一部历史卷，第一军分册（B）。

【1479】《陆军第一集团军军史》，第一部历史卷，第一军分册（B）。

七师师直、炮兵三〇三团、坦克自行火炮二一二团在信阳地区，十九团和二十一团一、三营在郑州地区，二十团和二十一团二营在湖北武汉地区，执行三支两军任务。7月中旬，部队奉命全部撤回。据《信阳地区志》：1967年2月，七师曾宣布豫南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信阳地区工人造反联合会为非法组织。6月，给原定为非法的群众组织平反。据第一集团军军史：1967年8月，二十一团奉命赴开封地区、炮兵三〇三团赴郑州和信阳地区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师直担负信阳至安阳铁路护送任务。12月，二十团（欠三营）奉命赴武汉地区执行三支两军任务。1968年3月，七师师部和十九团、二十一团赴湖北黄冈地区执行三支两军任务。6月28日，二十一团和二十团三营赴武汉地区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以后，将二十一团陆续调赴黄冈，加强该地区力量。至9月，该师先后派出两个团又一个营兵力，加上师直共50个连队，分别在黄冈地区九个县、67个区镇、1,540个点上执行三支两军任务。1969年3月，该师奉命撤回黄冈地区大批部队，返回沉湖农场执行围湖造田任务。^[1480]

（三）武汉军区直属部队

1. 炮兵第二师

师部位确山县，代号8212部队。1966年12月划归武汉军区炮兵建制。师长杜恒荣（1967年8月蔡铎），政委李中顺（1967年8月李江），副师长蔡铎、宋保芝，副政委李江（1967年8月张亚民），参谋长蔡铎兼，政治部主任张亚民（1967年8月麦汝强）。辖炮兵第二十八团、第二十九团、第三十团、第五十一团。

2. 炮兵第六十三师

师部位巩县，代号8250部队。1966年12月划归武汉军区炮兵建制。师长范振声，政委杜河堤，副师长张锡璞，副政委缺，参谋长牛志寿，政治部主任王建国。辖炮兵第六〇七团、第六〇九团、第六二七团、第六二八团。该师在豫西地区支持造反派，被誉为“支左红旗”，成为1968年武汉军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先进集体代表。1968年2月18日，军委电复武汉军区，同意炮兵第六十三师接替工程兵建筑第五十三师担任郑州警备区任务，该师于3月20日至30日分批从洛阳、三门峡地区进驻郑州。据有关军史材料称，“1967年二、三月间，高炮六十三师奉命成立‘支左办公室’，先后派出62个宣传队、1,052人，到河南省的巩县、荥阳、上街、三门峡、渑池一带的学校、公社、工矿等基层单位参加‘三支两军’；5月，该师数十名干部战士组成洛阳铁路分局军管会担

【1480】信阳地区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信阳地区志》，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页99-100；《陆军第一集团军军史》，第一部历史卷，第一军分册（B）。

任军管任务；6月，六二七团一个营由滏池进驻洛阳铁路分局；8月19日，师部率六二八团进驻洛阳市，六〇七团移驻巩县。由高炮六十三师负责与洛阳各驻军联合成立支左办公室，统一领导洛阳市的‘三支两军’工作。全师先后派出干部战士1,250名，组成127个宣传队，分别到洛阳、三门峡和郑州市等地参加‘三支两军’。1970年2月，该师参加‘三支两军’的人员撤离归建。”^[1481]

3. 工程兵建筑第五十三师

代号8210部队。1966年2月2日，军委电令，该师调归武汉军区建制领导，2月底前到达武汉军区，担任该军区设防任务。师长王辉，政委王乃力。1967年1月后，该师率所属工程兵建筑第一〇六团、第一一一团、第一二八团开赴河南平顶山、襄城、新郑、禹州、新密、荥阳等地，部队抽调部分干部战士参加三支两军工作。1967年8月4日，军委电令，决定调该师师部及工程兵建筑第一〇六团（8196部队），于8月10日前进驻郑州市，师部兼郑州警备司令部。陈桂昌任郑州警备区司令员，王辉任副司令员。1968年2月13日，军委电令调该师于5月10日前到达内蒙集宁地区。

（四）空军驻豫部队

1. 空降兵第四十三师

师部位开封市，代号7249部队。归空降兵第十五军建制。师长靳钟^[1482]，政委王敬春，副师长王佑民、程德明，副政委李维考，参谋长苗振华，政治部主任盛锡侯。辖空降兵第一二七团（7355部队）、第一二八团（7356部队）。1967年2月后，师成立了支左办公室，先后派出2,268名干部战士（除一二七团担任战备值班任务外），参加了北京、郑州、武汉、开封等地的三支两军工作。

2. 空军第十三师

师部驻空军郑州基地，代号7113部队。师长王洪智，政委刘德锐，副师长阎满栋、王捷程、刘洪德，副政委张宗鲁，参谋长王捷程兼，政治部主任焦怀仁。辖空军第三十七团、第三十八团、第三十九团。1967年10月21日起，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先后派出3,073人次到驻地郑州、开封和宜昌、沙市、当阳等市县的127个单位执行三支两军任务。1968年9月，师部移驻湖北当阳基地。

此外，空军驻豫部队还有空军第十九师（7320部队），师部驻空军新乡基地（3653部队）；空军第二十三师（7293部队），师部驻空军李新店基地（3650部队）。

【1481】中国共产党陆军第五十四集团军委员会：《无敌的铁拳——陆军第五十四集团军军史》，1991年，页363。

【1482】靳钟，1965年空军大校军衔。。

河南驻军分布图(1967-1968)



二、河南省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1967年1月17日, 郑州大学等六所大学造反派组成炮轰省委联络站, 进驻省委办公大楼, 同省委机关造反派结合起来搜集省委领导人的材料。18日, 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候补书记纪登奎、戴苏理被红卫兵看管。21日, 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开会决定, 六所院校造反派接管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1483]河南虽从未有组织宣布全省性的夺权, 惟省委、省人委实际上已处于半瘫痪状态。

1月30日, 河南省军区和驻豫部队组织武装游行, 正式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河南的情况, 如文敏生所言: “河南郑州市各大专院校, 无产阶级革命派原早已取得绝对优势, 但自元月中旬起即开始分裂为两大派, 在元月三十日河南省军区和人民解放军驻郑部队举行了游行之后, 斗争即转移为以军区为中心展开了, 一派支持军区, 军区和另一派则处于对立, 斗争十分尖锐。工人、农民、机关干部也参加了。不仅郑州市如此, 据说开封等地也有类似情形。”^[1484]

【1483】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河南省志·大事记》,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年, 页439。

【1484】文敏生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信, 1967年2月10日。一丁:试析河南省文革的几个特点,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1025/22/5333264012396.shtml>, 最后访问:

河南省军区介入地方文革后，支持清华大学井冈山驻郑联络站、河南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河造总），把郑大联委、开封八二四等造反派组织视为“非法”组织。

2月4日，郑州大学、河南医学院、河南农学院、郑州粮食学院和省直机关等十几个造反派群众组织到河南省军区大院静坐，要求省军区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2月7日，郑大联委、河医东方红、粮院联委、河南农学院红卫兵总部（豫农红总）等河南全省74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河南二七公社。北京和全国许多著名造反派组织发表声明，表态支持郑大联委和河南二七公社。同日，河南省军区针对外地军事院校学生和郑州部分群众组织冲击省军区和在《河南日报》社夺权的行动，发表《严正声明》。^{【1485】}

2月10日，由河南二七公社控制的《河南日报》发表《向河南省军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挑战》和《二十八个为什么——当前河南文化大革命值得深思的问题》两文，对河南省军区进行反击。2月17日，河南造总组织上万人冲击河南二七公社控制的河南日报社，引发武斗。下午五点三十分周恩来指示河南省军区：迅速派部队让武斗的双方立即隔离；对河南日报社进行军事接管；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代表包括河南省军区、中共河南省委、武斗的双方，以及其他“革命组织”的代表。由何运洪出面召集有关各方拟定名单，上报中央，在中央批准后再来北京。^{【1486】}

3月6日，河南省军区和河造总召开有十五万人参加的“省会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何运洪在会上讲话，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必须立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动”，“‘郑大联委’中的一小撮头头，必须向河南人民低头认罪，必须交待他们的幕后策划人”。^{【1487】}会后，河南省军区用飞机在全省散发了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的《告全省人民书》。《告全省人民书》使郑州两派组织之间的对立日趋尖锐化。其后，郑大联委负责人党言川、开封师院八二四负责人陈红兵、郑州国棉六厂工人赤卫队负责人申茂功相继被捕。郑大联委及全省二七派遭到镇压。

2015年1月20日。

【1485】《河南省志·大事记》，页440。晨蓝新光：各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纪事，第十二章河南省，<http://blog.163.com/shg0515@126/blog/static/325013722012829113843362/>，最后访问：2015年1月20日。

【1486】晨蓝新光：各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纪事，第十二章河南省。

【1487】河南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河造总）：河南省省会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大会特刊》，1967年3月7日。

4月23日，毛泽东关于将河南两派领导人调来北京商谈解决问题等的批语称：“林彪、恩来同志：河南问题争得厉害，请商陈再道、钟汉华、刘建勋诸同志，是否将两派领导人调来谈一次，省军区只保一个赵文甫，将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戴苏理、杨蔚屏都不要，这种看法是否适当，值得研究。又湖北问题也很大，几乎省委大都是坏人，也应快点研究为宜。”^{【1488】}4月26日，周恩来总理办公室通知河南二七公社和河造总两派各派代表及河南省委领导干部四人，赴北京汇报河南问题。赴京汇报前夕，省军区撤销了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的决定。^{【1489】}

从5月29日至7月30日，中央、中央文革和军委负责人八次听取了河南地方领导干部、省军区和两派群众组织代表的汇报。在此期间，中央、中央文革和军委负责人还多次接见了河南省军区、陆军第一军和河南其他驻军负责人，并作出指示。

5月29日晚至30日凌晨，中央负责人第一次接见河南赴京汇报代表团时，周恩来在听取汇报后称：“郑州武斗很盛，军区可以制止，劝解一下就打不起来了，何运洪负责，你要打电话。军事院校赴豫调查团的人牺牲了两个，二百五十人在开封被扣，一军要马上放，北京尚有学生与军区对立，可以劝说。马上放，给自由，不要把事情看得太严重了。”^{【1490】}

6月4日，中央负责人接见河南省军区和一军首长时，周恩来称，“河南武斗是你们压二七公社的结果，主席说过福建、河南的问题就是对群众的态度问题。我们开门见山地说，主席二月有个批件，就是批河南问题的。当时冲军区，主席说这是对你的信任的表示。省委瘫痪了，群众找你们是信任你们，相信你们不会开枪，他真要冲，让他冲进去，住够了就好了。郑州围报馆，主席说让他暴露几天，不要接管。以后我们叫你们来谈判，你们说只有一派了。我们讲只有一派了还有啥谈的，就没有谈的了嘛！但是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左、中、右总是存在的。以后你们抓人，宣布非法组织，把他们压下去，压力越大，反抗力越强，物极必反嘛！你压了他，他就要闹。”^{【1491】}

【148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316。毛泽东这个批语，是看了中共河南省军区委员会4月23日关于河南各造反派组织准备近日派四千余名代表进京反映问题的报告后写的。赵文甫、杨蔚屏，原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1489】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河南党史大事记》下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190。该书同页还称：4月16日，省军区在郑州再次召开群众大会，重申“郑大联委”是非法组织。

【1490】《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央首长关于河南问题的指示及赴京汇报纪要汇编》，页3-6。

【1491】《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央首长关于河南问题的指示及赴京汇报纪要汇编》，页101。

6月10日，萧华、杨成武、关锋、戚本禹接见河南省军区和一军首长时，杨成武称，“你们要学山东。山东省军区、六十七军都转过来了。开始，大军区还转不过来。你们要学习山东的经验。那天，总理、康老讲了，你们犯了路线错误，和刘邓的不一样，你们要正确认识问题。”^[1492]

6月27日，河南省军区党委作出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报告中称：

我们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大方向就错了。我们对省委领导成员的情况未作全面系统的了解和阶级分析，没有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错误地把刘建勋、纪登奎同志当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将他们所支持的革命造反派组织看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御用工具”，把革命造反派组织二七公社，看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因此，我们在二月份先后错误地发表了《严正声明》和《告全省人民书》，把斗争矛头指向了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而没有对准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二月十七日河南日报社事件，主席、中央指示我们组织双方代表赴京汇报，这对解决河南问题、纠正我们的错误，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我们错误地理解了中央的指示，而对郑大联委与河南二七公社采取了压垮和拖垮的政策，限制他们的代表名额，不想赴京汇报，这实际上是无视主席、中央的指示，与主席思想是对立的。^[1493]

7月4日，中央负责人第五次接见河南赴京汇报代表团时，何运洪检讨称，“军区支左一开始，大方向错了，没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颠倒了敌我关系，错误地把革命领导干部刘建勋、纪登奎同志当成了打倒对象。把郑大联委看成‘御用工具’，错误地把二七公社看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因此，二月份连续把斗争矛头指向领导干部、革命群众，没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徐文礼检讨称，“我沉重地检讨，对八二四革命造反委员会所犯的错误的性质是路线性的，错误地提出了口号：打倒八二四幕后幕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二八’事件看得太严重了，军队开了五枪，还有三枪没查出来，打死一人尚未查清。总之开枪的性质是严重的。一共抓了294人，到现在还有15人未放。三月十四日赵静生同志在师院宣布‘八二四’为反动组织是

【1492】《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央首长关于河南问题的指示及赴京汇报纪要汇编》，页104。

【1493】《河南省军区党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1967年6月27日。中发[67]216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1967年7月11日发出。

非常错误的，在这里我向毛主席承认错误，向‘八二四’承认错误，赔礼道歉。对首都红代会，军事院校赴汴同学，四、五月份发生了很多错误作法，我们负有很大的责任。”^[1494]

7月10日，中共中央对河南省军区党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作出批示称，“河南省军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农、支工工作中，作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支左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造成了部队同群众、群众同群众之间的对立。这个错误主要应由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同志负责。这次，河南省军区党委所作的关于支左错误的检查比较好。我们相信，在省军区作了认真检查以后，广大革命群众是会拥护解放军，会欢迎并支持军区改正错误的。”“河南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书记处书记赵文甫。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同志，过去在河南的工作中虽然犯有某些严重错误，但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认真地作了检查，回到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是革命的领导干部。中央决定着手成立以刘建勋同志为首的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参加的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1495]

7月12日，周恩来、戚本禹接见河南省军区、一军和河南驻军赴京汇报的负责人。周恩来称，“省军区党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还不错，中央转发了！各方群众组织达成的协议，中央也转发了。这对军分区、县市人武部认识错误，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上来有好处。……河南省要成立以刘建勋为代表的有革命群众代表、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的筹备小组，领导河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看了你们的检查报告，这是很好的，我们欢迎你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本来主席和林副主席已经看了，批了还是叫你们先学习一下，把思想搞通。”^[1496]

7月25日凌晨，周恩来、康生等在京西宾馆接见河南省军区、军分区和河南驻军在京领导干部时，周恩来称，“山东、山西、河南、浙江、江西、湖南、福建等军区都来人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武汉，震动全国。……河南二七公社平反了，很快就影响到武汉工总，我在武汉讲了四点，又讲了八点，四点、八点都是我讲

【1494】《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央首长关于河南问题的指示及赴京汇报纪要汇编》，页29-30。

【1495】《中共中央对〈河南省军区党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的批示》，1967年7月10日。中发[67]216号中共中央文件。

【1496】《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央首长关于河南问题的指示及赴京汇报纪要汇编》，页110-111。

的，我走了，事情就发生了，他们把‘罪名’加在王力同志身上，这完全是预谋的，矛头完全指向中央，这不是简单的事件。”^[1497]

7月30日晚至31日凌晨，在中央负责人第八次接见河南各方面赴京汇报代表团时，康生称：“河南军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农、支工工作中，作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支左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造成了部队同群众、群众同群众之间的对立。这个错误主要应由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同志负责。因此，中央除了派刘建勋同志回去以外，军区干部要加以改组，这一点同志们放心好了（二七战士高呼口号），中央已经决定调王新同志去帮助刘建勋同志作军区工作。有的同志问何运洪怎么样？同志们，我可以告诉你们，何运洪没有资格领导文化大革命。因此，中央决定着成立以刘建勋同志为首的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参加的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1498]

三、从省军区、一军领导成员调整到省革委会成立

8月1日，中央、军委决定调整河南省军区领导成员。刘建勋仍任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张树芝仍任司令员。免去何运洪的第二政委职务。^[1499]任命原空降兵第十五军政委王新为第二政委，副司令员陈桂昌为第一副司令员，工程兵建筑第五十三师师长王辉为副司令员，炮兵第六十三师政委杜河堤、炮兵第二师政委李中顺为副政委。原第三政委王全国以下各人均留职。

同月，陆军第一军领导成员亦作出调整。武汉军区步兵学校校长杨力勇调任军政委，炮兵第二师师长杜恒荣调任副军长。11月，空降兵第四十三师政委王敬春调任军副政委。原军长徐文礼以下各人均留职。

8月2日，中央批准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刘建勋任组长，王新、纪登奎任副组长。

【1497】《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央首长关于河南问题的指示及赴京汇报纪要汇编》，页113。

【1498】《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央首长关于河南问题的指示及赴京汇报纪要汇编》，页65-66。

【1499】何运洪三年后于1970年至1976年任武汉军区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1974年2月起任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78年5月至1983年5月任武汉军区顾问。1988年离休，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享受副大军区职待遇。

8月21日，省军区机关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批判何运洪、李善亭、余嗣贵等人。刘建勋在会上宣布：已请示中央，批准省军区进行“四大”，组织班子专门肃清何运洪的流毒。^{【1500】}

9月8日，总参电复武汉军区，同意由陆军第一军兼开封警备区司令部。杜恒荣兼警备区司令员，原开封地委第一书记张申兼政委。

9月21日下午，毛泽东乘专列巡视各地途中到达郑州。22日上午，毛在专列上接见了刘建勋、王新和纪登奎。据刘建勋传达毛接见他们时称：

主席见到纪登奎同志时说：“你是纪登奎，老朋友了。”我说：他被关了四个月，挨了四个月的斗争。这时主席笑了，说：“你说一点好处都没有吗？”纪登奎同志说：大有好处。主席说：“那是文敏生、赵文甫、何运洪他们搞的。”又说：“我上次路过郑州时，看到一张大标语：大局已定，二七必胜。河南形势很好么！”

当我们汇报到河南各级都站出来一些革命干部时，主席说：“这是何运洪干的好事，何运洪那么厉害呀！”

当汇报到调武装干部到北京集训时，主席说：“集训也要去好人。”

当汇报到开封的情况时，主席说：“不讲‘俘虏政策’不好，要给八二四做工作，我赞成你们的意见。”

当汇报到少数人不大讲政策，随便开枪、有时还打死人时，主席说：“群众起来议论，不赞成他们。群众起来都反对，就收场了。”主席又说：“抓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搞不久，现在已经不那么响了。他们不拥军，一拥军就没有对象了。”王新同志说：主要在理论上把他们的错误理论，思想批倒。主席说：“对。”^{【1501】}

1968年1月18日，刘建勋、王新向中央报送关于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1月25日，中央批示称，“中央同意刘建勋、王新同志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八日关于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驻河南地区的人民解放军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广大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坚决执行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及时克服了省军区个别领导人的错误，加强了团结，坚决执行毛主席指示的支左不支派的原则，为河南省文化大革命运动，建立了很大的成绩。”批示还称，“中央同意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由

【1500】《中共河南党史大事记》下编，页193。

【1501】刘建勋同志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1967年9月26日下午4时。开封八·二四地专革命造反总部：《地专战报特刊》，1967年9月27日。

一百五十五名委员组成，由刘建勋同志担任主任，王新、纪登奎、耿起昌、杨力勇同志以及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一至二人担任副主任。”^{【1502】}

中央批准的省革委会常委共41名。其中军队代表八名：王新、杨力勇、张树芝、陈桂昌、王辉、杜河堤、李中顺、王洪智。革命领导干部十名：刘建勋、纪登奎、耿起昌、王庭栋（原河南省委委员）、张申（原开封地委第一书记）、王维群（原河南省委候补书记、副省长）、王黎之（原郑州市委第一书记）、张耀东（原河南省委副秘书长）、张钦礼（原兰考县委副书记）、戴苏理（原河南省委候补书记）。十人中除戴苏理支持河造总外，其余均支持二七公社。常委中的群众组织代表，二七公社派亦占了绝对优势。1月27日，河南省革委会正式宣告成立。

河南是由非现役军人任第一把手的少数省、市之一。1968年10月，杨力勇调任武汉军区工程兵政委离开河南。“九一三事件”后，王新受牵连于1972年11月被隔离审查。河南省的党政大权，实际掌握在以刘建勋为首的地方干部手中，直至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

1967年12月至1968年5月，河南全省10个地区、3个省辖市、1个特区的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各地市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如下：新乡地区革委会由耿起昌任主任；驻马店地区革委会由原安阳地委第二书记王大海任主任；开封地区革委会由张申任主任；开封市革委会由陆军第一军副参谋长何俊德任主任；洛阳地区革委会由原洛阳地委副书记关廷秀任主任；商丘地区革委会由原商丘地委第一书记张学清任主任；郑州市革委会由王辉任主任；洛阳市革委会由原河南省委工交政治部主任王甲军任主任；信阳地区革委会由信阳军分区副政委王子平任主任；平顶山市（1968年3月平顶山特区改称）革委会由炮兵第二师副师长宋保芝任主任；安阳地区革委会由原河南省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董连池任主任；许昌地区革委会由原许昌专署专员王延太任主任；周口地区革委会由原周口地委第一书记董万里任主任；南阳地区革委会由原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张成国任主任。上述地市革委会，由地方领导干部担任第一把手的占70%，这种情况，在全国亦为少见。

第六十四节 河北：驻军三支两军述略

一、野战军数量为全国之最

1967年1月23日一天之内，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委，中共保定地委、保定专署，中共保定市委、保定市人委等在省会保定的三级党政领导机关全部被

【1502】《中央关于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1968年1月25日。中发[68]17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1968年1月27日发出。耿起昌，原新乡地委第一书记。

夺权。此后几天内，全省其余9个专区（邯郸、邢台、石家庄、张家口、承德、天津、唐山、沧州、衡水）地、市机关全部被夺权。同月，根据中央《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河北驻军奉命在全省各地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1503】}

次月陆军第六十九军调离保定地区后，河北省内驻军军以上单位（未计院校）计有：领率机关驻唐山市的二十四军、驻石家庄市的六十三军、驻张家口市的六十五军，领率机关同驻保定市的三十八军和河北省军区，共5个，^{【1504】}野战军数量为全国之最。三支两军分工范围大略为：二十四军负责唐山地区（包括唐山市、秦皇岛市），六十三军负责石家庄地区（包括石家庄市），六十五军负责张家口地区（包括张家口市），三十八军和河北省军区共同负责保定地区（包括保定市），炮兵第十四师负责邯郸地区（包括邯郸市），其余邢台地区（包括邢台市）、承德地区（包括承德市）、天津地区、沧州地区（包括沧州市）、衡水地区，由省军区所属各军分区负责。

河北省军区辖邯郸、邢台、石家庄、保定、张家口、承德、天津、唐山、沧州、衡水10个军分区，并辖独立第一师、独立第二师2个独立师。军区司令员马辉，政委曾美，副司令员方之中、杨有山、王茂全、袁捷，副政委卢克、李致远、杨明山、郑旭煜、萧靖甫，参谋长尚素子，政治部主任谷奇峰。^{【1505】}

1967年8月30日，北京军区副参谋长成少甫^{【1506】}在北京军区干部会议上，介绍河北的支左情况，从北京军区的角度，对河北驻军支左工作作出评价称：

河北地区总的支左情况是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主流是好的。但是也犯了一些缺点和错误，这些缺点和错误是支流，是局部性的，现在就来具体谈谈。

.....

承德地区：军分区支持保守派，五月份军区支左干部在承德扭转了军分区的错误，军分区在扭，但扭得很慢，错误改正的吞吞吐吐。目前承德地区保守势力还很大，工作还是比较困难的。

【1503】中共河北省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河北历史大事记（1949.7-1978.12）》，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页396。

【1504】未计领率机关驻天津市而所辖一九六师驻河北武清县的六十六军。

【1505】马辉、曾美、方之中、卢克、李致远，1955年授衔少将。郑旭煜，1961年晋升少将。杨有山、王茂全、杨明山，1964年晋升少将。袁捷、尚素子、萧靖甫、谷奇峰，1965年大校军衔。

【1506】成少甫，1955年授衔少将。

唐秦地区：基本上支持了保守派，压制打击了造反派，有问题，由他们自己解决，当地驻军轻者是支持一派，压制一派，重者是支持了保守派，压制打击了造反派，我们（北京军区）同他们的斗争是最长的，终究要纠正他们的错误。

天津地区：主流是好的，方向是对的，形势是好的。五代会要改组。

沧州地区：一月夺权大方向是正确的，夺权后压制了革命造反派。

衡水地区：军分区支错了，军区支左干部下去后扭转了军分区的错误，军区干部支对了。

张家口地区：情况很复杂，六十五军由于接待红卫兵和调出干部搞军训，因此人力不足，再加上六十五军和当地三个军事院校关系搞的不好，所以张家口地区需要一到二个月才能调查清楚。

宣化地区：抓七个人是错误的，有五个人根本都不应该抓，抓错了。有二个人有问题，现在看来抓也是不对的，对宣化初步认识是支持了一派压制了一派。

保定地区：最近司法机关^{【1507】}对三十八军有些议论，我现在讲一讲：三十八军4800部队支左主流是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这个部队干劲足，革命性强，旗帜鲜明，没有框框。有错误缺点是支流。我今天讲完之后，希望大家不要再议论了。当然大家也可以保留自己的看法嘛。

石家庄地区：石家庄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主流是好的，但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这是支流。

邢台地区：主要是对的，有严重错误，大部分对了，部分支错了。

邯峰地区：有三派各支一方，我们军区还未表态。

我们军区在二月份取缔的保定八一、邢台的野战军、邯郸的红战师这三个群众组织，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军区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军区党委已经决定予以平反，并准备作检查，有的军区负领导责任。张宣地区我们发现问题比较早，但解决得不够及时，在解决上是有错误。^{【1508】}

省内驻军在各地区支左大略情形分述如下。

【1507】原文如此。“司法”两字似为衍字，又或为“军区机关”。

【1508】清华井冈山一部第三动态组编《动态》第141期，1967年9月5日。

京、津、冀驻军分布图(1967-1968)



二、石家庄地区

1967年2月，石家庄地区驻军主要为陆军第六十三军。另驻有北京军区步兵学校(京字320部队)、北京军区后勤部第七分部(京字801部队)、铁道兵学院(总字501部队)及空军第四航空学校(空字019部队)。

陆军第六十三军领率机关位石家庄市，代号4587部队。辖陆军第一八七师、第一八八师，直辖炮兵第一七〇团(4589部队)。军长张英辉，政委蔡长元，副军长何凤山、徐信、曹步墀、阎同茂，副政委杨子安、刘炎田，参谋长曹步墀兼，政治部主任刘炎田兼。^{【1509】}

【1509】张英辉、蔡长元，1955年授衔少将。徐信，1964年晋升少将。何凤山、杨子安、曹步墀、刘炎田，1965年大校军衔。

陆军第一八七师，师部位邢台市，代号 4593 部队。师长崔凤歧，政委吴寿安，副师长余洪信、刘秀英，副政委曲凤图，参谋长杨宝祥，政治部主任杨书兴。辖步兵第五五九团（4594 部队）、第五六〇团（4595 部队）、第五六一团（4596 部队）、炮兵第五六七团（4597 部队）和坦克自行火炮第三九二团。

陆军第一八八师，师部位获鹿县，^[1510]代号 4602 部队。师长王根成，政委田荫东，副师长张沛然、罗金友，副政委宋双来，参谋长史其昌，政治部主任李立。辖步兵第五六二团（4603 部队）、第五六三团（4605 部队）、第五六四团（4606 部队）、炮兵第五六八团（4607 部队）和坦克自行火炮第三九三团（4608 部队）。

1967 年 6 月，炮兵第六十一师移防石家庄地区，隶属北京军区炮兵建制领导，师部位石家庄市，代号 4733 部队。师长王庆华，政委谢特山，^[1511]副师长周青，副政委樊树德，参谋长苗永清，政治部主任田益国。辖炮兵第六〇一团、第六〇二团、第六〇三团和第六二九团。

1967 年 12 月，北京军区工程兵第六工区（京字 417 部队）划归第六十三军代管。工区主任董儒强，政委陆国桢，参谋长王一克。辖工程兵建筑第一六三团、第一六四团、第一六五团和第一六六团。

六十三军军史称：1967 年 1 月，“我军首批抽调一千七百九十七名干部进驻石家庄、邢台两市的部分机关团体和学校，执行‘支左’任务。同时，……派出若干精干的‘支左’小组，进驻石家庄、邢台地区十八个县的公社和大队。二月下旬，又根据军委和军区指示精神，派出人员对驻地地、市、县的公、检、法机构和铁路部门实行军事管制。”3 月，“我军又派出四千余名干部战士进驻石家庄和邢台两地市的工商、邮电、交通、厂矿等企事业单位，执行‘支左’任务。……根据军区指示，我军除负责驻地的军训任务外，又抽调二千二百一十四名干部和战士骨干组成十一个军训团、四十七个营、二百二十二个连，进驻北京，负责西城区四十三所大中专院校的军训工作，……军训结束后，根据军区指示，抽调部分干部战士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院校和‘光明日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社等单位执行军宣队任务。……至此，我军先后参加‘三支两军’的人员已达一万零八百五十六人，主要执行石家庄、邢台两市一千零二十七个单位和两地区十八个县的农村‘三支两军’任务，参与了各级‘革命委员会’的筹建工作，一部分干部还以军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1512]

【1510】1966 年 5 月，一八八师师部从邯郸市移至该县原一八九师师部驻地。

【1511】王庆华、谢特山，1965 年大校军衔。

【1512】陆军第六十三集团军军史编研室：《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六十三集团军军史》，1992 年，页 437-438。

六十三军军史未能告诉读者的是：实际上，石家庄地区在1967年中形成了狂派（以狂人公社而得名，后改称鲁迅公社）与联指两大派对峙的局面。狂派被指为“反军派”，联指被视作“拥军派”。以六十三军为首的驻军倾向于联指派，压制狂派，同时受压制的还有与狂派同一立场的铁道兵学院革命造反兵团。

1967年10月27日凌晨，陈伯达、谢富治、郑维山在北京接见河北五个地区赴京汇报代表团时，对石家庄狂派（鲁迅公社）进行了严厉批评。陈伯达称：“鲁迅公社原来是狂派，是我给他们改的。……我现在再给鲁迅公社一个建议看赞成不赞成。我不赞成鲁迅公社再存在。……你们鲁迅公社是个大杂烩，你谁也不能对谁负责。是个跨行业的大杂烩，谁也不能对谁负责。建议你们这个组织解散。还有什么马路兵团，八五风暴，赤峰公社，这些都要不得，都要解散。……你们以石家庄狂派代表的结合是大杂烩的结合。河北各地区集合在你们这一边（指狂派），共同目标是反对军队，这个目标是错误的（谢副总理：反对三十八军也是错误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英雄的军队，反对其它军也是错误的。你们不要钻空子，你们两派都有这个企图。”^[1513]陈伯达、谢富治表态后，“狂派”受到压制，武斗平息，形成相对平静局面。

1967年11月20日，河北第一个地专级革委会——石家庄地区革委会成立，主任为六十三军副军长徐信。12月20日，石家庄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主任为六十三军副政委刘炎田。

1969年中苏关系紧张，中国加强了北线的设防。10月28日，根据毛泽东签发的军委关于部队移防的命令，陆军第六十三军由河北移防山西，接替北移的陆军第六十九军驻防区。12月15日，第六十三军全部进驻山西。^[1514]

1970年3月，原驻江苏地区并已于1969年8月调驻河北张家口、宣化地区的陆军第二十七军，奉命移防石家庄、邢台、邯郸地区。军部驻石家庄市，代号1591部队；所辖第七十九师驻邢台，代号1588部队；第八十师驻获鹿，代号1600部队；第八十一师早于1969年11月下旬已调防至邯郸地区，代号1585部队。到达新驻地后，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第二十七军抽调755名干部担负河北省直机关、红旗五七干校以及石家庄、邢台、邯郸三地的三支两军工作。该军军长尤太忠，1970年3月增补为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515]

【1513】唐山铁道学院红旗战斗队主办：《红旗》第45期，1967年11月1日。

【1514】《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六十三集团军军史》，页455。

【1515】陆军第二十七集团军军史编委会：《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二十七集团军军史》，1999年，页413、710-711。

三、张家口地区

1967年2月，张家口地区驻军主要为陆军第六十五军，另驻有解放军技术工程学院（总字793部队）、炮兵学院（总字160部队）及宣化通信兵学校（总字432部队）三所军事院校。

陆军第六十五军 领率机关位张家口市，代号4618部队。辖陆军第一九三师、第一九四师，代管工程兵第四工区，直辖炮兵第一七二团（4619部队）、高炮第九十团（4574部队）。军长符先辉，政委贺明，副军长杨森，副政委刘克宽，参谋长周衣冰，政治部主任张光。^{【1516】}

陆军第一九三师，师部位宣化县，代号4626部队。师长孙致厚，政委郭锁，副师长黄树英、刘庚寅，副政委缺，参谋长刘文星，政治部主任王维汉。辖步兵第五七七团（4627部队）、第五七八团（4628部队）、第五七九团（4629部队）、炮兵第五七三团（4630部队）和坦克自行火炮第三九八团（4631部队）。

陆军第一九四师，师部位怀安县，代号4645部队。师长吴茂生，政委赵葆华，副师长王守忠，副政委刘宗泽，参谋长张善交，政治部主任刘健身。辖步兵第五八〇团（4646部队）、第五八一团（4647部队）、第五八二团（4648部队）及炮兵第五七四团（4649部队）。

北京军区工程兵第四工区，代号京字415部队。工区主任刘长治，政委缺，副主任陈朝，副政委高秉哲、王俊海，参谋长韩仁勇，政治部主任陈桐林。辖工程兵建筑第一五六团、第一五七团及第一五八团。

六十五军军史称，1967年1月以后，“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我军先后派出一万一千多人。组成一百一十多个宣传队，到张家口地区四十个县、市和山西省两个县参加‘三支两军’，以后又参与了各级‘革命委员会’的筹建工作。一部分干部还以军队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一九六七年二月至年底，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我军奉命派出两千五百多名干部、战士，开赴北京东城区，对五十一所大中学校执行军训任务。军训结束后，根据上级指示，抽调五七九团二、三营、五七八团二营及军机关部分干部，到国务院文化部及其所属十所大专院校、十个协会、三个电影制片厂等八十余个单位执行‘军宣队’任务。同年五月，我军五七八团（欠一个营）和五七九团一个营奉命到内蒙呼和浩特市进行‘支左’。”^{【1517】}

【1516】符先辉，1961年晋升少将。贺明、杨森，1964年晋升少将。刘克宽，1965年大校军衔。

【1517】《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六十五军军史》，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页361-362。

1967年2月，六十五军对张宣地区军内外造反派进行了压制，与张宣地区革司一派及炮兵学院革命造反联合兵团、技术工程学院红色造反联络总站、宣化通信兵学院红色造反兵团形成对立。

1967年7月23日，在声援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示威游行中，市联总和革司两派发生武斗，持续近半月之久。最后经支左部队出面调解，两派与8月5日脱离接触，武斗逐渐平息。8月，联总和革司分别各派代表15人，在北京进行谈判，持续两个月之久，达成停止武斗，实现大联合的协议。

1967年12月14日，张家口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主任为六十五军政委贺明。1968年1月20日，张家口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主任为一九四师副政委刘宗泽。

四、唐山地区

1967年3月后，唐山地区的三支两军，由陆军第二十四军，炮兵第五师、第六十八师，唐山军分区，海军后勤部秦皇岛办事处等共同负责。其任务区分为：唐山市以二十四军领率机关为主，军分区、炮兵第六十八师、陆军第七十二师参加；秦皇岛市由陆军第一九七师、海后办事处负责；七十二师负责滦县、柏各庄农垦区；炮兵第五师负责昌黎和丰南县；其余各县以人武部为主。

陆军第二十四军领率机关位唐山市，兼唐秦警备区，代号4555部队。辖陆军第七十二师、第一九七师，代管工程兵第三工区，直辖炮兵第一二七团、高炮第四十九团。军长陈仁洪，政委廖鼎琳，副军长康银寿、万海峰，副政委李怀德，参谋长刘长仁，政治部主任朱松岭。^{【1518】}

陆军第七十二师，师部位唐山市东矿区赵各庄，代号4582部队。师长唐述棣^{【1519】}，政委汪曙东，副师长谭竟成，副政委尤学仁，参谋长高翔，政治部主任李习。辖步兵第二一四团、第二一五团、第二一六团及炮兵第三五一团。

陆军第一九七师，师部位秦皇岛市，代号4610部队。师长罗云章^{【1520】}，政委马信，副师长王嘉祥，参谋长姚宝钱，政治部主任尹修柏。辖步兵第五八九团、第五九〇团、第五九一团及炮兵第五七七团。

北京军区工程兵第三工区，代号京字414部队。工区主任李甲盛，政委叶初晓，副主任张宏献、赵义金，副政委李元文、朱敏仁，参谋长孔庆林，政治部主

【1518】 陈仁洪、廖鼎琳，1955年授衔少将。康银寿、万海峰、李怀德、刘长仁、朱松岭，1965年大校军衔。

【1519】 唐述棣，1965年大校军衔。

【1520】 罗云章，1965年大校军衔。

任陈如尧。辖工程兵建筑第一五三团、第一五四团及第一五五团。工区机关及三个团均驻唐山地区。

炮兵第五师，师部位昌黎县，代号4672部队。师长萧剑平，政委赵江，副师长高文义，副政委李同贺，参谋长刘通启，政治部主任王玉舟。辖炮兵第三十四团、第三十五团、第五十团及第二〇六团。

炮兵第六十八师，师部位唐山市。师长范文斌，政委过晓秋，副师长潘忠，副政委高云清，参谋长问程寿，政治部主任龚杰。辖炮兵第六三三团、第六三四团及第六三五团。1968年2月，该师入越参加抗美援朝战争，隶属广州军区领导，1969年2月归建。

1967年1月23日，唐山矿冶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唐山革命职工红色造反兵团和地市机关造反派夺了唐山地委、专署和唐山市委、市人委的权(后称“一二三夺权”)。1月26日，驻唐部队开始介入唐山地区文革。2月23日，唐秦警备区发表声明(后称“二二三声明”)，首次表态反对“一二三夺权”。3月29日，在驻军支持下，成立“夺权筹备委员会”。尔后，相继又成立了唐山市红代会、农代会、工代会，三者合称“三代会”。6月3日，与三代会对立的“矿派”学生在唐山矿冶学院成立了唐山市革命造反红代会。6月10日，矿派以八中教师郭跃东被另一派殴打重伤致死为由，在唐秦警备区门前静坐绝食，持续五十余天，后称“六一〇事件”。6月18日，洼里公社夏庄大队发生大规模武斗，参加者达二千多人，一人被打死，一人致残，93人受伤，后称“六一八武斗”。7月30日，两派在市区新华路发生大规模武斗，持续两天，造成死亡四人、重伤129人、轻伤1,460人，通称“七三〇事件”。此后，开滦唐山矿、机车车辆厂等单位继续发生武斗，造成一些伤亡。^{【1521】}

1967年10月28日，郑维山等北京军区负责人在北京接见唐秦地区双方赴京代表团时，态度明显偏于唐山驻军尤其是二十四军。郑维山称，“我知道二十四军有个检查，是高一点还是低一点？有的说高了，有的说低了，我看差不多，各地都是这个情况。究竟是高还是低，是给一百分，一百二十分，还是八十分，七十分？没有这个必要。”郑维山又称：“二十四军的检查，你们有什么意见可以和二十四军的同志坐下来谈。检查一个是要高姿态，一个是要实事求是，不高姿态，不实事求是，羞羞答答，这个不好。我反对。但你们无限上纲，我也不同意。大家都

【1521】参见唐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唐山市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年。

要从大局出发。当前最大的问题是有人要把军队搞得灰溜溜的，有什么好处，现在地方党政机关垮了，你把军队搞垮，文化大革命不搞了？”^{【1522】}

1968年1月6日，唐山地、市革命委员会同时宣告成立。地区革委会主任为二十四军副政委李怀德，市革委会主任为二十四军政治部主任朱松岭。1月16日，秦皇岛市革委会成立，主任为一九七师参谋长姚宝钱。

1968年2月7日，唐山市革委会按照陈伯达1967年12月25日在唐山的表态，^{【1523】}正式建立“冀东专案组”，专案人员由20多人扩大到280多人。被列入“冀东专案”审查的干部共1,604人，涉及到中央29个部门和24个省、市，其中被定为叛徒、特务、国民党、走资派等罪名737人；被审查的地下党员662人，被定为和列为叛徒、特务、国民党、三青团等罪名的282人。^{【1524】}

五、邯郸地区

1967年2月，邯郸地区三支两军主要由炮兵第十四师负责，邯郸军分区参加。

炮兵第十四师，师部位邯郸市原一八八师师部驻地，代号4691部队。师长杨文亭，政委徐士信，副师长史绍尹、石悟、王本昌，副政委冯国声，参谋长王本昌兼，政治部主任杜连达，辖炮兵第六团（4692部队）。该师师史称，自1967年2月介入文革后，该师先后派出9,571人次，在邯郸市、北京市、河南新乡市、山西太原市及内蒙呼和浩特等五市16个县的120多个企业和大中学校执行三支两军任务。

据《邯郸市志》称：2月8日凌晨，邯郸军分区、邯郸驻军用飞机散发镇压“红旗首都红军战斗师”和取缔“回民支队”的通令。同时，部队和一些群众组织一起行动，将红战师独立营营长以上、回民支队副支队长以上的头头逮捕。2月13日，邯郸驻军开始介入邯郸文革，同时成立邯郸市军管会。^{【1525】}

1967年中，邯郸地区形成市联委与地总两大派。9月，根据中央和北京军区安排，邯郸两大派分别组成谈判代表团赴京谈判。1968年1月6日，陈伯达在李雪峰、郑维山陪同下在炮兵第十四师礼堂接见两派代表和驻军负责人时称，地总为“大杂烩”、“反动流派”、“反动思潮”等，引致邯郸市在随后十天内接连发生攻打邯郸针织厂、火烧专区运输公司大楼、土坦克撞毁邯钢医院楼等十一次大规

【1522】唐山市工农红代会赴京汇报代表团整理。唐山铁道学院红旗战斗队：《红旗》第45期，1967年11月1日。

【1523】陈伯达在听了唐山文革的情况汇报后，表态称“冀东这个党是很复杂的”，“可能是国共合作的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在这里起作用，叛徒在这里起作用”。

【1524】《唐山市志》，页2799。

【1525】邯郸市地方编纂委员会：《邯郸市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年，页61。

模武斗事件，死亡20人，伤119人。至此，邯鄹两派斗争形势急剧变化，地总派被摧垮，市联委派取得胜利。

1968年1月28日，邯鄹地、市革委会同时成立。地区革委会主任为炮兵第十四师政委徐士信，市革委会主任为炮兵第十四师副师长史绍尹。

2月9日，邯鄹驻军及邯鄹市联总派人员在六十三军、一军各一个团的配合下，武装包围磁县县城，命令聚集于此的地总派人员交枪投降。地总派顽抗，围攻者发起进攻，引发武装冲突，后称“磁县二九事件”。事件导致地方群众死亡51人，伤数百人，部队死亡18人，伤77人。^{〔1526〕}

六、河北省革委会成立

至邯鄹地区革委会1968年1月28日成立时止，河北十个地区除保定外已有九个成立了革委会。除上述由野战部队负责的石家庄、张家口、唐山、邯鄹地区外，由各军分区为主负责的五个地区大略情况为：天津地区革委会于1967年11月28日成立，由天津军分区第二政委宋健任主任；承德地区革委会于1967年12月14日成立，由承德军分区政委牛奉林任主任；衡水地区革委会于1967年12月14日成立，由衡水军分区政委李文祥任主任；邢台地区革委会于1967年12月21日成立，由邢台军分区司令员王震任主任；沧州地区革委会于1968年1月4日成立，由沧州军分区司令员朱智勇任主任。

1968年1月16日，北京军区在北京召开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十个地区、省直和军队负责干部及群众代表180余人。会议提出了省革委会委员、常委、正副主任人选。1月28日，郑维山、李雪峰署名向中央呈报《北京军区关于建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报告称，省革委会筹备会议“对以下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其中第二点为“省革命委员会常委由三十一人组成。其中：军队代表八人，占总数百分之二十五点八，地方革命领导干部七人，占总数百分之二十二点六；革命群众代表十六人，占总数百分之五十一一点六。”第三点为“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建议由李雪峰同志兼任；副主任六人，拟由刘子厚同志任第一副主任，马辉、曾美、张英辉、刘殿臣、耿长锁五个同志为副主任。”^{〔1527〕}第五点为“鉴于石家庄的文化大革命走在全省的前头，工人阶级队伍比较坚强，

〔1526〕 参见董保存的博客：《文革河北磁县二·九事件始末》，<http://blog.people.com.cn/u/1132628.html>，最后访问：2015年1月22日。

〔1527〕 刘子厚，原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殿臣，石家庄国棉一厂工人。耿长锁，饶阳县五公公社社长，劳动模范。

又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可以形成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因此，我们建议河北省省会由保定迁至石家庄。但目前原河北省直机关均暂住原地不动。”

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准河北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称，“中央同意郑维山、李雪峰同志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关于成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同意革命委员会由一百二十一名委员组成，并由李雪峰同志任主任，刘子厚同志任第一副主任，马辉、曾美、张英辉、刘殿臣、耿长锁五同志为副主任。同意河北省省会迁至石家庄。”“北京军区和河北省军区认真地执行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河北省的人民解放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两军’工作中，坚决执行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伟大的成绩。”^{【1528】}2月3日，河北省革委会在石家庄正式宣告成立。1968年11月，省军区机关亦由保定市迁驻石家庄市。

省革委会常委中的军队代表八人为：河北省军区司令员马辉，河北省军区政委曾美，六十三军军长张英辉，河北省军区副司令员袁捷，二十四军军长陈仁洪，三十八军军长李光军，六十三军副军长徐信，六十五军副政委刘克宽。八人之中，河北省军区占三名，六十三军占两名，此中可见北京军区负责人的亲疏之别。虽然省革委会第一、二把手均非现役军人，惟军队掌控了省、地一级临时权力机构的实权。如省革委会政治部主任由曾美兼任，生产指挥部主任由马辉兼任，保卫组组长由卢克担任。

七、保定地区

保定地区1967年8月前的基本状况，见本书“三个野战军的调防”一节。此后两派武斗冲突情况，据《保定市志》称，（1967年）“12月29日，陈伯达到保定表态，公开支一派，压一派，使保定的形势骤然恶化。两派群众开始自制和抢劫军队的枪支、弹药，造成全市城乡枪声不断，武斗更加频繁，社会秩序更加混乱。1968年2月3日，两派群众10万余人在庆祝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因占主会场发生争执。上午9时许，庆祝会还未开始，裕华路等街道上便枪声四起，两派群众动用了早已准备好的机枪、冲锋枪、步枪、手榴弹等武器，大打出手。摩托车、消防车、防弹车拉着全副武装的武斗人员，在街上横冲直撞。与此同时，在交际处（现保定宾馆）、河北饭店、房管处、263医院等处，均发生近1小时的激烈枪战。参加集会的群众四散奔逃躲避，全市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在西

【1528】《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准河北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1968年1月29日。中发[68]21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1968年2月2日发出。

郊，武斗人员袭击、拦截前往市内参加集会的车辆，造成车祸，致使5人死亡，30多人受伤。1968年2月9日，在保定棉纺厂生活区又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武斗事件。陈伯达来保时曾公开表态说保定棉纺厂的‘红革会’是不三不四的组织。棉纺厂的另一派群众组织‘棉一总部’即想摧垮对方，2月4日、5日，‘棉一总部’在省军区西库修械所抢劫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准备武斗。2月7日，‘工筹派’西郊各主要群众组织开会，决定把‘红革会’赶走，从而统一西郊。会后，‘棉一总部’的武斗人员在其它单位武斗人员的配合下，对‘红革会’实行三面包围，构成交叉封锁。‘红革会’也在本派群众组织的支援下，装备了武器弹药，加固了工事，准备应战。准备期间，双方增援的群众组织，多次交火，各有伤亡。2月9日，‘棉一总部’用了八二迫击炮，向‘红革会’所在的礼堂、单身楼进行炮轰，退守在5号单身楼上的‘红革会’集中火力还击。‘棉一总部’见久攻不下，立即派人将炸药放在5号楼下，将5号楼西半部炸毁，楼内9人当场死亡。接着又炸毁该楼的东半部，‘红革会’人员逃出楼时，双方激烈枪战，多人被打死打伤。这次武斗，有16人死亡，多人受伤，其中43人致残，一座楼房报废，大批国家和私人财物遭到洗劫破坏。这次事件以后，大型武斗不仅在市内扩展，而且蔓延到两县。4月3日，在清苑县北大冉的一次战斗中，炸毁楼房两栋，平房20余间。激烈的武斗持续一天一夜，双方死亡37人，伤者甚众。此后，市内的化纤厂、604厂、市印、电校、华二等处又连续发生大型武斗。据不完全统计，自1968年2月到7月，几乎时时有枪声，天天有武斗。”^{【1529】}

关于此一时期三十八军与陈伯达、北京军区和河北省军区的关系，三十八军党委1970年12月10日“揭发”称：

毛主席视察三大区的最新指示发表后，经大力在群众中宣传，到十二月下旬，全区二十二个县已有十五个县达成了大联合协议，保定市百分之八十的单位实现了大联合或达成了协议，并筹备在一九六八年一月成立市革委会。十二月二十七日，陈伯达窜到保定，大耍两面派。在保定讲，要收枪，停止武斗，搞大联合；但是十二月三十一日至一九六八年一月三、四日，他到了石家庄、邯郸，不同我军打任何招呼，突然宣布我军支持的两个群众组织（一是占旧省委机关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一般干部组织河北省委红色造反兵团^{【1530】}，另是河北

【1529】保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保定市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年，页547。

【1530】原注：“河北省委兵团”是河北省军区支持下于一九六七年一月成立的旧河北省委机关的一个一般干部组织，占机关总人数70%以上。河北省军区向我们介绍，这个组织政治纯洁，大方向正确，是一个左派组织，并要求我军一同和他们参加会议表态支持。

农业大学近两千人的学生组织农大红色造反团^[1531]是“反动流派”，是“刘邓路线的产物”，是“反动思潮小集团”。号召全省的另一派，对保定工总派数百万群众要“斩断他们的手”，“彻底打败”，“彻底摧垮”，“毁灭性打击”，叫他们“灭亡”等^[1532]。他还通过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副司令员肖文玖给我军下令，要三十八军拘留工总派农大造反团的头头，交给河北省军区转给工筹派处理。

.....

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杨成武被揪出后，陈伯达变换反革命策略，操纵一派，想用拖的办法，妄图把保定问题长期拖住，以便从政治上打击三十八军。一九六八年三月，在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关怀下，中央举办保定学习班，两派群众组织代表迅速达成大联合协议。陈伯达立即跳出来公开煽动说：“听说六、七天就联合了，那是假的，告诉了我，我就不去”^[1533]。一九六八年八月，军委办事组遵照毛主席、林副主席指示的精神，接见了三十八军和河北省军区领导同志，对迅速成立地市革委会作了具体要求，两军领导同志经过协商共同给两派群众做工作，很快成立了保定地、市革委会。陈伯达又跳出来反对，几次散布：“保定的革委会成立得早了，急了，时机不成熟”^[1534]。

1968年8月18日，保定地、市革委会同时成立。地区革委会主任为三十八军副军长刘海清，市革委会主任为保定军分区拟任第二政委苏国柱。至此，河北全省地区一级革委会全部成立，其第一把手全为现役军人。

第六十五节 广东：从军管到省革委会成立

一、广东军管

1967年2月27日，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广东问题。会后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认为广东局势不宜久拖，建议立即对广东实行军管，准备筹建三结合的革委会。

因这个组织对省军区武装镇压“八一”有不同意见，九月份省军区支左人员，便宣布撤销支持。我们询问省军区，马辉司令员说，没有撤销支持，是下面干部搞的。

【1531】原注：“农大红色造反团”是河北农业大学一个红卫兵组织，是保定地区学校红卫兵中最大的一个学生组织，镇压“八一”时被摧垮，军委1967年4月十条命令颁发后又新生。他们反对武装镇压“八一”，河北省军区不承认他们，说是打砸抢的坏组织。

【1532】原注：1967年12月31日，陈伯达“视察”石家庄时，向当地驻军和群众代表的讲话。

【1533】原注：1969年4月6日，陈伯达在“九大”期间接见李雪峰同志的谈话。

【1534】《中国共产党陆军第三十八军委员会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1970年12月10日。中发[1970]76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1970年12月22日发出。

此外，还建议对同广东情况类似的云南拟亦先行军管。毛泽东阅批：“同意这样做。”28日，周恩来再同广东省委、广州军区负责人谈话，宣布由广州军区和广东省军区组织对广东省实行军管。下面设两个班子。一个抓文化大革命，一个抓业务。^{【1535】}

3月11日，国务院、中央军委致电广州军区称，“三月四日电悉。鉴于广东地处国防前线，面临港澳，援越抗美任务繁重，加之广东工农业生产主要集中在沿海各专区，同意你们对沿海几个地委机关和汕头、惠阳、佛山、湛江、海口等市级机关和沿海第一线的县和纵深一些重点县实行军事管制。”^{【1536】}

3月15日，广东省军管会和广州市军管会同时宣布成立。省军管会由15名委员组成，阵容鼎盛。主任黄永胜，副主任刘兴元、陈德；委员詹才芳、温玉成、陈发洪、邱国光、吴富善、吴瑞林、江燮元、阎仲川、任思忠、黄荣海、王道全、邓秀芳。广州市军管会主任由黄荣海担任。^{【1537】}

截至3月28日，广州军区（含广州军区空军、南海舰队）共抽调1,388名干部，参加省军管会和广州日报等19个单位军事管制小组工作。其中师职以上干部44名，团职干部230名，营职干部284名，连以下干部830名。^{【1538】}

1967年广东辖1市（广州市）及惠阳、韶关、佛山、肇庆、汕头、梅县、湛江7专区及海南行政区（含海南黎族自治州）。自3月15日至3月30日，实行军管的有1个省辖市、沿海4个专区和1个行政区。除前述广州市军管会主任由黄荣海兼任外，汕头地区军管会主任由陆军第四十一军政委白相国担任（所辖汕头市军管会主任由陆军第一二二师副政委阎寿湖担任）；佛山地区军管会主任由万山要塞区司令员刘凌担任（所辖佛山市军管会主任由要塞区副司令员张焕新担任；江门市军管会主任由第二一五师步兵第六四三团政委渠惠君担任）；湛江地区军管会主任由海军南海舰队司令员吴瑞林担任（所辖湛江市军管会主任由南海舰队副司令员王政柱担任，茂名市军管会主任由南海舰队副参谋长岳英担任）；惠阳地区军

【1535】《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下，页132。

【1536】广州军区收电：关于对广东省和广州市实行军事接管问题，1967年3月11日。原件存广州军区档案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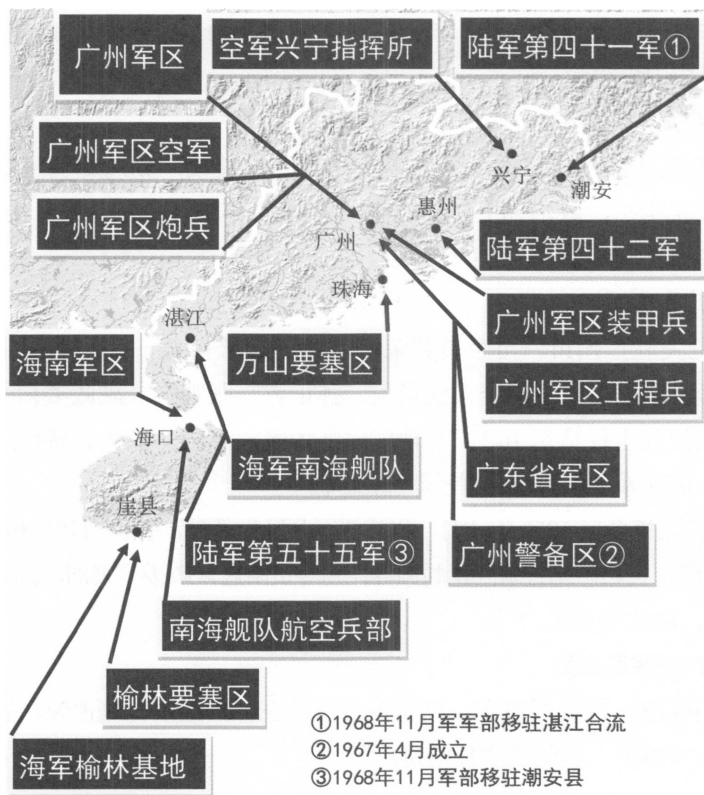
【1537】陈德，时任广东省军区政委。江燮元，时任广州军区副参谋长。任思忠，时任广州军区政治部代主任。黄荣海，时任广东省军区司令员。邓秀芳，时任广东省军区政治部主任。陈德、江燮元、黄荣海，1955年授衔少将。任思忠，1961年晋升少将。邓秀芳，1965年大校军衔。

【1538】广东省军管会组织小组简报。广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东省志·军事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255。

管会主任由陆军第四十二军副政委卜占亚担任；海南行政区军管会主任由海南军区司令员孙干卿担任（所辖海口市军管会主任由海南军区副参谋长范华担任）。^{【1539】}

内陆3个专区，不成立军管会，由驻军出面于3月份成立地区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作为该地区临时最高权力机构，行使原地委、专署职权，由驻军最高领导人任组长。韶关、梅县、肇庆地区组长分别为周益宽（广州军区炮兵政委）、曾韬（梅县军分区政委）、董自立（肇庆军分区司令员）。^{【1540】}

广东驻军分布图(1967-1968)



【1539】《广东省志·军事志》，页256-258。王政柱，1955年授衔海军少将。孙干卿，1961年晋升少将。白相国、张焕新、卜占亚，1965年大校军衔。

【1540】《广东省志·军事志》，页258。周益宽、曾韬，1965年大校军衔。

二、广州地区

1967年，广东全省军级以上军事单位共有17个之多，为除北京外全国省级行政区域之最。驻广州地区军级以上军事机关7个：

（一）广州军区

领率机关驻广州市。司令员黄永胜，第一政委原中南局第二书记韦国清兼，第二政委刘兴元，第三政委孔石泉，副司令员文年生、詹才芳、吴富善、温玉成、杨梅生、吴瑞林，副政委晏福生，参谋长陶汉章（1967年8月后吴纯仁），政治部主任相炜（1967年8月后任思忠）。^{【1541】}

广州军区辖区包括粤、桂、湘三省区，惟三支两军仅专管广东，桂、湘两省区大政方针由中央直管。

（二）广州军区空军

领率机关驻广州市。司令员吴富善，政委龙道权，副司令员王定烈、安志敏，参谋长张实杰，政治部主任叶松盛。从1967年1月起先后派出八千九百多名干部战士参加三支两军。^{【1542】}

（三）广东省军区

领率机关驻广州市。司令员黄荣海，第二政委陈德，副司令员毛和发、邬强、刘兴隆、周志飞、王道全、江贤玉、孙正乾、张鸣夫，副政委白平，参谋长于振河，政治部主任宿东山。^{【1543】}辖广州警备区，惠阳、韶关、佛山、肇庆、汕头、梅县、湛江军分区及独立第一、第二师。

（四）广州警备区 1967年4月，以广州军分区为基础，扩编组建广州警备区，行使军级权限，仍归广东省军区建制领导。司令员阳震，政委罗兴洲，副司令员郭季若、何守全，副政委鱼鉴。^{【1544】}

（五）广州军区炮兵

司令员韩庄，政委周益宽，副司令员王鉴三、国经汉、刘占荣，副政委萧泽泉，参谋长刘恒荣，政治部主任马奇。^{【1545】}

【1541】 吴纯仁，1961年晋升少将。

【1542】 《中国共产党空军组织史资料丛书》第1集，页335。龙道权，1955年授衔防空军少将。安志敏，1955年授衔空军少将。王定烈，1961年晋升空军少将。张实杰、叶松盛，1964年晋升空军少将。

【1543】 刘兴隆，1955年授衔少将。毛和发、周志飞，1964年晋升少将。邬强、江贤玉、于振河、白平、孙正乾、张鸣夫、宿东山，1965年大校军衔。

【1544】 阳震、罗兴洲，1965年大校军衔。

【1545】 韩庄，1961年晋升少将。王鉴三、国经汉、刘占荣、萧泽泉、刘恒荣、马奇，1965年大校军衔。

(六) 广州军区装甲兵

司令员叶建民，副司令员王子衡，副政委王侨（1967年8月任），参谋长张林，政委办公室主任周峰。^{【1546】}

(七) 广州军区工程兵

司令员廖仲符，政委郭质甫，副司令员寇吾先、李庆三，副政委朱子统，参谋长李庆三（兼），政治部主任王居义。^{【1547】}

广东军管前后，广州地区以至广东全省，已形成红旗派（旗派）与东风派（总派）两大相互对立的派别。

1967年4月中旬，周恩来来到广州，听取了广州军区和省军管会负责人的汇报，多次召开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座谈会。4月18日，周恩来在广州各群众组织代表座谈会上讲话时称，“我十四号到广州来，本来是处理交易会的问题，准备处理完了就走的。以后主席觉得我既然来了，还是帮助军区，帮助黄永胜同志把一些问题推动解决一下。”对广州军区及广东军管会，周恩来予以肯定称，“军事管制在广东来说，是在极其需要的情况下，由主席和党中央决定，要求广东付诸实施的。这么一个结论，就是这样得出来的。在二月底三月初，要求迅速来解决广东问题，专谈这个问题，只用了三天时间，就解决了。这是广东的地位和情况，我应该说清楚。这个主要责任归之于广东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前省委以赵紫阳、区梦觉、尹林平他们为首的这一伙人。”“二月以来，军区拘捕了一些人，拘捕的人数虽然多了一点，但是不像别的地方那么多。我们后来重新核实，连取缔的反动组织在内，总共也不过四百五十人。……在全国来说，广东捕人并不多，而且放得很快。”“军管前的形势，应该说，广东是个南方的门户，面临前线，但本身还没有闹出大乱子，我们感觉广州军区在这个问题上，从黄永胜同志起，领导还是负责的。这一点主席、林副主席是寄予期望的，信任他的，我应该肯定的告诉你们。”^{【1548】}

周恩来对广东两大派分别作出评价称，“‘地总’、‘红总’问题。‘地总’、‘红总’拥有大量工人群众，他们都是广州工人的革命组织，只是有些偏于保守。这两个组织不能称为大老保，也不能笼统地称为保守派。”“有的同志急得很，问‘红总’、‘地总’保守表现在那里。我只是说有些事情偏于保守，我并没有说你是‘大老保’。我对人家加给你们‘大老保’的帽子，我不赞成，我替你们辩护的。你们

【1546】叶建民，1955年授衔少将。王子衡，1965年大校军衔。

【1547】廖仲符，1961年晋升少将。郭质甫、寇吾先、李庆三、朱子统，1965年大校军衔。

【1548】《周总理四月十八日在广州各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稿，1967年4月18日。该记录稿无出版单位，但相信为广东省军管会所印。

过去有些事情偏于保守，以后可以改。偏于保守为什么不可以改？”^{【1549】}三个‘红旗’是革命左派，这就是‘中大红旗’和‘八一’；‘华工红旗’；‘广医红旗’。但不仅仅是这三个‘红旗’是革命左派，其他都不是，如果这样传出去，那我就提倡宗派主义了，要犯极大的错误。我是提出三个例子。三个‘红旗’的确是广东一向来承认的，军区一向支持的，尽管犯了严重错误，像中大的‘八一’，在夺权斗争中就是犯了极严重错误，但是并没有因此而责备它。”^{【1550】}

周恩来的讲话，使红旗派欢欣鼓舞，也使东风派心怀不忿，两派冲突频仍。周恩来4月18日讲话四天之后，4月22日，中山医学院内两派发生冲突。消息传开，市内两派分别组织队伍前往支援，聚集人数最多时达至万余人。广州市军管会主任黄荣海闻讯赶至现场调解，并调动数百解放军于当晚开进中山医学院，最后武斗遂告平息。7月23日，东风派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中山纪念堂举行大会，红旗派则在相距不远的越秀山体育场开会，午后两派在中山纪念堂周边发生武斗，共聚集了两万余人。为防止事态继续扩大，广州市军管会抽调21个连的部队赶赴武斗现场，在冲突双方中间筑起人墙，黄荣海等人也亲到现场做劝解宣传工作。^{【1551】}其后，广州于8月13日发生了白鹅潭武斗，8月18日发生长堤省总工会大楼武斗，8月20日发生三元里武斗，8月26日发生文冲船厂武斗、9月2日发生太古仓武斗等。这些武斗都动用了枪支、手榴弹，造成了人员伤亡。

1967年8月22日凌晨至清晨，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广州两派代表，黄永胜在座。周恩来在讲话时称，“不要把矛头对准解放军。武汉七月二十号叛乱事件后提了军内一小撮，这是我们在宣传工作方面出了点毛病，伟大统帅批评了这件事。……现在主要还是党内一小撮，军队还是党领导的嘛！现在到处抓军内一小撮，这样搞不是把党内一小撮放弃了吗？七月廿日以后，宣传部门提出军内一小撮，出了点毛病，我可以告诉同志们，现在不再提了。”周恩来要求两派“先达成协议：一、对外广播不能用；二、不能动用军用物资，不能抢解放军的武器，运输中的物资都不能动；三、在手中的武器包括自己的长矛、短刀一律停止使用，封存起来，准备交给解放军；四、立即停止武斗，停止打、砸、抢、抄、抓，这几件事情先做。还有铁路的两派，先恢复物资运输，不同观点可在业余时间讨

【1549】该记录稿上对总派的评价并非周恩来的原话。讲话整理者有说明称，“总理对‘地总’‘红总’的评价部分，根据总理的指示，改用了四月十九日二十时四十分由总理办公室周秘书从北京传来的电话稿。”

【1550】《周总理四月十八日在广州各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稿。

【1551】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大事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页217-218。

论，但不要停车，用这几条来考验你们；五、还有扣留的人员都要释放。以上几条第一条是少数人的事情，主要是后面四条。”当日，广州两派代表签订协议，表示完全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四项紧急措施”，“我们将立即通知各自的组织，坚决贯彻执行。”^{【1552】}

1967年11月2日，广州地区双方赴京代表团签订关于“拥军爱民”、“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开展革命大批判，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书。11月14日，双方组成的广州地区群众组织赴京代表团发布《告广州地区人民书》。广州形势趋于稳定。

三、军方检查与省革委会成立

1967年5月13日，广东省军管会就前段支左工作的教训和下一步的做法报告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称，最近常委对前段支左工作进行了检查，认为部队支左以来，虽然支持了一些真正的革命左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着许多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受到一些革命小将一针见血的批评。14日，毛泽东为转发上述报告及湖南省军区5月12日关于贯彻广州军区首长指示的另一报告代中央写的批语称：

（一）现将广州军区、湖南省军区报告两件发给你们，望参照执行。

（二）凡犯了错误的必须坚决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以前更高。

（三）不要动动摇摇，游移不决。听信老婆孩子从保字号那里带来的错话，信以为真。

（四）要受得住工人、农民、学生、战士、干部的批评，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错的解释。解释不通，暂时搁下，将来再说。

（五）要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样一想，就什么都通了。^{【1553】}

1967年5月21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编印的《信电快报》第121期登载了黄永胜、温玉成等5月10日与广州工联八位代表座谈时的讲话摘要。黄永胜在讲话中检查了“前一段支左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表示彻底给被打击迫害的革命造反派平反，坚决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毛泽东5月23日为此作出批示表扬黄永胜称，“林彪、恩来同志，并告文革小组：黄永胜同志讲话一篇，建议发给各大军

【1552】《关于广东问题资料汇编》，页7-9、50。

【155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347。

区，各省军区，各军，各军种兵种作为参考。我觉得这种小型的谈心会很好。当地最高首长出面与小将平等地谈心，不摆架子，有错爽直承认，而不吞吞吐吐，并且立即改正，这些都很好。如同意，请酌处。”^{【1554】}

1967年8月20日，广州军区党委作出《关于在广州地区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承认其“在支左工作中，在一段时间内我们犯了许多错误，有的是方向路线的错误”。检查中称，

一月二十二日，“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省革联”），对旧省委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的大方向是正确。当时，我们没有首先肯定他们的斗争大方向，只看到了他们由于斗争经验不足而犯的一些错误。二月初，“省革联”的某些组织参加冲击军区之后，我们就更加认为他们的错误严重，于是，在社会宣传工作中，公开指责了“省革联”，给“省革联”以很大压力。后来，在组织临时生产指挥部和各级临时生产领导班子时，又把参加过“省革联”的群众组织排斥在外。这些做法，都是错误的。

三月份，我们又错误地取缔和解散了“八一战斗兵团”等军内外一些群众组织，错抓了一些人。在为迎接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而进行的整顿广州市社会秩序和加强治安工作中，也扩大了打击面，抓了一些不该抓的人。与此同时，我们还压制了中山大学“红旗公社”和“八三一战斗团”等革命群众组织的活动。

检查中又称，

我们有决心彻底纠正支左工作中的错误。我们重申，对过去被我们取缔和解散的军内外革命群众组织一律平反；过去所发布的有关取缔和解散革命群众组织的公告、布告、“罪状”等；一律作废。被拘捕的人员，除个别有现行罪行、证据确凿的坏人，应当按照中央规定依法处理外，其余一律平反。在这里，我们特向被错误地取缔和解散的革命群众组织和被捕的人员，以及由于我们的错误而受到压抑的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道歉。同时，有些群众组织在我们影响下犯了某些错误，其责任在于我们。我们感谢广大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给予我们的批评和帮助，并且希望继续给予我们批评、帮助和监督。^{【1555】}

1967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该决定共四条，其中第一条称，“广州军区是中央信任的，

【155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353。

【1555】《关于广东问题资料汇编》，页45-46。

他们过去是紧跟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从介入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来，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很大的成绩。在某些地方的支左工作中，虽然犯有一些错误，但是从今年四月以后，在中央和革命群众的帮助下，已有改正，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效。这次所作的《关于在广州地区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态度是诚恳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希望广州军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新功。”第四条中称，“中央决定建立以黄永胜、陈郁、孔石泉、王首道、陈德等同志和实现了革命大联合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组成的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1556】}

1967年11月14晚，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接见广东各群众组织赴京代表时，周对《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逐条作了解释说明。在宣读决定第一条后，周称，“大家都很晓得，广州军区本身任务很重，还管三个省——广东、广西、湖南，也是野战军比较多的军区。面对南线敌人，又有援越抗美的任务。不仅有本身的工作，有备战，还有援外工作。今年一月又接受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交给的‘三支’‘两军’的任务，任务是新的。……军区支左犯的错误的，军区检查说了。检查说‘在一段时间内我们犯了许多错误，有的是方向路线的错误。’我们认为广州军区总的成绩是肯定的。所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林副统帅亲自指挥的。广州军区解放海南是林副统帅亲自指挥的。广州军区是得到中央信任的。”在宣读完决定第四条后，周称，“经过和你们协商，中央决定建立以黄永胜、陈郁、王首道、孔石泉、陈德等五位同志负责组成省革筹小组。三位军队干部，两位地方干部。黄永胜同志经过多次接触，是个很好的领导干部，是紧跟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当然，他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也犯了一些错误，这他已经和你们谈了。军委、中央文革是信任的。本来省革筹小组可以由省军区负担，但广州是华南重镇，任务很重，所以由大军区出面，还是黄永胜同志领头。孔石泉同志是中央新派去的第三政委。最近他推动广州工人大联合做出了成绩，三方面都满意他的工作，这次工人联筹成立大会他讲了话。陈德同志是广东省军区的政委，广东人，你们都很熟了。在军管中处在第一线，支左中犯了一些错误，在工作中和大家不那么融洽，他来京开过会，他已经承认了错误，已经和你们讲清楚了。中央对他是信任的，我们相信他能把工作担负起来，现在需要大家支持。地方的两位，陈郁、王首道两位同志是中南局无产阶级革命派支持的。”^{【1557】}

【1556】《关于广东问题资料汇编》，页1。

【1557】《关于广东问题资料汇编》，页40-42。1968年2月广东省革委会正式成立时，陈德未成为省革委会副主任，他的位置被黄荣海所取代。



广州军区领导与丁盛到林彪家拜年，前排左起：邱国光、丁盛、任思忠、林彪、黄永胜、叶群、项辉方，中排左一林立果，1968年春节。

1968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准成立广东省革命委员会。21日，正式宣布广东省、广州市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中央批准省革委会由黄永胜任主任，孔石泉任第一副主任，陈郁、王首道、邱国光、阎仲川、黄荣海、刘继发、黄育英（女）七人^[1558]和待补一至二人任副主任。省革委会常委39人，其中军队代表除黄永胜、孔石泉、邱国光、阎仲川、黄荣海外，还有陈德、袁德良^[1559]、孙正乾、白平共九人，虽只占常委23%，但掌握实权。省革委会工作机构设四大组，正职全部由军人担任。广州市革委会主任，由黄荣海担任。

总体来说，以一个一类大军区的力量去管辖一个省，黄永胜领导的广州军区，表现在全国来说尚属中上。除个别地区（如海南）以外，广东相对于邻近的省区，尚属比较平静。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后，黄永胜调京任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应该还是合适的人选。在当时的环境下，很难说会有其他人比他做得更好。

【1558】邱国光，新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阎仲川，1967年12月起任广州军区参谋长。刘继发，广州重型机械厂工人，红旗派负责人。黄育英，揭阳县桂岭公社民办小学教师，1972年因患精神分裂症服毒自杀身亡。

【1559】袁德良，时任广州军区后勤部副部长，1965年大校军衔。

四、惠阳地区

惠阳地区三支两军的主力为陆军第四十二军。

陆军第四十二军军率领机关位惠州市，代号 6840 部队。辖陆军第一二四师、第一二六师、第一二八师，直辖炮兵第一四七团及高炮第六十七团。军长张荣森（1968 年 2 月张景耀），政委任思忠（1967 年 8 月卜占亚），副军长苏克之、张景耀，副政委卜占亚、贺靖，参谋长赵欣然，政治部主任贺靖兼。^{【1560】}该军军史称，1967 年 4 月，“先后派出上万名指战员分赴广东省的 2 个专区、14 个县（市）、139 个公社、工厂、学校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原则上每个县派 2 至 3 名团以上干部和 40 至 80 名工作人员。”^{【1561】}

陆军第一二四师，师部位博罗县，代号 6864 部队。师长魏化杰，政委刘永寿，副师长董永兴、叶川、王玉振，副政委吴耀光，参谋长王玉振兼，政治部主任赵桂生。辖步兵第三七〇团、第三七一团、第三七二团，炮兵第五〇四团及坦克自行火炮第三二九团。该师师史称，“1967 年 2 月，第 124 师根据上级命令，开始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师、团两级均成立了负责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的专门办公室。从 2 月至 8 月，师所属第 370、371、372 团和坦克——自行火炮第 329 团先后派出大批干部战士分散到广州、惠阳市、博罗县、增城县、龙门县等地执行任务，进驻广州的部队还担负了保卫军区领导机关的任务。师所属炮兵第 504 团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人员于 1968 年 3 月上旬进驻广州沙河、东圃地区。”“1967 年 7 月至 10 月，广州总工会、钢铁厂、第 22 中学、氮肥厂等单位相继发生了数千至上万人卷入的大规模武斗，有的还动用了高射机枪对打。危急关头，奉命进驻广州‘支左’的第 124 师部队，不分白天黑夜，哪里有武斗就及时出现在哪里，少则 1 个班、1 个排，多则 2 至 3 个营同时出动，组成人墙插到两派中间，劝解双方停止武斗。”^{【1562】}

陆军第一二六师，师部位斗门县，代号 6856 部队。师长杨海水，政委励勋，副师长邢嘉盛、陈仕林，副政委蒋立明，参谋长胡锡标，政治部主任于敬华。辖步兵第三七六团、第三七七团、第三七八团及炮兵第五〇六团。该师时在斗门县白藤岛执行生产任务。1967 年 3 月后，先后派出 567 名干部、92 名战士和五个建

【1560】张荣森、苏克之，1964 年晋升少将。张景耀、贺靖、赵欣然，1965 年大校军衔。

【1561】陆军第四十二集团军军史编审委员会：《陆军第四十二集团军军史》，2008 年 10 月，页 448。

【1562】步兵第一二四师师史编审委员会：《岭南雄师——步兵第一二四师师史》上册，2010 年，页 210。

制连队，分赴广东一市（广州市）、两专区（惠阳、佛山）七个县、18间工厂、19个公社、16所学校和一个农场参加三支两军。

陆军第一二八师，师部位惠阳潼湖，代号6879部队。师长王文德，政委刘安元，副师长俞梅生，副政委张若愚，参谋长盖玉宪，政治部主任阎尚杰。辖步兵第三八二团、第三八三团、第三八四团及炮兵第五〇八团。师机关率直属分队、三八二团、三八四团及炮兵第五〇八团在潼湖执行军农生产任务，三八三团驻宝安县深圳地区，执行边防警戒任务，1967年在深圳边境直接参加三支两军。师长王文德兼任深圳地区对敌斗争领导小组组长。1968年10月重建陆军第四十三军，一二八师归四十三军建制领导，由惠阳地区移防至广西柳州市。

1968年1月20日，广东省革委会筹备小组同意成立惠阳专区革委会，由四十二军新任军政委卜占亚任主任。同时成立惠州市革委会，主任为一二六师参谋长胡锡标。

五、韶关地区

韶关地区的三支两军主要由广州军区炮兵和韶关军分区负责。当地驻军主要为炮兵第一师，师部位曲江县马坝，代号7030部队，师长刘尚文，政委崔金锡。

1967年初至8月中旬，韶关各地发生两大派抢夺军队枪枝弹药多起事件。其间韶关发生大规模武斗两次，英德、乐昌、乳源、连县也发生武斗，造成人员伤亡。

1967年12月12日，在北京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韶关专区两派群众组织代表经协商实现大联合。^[1563]1968年2月13日、15日，韶关专区、韶关市革委会先后宣告成立。专区革委会主任为广州军区炮兵政委周益宽，韶关市革委会主任为广州军区炮兵副司令员王鉴三。

六、佛山地区

1967-68年，参与佛山地区三支两军的部队，主要为万山要塞区，陆军第二一五师、海军川岛水警区及佛山军分区。

万山要塞区 领率机关位珠海县，代号7002部队。司令员刘凌，政委刘华村，副司令员贺正海、张焕新、刘盛云，副政委韩敏，参谋长何恩昌，政治部主任顾汉国。^[1564]

【1563】韶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韶关市志》，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页87。

【1564】刘华村、贺正海、刘盛云，1965年大校军衔。

陆军第二一五师，属五十五军建制领导，师部位台山县，代号 6979 部队。师长何福田，政委王永宁。辖步兵第六四三团、第六四四团、第六四五团及炮兵第五四四团。1968 年 11 月，调至江西赣南地区接替陆军第一二一师，担负赣南三支两军工作。

海军川岛水警区，属南海舰队建制领导，指挥机关位台山县，代号 4402 部队。司令员韩振江，政委缺，副司令员李洪鉴、张羽、郝志刚、张太和，副政委朴英杰，参谋长赵忠，政治部主任顾新亭。

1968 年 3 月 2 日，佛山专区、佛山市革委会同时成立。专区革委会主任为万山要塞区政委刘华村，佛山市革委会主任为万山要塞区副司令员张焕新。4 月 11 日，省革委会同意成立江门市革委会，由第二一五师六四三团团长赵书田任主任。

七、肇庆地区

肇庆地区三支两军由肇庆军分区负责。

1967 年 2 月，肇庆形成东风和红旗两派。6 月 8 日，两派在市搬运公司首次发生冲突。随后，6 月 13 日、25 日，7 月 26 日，数次发生大规模冲突。

8 月 12 日，肇庆市发生抢枪事件。至此，两派均掌握武器弹药，导致冲突升级至枪战。8 月 16 日，广宁县两派在县城发生武斗。9 月 2 日，肇庆两派在西门缘瓦坑发生武装冲突，死伤多人。11 月 9 日，肇庆两派再次发生武斗，从西江饭店楼上扔下手榴弹，炸伤军民数人。1968 年 1 月 10 日，罗定县两派发生武斗，死伤数十人。^{【1565】}

1968 年 3 月 14 日，肇庆专区革委会成立，主任为肇庆军分区司令员董自立。

八、汕头地区

汕头地区三支两军的主力为陆军第四十一军。军分区、汕头水警区参加。

陆军第四十一军军领率机关位潮安县，代号 6801 部队。辖陆军第一二一师、第一二二师、第一二三师，直辖炮兵第一四六团、高炮第六十六团。1967 年 3 月，代军长郝盛旺，政委白相国，副军长江雪山、王洪荣、冉泽、阳震，副政委王淳，参谋长陈清世，政治部主任仇天钧。^{【1566】}

【1565】肇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肇庆市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年，页 66-67。

【1566】郝盛旺、冉泽，1964 年晋升少将。王洪荣、王淳、江雪山、陈清世、仇天钧，1965 年大校军衔。

陆军第一二一师，师部位梅县，代号 6810 部队。师长张序登，政委于厚德，副师长于海学、张德福，副政委刘智民，参谋长蔡志贤，政治部主任孙建文。辖步兵第三六一团、第三六二团、第三六三团及炮兵第五〇一团。

陆军第一二二师，师部位澄海县牛田洋，代号 6822 部队。师长王新民，政委秦道容，副师长王国屏、徐元利，副政委阎寿湖，参谋长林学诚，政治部主任曲振顺。辖步兵第三六四团、第三六五团、第三六六团及炮兵第五〇二团。

陆军第一二三师，师部位揭阳县，代号 6823 部队。师长姜永凯，政委王程明，副师长毕可升，副政委修向辉，参谋长王凤歧，政治部主任曹杰。辖步兵第三六七团、第三六八团、第三六九团及炮兵第五〇三团。

1967 年中四十一军三支两军分工：军部和一二二师负责汕头市和澄海、潮安两县；一二三师负责揭阳、普宁、揭西三县；7 月，一二一师师部率三六二团、三六三团赴江西吉安、赣州地区执行三支两军任务。

海军汕头水警区，指挥机关位汕头市，代号 4401 部队。司令员刘墨卿^[1567]，政委李学南，副司令员孔照年、程远香，副政委张山峰，参谋长王锦，政治部主任傅敬礼。

1967 年 2、3 月间，汕头形成支持封《汕头日报》社的二七派与号称拥护军管会的三六派。5 月 1-12 日，海丰县海城镇发生重大武斗事件。海丰无产阶级左派委员会与人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因争夺原军管会大楼，发生近二千人参加的武斗事件，共打伤三百多人。5 月 23 日，汕头地区军管会召开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25 周年大会，会上军管会只同意三六派的代表发言，而二七派没有得到批准发言便冲散会场，组织队伍到军管会静坐抗议，静坐一直持续一个多月。“五二三事件”使两派的对立情绪加剧。8 月 14 日，三六派举行示威游行，游行队伍冲进汕头军分区和警备司令部，要求警备司令部镇压二七派，要求军分区发枪枝弹药。同时三六派还在延安中学（原市第十中学）组织武斗队伍。8 月 16 日，汕头两大派各占武斗据点。8 月 17-18 日，汕头市抢枪事件连续发生，群众组织在两天内抢夺驻军和经济警卫用枪共 182 支，其中有手枪、冲锋枪和半自动步枪。8 月 26 日，大批武装民兵冲进海丰县海城，围剿镇压一批维护彭湃烈士的干部群众，致使 90 多人惨遭杀害，三千多人被打伤，其中四百多人被打成重伤和残废，彭湃的亲属有五人被杀害，彭湃的母亲和儿子彭洪被迫害致死。9 月 3 日，汕头地、市军管会发表公开信，表态支持一派组织，使两派更加对立。9 月 22 日，在汕头市军管会主持下，汕头市三六派和二七派达成停止武斗协议。

【1567】刘墨卿，1965 年海军大校军衔。

12月11日，汕头市两大派赴京代表发出《关于实现汕头市革命大联合的紧急倡议》。^{【1568】}

1968年3月14日，汕头专区革委会、汕头市革委会同时宣告成立，四十一军政委白相国任专区革委会主任，一二二师副政委阎寿湖任市革委会主任。

九、梅县地区

梅县地区三支两军，主要由梅县军分区负责，空军兴宁指挥所（3731部队）及广州军区后勤二十一分部（广字106部队）参与。

空军兴宁指挥所总参1965年4月27日批准在广东省兴宁县组建的一个相当于军的指挥所，隶属广空建制领导，主要担负粤东方向防空作战任务。主任林虎，政委彭由，副主任李宪刚，参谋长高继尧，政治部主任余修。从1967年1月起，先后派出1,449名干部战士参加三支两军。^{【1569】}

1967年4月，梅县驻军组成“梅县地区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领导全区的文革和工农业生产。1968年3月14日，成立梅县专区革委会，由梅县军分区政委曾韬任主任。

十、湛江地区

1967年中，参与湛江地区三支两军的驻军军以上单位为陆军第五十五军及海军南海舰队。

（一）陆军第五十五军

军领率机关位湛江市郊合流，代号6975部队。辖陆军第一四四师、第二一五师、第二一九师、第二二〇师，直辖炮兵第一六一团、高炮第八〇团。军长陈明仁，政委缺（1967年8月后罗荣），第一副军长霍成忠，副军长罗荣、杨敏、孙凤章，副政委张战东、朱万新，参谋长杨敏兼，政治部主任王光辉。^{【1570】}

陆军第一四四师，师部位广西贵县。代号6977部队。师长缺，政委蒋超，副师长张本林、金文秀、王焕东、李金祥，副政委王铁炉，参谋长闵春明，政治部主任官勇。辖步兵第四三〇团、第四三一团、第四三二团及炮兵第五四三团。

陆军第二一五师见上文佛山地区段。

【1568】汕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汕头市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页180-182。

【1569】《中国共产党空军组织史资料丛书》第2集，页343。

【1570】陈明仁，1955年授衔上将。罗荣、霍成忠、杨敏、孙凤章，1965年大校军衔。

陆军第二一九师，师部位海康县，代号 6982 部队。师长王影彩，政委钱光弟，副师长王国瑞、李凯、白忠耀，副政委赵盛昌，参谋长白忠耀兼，政治部主任逢永歧。辖步兵第六五五团、第六五六团、第六五七团及炮兵第五四五团。

陆军第二二〇师，师部位广西田东县，代号 6908 部队。1967 年 2 月由广西边防师改番号，归五十五军建制。1968 年 9 月，归重建的陆军第四十三军建制领导。

1967 年 2 月后，五十五军军部和二一九师在湛江，二一五师在台山、江门、佛山，一四四师在广西南宁、柳州、贵县等地参与三支两军。

1968 年 11 月，五十五军调防至广东粤东地区和江西赣南地区，接替四十一军的防务和其在汕头、江西赣州、吉安地区担负的三支两军工作。

（二）海军南海舰队

领率机关位湛江市霞山。司令员吴瑞林，政委方正平，第二政委桂绍彬，副司令员王全珍、王政柱，副政委缺，参谋长高希曾，政治部主任缺。^{【1571】}辖海军榆林基地、南海舰队航空兵部，直辖汕头、川岛水警区及快艇十一支队。1964 年 7 月，舰队司令部、政治部从广州移驻湛江。舰队后勤部、修理部、工程部于 1967 年 7 月分别由广州向湛江搬迁，是年 12 月搬迁完毕。

1967 年 5 月 9 日，一派群众组织 80 多个单位两千多人在赤坎公安分局门前静坐示威，提出释放麦九等条件，^{【1572】}历时 28 天。以对静坐态度为分水岭，湛江形成支持静坐的红旗派（又称联派）和反对静坐的东风派（又称捍派）对立的两大派。6 月 6 日，湛江市一中两派组织发生武斗，为湛江文革武斗之始。8 月 14 日，群众组织首次抢夺武装部枪枝弹药。随后，两派群众组织接连抢夺驻湛部队的枪枝弹药与其他军用物资，甚至抢夺抗美援朝归国部队的武器装备。9 月 7 日，两派为争夺湛江水产学院大楼发生大型武斗达两天两夜，双方各有伤亡。9 月 27 日，两派为争夺湛江气象学校发生大型武斗，动用各种轻重武器及土坦克等，激战两天一夜，双方伤亡惨重。同日，周恩来电召湛江两派代表到北京谈判。11 月 9 日，湛江两派代表在北京签订“一一九协议”。12 月 3 日，由军管会支持，成立湛江市大联合筹备委员会。^{【1573】}

【1571】方正平，1955 年授衔海军中将。桂绍彬，1955 年授衔海军少将。王全珍，1961 年晋升海军少将。高希曾，1965 年海军大校军衔。

【1572】麦九为湛江通用机械厂工人，因印刷传单出现错字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6 月 21 日，军管会为麦九等人平反。

【1573】湛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湛江市志》，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页 122-123。

1968年3月31日，湛江专区、湛江市革委会同时成立。专区革委会主任为五十五军副政委朱万新，市革委会主任为南海舰队副参谋长岳英。

十一、海南地区

1967-68年，参与海南地区三支两军的驻军军以上单位为海南军区、南海舰队航空兵部、海军榆林基地及榆林要塞区。

（一）海南军区

与广东省军区平级的军级军区。领率机关位海口市，辖榆林要塞区（7001部队）、通什军分区、陆军第一三二师（6925部队）及守备第二十七师（6846部队）。1967年5月，司令员孙干卿，第二政委魏佑铸，副司令员马白山、段志清、冯镜桥、袁意奋、杨绍良、刘远生、覃士冕，副政委单印章、李鹏，参谋长胡海晓，政治部主任缺。^{【1574】}

（二）南海舰队航空兵部

领率机关位海口市，代号4420部队。辖海军航空兵第八师（4421部队）。司令员罗文华，政委周志先，副司令员芦仕盛、张文清、张经文，副政委凌旺、刘春光，参谋长张经文兼，政治部主任田翰阁。^{【1575】}

（三）榆林基地

领率机关位崖县，代号4009部队。辖海口水警区（4404部队）。司令员袁意奋，政委王权，副司令员刘世湘、田松、彭一坤、胡胜辉、苏军，副政委朱坡，参谋长段华夫，政治部主任张述谦。^{【1576】}

（四）榆林要塞区

领率机关位崖县，代号7001部队。司令员刘远生兼，政委李鹏兼，副司令员纪刚，副政委刘云，参谋长王文林，政治部主任薛仁斌。

海南驻军中，陆军部队倾向于保守派，海军尤其是快艇十一支队^{【1577】}倾向于造反派。据海南军区干部于林彪事件后揭发指责十一支队称：“1967年11月，海军首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召开后，《人民海军》登了‘飘扬在南海上空的一面红旗——记4411快艇部队’，11月30日，4411部队500余人领头，及旗

【1574】马白山、覃士冕，1955年授衔少将。魏佑铸、段志清，1964年晋升少将。冯镜桥、袁意奋，1964年晋升海军少将。杨绍良、刘远生、单印章、胡海晓，1965年大校军衔。

【1575】罗文华，1964年晋升海军少将。周志先、芦仕盛、张文清、张经文、凌旺，1965年海军大校军衔。

【1576】刘世相，1964年晋升海军少将。王权、田松、胡胜辉、朱坡，1965年海军大校军衔。

【1577】快艇十一支队位文昌县清澜港，代号4411部队。支队长武毅，政委张永前。

派在文昌开车示威游行，以示庆祝，游行队伍回到文昌中学，就向联派发起了进攻，文昌成为全岛武斗最激烈的县之一，双方死伤数十人。”^{【1578】}

据官方资料称，1967年6月6日，军队进驻《海南日报》社，将长期强占报社大楼的东方红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东联站）驱赶出去。东联站一些头头静坐抗议。8月8日，东联站、海南政法、东方红革命造反司令部与海南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部（简称海联司）两派在游行中于海口市解放路发生武斗。这是文革中海口地区第一次大的武斗。9月28日，针对海口地区严重的混乱局面，海口警备区司令部发布《关于制止武斗、收回枪枝弹药的布告》。11月中旬至12月下旬，东联站与海联司先后在海口市内的海南机械厂、建国旅店、海南汽车总站、百货大楼等地发生武斗。这是文革中海口地区第二次大的武斗。1968年1月8日，海口地区各群众组织赴广州迎接广东省赴京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及省、市汇报代表团的代表，达成“自1月9日零时起，各群众组织立即停火并停止一切战斗”等七项协议。2月4日至3月12日，海南、海口群众组织代表59人在京参加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海南班学习，着重解决海口地区“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问题。通过学习，各派群众组织代表签订了协议，并拟定了建立海南、海口两级革委会的初步方案。^{【1579】}

1968年4月7日，海南行政区革委会和海口市革委会同时宣告成立。行政区革委会主任由海南军区司令员孙干卿担任，海口市革委会主任由海南军区新任参谋长孟亚东担任。4月6日批准成立的海南黎族自治州革委会，主任由通什军分区司令员刘荣担任。

第六十六节 吉林：军队为稳定局势所作的努力

一、长春驻军介入地方文革

1967年1月军队介入地方文革时，驻吉林省内军级单位（不含军队院校）共7个，其中省会长春地区3个，即：

（一）陆军第十六军

军领率机关位长春市，代号3009部队。军长汪洋，政委王淮湘，副军长徐仲禹、诸传禹、杜海林，副政委马希圣，参谋长高涨，政治部主任王尚。^{【1580】}

【1578】《揭发材料（60）》，原海南军区教导大队副政委王龙彦揭发材料，中共广东省委01办公室，1972年5月11日。

【1579】海口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海口市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4年，页57。

【1580】汪洋、王淮湘、杜海林，1964年晋升少将。徐仲禹、诸传禹、马希圣、高涨，1965年大校军衔。

辖陆军第三十二师、第四十六师、第四十七师，直辖炮兵第一一八团、高炮第四十一团。

陆军第三十二师，师部位四平市，代号3010部队。师长聂济幢，政委王英烈。辖步兵第九十四团、第九十五团、第九十六团，炮兵第三二六团及坦克自行火炮第二三七团。1967年6月，由四平地区移防通化地区，师部位通化市。

陆军第四十六师，师部位长春市，代号3032部队。师长刘凤鸣，政委李洪昌。辖步兵第一三六团、第一三七团、第一三八团，炮兵第三二七团及坦克自行火炮第二五二团。

陆军第四十七师，师部位辽源市，代号3016部队。师长师仲伟^[1581]，政委唐玉胜，副师长朱敦法，副政委陈凤歧，参谋长丁耀辉，政治部主任陈宪瑞。辖步兵第一三九团、第一四〇团、第一四一团，炮兵第三二八团及坦克自行火炮第二五三团。

（二）空军第一军

军领率机关位长春市，代号7311部队。辖空军第二十师（师部位公主岭基地）、空军第二十一师（师部位二台子基地）和空军第二十八师（师部位四平基地）。军长马宁，政委萧道生，副军长周承重、陈海林、贾波、江震，副政委邱仁华、丁克明，参谋长王雨森，政治部主任丁克明兼。^[1582]该军军史称，1967年，“军属部队先后派出干部3937人、战士2105人，到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四川、陕西等6省市的214个单位，担负‘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直到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三支两军’人员才陆续撤回。1973年7月，除58人准备长期在地方工作、8人暂过渡外，其他同志全部返回部队，‘三支两军’工作宣告结束。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对制止地方武斗、稳定社会局势、恢复生产起了积极作用，但在客观上维护了极‘左’的思想路线，部分人员犯了支持派性、乱用职权等严重错误，损害了军民关系。一些人还把派性作风带回部队，给部队建设造成不良影响。”“1967年的7、8、9三个月，地方武斗严重，社会上相当动乱。一些造反派组织为了夺取枪支弹药，多次冲击军营、机场。在长春，造反派冲击军机关大院。在二台子场站，还发生造反派冲击机场，企图拆下飞机机炮事件。这一年，军属各部队被冲击达100多次，157名同志挨打，17人被打伤，2人被打死。但由于广大指战员保持高度克制，始终坚持‘四不、一宣

【1581】师仲伟，1965年大校军衔。

【1582】马宁，1964年晋升空军少将。萧道生、周承重、邱仁华、陈海林、贾波、丁克明，1965年空军大校军衔。

传’（即：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动气、不开枪、耐心向群众作宣传），因而没有发生严重军地纠纷。”^{【1583】}

（三）吉林省军区

军区领率机关位长春市。辖德惠、永吉、白城、四平、通化、延边6个军分区，长春、吉林2个市人民武装部，独立师2个，即独立第一师（师部位安图县，代号3303部队）、独立第二师（师部位长春市，代号3375部队）。司令员何友发（1967年6月到任），政委缺，副司令员黄思沛、钟明彪、蒋克诚、黄运昌、贺吉祥、何耀海、刘金才、薛复礼，副政委苏俊禄、孙寅东、黄鸿瑞、王振华，参谋长王乃征，政治部主任丁池。^{【1584】}

长春地区驻多间军队院校。计有：兽医大学、防化学兵学院、第五坦克技术学校、第九航空学校（1967年5月改称空军第二航空机务学校）和第一航空预备学校等。

1967年1月16日，中共吉林省委向中共中央、东北局作了关于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的报告。……由于省委领导同志长期分散，不能形成集体，因而对运动中的问题不能研究，对中央的指示无力贯彻执行。赵林同志^{【1585】}的历史问题公布并游斗以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情况更加复杂，省委工作也更加困难。”报告又称，全省八个市、地委，长春、延边、四平已经瘫痪，吉林、永吉、白城、通化地区的党委基本上也处于瘫痪状态，只有成立不久的德惠地委好些。由于省委和各级党组织瘫痪，连有些具体问题也解决不了。^{【1586】}

1月18日，中共吉林省委向中共中央、东北局报告：17日，省委和长春市委统战系统、吉林师范大学等五个群众组织，接管了省委统战部，查封了档案，封存了印鉴。同日，长春市二总部等62个单位的群众组织联合召开“长春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猛烈开火大会”，提出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向党内走资派展开夺权斗争。当日晚9时，长春市二总部与吉林省委机关的群众组织对省委实行了联合夺权，成立了接管委员会，查封了省委机关各部门，发出“六条通令”。与此同时，吉林省人民委员会、省公安厅、中共长春

【1583】空一军军史编纂委员会：《空军第一军军史》，页90-92。

【1584】何友发，1964年晋升少将。黄思沛、钟明彪、蒋克诚、贺吉祥，1955年授衔少将。黄运昌、苏俊禄、孙寅东、黄鸿瑞、何耀海、王振华、王乃征、刘金才、薛复礼、丁池，1965年大校军衔。

【1585】赵林，时任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

【1586】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吉林省委活动大事记（1966.5-1987.12）》，1990年，页38-39。

市委、长春市人民委员会等，也被‘接管’。接着，其他市、地、县也相继被“接管”。至此，夺权之风刮遍全省，各级党政机关均已瘫痪。

1月23日，吉林省军区召开支左工作座谈会。省委书记处书记阮泊生和驻长春部队首长等参加了会议。会议听取了省军区关于长春市各群众组织情况的汇报，决定表态支持一派群众组织，同时还研究了吉林省体育学校革命造反大军等群众组织的问题。会议认为，体校造大等几个群众组织是“反动组织”，经请示东北局同意，决定予以取缔。26日，吉林省军区召集长春市二总部所属群众组织的头头开会。省委书记处书记阮泊生和省公安厅的领导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研究了预定在29日召开“揭发控诉游斗三个反革命组织中一小撮暴徒大会”的有关问题。29日，长春市二总部等群众组织，在地质宫广场举行了控诉游斗大会。^{【1587】}

自1967年2月1日起，地院兵团、工大造大、光机八一五、人大红野等红卫兵组织先后退出长春市红卫兵二总部，宣布成立吉林省革命造反司令部。8日，地院兵团、工大造大等十几个群众组织召开会议，决定将吉林省革命造反司令部改为长春人民公社筹委会（简称长春公社）。2月5日，5万多名造反派在长春市人民广场举行吉林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誓师大会，宣布成立红色造反者吉林省委员会（简称省红革会）。2月14日，吉林工大造大、地院兵团、光机八一五等群众组织数千人围攻吉林省军区，高呼“军区有鬼”、“炮轰军区”等口号，要求与主管支左的军区副司令员贺吉祥辩论。2月20日，吉林师范大学红色造反兵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长春市公安系统联合总部等20个群众组织联合发起“成立吉林省东方红公社誓师大会”。自此，吉林省两大派四大组织（红革会和红卫兵二总部为一派，统称红二派，长春公社和东方红公社为一派，统称公社派或社派）正式形成。两大派群众组织间的武斗日趋频繁、激烈。^{【1588】}

2月23日，根据沈阳军区指示，由十六军、空一军和吉林省军区，组成驻长春三支支左领导小组，共同负责长春地区的三支两军。支左领导小组由王淮湘任组长，成员有汪洋、萧道生、苏俊禄、贺吉祥；后又增补何友发、马宁为成员。^{【1589】}据王淮湘后来称，支左领导小组成立初期，思想倾向上倒向二总部、红革会。后王淮湘、汪洋马宁对公社派态度有所松动，转而对两派均表示支持，惟

【1587】《中共吉林省委活动大事记（1966.5-1987.12）》，页40-41。

【1588】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志卷二·大事记》，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606-607。

【1589】《中共吉林省委活动大事记（1966.5-1987.12）》，页42。

萧道生及省军区一直支持二总部、红革会一派。支左领导小组内部有意见分歧，“七二〇事件”后，陈锡联叫王淮湘回去改错，统一认识。^{【1590】}

二、军队为稳定长春局势所作的努力

6月28日-30日，驻长春三军党委首长先后召开有吉林省红革会和长春市二总部常委参加的会议。会上，提出了准备向有关群众组织检查的“四点意见”（省体育学校革命造反大军不是反革命组织；释放原副省长张文海，让群众审查定性；长春地质学院、吉林工业大学、长春光机学院和东北人民大学的四个群众组织是“犯错误的左派”；“二二三”武斗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要平反），遭到与会者的强烈反对，迫使驻长春三军党委不得不暂时推迟向有关群众组织作检查。8月11日，汪洋代表驻长春三军党委在地质宫广场公开作《关于压制长春公社错误的检查》。^{【1591】}

8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对吉林省军区、十六军、空一军《给长春市广大革命群众的公开信》作出批示称，“中央认为，你们《给长春市广大革命群众的公开信》是正确的，你们的检讨是‘痛痛快快’的，而不是‘吞吞吐吐，扭扭捏捏’。检讨了错误，改正了错误，一定能够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拥护和欢迎。”公开信中称：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我们吉林省军区和驻长春的部队，立即响应，全力以赴，介入了地方文化大革命。半年来，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广大干部战士积极努力，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我们支持了一个革命造反派——红革会，二总部，这是对的，但是压制了另一个革命造反派——地、工、光、野和他们串连革命工人组织等成立的长春公社，这就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对于这样严重的错误，我们又迟迟没有认识，没有改正，给长春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很大曲折和严重损失，现在感到十分痛心。我们所犯的错误，主要表现在：

二月初，地院兵团、工大造大和光机八一五这几个革命群众组织，退出了二总部。我们把这件事情看重了。认为这是搞“分裂主义”。我们口头上承认地、工、光、野是造反派，实际上没有给予支持。对于地工光串连组成的长

【1590】访问王淮湘记录，2000年10月13日。

【1591】《中共吉林省委活动大事记（1966.5-1987.12）》，页49-50。

春公社更错误地看成是“分裂主义的产物”，不予承认。这样，就形成了支持一派，压制一派的错误。

长春公社在军区门前集会游行，表示对军队支左工作有意见时，我们没有反省检查自己的错误，却错误地认为这是适应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伤害了解放军的尊严。由于感情上的对立，我们就派人上街参加辩论，印发传单，以及在广播和接待来访中，都散布过“长春公社大方向错了”等错误观点，给长春公社造成了很大的舆论压力。

除舆论压力之外，我们又施加军事压力。二月二十六日，我们派部队参加了对“二二三事件的控诉大会”，并出动飞机散传单，会后又派部队参加了对“公安联总”负责人的游斗。这样做，实际上向长春公社示威，给东方红公社施加压力。

三月四日对人民解放军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出兵实行纪律制裁，抓了他们的负责人和肇事人，这不只对“红色造反团”的问题看重了，处理有错误，更严重的是使长春公社以及其他群众组织受到了很大的军事压力，一时许多群众被迫打着白旗请罪，长春公社也被压垮了。这更是极端错误的。

紧接着，我们在组织地工光整风时，又错误地提出了“三个彻底”（彻底揭发、彻底批判、彻底改组）。使“工大造大”、“地院兵团”、“光机八一五”的组织解体了。三结合筹备工作也没有吸收他们参加。

四月初，中央五条指示和军委十条命令下达以后，地、工、光、野和长春公社先后恢复了组织，我们不仅没有及时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反而认为他们还在继续犯错误。所以，对他们仍不表态支持。对他们的革命行动，甚至给予冷遇。现在检查起来，深深感到我们的姿态比革命小将低得多，我们的胸怀比革命小将窄得多。内心感到十分惭愧。

公开信又称，

“我们所犯的错误，造成的后果是很严重的。由于压制了地、工、光、野和长春公社，使二、三月份的斗批改，以后的大批判都受到了影响。我们支持一派，压制一派，使群众组织之间矛盾更加激化，并且波及到了我省的一些地区，影响了当地文化大革命的顺利开展。”

“我们所犯的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责任在吉林省军区、三〇〇九部队、七三一一部队的党委。我们所以犯如此严重的错误，根本原因是毛泽东思想伟

大红旗举得不高，没有真正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能正确地对待群众。……

总之，我们犯的错误是很严重的，教训是沉痛的。我们辜负了最高统帅毛主席，副统帅林副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的教导和信任，辜负了广大革命群众对我们的信赖和期望。在这里，我们向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认错，向受我们压制的地、工、光、野的革命小将和长春公社的广大革命群众赔礼道歉。向全市革命群众诚恳检讨，并欢迎大家对我们的错误，提出批评，监督我们改正错误。”^{【1592】}

公开信发表后，长春驻军不得不改变其支一派压一派的做法。8月19日，驻长春部队举行游行，拥护中央“八一七”批示，支持一切“革命群众组织”。8月25日，驻长春部队三军支左领导小组同长春公社常委座谈，汪洋就贯彻中央“八一七”批示问题讲了话。同日，吉林省军区和驻长春部队召开爱民大会。长春市两大派四个群众组织（吉林省红革会、长春市二总部、长春公社、吉林省东方红公社）应邀参加大会。会后，举行了游行。^{【1593】}

关于制止武斗的工作，也在努力进行之中。在军队的主导下，8月31日，长春公社、东方红公社和省、市红革会、长春市红卫兵二总部及长春卫戍区司令部5方面代表协商签订了《关于制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规定两大派组织于9月2日12时起无条件全面停火，严禁打、砸、抢、抄、抓，严禁拦路截车。9月5日，长春公社和红革会、二总部两大派群众组织与长春卫戍区司令部三方代表第二次达成《关于制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协议》规定：所有群众组织的武器一律于10日12时以前无条件地全部上交，任何组织、任何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抢夺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不准再自制武斗工具和进行武斗。9月10日，省、市红革会、二总部和长春公社、东方红公社两大派共同签订了《关于坚决执行中央“九·五”命令的若干措施的协议》，就抢劫武器，打、砸、抢、抄、抓及转移军用物资等问题制订出具体措施。9月22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长春、吉林、四平市驻军、各大派群众组织代表和阮泊生、兰干亭^{【1594】}等省委领导干部一起赴京听取中央指示，协商“拥军爱民、制止武斗，恢复生产”等问题，周恩来针对吉林省武斗情况发出三点指示：一、立即停止武斗，封存并上交各种武器、装备和

【1592】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文件汇集》第三集，页253-260。

【1593】《中共吉林省活动大事记（1966.5-1987.12）》页50-51。

【1594】兰干亭，原吉林省委书记处书记。

军用物资，立即恢复生产、交通和社会秩序；二、到京代表一定要按中央指示精神带着无产阶级党性来，不要带着小资产阶级派性来；三、各群众组织在代表协商期间，任何一方不得挑起武斗，破坏生产和交通。凡是违反者必须追究责任，代表到京是为达成协议，不是吵架。28日，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东北三省赴京代表，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要斗私批修”和“要通过大批判促进大联合、促进斗、批、改，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的指示。周恩来说：中央要求吉林问题年底前能够解决。”是日，长春卫戍司令部发出《关于立即停火和封存、收交武器的规定》。9月25日，省、市赴京代表团发出紧急倡议，要求两派群众组织立即全面无条件停火，立即就地封存武器、弹药、装备和物资，由长春卫戍司令部收缴。9月27日，驻长春部队首长召集长春公社、东方红公社、红革会、红卫兵二总部的代表开会，研究上缴武器、庆祝国庆节和释放双方被抓人员的问题。10月5日，长春公社、东方红公社、红卫兵二总部与长春卫戍司令部经过协商达成《上缴武器、恢复交通、恢复社会秩序的协议》。7日，吉林省、长春市两大派四大群众组织和长春卫戍司令部的代表在北京签订了《关于拥军爱民，制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书》。12日，上述5个方面的代表在京达成《关于退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复课闹革命的补充协议》。10月30日，长春两大派群众组织赴京代表共同作出《关于彻底上交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的规定》。《规定》上缴武器如遇阻挠或反抗时，由吉林军区和驻长部队协助强行收缴。12月3日，长春市两大派四大群众组织和长春警备区司令部的代表签订了《关于贯彻“长春市两大派群众关于彻底封存上交武器和维护社会治安的协议”的具体措施》。21日，长春市两大派组织和长春警备区司令部的代表又签订了《长春市两大派关于彻底上缴各种武器的补充协议》。两派代表都表示在年底前全部、彻底上交各种武器、弹药和其它军用物资。^[1595]

1968年1月21日，长春市两大派群众组织在北京达成《吉林省长春市两大派群众四个革命群众组织关于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24日，中共中央对《协议》作了指示：“中共中央同意并支持这个《协议》，要求两派群众组织坚决克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派性，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对《协议》要认真贯彻执行，尽快实现革命大联合。”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批准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由王淮湘任主任，阮泊生、郑季翘^[1596]、萧道生、何友发和地方革命干部2人、革命群众代表1至2人（暂缺）任副主任。在现有的

【1595】《吉林省志卷二·大事记》，页614-6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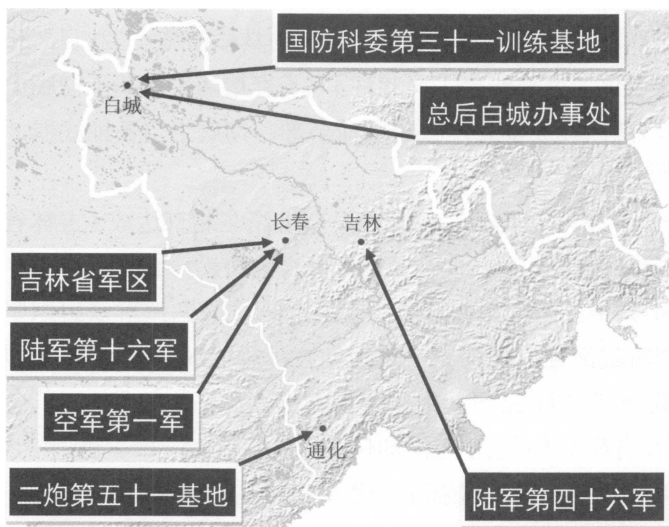
【1596】郑季翘，原吉林省委书记处书记。

五名正副主任中，军队代表三名，占60%。3月6日，吉林省和长春市革命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经沈阳军区党委批准，长春市革委会由原长春市委书记处书记任青远任主任。^{【1597】}

吉林省革委会成立时设办事组、政工组、政法组、生产指挥部。各部门负责人全为现役军人。办事组负责人为空一军副军长贾波；政工组（1968年4月改为政治部）负责人为新任省军区政委苏俊禄，后为省军区参谋长王乃征；政法组（1968年4月改为保卫组）负责人为十六军副军长徐仲禹；生产指挥部负责人为省军区副司令员蒋克诚及省军区副政委王振华。

王淮湘1967年2月起领导驻长春三军支左领导小组介入地方文革，自1968年2月起主政吉林长达九年之久。1969年9月在军内升任沈阳军区副政委兼吉林省军区第一政委、吉林省军区第一书记（仍兼十六军政委至1975年9月）。1971年3月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正式成为吉林党、政、军一号人物。中共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总体来说，王淮湘的表现算是不过不失，在他的领导之下，吉林全省大体上总算比较稳定。文革结束后于1977年2月调离吉林，5月调任武汉军区副政委。同年12月被地方追究在吉林主政期间的“严重错误和罪行”而被免职。1985年2月被开除党籍，翌年被令退休，降为军级待遇。武汉军区撤销后在广州安置，2013年2月23日在广州病逝。

吉林驻军分布图(1967-1968)



【1597】1969年1月22日，吉林省革委会常委会议决定撤销任青远长春市革委会主任职务并对其实行拘留审查；同意十六军副军长徐仲禹任长春市革委会主任。

三、吉林各地三支两军概况

1967-68年，吉林全省共有2省辖市（长春、吉林）、5专区（白城、通化、四平、德惠、永吉）、1自治州。全省三支两军大体分为五片：除长春市由十六军、空一军与省军区负责外，吉林市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由四十六军负责；白城专区由总后白城办事处负责；德惠、永吉专区由军分区、人武部单独负责；其余地区由当地驻军与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共同组成领导小组负责。

（一）通化专区

1967年6月，陆军第十六军三十二师进驻通化市，接替陆军第六十四军一九二师防务，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7月，通化地区群众组织分成通化公社与通化红革会两大派。八九月间武斗最盛。1968年2月17日，经沈阳军区党委批准，通化专区革委会成立，原通化地委书记冯骥任主任。

第二炮兵第五十一基地（总字120部队）驻通化县，未见有介入地方文革的记录。

（二）德惠专区

1968年2月20日，经沈阳军区党委批准，德惠专区革委会成立，原德惠专员公署专员李北淮任主任。

（三）永吉专区

1968年3月4日，经沈阳军区党委批准，永吉专区革委会成立，原永吉专员公署专员王万春任主任。

（四）吉林市

1967年2月，吉林市驻军军以上单位为陆军第四十六军。

陆军第四十六军 领率机关驻吉林市，代号3167部队。辖陆军第一三三师、第一三六师、第一三七师，直辖炮兵第一五一团、高炮第七十一团。军长谢正荣，政委刘光涛，副军长蔚彰、赵炳安，副政委皋峰、曹海炳，参谋长巩玉然，政治部主任崔星权。^{【1598】}

陆军第一三三师，师部位延吉市，代号3168部队。师长钱仁甫，政委李沛章。辖步兵第三九七团、第三九八团、第三九九团及炮兵第五一六团：

陆军第一三六师，师部位蛟河县，代号3180部队。师长缺（1968年后为李秀波），政委段景岳。辖步兵第四〇六团、第四〇七团、第四〇八团及炮兵第五一七团。

【1598】谢正荣，1955年授衔少将。刘光涛，1964年晋升少将。蔚彰、赵炳安、皋峰、曹海炳、崔星权，1965年大校军衔。

陆军第一三七师，师部位吉林市郊，代号3185部队。师长萧凤山，政委缺（1968年2月起李锡文）。辖步兵第四〇九团、第四一〇团、第四一一团及炮兵第五一八团。

1967年2月12日，四十六军介入地方文革，表态支持吉林市四个群众组织：省机工人革命造反大军、市广播局毛泽东思想红色广播造反大军总部、市井冈山红卫兵总部和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总部。^{【1599】}

据四十六军军史称：

当时吉林市的状况是：自1966年下半年，以学生“红卫兵”为先导，机关、工厂、企事业单位纷纷成立了群众造反组织，达十万余人。并形成了两大派系，一是市红色造反者司令部（简称“色司”），一是市革命造反大军（分学生造大、工人造大）。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已经瘫痪，群众组织间开始对立，社会秩序混乱。

我部首先抽调干部成立了“三支两军接待站”，每天接待大量前来反映情况的群众和群众组织的代表，同时又派出不少干部，走出去到各工厂、机关、学校、街道及各企事业单位调查情况。

1967年1月20日，在上海所谓“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吉林市发生了“色司”夺权，市“造大”反夺权事件。随着“造大”派的胜利，“色司”迅速解散。

当时中央连续广播了黑龙江等地军队介入、镇压反革命组织的消息，我军调查人员查到“街道造反大军”（一万人）的一些头头有各种问题，经报沈阳军区批准，于2月12日将其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后予以平反）。

……

这时农村应该进行备耕生产了，但有的基层干部被打倒，有的挨斗不干了，有的两派组织对立。生产没人管，难以搞下去。我部派出六十三个连队，共一万一千人，到农村支农，每个公社几个人。任务是下到生产队，把生产抓起来。在当时的形势下，对生产少受影响，起了很大作用。

另派部队进驻三十九个工厂、三个矿山，使生产开始回升。又派十三个连队去大庆。

为了把生产和群众生活全面地组织恢复起来，转入正常，我部派干部并吸收部分地方负责干部，建立起市生产指挥部。下设工交、财贸、文教、农林四个口，每个口都由军、师首长专门负责。这样，我部派驻党政机关、企业

【1599】吉林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市志·综述·大事记》，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页226。

单位的干部，实际上开始行使了地方政府的领导职能，扭转了吉林市及地区的无政府状态，使混乱的局面趋于稳定。

1967年4月，……吉林市的斗争加剧。一些组织于6月8日联合成立“市造反公社”。原“造大”的部分组织，又恢复了“市造大”的旗号。“造委会”派与“公社派”群众对立情绪升级，发生了电装学校等三次较大的武斗事件。这时我部的工作是制止武斗，得知消息后，立即派宣传车或部队前去宣传。当场分隔、制止，尽量防止事态扩大、防止伤人。

6月6日，中央下达制止武斗通令。但江青于7月22日提出了所谓“文攻武卫”，教唆群众组织之间互相残杀。吉林市也和外地一样，发生了到部队抢枪的风潮。连续发生了化校、航校、火烧十中等规模较大的武斗事件。“公社派”开始冲击军事机关，我部这时的工作就是制止武斗。由于我们无法从根源上解决，只能到现场制止，并要求部队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部队干部、战士被打伤的不少，有的同志为制止武斗而牺牲了。

9月，我军根据“九·五”命令，进行收缴武器的工作。至10月10日，即收缴了全部武器的百分之七十。9月中旬，我军发表了“爱民公约”，并积极做各派的工作，组成了有各派代表参加的“吉林市拥军爱民制止武斗、恢复生产监督小组”。

……

12月，我部公开发表了“给吉林市广大群众的公开信”。在充分肯定“造委会”一派群众组织的同时，指出我们犯了不少错误。有的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还检讨了“支一派、压一派”的问题。由于部队做了检讨，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群众与部队以及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但是，由于两大派长期对立、武斗，因而对立情绪并未根本消除。

1968年1月18日，造委会、造大、公社三派谈判代表在北京谈判签署了“大联合协议”。2月4日，签署了“关于成立吉林市革命委员会的协议”。3月23日，吉林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我军党委决定由副政委曹海炳出任主任。在各级普遍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同时，又按上级部署，逐步展开了清队和所谓“斗、批、改”的工作。7、8月，清队在吉林形成高潮。至年底，我部领导发现清队有严重扩大化的趋势，开始抓落实政策的工作。^{【1600】}

【1600】《陆军第四十六军军史》，页445-450。

(五) 白城专区

1967年，白城地区军级单位两个：国防科委第三十一基地（8309部队）及总后勤部白城办事处（后字201部队）。白城专区的三支两军，由总后白城办事处负责，未见三十一基地介入地方文革的资料。

总后白城办事处主任苏旺，政委沈润生，副主任姜树德，副政委王克强、王法禹，参谋长赵德才，政治部主任李长胜。1968年8月15日，吉林省革委会批准成立白城专区革委会，并同意由王克强任主任。

(六)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1967年，驻延边州师级单位三个：陆军第一三三师（3168部队）、炮兵第十师（3359部队）及沈阳军区后勤第一分部（沈字436部队）。延边州的三支两军，主要由四十六军及一三三师负责。

据四十六军军史称：

延边地处中、苏、朝交界地带，又是少数民族地区，情况较复杂。我军介入后，按中央的指示，于3月份对该地区实行军事管制。军党委决定并经沈阳军区批准，由副政委臬峰担任军管会主任。军管会的工作，除按正常请示军党委外，重大问题直接请示沈阳军区，由军区首长请示中央决定。

军管会在调查研究延吉市各群众组织性质的过程中，逐渐按“理论”统一思想，并受到窜入延边活动的学生组织和毛远新的一定影响。经报请沈阳军区批准，表态支持：“红色”（市红色造反司令部）；团结“827”（延大8.27造反派）；对“白、抗、工”（白求恩公社、抗大、工革会）“红联”（红联等）未予支持。做争取其改变观点的工作。至7、8月份，在全国形势影响下，两大派发生了抢枪和武斗升级。较严重的有“8.2”、“8.4”事件。当时“白、抗、工”一派围攻军管会、邮局、公安处、市医院，在市服务大楼等三处放火，并进行武斗。军管会派部队救火，被阻于火圈之外，被殴打和致伤致昏的干部战士达二百余人，火势蔓延烧毁的房屋面积达六万多平方米。军管会将现场情况向军区汇报，当时的军区首长直接请示了周总理，按上级指示，出动部队将放火人武装包围起来，同时向被支持的工人组织发了枪。然后做被围在两座楼内的两千人的工作。至8月16日得知，被围那一派组织要动员农民进城武斗。为避免事态扩大，遂按上级指示，支持“红色”派用武力将两座大楼攻下，双方亡六人。^{【1601】}

【1601】官方出版的《延边市志》则称，“8月2日至16日，延吉市武斗升级达到顶峰。毛远新、臬峰等人以镇压‘叛国暴乱’为由，擅自向一派群众组织发枪，把另一派数千名群众逼

为防止一些人外逃，部队在边界地带加强了部署。

年底，在吉林市公开检查的同时，军管会也对延边的“支左”做了公开检查。1968年8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革命委员会。军党委决定仍由臬峰出任主任。^{【1602】}

（七）四平专区

1967年，四平驻军师级单位为坦克第三师（3289部队）和空军第二十八师（7228部队）、空军四平基地。

坦克三师师长江丛义，政委刘川，副师长陈学祥，副政委李景章，参谋长吴纪西，政治部主任王迺康。

1967年2月，驻四平部队四平军分区、四平市人民武装部、坦克第三师、空军奉命介入地方文革，成立联合办公室。5月-7月，四平市红色造反者革委会（红革会、红色）和四平公社（公社）两大派形成。下半年至1968年6月，发生严重流血事件十余起，四平火车站办公室、候车室、电业大楼均被焚毁，总计死伤百余人。9月22日，中共中央决定，四平各派代表和部队代表立即来京听取中央指示，协商制止武斗、恢复生产等问题。1968年4月，四平三派（公社、红色、红三司）代表，由京返平，终于达成协议，成立四平专、市革命大联合委员会。8月，由驻军、“革命领导干部”、群众组织代表组成四平专、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赴长春代表团，在吉林省革委会帮助下，商谈筹建四平专、市革委会事宜。9月1日达成协议。^{【1603】}9月2日，经吉林省革委会批准，成立四平专区革委会，并同意由坦克三师师长江丛义任主任。9月3日，四平专区革委会宣告正式成立。

综上所述，吉林全省8个省辖市、专区、自治州一级革委会，由地方领导干部任第一把手的4个，占50%。由军队领导干部任第一把手的亦为4个。其中四十六个军2个，占25%，总后白城办事处1个，占12.5%。坦克三师1个，占12.5%。

进延边医学院大楼（被称为‘白宫’）实行武装镇压。在这一事件中有53人死亡，130余人致残，3000余人被俘，国家财产遭受严重损失。”见延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延吉市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4年，页32。

【1602】《陆军第四十六军军史》，页450-452。

【1603】四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平市志》，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73-74。

第八章

1967-69・下：山岳潜形

第六十七节 江苏：从军管到省革委会成立

一、江苏驻军简况

1967年3月，中央决定对江苏实行军事管制时，驻江苏军级以上军事单位（不含军事院校）共10个，分别如下：

（一）南京军区

领率机关驻南京市。司令员许世友，第一政委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兼（1967年5月任命），第七政委杜平，副司令员郭化若、张才干、王必成、刘先胜、林维先、聂凤智、钱钧、饶子健、廖容标，副政委鲍先志、周贯五，参谋长王蕴瑞，政治部主任王六生。^{【1604】}

南京军区辖区包括江苏（徐海地区除外）、浙江、安徽、上海三省一市，惟三支两军仅专管江苏，其余中央直管。

（二）南京军区空军

领率机关驻南京市。司令员聂凤智，政委江腾蛟，副司令员蔡永，副政委李赤然、王绍渊，参谋长顾前，政治部主任李道之。^{【1605】}辖空军第四军、第五军。从1967年1月起先后派出干部战士18,917人，在江苏（徐海地区除外）、浙江、安徽和上海市执行三支两军任务。^{【1606】}

（三）江苏省军区

领率机关驻镇江市，为当时全国唯一一个领率机关不在省会城市的省军区。司令员赵俊，第二政委曾如清（1967年7月调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第三政委陈茂辉，副司令员李木生、傅绍甫、刘林、钟发生、谢中光、朱传保、沈开荣，副政委张潮夫、梁辑卿、王荣光，参谋长周蔚昌，政治部主任刘超。^{【1607】}

辖盐城、扬州、南通、淮阴、苏州、镇江、徐州、南京、六合军分区及无锡市人武部，并辖独立第一师（6540部队），师长于春圃，政委章尘，独立第二师（6358部队），师长曾万标，政委刘其章。

省军区系统原则上就地就近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省军区机关负责省级机关、南京市、镇江市兼顾常州市；独一师负责南通专区、南通市及盐城专区的滨海

【1604】刘先胜、饶子健、廖容标、周贯五，1955年授衔中将。王六生，1955年授衔少将。

【1605】江腾蛟、李赤然，1955年授衔防空军少将。蔡永，1955年授衔空军少将。王绍渊，1961年晋升空军少将。李道之，1964年晋升空军少将。顾前，1965年空军大校军衔。

【1606】《中国共产党空军组织史资料丛书》第1集，页273。

【1607】赵俊、曾如清、陈茂辉、李木生、傅绍甫、张潮夫，1955年授衔少将。刘林、钟发生、梁辑卿，1961年晋升少将。谢中光、朱传保、沈开荣、王荣光、周蔚昌、刘超，1965年大校军衔。

县、陈家港；独二师参加省级机关和南京市三支两军；各军分区和市、县人武部均参加驻地地、市、县三支两军。省军区首长分工：赵俊、傅绍甫、梁辑卿参加省军管会领导工作；刘林、张潮夫参加南京市军管会工作；王荣光、刘超先后负责镇江市军管会工作。

（四）陆军第十二军

该军 1967 年 8 月调离江苏，详见本书第五十一节。

（五）陆军第二十七军

1967 年 3 月，军领率机关驻无锡市，代号 6410 部队。辖陆军第七十九师、第八十师、第八十一师。直辖炮兵第一三〇团（6304 部队）、高炮第五十二团（6306 部队）、工程建筑第一四三团（6532 部队）。军长尤太忠，政委马杰，副军长涂学忠、王珽，副政委刘传新（已调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1967 年 10 月免职），参谋长王珽兼（1967 年 8 月阎川野接任），政治部主任吴戈华。^{【1608】}

陆军第七十九师，师部位苏州市北兵营，代号 6307 部队。师长向孝书，政委王世延^{【1609】}，参谋长郭学泮，政治部主任迟浩田。辖步兵第二三五团（6308 部队）、第二三六团（6309 部队）、第二三七团（6310 部队）、炮兵第三五九团（6311 部队）及坦克自行火炮第二八四团（6312 部队）。

陆军第八十师，师部位无锡市荣巷北一公里处营房，代号 6313 部队。师长阎川野，政委叶金刚，参谋长梁凤岗，政治部主任刘祥之。辖步兵第二三八团（6314 部队）、第二三九团（6315 部队）、第二四〇团（6316 队）、炮兵第三六〇团（6317 部队）及坦克自行火炮第二八五团（6318 部队）。

陆军第八十一师，师部位镇江以南高骊山，代号 6323 部队。师长杨年伦，政委张孝先，参谋长刘云江，政治部主任于一文。辖步兵第二四一团（6324 部队）、第二四二团（6325 部队）、第二四三团（6326 部队）、炮兵第三六一团（6327 部队）及坦克自行火炮第二八六团（6328 部队）。

该军军史称，“根据南京军区指示，从（1967 年）2 月初起，本军陆续派出万余名干部战士，赴江苏省镇江、苏州两个专区的江宁、句容、扬中、武进、溧水、丹阳、高淳、丹徒、金坛、溧阳、宜兴、常熟、吴县、太仓、昆山、吴江等 16 个县和苏州、镇江、常州、无锡 4 个市的工厂、学校和人民公社执行‘三支两军’

【1608】马杰、涂学忠，1964 年晋升少将。王珽、吴戈华，1965 年大校军衔。

【1609】王世延，1965 年大校军衔。

任务。”“1969年8月，本军奉命调防河北。参加江苏省‘三支两军’的人员，除少数干部因工作需要移交江苏省军区外，其余人员即撤回本部。”^{【1610】}

1967年8月，坦克自行火炮第二八四团、第二八五团、第二八六团调归新组建的坦克第十师及南京军区装甲兵建制。

1968年2月5日，江苏省军区独立第二师调归陆军第二十七军建制。

1968年2月9日，陆军第八十师配属高炮第五十二团从无锡调往镇江地区驻防，师部驻镇江。

(六) 陆军第六十军

1967年7月，军领率机关驻南京浦口花旗营，代号6453部队。辖陆军第一七八师、第一七九师、第一八一师。直辖炮兵第一六七团（代号6471部队）、高炮第八十五团（代号6472部队）。军长朱启祥，政委杨广立，副军长吴仕宏、姚晓程，副政委滕俊卿，参谋长高士亮，政治部主任方敏。^{【1611】}

陆军第一七八师，1967年2月，奉南京军区命令，在六十军序列内组建一个陆军师，加强对霍邱城西湖农场建设。原军直辖步兵第五四三团归该师领导，代号南字415部队。6月7日，军委正式授予新组建陆军师番号为陆军第一七八师，代号6761部队（1968年2月颁布支左临时代号南字163部队）。师长郑克良，政委赵双选，副师长高玉、郭兴旺，副政委孙伯英，参谋长吴立元，政治部主任穆树振。辖步兵第五三二团（原五四三团改称，6543部队）、第五三三团（6545部队）、第五三四团（6548部队）、第五三八团（6550部队）。

陆军第一七九师，师部位安徽滁县，代号6483部队。师长武占魁，政委彭勃，副师长郭仕俊，副政委王积德，参谋长元喜，政治部主任李来水。辖步兵第五三五团（6511部队）、第五三六团（6518部队）、第五三七团（6544部队）、炮兵第五五九团（6551部队）及坦克自行火炮第二八三团（6530部队，1967年8月30日转隶新组建的坦克第九师建制）。

陆军第一八一师，师部位南京白水桥，代号6495部队（1968年2月颁布支左临时代号南字172部队）。师长姚履范，政委陈令云，副师长陈敬毅，副政委侯进，参谋长高柏林，政治部主任赵三禄。辖步兵第五四一团（6497部队）、第五四二团（6503部队）、第五四三团（6504部队）及炮兵第五八七团（6505部队）。

【1610】《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二十七集团军军史》，页412。

【1611】朱启祥、杨广立、吴仕宏，1964年晋升少将。姚晓程、滕俊卿、高士亮、方敏，1965年大校军衔。

第六十军军史称：1967年3月，一七九师在安徽滁县地区；军直和一八一师在南京浦口区、栖霞区和南京铁路局、港务局以及长江大桥等单位；新组建的一七八师在安徽六安、霍山、舒城、金寨，执行三支两军任务。1967年4月1日，六十军政委杨广立率30多名干部参加安徽省和合肥市军管会工作。1967年7月，奉军委命令，一七九师师直及五三五、五三七团进驻南京市，担负南京警备区任务。1967年9月，五三六团奉命进驻蚌埠铁路分局和南京铁路分局，以及南京港务局、津浦铁路宁蚌段沿线各主要车站执行护路、护港任务。1968年初，南京军区赋予六十军负责南京市警备和苏北淮阴、盐城、扬州、六合以及安徽霍邱等地三支两军任务，解除原担负的六安地区三支两军任务。2月9日，六十军党委具体区分了工作任务：军直和一七九师负责南京市，军抽调部分干部参加江苏省级机关三支两军，一七九师兼任南京警备区。一八一师（欠五四一团）从南京白水桥等地移防江苏淮阴地区，接替三十五师苏北地区守备，抽出人员进驻淮阴、盐城地区，师部和五四三团驻防清江市，五四二团驻防响水县陈家港，炮兵五八七团驻防盐城县，五四一团仍留南京执行迎处任务，暂归一七九师指挥。一七八师负责扬州、六合和安徽霍邱县三支两军，五三三团由城西湖农场移防扬州市，师炮兵营移防六合，师部率五三二、五三四团仍担负城西湖农场生产任务，五三八团移防安徽来安县接替一八一师生产任务。2月15日，军委、南京军区下达命令：江苏省军区所属工程处、仪征工地、江苏独立第一师（辖三个步兵团）、南通军分区守备七十团、七十五团和盐城军分区守备七十六团、工程建筑一四二团、盐城独立守备营以及十二军三十五师一〇五团，划归六十军建制领导。整个军共增加1个师、5个团、1个营和2个师级单位，总兵力达8万余人。^{【1612】}

（七）陆军第六十八军

1967年7月，军领率机关驻徐州市，代号6063部队。辖陆军第二〇二师、第二〇三师、第二〇四师，军工区，指挥守备第十八师、第二十六师。直辖炮兵第一七五团、高炮第九十三团。军长张铨秀，政委李布德，副军长吴怀才、郑统一、胡贤才，副政委刘汝贤，参谋长钟光国，政治部主任穆正身。^{【1613】}

【1612】陆军第一集团军军史编审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一集团军军史》历史卷·第六十军分册，2006年，页206-207，345-346。

【1613】张铨秀、李布德，1955年授衔少将。胡贤才，1964年晋升少将。吴怀才、郑统一、刘汝贤、钟光国、穆正身，1965年大校军衔。

陆军第二〇二师，师部位新沂县，代号 6066 部队。师长韩玉奎^[1614]，政委赵斌杰。辖步兵第六〇四团、第六〇五团、第六〇六团、炮兵第五八二团及坦克自行火炮第二〇二团。

陆军第二〇三师，师部位徐州市泰山营房，代号 6074 部队。师长于耀江，政委金波。辖步兵第六〇七团、第六〇八团、第六〇九团、炮兵第五八三团及坦克自行火炮第三三一团。

陆军第二〇四师，师部位山东临沂县，代号 6085 部队。师长李炳智，政委孙子斌。辖步兵第六一〇团、第六一一团、第六一二团及炮兵第五八四团。

军工区辖工程建筑第一七五团、第一七六团和独立工程建筑营。

守备十八师师部位连云港市，代号 6117 部队。守备二十六师师部位山东日照县，代号 6152 部队。

1975 年之前，六十八军领率机关及主要部队三个师均部署于江苏徐海地区。惟徐海地区属江苏省却被划为济南军区防区，六十八军又隶属于济南军区，同一地区军地隶属关系不同、军地互不统辖的潜在的体制性缺陷，在文革中暴露无遗，为徐海地区长期动乱的重要原因。即便独霸一方如许世友，对于本属江苏范围之内的徐海地区局势，也束手无策，难以过问。

六十八军军史称：1967 年 2 月起，该军“先后派出一百二十三个连队，二万一千多名干部战士，分别到江苏、山东、安徽三省二十九个县市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和担负陇海铁路连云港——徐州——郑州——潼关之段、京沪铁路禹城——徐州——固镇之段共一千四百二十九公里的护路任务。”1968 年 3 月，“对辖区内苏鲁两省县以上单位的公检法、邮电系统、广播电台、报社实行军事管制。4 月，我军部分干部参加中央在北京办的‘徐海班’学习至 1969 年 6 月结束。”1968 年 12 月，“二〇四师与六十七军二〇一师对调防务和改变建制领导关系，对调后，第二〇一师驻山东临沂地区原二〇四师营房，第二〇四师驻原第二〇一师营房。”^[1615]

（八）南京军区炮兵

领率机关驻南京市。司令员周纯麟，政委王展，副司令员张新华、刘昂、王荣，副政委栗彬成，参谋长魏学诚，政治部主任刘鸿益。^[1616]

【1614】韩玉奎，1965 年大校军衔。

【1615】陆军第六十八军军史编写办公室：《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六十八军军史》，1985 年，页 267、271。

【1616】周纯麟、张新华、刘昂，1955 年授衔少将。王展、栗彬成，1964 年晋升少将。王荣、刘鸿益，1965 年大校军衔。

(九) 南京军区装甲兵

领率机关驻南京市。司令员萧永银，政委谢云晖，副司令员朱鹤云，副政委王义勋、朱奎，参谋长王振邦，政治部主任江洪涛。^{【1617】}

(十) 南京军区工程兵

领率机关驻南京市。主任胡大荣，政委王建青，副主任柴书林、许德厚、黎光，副政委钟良树、张鹏展，参谋长黄振东，政治部主任白金。^{【1618】}

江苏驻军分布图(1967-1968)



二、从军管到省革委会成立

1967年2月后，江苏造反派因对“一二六”夺权持“好得很”和“好个屁”的不同立场，分裂成好派（红总派）和屁派（又称P派，八二七派），后又出现以促进两派联合为号召实际倾向好派的促联。

【1617】 萧永银、谢云晖、王义勋，1955年授衔少将。朱鹤云，1964年晋升少将。朱奎、王振邦，1965年大校军衔。

【1618】 胡大荣、王建青、黎光，1955年授衔少将。柴书林，1964年晋升少将。张鹏展、钟良树、许德厚，1965年大校军衔。

1967年3月5日,周恩来、康生等接见江苏革命造反派赴京控告团、代表团时,透露中央决定对江苏实行军事管制。周恩来称,“我们根据双方表示,觉得应在革命派联合之前,‘三结合’条件成熟之前,搞一个过渡,实质是军事管制,但不宣布,在边疆搞了也不宣布”。“现在由军区行使临时权力,这是中央肯定的,已向毛主席报告了。你们回去不要忙于在报纸上宣布,一般不宣布,贴告示,回去要把意见说清。”康生称,“刚才总理讲,实行军事管制,为什么?什么叫军事管制?就是没有肯定你们一二六夺权。”^{【1619】}

3月8日,南京军区副政委周贯五向军区党委报告称:

3月6日,赵俊、梁辑卿同志和我奉命去京接受总理指示,7日17时30分至20时40分,总理、伯达、康生同志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我们和已在北京的杜方平同志^{【1620】}。接见时在座的,还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同志。接见时,总理就江苏实行军事管制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总理指示基本精神:“一廿六”夺权没有错,军区支持是对的,主要是夺权后,造反派分裂了。

如何实行军事管制,江苏的情况比较复杂,有大军区、有省军区,而省军区又在镇江,所以军事管制委员会要由大军区、省军区合起来搞,都派些人参加。

军管会主任,由大军区派一位同志担任,如果许世友同志抓三省一市忙不过来,我提议由周贯五同志担任,副主任,我提议由省军区赵俊、梁辑卿同志担任。

实行军事管制,首先要把公安、报纸、电台、邮电、财政、交通、重要工厂接过来。

军事管制不要太公开,不登报,接管公安、报纸、电台、邮电、财政、交通,要出个布告,其他则采取内部通知的办法。^{【1621】}

3月10日,周恩来审改中共中央就江苏问题复南京军区、江苏省军区及张春桥、姚文元电报稿。电报指出:鉴于江苏省的群众组织之争一时统一不起来,三结合条件还不成熟,中央决定由南京军区和江苏省军区负责建立军管会。军管会

【1619】江苏省省级机关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总部、江苏省省级机关八·二七革命串联会编:《毛主席、党中央及中央首长关于江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汇编》,1968年3月,页13、21。

【1620】杜方平,原任南京军区政治部国防工业政治工作部部长,时该部已经撤销。1965年大校军衔。

【1621】原件存江苏省档案馆。

下设两个班子，一个抓革命，一个管生产，把工农业生产和财贸工作管起来。对重要工厂、轮渡、火车站、邮电等部门可派军代表。修改时，将原稿中“江苏的问题，由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和许世友同志商量决定”改为“江苏的一般问题，由许世友同志和江苏省军管会同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商量解决”。^[1622]

同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对江苏全省实行军事管制。江苏省军管会由杜平、张才千、周贯五、赵俊、梁辑卿、傅绍甫、刘林、吴大胜、杜方平九人组成，杜平任主任，张才千、周贯五、赵俊、梁辑卿任副主任。5月24日，增补吴大胜、杜方平为副主任。^[1623]

江苏辖7市8专区。自3月14日至3月25日，经省军管会批准，实行军管的有3个省辖市、4个专区，几占全省50%。其中南京市军管会主任由江苏省军区副司令员张潮夫担任；^[1624]无锡市军管会主任由陆军第二十七军军长尤太忠担任；常州市军管会主任由海军海航五师政委马健担任；镇江专区军管会主任由江苏省军区副政委王荣光担任；六合专区军管会主任由六合军分区司令员蓝伯庄担任；扬州专区军管会主任由扬州军分区司令员胡先汉担任；南通专区军管会主任由南通军分区第二政委姚鼎担任。^[1625]

省军管会正式成立后，屁派欢迎军管，演变为拥军派。好派不欢迎军管，演变为反军派。

董国强、魏昂德认为：军方由此被拖入地方派性冲突。这个冲突在武汉“七二〇事件”后达到高潮——好派在此期间公开提出“打倒许世友”的口号。南京军区内部一些当初帮助策动“一二六夺权”的高级军官，此时也公开支持“倒许”运动。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各驻宁军事院校和当地各大军工企业的领导人，也加入到“反许”派的行列。由于军管当局不能或不愿采取有力行动，所以街头暴动冲突在8月份完全失去控制，江苏由此陷入统治危机。最终因毛泽东的有力干预，许世友才没有垮台。毛泽东8月中旬召见许世友，明确表态支持他。毛还同时表示，不会容忍对江苏军管当局的进一步攻击。当南京军管当局的权威在毛泽

【162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页134。

【1623】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江苏省组织史资料（1922.春—1987.10）》，南京：南京出版社，1993年，页755—756。吴大胜，时任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1965年大校军衔。

【1624】南京市各区亦由南京军区各大部、各兵种派出负责干部组成军管分会。如要武区（原玄武区）军管分会主任为南京军区炮兵副司令员刘昂；遵义区（原秦淮区）军管分会主任为南京军区装甲兵副政委王义勋；红卫区（原建邺区）军管分会主任为南京军区后勤部副政委俞新华；延安区（原鼓楼区）军管分会主任为南京军区工程兵政委王建青；东方红区（原下关区）军管分会主任为南京军区副参谋长段焕竟。

【1625】《中国共产党江苏省组织史资料（1922.春—1987.10）》，页796—818。

东的直接干预下得到初步稳固后，促成当地各派势力“大联合”的问题便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626】}

1967年9月4日，红总、八二七和促联三派在以空军党委常委刘锦平为组长的中央调查组调停斡旋下，达成《关于坚决制止武斗的协议书》。9月10日，中央对此复电表示完全同意和支持，并“要求各地驻军和军管代表协助和保证各派群众组织对协议各项的贯彻执行”。自此开启了历时半年的北京谈判。

北京谈判在1968年1月方获得突破性的进展，原因在于直到此时中央才在江苏问题上明确肯定了许世友而严厉指责了好派的幕后领导人物杜方平。

1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作出批示称，“南京军区是中央所信任的，他们过去是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走的。自从他们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介入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指战员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很大的成绩。但在一个时期内，在‘支左’工人及对待军内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的处理上，也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他们已经或正在改正。在有的地区（如无锡、南京），已见到显著的成效。中央认为，这个检讨报告态度是诚恳的，认识是深刻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1627】}

1月28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接见江苏赴京代表团，周恩来在讲话中表扬南京军区、二十七军和六十军称，“南京军区是长江的门户，江、浙、皖、上海三省一市，地处重要地位。最高统帅毛主席委任许世友同志担任军区司令员，他是久经战争考验的好同志，在这一点上必须肯定。当然，部队进行四大的一些单位和地方进行革命运动的小将们不了解历史，有一个时期觉得军区犯了一些错误，提出一些意见，这是正常的。但是我们对军队同志必须有全面的认识。”“如无锡吧，二十七军过去有错误，和地方一派对立，现在也推动和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表现很好。今天不仅王斑副军长在这里，而且把尤太忠军长也请来了，他在无锡支左工作做得很好嘛！”“不但无锡的二十七军，南京的六十军工作开展的也很好，对推动南京的大联合有成绩，六十军要在支左工作中更前进一步。他们在滁州也有很大推动。所以我们也把六十军的朱军长请到会了。”“这两个军对江苏‘三支’‘两军’工作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十二军在安徽担负‘三支’‘两军’工作，所以在江苏这两个军很重要，中央正在划分他们‘三支’‘两军’地区

【1626】董国强，Andrew G.Walder：《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昨天》，2012年8月30日第8期。

【1627】《毛主席、党中央及中央首长关于江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汇编》，1968年3月，页7。

和任务。同时，江苏省军区正在开会、学习、检查工作，回去还要继续学习、检查。”^{【1628】}

周恩来、康生在讲话中点了支持好派的杜方平和支持屁派的高啸平（原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部长）的名。周恩来称，“凡是犯错误的都在军内检讨解决。有的同志错误很深，如从去年以来就不执行中央的方针，我们屡教，他就是不改，我们要点他一下名，点谁的名？就是杜方平。他的错误是严重的，康老下面还要讲的。他的派性很强，影响了地方，影响了武斗。”“总有坏人钻空子，挑动，如南大‘八二七’原来很相信高啸平，后来要他回统战部去检讨，他就不高兴了，过去把你们分成两大派，现在又在你们内部制造分裂。（康老：现在他反对曾邦元^{【1629】}啰！）现在你们撇开他，他又挑拨啰！这种人他有个人企图，个人野心，因此我们要点出来。这两个人都叫‘平’，一个是高啸平，一个是杜方平。”^{【1630】}

3月18日，中共南京军区党委向中央呈报《关于成立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3月20日，中央发出同意成立江苏省革委会的批示，称中央批准南京军区党委的请示报告，“同意许世友同志为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和报告中所提的副主任及常委名单。”军队干部的人数在革委会委员中仅占18%，但是他们垄断了所有重要领导职位。四位副主任中，除彭冲之外都是军队干部（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吴大胜、杨广立及王珽）。省革委会下设各组组长亦全为军队干部：办事组组长钱永清（南京军区后勤部司令部办公室主任）；政治工作组组长蒋科（南京军区司令部军训部部长）；政法工作组组长赵洪（南京军区军事法院副院长）；生产指挥组组长张思温（南京军区后勤部军需部部长）。南京好、屁两派最著名的领导人——文凤来和曾邦元——双双入选常委会，但都不掌握实权。文凤来仅是政工组下属的教育革命组副组长，曾邦元仅是政工组下属的文化宣传组副组长。^{【1631】}

自1968年3月始，开启了许世友在江苏主政的五年。这五年，许世友在江苏军内外的名声都不好，尤其是在江苏大抓“五一六”，伤害了无数无辜民众。这些，已是后话。

【1628】《毛主席、党中央及中央首长关于江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汇编》，1968年3月，页141-144。

【1629】曾邦元，南京大学助教，南大八·二七负责人。

【1630】《毛主席、党中央及中央首长关于江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汇编》，1968年3月，页144-145，151。

【1631】参见《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三、各地、市革委会的建立

1967年2月以后，江苏7市8专区驻军均介入地方文革，担负三支两军任务，其中实行军管的有3市4专区。1968年前后，各市、专区陆续成立革委会，革委会主任均由军人担任。

(一) 苏州市

1967年2月18日，建立以长风机械厂造反派头头华林森为召集人的毛泽东思想苏州市革命委员会（苏革会）。3月1日，苏州驻军发表支持苏革会公告。3月20日，南京军区作出承认苏革会的决定。4月后，在全市范围内形成支（支持苏革会）、踢（踢开苏革会）两大派。7月后，全市大规模武斗愈演愈烈，长达半年之久。1968年1月28日，周恩来称苏革会应该充实、扩大、调整，支、踢两派应以同等数量代表参加。此后，苏革会更名为苏州市革委会。3月25日，决定市革委会主任为陆军第七十九师师长向孝书，华林森等为副主任。



苏州武斗现场的标语。向孝书时为驻苏陆军第七十九师师长，迟浩田时为该师副政委，1967年8月。

(二) 无锡市

1967年1月夺权后，无锡市形成主力军与九二两大派，九二派受到驻军支持。6月后，两大派武斗加剧，主力军于7月3日撤离无锡，10月上中旬陆续返回。12月14日，周恩来等在北京接见后，无锡两大派达成“坚决彻底”制止武斗的协议及《关于立即上交一切武器、弹药的协议》。1968年3月4日，经中共南京军区委员会批准，无锡市革委会成立，尤太忠任主任。

(三) 盐城专区

1967年3月，盐城军分区生产办公室接替地方工作，领导全专区的革命和生产。1968年3月12日，经中共南京军区委员会批准，盐城专区革委会成立，盐城军分区司令员陈连生任主任。

(四) 六合专区

1968年3月，六合专区革委会成立，南通军分区副政委郑云清任主任。

(五) 扬州专区

1967年3月，扬州地区造反派因对“一二八”夺权产生分歧，分裂为好派和屁派，两派矛盾不断激化，最后发展为大规模武斗。10月，专区军管会及两派代表赴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11月14日，周恩来等接见两派北京谈判代表。20日，两派代表在京就制止武斗等事宜达成协议并签字。1968年2月9日后，陆军第一七八师进驻扬州负责扬州地区三支两军。3月15日，扬州专区革委会成立，一七八师政委赵双选任主任。

(六) 南京市

1968年2月，原驻南京白水桥担负南京三支两军任务的一八一师调防苏北，一七九师担负南京三支两军任务。3月23日，南京市革委会成立，杨广立任主任，六十军副政委滕俊卿任第一副主任。

(七) 南通市

1967年3月29日，经中共南京军区委员会批准，同时成立南通专区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南通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革筹会）。南通军分区副司令员车吉林为市革筹会主任。4月后，围绕对市革筹会“拥护”和“炮轰”的态度，造反派分裂为拥派和轰派，发生一连串武斗事件。1968年3月，江苏省军区独立第一师（6540部队，支左临时代号南字180部队）来通支左。3月23日，经中共南京军区委员会批准，南通专区革委会和南通市革委会同时成立，独立第一师师长于春圃任市革委会主任。

(八) 南通专区

1967年2月，南通军分区奉命介入地方文革。1968年3月23日，经中共南京军区委员会批准，成立南通专区革委会，南通军分区司令员张宝珊任主任。

(九) 常州市

1967年2月后，海航五师（4105部队）、常州市人武部等驻常部队奉命介入地方文革。3月14日，驻常部队发布公告，宣布常州主力军等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5月，驻常部队发布公告宣布对主力军组织予以平反。8月，市军管会公开

检讨在三支两军中犯了“方向、路线性的错误”。此后，常州连续发生大规模武斗事件，社会秩序混乱不堪。12月28日，周恩来等宣布常州由二十七军负责，二十七军部队随后进驻常州，参加军管，制止武斗。1968年1月19日，常州两大派赴京代表达成促进和实现大联合等协议。3月23日，中共南京军区委员会批准常州市革委会成立，陆军第八十一师政委张孝先任主任。

(十) 苏州专区

1967年3月，苏州军分区按照上级指示，成立生产办公室，领导全专区工农业生产。11月，驻苏州七十九师与苏州军分区联合成立解放军苏州专区三支领导小组生产委员会，替代原军分区生产办公室。1968年3月26日，成立苏州专区革委会，苏州军分区代司令员刘金山任主任。

(十一) 镇江专区

1967年3月15日，经江苏省军管会批准，成立镇江专区暨镇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4月，军管会改组，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刘超任主任。6月，镇江联委会成立，与三代会（筹）形成两大派。1968年1月，中央通知军管会邀两派代表到京谈判。1月17日，周恩来等在京接见驻江苏部队和镇江两派代表。2月3日，专区军管会再次改组，决定由陆军第八十师接任镇江军管工作，八十师政委叶金刚任军管会主任。3月30日，省革委会批准成立镇江专区革委会，叶金刚任主任。

(十二) 淮阴专区

1967年3月，成立淮阴军分区生产办公室，领导全专区工农业生产。1968年2月，陆军第一八一师从南京移防淮阴地区。1968年5月29日，经省革委会批准，淮阴专区革委员成立，一八一师政委陈令云任主任。

(十三) 徐州市^[1632]

1967年1月21日，徐州市委、市人委被夺权后，全市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大联筹。经六十八军党委报济南军区、南京军区批准，大联筹于3月18日在徐州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成立由军、干、群三结合组成的徐州市革委会，六十八军副政委刘汝贤任主任，史称“三一八”革委会。4月中旬，以杨正祥为首的造反派宣布退出革委会。此后围绕“踢开”还是“支持”市革委会，形成两大派造反组织，即踢派、支派，且矛盾日益尖锐。8月30日，支派宣布退出革委会，致使市革委会彻底解体。此后，徐州市由六十八军支左人员维持局面。

【1632】资料来源：中共徐州市委组织部、中共徐州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徐州市档案局：《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徐州市组织史资料》，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

第二个徐州市革委会，经六十八军党委报济南军区批准，于1968年3月1日成立，革委会主任杨正祥，六十八军副参谋长祖岳嵘等为副主任，六十八军军长张铨秀、副政委刘汝贤等为常委。市革委会的主要领导人和常委的组成，以踢派成员为主，虽给支派留了一定席位，但支派没有参加。为解决徐海地区两派群众组织大联合的问题，中共中央于4月12日发出通知，要求徐海地区县以上革委会、两派群众组织、参加三支两军工作的部队主要领导人，赴京参加中央举办的徐海地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第二个市革委会实际未开展工作。

在中央举办的徐海地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里，徐州各方代表终于在1969年7月达成大联合协议。7月27日，六十八军党委向中央、毛泽东作了徐州两派已达成联合协议，具备了改组市革委会条件的报告。29日，毛批示“照办”。8月1日，第三个徐州市革委会成立。张铨秀为主任。根据中央11月6日指示精神，徐州市革委会直属江苏省革委会领导。

（十四）徐州专区^{【1633】}

1967年2月4日，地专机关及外地驻徐的29个群众组织，成立徐州专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夺了专区的党政财文权力。夺权不久，群众组织便分裂为两大派，互相攻击，武斗频繁。3月17日，江苏省军管会指令徐州军分区成立徐州专区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临时行使对徐州专区的领导职权，徐州军分区司令员柴荣生任指挥。为统一徐海地区的三支两军工作，省军管会指示，徐州军分区的三支两军工作接受六十八军的领导。1968年8月15日，六十八军设立徐州专区生产领导小组，接替徐州专区生产指挥部的工作。1969年7月26日，六十八军党委根据两派在北京徐海地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达成的“三结合”协议，向中央上报《关于成立徐州专区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29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徐州专区革委会，柴荣生任专区革委会主任。

（十五）连云港市

1967年“一二五”夺权后，连云港市观点对立的群众组织逐渐形成公社与反到底两派，10月后，对立情绪加剧，武斗升级。11月9日，连云港市卫戍区支左指挥部成立。1968年2月21日，济南军区连云港市支左指挥部组成，军区副参谋长方正任主任。7月19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徐海班在京开学，连云港两派代表和支左指挥部及驻军代表参加学习。12月15日，中央决定济南军区连云港市支左指挥部撤销，由六十八军组织驻连部队负责连云港市三支两军工作，成立驻连部队支左领导小组，守备第十八师师长亓庆标任组

【1633】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徐州市组织史资料》，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

长。1969年7月22日,连云港两派代表和驻连支左领导小组代表在京签订《连云港两派革命群众关于停止武斗、上缴武器、归口闹革命的方案》。8月1日,经周恩来批准,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连云港班在京开办。8月上旬,连云港市开始收缴群众武斗的枪支弹药,至9月底,全市武斗基本停止,社会秩序日渐好转。9月2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连云港市革委会成立,亓庆标任主任。这是江苏省内最迟成立的地、市级革委会。

以上15个地、市级革委会,第一把手全部由现役军人担任。其中省军区系统6个,占40%;二十七军4个,占27%;六十军3个,占20%;六十八军2个,占13%。

第六十八节 宁夏:康健民率部入宁与“青铜峡事件”

一、宁夏驻军简况

1967年初,宁夏回族自治区面积6.6万平方公里,为全国面积最小的省区。其驻军数量亦少,仅为1省级军区及所辖1独立师和野战部队3个团。

(一) 宁夏军区

领率机关驻自治区首府银川市。所辖军分区仅1个——固原军分区,1独立师及直辖2市(银川、石嘴山)11县人武部。司令员朱声达,副司令员张怀礼、陈阳春、刘德夫、赵炳伦,副政委江波、马克,参谋长陈阳春兼,政治部主任向辉宇。^{【1634】}

宁夏军区独立师,1966年7月由宁夏公安总队改编,师部驻银川市,代号8137部队,师长涂宗德,政委缺。下辖步兵第一、第二、第三团。步兵第一团(8128部队)由宁夏军区步兵第六团改编,驻银川市。步兵第二团(8129部队)由宁夏公安总队直属团改编,驻平罗县城。步兵第三团(8130部队)由银川公安支队改编,驻银川市。其部队主要分布在银川、石嘴山、惠农农场、平罗潮湖农场及吴忠、中宁、中卫、青铜峡等地执行警卫、守卫、看押等任务。

(二) 陆军第六十二师驻宁部队

1967年8月以前,陆军第六十二师师部驻甘肃平凉县,代号8037部队。所辖步兵第一八五团(8047部队)自1961年7月即驻宁夏青铜峡市。步兵第一八六团(8048部队)自1962年9月驻宁夏固原地区。炮兵第三四二团(8050部队)自1966年9月驻宁夏西大滩执行垦荒生产任务。另所辖步兵第一八一团(8046部队)

【1634】朱声达,1955年授衔少将。赵炳伦、江波,1961年晋升少将。张怀礼、陈阳春、刘德夫、马克、向辉宇,1965年大校军衔。

在兰州市支左。该师虽在1967年2月已由兰州军区归还二十一军建制，惟二十一军对其只管部队工作，其三支两军任务则由兰州军区直接领导。

宁夏驻军分布图(1967-1968)



二、从夺权到康健民率部入宁

在上海“一月革命”的感召下，1月25日，《宁夏日报》发表了银川地区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等二十二个组织的《紧急通知》，声称“坚决开展全面的夺权斗争”，并于当日组成了宁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联委会)。1月27日，联委会夺了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的党、政、财、文大权。同时，还接管了银川市的党、政、财、文大权。联委会在“夺权公告”中宣称：“一切领导权，由本联合委员会接管，委员会下设文化革命委员会和

生产建设委员会。”此后，夺权之风刮遍宁夏各地。^{【1635】}宁夏夺权并未得到中央的承认。

1月27日，宁夏军区党委决定支持“宁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派部队参加宁夏夺权庆祝大会，并指派副司令员张怀礼参加宁夏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工作。2月5日，宁夏军区派部队参加宁夏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召开的巩固夺权斗争胜利大会。2月11日，宁夏军区决定退出宁夏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召回张怀礼副司令员，并发表关于撤销对宁夏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的一切支持和援助声明。同时，对自治区公安厅、银川市公安局、宁夏日报社、宁夏人民广播电台、银川市有线广播站、农建十三师实行军事管制。自撤销对宁夏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的支持后，宁夏军区转而支持宁夏革命大联合筹备处。^{【1636】}

3月10日，保守派群众组织银川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处（筹备处）成立。3月12日，宁夏军区表态支持筹备处。3月18日，造反派群众组织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总指挥部）成立。6月19日，宁夏地区第一次较大规模的群众武斗在石嘴山市发生。^{【1637】}

7月26日，筹备处更名为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处（仍简称筹备处）。8月1日，总指挥部调集石嘴山工人造反组织等攻打筹备处所在地银川西塔，将筹备处赶出银川。8月8日，总指挥部、筹备处两派在永宁县大观桥发生大规模枪战，武斗进一步升级。随后又在永宁、吴忠、银川、平罗等地发生大规模武斗。

自7月下旬，宁夏军区司令员朱声达赴兰州向军区党委汇报。据朱称，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拒不接见他。8月8日永宁武斗后，冼称是“朱声达开了枪”。次日，朱从兰州返回银川，动用战备密码，以个人名义向中央发报，请求到中央汇报宁夏文革情况。

8月12日，由于中央认为宁夏军区在三支两军中犯了“严重方向路线性的错误”，遂派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康健民率8037、8119部队，^{【1638】}接替宁夏军区，负责宁夏三支两军工作。并重新建立了以康健民为组长、张怀礼、徐洪学为副组长

【1635】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党校、宁夏回族自治区档案馆：《中共宁夏党史大事记》，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361。

【1636】宁夏军事志编纂委员会：《宁夏军事志》下，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967。宁夏军区退出联委会时间原书为2月21日，根据《中共宁夏党史大事记》改为2月11日。

【1637】《中共宁夏党史大事记》，页361-362。

【1638】康健民，1955年授衔少将。8119部队为炮兵第十五师炮兵第八团的代号。1967年9月该团由原驻地甘肃进驻贺兰县、永宁县执行三支两军任务。

的支左领导小组。8037、8199 部队表态支持宁夏总指挥部，并于 18 日撤销了对筹备处的支持。^{【1639】}

8 月 14 日至 12 月底，宁夏军区司令员朱声达，副司令员陈阳春、张怀礼，副政委江波、马克，副参谋长刘恒业，政治部主任向辉宇、副主任何其仁、乔克广，后勤部副政委薛文亨，独立师师长涂宗德、副政委王兴云，固原军分区政委田有胜以及机关和团以上单位的有关人员共 47 人，在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解决宁夏问题的会议。在此期间，根据兰州军区指示，宁夏军区系统暂时停止三支两军工作，机关进行整顿。^{【1640】}

三、“青铜峡事件”

8 月 12 日，陆军第六十二师奉命在师长姜玉安、政委李天冲、副师长徐洪学、副政委孟移山、参谋长王晨光、政治部主任赵书堂率领下，担负宁夏大部分地区的“制止武斗，稳定局势，保护左派”任务。基本部署为：师部带步兵第一八五团进驻银川市，步兵第一八六团进驻吴忠、灵武、青铜峡地区，炮兵第三四二团进驻平罗、石嘴山地区。^{【1641】}该师前指于 12 日 18 时进抵银川，一八五团、炮兵三四二团移防亦称顺利，惟一八六团进驻途中受阻。

时一八六团团团长王林，政委许昌其。据许昌其在 2002 年对笔者称：

在驻固原期间，一八六团原倾向于保守派“筹备处”。师里通知我团，说我们支左支错了，要转观点，支持造反派“总指挥部”。团主要领导一时转不过弯来，全团上下也转不过弯，但通知下来，只得执行。

8 月中，我团奉命由固原进驻吴忠支左。开始去了两个营，一个营留守固原。当部队行进至离吴忠约二十公里处时，被保守派“筹备处”围住，不能前进。保守派听到风声，说我们到吴忠是支持“总指挥部”的，“筹备处”发动支持他们一派的农民，睡在公路上，我们整整一天都前进不了。请示师里，师里也不回电话，到晚上，派团副参谋长和保守派谈判，未有结果。师政治部副主任正好因事经过此地，要他再请示师里，亦无回音，团党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不能动武。

被围困的地方，叫高米子湾，是一公路岔口，离青铜峡大坝下的一八五团团部原驻地约七八公里。一八五团主力已随师部进驻银川，原驻地仅有小部分

【1639】《中共宁夏党史大事记》，页 362。

【1640】《宁夏军事志》下，页 967。

【1641】兰州军区守备师师史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守备师（原陆军第六十二师）师史》，1992 年，页 174。

人留守。拂晓时分，我们团领导决定部队突围到一八五团团部，刚走不到两公里，就被堵住了，农民们睡在公路上，还挖了坑。至中午，勉强前进到一八五团团部驻地，农民又围了上来，干部战士情绪很大。而保守派甚至扬言如果部队再往前开，就要炸掉大坝。为防不测，我率团基本指挥所在大坝上警卫，团长则留守在大坝下的团部。

8月28日傍晚，徐洪学来电话，要求作好反击准备，中央有电报，马上会转到。晚上九时至十时左右，六十二师转军委电报，要求要出击，坚决打下去。我命令枪朝天打，但部分干部战士有情绪，混乱中向群众开了枪，造成在大坝上的部分群众死伤，死了四十多人。^[1642]

一开枪，不仅是青铜峡，整个宁夏都平静下来了。^[1643]

“青铜峡事件”的特殊性在于：文革中与军队发生流血冲突的，普遍都是造反派，而“青铜峡事件”中部队开枪打死打伤的，却是保守派。

洗恒汉文革后回忆道：“后来搞清楚，由于派性，当时宁夏的一派群众组织企图以暴力手段制造事端，胁迫驻宁夏的支左部队和兰州军区乃至中央来支持他们。所以，扬言要爆炸青铜峡水库的大坝，造成黄河决口，淹没下游。”^[1644]洗未指明的是，所谓“当时宁夏的一派群众组织”，实际上就是保守派筹备处。

至于北京方面的态度，洗恒汉在回忆中说：“收到六十二师报告的当天晚上，我召开军区常委会议，常委们一致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将宁夏的原电报转报中央。第二天深夜，总理亲自给我打来电话，听得出来总理非常着急，他说，报告收到了，你们提个处理意见报中央。要驻宁夏部队派人守护大坝，决不能发生爆炸事件。”兰州军区随即报送的处理意见中提及，如有人不听鸣枪警告继续进行爆破活动，并在部队阻止当中有人开枪向部队射击时，“部队可以还击”。

洗又说：“到了八月二十八日凌晨，康生给我打来电话说：‘总理委托我叫我给你打个电话，你们关于青铜峡的处理意见报告，中央收到了，毛主席也看了，政治局也研究了。中央同意你们的意见。’我接到电话后，又立即召开党委常委会

[1642] 据官方资料，群众死亡104人，伤残133人。见青铜峡军事志编纂委员会：《青铜峡军事志》，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页25。

[1643] 访问许昌其谈话记录，2002年9月12日，西安。许昌其的仕途并未受青铜峡开枪事件影响，1969年10月后历任师政治部主任、总政组织部处长、师政委、军政治部主任、军顾问，1988年离休。

[1644] 洗恒汉：《风雨八十载》节选，下同。 <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09/09/21135.html>。最后访问：2020年4月13日。

进行了传达，并且立即把中央的决定和军区的意见告诉了宁夏支左领导小组康健民、徐洪学同志。”

冼又说：“后来听汇报说，在部队对空鸣枪警告后，一些群众仍不停止爆破活动，准备炸坝，并且群众中有人向部队开枪射击，有两名战士倒下，在这种情况下，部队指挥员被迫下令开枪还击，一场流血事件没有避免。”而现场指挥的许昌其在回忆中，并没有指筹备处有“准备炸坝”的实际行动（只有“扬言”），也没有群众“向部队开枪射击，有两名战士倒下”这样的严重情节。惟在当时的紧张氛围之下，筹备处一派某些人的“扬言”，足以害死自己。

四、从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到宁夏革委会的成立

12月9日，在支左部队领导下，由宁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宁三司）、宁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宁总司）、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处（革命造反派）（筹革造）、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总指挥部）四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在京共同签订了《关于实现宁夏革命大联合的协议》。

12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毛泽东批示“照办”的《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全文如下：

（一）宁夏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广大革命群众同杨静仁，马玉槐^{【1645】}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于一月二十七日夺了他们的权。

现在，宁夏各派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在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教育和帮助下，在京签订了《关于停止互相攻击、收缴武器、制止武斗的协议》和《关于实现宁夏革命大联合的协议》。中央认为，这两个协议很好。希望各革命群众组织在宁夏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保证贯彻执行。

（二）宁夏军区党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个错误应由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朱声达同志负主要责任。宁夏军区党委对他们的错误的检查是好的，态度是诚恳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朱声达同志经过中央的批评教育和群众的帮助，作了检讨，表示愿意改正错误，中央欢迎他这种态度。^{【1646】}

【1645】杨静仁，原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人委主席。马玉槐，原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委党组书记、副主席。

【1646】1968年元月，中央让朱声达到北京空军学院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宁夏班接受批判教育。7月间又到海运仓总参招待站继续检查“错误”。1969年10月被下放到陕西省

(三) 中央派到宁夏支左的六十二师等部队, 做了许多工作,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希望他们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做好“三支、两军”工作,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立新功。

(四) 宁夏地处边疆, 又是少数民族地区, 阶级斗争是尖锐的, 情况是复杂的。广大革命群众和全体指战员应当积极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 加强革命群众之间的团结, 加强军民之间的团结, 提高革命警惕性, 严防美蒋、苏修、蒙修特务的破坏活动。

(五) 中央决定建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由康健民、张怀礼、徐洪学、王志强、李天冲、许冲波、乔克广、李江烈、丁毅民、陈养山同志^[1647]以及革命群众组织代表若干人组成。康健民同志任组长, 张怀礼、徐洪学、王志强同志任副组长。筹备小组中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 应按革命大联合的精神协商提出, 报中央批准后参加。

各革命群众组织都要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直接领导下, 认真学习和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学习林副主席“八九”重要讲话和江青同志“九五”重要讲话, 以“斗私, 批修”为纲, 开展革命的大批判, 逐步实现按系统、按单位、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 搞好革命的三结合和本单位的斗批改, 抓革命, 促生产, 把宁夏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1648]

1968年2月20日, 经兰州军区批准, 银川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由第六十二师后勤部政委张晓林任主任。

3月20日, 经兰州军区批准, 石嘴山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炮兵第三四二团团团长于学进任主任。

3月21日, 兰州军区党委发布《关于组成宁夏军区临时党委的决定》, 由张怀礼、赵炳伦、刘德夫、陈阳春、向辉宇、乔克广、贾继毅^[1649]、薛文亭等任委员, 张怀礼任书记。

蒲城县独立师农场强迫劳动4年。1973年10月降任甘肃省军区副司令员。文革结束后于1979年2月为青铜峡“反革命叛乱事件”平反。1979年后任甘肃省军区顾问组组长和甘肃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1983年10月离休。1985年1月中央军委下达了撤销降职命令和晋升正兵团职(从1983年10月离职休养算起)的命令, 同月21日在兰州病逝。

【1647】 王志强, 原自治区交通局副局长。许冲波, 炮兵第十五师政委。李江烈, 原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丁毅民, 原自治区建工局局长。陈养山, 原自治区人委副主席。

【1648】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政工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一)》, 1968年8月, 页889-892。

【1649】 贾继毅, 时任宁夏军区后勤部副政委, 1968年6月任宁夏军区独立师政委。

4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作出毛泽东批示“照办”的《关于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称：“中央同意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三月二十三日关于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中央同意宁夏革命委员会由八十一名委员组成，同意报告中所提的革命委员会委员和常委的名单，同意由康健民同志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怀礼、徐洪学、王志强、安建国同志^{【1650】}任副主任，另留两名副主任的名额，待以后增补。中央热烈祝贺宁夏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宁夏驻军和宁夏军区广大指战员，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指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651】}

4月10日，在银川召开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大会发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不到长城非好汉——热烈欢呼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社论。在庆祝大会上，革委会主任康健民发表了《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宁夏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讲话，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宁夏军区副司令员张怀礼发表了《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讲话。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宁夏驻军支左小组组长徐洪学发表了《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坚决保卫红色政权》的讲话。

8月21日，自治区革委会发出《关于成立固原专区革命委员会的指示》，固原军分区司令员李凯国任专区革委会主任。

第六十九节 陕西：驻陕部队的三支两军

一、陕西驻军简况

1967年5月至1968年5月，陕西省内军以上军事单位（不包括军事院校）共4个，其领率机关集中于西安市内。

（一）陕西省军区

领率机关驻西安市。司令员黄经耀，第二政委袁克服，第三政委谷凤鸣，副司令员闵洪友、王明坤、孙光、徐立树、邢荣杰、胡德利、熊光焰、苏锦章（1967

【1650】安建国，宁夏大学数学系毕业学生，宁夏总指挥部总指挥。

【1651】《关于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1968年4月4日。中发[68]55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1968年4月6日发出。康健民任宁夏党、政一把手接近九年，1977年1月18日因患心脏病突然恶化，经多方抢救无效，在银川逝世，终年六十岁。

年7月任命)、黄传龙(1967年7月任命),副政委李一松、吕明浩,参谋长刘德琛,政治部主任康应中。^{【1652】}辖榆林、延安、渭南、咸阳、宝鸡、西安、商洛、汉中、安康军分区及铜川市人武部(1968年2月由省军区直辖),并辖陕西省军区独立师(8134部队),师长黄传龙,政委萧秉公。

(二) 兰州军区空军

领率机关驻西安市。司令员杨焕民,政委关盛志,副司令员袁学凯、杨思禄、方升普,副政委刘镇,参谋长郭健,政治部主任张翼。^{【1653】}部队分布于西北及西藏六省区。所属军级单位为驻新疆的空九军,师级单位有空六师、空二十五师、空三十六师,空军高炮第十一、十二、十三师,第五、第十六航空学校,空军通信学校,空军和田、拉萨指挥所等。截止1969年底,共有17,521人(其中干部3,700多人)到1,796个单位三支两军。^{【1654】}

(三) 陆军第二十一军

领率机关1967年2月移驻西安市后,军长仍为胡炜,副政委刘建功1967年7月接替施义之任政委,副军长彭思忠、刘江亭不变,苏锦章1967年7月调任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参谋长马友里、政治部主任梁济民不变。在陕西省内的两个师,陆军第六十一师师部位西安市,六十三师师部位宝鸡市。

(四) 总后西安办事处

领率机关驻西安市,军级单位,代号后字203部队。总后驻西安地区的办事机构,又是该地区后方基地指挥机关。所属单位主要是工程建筑、汽车部队和后方仓库、医院等,分别驻陕西、河南两省境内的陇海铁路沿线。主任白辛夫,政委缺,副主任陈毅斋、李德安、魏文建、徐元彬、王茂发,副政委阎子庆、李孔亮,参谋长王拱,政治部主任刘琨如。^{【16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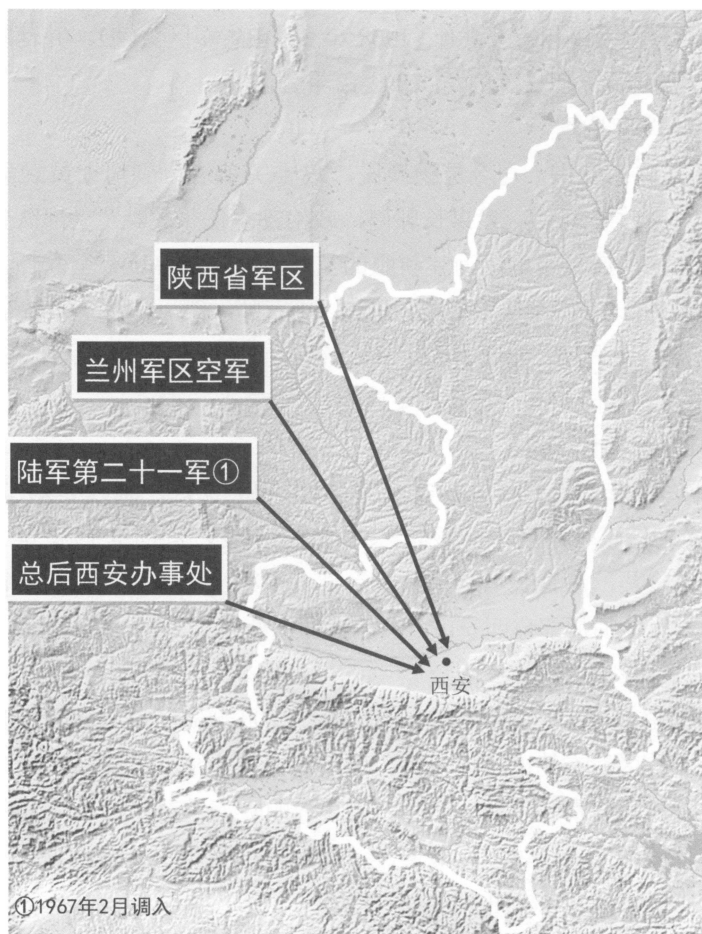
【1652】袁克服、闵洪友、王明坤、孙光,1955年授衔少将。黄经耀,1961年晋升少将。邢荣杰、苏锦章,1964年晋升少将。谷凤鸣、徐立树、胡德利、熊光焰、黄传龙、康应中,1965年大校军衔。

【1653】杨焕民、关盛志、袁学凯,1955年授衔空军少将。方升普,1955年授衔防空军少将。杨思禄、刘镇,1961年晋升空军少将。张翼,1964年晋升空军少将。郭健,1965年空军大校军衔。

【1654】《中国共产党空军组织史资料丛书》第1集,页212。

【1655】白辛夫、李孔亮,1964年晋升少将。李德安、魏文建、阎子庆、陈毅斋、徐元彬,1965年大校军衔。

陕西驻军分布图(1967-1968)



二、陕西驻军介入文革

胡炜晚年回忆道：“二十一军部队到达西安地区时，面临的情况是：群众组织已分裂为对立的两大派，他们开大会，搞大游行，壮大自己的声势；搞大辩论，相互攻击，显示自己的正确。1967年1月底，全省已自上而下地夺了权，党政机构全部瘫痪，各级领导干部均靠边站，许多同志遭揪斗，极少数领导干部公开表态，支持这派或那派，大多数没有公开表态，但思想上都有明显的倾向性，一般的是倾向于保自己的一派群众组织；省军区、兰空、西办机关的‘四大’刚停止，机关干部也都分为两派，又都和地方上的两派分别联在一起。二十一军未到西安前，西安地区的支左工作，先由省军区统管，军区和西办机关的多数派支

持东派，兰空机关的多数派支持西派，省军区还根据东派提供的材料，抓了几个西派在基层单位的头头引起西派很大不满。当时的情况十分复杂。”^{【1656】}

3月2日，经兰州军区党委批准，“西安地区驻军支援左派统一指挥部”（简称支左统一指挥部）成立。支左统一指挥部由陕西省军区、兰州军区空军、陆军二十一军共同组成。胡炜、黄经耀、杨焕民三人任指挥，成员有袁克服、孙光、刘建功、方升普等人。3月9日，该指挥部改名为“西安驻军支援无产阶级革命派统一指挥部”（不久又改称“陕西省军区、驻陕部队支左委员会”），并增加王明坤、徐立树、苏锦章、刘江亭、白辛夫等为指挥部成员。^{【1657】}

3月6日，陕西省保卫工作会议召开，研究和布置“镇反”工作。全省自1月20日至4月15日，共逮捕774人，拘留809人，其中把一部分造反组织及其成员定为反革命。4月25日，指挥部召开办公会议认为，当前政法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捕人过多。其原因是办案不准，处理草率，手续马虎，任意宣布群众组织为反动组织，会议指出，要加强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军分区党委要切实把政法工作抓起来，会议还指出，哪一级批办错了的，由哪一级负责纠正。^{【1658】}

3月7日，陕西省军区对西安铁路局实行军事管制。3月9日，又对省广播事业管理局、省电台、市电台、西安电视台、西安晚报社、东方红广播站实行军事管制。^{【1659】}

3月8日，“西安大专院校革命师生训练指挥部”成立，该指挥部是由陕西省军区、二十一军、兰州军区空军、总后驻西安办事处联合组成的。指挥部领导小组由8人组成，他们是：二十一军副军长刘江亭、省军区副参谋长王辉、兰空训练部副部长储孔玉、西办副主任陈毅斋、六十三师政委魏宏武、二十一军炮兵副主任施夫俊等。领导小组组长刘江亭，副组长王辉、储孔玉、陈毅斋。办公室设在二十一军军部。3月15日至18日，“西安驻军支援无产阶级革命派统一指挥部”抽调解放军干部、战士2,059名，进入交大、西工大、西军电、冶院4所院校开展军训。4月，西军电，交大等校军训先后结束。至10月，西安矿院、西安石油学院、陕西师范大学等院校军训工作也先后结束。^{【1660】}

【1656】胡炜：《征程纪事》续集，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5年，页25。

【1657】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大事记》，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页463。

【1658】《陕西省志·大事记》，页463-464。

【1659】《陕西省志·大事记》，页464。

【1660】《陕西省志·大事记》，页464。

3月12日，“西安驻军支援无产阶级革命派统一指挥部”决定：由二十一军派出57名干部和一个连队分别进驻省、市委办公厅、工交政治部及省、市各工业局等31个部门，并由二十一军副军长苏锦章、参谋长马友里、西安军分区副司令员刘文华等和分管工业的省委书记萧纯、副省长惠世恭、西安市委书记薛焰、颜志敏及3名副市长分别建立了省、市工业领导小组，即日起开始办公。^{【1661】}

4月23日，毛泽东批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编印的《快报》第1940号登载的《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该材料称，陕西军区司令员黄经耀、政委袁克服，驻陕部队首长胡炜等负责同志，四月中旬以来，连续召集西工大和西电革命派、交大文革总会代表座谈，听取他们对支左问题的意见和批评。座谈中，同学们批评了部队在前段支左工作中，旗帜不鲜明，调查研究不够，没有支持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有的还支持保守派组织，压制革命派。批评部队没有把训练内容和西安地区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而是“采取压制的与世隔绝的方法”，搞“关门军训”，所以训练过程中几次出现贴军队大字报高潮，说部队“在学校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等。在这段话后面，毛加括号注“不要怕批评，全军在这种批评过程中，将会正确地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毛并在这期《快报》的报头上批示：“林彪、恩来同志：建议将此件印发军委扩大会各同志。军队这样做是很正确的，希望全军都采取此种做法。”^{【1662】}

胡炜称：

6月下旬以后，在两派对立斗争中，出现了新的情况和问题。第一，两派对中央和总理的指示，各取所需，表面拥护，暗中都在挖对方的墙角，发展自己的势力，争取在大联合中处于优势地位，两派的对立，有所加剧。第二，两派都采取拉、压两手争取军队的支持。支左开始后，省军区、西办的机关多数派同志支持东派，压了西派，二十军部队到达后，支左委员会对两派采取同等对待的态度。这样，西派从受压中喘了一口气，东派则感到不满。四家派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执行支左委员会五项要求方面也不尽如人意，省军区、西办派出的多数支左人员仍暗中支持东派，兰空派出的多数支左人员则暗中支持西派，二十一军派到韩森寨几个国防工厂的支左人员也轻率地表态支持这些单位的西派，更引起东派的不满，这样就出现了“各支各的左，各拥各的军”的情况，东派乃大造支左委员会、二十一军支一派压一派的舆论。第

【1661】《陕西省志·大事记》。页464。

【1662】东方红农业大学东方红公社主办：《东方红战报》第48号，1967年6月1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318-320。

三，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一种说法：河南、四川、甘肃都很乱，西安这样平静很不正常。两派中均有些头头想大乱一下，以便在乱中压倒对方，使本派取得优势。在上述情况下，接连出现了一系列严重问题：7月6日晨，西安大街上出现了很多针对胡炜和二十一军的大标语，如“胡炜不执行周总理的指示，罪该万死”，“打倒胡长官，解放西安解放陕西”，“坚决反对二十一军支一派、压一派”，等等，上午10时，交大300余人举着画有黑心的标牌拥到支左委员会办公室，要找胡炜出来谈心。7月中旬，西派200人冲到省军区黄经耀司令、袁克服政委的住地，要求释放国棉二厂的头头王文，交大随即组织了一批人到那里绝食，坚决反对释放王文。武汉“七二〇”事件后，交大组织一批人冲击了四家部队的游行队伍，西派则组织一批人冲击了152炮校（军队搞四大单位，东派在该校占优势）的游行队伍。8月5日，东派组织了约万人到二十一军军部前静坐，有百余人冲入军部大院内，同时组织万多人到支左委员会联络组办公地点静坐，对支左委员会和二十一军施加压力，西派则乘机打出拥军的旗号，多次组织数万人游行，高喊“谁反军绝无好下场”。西派游行队伍向东派的人扔西瓜皮、吐口水。这就是有名的西安“八五静坐”。部队不分昼夜耐心地做静坐群众的工作，给他们送水送饭，派医务人员给他们看病送药，搭帐篷为他们遮雨避暑，同他们谈心听取意见，同时派部队把西派和围观的群众和静坐群众隔开，劝阻西派不要冲击和侮辱静坐群众。在部队正确对待和耐心工作下，静坐群众也自知理亏，到八月底，静坐的只剩下二、三百人。为报复西派，9月1日夜，东派组织了2000余人攻打西派占优势的庆安公司，西派也作了相应的准备，我们得知此情况后，于当晚紧急找两派头头开会，要求他们停止武斗行动。双方互相指责争吵后，经说服教育，才在停止武斗协议上签字。但是会后，他们仍按原计划武斗，双方从下半夜打到天亮，共伤亡四十余人。这就是“九二武斗”，是西安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较大武斗事件。在两派严重对立的情况下，四家部队内部的分歧也明朗化，省军区独立师公开表态反对“八五静坐”，省军区机关、西办机关的一批机关干部在个别领导干部暗中支持下，续公开贴出了支持“八五静坐”的大字报和大标语，支左委员会领导同志的认识和行动始终是一致的。西安的形势影响到铜川（铜川219派倾向东派，212派倾向西派），在东派大反二十一军的情况下，二十一军派到铜川各矿支左的人员，倾向于212派，引起了219派的不满，两派斗争加剧，煤炭生产大幅度下降，日产仅千吨左右，西安电厂有时存煤仅够两天用，随时可能发生停电。支左委员会对铜川情况了解不够，轻信支左人员反映的情况，

出于要把煤炭生产搞上去的考虑，遂以省军区和驻军的名义发出了《8.20 通告》，支持了一派，致铜川形势更加恶化，以后派二十一军参谋长马友里同志代表支左委员会到铜川召开大会，公开承认错误，宣布撤销《8.20 通告》，形势才逐步好转起来。面对当前严峻复杂的形势，支左委员会不断对形势进行分析研究，及时向中央报告，采取多种形式作两派头头的工作，严格要求各家部队按支左委员会的五项要求办事。面对一派对二十一军的压力，军党委要求部队和军宣队坚决克服并防止倾向性和急躁情绪，对群众的任何言行都要正确对待，耐心做群众工作，绝不允许感情用事。8月17日夜，关锋打电话对我说：“西安一派群众搞静坐，苗头很好，形势很好，躲在后面的人，很快就会跳出来了，你们要抓着大好时机，把工作做好。”我不了解关锋其人，只知道他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我们的三支两军工作，从一开始就是在总理的关怀和领导下进行的，中央文革未指派任何人过问陕西的事。关锋突然打电话，似有要我们搞垮一派，揪出所谓“幕后”的意思，若按他讲的办，将会造成严重后果，当时个别领导同志也有搞垮一派的想想法，若传达关锋的电话，可能会引起一些思想混乱。此事只有我和当时在旁听电话的二十一军党委秘书卢念足同志知道，我考虑再三，决定不向任何人传达。我们坚决贯彻执行总理的指示，对两派一视同仁，耐心做群众工作，促进大联合这里要指出的是，宝鸡市和宝鸡地区也都是两派，但一派占绝对优势，六十三师能正确对待两派，特别是对少数派给予多方照顾，工作做得较细致，因之，宝鸡地区的形势比较稳定，未受西安形势的影响。在西安地区形势最严峻的七、八月份，我的肝部经常隐隐作痛，经四医大检查，怀疑是肝癌，军党委上报后，军党委批准我到上海检查治病。当时黄已因病住院，支左委员会的工作，主要靠我主持，我若离开，工作怎么办呢！在危急的时刻，我绝不能临阵脱逃，坚持不去外地治病，躺在沙发上坚持工作，这对渡过那段困难时期是有积极作用的。

周总理对西安的形势非常关心，大力支持我们的工作，针对东派对黄、胡施压的情况，中央8月10日发出明码电报说：“黄经耀、胡焯同志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同志，两派群众组织要支持他们的工作。”不久又给铜川市两派群众发出明码电报，号召他们“要抓革命促生产，把煤炭生产搞上去”。9月初，东派要抢咸阳302国库的武器，总理深夜来电话告我要派部队严加保护，制止对方抢夺国库的武器。又由总理联络员办公室直接给交大头头李世英打电话，责成李立即到咸阳把要抢武器的群众撤回。9月上旬，总理指示把东派各组织的20多个头头调到北京学习，先后两次接见他们，对他们进行批

评教育。这样，在二十一军军部和支左委员会联络组门前静坐的群众，被迫于9月19日全部撤回，那时在军部门前静坐的只有80多人了。9月中旬，总理要黄、胡到北京汇报情况，做东派头头的工作，15日下午，总理接见黄、胡，听取了简要汇报，指示我们要认真学习、宣传、贯彻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重要指示，抓紧做好两派的联合工作。根据毛主席关于“地方的问题在军队，军队的问题在工作”的指示，中央、总理要西安四家部队的主要领导同志和负责支左工作的领导同志到北京开会，粟裕、杨成武、冼恒汉同志还有邱会作代表中央领导主持会议，经过分析形势，总结支左开始以来的工作，大家一致认为，支左委员会对支左工作的领导和对一些较大问题的处理是正确的，一些原来或明或暗支持一派的同志也都作了自我批评。1月2日晚，政治局接见了到会的同志，对会议的情况表示满意，对省支左委员会的工作作了肯定，指示我们要认真贯彻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指示，促进大联合，发展全省形势，并决定陕西不再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支左委员会和群众协商，提出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的方案。同时确定调省军区系统的大部分干部到京办学习班，学习提高。总理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使到会同志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1663】

三、省革委会成立前后

很快到了1968年。关于省革委会成立前后的情况，胡炜晚年回忆称：

在大联合形成的高潮中，宝鸡地区、宝鸡市、虢镇、临潼等县和一批基层单位陆续建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省支左委员会认为，应当抓紧有利时机，尽快地把陕西省和西安市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1968年2、3月间，支左委员会召集两大派头头60余人开会，协商成立省和西安市革委会的方案。根据中央关于成立省革委会的原则指示，参照已建立省革委会的人员组成情况，对省和西安市革委会的组成人员统筹安排，经过反复协商、研究，确定省革委会由149名委员组成，设常委35名，正、副主任八名（主任由中央确定），关于参加省革委会的群众代表，除宝鸡地区已选定外，其它地区革委会尚未建立，参加省革委会的群众代表只确定了10名工、农劳动模范，其余暂空缺，待各地区成立革委会后补选。协商中争执的焦点是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同志，西派提出霍必须参加结合，东派坚决反对，霍是否参加结合牵涉到

【1663】《征程纪事》续集，页27-33。

两派的所谓斗争大方向，支左委员会是主张霍参加结合的，由于两派各不相让，我们不好明确表态，最后商定，霍是否参加结合，由党中央决定，两派都要听中央的。在对省革委会的组成方案取得一致意见后，又经过协商，确定了西安市革委会的组成方案。

在协商成立省革委会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关注着各专区的形势。延安是革命圣地，由于军分区领导干部各支持一派，无法做两派的工作。为推动延安专区的问题早日得到解决，二十一军党委确定派一批干部率一个营前往延安地区，得到支左委员会的一致赞同。二十一军作训处长许效民、干部处长李朝顺率一八四团三营于1968年3月下旬到达延安。经过一段工作，促进了两派的联合，使延安地区的形势，很快稳定下来。

1968年3月底，组成了由军队干部、地方领导干部和群众代表40多人的代表团赴京向中央汇报，总理听取了军队和地方领导干部汇报后，接见了代表团的全体同志。总理指示说：陕西成立省革委会的条件已基本成熟，应该适时地建立省革委会，领导全省的工作。关于霍士廉同志，现在谈打倒太早，谈结合也太早，这个问题留待以后再说。总理的指示，既说霍现在不参加结合，又称霍为同志，巧妙地照顾两派，得到一致的拥护。总理又说，中央决定由李瑞山同志任革委会主任，军队和群众都要支持李，把工作搞好。4月29日夜，总理打电话给我说，中央确定增加三名群众代表为副主任，你们思想要解放些，要连夜协商，明天5时前把协商的结果报来，以便5月1日成立革委会，我在电话机前等待你们的报告。接电话后，我们立即把代表们喊起来，借总理指示的东风，彻夜协商，就增补的副主任人选达成一致意见。按时上报后，总理很满意。4月30日晚，中央政治局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接见代表团，宣布党中央批准成立陕西省革委会的决定，并作了指示，会后全体代表即乘专机回西安。5月1日上午，召开30万人参加的大会，我宣读了党中央的决定，李瑞山同志发表了讲话，西安市革委会也同时宣布成立。从此陕西省和西安市从无政府状态转入了尚不健全的有政府状态。^{【1664】}

4月30日，周恩来等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代表团全体成员，宣读毛泽东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当晚，代表团即乘飞机返回西安。

《关于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称：

【1664】《征程纪事》续集，页35-37。

中央同意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支左委员会四月二十九日关于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中央同意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四十九名委员组成；同意所提三十五名常委；同意由李瑞山同志担任革命委员会主任，黄经耀、胡炜、杨焕民、萧纯、张培信、马希圣、单英杰、王凤琴（女）、李世英、孙福林、杨梦云（女）^{【1665】}十一名同志任副主任，并另留几名副主任名额，待以后增补。

一年多来，陕西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揪出了西北和陕西地区以刘澜涛、赵守一、李启明^{【1666】}为首的一小撮叛徒、特务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摧毁了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在西北的反革命老巢，进行了革命的大批判，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了丰功伟绩，为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陕部队和陕西军区的广大指战员，坚决执行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的指示，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于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起了促进的作用。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中央表示热烈的祝贺。^{【1667】}

有关省革委会成立以后的全省局势，胡炜回忆称：

省革委会是党中央批准成立的权力机关，可以发号施令，不像支左委员会那样一切靠和群众组织协商办事，但仍面对着复杂严峻的形势。第一，西

【1665】 萧纯，原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培信，庆安公司八厂调度员，工联负责人。马希圣，西安铁路局西站连结员，工总司负责人。单英杰，宝鸡212厂技术员，宝鸡工矿总部负责人。王凤琴，户县苍游公社大队党支部书记。李世英，西安交通大学革委会主任。孙福林，统指负责人，西北工业大学革委会主任。李洪明，红造司负责人，西北电讯工程学院革委会主任。杨梦云，统指负责人，西安冶金建筑学院革委会主任。

【1666】 刘澜涛，原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兼兰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兰州军区第一政委。赵守一，原中共陕西省委第二书记。李启明，原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陕西省省长。

【1667】 中发[68]67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1968年4月30日发出。李瑞山是当时全国少数担任省级革委会一把手的领导干部之一。他的工作实际上受到胡炜为代表的军队干部的支持。胡炜1969年10月升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仍兼二十一军军长至1971年7月），1971年3月任陕西省委书记。1973年10月调总参帮助工作，翌年11月升任副总参谋长兼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候补委员。文革结束后受审查被免职，后问题得以澄清，1984年按正兵团职离休。2018年6月20日在北京病逝。

安两大派虽然宣布撤销了原来的组织，但派性依旧，两派主要头头虽已分别进入省、市革委会，但一些有实权和影响的中、小头头，因未能进入革委会而不满，这样，原两派仍在暗中较量，都对省、市革委会出难题。5月26日，东派部分头头制造了西安火车站停车事件，严重影响了交通运输秩序，对新成立的省革委会施压。革委会领导同志除对其头头进行严肃批评，对群众耐心地做工作外，还召开省革委会公开讨论处理停车事件，指出事件的严重性，经过讨论形成和发出省革委会第一个文件。在这样的较量中，既恢复了正常运输，也逐步建立起省、市革委会的权威。接着两派在搪瓷厂、柏家口、红旗机械厂、胡家庙等处基层组织的部分人员，先后搞起了小型武斗，不断制造事端。第二，党中央在批准成立陕西省革委会的决定中指出，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当时我们不了解反“三右”是什么意思，也不好向中央询问，可是在西安和一些专区的群众组织中都有人把支左委员会和二十一军说成是右倾势力，还有人说什么“二十一军是杨成武的部队”，对部队施加压力。第三，各专区的群众组织头头对未能进入省革委会不满，再加上各军分区、武装部力量单薄，又不同程度地陷入派性，西安原两派中少数人又暗中插手，以致多数专区的三结合工作很难开展。江青接见河南群众组织时提出“文攻武卫”，起了很恶劣的作用，致使几个专区的两派各组织起数百人的武斗队伍，使武斗规模发展到整个地区，在武斗过程中抢银行、商店、仓库，以至随便打死人的事件时有发生。安康两派在武斗中，竟把县城内的许多建筑炸毁，渭南、咸阳地区的武斗队甚至提出要“以农村包围城市，打到西安去”。河南、四川的武斗也影响到陕西，四川数百名武斗人员窜到汉中的阳平关地区，严重威胁国家战略储备油库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除努力从各方面做工作外，每天均把情况上报中央。6月中旬，根据总理的电话指示，二十一军令六十三师孙玉水师长率一八七团主力星夜赶到阳平关，经过工作，将四川的武斗队劝回，并不允许再过来。接着二十一军又令六十三师魏新民副师长率一八七团主力进到安康地区，经过一个多月的的工作，安康地区的形势逐渐好转。但是对汉中、渭南、咸阳地区，由于二十一军三个师分别在陕、甘、宁地区支左，再无兵力可派，确实感到无能为力。

7月中旬，李、黄、胡到京汇报请示，总理听取汇报后，确定专为陕西发布了中央《7.24》布告，责令群众组织停止武斗，上交武斗武器，拆毁武斗工事，要求省革委会清查武斗的组织者、指挥者、幕后策划者以及在武斗中犯有罪行的人，并予以严惩。我们回到西安后，即集中四家部队的全部力量，分赴

各武斗地区，宣传贯彻《7.24 布告》。由于布告的强大威力，经过两个月的工作，全省武斗全部停止，武斗据点工事全部平毁，共收缴武斗武器十万余件（都是群众组织从军分区武装部仓库中抢夺的和一部分民兵手中的武器），全省形势迅速稳定下来，关于清查有关的责任者，则只能待以后进行。

全省形势稳定后，我们趁热打铁，把一些未成立革委会的专、县和一些厂矿企业的两派群众组织头头分别集中办学习班，促进三结合的实现。为了减少工作中的阻力，当时确定的原则是，参加三结合的军队代表由部队指派，地方领导干部凡两派同意的，均出来参加结合或在办事机构内工作，群众代表两派采取对等的原则，具体人选由各派自己确定，这样作可以很快把三结合的革委会组建起来，至于参加结合的群众代表有些不合适，有的甚至有严重问题，这一点我们心中有数，待革委会成立后，再逐步进行调整处理。在全省形势已经稳定的情况下，工作进展得很顺利，到11月底，全省各级以及各厂矿企事业单位均建立起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当时的语言是全省实现了一片红，这样全省就由无政府状态过渡到有政府状态。^{【1668】}

三、各地、市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1967-68年，陕西省辖8专区，1省辖市，并直辖铜川、宝鸡两市。各地、市革委会建立经过如下。

（一）宝鸡地区

1967年1月中、下旬，宝鸡专区和宝鸡市党政机关均被宝鸡工矿总部等组织夺权。2月，陆军第六十三师（8145部队）进驻宝鸡。3月，宝鸡军分区先后成立机构负责管理全专区、市工农业生产。8月11日，造反派组织冲进宝鸡军分区，将政委杨建鼎拉到市区游街、殴打。8月至11月，宝鸡地区发生多起大规模武斗。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宝鸡支左委员会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成立，撤销军分区前此成立的地、市两个指挥部。1968年2月15日，成立宝鸡专区公检法军管会，对宝鸡专署公安处、宝鸡检察分院、宝鸡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实行军事管制。2月28日，经兰州军区党委批准，宝鸡专区革委会成立。^{【1669】}原宝鸡地委副书记黄志诚任主任。

【1668】《征程纪事》续集，页37-40。

【1669】宝鸡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宝鸡市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页2364、2408。

(二) 宝鸡市

3月26日,经兰州军区党委批准,宝鸡市革委会成立,陆军第六十三师副政委刘建德任主任。

(三) 榆林专区

1967年1月30日,榆林专区境内米脂县人武部公开表态支持米脂一派造反组织——101统一指挥部。8月14日,中央发出中发[67]245文件,转发《米脂县武装部被革命群众誉为陕北高原上一面支左的红旗》一文,嗣后各中央媒体公开发表了此文。各县人武部纷纷发表声明,支持一派群众组织,使本区群众组织间的斗争更加尖锐。9月1日,省军区发表声明宣布:“誓做‘红工机’革命造反派的坚强后盾”;榆林军分区党委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对刘凤山(军分区政委)、成普(军分区第一副司令员)予以停职反省,由军分区司令员仇太兴等负责地区支左工作。1968年1月,群众组织双方赴京代表达成大联合和制止武斗、上缴武器协议。4月8日,榆林专区革委会成立。仇太兴任主任。^[1670]

(四) 西安市

1968年5月1日,西安市革委会与陕西省革委会同时成立。原陆军第六十一师政委、新任二十一军政治部主任孙长兴任主任。

(五) 铜川市

1967年2月3日,铜总司在市人民武装部支持下,声称夺了市委、市人委的党政大权,市委、市人委全部陷于瘫痪。8月19日,陕西省军区和二十一军公布《关于解决铜川问题的公告》,公开支持铜总会,压制铜总司一派。9月起,铜总会与铜总司两派武斗频仍。9月5日,中央以特急电报形式发出中发[67]289号文件,要求铜川矿区造反派组织“立即停止武斗,迅速恢复生产,恢复交通运输”。11月9日,为制止铜川武斗,中央发出《关于解决铜川问题的指示》和《中央批转铜川两派〈关于停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并抽调兰州空军工程兵、驻铜二十一军部队与铜川市人武部联合组成铜川市及渭北煤矿军管会,对市、矿统一实行军事管制。1968年5月20日,铜川市革委会和渭北煤矿革委会成立。^[1671]市革委会主任由铜川市人民武装部政委丁克担任。

【1670】榆林地区地方志指导小组:《榆林地区志》,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页489-490。

【1671】张立:《铜川市志》,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页20-21。

(六) 延安专区

1967年1月26日,延安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造反总部对延安地委和专署夺权。3月,延安军分区奉命介入本区文革,组成延安地区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领导全区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工作,对专区公安、检察、法院,以及邮电、电信等要害部门实行军事管制。1968年6月,陆军第六十一师到延安执行军管任务。8月18日,经省革委会批准,延安专区革委会成立。^[1672]六十一师参谋长许效民任主任。

(七) 渭南地区

1967年1月,渭南地区造反派夺权,渭南地委和渭南专员公署陷于瘫痪。3月,总后西安办事处和渭南军分区介入渭南地区文革。支左部队吸收少数地方干部成立有军、干、群三方代表参加的渭南地区红色革命造反派联合接管地委、专署临时委员会和渭南地区抓革命、促生产一线指挥部,分别掌管地区党政大权。1968年9月3日,经解放军渭南地区支左领导小组与两派群众组织协商,省革委会批准,正式成立渭南专区革委会。^[1673]总后西安办事处副主任徐元彬任主任。

(八) 汉中专区

1967年1月,“一月风暴”夺权风刮入汉中,全专区各级党政机关、各单位工作陷入瘫痪。2月,工程兵工程建筑第一〇七团(代号8318部队)与汉中军分区奉命介入汉中地区文革,全区统派、联新派两大派组织形成。3月10日,经省军区党委批准,汉中军分区农业生产领导小组成立,25日改为汉中军分区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统一指挥领导全区工作。6月后至次年7月,两派武斗频仍。1968年6月2日,勉县联新派武装冲击三机部勉县档案馆,打死警卫战士9名,重伤4人。7月24日,中央发出“七二四”布告,汉中军分区和驻汉部队强令两派停止武斗。9月2日,汉中专区革委会成立。^[1674]汉中军分区政委罗铭任主任。

(九) 安康专区

1967年3月,安康军分区介入地区文革。是月,安康形成红三司和六总司对立两派。从1968年3月起,发生大规模武斗。从4月12日至5月9日,周恩来三次向安康两派发出指示,要求立即停止武斗,均未能奏效。6月2日,六十三师步兵第一八七团(8163部队)奉命进驻安康,强行制止武斗。部队开进后,首先用装甲车隔开武斗双方,并设置警戒,然后强行将所有防御障碍物摧毁。两派

【1672】延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延安地区志》，西安：西安出版社，2000年，页43、690。

【1673】渭南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渭南地区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页162、164。

【1674】汉中市地方志办公室：《汉中地区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页2225-2226。

慑于部队强大压力，武斗气焰有所收敛，安康城内外枪声渐稀，城区始见平静。7月1日，由驻安康8163部队、总字282部队和安康军分区主要领导参加、重新组成解放军安康支左领导小组，加强对安康混乱局面的控制。7月下旬，在贯彻中央“七三”“七二四”两个布告中，驻军向两派做了大量工作，两派才公开表示愿意上缴武器弹药，解散武斗组织，停止武斗。随后，调集两大派头到西安参加省革委会举办的学习班，在安康支左领导小组主持下，经两派代表协商，于8月27日达成进一步全面、彻底收缴武器，实现联合，成立革委会的协议。9月3日，省革委会批准成立安康专区革委会。^[1675]六十三师副师长魏新民任主任。

(十) 咸阳专区

1967年2月4日，地直机关造反军、东方红等十个群众组织宣布夺了地委、专署的权。3月7日，咸阳军分区党委成立军分区农业生产领导小组，负责指挥全区的农业生产。同月，军分区和步兵第一八二团（代号8157部队）奉命介入咸阳地区文革，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省军区派员组建军事管制小组，对地区公安处，检察分院和中级人民法院实行军事管制，机关的日常工作由军队主持。4月，由军分区主持，以军分区领导人为主，结合部分地方干部，成立咸阳地区生产领导小组，负责全区工农业生产和其他日常工作。从1967年7月至1968年8月底，全区11个县先后发生武斗102起，致死460人，致残124人。1968年9月3日，经省革委会批准，咸阳专区革委会在兴平县成立。^[1676]军分区司令员武治业任主任。

(十一) 商洛专区

1967年1月下旬，商洛专区造反派组织夺地委、专署的权，各级机关陷于瘫痪。3月中旬，商洛军分区奉命介入商洛专区文革，成立商洛军分区支左委员会。5月，军分区牵头，吸收地委、专署部分干部参加，成立“商洛专区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负责全区工农业生产的领导工作。6月25日，解放军商洛专区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对商洛公安处、商洛检察分院、商洛中级人民法院实行军事管制。12月28日，“商洛专区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商洛专区支左委员会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1968年1月上旬，全区自上而下开展“两挖一清”运动。全区挖出地主、富农近千户，“反革命分子”和“叛徒”近千人，“国民党残渣余孽”和“牛鬼蛇神”多达万人。全案

^[1675] 安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安康地区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44-45，1651-1652。

^[1676] 咸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咸阳市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1年，页711-713。

涉及干部 368 人, 被关、管、斗的干群中有 56 人丧生。2 月 28 日, 商洛专区公检法三机关合并, 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商洛专区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 行使审判权。3 月 28 日, 省军区党委批准, 商洛军分区和驻商洛部队共同组成“商洛专区驻军支左统一指挥部”。8 月下旬, 支左统一指挥部组织两大派在西安达成停止武斗、收缴武器、实行革命大联合与革命三结合协议。9 月 6 日, 商洛专区革委会成立。^[1677]商洛军分区新任政委慕明君任主任。

以上 11 个地、市级革委会, 由军队现役干部任第一把手的 10 个, 占 91%(其中省军区系统 5 个, 占 46%; 二十一军 4 个, 占 36%; 总后西安办事处 1 个, 占 9%); 地方干部任第一把手 1 个, 占 9%。

第七十节 辽宁: 沈阳军区主导下的三支两军

一、辽宁驻军简况

1968 年 1 月, 辽宁省内军以上单位(不包括军事院校)为 15 个, 数量在全国省级行政区域中仅次于广东。

(一) 沈阳军区

领导和指挥东北黑、吉、辽三省境内所属武装力量, 时为陆、空军兵力最多的军区。领率机关驻沈阳市。司令员陈锡联, 政委宋任穷(东北局第一书记)兼(1968 年 6 月免), 第二政委曾绍山, 政委潘复生(原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兼(1967 年 5 月任), 副司令员刘转连、唐子安, 参谋长江拥辉, 政治部主任李伯秋。^[1678]

(二) 沈阳军区空军

领率机关驻沈阳市。辖空一军、空二军及空三军。司令员曾国华, 副司令员何振亚、吕黎平(1968 年 1 月免), 副政委程明, 参谋长王毓淮, 政治部主任王文。^[1679]1967 年 1 月后, 先后派出 3,013 人在一些地区和单位执行三支两军。^[1680]

【1677】商洛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商洛地区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6年,页46-47。

【1678】李伯秋,1955年授衔少将。

【1679】曾国华,1955年授衔空军中将。何振亚,1955年授衔空军少将。吕黎平、程明、王文,1961年晋升空军少将。王毓淮,1964年晋升空军少将。

【1680】《中国共产党空军组织史资料丛书》第1集,页96。

(三) 旅大警备区

兵团级单位，领率机关驻旅大市。代号 3280 部队。司令员邓岳，政委杨俊生，副司令员陈信忠，副政委袁佩爵，参谋长程登志，政治部主任缺。^{【1681】}辖外长山要塞区，守备第一师（3220 部队）、守备第二师（3292 部队）及守备第三师（3042 部队）。

旅大警备区军史称，“1967 年 1 月警备区介入地方文革后，派出干部五百五十六人、战士一千零三十六人，共一千五百九十二人，约十个连的兵力。先后对广播电台、冷冻库、油库、粮库（一月二十三日）、监狱（二月三日）、公安局（三月七日），……市党政机关（三月三十一日），机车厂（六月二十九日）等国家重要目标、要害部门实行了军管。”“奉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由驻旅大陆、海、空三军（旅大警备区、海军旅顺基地、空三军、炮七、三十一师），对旅大市实行了全面军事管制。”“成立了‘大连警备司令部’，狠抓了制止武斗的工作，那里发生武斗，执勤部队就到那里制止。”“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为了支持新的政权。警备区先后派出一千七百五十五名干部、战士，参加了各级革命委员会的‘三结合’（其中办事人员五百二十八人）。参加市革命委员会‘三结合’的军队代表，邓岳任主任，……要塞区、各师、团都派主要领导干部参加各区、县、工厂、企业、学校的‘三结合’。”^{【1682】}

(四) 外长山要塞区

隶属旅大警备区领导，执行军级权限。领率机关驻长海县，代号 3282 部队。司令员王海廷，政委任茂如，副司令员黄国忠、陈武魁、姚路，副政委杨国喜、牛明轩、尹培良，参谋长赵勤谋，政治部主任王国英。^{【1683】}辖广鹿、小长山、大长山、石城、海洋、獐子等 6 个守备区。

(五) 陆军第三十九军

领率机关驻营口市，代号 3096 部队。军长张峰，政委陈绍昆，副军长王扶之、朱恒兴、高克，副政委何渠若、李军、封克达，参谋长要清川，政治部主任王君森。^{【1684】}辖陆军第一一五师、第一一六师、第一一七师。第一一五师师部位

【1681】邓岳、杨俊生、陈信忠、袁佩爵，1955 年授衔少将。程登志，1961 年晋升少将。杨俊生 1968 年 5 月调任北京卫戍区政委。

【1682】旅大警备区：《中国人民解放军旅大警备区军史》，1989 年，页 131-134。

【1683】王海廷、任茂如，1964 年晋升少将。黄国忠、陈武魁、姚路、杨国喜、牛明轩，1965 年大校军衔。王海廷 1969 年 8 月后历任旅大警备区副司令员、旅大警备区政委、国家民航总局政委。

【1684】张峰、陈绍昆、王扶之，1964 年晋升少将。何渠若，1965 年大校军衔。张峰 1969 年 9 月升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陈绍昆 1969 年 8 月升任沈阳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

盖县，代号3097部队。师长赵先顺，政委韩守一，副师长楚永兴、刘纯仁，参谋长何海云，政治部主任汤文惠。第一一六师师部位海城县，代号3174部队，师长张杰，政委李兆书，副师长王林，副政委胡可风，参谋长萧文泉，政治部主任张业香。第一一七师师部位复县，代号3125部队。师长王秀法，政委薛瑞云，副师长刘兆，副政委王青羊，参谋长黄达宣，政治部主任张跃东。

该军军史称，1967年2月2日，“我军进驻鞍山、营口、海城、复县、新金、盖县、盘锦等地，执行‘三支两军’任务。”8月17日，“根据中央《关于处理鞍山问题的决定》，由军长张峰、政委陈绍昆为首的军管会，对鞍山市实行军管。”^{【1685】}1968年，“我们军‘三支两军’地区的各市、县、区先后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共有900多名干部战士被结合进各级的革命委员会任职，继续进行‘三支两军’工作。”^{【1686】}

（六）陆军第四十军

领率机关驻锦州市，代号3135部队。军长吴忠，政委刘振华，副军长颜文斌、符必玖、黄德懋，副政委张纪之、展明，参谋长宋宪孔，政治部主任郑屏年。^{【1687】}辖陆军第一一八师、第一一九师、第一二〇师。第一一八师师部位义县，代号3136部队。师长赵兴元，政委谭顺田，副师长翟文清，副政委张仲先、李湖，参谋长于宗浚，政治部主任朱英才。第一一九师师部位锦县，代号3146部队。师长朱玉荣，政委王世乾，副师长张建奎、刘忠武，副政委李洪奎、苏章，参谋长杨月山，政治部主任郭俊。第一二〇师师部位兴城县，代号3160部队。师长邢维邦，政委冯恺，副师长宋汉珠，副政委李学毅，参谋长董长杰，政治部主任晏世禄。

该军军史称，1967年1月，该军“从二十五日起，介入了锦州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先后派出七百四十五名干部战士，接管了锦州广播电台，和对锦州地区的粮、棉、油及物资仓库等四十二个单位，实行了武装警卫。二月下旬，派出八十八个连队进驻锦州、朝阳地区的十个县、二百七十六个公社进行支农。三月

任，1970年6月调任冶金工业部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扶之1968年4月调任总参作战部副部长。何渠若1969年8月调任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1685】军史编写办公室：《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三十九集团军军史（征求意见稿）》下，1989年9月10日，页740。

【1686】陆军第三十九集团军：《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三十九集团军军史》，1995年，页771。

【1687】吴忠，1955年授衔少将。刘振华、颜文斌，1964年晋升少将。张纪之、展明、黄德懋、符必玖，1965年大校军衔。吴忠1968年5月后历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刘振华1969年8月后历任沈阳军区副政委兼旅大警备区第一政委、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张纪之1967年12月任新华社军管小组组长。

初，派出一千一百多名干部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赴锦州、阜新两市的一百七十九个工厂、五个矿区进行支工。并先后对阜新市、锦州铁路局和锦州地区等三十九个国家重要单位、部门，实行了军事管制。还分期分批对阜新市、锦州地区的大中院校和小学高年级实行了军政训练。”1968年“四、五月，阜新市、锦州市、锦州铁路局等单位革命委员会先后成立。我们军有一千二百多名干部结合进各级革委会，一百八十名同志担任了县团级以上革委会的主要领导。”^[1688]

(七) 陆军第六十四军

领率机关驻本溪县，代号3225部队。军长刘德才，政委郭玉峰，副军长张怀瑞，副政委马瑛、刘路明，参谋长缺，政治部主任展征。^[1689]辖陆军第一九〇师、第一九一师、第一九二师。第一九〇师师部本溪县，代号3226部队。师长王庆瑛，政委刘鸿臣，副师长汪明德、穆大法，副政委张千，参谋长刘振山，政治部主任缺。第一九一师师部丹东市，代号3249部队。师长刘东起，政委武峰光，副师长葛根元、彭庆德，副政委马海臣，参谋长缺，政治部主任孙福斌。第一九二师师部凤城县，代号3271部队。师长王统，政委李炜，副师长徐超、袁天禄，副政委段吉正，参谋长王连清，政治部主任边振武。

该军军史称，“1967年初，……我军先后派出3.2万多人，分别到本溪、抚顺、沈阳、丹东4市和本溪、抚顺、凤城、宽甸、桓仁、清源、新宾等县执行‘三支两军’任务。”“1967年3月至1968年12月，根据党中央和军区指示，我军派出22个建制连队、270名干部对沈阳、本溪市公安局和抚顺、本溪矿务局以及本溪钢铁公司、通化铁路局等11个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建立了6个军事管制委员会，41个军管领导小组。还派出近200名干部、战士对丹东铁路大桥、档案馆、凤城粮库，本溪、抚顺公安局看守所5个单位实行警卫保护。”“1968年，……我军有1792名干部被结合进各级革命委员会任职，部分干部还担任‘革委会’主要领导。军胡金波副政委担任了本溪市‘革委会’主任，张怀瑞副军长、武峰光副政委先后担任了抚顺市‘革委会’主任。”^[1690]

【1688】陆军第四十军：《光辉的战斗历程》，1978年，页380-382。

【1689】刘德才、郭玉峰，1964年晋升少将。刘路明、张怀瑞、马瑛，1965年大校军衔。刘德才1969年8月调任旅大警备区司令员。郭玉峰1967年10月任中央组织部业务组组长。刘路明1969年11月调任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

【1690】陆军第六十四集团军编：《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六十四集团军军史》，1997年，页465-467。胡金波任本溪市革委会主任时军内职务为军政治部副主任。

(八) 辽宁省军区

领率机关驻沈阳市。司令员贺庆积，第三政委杨弃，第四政委李道之，副司令员张海棠、张天恕、赵鹤亭、巫金锋、汪应中、曾长柏、李亚田、凌少农、罗春云，副政委刘采芹，参谋长刘春芳，政治部主任陶明。^{【1691】}辖沈阳市、鞍山市、营口市、锦州市人民武装部，辽南、旅大、丹东、抚顺、沈阳、阜新、朝阳、本溪、锦州军分区。并辖辽宁省军区独立师第一师(3209部队)、独立第二师(3365部队)。

辽宁省军区资料称，自1967年1月至1973年，“省军区共派出13,969名干部、战士(其中干部7,582人次，师以上干部108人次)参加了‘三支两军’工作，其中有2,017人担任省、市(地)、县(区)及基层单位的领导职务。”“按沈阳军区党委指示，省军区党委主要领导参加了临时组建的辽宁省‘抓革命、促生产’总指挥部，工农、文教、卫生等口都有一名省军区领导参加。……1967年至1968年，按沈阳军区党委的指示，省军区成立制止武斗领导小组，每天有2至3个连队担任值勤，在制止武斗中有459名干部、战士被打伤(重伤62人)，2人被打死，共收缴武器2万多件，手榴弹5万多枚，雷管23万多个，子弹20余发，军用汽车100多辆。”^{【1692】}

(九) 空军第二军

领率机关驻丹东市，代号7321部队。军长邹炎，政委赵其林，副军长张子安、李飞、孙景华，副政委缺，参谋长李飞兼，政治部主任王恕年。^{【1693】}1967年6月后，全面负责丹东地区三支两军工作，有45.8%的干部先后参加了三支两军，78名团以上干部参加了地方“三结合”的领导班子。^{【1694】}

(十) 空军第三军

领率机关驻旅大市，代号7331部队。军长吕茂堂，政委杨大伦，副军长刘国柱、黄鲁、李兆霖，副政委任球，参谋长佟铁夫，政治部主任彤剑。^{【1695】}1967

【1691】贺庆积、李道之、张海棠，1955年授衔少将。杨弃、张天恕、赵鹤亭、巫金锋，1964年晋升少将。汪应中、罗春云、曾长柏、凌少农、刘采芹、李亚田，1965年大校军衔。杨弃1968年5月任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

【1692】辽宁省军区政治部：《中国共产党辽宁省军区组织史资料(合编本)》，1994年，页282-283。

【1693】赵其林，张子安，1965年空军大校军衔。

【1694】《中国共产党空军组织史资料丛书》第2集，页63。

【1695】刘国柱，1961年晋升空军少将。杨大伦、吕茂堂、任球，1965年空军大校军衔。

年到1973年间，军组织机关、部队部分人员执行了北京市朝阳区和大连市区、局、院校、工厂的三支两军任务。^{【1696】}

(十一) 海军旅顺基地

领率机关驻旅大市，代号4005部队。司令员马忠全，政委宋景华，副司令员高诗荣、赵友夫、冯尚贤，副政委孙鸿志，参谋长王屏寿，政治部主任冯达。^{【1697】}参与了旅大地区的三支两军工作。

(十二) 国防科委第二十三基地

领率机关驻锦西县，代号4497部队。司令员郑国仲，政委王大华，副司令员杨国宇、冰野，副政委史子才、朱卿云，参谋长王际鲁，政治部主任陶绍侃。^{【1698】}

据基地《大事记》称：1967年，“基地派出1,030名干部、战士（其中团以上干部59名，一般干部861名，学员和战士110名）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于三月二日分赴锦西县23个公社和一个镇，担任支农任务。同时还派出65人组成4个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进行流动宣传演出。同时，按上级部署，基地先后向锦西、北京等地派出5,284人次（其中去北京为121人次）执行‘三支两军’任务。派到锦西地区的单位是：锦西县、石油五厂、化工厂、化工机械厂、化工研究院、化工二处、渤海造船厂、六局一公司等。派到北京的单位是：第六机械工业部、第七机械工业部及其所属第三研究院、北京市外贸局、冶金局、二商局等。派出人员中，有军职干部7人次，师职干部32人次。锦西地区的‘三支两军’工作，由基地、海军第一航空学校、四十军三五八团、锦西县人民武装部4个驻军单位，于一九六七年三月组成锦西卫戍区，后改为警备区，实施统一领导。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根据沈阳军区转发军委的指示，撤销了警备区，改设驻军‘三支两军办公室’，简称‘支左办公室’。”

(十三) 沈阳军区炮兵

领率机关驻沈阳市。第一副司令员吴子杰，政委缺，副司令员王亚夫、艾福林、甘伯勋、熊金波、甄秉信，副政委张兆仁、何槿，参谋长甄秉信兼，政治部

【1696】《中国共产党空军组织史资料丛书》第2集，页97。

【1697】马忠全、宋景华，1955年授衔海军少将。高诗荣、赵友夫、冯尚贤、孙鸿志，1965年海军大校军衔。

【1698】郑国仲，1955年授衔海军少将。王大华、杨国宇，1961年晋升海军少将。冰野、史子才，1965年海军大校军衔。朱卿云，1965年大校军衔。杨国宇1967年5月后历任七机部三院军管会主任、部军管会副主任。陶绍侃1967年10月任七机部三院军管会主任。

主任缺。^{【1699】}辖炮兵第七师、第十师、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师、第三十三师及第六十二师，军区野战高射炮兵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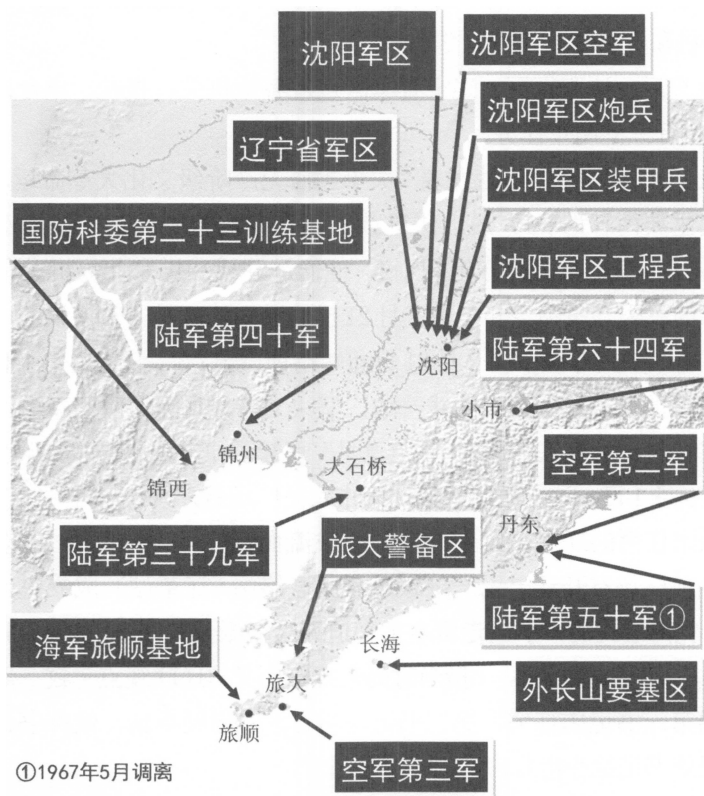
(十四) 沈阳军区装甲兵

领率机关驻沈阳市。司令员缺，政委杨中行，副司令员唐青山、王超、赵占魁、赵云鹤，副政委裴光、高书简，参谋长吕文选，政治部主任王千祥。^{【1700】}辖坦克第三师(3289 部队)。

(十五) 沈阳军区工程兵

领率机关驻沈阳市。主任夏克，政委王从周，副主任杨启轩、宋文洪，副政委邹平光，参谋长朱玉山，政治部主任苏民。^{【1701】}辖第一、第二、第五、第六工区及工程兵第四支队(3316 部队，1968 年 2 月组建)。

辽宁驻军分布图(1967-1968)



【1699】 吴子杰，1955 年授衔少将。张兆仁、王亚夫、艾福林，1965 年大校军衔。

【1700】 杨中行、唐青山，1955 年授衔少将。王超、裴光、赵占魁，1965 年大校军衔。

【1701】 杨启轩、宋文洪、王从周，1965 年大校军衔。

二、1967-1968年辽宁文革进程与军队

1967年1月31日，由24个造反组织发起成立的辽宁省革命造反夺权指挥部于凌晨三点宣布接管辽宁省委、省人委的一切权力。辽宁夺权未有得到中央承认。

2月16日，辽宁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辽联）在沈阳宣告成立，宋任穷在成立大会上讲话以示支持。辽联以东北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学生造反派为主体，思想较为活跃，得到了相当大一部分机关中下层干部和已经“站出来”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支持。辽联反对沈阳军区1966年下半年后对军内造反派和1967年1月介入地方文革后对地方造反派的压制。

2月20日，辽宁省军区对辽宁省公安厅实行军事管制，沈阳军分区对沈阳市公安局、市人民检察院、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市邮电部门实行军事管制。

2月27日至3月1日，辽宁省军区召开部队和地方三级干部会议，研究和布置了农村备耕和春耕生产工作。

3月19日后，沈阳军区、辽宁省军区进驻各地机关、报社、电台、学校、工厂、农村，执行三支两军任务。

4月21日，东北局书记处发表“关于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三点意见’”，其主要内容为：1、最近进驻或冲进东北局机关的东工红旗造反团、革命造反团和辽大红卫兵是保守组织；2、他们进驻或冲进东北局机关是违反毛主席亲自指示的军委八条命令和中央2月21日的通知的，是非常错误的，希望他们按照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和中央2月21日通知精神撤出；3、我们坚定不移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坚决支持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同他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三点意见”引起了冲击东北局的一派学生组织的强烈不满。5月4日，这一派组织在沈阳市人民广场召开大会，批判“三点意见”，会场上与保宋任穷的辽联派发生冲突，酿成流血事件。5月10日，冲东北局一派在沈阳南站前广场召开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辽革站）成立誓师大会，声讨和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东北的代理人”，矛头直指“宋、马、顾、喻、徐”（指当时尚未打倒而又与辽联观点一致、受到辽联支持的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第三书记马明方、书记顾卓新、候补书记喻屏和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徐少甫）。

6月5日，以辽宁大学八三一为主体的辽宁八三一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八三一）成立。至此，辽宁地区三大派三足鼎立、相互抗衡的局面形成。三派观点鲜明：辽革站——保陈打宋；辽联——保宋打陈；八三一——既打宋，又打陈。一般认

为，辽革站是保守派，辽联与八三一是造反派，不过，辽联是造反派中较稳健一翼，而八三一是造反派中更激进一翼。

“三点意见”使本应长于政治斗争手腕的宋任穷本人及其为首的东北局书记处事与愿违，陷于被动。虽然，宋于7月4日被迫以他个人名义收回了“三点意见”，但已于事无补。8月6日，中共中央作出《东北局停止对东北各省市领导的决定》，标志着毛、周在权衡利害后最终放弃了保宋，从此，辽宁全省为年初已介入三支两军的沈阳军区所左右。

8月26日，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沈阳三派组织赴京代表，并指示要制止武斗，恢复交通，恢复生产，恢复正常秩序。9月9日，中央领导第三次接见辽宁代表和军区、地方领导干部，解决实现大联合问题。在周恩来主持下，沈阳三派代表签订了《关于拥军爱民，制止武斗，恢复生产协议书》。为加速解决辽宁问题，中央又派出以柴成文^[1702]为首的中央调查组到辽宁。12月18日，沈阳三派代表在中央调查组的主持下，与警备司令部代表达成《关于制止武斗联合紧急通知书》的协议。

1968年1月27日，辽宁三派群众组织，在京签订《沈阳三大革命群众组织关于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2月13日，沈阳财贸系统200多个单位实现了大联合。20日，沈阳市大专院校三派签订了《革命大联合协议》。2月末，省委机关三派组织签订了《实现革命大联合协议书》。到4月末，全省已有90%以上单位实现了大联合。

5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名发出关于成立辽宁省革委会的批示，同意由陈锡联任省革委会主任，李伯秋、杨春甫、王良、杨迪、杨弃、毛远新等15人任副主任。^[1703]在省革委会委员中，军队干部占16%，地方干部代表占22%，三派群众组织代表占62%，虽然在人员构成上表面是“军干群”三结合且军队干部最少而群众组织代表最多，但实际上是军队干部主持了大局。

【1702】柴成文，时任总参情报部副部长，1961年晋升少将。

【1703】《关于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1968年5月8日。中发[68]70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1968年5月9日发出。杨春甫、王良，原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迪，时任沈阳军区副参谋长。李伯秋1969年8月升任沈阳军区副政委，1971年1月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1977年被免去在辽宁省的领导职务。1986年被开除党籍、军籍，按师级干部待遇作退休处理。1990年恢复党籍、军籍。2005年7月18日在沈阳病逝。毛远新在中央文件中未注明原职务，其被安排至辽宁任职，并非沈阳军区或陈锡联本人主动提出。1968年4月22日，陈锡联向中央、中央文革并军委办事组提交“关于筹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初步意见（第二次修改稿）”，提出了省革委会的人选，这是陈关于此问题的最后一个报告，其中完全没有提及到毛远新的名字。



陈锡联与毛远新在沈阳，1968年。

1968年，正当盛年的陈锡联春风得意。这一年9月，经中共中央批准，陈任沈阳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这使得陈不仅成为辽宁第一把手，而且名正顺地成为支左部队遍布全东北的沈阳军区第一把手。1973年12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陈调任位置更显重要的北京军区司令员，一个月后，成为负责处理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六人小组成员，直至1975年2月成立军委常委会，为常委之一。同年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1976年2月2日，叶剑英被宣布停止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改由陈主持，10月，参与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次年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再次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再次担任中央军委常委。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期间，陈被视为凡是派大将之一员，“根据党内外广大群众的意见，决定批准他的辞职要求”。1982年9月至1992年10月任中顾委常委。1999年6月10日在北京病逝。

陈锡联为人四平八稳，不露锋芒。在辽宁当政期间，省内粮油副食品供应严重不足，被讽称为“陈三两”（指每人每月限供三两食油）。惟辽宁是一工业省，城市工业人口众多而农业相对落后，文革前，粮油食品大多由外省调入。文革中，调入困难，造成供应紧张，加之陈为一起赳赳武夫，文革前经济工作从未沾手，很是外行，以此角度思之，由于客观原因他没有做好他所不熟悉的工作，也是情有可原，未可求全责备。

三、各地、市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1968年初,辽宁省辖4专区,10省辖市,1垦区。各专区(垦区)、市革委会成立经过及与军队关系简况如下。

(一) 鞍山市

1967年4月9日,鞍山两派在游行时发生武斗。从本日至9月13日,发生武斗147次,有614人受伤,其中重伤116人。7月26日,鞍山两派代表在北京经两个月谈判,达成制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十二条协议后,武斗尚时有发生。^{【1704】}8月17日,中央发出关于处理鞍山问题的决定,将原中共鞍山市委第一书记王鹤寿等定为走资派,决定成立以张峰、陈绍昆为首的鞍山市军管会,对鞍山市、鞍山钢铁公司实行全面军事管制。在军管会下设立“抓革命、促生产”的两个班子,分别领导文化大革命和生产、财贸工作。1968年3月22日,鞍山市革委会成立,张峰任主任,何渠若任第一副主任。

(二) 锦州专区

1968年4月3日,锦州专区革委会成立,锦州军分区司令员曾广珍任主任。12月26日,辽宁省革委会决定撤销锦州专区,将其所属的七个县划归锦州市领导。

(三) 阜新市

1967年1月,阜新市形成两派,斗争日趋尖锐。1966年下半年到1968年1月,市内发生较为严重的“打砸抢”事件27起,波及朝阳、哲里木盟地区的25个单位。2月28日,阜新地区实行军事管制,阜新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主任展明。1968年1月28日,阜新市两派在北京达成大联合协议。4月26日,举行阜新市革委会成立暨庆祝大会。阜新市革委会主任为展明。^{【1705】}

(四) 朝阳专区

1967年1月28日,由一派群众组织成立的朝阳地区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宣布夺了中共朝阳地委、朝阳专员公署的党政财文大权。1月29日,另一派群众组织成立的朝阳各界总部极力反对朝阳地区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的“一二八”夺权,称他们为“保皇派”。2月26日,朝阳军分区公开表态支持朝阳地区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承认“一二八”夺权,并由朝阳军分区负责人、地方领导干部和造

【1704】鞍山市地方志办公室:《鞍山四十年》,1989年,页518-519。

【1705】阜新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阜新市志》第一卷,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年,页63-64。

反派组织负责人正式组成三结合的领导机构——朝阳地区临时革委会。1968年5月6日，沈阳军区批准成立朝阳专区革委会，贺晓成任主任。^{【1706】}

(五) 沈阳专区

1967年3月5日，沈阳军分区支援农业生产领导小组成立，军分区政委赵克勋任组长。27日，专区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成立，指挥赵克勋。6月18日，地委第一书记申东黎被迫害致死。26日，沈阳军分区司令员苟耀德任专区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总指挥。是月，全区开始出现武斗。8月武斗升级。1968年2月12日，解放军辽宁省沈阳专区公安机关军管会成立，原公、检、法机关人员大部分进“五七干校”学习。5月7日，沈阳军区批示，同意沈阳军分区《关于成立沈阳专区革命委员会的报告》。苟耀德任专区革委会主任。12月26日，沈阳专区改名为铁岭专区。^{【1707】}

(六) 沈阳市

1967年1月23日，沈阳市委由市委机关“串连总部”、东北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18个群众组织组成的“接管委员会”接管，从此，沈阳市党政机关陷入瘫痪。2月22日起，沈阳军区、辽宁省军区陆续派员进驻机关、学校、工厂、农村。8月16日，沈阳三派与沈阳卫戍区司令部签订《关于立即制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书》。12月18日，沈阳三派代表与警备区司令部代表，在中央调查团的主持下，达成《关于制止武斗联合紧急通知书》。1968年1月6日，沈阳三派与沈阳卫戍区达成贯彻1968年春季征兵命令的协议和《关于进一步贯彻“九九”协议、彻底制止武斗的十条规定》。30日，沈阳三派在市人民广场联合召开“沈阳市三大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大联合大会”。5月10日，沈阳市革命委员会与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市革委会主任为王从周。^{【1708】}

(七) 锦州市

1967年1月10日，锦州市造反派开始夺权，各级党政机关逐渐瘫痪。是月，驻锦部队奉命在锦州开始执行支左任务。2月，锦州市形成“好”“糟”两大派。3月6日，锦州市公安局发出通令，宣布锦州师范学院等几个群众组织为“反动组织”。5月27日，市公安局军管会撤销“三六通令”。8月，锦州市武斗再次升级，

【1706】朝阳市史志办公室：《朝阳市志》，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6年，页81。贺晓成，时任朝阳军分区第二政委。

【1707】铁岭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铁岭市志》综合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页69-70。

【1708】沈阳市人民政府地方志编纂办公室：《沈阳市志》第一卷，沈阳：沈阳出版社，1989年，页176-178。

许多工厂停工。1968年1月10日,锦州警备区发出布告:奉命自即日起,对锦州地区公检法机关全面实行军事管制。2月25日,锦州两派在站前广场召开大会,宣布成立锦州市大联合委员会(8月11日两派群众组织宣告撤销)。5月26日,锦州市革委会成立。^{【1709】}四十军副军长黄德懋任主任。1969年1月10日,辽宁省革委会决定,锦州专区与锦州市合并后组成的锦州市革委会,仍由黄德懋任主任。

(八) 丹东市

1967年2月,丹东驻军介入地方文革,表态支持丹联派夺权革命行动,全市夺权之风骤起。2月13日,丹东红司派认为丹东驻军某些支左人员支一派压一派,红司派组织到3197部队(陆军第五十军)军部门前送大字报,并在门前围坐长达7天8夜,即“二一三事件”。3月中旬,以军队领导为主体组成丹东市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5月底,3197部队换防离开丹东,丹东支左工作改由空军第二军负责。1968年1月8日,丹东市驻军对丹东市公安局、检察院和中级人民法院实行军事管制。2月19日,丹东市两派群众组织举行实现革命大联合大会,成立丹东市革命大联合指挥部。5月30日,丹东市召开革委会成立大会,大会宣读辽宁省革委会关于成立丹东市革委会的批示,批示中同意赵其林任市革委会主任。^{【17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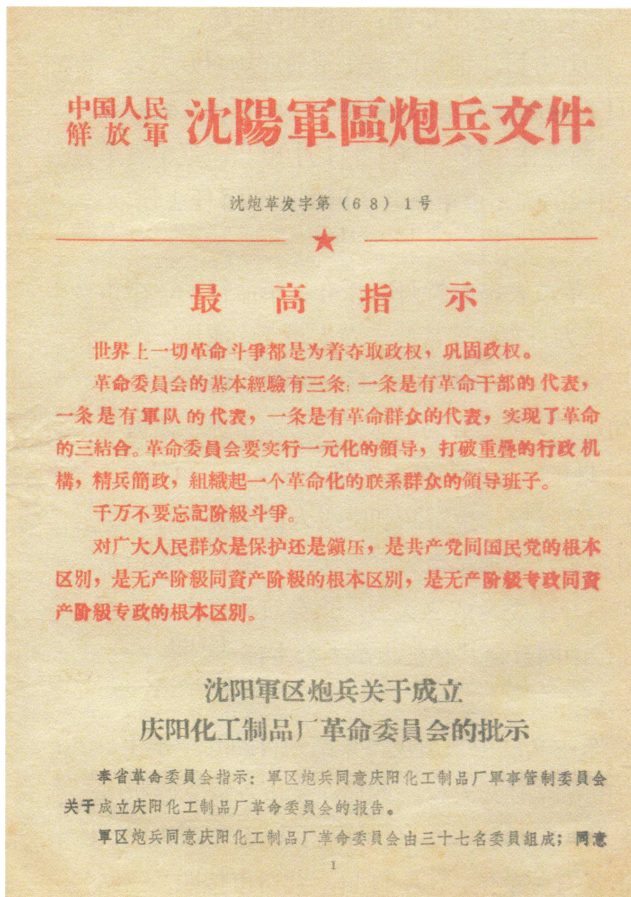
(九) 营口市

1967年1月28日,以营口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造反司令部为首的6个学生、工人造反组织,于夜间宣布夺了营口市党政财文大权,此后,全市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大多被造反派夺权。是月,营口驻军及辽南军分区、营口市人民武装部派出大批干部、战士,进驻全市各有关单位。3月14日,营口市按照“三结合”方针,成立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7月,营口市各不同派别的造反组织间武斗不断发生和发展。据城区六、七月统计,共发生武斗75起,伤135人。12月21日,营口市公安局、检察院、中级人民法院实行军事管制,成立解放军营口市公检法军管会。1968年1月,营口市区两大派群众组织开始联合。双方代表在北京办学习班谈判时,在周恩来主持下,两派联合成立营口市革命群众大联合指挥部。5月31日,营口市革委会成立。主任委员韩守一。1969年1月10日,辽宁省革委会同意辽南、营口合并后的营口市革委会由耍清川任主任。^{【1711】}

【1709】锦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锦州市志》,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

【1710】丹东市地方志办公室:《丹东市志》(1),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页176-180。

【1711】《营口市志》第一卷,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2年,页184-189。韩守一,时任陆军第一一五师政委。耍清川,时任陆军第三十九军参谋长。



沈阳军区炮兵亦有权批准部分单位革委会成立。

(十) 辽南专区

1968年5月3日，经辽宁省革委会批准，成立辽南专区革委会，主任由原辽南专员公署专员金铎担任。12月26日，辽南专区撤销，所辖各县分别划归营口市、旅大市领导。

(十一) 本溪市

1967年2月，全市群众组织开始层层夺权，市级党政机关遂告瘫痪。市委个别常委公开发表声明“退出常委闹革命”。不久，全市造反派组织形成两大派，即毛泽东思想八三一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八三一）和本溪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本联）。3月26日，本溪驻军、本溪军分区成立三支两军办公室，派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机关、学校、文化、卫生等部门。在本溪军分区领导下，成立负责指挥全市经济工作的临时领导机构——本溪市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

是年秋，本溪市两大派代表在北京协商大联合，至翌年初达成两派“大联合”协议。1968年6月15日，经辽宁省革委会批准，本溪市革委会成立，胡金波任主任。^[1712]

(十二) 盘锦垦区

1967年2月3日，中共盘锦垦区委员会、垦区人委被夺权，区委、区人委领导机关陷入瘫痪状态。是月，垦区相继成立各造反派组织达900多个，对垦区党委第一书记马赋广、第二书记李世善、副区长许宏文等轮番批斗。群众组织尖锐

【1712】本溪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本溪市志》（第一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年，页69-70。胡金波，时任陆军第六十四军政治部副主任。

对立，派性斗争逐步升级，武斗流血事件经常发生。3月5日，解放军3125部队到垦区开展三支两军。1968年1月，垦区大联筹与五一六两派在北京达成大联合协议。2月，垦区公、检、法军管会成立。6月28日，经辽宁省革委会批准，盘锦垦区革委会成立，主任刘盛田兼。^{【1713】}

(十三) 辽阳市

1967年1月23日，中共辽阳市委机关各群众组织联合，于13时宣布“正式夺了市委的大权”。同日，一二六革命造反总部、辽阳市无产阶级造反团联合“大夺权”，先后夺走中共辽阳市委、市人委、市公安局、法院、检察院、报社、车站等机关单位公章。1月末到2月初，市、县其他群众组织也纷纷大搞夺权。7月，市、县各派群众组织相继武装，武斗日渐升级，打、砸、抢事件不断发生。1968年1月28日，辽阳市4个群众组织在北京签订实现革命大联合协议书。8月2日，经辽宁省革委会批准，成立辽阳市革委会，主任李得功。^{【1714】}

(十四) 旅大市

1967年1月23日，旅大警备区奉命支左，陆续向市级党政机关、报社、电台、大型厂矿企业、高等院校等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2月1日，全市42个单位的群众组织开会宣布夺市委、市人委权。市党政领导机关瘫痪，全市陷于无政府状态。2月8日，驻旅大部队奉命强行解散被定为“反革命组织”的瓦纺工人造反团。11日，又强行解散旅大造反军团。从此，旅大群众组织围绕对解放军支左的态度和行动问题，分成拥军派和反军派。3月28日，旅大警备区等根据中央指示，对旅大实行军事管制。从1966年末至1968年上半年，全市发生大小武斗事件76起，死亡189人，重伤625人。1968年1月30日，旅大市三大派组织在北京签署《旅大市各革命群众组织关于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书》。3月7日，该《协议书》正式公布，并成立旅大市革命大联合筹备委员会。8月3日，辽宁省革委会下发《关于成立旅大市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同意成立旅大市革委会，邓岳为主任。^{【1715】}

【1713】 盘锦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盘锦市志》综合卷，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年，页89-93。3125部队为陆军第一一七师的代号。刘盛田，原任营口县委副书记兼水源公社党委书记，时任省革委会副主任。

【1714】 辽阳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辽阳市志（1）》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111-113。李得功，时任炮兵第十一师师长。

【1715】 大连市史志办公室：《大连市志·大事记·行政建置志》，大连：大连出版社，2001年，页155-158。

(十五) 抚顺市

1967年1月24日，抚顺市一派群众组织夺了《抚顺日报》社和市公安局的领导权。2月23日，另一派群众组织又从夺权的群众组织手中夺了市公安局和《抚顺日报》社的权。从此，抚顺市的造反派分化成为两大派群众组织。3月，抚顺军分区和驻抚部队开始介入抚顺市的文革运动。中共抚顺市委书记处办公楼被群众组织占领。从此以后，抚顺市的党政机关和群团组织相继被迫停止工作。5月23日，在抚顺军分区主持下，成立辽宁省抚顺市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1968年1月12日改称抚顺驻军生产指挥部），实际上取代市委、市人委的领导权，成为抚顺生产、工作的临时领导机构。1968年7月15日，抚顺胜利矿两派群众组织之间进行武斗，有18人丧生。从1967年7月中旬开始武斗以来至本日，全市共发生较大规模的“打、砸、抢”和武斗事件300多起。其中大型武斗有40多起，动用了机枪、大炮、坦克等重型武器。全市因武斗死亡700多人，伤1,700多人，重伤致残240多人。8月28日，抚顺市革委会成立大会召开，主任张怀瑞。^{【1716】}

以上15个地、市级革委会，由现役军人任第一把手的共13个，占86.7%（其中旅大警备区、军区工程兵、军区炮兵、空二军各1个，各占6.7%，共占26.8%；陆军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第六十四军各2个，各占13.3%，共占39.9%；省军区系统3个，占20%）；地方干部2个，占13.3%。

第七十一节 云南：动荡的西南边陲与军队

一、云南驻军简况

1968年1月，云南省内军以上单位共6个，即昆明军区，陆军第十三军、第十四军，云南省军区，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及第二炮兵第五十三基地。1968年9月，军委命令第十三军由滇南调至川东，第十四军由滇西调至滇南，第五十四军由川东调至滇西，云南省内军以上单位保持6个不变。

云南是军队陷入两派之争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其中又以十四军及云南省军区为甚。

(一) 昆明军区

领率机关驻昆明市，领导和指挥云南、贵州两省境内所属武装力量。1968年1月，军区司令员秦基伟、第二政委李成芳虽未被正式免职，但均已“靠边站”。5月19日，经毛泽东、林彪批准，军委任命工程兵政委谭甫仁为昆明军区政委，

【1716】抚顺市地方志办公室：《抚顺市志》，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114-115。

谭甫仁此后主持昆明军区工作。副司令员陈康、鲁瑞林、田维扬、查玉升、徐其孝，副政治委员胡荣贵、周兴、李再含、张子明，参谋长崔建功，政治部主任雷起云。^{【1717】}

1968年1月，昆明军区下辖陆军第十三军、第十四军，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云南省军区、贵州省军区，炮兵第四师、高炮第六十五师、陆军第四十九师及丽江、保山、临沧、思茅4个边防军分区。

(二) 陆军第十三军

1968年1月，领率机关驻开远县，代号7557部队。军长吴效闵，政委段思英，副军长顾永武、阎守庆，副政委何云峰、朱光海，参谋长张静波，政治部主任袁明。^{【1718】}辖陆军第三十七师、第三十八师、第三十九师。第三十七师师部位宜良县。师长耿忠贤，政委陈占楼，副师长安玉峰，副政委龚殿友，参谋长张宝珍，政治部主任张文杰。第三十八师师部位蒙自县。师长张英才，政委杨振贤，副师长王文辉，副政委乔洪德，参谋长杨安忠、政治部主任原虎林。第三十九师师部位普洱县。师长马玉芳，政委赵伟，副师长王秀玉，副政委张志锐，参谋长郭永瑞，政治部主任高维岳。

该军军史称，1967年，“根据昆明军区党委的指示，我军部队从三月中旬起陆续派出人员对滇南地区部分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先后接管了位于个旧市的云南锡业公司；红河州的地州机关和所属各大口，以及该州所辖除开远县以外的红河、元阳、泸西、弥勒、蒙自、建水、石屏、金平、河口、绿春、屏边等十一个县；文山州的地州各机关；思茅地区的地区机关及所属各大口；西双版纳州的州工委、人委和所属各大口，以及该州境内之景洪农场总场和勐养农场总场、热带植物科学研究所；军部所在地红河州之开远县因已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县级领导机构未予实行军管，只接管了该县境内的州属企业十三家和县属工交手管局、商业局、邮电局、人民医院等单位。”“我军遵照中央关于制止武斗的指示和昆明军区的命令，先后派出部分部队前往昆明、文山、个旧、广南等武斗严重的地区，担负制止武斗的任务。指战员不顾挨打受骂，遭到围攻，乃至自身安危，冒着棍棒和枪弹的威胁，到群众中去做宣传工作，并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在武斗两派之间组成了一道道人墙，把双方隔开。在昆明担负制止武斗的一一〇团，每执行一次任务，都有一批干部战士被打伤。一九六八年一月三十日，一一三团

【1717】查玉升、徐其孝，1955年授衔少将。张子明、雷起云，1961年晋升少将。周兴，地方干部，原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云南省省长。

【1718】段思英，1961年晋升少将。吴效闵、何云峰，1964年晋升少将。顾永武、张静波、阎守庆、袁明，1965年大校军衔。

奉命乘车开赴制止武斗地点的人员，途中在鸡街地区遭到子弹、手榴弹袭击，数十人受伤，三营营长胡玉新等六名同志当场牺牲。在文山、广南制止武斗的一一四团，被围困两个多月，不仅遭到冲击、谩骂、扭打、侮辱和断水、断电、断粮，并且被迫中断了同上级和外界的联系。”“在负责滇南地区‘三支两军’工作的同时，我军部队还根据昆明军区指示，派出部分人员参加了昆明、东川、一平浪等地部分厂矿企业的军管工作，派出部分部队担负昆明等地一些重要目标的警卫执勤任务。一九六八年十月，我第十三军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和中央军委的命令，由滇南调往四川，接替第五十四军防务，隶属成都军区建制。同时，将原驻区的防务交由第十四军负责。”^[1719]

（三）陆军第十四军

1968年1月，领率机关驻大理县，代号7582部队。军长梁中玉，政委缺，副军长王守志，副政委成泽民、翟鸣武，参谋长高建兴，政治部主任原增禄。^[1720]辖陆军第四十师、第四十一师、第四十二师。第四十师师部驻临沧县，代号7594部队。师长原金锁，政委王玉琨，副师长李亥生，副政委张建文，参谋长卢永生，政治部主任康清威。第四十一师师部驻保山县，代号7599部队。师长王有福，政委张琦，副师长赵林枝、齐培元、王贵和、董胜、王英仕，副政委李贵明、赵荣德、曲明辉，参谋长王英仕兼，政治部主任赵琴。第四十二师师部驻下关市，代号7605部队。师长田大邦，政委赵世英，副师长葛成义、赵瑞来，副政委李廷忠，参谋长葛成义兼，政治部主任张民声。

1968年9月，军委命令五十四军由川东调至滇西，接替十四军防务；十四军由滇西调至滇南及贵州地区，接替十三军和四十九师的防务。10月28日，军委电示：同意将现驻贵州的四十九师与四十一师对调，调防后四十九师归十四军建制，四十一师建制不变，由贵州省军区代管。调防后，军领率机关驻开远县。四十师师部驻宜良县，四十一师师部驻贵阳市，四十二师师部驻普洱县，四十九师师部驻蒙自县。

该军军史称，“我军的‘三支两军’工作分为两个阶段，先后在不同地区和单位进行。一九六七年二月至一九六八年十月，除由军区统一调配少量干部和部队到省级机关及昆明市支左外，主要负责部队驻地的滇西地区之大理、保山、临沧、丽江、楚雄共五个地州、县、市的支左任务。共派出二千多名干部战士

^[1719] 陆军第十三集团军：《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十三军简史（1950—1985）》下卷，1993年，页174—178。

^[1720] 梁中玉，1964年晋升少将。成泽民、翟鸣武、高建兴，1965年大校军衔。

分赴上述地区党政机关、部门、厂矿、学校、公社，参加这些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八年十月，我军奉命调防到滇南地区和贵州省驻防，从一九六九年一月起，我军的‘三支两军’地区和单位更广，派出的人员更多。担负了滇南地区的红河、文山、思茅等三个地州、县市，还负责贵州省遵义、毕节、安顺等三个地州、市县的‘支左’任务。先后共派出八千五百多名干部战士分布在上述地区，继续执行‘三支两军’任务。至一九七二年中央三十二号文件要求‘三支两军’人员撤回部队起，我们军的‘三支两军’人员开始陆续撤回部队，而四十一师有的部队由于任务的需要，直到一九七四年底才全部撤回。”^{【1721】}

惟文革结束后云南地方严厉批评梁中玉道：

十四军军长梁中玉也在红河、文山、大理等地州积极推行“划线站队”。1968年11月27日，梁中玉在红河州把两派武斗事件宣布为“‘炮派’制造的反革命事件”，作为红河州“划线站队”的突破口，对两派武斗中的一派群众摧残迫害达七八年之久，被列为重点审查人员1,020人，制造冤假错案550起，受牵连人数2.48万人，被打伤致残3,693人，打死2,192人。1969年1月，梁中玉到文山州8个县作了9场报告，每到一个县都召开群众大会推行“划线站队”，煽动打人。每次报告会都宣布文山地区“炮派”群众组织“大联合指挥部”为“反动组织”，“要彻底砸烂”。每次讲话都点一大批人的名字，从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省军区政委、副司令员，省委副书记，军分区领导，地方的州、县领导，直到县、公社武装部长、公社干部，他都“横扫”一大片，号召对这些人“要狠狠地批斗”。1月12日，他在文山万人大会上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最危险的敌人到底是什么？是军分区的司令员、政委，他们不是老革命，是老反革命”，“我们在中央首长的支持下，把‘滇西挺进纵队’消灭了，我就是消灭‘滇挺’的头头。后来，在社会上有人骂鲁副司令员是鲁屠夫，骂我是刽子手，我说我就是杀反革命的刽子手”。文山州委书记李原、副书记马生申等一大批干部群众被五花大绑，罚跪在他作报告的台下听他训斥，干部群众被任意踢打，不少人被当场打残，有的被打死。他在砚山县的大会上讲：“各单位揪出来的不要上交，监督他劳动，然后进行斗争。”他到西畴县在大会上说：“可以打人，只要不打死。”话音刚落，就立即响起抓打声和受害者的惨叫声，很多人当场被打翻在地，被打伤400多人，打残200多人，打死共产党员牟顺昌、民兵排长庞家寿、民兵营副营长钱应堂。有几个县，听了

【1721】第十四集团军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四军保卫边疆史》，1990年，页161-162。

他的打人员报告后，供销社可以用作捆绑打人的扁担绳索等被抢购一空，一次又一次掀起游街示众和打人高潮。^[1722]

(四) 云南省军区

领率机关驻昆明市。文革前夕，辖文山、蒙自2个边防军分区及曲靖、昭通、玉溪、大理、楚雄5个内地军分区和昆明、东川2市人武部，1个边防团、4个边防独立营和1个警卫团。司令员黎锡福，第一政委周兴兼，政委张力雄，副司令员丁荣昌、朱家璧、熊奎、王银山、李兆升，副政委李明、谷自珍，参谋长王银山兼，政治部主任周政宜。^[1723]1966年7月，云南省公安总队所属部队划归云南省军区建制领导，改称云南省军区独立师(7703部队)，下辖3个步兵团，师长王西军，政委寇民。

(五) 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

领率机关驻昆明的相当军一级的空军指挥机关，统一领导指挥驻云南、贵州两省的空军部队，受空军和昆明军区双重领导，代号7105部队。主任刘懋功，政委崔文斌，副主任李发应、张东梅、马杰三、朱刚，副政委任敬汤，参谋长刘环，政治部主任任敬汤兼。^[1724]1967-1968年先后派出干部、战士约3,000人次，到云南、贵州省的一些地区和单位执行三支两军任务。^[1725]

(六) 第二炮兵第五十三基地

1967年5月由炮兵三〇四工程筹建处改称，归军委炮兵建制。1967年10月，划归第二炮兵建制。领率机关驻建水县，代号总字122部队。1968年1月，司令员、政委缺。副司令员贺进恒，副政委熊志生。^[1726]1968年8月，司令员贺进恒，政委熊志生，政治部主任庞汉良。未见该基地参与三支两军记录。

(七) 陆军第五十四军

1968年9月，该军奉命由四川调入云南滇西大理等地，接替第十四军防务，隶属昆明军区。领率机关驻大理县，代号由7788部队改0251部队。军长韦统泰、政委蓝亦农。下辖第一三〇师进驻临沧，代号由7790部队改0253部队。第

【1722】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2005年，页164-165。梁中玉在文革中的表现并未影响他的升迁。他于1970年4月升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1975年8月调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1980年5月在成都军区顾问任内病逝。

【1723】黎锡福、丁荣昌、熊奎，1955年授衔少将。张力雄，1961年晋升少将。朱家璧、王银山、李明，1964年晋升少将。李兆升，1965年大校军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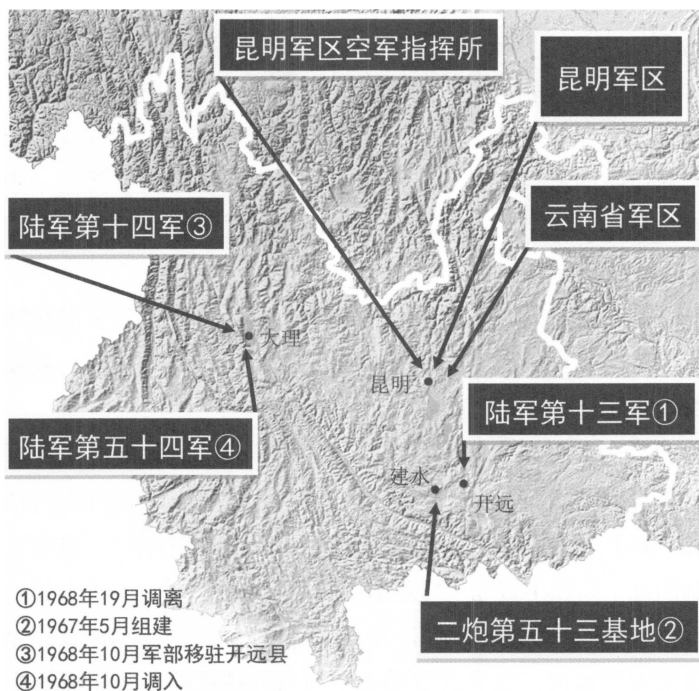
【1724】刘懋功，1955年授衔空军少将。崔文斌、李发应，1961年晋升空军少将。任敬汤、张东梅，1965年空军大校军衔。

【1725】《中国共产党空军组织史资料丛书》第2集，页404、414。

【1726】熊志生、贺进恒，1965年大校军衔。

一三四师进驻保山地区,代号由7795部队改0258部队。第一三五师进驻下关地区,代号由7803部队改0263部队。^{【1727】}五十四军移防滇西后,抽调干部1,964名,战士5,567名,建制连队107个,在昆明和东川两市以及大理、临沧、德宏、丽江、迪庆、楚雄、昭通等8个地区(州)57个县市,执行三支两军任务。^{【1728】}

云南驻军分布图(1967-1968)



二、1967年云南文革进程与军队^{【1729】}

1967年1月22日,以云南大学炮兵团为主的62个造反派组织,从大联委中分裂出来,另成立新云南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联络站。以后又经过不断分化组合,

【1727】云南省军区:《云南军事志》现代卷(上),页99。

【1728】陆军第五十四集团军军史编审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五十四集团军军史》,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2年,页361。

【1729】主要资料来源:当代云南编辑部:《当代云南大事纪要》,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页354-369;八·二三风展红旗:《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续集)》;昆明八·二三风展红旗:《昆明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

正式形成云南的两大派群众组织，一派以大联委为主，成立八二三战斗兵团，简称八派；一派以新云南为主，成立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简称炮派。

1月26日，新云南所属造反组织夺了云南省人委的权，当晚，大联委在检阅台召开“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并指责新云南夺省人委的权是“假夺权”。会后，大联委所属造反组织夺了中共云南省委的权，省委、省人委被迫停止活动。接着，省以下各级党政机关以至各行各业的基层组织也相继被夺权。云南夺权未有得到中央承认。

2月10日，中央电召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周兴、赵健民、郭超、薛韬、省委常委刘林元、省监委副书记周力赴京，讨论当前云南局势，研究对策。两大造反派也分别推选了代表赴京，抵京后，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接见了他们。周恩来对昆明两派代表说：云南省委、省人委不能长期瘫痪。中央准备对云南实行军管，委托李成芳负责，昆明军区和省军区组织一个领导机构，来帮助、推动你们实现“三结合”。

2月28日，云南省军区开始对云南省公安厅、昆明市公安局和邮电局实行军事接管。此后，全省的铁路系统、公路系统、报纸、广播电台、重要厂矿企业，相继实行军事管制。

3月18日，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作出《关于云南边疆地区实行军事管制的几个问题》（供试行用）、《关于边疆第一线县文化大革命改为正面教育的意见》（供试行用）和《关于边疆农场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供试行用）。昆明军区党委在实行军事管制的几个问题中宣布：“遵照国务院、中央军委三月十一日命令，对边疆各个专州地区实行全面军事管制”，决定：“丽江、保山、临沧、思茅、红河、文山等六个边防专州地区，以分区党委为主与当地驻军党委共同组织本地区的军事管制委员会，作为临时最高权力机关，行使党政职权。在昆明军区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滇南的思茅、红河、文山地区由十三军领导；滇西的丽江、保山、临沧地区由十四军领导。各边疆内地县以县武装部为主与当地驻军共同组织军事管制委员会；各边疆一线县的军事管制委员会，以县武装部为主或以边防团为主组成，由边防分区决定。县军事管制委员会，作为县的临时最高权力机关，行使党政职权”；“专、县的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设文化革命委员会和生产委员会……。委员会的成员和下属机构的主要领导职务，由军队干部担任。另根据需要对革命群众协商从地方机关中吸收一部分负责干部，参加委员会和办公室工作”；“各边工委、国营农场、林场和工厂，可根据需要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或派军事代表，实行

军事管制。区(大公社)有必要时由县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出军事代表(现役武装干部)实行军事管制”等。

3月19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后,昆明军区所属部队奉军委之命,陆续派出6万多名干部、战士参加三支两军。部队介入文革后,云南地方两大派都得到部队一些人的支持。这是云南两派斗争越来越激烈,以至武斗越来越升级的重要原因。倾向八派观点的军队领导干部,有李成芳、鲁瑞林、张子明,地方领导干部周兴;倾向炮派观点以军队领导干部陈康、张力雄,地方领导干部赵健民为代表。

3月31日,中共中央批准云南省军管会组成人员,云南省军管会正式成立,主任李成芳,副主任张子明、黎锡福。7月12日,昆明军区党委在给中央的《关于解决云南问题的意见》中提出,为了增强两级军区和部队内部的团结,保证部队的稳定和加强军管会的领导,建议增补陈康、张力雄为省军管会副主任委员。8月8日,中共中央批复同意昆明军区党委的意见。8月以后,李成芳、张子明相继离开云南,省军管会由陈康主持。陈康到北京期间,省军管会工作实际上由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省军管会生产指挥部部长鲁瑞林主持。^[1730]

云南辖2市7专区8自治州。3-4月间,实行军管的有1市5专区6自治州。其中东川市军管会主任由四十一师副师长田大邦担任;昭通专区军管会主任由昭通军分区司令员周大鹏担任;思茅专区军管会(辖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军管会)主任由思茅军分区第二政委熊明发担任;保山专区军管会主任由保山军分区第二政委范新友担任;丽江专区军管会(辖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县军管会和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军管会)主任由丽江军分区政委刘世泽担任;临沧专区军管会主任由临沧军分区政委郝效烈担任。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军管会主任由蒙自军分区政委马国藩担任;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军管会主任由文山军分区司令员崔正三担任;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军管会主任由第一民族支队政委郝生智担任;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军管会主任由保山军分区副司令员张志敏担任;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军管会总代表由丽江军分区副政委郭春轩担任;迪庆藏族自治州军管会主任由张贤孝担任。此外,昆明市、楚雄彝族自治州、大理白族自治州分别成立支左委员会。曲靖、玉溪两专区成立农业生产领导小组,由军队干部担任主要领导职务。^[1731]

【1730】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云南省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组织史资料、云南省政军统群组织史资料》,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页223-224。

【1731】《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组织史资料、云南省政军统群组织史资料》页226-228。

5月30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致电昆明军区党委，对昆明地区两大派发生严重武斗，军区机关、部队干部战士引起思想上动荡，极为关切，并作出几点指示：（一）对昆明地区两大派的武斗，军区机关部队干部战士都不要介入，应该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制止武斗，劝说群众摆事实、讲道理，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办法，逐步解决两派之间的问题，不要打击一方压制一方，使矛盾激化。（二）昆明军区处在反帝斗争的第一线，担负着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援越抗美、保卫国防等艰巨任务，军委1月28日关于重申军区文化大革命分期分批进行的指示中，规定昆明军区的文化大革命暂缓进行，望坚决执行这一规定，机关干部一律不开展“四大”，任何人都不得揪斗领导干部，保持机关、部队的稳定，院校、文体单位不得同机关、部队串连，一律回到本单位，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三）中央军委信任以李成芳为首的军区党委，军区机关部队全体同志要在李成芳同志为首的军区党委领导下，加强团结，坚守岗位，遵守纪律，努力工作，很好地完成中央、军委所赋予的三支两军、支援越南、保卫国防等一切任务。（四）对军区副政委张子明、胡荣贵的历史问题，由军委总政治部进行调查，尔后再进行实事求是的处理。

5月以后，从“四二六”、“五二八”、“五二九”的武斗开始，云南两大派群众组织由观点对立进入“全面内战”，武斗逐步升级，遍及全省。

6月23日至7月4日，受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委托，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李再含等到昆明解决云南问题。在昆期间。先后参加了两级军区党委联席会议，接见了驻昆部队干部和军队院校、文体单位群众代表，7月3日又参加了在东风体育馆举行的“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盛大集会”，谢富治、王力，李再含先后讲了话，要点是：一、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云南的问题要就地解决，要依靠云南的革命派和人民解放军自己解决”；二、针对前段时期一度出现冲击部队的情况，强调要认真贯彻“拥军爱民”的方针，保持部队的稳定。革命派对于军队某些负责人犯的错误不要看得太重，有了错误就检讨，就改正，改了就好了；军队要坚定不移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保护革命派，保护革命小将、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的组织；三、云南的两大派应该联合起来，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谢富治在军区党委联席会议上还指出：错误在于支持了一派，压了一派，违背了大方向，也违背了毛主席要我们团结大多数的教导，不利于革命的大联合和团结大多数。目前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军队，军队的关键又是两级军区——昆明军区和云南省军区，特别是大军区要负主要责任。后来，省军管会主任李成芳也就支左工作中“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作了检查。

7月6日,中央文革小组同意在《云南日报》公开点名批判阎红彦。7月9日,《云南日报》一版全文刊登《昆明军区党委关于深入开展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阎红彦的通知》,配发社论《打倒阎红彦,砸烂阎王殿》。

12月18日,为解决云南驻军在支左中出现的问题,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通知昆明军区、云南省军区、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陆军第十三军、十四军领导干部赴京开会(以后又扩大到司、政、后三大机关造反派代表)。12月27日,周恩来、康生、谢富治在京西宾馆接见了他们,周恩来在讲话中强调指出:“李成芳、胡荣贵、张子明有问题,支左不力,抽出来,不插手,作专案处理,像秦基伟一样让他休息,但不能说和他们接近的都是一派,一定要把李的问题搞进去,把整个部队搞进去,这是不怀好意,自毁长城。”“军队要有威信,现在急需稳定军队的威信。”根据中央领导人提出的稳定部队、制止武斗的精神,12月下旬,参加会议的陈康、鲁瑞林、田维扬、查玉升、张力雄、刘懋功、王银山、吴效闵、段思英、梁中玉、成泽民等11人曾3次致电昆明军区。23日电报称:近来昆明地区有些机关和部队极不稳定,特别是三大机关,严重地影响了部队的稳定和三支两军工作的进行,地方两大派武斗严重,社会秩序相当混乱,中央首长对此极为关切。根据中央首长指示,我们建议军区所属机关和部队应坚决执行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11月14日通知(即《关于各级军区机关目前不搞“四大”和军以下部队坚持正面教育的通知》),当前驻昆部分机关和部队以各种借口开展的“四大”是违背中央通知规定的,是错误的,应立即纠正。

三、1968年云南文革进程与军队^{【1732】}

1968年1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云南班”,解决云南问题,通知云南两派选出代表和军队支左人员共700人参加。2月11日,毛泽东等听取各省、市、自治区和军队办学习班的情况汇报,周恩来首先汇报了“云南班”的情况,当谈到云南已来了800多人时,毛泽东称:“不行,800人少了,要增加一倍。”此后“云南班”学员陆续增加到2,000多人。另外,根据毛泽东关于集训全军团以上干部的决定,昆明军区也在京举办了四批有3,000多军队干部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昆明班”。

【1732】主要资料来源:当代云南编辑部:《当代云南大事纪要》,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页354-369;八二三风展红旗:《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续集)》;昆明八二三风展红旗:《昆明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一、第二、第三集)。

1月10日，山东来云南支援边疆建设的工役制工程第八团77人，由炮派负责人李国贞率领，从昆明出发前往下关接回该团武斗中被围困的600余人，等待退役回山东。14日抵达下关后，卷入了当地的两派武斗，双方互有伤亡。当地驻军第十四军党委从派性出发，给工八团扣上“滇西挺进队”的政治帽子，强加一些莫须有的“罪行”，上报昆明军区党委，昆明军区党委未加核实，即上报中央。1月21日，工八团住下关的全部人员700多人，携带武器离开下关返回昆明。当天，康生、谢富治接见在京开会的昆明军区领导干部时称：“滇挺是造无产阶级的反，他们的枪口不是对敌人，不是对反革命，而是对人民解放军”，“他们的行为完全离开了文化大革命的轨道，走到反面了，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行为”。周恩来根据云南1月22日的报告批示：“同意对工八团回窜给以坚决堵截。”^{【1733】}1月27日，工八团途经一平浪矿区时，被部队围歼于甘海资煤矿，打死工八团成员184人，当地炮派群众和煤矿职工、家属59人。在1968年将近一年的时间内，军内外不断举办了“滇西挺进纵队罪行展览”，在“划线站队”和“清队”中，又掀起了抓“滇挺”分子的高潮。仅据大理州统计，在追查“滇挺”分子中，干部、群众被打死、逼死700多人，被打伤致残2,000多人，受株连的达10万余人。

1月21日，康生、谢富治等在京西宾馆接见昆明军区、云南省军区、昆明空军指挥所、第十三军、第十四军领导干部以及昆明军区司、政、后三大机关部分群众代表，并通知在京的赵健民也参加了会议。会上，谢富治指责赵“片面支持炮兵团，在后面出了许多坏点子，现在还在那里指挥”。紧接着康生追问赵1936年9月在白区工作被捕的情况，当面诬指赵是“混在我们党内来，想乘文化大革命把边疆搞乱”的“叛徒”。还称：“我看了国民党特务云南组的计划，你的行动就是执行他们的计划”。赵再三申辩，以党籍担保，要求中央审查。康生指责赵健民的要求是“疯狂地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即指使谢富治命令警卫当场将赵健民逮捕，投入监狱达8年之久。

2月13日，云南两大派赴京代表正式签署了《关于停火交枪、制止武斗的协议》和《关于恢复交通运输和保障邮电畅通的协议》。同日，周恩来、康生、江青、谢富治等接见了云南两派代表和军队代表，要他们在中央首长面前签字，强调“签了字就要执行”。当场在协议上签字的有八派代表40人、炮派代表40人、军队代表14人。2月2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对两个协议作了批示：“中央同意云南两派达成的协议，希望你们按照协议，条条落实，认真贯彻执行。”3月4日，两派赴京代表又签署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打击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协议》。

【1733】《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页169。

4月18日，中央军委电示：为了维护昆明市社会治安，同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警备区”。警备区由炮兵第四师领导机关兼。

5月19日，中共中央批准，任命工程兵政委谭甫仁为昆明军区政委，6月17日，中共中央又批准谭任昆明军区党委书记。从此谭正式主持云南全面工作，并直接领导正在北京举办的“云南班”和“昆明班”。他先后向学习班的部队和地方干部、群众代表讲了4次话，内容大同小异，要点是：一、云南两大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应该在革命的基础上，实现大联合。从军队来讲，对两派都要采取联合的方针，团结的方针，而不应支一派，压一派，武装一派，消灭一派；二、有的人以李成芳来划线，提出什么“没有李成芳的李成芳路线”、“李成芳有一伙人推行李成芳的路线”等，这是完全错误的。只能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来划，不应以李成芳来划；三、关于“革”与“保”的问题：云南两大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不存在“革”与“保”的问题，军队更不存在“革”与“保”的问题；四、云南的问题在军队，军队的问题在领导，在两级军区；五、军队要认真贯彻落实正面教育的方针，坚决执行中央“1114”通知，不搞“四大”，以保持部队稳定，无论如何不能把部队搞乱了；六、驻云南的野战军、省军区都是毛主席领导的，十三军、十四军、六十五师都是好部队，野战军、地方军都要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支持，互相学习，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不能把矛头指向部队，冲击部队。谭以上讲话，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肯定两大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毛泽东还强调：“要周兴、陈康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周兴、陈康离开京西宾馆到学习班去，周兴住到炮派，陈康住到八派，向群众作检查，消除对立情绪”这样一个背景下讲的。



谭甫仁在云南省革委会成立大会上，
1968年8月13日。

8月6日，昆明军区党委向中央作了《关于建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认为“从云南各方面情况看来，早日建立云南省的红色权力机构已经成为全省各族人民迫切的心愿，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的条件已经成熟。”8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准成立云南省革委会。

中央对昆明军区党委报告批示称：“中央同意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8月6日关于建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中央同意报告中所提的革命委员会委员和常委的名单，同意谭甫仁同志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周兴、陈康、鲁瑞林、刘明辉、黄兆其、李毅、徐学惠（女）、段宝珍（女）同志任副主任，另留两名副主任名额（产业工人、贫下中农各一人），待以后增补。”^[1734]批示中还把阎红彦、赵健民定为“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云南的代理人”。8月13日，云南省和昆明市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

谭甫仁主政云南期间，口碑不佳。1969年1月后，他主持在云南全面开展“划线站队”，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如“滇西挺进纵队”假案、“滇东北游击军”假案、“云南省中上层干部联络站”冤案、“摧资兵团”冤案、“关仓停粮，逼民造反”冤案、“黑银行”假案、“袭击202次旅客列车反革命事件”冤案、“‘文山农民革命军’反动组织”冤案、“江川农革军”假案、“新平特务组”假案、“国民党复仇军”假案、“反共救国军”假案、“国民支部”假案、“滇南情报总站”假案等等。据文革结束后有关部门统计，云南在“划线站队”中形成的冤假错案达1.5万件，被强加上各种罪名的有138万人之多（不包括被株连的直系亲属）、被冤假错案迫害致死1.7万人（不包括省革委会建立前，由于武斗等因素造成的非正常死亡的5,000余人），被打伤致残6.1万人。在“划线站队”的基础上，又全面开展了群众性的“清理阶级队伍”（“清队”）工作。据省革委会政工组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截至1969年8月底的不完全统计，当时已清出“九种人”（即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及现行反革命分子）25.7万人；正式列为批斗对象的44.8万人，被迫自杀死亡的6,979人。1970年后，又结合“清队”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1735]

^[1734]《关于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1968年8月10日。中发[68]128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1968年8月11日发出。刘明辉，原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黄兆其，昆明工学院研究生，八派。李毅，昆明医学院学生，炮派。徐学惠，昆明市百货公司一般干部。段宝珍，昆明纺织厂工人。

^[1735]《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页18、219。

此外,在谭甫仁指示下,1969年12月,昆明市革委会提出“移山填海,围海造田,战天斗地,向海要粮”的口号,布置在滇池边沿挖山运土造田,排干1,700万立方米湖水,造田1.2万亩。全省其他一些主要湖泊,如杞麓湖、异龙湖也都遭到类似不同程度的生态环境破坏,带来无法补救的恶果。^{【1736】}

1970年12月17日凌晨,谭甫仁夫妇在昆明军区大院居所内被正在受“清队”审查的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副科长王自正枪杀。谭终年60岁。

四、各地、市、州革委会的建立

1968年,云南各地、市、州革委会建立及与军队关系概况如下(以建立先后为序)。

(一) 迪庆藏族自治州

1967年12月10日,州、县两级军管会、昆明军区步兵一团党委、中甸县人武部联合向昆明军区报告,请求成立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县两级革委会。1968年2月27日,中甸县革委会成立。4月,经昆明军区党委批准,迪庆州革委会成立,与中甸县革委会“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至1972年分设)。主任张贤孝(军代表)。^{【1737】}

(二) 临沧专区

1967年10月,在军管会领导下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参加的有群众组织的头头及地方干部、支左军队干部,以推动实现“革命大联合”,筹建“三结合”的革委会。1968年4月28日,经昆明军区党委批准,临沧专区革委会成立。主任郝效烈(临沧军分区政委)。^{【1738】}

(三)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1967年1月29日,怒江州造反派夺了怒江州工委和州人委的权,领导机关瘫痪。1968年4月29日,经昆明军区党委批准,成立怒江傈僳族自治州革委会(后属丽江专区革委会领导)。主任于升鏊(军代表),1969年9月后范振山(步兵第九团政委)。

(四) 丽江专区

1967年1月27日,丽江专、县造反派到地委机关夺权。地委机关工作全部瘫痪。9月30日,丽江专区大联合总部成立,与昆明八派挂钩,主要以军管会支

【1736】《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页274-275。

【1737】刘群：《迪庆藏族自治州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页45、376。

【1738】云南临沧地区志编纂委员会：《临沧地区志（上）》，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页251-251。

持的原八派观点的丽江专、县造反派组织组成。1968年8月7日，丽江专区革委会正式宣布成立。^[1739]主任刘世泽（丽江军分区政委）。

（五）昆明市

1968年8月13日，经昆明军区党委批准，昆明市革命委员会与云南省革委会同时宣告成立。主任段思英（十三军政委）。1968年12月十三军调防后，主任一职由五十四军政委蓝亦农接任。

（六）楚雄彝族自治州

1967年4月中旬，十四军副参谋长路俊义带120名干部、战士，到楚雄州执行三支两军任务，楚雄军分区按照十四军指示，成立军分区支左委员会，主任黄学义（军分区司令员），副主任阎振龙（军分区政委）、路俊义。5月，支左委员会先后派出了619名干部到州、县级机关学校和企事业单位担任军代表，以军代表为主成立领导小组，领导所在单位的革命和业务工作。1968年8月19日，楚雄州革命委员会成立。^[1740]主任黄学义。

（七）思茅专区

1967年2月，夺权之风蔓延全区，各级领导机构瘫痪。4月4日，全区各级党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均实行军事管制。6-8月，全区造反派分裂成八二三和炮兵团两大派组织。9月，造反派勉强组织“革命大联合”。此后，派仗仍然不断。1968年9月7日，省革委会批准成立思茅专区革委会，同时撤销思茅专区军管会。革委会主任熊明发（思茅军分区第二政委）。^[1741]

（八）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1967年9月5日，文山两派不同观点群众组织开始抢夺部队武器，武斗升级为枪战，两派均有伤亡。1968年2月，州、县两派群众组织代表、支左部队代表、革命干部代表上京学习，签订两派革命大联合和“三结合”协议，8月返文。9月29日，州革委会成立。^[1742]主任席伯晏（军队干部，未到职），代主任王继模。

【1739】丽江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丽江地区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年，页47-48。

【1740】楚雄彝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楚雄彝族自治州志》，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148-149。

【1741】普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思茅地区志》，昆明：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页43-44。

【1742】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志》第一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页54-55。

(九) 大理白族自治州

1967年1月,大理州各级党政机关纷纷陷于瘫痪。3月,在大理军分区主持下成立“农业生产领导小组”,负责全州“抓革命,促生产”工作。5月,大理地区派性斗争愈演愈烈,局势全面混乱。6月1日,成立解放军云南省大理州支左委员会,由大理军分区和四十二师负责人参加,行使地委职权。9月29日,成立大理州革委会。全州开展了“划线站队”、“二次土改”、审查地下党等斗争,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迫害。^[1743]州革委会主任田大邦(四十二师师长)。四十二师移防后,由李蔚华(一三五师政委)接任。

(十) 曲靖专区

1967年2月9日,曲靖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夺了地委和专署的领导权,机关工作全部瘫痪,领导干部被揪斗批判。3月8日,曲靖军分区组成曲靖专区农业生产领导小组,军分区副司令员柴向东任组长,随即各县、区分别成立相应机构。同月,全区派出297名军人干部进驻机关、学校执行三支两军。1968年1月1日,曲靖专区生产领导小组改称生产指挥部,负责领导全区各项工作。1月,红八二七和云南八二七发生大规模武斗,云南八二七一派被赶出曲靖城。9月30日,曲靖专区革委会成立。^[1744]主任王文宗(曲靖军分区政委)。

(十一) 玉溪专区

1967年1月,玉溪军分区先后派出266名干部到地方各级机关、单位支左、支工、支农。3月,专区和各县组成以军队干部为主的农业生产领导小组。12月,玉溪地区两派造反组织,由口头攻击、大字报论战发展到夺枪武斗,发生流血事件。1968年9月30日,专区革委会成立,军代表申魁任主任。^[1745]

(十二) 昭通专区

1967年3月,昭通军分区和各县人武部介入地、县文革。同月,成立昭通专区军事管制委员会和昭通专区生产委员会。1-3月,各单位造反组织相继成立,支左办公室派出军代表,认定一些群众造反组织为“左派”。4-8月各个组织之间矛盾公开化,逐步升级到真枪实弹的武斗。军分区、县人武部先后发枪2,956支(其中轻重机枪171挺,冲锋枪379支),子弹15万发。9月4日,昭通县八一派

【1743】大理白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大理白族自治州志》卷五,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页103-104。

【1744】云南省曲靖地区志编纂委员会、中共曲靖地委史志工作委员会:《曲靖地区志》(1),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页106-108。

【1745】云南省玉溪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玉溪地区志》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页46。申魁,原蒙自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后任玉溪军分区政委。

头头挑动上万农民对县城内红旗派进行包围，城内与外部交通通讯被截断。1968年2月25日，昭通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在北京签订《关于停火交枪和彻底制止武斗协议》。县城仍被围困。9月30日，昭通专区革委会成立，县城始得解围。^[1746]专区革委会主任周大鹏（昭通军分区司令员）。

（十三）保山专区

1967年1月，中共保山地委书记林钧被造反派挟持到昌宁县城进行批斗。随即各县县委、县人委机构瘫痪。3月，保山专区军管会成立。7月，全区各县造反派逐渐形成两派，互相攻击，严重对立。9月15日，保山北关发生全区第一起两派械斗伤人事件。之后，两派武斗连连升级，保山、腾冲等县数十人在武斗伤亡。1968年10月1日，成立保山专区革委会。1969年1月28日，德宏州军管会撤销，合并保山专区革委会。^[1747]专区革委会主任张琦（四十一师政委）。1969年1月四十一师移防后由朱志伟（一三四师政委）接任。

（十四）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1967年5月，州军管会表态红总是革命群众组织。二三派以“景洪地区革命造反派”名义宣布正式接管已由军管会先行接管的州工委、州人委，实际上是夺军管会的权。1968年6-8月两派接连发生“六三〇”和“八四”武斗事件。8月，全州民族上层和宗教界人士被打成“牛鬼蛇神”，遭到残酷的斗争。10月1日，经省革委会批准，宣布成立西双版纳州革委会。^[1748]主任郝生智（第一民族支队政委）。

（十五）东川市

1967年初，市委、市人委及各级党政部门被造反派先后夺权，党政机关陷于瘫痪。8月，东川的群众组织分化为对立两派，并导致三次大规模武斗。1968年5月，解放军执勤部队进驻东川，收缴武器。10月24日，东川市革委会成立，主任崔保平（四十二师副师长）。1969年1月，一三五师换防进驻东川，市革委会主任由李九龙（一三五师副师长）接任。^[1749]

【1746】昭通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昭通地区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页419。

【1747】保山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保山地区》上卷，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页31-32。

【1748】西双版纳州委党史征集研究室：《西双版纳五十年》，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年，页134-139。

【1749】参考：东川市志编纂委员会：《东川市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

(十六)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1967年1月28日,个旧地区部分群众组织星夜夺了红河州、个旧市和云锡公司党政大权,随即夺权之风遍及全州。3月24日开始,红河州驻军和蒙自军分区先后组织1,184名军队代表进驻红河州和所属各市、县党政机关及中央、省、州属企事业单位,实行军事管制。7月31日-8月1日,个旧部分不同观点群众组织在七层楼发生武斗,之后武斗不断发生,逐步升级。1968年4月,中央在北京召集个旧地区群众代表协商,制定了《制止武斗、恢复生产、恢复交通及促进革命大联合》协议书。10月30日,经省革委会批准,成立州革委会。^{【1750】}主任袁明(十三军政治部主任)。十三军移防后,冯志国(十四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接任主任。

(十七)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1969年12月15日,德宏州所辖5县1镇革委会划归保山专区革委会领导,德宏州建制实际上被取消。

以上地、市、州级单位,实际成立革委会的16个。除2个情况不明确外,由地方军事系统任第一把手的8个,由野战军系统陆军第十三军、第十四军任第一把手的各3个。

第七十二节 福建:东南前线的三支两军

一、福建驻军简况

1968年1月,福建省内军以上单位共有以下10个。

(一) 福州军区

领导和指挥福建、江西两省境内所属武装力量。领率机关驻福州市。司令员韩先楚,政委叶飞(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兼,1968年2月免),第二政委刘培善(1968年5月自杀身亡),第三政委杨尚奎(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兼,1968年2月免),副司令员皮定均、朱绍清、邓克明,副政委廖海光、卢胜、詹化雨,参谋长周世忠,政治部主任严政。^{【1751】}

(二) 福州军区空军

领率机关驻福州市。司令员谢斌,1968年5月后杨思禄,政委李世安,1968年11月后韦祖珍,副司令员袁彬,1968年5月后蒋亭、吴元任,参谋长蒋亭,

【1750】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志编纂委员会:《红河州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页84-85。

【1751】詹化雨,1955年授衔少将。

政治部主任陈兴畴。^{【1752】}福建、江西两省境内空军部队归其建制领导。辖军级单位1个，师和相当师级单位10个。

1967年1月后，根据福州军区和空军安排，在福建、江西两省和三机部所属工厂共294个单位执行三支两军任务。截止1970年底，共有1,789名干部参加三支两军工作。^{【1753】}

(三) 陆军第二十八军

领率机关驻莆田县，代号6586部队。军长康林，政委王直，副军长周时源、蒋学道，副政委高占杰，参谋长张书香，政治部主任颜红。^{【1754】}辖陆军第八十二师、第八十三师，并直辖炮兵第一三一团（6587部队），领导指挥守备第八师、守备第十三师。第八十二师师部莆田县，代号6588部队。师长宋家烈，政委于耿光。第八十三师师部南安县，代号6607部队。师长黄冠亭，政委刘挺柱。守备第八师师部惠安县，代号6735部队。守备第十三师师部长乐县，代号6740部队。

该军军史称，1967年，“从1月底起，我军先后派出二千七百二十二名干部，赴福建的福清、永泰、南安、永春、德化、晋江、惠安、长乐、平潭、仙游、安溪、莆田县和泉州市共十二县一市、一百零六个公社、六十七个工厂、五十四所学校和十二个军管单位，担负‘三支两军’任务。1968年10月，根据中央军委和福州军区指示，我军对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部队进行轮换和调整，具体区分是：82师负责福清、永泰县；83师负责南安、永春、德化县，并和炮兵131团、独立坦克5团等单位负责泉州市；守备8师负责晋江、惠安县；守备13师负责长乐、平潭县；军直负责莆田县。1969年11月，我军奉命调防山西，参加‘三支两军’人员陆续撤回部队，留少数干部移交福州军区，继续担任‘三支两军’工作。”^{【1755】}

(四) 陆军第三十一军

领率机关驻同安县，代号6645部队。军长刘春山，政委郑国，副军长彭飞、田贤成，副政委张维滋，参谋长田世兴，政治部主任张志勇。^{【1756】}辖陆军

【1752】 谢斌，1955年授衔防空军少将。李世安、韦祖珍，1955年授衔空军少将。杨思禄、袁彬，1961年晋升空军少将。陈兴畴，1964年晋升空军少将。吴元任，1965年空军大校军衔。

【1753】 《中国共产党空军组织史资料丛书》第1集，页496。

【1754】 王直，1955年授衔少将。康林，1961年晋升少将。周时源、高占杰，1964年晋升少将。颜红、蒋学道，1965年大校军衔。

【1755】 陆军第二十八军：《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二十八军军史（修订本）》，1985年，页259-260。

【1756】 刘春山、郑国、彭飞，1964年晋升少将。田贤成、张维滋、田世兴、张志勇，1965年大校军衔。

第九十一师、第九十二师、第九十三师，并直辖炮兵第一三五团（6646 部队）。第九十一师师部位漳州市，代号 6647 部队。师长李军，政委荆世训。第九十二师师部位同安县，代号 6655 部队。师长宋忠贤，政委黄瑞祥。第九十三师师部位厦门市，代号 6718 部队。师长丛德滋，政委李平。

该军军史称：

军于一九六七年春，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持地方工作。军即抽调领导干部组成厦门、龙溪、龙岩地区群众接待站，了解当地运动的情况，做群众工作。

根据中央军委三支两军的指示和中央军委发布的关于不准对群众开枪、不准随意捕人、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过去冲击军事机关的概不追究、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活动的命令，军党委于一九六七年四月五日召开扩大会议，强调必须严格执行中央军委的“五不”命令，凡是重大问题必须经过党委集体讨论，个人不能随意表态；区分厦门市和龙海、平和、同安、南靖、长泰、云霄、诏安、漳浦、东山等县三支两军的任务，确定抽调五分之一的干部参加三支两军工作。四月下旬，根据上级的批复，对厦门市、东山、漳浦、龙海、同安县的公安局，东山、漳浦县的邮电局和广播站，厦门市的广播电台、《厦门日报》社和海关、火车站、航管局、水产局以及公、检、法机关等单位实行军管，保证工作正常进行。对三月间按照“公安六条”拘捕的人和取缔的组织认真地作了甄别处理。

……

一九六七年六月，福州军区批准厦门、龙溪地区实行军事管制。厦门市军管会主要由军负责，郑国政委任军管会主任，田世兴参谋长任第一副主任，陆军第九十三师、厦门军分区、海军厦门水警区的主要领导干部参加。龙溪地区军管会主要由空八军负责，本军机关、龙溪军分区、陆军第九十一师和十八分部的领导干部参加。实行军管对贯彻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稳定厦门、龙溪地区局势，起了重要作用。

……

七月二十六日，厦门即开始大规模抢枪，并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等武斗组织，在“文攻武卫”反动口号的煽动下，发生了八月二日在厦门大学、八月十九日在厦门莲板的大规模武斗事件。在此期间，部队机关被冲击、部队和民兵的武器被大量抢夺的事也不断发生。据不完全统计，厦门龙溪地区被抢走的各种枪支五千五百零七支（本军三百四十九支，兄弟部队一千四百二十九

支，民兵武器三千七百二十九支），无后座力炮五门，六口炮七门，八二迫击炮三门，手榴弹三千八百四十三枚，各种枪弹九十三万发。厦门万寿岩国防仓库被抢走二十三卡车的弹药，两派武斗开枪开炮，伤数百人，亡百余人。

.....

同年夏秋，为了稳定地方局势，保证生产顺利进行，军奉命派出部队执行护路、护桥和保卫重要目标的任务。驻厦部队派分队到厦门火车站、电台、监狱警卫；第二七二团一部进驻漳平、莱舟火车站，漳平汽车站和煤矿，负责铁路沿线的武装押运任务；第二七三团一部进驻漳州汽车站；炮兵第三七一团一部进驻漳州糖厂；第二七五团一部进驻龙岩汽车站。他们一面执行保卫任务，一面协助搞好生产，较好地维护了革命秩序，得到群众拥护。

.....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中央在北京举办福建各派群众组织和有关地方、军队干部代表参加的学习班，促进大联合、三结合。经过耐心教育，福建两派群众组织于十二月达成了大联合协议。

一九六八年春，军管会组织了一批军宣队，做基层单位的大联合工作。仅厦门市进驻的就有十五个工厂、学校。一九六八年二月二日，福建各派在京代表达成《关于收缴武器、制止武斗的协议》。根据军区指示，军党委于二月上旬派出二十六个连队、两个营部分别进驻厦门、龙溪地区二十五个基层单位、武斗据点和要害部门。二月中旬，厦门、龙溪各县市军管会大力发动群众，收缴武器。至三月底，厦、漳各地共收缴各种枪七千零九十五支，子弹四十八万四千六百多发，火炮一百零二门，炮弹四百七十三发，手榴弹一万一千四百六十九枚，炸药三千八百五十公斤，军宣队进驻的基层单位大部分实现了大联合。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六日，周总理在京接见福建学习班学员时，根据中央调查组在厦门经过三个多月的调查情况，对厦门的群众运动作了准确的估价、明确的指示，提出“厦门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要联合起来”的号召，这对稳定厦门的局势，促进群众的联合，加强军政、军民团结，起了决定性作用。

一九六八年八月下旬，厦门、龙溪地区军管会积极做好两派群众的工作，采取拆除武斗工事，在武斗现场强行收缴双方武器，限期上缴武器等有力措施。同时，军先后派出二十一个连队到厦门市、杏林、集美、平和、云霄、同安、丙州等地进驻三十七个制高点和武斗点，并在水陆交通要道设立宣传站，协助军管会查缴武器。一九六八年八、九月份，厦门和龙溪地区共

收缴各种枪六千五百一十五支(龙溪三千三百八十支),各种炮四十五门(龙溪二十九门),子弹三十四万八千九百多发(龙溪一十七万七千六百多发),手榴弹(含自造)八千九百一十六枚(龙溪三千零一十七枚),炮弹一百五十八发(龙溪一百三十八发)。诏安封存各种枪七百六十七支,弹一万九千六百多发,手榴弹六百五十五枚,拆除了大量武斗工事。仅厦门市就拆除了八百多处。从此,武斗制止,交通畅通无阻。

.....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四日,龙溪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主任由空八军副军长吴元任、副主任由第九十一师副政委高世昌等同志担任。九月吴元任同志调动工作,由副军长田贤成同志接任。九月十六日,厦门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主任由军政治部主任张志勇、副主任由第九十三师政委李平、师长丛德滋等同志担任。两地区各县(区)革委会于五月十四日至十月二十九日相继成立。大量地方领导干部参加各级三结合领导班子。军支左干部在两地区革委会中担任地县职务的六十五名,担任县以上机关正副组长(正副局长)职务的二百二十八名。一九六九年春,厦门市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张志勇同志调动工作,由军副政委丛德滋同志接任,直至一九七〇年三月。同年春,龙溪地区革委会主任田贤成同志调动工作,由军副参谋长陈天仁同志接任。

一九六八年九月,军接替空八军在龙溪地区的三支两军工作的任务。在这前后,有些县的支援任务也作了调整。^{【1757】}

(五) 闽北指挥部

1962年6月成立,指挥所属部队担负福鼎至闽江口北侧海防和机动作战任务。领率机关驻连江县,代号6728部队。司令员徐体山,政委尹明亮(代),副司令员青雄虎,副政委孙乐洵,参谋长李德安,政治部主任孙乐洵兼。^{【1758】}辖陆军第八十四师,代号6616部队。师长赵衍庆,政委李进民。领导守备第七师,代号6731部队。

(六) 福建省军区

领率机关驻福州市。1968年1月,辖福州、厦门、南平、福安、闽侯、晋江、龙溪、三明、龙岩九个军分区。1968年5月,福州军分区改编为福州警备区。并

【1757】 陆军第三十一军军史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三十一军军史(初稿)》第二册,1979年,页425-444。

【1758】 徐体山,1955年授衔少将。尹明亮,1961年晋升少将。青雄虎、孙乐洵、李德安,1965年大校军衔。

辖福建省军区独立第一师、独立第二师。司令员朱耀华，第一政委范式人兼（中共福建省委第二书记 1968 年 8 月免），第二政委刘健挺，副司令员毛会议、涂则生、林乃清、陈挺，副政委吴嘉民、周文在、罗维道，参谋长沈仲彝，政治部主任曾川。^{【1759】}

（七）福州军区炮兵

领率机关驻福州市。司令员刘禄长，政委方官富，副司令员沈仲文、高咏欣，副政委于英川，参谋长王鼎新，政治部主任李路明。^{【1760】}辖炮兵第三师，高炮第六十四师、第七十二师。

（八）福州军区工程兵

领率机关驻福州市。主任谢忠良，政委杨家华，副主任杨滨，政治部主任林枫。^{【1761】}

（九）海军福建基地

领率机关驻宁德县三都澳，代号 4008 部队。司令员康烈功，政委左爱，副司令员张朝忠、陈雪江、李胜明，副政委刘济民，参谋长孙公飞，政治部主任翟广明。^{【1762】}辖厦门、海坛水警区。

（十）空军第八军

担负闽南、江西地区国土防空和支援陆、海军作战任务。领率机关驻漳州市，代号 7104 部队。1968 年 1 月军长缺，政委张雍耿，副军长吴元任、徐登昆、李振川、王成美，副政委缺，参谋长曾冠民，政治部主任邹文泗^{【1763】}。1968 年 5 月 21 日，军委电令任命徐登昆为空八军军长，鲁鸣为政委，张雍耿调任沈空副政委，吴元任调任福空副司令员。1967 年 1 月后，根据空军、福州军区空军统一安排，空八军先后共派出 814 名干部在江西、福建及其他省市的三机部所属工厂执行三支两军任务。^{【1764】}

【1759】朱耀华、刘健挺、涂则生、吴嘉民、周文在、罗维道，1955 年授衔少将。陈挺，1961 年晋升少将。毛会议、林乃清，1964 年晋升少将。沈仲彝、曾川，1965 年大校军衔。

【1760】刘禄长，1955 年授衔少将。方官富、沈仲文、于英川，1965 年大校军衔。

【1761】谢忠良，1961 年晋升少将。杨家华，1965 年大校军衔。

【1762】左爱，1961 年晋升海军少将。康烈功，1964 年晋升海军少将。张朝忠，1965 年海军大校军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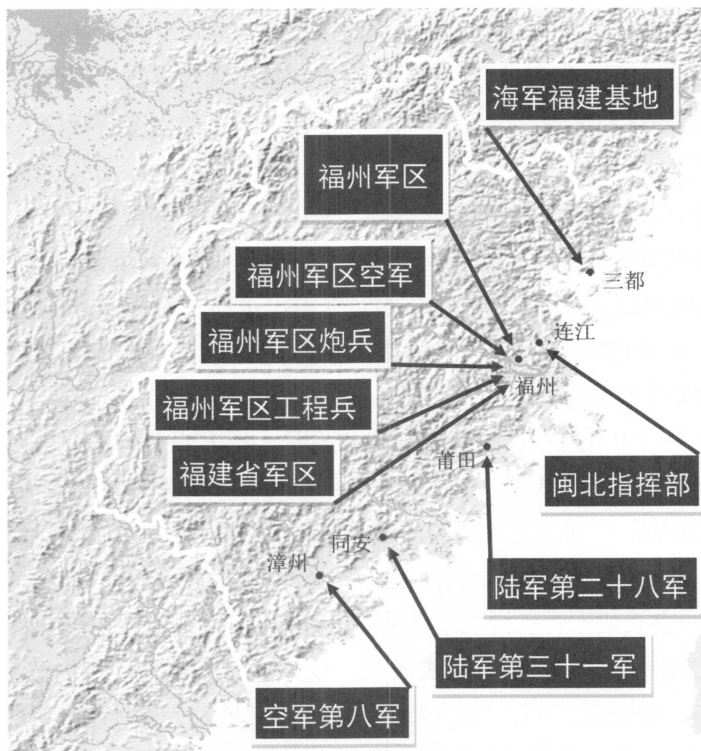
【1763】张雍耿，1955 年授衔空军少将。徐登昆、曾冠民，1965 年空军大校军衔。

【1764】《中国共产党空军组织史资料丛书》第 2 集，页 253。

二、1967-1968 年福建文革进程与军队^{【1765】}

福建 1967 年 3 月前的局势，见本书第三十三节。

福建驻军分布图（1967-1968）



1967 年 1 月后，福建省内群众组织分化成对立的两大派——以反军区反韩先楚为标志的福建省革命造反委员会（革造会）和以反叶飞为标志的福建省八二九革命造反司令部（八二九），各地、市、县的群众组织也相应形成两大派。

3 月，根据军委决定，驻福建各部队开始执行三支两军任务，至 1970 年 9 月先后抽调 16.1 万多人次（其中干部 4 万多人次）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到 1970 年 10 月，根据军委决定，全区有 904 名营以上干部到地方长期支左。

3 月 13 日，中央通知，王云集、陈文德等群众组织代表 12 人到京参加福建问题座谈。3 月 31 日，周恩来接见福建赴京全体代表，并作 6 点指示，指出 1 月

【1765】主要资料来源：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建省志·大事记》，北京：方志出版社，2000 年。

26日冲击军区是错误的，但对犯错误的人不要揪住不放，凡与1月26日冲击福州军区和2月7日冲击福建日报社有牵连被打成“右派”而被捕的，一律释放。

3月17日凌晨，周恩来看完福州军区党委关于成立福建省革命委员会和夺权问题的报告后，觉得条件不成熟，当即与韩先楚通电话，提议：（一）福建还是经过军管来筹备三结合的革委会好；立即以驻军负责人组成军管会，管起全省工作。（二）如各方面认为三结合（不是三凑合）条件确已成熟，可推出代表来中央一谈。（三）如18日大会^{【1766】}已宣布，无法取消，可改为准备夺权大会。毛泽东同意上述提议。^{【1767】}

4月20日，由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学院、师院附中和南下学生组织的四二〇行动委员会封闭了福建日报社。经周恩来作出关于“报社不能封”、“进报社的人要退出来”的指示后，四二〇行动委员会才退出报社。为使福建省主要新闻单位不受冲击，福州军区根据国务院、军委的批示，4月28日对福建日报社和福建人民广播电台实行军事管制。

4月30日，中央就福建问题提出10点意见。指出冲击军区和报社事件不能作为划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也不能作为革命与保守的分水岭，不予追究，但冲击军区是不对的。一切因此被捕的，应立即释放；一切因此被打成反革命或反革命组织的，应立即平反；要求各革命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中央同时宣布，福建先实行军管，并责成军管机构按中央精神，处理近几个月来发生的事件。

5月17日，省军管会宣布正式成立。以韩先楚为主任，廖海光为第一副主任，朱耀华、刘健挺、石一宸（福州军区副参谋长）为副主任，委员熊兆仁、陈景三（均为福州军区副参谋长）、颜红、刘维新（福州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1768】}

5月22日，省军管会召开会议讨论确定各地区军管会名单，并将沿海地区有关军管问题报中央审批。会上还确定沿海县实行军管由省军管会审批。5月23日，福州军区批准对三明、龙岩专区实行军管。6月13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复福州军区，同意对福州等沿海6个专、市实行军事管制。至此，全省2市7专区余南平专区未实行军管。

【1766】指报告中提出的定于18日举行的二十万人群众大会。此会原主要目的是向原中共福建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并宣布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1767】《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页136—137。

【1768】林一心：《“文革”时期的福建政治体制沿革研究——以党政沿革为研究中心》，硕士学位论文论文，2010年6月，页24。熊兆仁，1955年授衔少将。石一宸，1964年晋升少将。陈景三，1965年大校军衔。

福州市军管会的主管单位为福建省军区，主任由省军区副司令员涂则生担任；厦门市军管会的主管单位为陆军第三十一军，主任由三十一军政委郑国担任；龙溪专区军管会的主管单位为空军第八军，主任由空八军政委张雍耿担任；晋江专区军管会的主管单位为陆军第二十八军，主任由二十八军参谋长张书香担任；闽侯专区军管会的主管单位为闽侯军分区，主任由闽侯军分区政委王荣森担任；福安专区军管会的主管单位为闽北指挥部，主任由闽北指挥部副司令员青老虎担任；三明专区军管会的主管单位为三明军分区，主任由三明军分区政委程华民担任；龙岩专区军管会的主管单位为龙岩军分区，主任由龙岩军分区政委赵凡夫担任。^{【1769】}

从5月初至6月底，全省有22个县、市发生武斗，其中百人以上规模的武斗共85起，千人以上的有27起。武斗致死7人，伤1,351人，部队在武斗现场劝阻而致伤达138人。^{【1770】}7月后，全省武斗更加激烈。7月20日，革造会组织围攻八二九驻地人员，制造了“火烧交际处”事件。事件中，前来制止武斗的解放军伤亡295人（牺牲1人，重伤141人，轻伤153人），群众伤亡80多人。^{【1771】}全省各地武斗规模逐步扩大，夺枪事件不断发生，8月份夺枪事件最为严重。中央禁止夺枪的“九五”命令下达后，仍出现全省性夺枪事件。发生夺枪事件的地区达54个县、市，占全省69个县市的80%。^{【1772】}造反派共夺走几万支枪、炮和难以数计的子弹、炮弹、炸药。造反派有的用车、船参加武斗，并煽动农民大规模进城介入武斗，致使武斗一再升级，福州、厦门、漳州、泉州、龙岩和部分农村持续发生大规模武斗。^{【1773】}

7月13日，省军管会提出关于“老区”问题的几点意见，指出应按中央“农村十条”和关于福建问题的意见办事。“老区”组织问题，由广大群众用民主的方法商讨决定。被错打成“黑组织”、“右派组织”和被错捕、错斗的群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8月17日，中央同意并转发福建省赴京汇报团（群众组织代表参加）双方达成的4个协议，指示：双方应严格遵守协议，付之实施。省革造会和省八二九等8个总部达成的4个协议是：双方毫无条件、毫无保留地立即停止武斗，立即释

【1769】《“文革”时期的福建政治体制沿革研究——以党政沿革为研究中心》，页26-30。

【1770】福建省军管会：《五、六月福建武斗情况综合报告》，1967年6月26日。

【1771】福建省军管会：《在省交际处发生的武斗、纵火事件的情况调查》，1967年7月29日。

【1772】福建省军管会：《综报一九六七年武器、装备、物资被夺和归还情况》，1968年1月24日。

【1773】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建省志·共产党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页177。

放全部互抓的人员；双方在一定时间内撤离华侨大厦，另迁新址；坚决执行中央7月13日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的通知，双方不得以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双方保证在全省各地做到不得以任何借口、任何形式打、砸、抢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停止使用广播车，撤销广播站，互不围攻，各方自动拆除武斗工事等。

8月18日，省军管会被省革命造反委员会武卫司令部以“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由封闭，实行武装接管。23日，又强行进驻省委档案科办公楼。9月3日，中央指出：福建省革命造反委员会等组织随意进驻福州军区指挥机关的行动是极其错误的。即日，周恩来、陈伯达致电福建省各群众组织，要求进驻福州军区指挥机关的所有人员立即自动退出，并退还拿走的文书、档案资料等。

8月22日，周恩来与陈伯达指示：不论哪一派，在福建前线抢夺的枪支、弹药、一切军事装备和物资都必须立即交还解放军，立即停止夺枪，违反的以破坏国防安全论处。

8月29日，6万多人在福州市人民体育场集会并游行，将叶飞作为“中国赫鲁晓夫在福建的代理人”进行批判和声讨。大会由省革命造反委员会和福建前线部队革命造反委员会主持，北京和各地红卫兵代表也参加会议并发言。9月1日，《福建日报》发表《打倒叶飞》的社论。

12月上旬至1968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福建班。

1968年1月24日，省军区综报《1967年武器、装备、物资被夺和归还情况》指出，全省群众组织抢夺部队、民兵武器装备，是从1967年7月29日开始，8月份特别严重，“九五”命令下达后曾一度停止，10月中旬后再度发生。发生夺枪事件的有54个县、市。

2月2日，福建省各派群众组织协商通过《关于收缴武器、制止武斗的协议》。2月5日，中央同意此协议，批示：“希望你们按照协议，条条落实，认真执行。”

4月8日，福州军区、省军管会作出关于建立“三结合”权力机构革委会的审批手续规定。规定：一、专、市成立革委会，由大军区批准；二、县（市）成立委员会，以军分区为主，专（市）军管会协助审查批准；农村人民公社成立革委会，由县人武部审查，军分区批准。

5月8日，福州军区政委刘培善自杀身亡，终年56岁。

5月20日至7月5日,省军管会在福州举办第二期地方干部、部队成员和群众组织代表441人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班主要是帮助地方领导干部“斗私、批修”,为“三结合”作准备。

7月23日,福建省群众组织达成《关于大力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协议》。8月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对协议作了批示:“很好,望坚决贯彻执行,以促进福建省革委会早日诞生。”

8月20日,40万军民在福州集会,庆祝省、市革委会成立。韩先楚任省革委会主任,皮定均等11人任副主任。韩先楚在会上宣读毛泽东、中央批准成立省革委会的批示,并讲了话。8月2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热烈祝贺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称,“福建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彻底粉碎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福建的代理人叶飞、范式人、侯振亚之流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迷梦。”^{【1774】}

三、皮定均关于福建两条路线斗争问题的讲话

韩先楚1957年10月调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原司令员兼政委叶飞专任政委。中央交代叶飞管地方,军队工作由韩主持。韩、叶之间一直不咬弦,文革初期尤甚。福建两派亦因对韩、叶的态度问题,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1969年2月,皮定钧在福州军区、福建省革委会联合召开的支左工作会议上,就两条路线斗争问题作了讲话,回顾了韩、叶分歧的概况,表达了军方“挺韩反叶”的明确立场。皮定钧称:

为什么叶飞刚刚揪出来,就立刻刮了反军风,刮起了反对韩先楚同志的妖风。“一月革命”风暴,毛主席说:“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那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造反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这时,全国大夺权,走资派看军队一介入,权一夺,大势所趋,他们就认为根本问题不在造反派,起主导作用的是军队,就来了个“一二六”,那时,浙江、上海、新疆、西藏不少地方都有“一二六”。我就讲“一二六”是个反动行动,不是革命行动,他把矛头指向军队,人家不好喊“打倒解放军”,不好喊打倒那个排,打倒那个营,打倒那个战士,他就找军队的代表,福州军区就找韩先楚同志,广州军区就找黄永胜同志,南京军区就找许世友同志,沈阳军区就找陈锡联同志。一看全国的情况,我就着急,

【1774】 范式人,原中共福建省委第二书记。侯振亚,原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处书记。

他妈的！搞军队，军队就要注意这个问题。福建把矛头就对准韩司令，从广大群众来讲，要打倒韩先楚，群众是受蒙蔽的，他并不懂得嘛！韩司令对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但是敌人是有目的，是要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文化大革命。他要破坏文化大革命，首先就要破坏伟大的长城，只有把军队压下去，才能把权夺过去。毛主席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资产阶级也懂得，所以他要搞解放军。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叶飞在军内流毒极深，替他说话的有郑克诚、周振祥、李俊海、王锋，还有蒋俊基、孙继争，他们颠倒是非。我们大别山有一句话，就是“我们家里养了瞎眼狗”，这帮人就是瞎眼狗，专门咬家里人。他们是野猪，他们会造谣，搞“三百个为什么”、“韩先楚的罪行录”，他们把韩司令与叶飞作斗争说成是个人意气，说韩司令的错误比叶飞重一百倍，韩司令是五八年来福建的，军队原来是叶飞带来的，韩司令原来在第四野战军，对这里的干部也不熟悉，这不是颠倒是非吗？就是借口把军队搞倒。路线斗争不要把问题看得太简单。有的甚至说：“韩先楚窝藏叶飞、王于耕^{【1775】}”。那时叶飞要写检讨，他说没有地方写，周总理打来个电话，说他住在医院里写材料。这样，这帮狗，瞎眼狗就来咬。叶飞在医院里不写检讨，他在那里打老K。我和廖海光去叫他写，他说“写，写”，走了他就不写了。军队是有人真保叶飞的，还是相当负责的同志，还有人派汽车去把王于耕今天接到这里，明天接到那里，但是，倒没有人要打倒。韩司令是真正站在造反派一边的，却说是“保叶飞的”。这帮人要打韩司令，中央表了态，提出不能打倒。这些人顽固不化，王、关、戚在后面操纵，与这帮人勾搭，这帮人是“五一六”分子。“五一六”是反革命组织，福建有个“五一六”分部，×××军、闽指，×××军有没有呀？^{【1776】}现在我们知道后勤部有（闽北尹政委插话：我们那里还有大家伙），他们煽动军内外反对韩司令，反对韩司令不是反对个人的问题，就是反对军队，反对解放军，这是他们反革命的政治目的。揪叶飞，他们没有动静，打韩司令他们赤膊上阵。思想上站在叶飞一边。有的是特务分子，有的是反革命分子，有的是现行反革命，有的是双手沾满贫下中农鲜血的阶级异己分子。李俊海在日本侵略中国时，他反共演讲第一名，国民党时他也是反共演讲第一名。还有一个人，想当军区司令，他不打韩司令怎么行呢？为了证明这个问题，我要讲一讲中央对韩司令是什么态度的，重温一下毛

【1775】王于耕，叶飞夫人，文革前任福建省教育厅厅长。

【1776】原文如此。指二十八军、三十一军。

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中央首长一系列的指示。据不完全统计对韩司令的表态有十三次。

(1)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陈伯达同志给韩先楚同志的电报，电报说：“刚才我们得知：二月九日福州出现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两张传单。传单捏造说：‘一二六’是革命行动，‘韩先楚可以炮打’等等，这些纯粹是无耻的恶意指谣。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全体同志是支持韩先楚同志和福州军区的，根本没有也不会发出这样的电话或者电报。请警惕敌人的造谣中伤和挑拨离间。”以后查清，两张传单是造谣的，总是有反革命的造谣。他们冲军区，这个不是革命行动，要韩司令承认冲司令部，夺积极分子大会的领导权是革命行动，弄了韩司令两天两夜。以后毛主席都知道了。毛主席：“韩先楚同志这样很好，坐着汽车去接见。”

(2)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周总理接见福建赴京代表团讲话时说：“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委任韩先楚同志为福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周总理还打电话来讲，新疆、福建出了问题，对文化大革命有影响，福建的形势要特别注意，有什么要报告。

(3) 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在北京革命委员会会议上，陈伯达同志说：“有人说，中央文革委托到福州抓军内一小撮，打倒‘韩再道’这是有政治目的的”，周总理说：“现在福州、广州、沈阳很紧张，对野战军司令员动不动要打倒，在福建搞什么‘韩再道’，还要揪‘闽老谭’”，总理说“一定有坏人插手，不然，很难使人相信。”显然有反革命分子在挑动的。

(4) 六七年九月三日，伯达同志接见福建两派时说：“打倒韩先楚，中央不接受。韩先楚同志是打不倒的，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一定要搞解放军，这里就有鬼嘛！”

(5) 六七年九月五日，中央首长接见“八二九”总司，“革造会”，厦门“革联”、“促联”，伯达同志讲：“韩先楚是前线指挥官，你们以后会晓得，打倒他是错误的，回去要做好工作，要与韩先楚同志合作。‘打倒韩先楚’是政治上犯错误。”

(6) 六七年九月五日，周总理说“现在到处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广州揪黄永胜，福州要揪韩先楚，南京要揪许世友，沈阳要揪陈锡联，他们是老将军……；这是对伟大的军队的诬蔑。”

(7) 六七年九月八日，中央首长接见“革造会”、“军造会”时（“军造会”是非法组织），总理说：“福建要把矛头对准叶飞，全国对准刘、邓、陶。你

们不对准叶飞，打倒韩先楚，台湾在广播了，你们要警惕，敌人欢迎的事不是好的事。”

(8) 六七年九月二十六日，毛主席接见时，问了韩先楚同志身体怎么样……，你是打不倒的。

(9) 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周总理等中央首长接见福建班部分军队代表时，伯达同志说：“韩先楚同志是福建前线指挥官，人民解放军在福建前线的指挥官，担负着很重大的任务，保卫着祖国”。“打倒韩先楚的口号根本要不得，根本错误，中央是反对的。听懂了没有？”周总理讲：“‘九三’指示不是说明了么？搞两面派这是刘少奇的作风，彭、罗、陆、杨的作风，在福建你们把斗争矛头指向韩先楚，放着叶飞不管，福建的走资派是叶飞，中央的决议里都点了名嘛！你们完全颠倒了敌我关系。韩先楚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不是早就讲了吗？不管怎么，韩先楚中央是保定了。”康生同志说：“中央就是要保韩先楚，保定了！”

(10) 六八年一月二十日，中央首长接见福建班全体同志时，陈伯达同志说：“我是支持韩先楚同志的，因为毛主席支持韩先楚同志，党中央支持韩先楚同志。韩先楚同志是福建前线的指挥官，你们不保，不支持，是什么意思？只有台湾高兴。蒋介石高兴。”吴法宪同志说“党中央、毛主席、陈伯达同志是保韩先楚的，你们要打倒，你们不是说，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中央文革，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你们这样做，是听毛主席的话吗？”

(11) 在中央学习班时，毛主席接见，毛主席说：韩先楚同志，你不是会打仗吗？你同他们打一仗。六八年八月十一日，毛主席接见六大区的军队代表，主席又讲：韩先楚同志，拥护你的那一派没有问题了吧？你们要做好反对你们的那一派群众工作。对造反派和对军队不同。最近，韩司令按照毛主席指示，几次到下面都讲了，韩司令给我们作了榜样。现在有些反复，就是你压了人家才有反复。今天讲了，要像韩司令那样去做好群众工作。不要死不悔改。

(12) 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主席说：韩先楚同志来了没有？福建不是很复杂吗？后来不是韩先楚同志做了工作，问题就解决了吗？你们的报告很好（指成立革委会的报告）。^{【1777】}

【1777】永春县革命职工贫下中农红卫兵代表委员会：《造反报》第九、十期，1969年2月24日。

四、各地、市革命委员会的建立^{【1778】}

1968年，福建省辖7专区，2省辖市。各专区、市革委会建立概况如下。

(一) 福安专区

1968年4月15日，中共闽北指挥部委员会向中共福州军区委员会上报《关于成立福安专区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4月18日，中共福州军区委员会批示同意该报告。并同意由叶克宁（福安军分区司令员）任主任，范银根（守备七师政委）任第一副主任。

(二) 龙溪专区

1967年3月，龙溪军分区工农业生产办公室成立，领导全专区经济工作。1968年4月，专区造反派开始“革命大联合”（直至10月方告完成）。5月12日，中共空军第八军委员会向中共福州军区委员会报送关于成立龙溪专区革委会的请示报告。5月14日，中共福州军区委员会批示同意该报告。并同意由吴元任（空军八军副军长，1968年5月升任福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任主任。9月，三十一军接替空军在龙溪地区的三支两军工作，专区革委会主任一职由三十一军副军长田贤成接任。1969年初，由三十一军副参谋长陈天仁接任。

(三) 南平专区

1967年2月，成立南平地区革命造反委员会。3月，改称为地区革委会，主任陈洪波。1968年5月13日，中共福建省军区委员会向中共福州军区委员会报送《关于南平专区革命委员会“补台”的请求报告》。中共福州军区委员会5月15日同意该报告，并同意梁业坤（南平军分区司令员）任主任。

(四) 闽侯专区

1968年6月3日，中共陆军第二十八军委员会向中共福州军区委员会报送《关于成立闽侯专区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6月5日，中共福州军区委员会同意该报告，并同意王荣森（闽侯军分区政委）任主任。10月，于英川（军区炮兵副政委）任主任，王荣森改任第一副主任。

(五) 福州市

1968年8月12日，中共福建省军区党委向中共福州军区委员会报送《关于成立福州市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8月14日，中共福州军区委员会批准该报告，并同意由贺梦先（福州军分区政委）任主任。

【1778】有关各单位的请示报告和福州军区党委、福建省革委会的批复，见福建省档案馆卷宗221-1-25，

(六) 厦门市

1967年1月，厦门市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革联）和厦门市促进革命大联合委员会（促联）先后成立。2月4日，驻厦部队举行武装游行，表示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此后，军队开始介入地方文革运动，执行三支两军任务。3月1日，在驻厦部队主持下，经过两派协商，成立厦门市“三结合”筹委会。4月29日，革联、促联两派在工人文化宫发生武斗。此后，厦门市武斗愈演愈烈。9月3日，革联、促联两派赴京代表经过协商，在北京达成上缴武器、制止武斗等八条协议。但后来双方撕毁协议，武斗再起。1968年2月10日，革联、促联两派在北京签署《革命大联合协议》，次日两派开始上缴武器。16日，两派实现停火。^{【1779】}9月14日，三十一军党委向中共福州军区委员会、福建省革委会报送关于成立厦门市革委会的请示报告。9月16日，福州军区党委、福建省革委会批示同意该报告，并同意由张志勇（三十一军政治部主任）任主任。

(七) 晋江专区

1968年9月20日，中共陆军第二十八军委员会向中共福州军区委员会、福建省革委会报送关于成立晋江专区革委会的请示报告。9月23日，福州军区党委、福建省革委会批准该报告，并同意高占杰（二十八军副政委）任主任。

(八) 龙岩专区

1968年10月4日，中共福建省军区委员会向中共福州军区委员会、福建省革委会报送关于成立龙岩专区革委会的请示报告。10月5日，福州军区党委、福建省革委会批准该报告，并同意齐光照（龙岩军分区政委）任主任。

(九) 三明专区

1968年10月22日，中共福建省军区委员会向中共福州军区委员会、福建省革委会报送关于成立三明专区革委会的请示报告。同日，福州军区党委、福建省革委会批准该报告，并同意王健行（福州军区司令部作战部部长）任主任。

截至1968年10月，以上9个专、市革委会的第一把手，全部由现役军人担任。其中由省军区系统任第一把手的4个，占45%；三十一军2个，占22%；二十八军、军区机关、军区炮兵各1个，各占11%。

【1779】厦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厦门市志》第一册，北京：方志出版社，2004年，页68。

第七十三节 广西：军队对一派的强力镇压

一、广西驻军简况

1967年1月至1968年12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军级单位(不包括军事院校)先后有3个，即广西军区、空军第七军、陆军第四十三军。领率机关不在广西却参与广西三支两军的军级单位1个，即陆军第五十五军。师级部队、后勤分部前后共10个。

(一) 广西军区

领率机关驻南宁市。辖南宁、柳州、桂林、梧州、玉林、钦州、百色、河池等8个军分区及2个独立师。司令员欧致富，第一政委原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兼，第二政委李士才，第三政委魏佑铸(1968年9月任)，副司令员吴华、陈开路、刘重桂、焦玉山、陈运春、徐其海、孙伯威，副政委周绍明、何纪元、韩世福、王希永，参谋长李林(1968年7月免)、宋治平(1968年8月任)，政治部主任孙磊。^{【1780】}

广西军区为1968年武力镇压四二二派的指挥部。

(二) 空军第七军

统一领导驻广西和雷州半岛的空军部队，担负国土防空和援越抗美作战任务。领率机关驻南宁市，代号7332部队。军长王璞(1968年5月免)、刘玉堤(1968年5月任)，政委焦红光(1968年5月任)，副军长刘玉堤、范迪波、刘鹤翹(1968年5月任)，副政委焦红光、张永亮，参谋长周贤卿，政治部主任陈刚(1968年5月免)、张虎忱(1968年5月任)。^{【1781】}

空七军于1967年1月26日成立支左办公室。从1967年1月至1970年底，共抽调762名干部、战士参加地方三支两军工作。1972年8月后，除少数人员留在地方工作外，绝大多数三支两军人员陆续撤回部队。^{【1782】}

1967年11月，焦红光任广西革筹小组成员。1968年8月任广西革委会副主任。

(三) 陆军第四十三军

经毛泽东批准，军委1968年7月13日命令：为加强广西方向战备，加强部队领导和有利于作战指挥，决定在广西组建一个军部，恢复陆军第四十三军番

【1780】欧致富、李士才、徐其海，1955年授衔少将。魏佑铸、焦玉山，1964年晋升少将。吴华、刘重桂、陈运春、孙伯威、周绍明、何纪元、王希永、陈开路、韩世福，1965年大校军衔。

【1781】王璞，1963年晋升空军少将。焦红光，1965年空军大校军衔。

【1782】《中国共产党空军组织史资料丛书》第2集，页218-219。

号。原第四十三军所辖的第一二七、第一二八师归建，第五十五军第二二〇师、炮兵第一师第四十四团、第四十七军第一四一师坦克团划归第四十三军建制。同时，根据广州军区命令，组建高炮第六十八团。

1968年9月，第四十三军领率机关正式成立，驻柳城县龙船山（后又移至柳州市），代号6870部队。军长张荣森，政委王文德，副军长张福钰，副政委王程明、马福增，参谋长王恒一，政治部主任马福增兼。陆军第一二七师与第一四一师换防，西进桂林。第一二八师由广东惠阳移防至广西柳州市。第二二〇师仍驻防广西百色地区。^{【1783】}

（四）陆军第五十五军

1968年11月前，陆军第五十五军领率机关驻广东湛江合流。唯所辖军直炮兵第一六一团（6976部队）驻广西柳州箭盘山，陆军第一四四师师部位广西贵县。师部位广西田东县的陆军第二二〇师，1967年2月至1968年8月归五十五军建制领导。

副军长孙凤章1967年间任驻柳（州）支左领导小组组长。1967年8月任柳州铁路局军管会主任。1967年11月任广西革筹小组成员。1968年5月，孙凤章因同情四二二派被免除副军长及广西革筹小组成员职务。第一副军长霍成忠1968年8月任广西革委会副主任。陆军第二一九师副师长王国瑞1967年8月任柳州铁路局军管会副主任。1968年8月任柳州市革委会主任。

（五）师级单位

1. 广州军区后勤二十分部

分部机关驻桂林市，代号广字104部队。部长王斌（1968年11月免）、魏德安（1968年11月任），政委曹公和（1968年2月免）、张绍恭（1968年2月任）。^{【1784】}

1967年11月，王斌任广西革筹小组成员。1968年4月，王斌任桂林市革委会主任，分部副政委康凝任桂林专区革委会副主任。

2. 广西军区独立第一师

1967年1月组建。师部位宾阳县，代号6949部队。辖步兵第一、第二、第三团。师长董永兴，政委缺，副师长王建勋、徐吉元，副政委郭长僧（1968年6月免），参谋长徐吉元兼，政治部主任刘洪涛。1969年3月调防广东，改称广东省军区独立师。

【1783】济南军区《第四十三军军史》编辑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三军军史》，济南：黄河出版社，1998年，页399-400。

【1784】王斌、魏德安、张绍恭、曹公和，1965年大校军衔。

该师为 1968 年镇压四二二派的主力。

3. 广西军区独立第二师

1966 年 8 月, 广西公安总队改编为广西独立师, 9 月 1 日改为独立第二师。师部位南宁市, 代号 6966 部队。辖步兵第四、第五、第六团。师长李孝元, 政委张正安, 副师长饶金财, 副政委冯艾文, 参谋长赵振华, 政治部主任陈国。1969 年 3 月改称合浦独立师, 师部移驻合浦县。1969 年 12 月, 复称广西军区独立第二师。

4. 陆军第一四一师

1968 年 9 月前, 师部位桂林市郊奇峰镇, 代号 6955 部队。师长陈育才, 政委张骥(1967 年 12 月免)、桑文重(1968 年 6 月任), 副师长郝忠云、韩更, 副政委赵宝立、桑文重, 参谋长任常裕, 政治部主任华鲁。辖步兵第四二一团、第四二二团、第四二三团, 炮兵第五二一团和坦克独立第九团。1967 年 1 月至 8 月, 所辖各部相继奉命进入广西桂林市和湖南长沙、常德、株洲等地区执行三支两军任务。1967 年 11 月, 郝忠云任广西革筹小组成员。1968 年 4 月, 郝忠云任桂林市革委会副主任。1968 年 9 月, 与陆军第一二七师换防, 由桂林调往广东翁源。坦克独立第九团与在桂林地区担负的三支两军和护路任务, 全部移交给第一二七师。

广西境内唯一一支同情及支持四二二派的师级部队。

5. 陆军第一四四师

1968 年 11 月前, 师部位贵县。代号 6977 部队。师长阎永让(1968 年 6 月任), 政委蒋超(1968 年 6 月免)、郭长僧(1968 年 6 月任), 副师长张本林、金文秀、王焕东、李金祥、边贵祥、翟元祯, 副政委甄文林、周锡铭, 参谋长闵春明, 政治部主任官勇。辖步兵第四三〇团(6983 部队)、第四三一团(6984 部队)、第四三二团(6985 部队)及炮兵第五四三团。从 1967 年 1 月至 1968 年 11 月, 主要担负南宁、柳州、贵县的三支两军任务。师直在柳州和贵县, 四三〇团在鹿寨, 四三一团在柳州和南宁, 四三二团在湛江, 炮兵第五四三团在南宁支左。1968 年 8 月, 阎永让任柳州铁路局革委会主任。1968 年 11 月, 由贵县、柳州调防至广东揭阳。

1968 年 2 月, 第四三一团调离南宁支左一线时被四二二派挽留, 酿成极具争议事件。

6. 陆军第一二七师

1968年9月与一四一师换防，移驻桂林市，调归第四十三军建制领导，代号6898部队。师长马庆功（1968年12月免）、张万年（1968年12月任），政委王大举（1968年12月免）、关光烈（1968年12月任）。辖步兵第三七九团、第三八〇团、第三八一团、炮兵第五〇七团及坦克独立第九团。驻桂林期间执行过三支两军任务。1969年10月，移防河南。

7. 陆军第一二八师

1968年9月，由广东惠阳地区移防至柳州市，调归第四十三军建制领导。代号6879部队。师长俞梅生，政委刘安元。辖步兵第三八二团、第三八三团、第三八四团及炮兵第五〇八团。自1968年10月开始，分别在柳州铁路局，柳州市公检法、工交战线，罗城、宜山部分地区执行三支两军任务。1968年10月，俞梅生任柳州铁路局革委会主任。1969年10月，移防河南。

8. 陆军第二二〇师

师部位田东县，代号6908部队。1968年9月，归重建的陆军第四十三军建制领导。师长刘兴胜，政委阎尚杰。辖步兵第六五八团（6911部队）、第六五九团（6912部队）、第六六〇团（6913部队）及炮兵第五九〇团（6909部队）。1969年9月，番号改称陆军第一二九师。10月，进入贵州执行三支两军任务。

9. 陆军第一二一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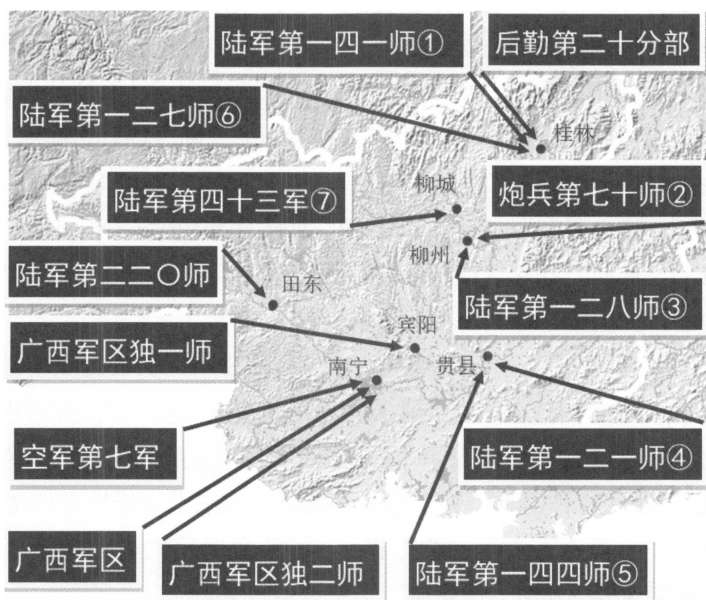
1968年11月，由广东兴梅地区调防至贵县地区，接替陆军第一四四师防务。师部位贵县，代号6810部队。师长于海学，政委刘智民。辖步兵第三六一团、第三六二团、第三六三团及炮兵第五〇一团。12月，遵照命令抽调部队支农。师侦察连与师工作队进驻广东高州；三六二团进驻广西贺县、昭平；炮兵五〇一团进驻广西贵县、博白；三六二团在广西贵县覃塘地区、三六一团在广东韶关地区结合国防施工就近支农。

10. 炮兵第七十师

1966年2月在柳州组建，代号6934部队。下辖炮兵第六二一团、第六四一团（6935部队）、第六四二团（6936部队），1967年4月组建六四〇团。师长张建中，政委李景炎。1967年8月入越，1968年3月回国。回国后师部驻柳州龙船山；炮兵第六四一团驻柳州红马山；炮兵第六二一团驻雁山，后调柳州南担任三支两军任务；炮兵第六四二团在南宁执行三支两军任务。1968年9月，解除炮兵第六二一团、六四一团在柳州市临时支左任务，炮兵第七十师由柳州移驻桂林原桂

林步校校址。1969年3月移驻湖南衡阳车江原一三九师营房，炮兵六四〇团1968年12月回国后直接进驻湖南车江营房。

广西驻军分布图(1967-1968)



- ①1968年9月调离②1967年8月入越,1968年3月回国③1968年9月调入
④1968年11月调入⑤1968年11月调离⑥1968年9月调入⑦1968年9月组建

二、1967年广西文革进程与军队^{【1785】}

1967年1月19日，桂林市革命造反大军（桂林老多）连续三天在桂林市体育场召开几万人的大会，批判韦国清、桂林市委书记黄云等一批区、市领导干部。被陪斗的有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贺希明等。在批斗中，他们被挂黑牌，戴高帽；有些人被强迫下跪。批斗后，数十辆汽车进行大游斗。造反派用工人赤卫队和红旗红卫兵的袖章缝制衣服，要韦国清披着，站在第一辆汽车上游街示众。被游斗者沿途被人掷石子、吐唾沫，受尽凌辱。

【1785】主要资料来源：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十八册，1988年；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编写小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1月23日，广西工总、广西红总、广西八三一、广西八八红卫兵总部、首都三司驻邕联络站等26个造反组织，于凌晨三时进自治区党委大院，夺了各部委的一切大权。相继被夺权的单位有自治区人委、区公安厅、高级法院和南宁市委、市人委等。当天，柳州铁路局也被夺权。接着，桂林地、市、梧州地、市、柳州地、市，玉林、河池、百色等地区党政领导机关，也分别于24-26日先后被夺权。至2月上旬左右，各级党政组织陷于瘫痪，全区处于无政府的混乱局面。

1月23日，韦国清在区党委大院内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揭发刘少奇、邓小平的几个问题》，说刘少奇、邓小平是“潜藏在党内的危险人物，是两颗定时炸弹，过去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干了很多坏事”等。2月1日，韦国清贴出第二张大字报《揭发两面派陶铸》。2月5日，韦国清贴出第三张大字报《揭发王任重的几个问题》。

2月11日，根据广州军区的指示，广西军区民兵办公室改为支左办公室，由王希永、孙磊、韩世福、徐其海等人负责。

2月15日，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派支左办公室人员去区党委群众接待站散发他1月28日“给国清、区党委常委并报广州军区党委”的信和揭发韦、乔、伍问题的材料。欧致富在信中表示“军区部队必须支持和援助‘广西革命造反大军’，尽管他们遇到种种困难，甚至有多次反复，也毫不动摇地支持援助他们”。还称“区党委主要负责人表示同意把权交给‘革命造反大军’，但下面不愿意交权，下面的权看来是掌握在‘保守派’手中”。

2月19日，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人委副主席贺希明，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委副主席李殷丹，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谢王岗，自治区公安厅厅长管世新等十二名领导干部，发表《革命造反声明》（后称《二一九声明》），提出“砸烂区党委！打倒韦国清！打倒乔晓光！”“二一九”声明发表后，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伍晋南、候补书记霍泛发表声明支持。声明公布后，全区逐渐演变为以人划线的两大派组织。

3月6日，中共广西军区委员会发出《关于成立抓革命促生产指挥的通知》，决定在军区党委领导下，成立广西军区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主任欧致富，副主任陈开路、徐其海、何纪云、范迪波、魏德安、贺希明（4月26日撤销）、李殷丹等十三人。通知发出后，各地、市县也相继成立了以解放军为主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

3月13日，周恩来打电话给韦国清称：广西地处援越抗美前线，要实行全面军管，你站出来当军管主任，黄永胜搞广东，你搞广西。韦国清称：“现在搞得不像个样子，站不出来了。”周说：“我们做工作。”还指示军区给韦国清拿一套军装

穿，并要空七军派专机把韦国清送到广州。14日，韦国清乘飞机由南宁赴广州。17日，韦国清从广州乘飞机去北京。

3月18日，按中央指示，广州军区副政委陈发洪率领工作组到广西筹备成立广西军管会，并做韦国清“站出来”的工作。21日，广西军区召开区直机关代表座谈会，座谈区党委领导干部谁能站出来的问题。陈发洪传达了中央对韦国清的看法，称韦支援越南是有功的，是好同志，要支持他站出来。3月下旬以来，经广州军区赴桂工作组和广西军区做工作，一批群众造反组织和一些中上层领导干部，纷纷表态支持韦国清站出来。同时也有一批群众造反组织和干部坚决反对韦国清站出来，形成了两派的观点。

3月23日，经广州军区批准，广西军区派出50名干部，对区公安厅、银行、邮电局、广西日报社、外事办公室（含交际处）、广播电台和市公安局等九个单位实行军事管制。

4月22日晚，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等数十个造反组织万余人在南宁召开大会，并于当晚宣布成立南宁四二二火线指挥部（后改为广西四二二革命行动指挥部，简称广西四二二）。总指挥曾春生（广西医学院学生）。

5月25日，支韦派成立五二五革命行动指挥部，以与四二二相对抗。从此，各组织便分别汇集阵线分明的四二二火线指挥部和五二五指挥部（后改为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广西联指），形成势不两立的两大阵营。

5月29日，南宁市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南宁警司）发出《致“新工总”、“倒海翻江”负责人的忠告、警告书》、《致“四二二”的通告书》，公开把斗争矛头指向一派群众组织。6月2日，南宁警司发出《致四二二火线指挥部通知书》，指责其“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叛徒操纵下”，“非法夺取军管广西日报的权。”要求他们撤出广西日报社，停止武斗，并掌握斗争大方向。同年9月26日，南宁警司撤销了《通告书》，并向四二二道歉。

6月1日至12日，四二二派第六次冲击广西军区，强行进入军区院内贴大字报，涂写反军区标语，提出改组广西日报军管小组，撤销致新工总、倒海翻江忠告、警告书，工总平反等七点要求；并进驻军区，四次封闭军区支左办公室群众接待站；打伤警卫战士，并在军区大门口和院内，集会和示威游行。同一期间，联指派组织约六万人次，先后六次到军区院外周围示威游行，抗议四二二冲击、进驻军区和冲击军管广西日报。双方发生袭击、绑架事件。

6月14日，周恩来第二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这次接见主要解决柳州国际列车停运问题。周批评四二二不开车是不对的；还把车开到道叉上，使别的车不能

开，是破坏行为。批评联指上火车抢报纸，并检查国际列车邮件也是不对的。报纸问题。周总理批评了四二二说：“冲军管是不对的。”“办的《广西日报》是派别报纸；”同时也指出：“如果军管了，只登一派声音也是错误的。”还指出，“在问题没有解决前，不要办成派别报纸，不登本地消息，只登中央电讯”。“为了传达毛主席及党中央的声音，先登北京消息。”

7月4日，广西赴京两派在京达成《十条协议》，周恩来指示：“立即发给广西来京全体代表并请两派和军区以明电和电话打回转告全区照办。”24日，根据两派达成的《十条协议》，双方在京代表就组织南宁地区监督小组问题达成协议。双方同意各派代表19名，由广西军区召集组成监督小组。26日，由军代表和两派组成的监督小组成立，监督小组由军代表领导。

8月9-10日，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纠集广西四二二汇报团和北京红代会人员二百多人，再次冲击京西宾馆，打伤韦国清。上午，四二二一些人去京西宾馆找王希永，要王希永把韦国清找出来解决广西武斗问题。王希永同意了。接见人除韦国清外，还有王希永、徐其海、陈发洪和张骥等。四二二代表团团长杨福庭等赶到后，拿出四点要求要韦国清签字，韦不签，但王希永签了，大家对韦更不满。这时，北京红代会的人已经来了，有人在门外打手势，示意要揪走韦，韦见势不对，说要出去小便，想从小门离开。北京红代会和四二二汇报团一伙人乘机要抢韦上汽车，京西宾馆的警卫战士、工作人员和厨师等闻讯赶来保护韦，并把他们隔开，但北京红代会等一伙人冲进去，扯掉韦国清的领章，卡住他的脖子，把他推倒在地上踢打，韦的小腿、腰部、眼角、面部均受伤，流血不止，昏迷过去（后警卫战士将他送回房间）。当时在会议室的工总成员也围攻、辱骂、推打了徐其海，并撕了他的领章和帽徽，抢走了他的军帽。零时左右，周恩来秘书周家鼎传达周指示：要四二二马上离开京西，如果再这样做，中央就要考虑你们是不是造反派了。四二二的人方离去。

8月上旬，一四一师政委张骥也做王希永的工作，要他支持四二二和老多。后王希永草拟了一封表态信称：四二二是造反派。过去觉悟低，认识迟，今后要坚决支持他们；联指是保守组织，今后要做他们的转化工作，要以四二二为主，联合联指等。在周恩来五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时，戚本禹称“王希永的态度比较好”。^{【1786】}

【1786】1968年3月，王希永以在三支两军中“犯有严重错误”和“历史反革命”、“特务”的罪名被隔离审查，1969年10月正式免职，到湖南西湖农场劳动长达八年之久。文革结束后于1983年复查撤销原结论，1984年调为正军职离休，1989年4月2日病逝。

8月24日,周恩来第五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陪同接见的有戚本禹、黄永胜。接见中,周批评联指:“越搞越不像话了,老进攻人家,越走越远了。”又称:“你们批判资产阶级路线是不能抹煞的,支韦是可以的,打倒贺、霍是对的,但不能压人家,压人家就不对。”并对四二二代表称:“‘联指’过去压你们不对;你们抢援越物资不对;你们到京西宾馆去,韦国清接见你们,把他打伤了,这就不对了。”“过去你们受压,现在不能再反过来压别人。”“中心问题是搞好与解放军的合作。军区过去支一派压一派,现在军区要支持你们,你们是造反派,军区要端正态度,积极支持你们,也帮助他们(指联指)。”并说:“军区错了,能改,就要拥护。提出一小撮口号,主要是指党内,对军队不能用这个口号。……如果不是这样,就要犯错误。你们对韦过火了,对贺、霍上当了。”最后,联指张小秀问:“我们是什么组织?”周答:“是群众组织。继续革命还是革命组织。”联指代表团因此对周大为不满,不辞而去。周五次接见两派代表后,四二二派以响当当的“造反派”自居,乘机加强政治宣传攻势,压联指;联指派则乱了阵脚,有的“倒戈”,有的发表声明退出联指组织;一些原表态“支韦”的领导干部有的也改变观点,发表支持四二二的声明。联指部分人对广西军区某些领导人当时的态度不满,冲击了军区。

8月24日,驻柳五十五军等部队发表声明,支持柳州造反大军。同日,柳州军分区决定:为红铁军彻底平反,被捕人员一律释放,恢复名誉。^{【1787】}

8月30日,同日,桂林驻军6955部队(陆军第一四一师)与桂林地、市造反大军举行“拥军爱民”武装游行。6955部队出动六十门大炮、一百四十辆汽车,满载全副武装人员参加游行。这次游行加深了桂林两派的对立和支左部队之间的分歧。

8月31日,广州军区发布命令:任命孙风章为柳州铁路局军管会主任,王国瑞、张丰昌为副主任。金文秀为南宁分局军管会主任,黄世卿、翟元勋为副主任,曹银忠为柳州分局军管会主任,王洪均为副主任,华庆国为都匀分局军管会主任,程振堂、李观明为副主任。

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决定》认为,广西军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两军工作中,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军区对支左工作中发生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所作的

【1787】3月24日,柳州军分区曾发布《关于取缔反革命组织全国铁路革命造反兵团红铁军柳铁合同工造反司令部的公告》,决定将廖志刚等14人依法逮捕。

检查是深刻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1788】}《决定》认为，韦国清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虽然犯了一些错误，但能够诚恳地检查错误，态度是好的。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批准了他的检查，毛也看过这个检查，并批示“照办”。^{【1789】}中央还同意安平生、伍晋南的各自检查和韦国清、伍晋南、安平生的联名检讨。中央同意和支持两派赴京代表在京期间签订的《关于广西两派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十条协议》、《关于立即停止武斗的协议》和《关于全面上交枪支弹药的七点协议》，并希望广西军区、当地驻军和各群众组织切实贯彻执行。中央决定建立由韦国清、欧致富、魏佑铸、孙凤章、焦红光、郝忠云、王斌、伍晋南、安平生以及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12月24日，经中央批准同意，革筹小组和军区联合发布了《取消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等组织的紧急通知》。指出“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贫下中农镇反委员会”和“贫下中农肃反委员会”等组织是非法的，必须立即取消，停止活动，今后不得再成立类似组织，更不得以任何名义、任何借口私设法庭，随意杀人、捕人，如有违抗者，严加追查，依法惩办。

三、1968年广西文革进程与军队^{【1790】}

1968年2月4日，区革筹小组开会，讨论如何克服派性和抓好对敌斗争问题。韦国清、魏佑铸、王斌、郝忠云、安平生、孙凤章出席。韦国清称：“广西有几条黑线。一是历史反革命，他们当过高级军官，在红军时代，杀害过红军和群众。二是地下党被破坏两次，有叛徒。三是有托派，过去有一批留苏学生，有的参加了托派。四是有走资派，也就是刘邓黑线伸向广西。走资派是黑线上的人物，他们不搞坏事是不可能的。当前群众派性比较严重，这些人不利用群众的派性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去年底大联合的形势很好，很快又出现了反复呢？就是有黑手在活动。透过南宁和一些地、县的一些现象，我们要看到逆流是从哪里出来的。‘捍联站’和有关挽留6984部队的联络站等等，就是表演嘛，就是有黑手嘛！要把黑手统统抓出来！”孙凤章称：“从我个人看，没有也不敢把矛头指向省军区，

【1788】11月8日，广西军区党委作出《广西军区在支左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检查报告》称：“我们的错误是，对反对韦国清同志的‘四二二’，接近少，支持少，实际没有给予支持”，“对他们的一些缺点错误看得过重，且在政治上压制了他们。”《检查报告》又称，“在执行军管任务中，我们对群众态度有错误”，“由于我们在支左工作中，支持一派、压制另一派的错误做法，激化了两派之间的矛盾，使南宁市和广西各地的斗、批、改受到了影响。”

【1789】11月1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批转韦国清《在广西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检讨》。

【1790】主要资料来源：《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十八册；《广西文革大事年表》。

也没有把问题推到区革筹小组身上。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希望能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是很有必要的，是有益处的。省军区、各军分区和各县武装部对过去的问题还是作公开检查一下为好。”^[1791]

2月12日，广西四二二五千多人到广西军区举行挽留6984部队（步兵第四三一团）大会，并发表声明：（1）韦国清必须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了解真实情况，否则后果由韦国清负责。（2）区革筹、广西军区必须同意我们挽留6984部队的请求。对此，韦国清指出：“挽留6984部队是有黑手挑动‘四二二’搞起来的。”18日下午，韦国清、魏佑铸召见广西四二二挽留6984部队的代表，对他们要求挽留6984部队的行动进行了十分严厉的批评。

2月17日，区革筹、广西军区联合发布对自治区公、检、法机关实行军管的布告。军区副司令员宋治平任军管会主任。

3月7日晚，区革筹小组开会，研究几个重大问题决策。韦国清说，最近的工作安排：融安县和凤山县的问题要处理，可以给中央写报告，提出处理方案。博白县已去了部分部队，可以解决问题了。欧致富说，融安问题应派部队包围起来解决。韦国清说：对融安可采取解决里高墟的办法解决。^[1792]看看需要多少部队，要欧致富具体组织。凤山县是否也采取同样办法解决？欧致富说，融安造反大军有六百多条枪，一千多人，部队少了是不行的。魏佑铸说，建议广州军区给广西调部队？韦国清说，可以向广州军区提出意见，派部队解决柳州地区的问题。对凤山县，建议由二二〇师派部队解决。

3月16日，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广西“四二二野战军”情况和我们采取的措施的请示报告》称：野战军的组成及其发表的声明、公告是错误的，把斗争矛头指向区革筹和广西军区。他们组织挽留6984部队“联络站”，阻止部队调离，准备搞大规模武斗，搞打、砸、抢、奸，办地下工厂、商店等。野战军是由黑手、坏人和极左分子操纵的组织。我们要向野战军开展政治攻势，分化瓦解，对野战军这样少数坏组织的据点要以部队武装包围，开展政治攻势，全部收缴武器，交出坏头头。

3月20日，百色专区革委会成立。主任苏毅坚（百色军分区政委）。

3月27日，南宁专区革委会成立。主任许长庚（南宁军分区政委）。

【1791】孙凤章1968年5月被免去第五十五军副军长及在广西的一切职务，下放到湖南西湖农场劳动长达五年。1974年2月降任海南军区副参谋长。文革结束后于1981年提为海南军区副司令员，恢复副军待遇。1985年12月离休。2007年3月1日在广州病逝。

【1792】解决里高墟的办法是：区革筹、广西军区于2月29日命令6984部队派二十四辆卡车的全副武装人员去包围里高墟造反大军，收回武器，并抓捕了60多人押送柳州。

3月28日，玉林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主任甘照寰（玉林军分区政委）。

4月5日，钦州专区革委会成立。主任王晓峰（钦州军分区政委）。

4月13日，南宁市革委会成立。主任韩世福（广西军区副政委）。

4月14日，桂林市革委会成立。主任王斌（后勤二十分部部长）。

4月21日，桂林专区革委会成立。主任张鹤青（桂林军分区政委）。

5月5日，广西联指总指挥部组织三千八百多人，出动汽车四十五辆、火车（客车）一列，到南宁市长岗岭军区军械库抢夺武器装备。共抢走各种枪支七千零四十四支，其中轻机枪四百七十九挺、高机四十八挺、六〇炮四门、炮弹六十发、子弹一百二十万发、望远镜五十个。这是文革以来广西发生抢枪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严重事件。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和广州军区报告军械库被广西联指抢夺的事件。6日，周恩来命令：抢走的武器弹药限24小时内交回。7日，周来电指示，对联指5日抢枪事件，一定要严肃处理，并全部交回抢走的武器装备。8日，周又来电指示，5日联指抢走的武器要限期交回。10日，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我们对“联指”抢枪问题处理的错误的初步检讨》，称遵照总理5月6日、7日、8日指示，我们对广西联指5日大规模抢枪问题在处理上的错误进行了检查。对联指大规模抢枪错误的严重性和引起的后果认识不足，制止不力，措施一般化。

5月17日，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破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一案报告称，“我区破获一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组织。已捕获团长一人，副团长三人，政治部主任三人，经济部长一人，支队长四人，联络站负责人共六十三人。缴获反动组织纲领、反革命刊物、入团登记表、印鉴与国外敌特机关联系的秘密通信地址及部分枪支弹药等罪证。”“该反革命组织涉及南宁市及南宁、玉林、钦州、柳州等四个地区。”“于今年二月二日正式合并定名为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分团下设大队、中队，全区已发展匪徒两千多人。”“发展组织和活动特点是：利用群众组织中的派性，易地活动，钻进群众组织，互相串连，靠打砸枪补给经费，通过武斗掌握武器。总部设在南宁市解放路新华街（广西‘四二二’控制区），利用‘四二二’据点造反楼做联络站，与越侨有联系。”根据“处遗”调查结论，所谓破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一案，是一起特大冤假错案。这宗假案是广西军区支左干部王生江一手策划授意由广西四二二分化出来的罗振龙、曾学文编造出来的。广西军区、区革筹向中央报告后，部署全区追捕枪杀大批无辜干部群众，后果十分严重。这宗假案到1984年才平反。

5月17日，河池专区革委会成立。主任张智理（河池军分区政委）。

5月23日，梧州专区革委会成立。主任张耀先（梧州军分区政委）。

5月30日，广西四二二区展览馆据点为解除联指林业厅大楼据点对自己的威胁，于今天中午由阙家稳带领十一人，化装解放军，进入林业厅，冲上大楼，捣毁联指据点，打死坚守据点的联指成员十二人，打伤一人。联指总指挥部发现后，组织反攻，一直打到晚上。四二二撤退时，被联指打死了二人。是晚焦玉山、安平生召集广西军区、南宁驻军负责人开会，讨论区林业厅事件，一致认为林业厅事件是一起“有组织、有计划的严重政治事件”。会议决定除立即向中央报告外，并发出通告，公开表态。是晚南宁市革委会、南宁警司立即发布《公告》，把这一派性杀人的“五三〇”事件定为“极端严重的反革命犯罪行为”。区革筹、广西军区于当晚电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并报广州军区。同年8月，解放军打下展览馆后，阙家稳等人被关押判刑。

6月17日，区革筹、广西军区向全区发布《关于被获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反革命案件的公告》称：这个反革命集团的一些骨干分子，混入了某些群众组织（指混入四二二）中，有的还当了群众组织的头头，……现在，这个反革命集团并没有完全摧毁，必须彻底追查。《公告》发布后，各级革委会、人武部和联指组织群众，掀起了声讨“反共救国团”（简称“反团”）的热潮，公开地、集中地对另一派群众组织——四二二进行镇压，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据南宁市三百八十三个单位不完全统计，已被列为参加“反共救国团”的有三千五百四十七人（全部是参加四二二的），其中已被斗争的一千七百七十二人，关押九百五十七人，打死三十七人，被逼自杀身亡二十九人，打成残废二人，下落不明四人。玉林专区被当作“反团”立案审查、关押、残酷批斗的有五千二百一十三人，其中厅级干部一人，县级干部二十三人，许多人遭受折磨，被迫害致死、致残致伤。柳州市于六月十九日由市军管会、柳铁公安处、柳州警司联合发出公告，追查“反团”，仅十四个单位受审查的即达四百三十八人，其中被关押的四十五人，迫害致死十六人。

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布告》（习称“七三”布告）。《七三布告》在广西为派性所利用，把对立派当作阶级敌人，发动武装围剿，在全广西造成乱杀人，死人众多的极为严重的后果。7月11日，《广西日报》发表社论《伟大的战略决策——热烈欢呼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七三布告〉的颁布》。从今天起，该报军管小组在广西军区和自治区革筹小组主要负责人的指导下，就贯彻《七三布告》问题，先后发

表九篇社论。紧密配合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部署对“阶级敌人”的军事围剿，对全区又一次出现的惨无人道的乱杀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7月8日，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贯彻“七三”布告的措施》和《贯彻“七三”布告的情况简报之一》。简报说，接到布告后，革筹、军区、驻军负责同志立即研究贯彻执行。军区机关、部队、驻军、三支两军人员都召开庆祝大会，并召开了两派常委（新四二二拒不参加）座谈会。在《布告》的鼓舞下，又掀起了对敌斗争新高潮。有些单位“三查”运动进一步深化，又揪出一批“坏人”和“反共救国团”成员。13日，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文革发出《贯彻“七三”布告情况简报之六》。简报掩盖了广西联指、解放军重兵包围广西四二二控制区解放路一带而引起四二二还击的真相，竟说“自七月十日以来，南宁百货大楼、造反楼‘四二二’据点多次开枪，打死群众二人，伤多人。十二日上午他们从解放路、华西路向北大路打催泪弹（实际是联指向四二二进攻打的）有二、三百人中毒”。14日，广西四二二指挥部发表坚决贯彻“七三”布告的严正声明。《声明》指出区革筹、广西军区以贯彻“七三”布告为名，对四二二执行全面武装包围和镇压。

7月17日，解放军部队、广西联指和十县联指武斗人员全面包围广西四二二控制区——解放路一带。开枪炮击，双方互相投汽油弹，使永明街、汉乐街、上国街、自强街、民生路商店、民房起火燃烧。广西联指桂剧院据点向四二二百货大楼据点开炮，大楼的第三层楼里起火燃烧。同日，部队和联指围攻解放路一带时，四二二航运工总所据守的停泊在邕江河边的船只第三次遭到联指炮击，“兴无”号和“反修”号等一批船舶中弹烧毁。广西联指、南宁市革委会和南宁警司却把烧毁船只的责任强加给广西四二二。宣传广播称：“四二二匪徒放火焚烧停泊在邕江边的船舶，船上载有援越物资，破坏抗美援朝斗争，犯下滔天罪行。”

7月24日，宾阳县根据区革筹、广西军区和南宁专区革委会的指示精神，成立落实“七三”布告领导小组，由王建勋（驻军6949部队副师长、县革委主任）、王贵增（县人武部政委、县革委副主任）、黄智源（6949部队营教导员）、凌文华（6949部队炮营政委）为正副组长。从7月26日至8月6日的十二天里，全县被打死和迫害致死三千六百八十一人。其中国家干部五十一人，教师十七人，工人二十七人，集体工七十五人，农民、居民三千四百四十一人。全家被杀绝的达一百七十六户。

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在召见北京红代会“五大领袖”时称：“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于陕西，在我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

个全国性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造反，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林彪：现在有的是真正的造反派，有的是土匪、国民党，打着我们的旗号造反。广西烧了一千间房子。）在布告上写清楚，给学生讲清楚，如果坚持不改，就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实行围剿。”^[1793]

7月31日，区革筹、广西军区调动6912部队两个连，广西军区警卫营两个连，南宁军分区独立营一个连和炮兵第六四二团高机一连、二连，以及十县和南宁郊区联指武斗队，攻打广西四二二区展览馆据点。指挥攻打的是南宁警司副司令员印玺，副政委慕石起、参谋长陈德华等。指挥所设在明园饭店。十五时开始包围炮击。据“处遗”档案109号记载，打展览馆整个计划是经韦国清，欧致富批准的，主攻方向选择由越南领事馆突破，也是经韦、欧批准的。8月1日，围歼广西四二二区展览馆据点于上午八点结束。打死驻守据点二十三人，伤五人，“俘虏”四百七十多人。据炮兵第六四二团给军区和广州军区的报告，从7月31日十五时开始，到8月1日八时结束。共耗冲（步）枪子弹一万七千六百七十二发，轻机枪子弹一千八百一十四发，四联高射炮枪弹六百九十发，信号弹二十二发。8月2日，韦国清、欧致富、魏佑铸、焦红光向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和广州军区发出电报称，“我们对新‘四二二’展览馆据点实行强行‘进驻’和‘收缴武器’事先没有向中央请示报告，是严重错误，特向中央检讨，请中央给予批评。”

8月2日，区革筹、广西军区主要负责人命令6912、6966、6936等部队，以及广西联指武斗队和各县联指武斗队，大举包围广西四二二解放路据点。总指挥是广西军区副司令员焦玉山。军区副参谋长张海波、景伯承、仲生栋，南宁警司副司令员印玺和陈德华等也分别到各片指挥。8日，部队和联指攻打解放路全部结束。据不完全统计，围歼解放路和展览馆打死一千四百七十多人，抓获“俘虏”九千八百四十五人，都被当作“杀人放火”、“四类分子”、“坏头头”、“国民党残渣余孽”、“反团”等“要犯”、“首犯”处理。被俘人员交各县拉回去七千零十三人，其中被打死二千三百二十四人，当作“要犯”长期关押二百四十六人。据1983年“处遗”调查，解放军和联指攻打解放路一带，共烧毁三十三条街（巷），其中烧毁机关、学校、工厂、商店和民房共二千八百二十多座（间），建筑面积四十六万平方米，使街道的五个公社，一万多户，五万多居民无家可归，仅国家财产损失价值六千万元以上。8月10日，区革筹、广西军区向毛泽东、林彪、中共中央、

【1793】秦晖：《从文革中的清华与广西谈起》。<http://www.aisixiang.com/data/95741.html>，最后访问：2020年4月10日。

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处理南宁市解放路一带问题的情况报告》。《报告》对调动部队和联指武装攻打、炮击、爆破对方据点，以及双方对打时互相扔汽油瓶，企图燃烧对方前沿阵地而引起的火灾，烧掉解放路一带三十三条街（巷）和河边的船舶的责任强加于广西四二二一方。

8月13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向中央发出《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报告中建议由韦国清任革委会主任，欧致富、魏佑铸、焦红光、霍成忠、伍晋南、安平生等任副主任。20日，自治区革筹小组第二次向中央发出请示报告，取消了13日报告中建议伍晋南为副主任的意见，伍改任区革委会常委。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同意由韦国清任革委会主任，副主任欧致富、魏佑铸、焦红光、霍成忠、安平生、韦世经、林福文、毛凤鸾、廖炜雄、龙智铭、颜景堂、曾春生。^[1794]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正式宣告成立，并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大会。

8月20日，柳州专区革委会成立，主任郭鹏（柳州军分区政委）。

8月23日，柳州市革委会成立。主任王国瑞（陆军第二一九师副师长）。

8月26日，梧州市革委会成立。主任宋瀛洲（梧州军分区司令员）。至此，广西12个地、市革委会全部成立，其第一把手全为现役军人。

关于文革期间广西死人问题，1983年参与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的晏乐斌称：

1984年1月，我们赴广西工作组行将结束，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进入扫尾阶段时，自治区“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根据全区各地（市）、县、公社“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报上来的统计表明，全区“文革”中有名有姓有地址的死亡人数有8.97万人，其中，两派武斗死亡3700人，逼死7000人，其余7.9万多人，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打死和枪杀的。南宁地区14个县，死人在千人以上的就有8个，光一个宾阳县就死了3777人。另外，全区失踪2万余人，无名无姓的死者3万多人。^[1795]

[1794] 韦世经，自治区航运局船队服务员，联指派。林福文，自治区航运局船舶修理厂工人，原四二二派。毛凤鸾，女，凤山县谋屯公社民兵班长，联指派。廖炜雄，原自治区委组织部干部，联指负责人。龙智铭，自治区水电厅设计院秘书，原四二二派。颜景堂，广西大学学生，联指总指挥。曾春生，广西医学院学生，原四二二派负责人。自称老四二二的林、龙、曾等人，在1968年春因被四二二派视作已受韦国清“招安”的“叛徒”而于3月29日被撤销常委职务，此后四二二派为与他们划清界限则称新四二二。新四二二在1968年七八月被军区与联指派联合武装镇压后彻底瓦解，在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时无代表。老四二二的这几个代表在革委会成立后不久亦遭排斥和清洗。

[1795] 晏乐斌：《我参与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炎黄春秋》，2012年第11期。

这一切，当时主政广西的韦国清当然要负主要责任。籍贯广西的著名历史学家秦晖这样评价他的这位老乡：

从1955年在广西任职后，韦国清都极善于揣摩圣意，在人事上高度依靠外来干部和“南下干部”。广西地下党、边纵游击队出身的地方干部、“红七军老战士”乃至他故乡东兰凤山一带的壮族乡亲被他整得最厉害。“壮王”、“二壮王”曾是他扣给地方干部的帽子。而凤山“革老”（革命老人，即红七军老战士）大都反韦，使该县成为四二二在广西农村地区少有的根据地，文革中也被韦屠杀得最厉害——全县人口1.3%死于非命，死人比例为全广西之冠，其中“革老”就有149人遇害。韦国清的东兰壮族同乡兼红七军老战友韦祖珍文革中被中央调回广西与他搭档做第二把手，没两年就被韦国清借九一三事件之机打成“林彪死党”，几乎被整死。韦国清的老首长红七军军长李明瑞在苏区肃反中被冤杀，延安时期已平反并宣布为烈士，1949年后其在广西的家属因此很受尊敬，但文革时韦国清和广西当局在带头“批邓”的同时又宣布李是反革命，“大有鞭尸扬灰之势”，家属也被整得“家散人亡”，直到韦国清调离广西、文革结束，经邓小平直接过问，才恢复了历史的公正。又如而今闻名天下的“壮族歌仙刘三姐”，本是源自广东汉族地区的民间传说，传入广西后于1950年代末被当时广西区党委文教书记、广东籍汉族干部伍晋南调集文化力量将其打造成广西壮族的“文化名片”。可是文革中韦国清狠整伍晋南，“炮制大毒草《刘三姐》”成为伍的大罪之一，整个文革十年中“壮族歌仙”一直被“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韦国清封杀……

韦国清何以能成为“政治不倒翁”是另一个话题。这里要说的是：他在广西的作为并不是一个“土司”、“诸侯”的行为，反映的也不是什么地方或民族的“传统”，而就是一个成功揣摩圣意的跟风者、一个极权体制下地方官僚的无法无天，这在当时不能说没有代表性。^[1796]

要为这场大屠杀负上责任的，还有当时的北京中央及广西两大派，是的，包括广西四二二。秦晖称：

像广西四二二那样的造反派被残酷镇压和野蛮屠杀，对这种镇压和杀戮，今天是怎么谴责也不过分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四二二就是正确的。“奉旨造反”结果却被“引蛇出洞聚而歼之”固然可悲，但他们所奉之旨也很不人道，他们也喝过“狼奶”，得势起来也会很凶，就像清华井冈山得势时那样。

【1796】《从文革中的清华与广西谈起》。

广西四二二作恶远比镇压者少，原因并不是他们的主张正确，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势的机会罢了。^{【17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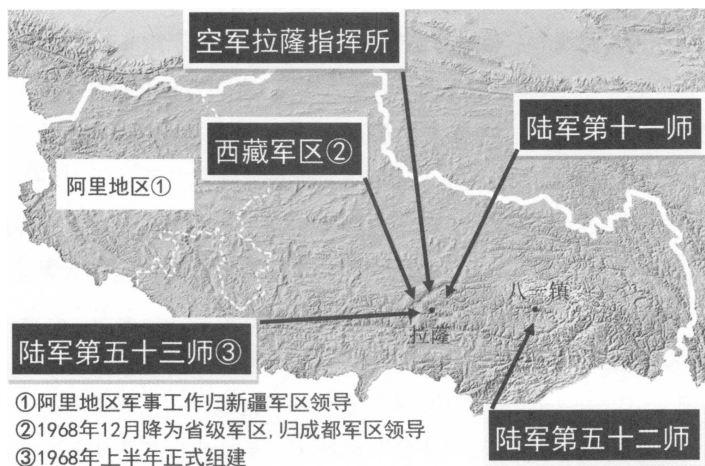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只要你想像一下韦国清 1967 年 8 月 9 日夜晚在本来是戒备森严的京西宾馆，被四二二的人推倒在地上踢打，以至小腿、腰部、眼角、面部均受伤，流血不止，昏迷过去的情景，你就会明白秦晖的话一点也没错。

第七十四节 西藏：西藏军区控制下的西藏文革

一、西藏驻军简况

1967 年 1 月至 1968 年 12 月，西藏自治区境内军级以上单位 1 个，即西藏军区。

西藏驻军分布图(1967-1968)



(一) 西藏军区

文革开始至 1968 年 12 月前为大军区，隶属军委直接领导。领率机关驻拉萨市。辖昌都、拉萨、日喀则、山南、那曲 5 个军分区和拉萨警备区^{【1798】}及陆军第十一师、第五十二师、第五十三师。司令员张国华，政委谭冠三（1967 年 6 月免），副司令员阿沛·阿旺晋美、陈明义、赵文进、曾雍雅、王亢、王诚汉、余致泉，副政委王其梅（1967 年 8 月去世）、吕义山、廖步云、任荣，参谋长江潮，

【1797】《从文革中的清华与广西谈起》。

【1798】1967 年 11 月 7 日军委命令，成立拉萨警备区。由于文革的冲击及拉萨地区形势变化，在建立过程中被取消。

政治部主任阴法唐。^{【1799】}1968年12月7日,军委决定西藏军区改为省军区,划归成都军区建制。1969年1月1日,成都军区对西藏军区实施领导。

据官方资料称,“1967年2月,西藏地方党政群团组织在‘文革’的冲击下全部瘫痪,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中共西藏军区委员会代行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人委的职权,对重要部门实行接管。之后,陆续对全区县以上单位实行军管。4月,西藏军区部队奉命执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参加‘三支两军’工作的干部、战士5,823人(其中干部2,344人,战士3,479人);参加各级革命委员会三结合的干部、战士366人(其中干部340人,战士26人)。”^{【1800】}

(二) 西藏军区所辖师级部队

1967-1968年,西藏军区辖陆军第十一师、第五十二师和第五十三师。

1. 陆军第十一师

1960年10月,军委指示,陆军第十一师调归西藏军区建制。1962年参加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代号7885部队,辖步兵第三十一团(7886部队)、第三十二团(7887部队)、第三十三团(7888部队)及炮兵第三〇五团(1965年9月进藏归建)。1963-1967年担任日喀则地区边防一线守备任务。1964年10月师部、直属队移防至拉萨白定。1968年5月,经军委批准,配置在加查至玉松沿雅鲁藏布江南岸一线地区。师部驻甲格附近地区,步兵第三十一团驻仲沙,三十二团驻加查,三十二团驻阿聋,炮兵第三〇五团驻仲达。1967年7月倾向大联指派,后转而倾向造总派。

2. 陆军第五十二师

1962年6月,为适应中印边境斗争形势,正式组建“西藏军区前进指挥部”,代号藏字419部队,负责指挥步兵第一五四团、第一五五团、第一五七团和若干保障分队。1965年5月,军委命令藏字419部队恢复陆军第五十二师番号,师长柴洪泉,政委徐浩。9月,组建五十二师炮兵团,番号为炮兵第三〇九团。1966年12月,第一五七团改为第一五六团。1968年5月,经军委批准,配置在工布江达至扎木(波密)地区,师部驻八一新村,步兵第一五四团驻札木,一五五团驻果园新村,一五六团驻帮纳,炮兵第三〇九团驻巴河新村。1967-1968年倾向大

【1799】阿沛·阿旺晋美,1955年授衔中将。余致泉、江潮,1964年晋升少将。张国华同时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

【1800】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西藏自治区档案局:《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组织史资料1950-1987》,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491。

联指。1969年1月，军委决定，五十二师与五十军一四九师对调防务，五十二师调归五十军建制，一四九师调归西藏军区建制。1969年12月，成都军区指示，第五十二师改称第一四九师，第一四九师改称第五十二师。各团番号也作了互换。

3. 陆军第五十三师

1966年6月，西藏军区为加强机动作战兵力，向军委建议在西藏组建一个步兵师。12月军委批示，同意以步兵第一五三团、三团、四团和原西藏公安总队机关为基础，另增加6,200人扩编成一个步兵师，番号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五十三师”，下辖3个步兵团，1个炮兵团，依次称步兵第一五七团、第一五八团、第一五九团、炮兵第三一〇团。同时将陆军第五十二师之一五七团改称为一五六团。1968年上半年正式组建，师长孙家贵，政委李传恩，归西藏军区建制领导。1968年5月，经军委批准，第五十三师师部驻拉萨地区（1969年9月移驻日喀则），步兵第一五七团驻白定，一五八团驻拉孜，一五九团驻江孜，炮兵第三一〇团驻曲水。

二、1967-1968年西藏文革进程与军队^[1801]

1967年1月11日，《西藏日报》以重要位置发表拉萨各族人民欢呼上海“一月风暴”的报道。同日晚，由西藏日报社部分职工组成的“红色新闻造反团”宣布夺了该报社的权。随后，新华社西藏分社、广播电台、中共拉萨临时市委和市人委以及自治区的各部、委、厅、局也相继被夺权。

1月下旬，张国华因病住进西藏军区总医院，经区党委其他书记研究，决定电请中央同意张国华到北京治病。中央复电表示同意。

2月5日，无产阶级大联合革命总指挥部（大联指）成立。与1966年已成立的拉萨革命造反总部（造总）形成对立的西藏两大派。

2月6日，中共西藏军区委员会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称，拉萨革命造反总部及其所属组织认为张国华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并说军区党委是“保皇派”、“黑窝子”，群众因不明真相，动荡很大，军区机关一部分干部和驻拉萨部队的部分干部战士也出现了思想混乱。此种状况，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后果是严重的。为此建议中央对张国华尽快表明看法。2月7日，毛泽东在西藏军区党委6日电报批语中称，“林彪、恩来、叶、聂、徐各同志：请你们研

【1801】主要资料来源：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西藏军区支左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中央首长关于西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1971年2月。



文革初期张国华在西藏拉萨，1966年8月。

究一下，张国华、周仁山、王其梅等究竟是好人、坏人，一二日内拟电告我，发出表态，是为至盼！”^{【1802】}

2月9日，数十名首都红卫兵和拉萨一部分群众组织的成员冲进军区大院，继续要求军区领导支持他们搞的“二五夺权”，提出“打倒张国华”，为时达十多小时。

2月10日，军委决定，西藏军区领导机关和军区生产部的文化大革命暂时停止下来，转入正常的战备工作。西藏所有军垦农场要集中精力搞正面教育，一律不搞“四大”。军区传达了军委的决定。同日，西藏军区发出《公告》和《给广大群众的一封信》，宣布“为了军区机关的稳定，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从二月十日起，在军区大院内实行军事戒严”。

2月12日，军委复电西藏军区称：

【180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218。周仁山，原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自治区人委副主席。文革结束后于1978年5月起历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第二书记。1981年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1984年11月7日在北京病逝。王其梅，原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西藏军区副政委。

张国华同志是经过几十年战争考验的，工作积极干劲大，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在进军西藏、六二年自卫反击作战是有功劳的，在批判刘、邓路方面旗帜鲜明，态度明朗，特别是对邓小平的揭发是比较深刻的。

张国华同志是有缺点和错误的，可以揭发、批评，但中央军委认为张国华同志基本上是个好同志，为了他在军区便于工作，这一点必须向全区指战员说清楚。

2月15日，西藏军区奉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于今日接管自治区公安厅，建立军管会，并对公安厅所属机构律派出军事代表。同日，西藏军区还接管了拉萨市公安局，实行军事管制。

2月17日，拉萨群众组织争相到军区总医院揪斗正在那里治病的王其梅。随后，中央决定王其梅去北京。8月15日，因病情恶化，王其梅在北京逝世，终年53岁。

2月24日，中央文革给拉萨革命造反总部等复电称，“中央军委2月12日给西藏军区的电报是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意见的，中央文革小组完全拥护这个电报所说的。张国华同志是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的，尽管他在工作上有缺点和错误，但基本上是个好同志，望军区党委同志向革命同志作些工作。”

2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电示西藏军区，代行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权力，对自治区公安厅、拉萨市公安局、西藏人民广播电台（含有线广播站）、西藏日报社、自治区人民银行、邮电局、机要局、档案局、交通厅（含运输局）实行军事接管。自2月26日开始，军区陆续派出1200余名军事代表进驻接管单位开展工作。^{【1803】}

2月26日，西藏军区发布一号公告，宣布奉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命令，于本日军事接管西藏日报社、西藏人民广播电台和拉萨有线广播站。报社接管遭到阻挠，《西藏日报》自今日停刊。3月4日，《西藏日报》复刊，刊登了军区一号公告。在接管期间，军区错误地抓了一批人。

3月初，西藏军区成立“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办公室”，任命军区政治部主任阴法唐为“地办”主任。“地办”吸收任明道（区党委书记）、陈卓（公安厅副厅长）、洛桑慈诚（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多杰才旦（农牧厅厅长）、张再旺（区党委宣传部长）等参加“地办”工作。此后，各地（市）也随之成立了“地办”。3月7日，《西藏日报》刊登军区3月3日发布的通令，规定一切革命群众和组织都

【1803】西藏军区军史编写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暨西藏军区军史（1949年2月—1985年12月）》送审稿，1991年1月，页358-359。



庆祝西藏自治区军管会成立，拉萨，1967年5月。

要协助军区完成军事接管任务。凡实行军事接管单位的“四大”都要按实行军事接管的原则办事。对本单位以外的组织，不再进行串联。

3月间，西藏军区相继对昌都、阿里两地区实行军事管制。

5月8日，周恩来就西藏军事管制问题批示：同意西藏立即实行军管，目前还不忙邀各革命造反派来京会商，昨夜已在四川会上与张国华同志谈定。^{【1804】}

5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成立西藏自治区军管会，张国华任主任委员，任荣、陈明义任副主任委员，廖步云、阴法唐、陈子植、张鹤田、宋开元、洪流任委员。^{【1805】}

5月，中共中央命令，张国华任成都军区政委、四川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组长，兼西藏军区司令员。

【180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页140。

【1805】《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暨西藏军区军史大事记（1949年2月-1985年12月）》送审稿，页216。陈子植，时任西藏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张鹤田、宋开元，时均任西藏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洪流，时任西藏军区后勤部政委。陈子植、张鹤田、宋开元、洪流，1965年大校军衔。

6月24日，西藏自治区军管会发出布告，明确在西藏自治区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建立前，西藏自治区军管会对全区各项工作实行统一领导。^{【1806】}同时，各地（市）、各部门也都成立了军管会或派了代表。

8月23日—9月17日，由于报社群众组织之间武斗升级，《西藏日报》被迫于8月23日停刊。直到9月18日，《西藏日报》才重新复刊，但只刊登新华社电讯，没有地方消息，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才解决。

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制止西藏武斗的五项指示”称：

一、会议听取两派情况的全面汇报以后，中央认为：造总、大联指均定为群众组织，以便实现大批判、大联合。两派的性质暂不下文字的东西。

二、拉萨各派组织，必须马上停止武斗，不准调农牧民进城，立即恢复交通运输，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促工作，认真学习中央文件、江青等同志讲话和报纸的社论，这些是对各革命群众组织的考验。

三、要防止挑拨离间，调拨民族关系。

四、报纸是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声音的。

五、如何做得好，这是对各革命群众组织的考验，还有一点要向造总同志传达的，“专打”^{【1807】}不能定为群众组织、中央认为它是有错误的。

9月18日晚，周恩来等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在京接见了西藏任荣、陈明义、张鹤田、苗丕一及周仁山。^{【1808】}周恩来在接见时称，“‘大联指’的广大群众是农奴出身的嘛！他们的革命性还是强的，是你们没有发动他们起来批判你们的缺点错误，不能说他们保。‘专打’这个口号是不恰当的，批判区党委和国华同志在运动初期执行的反动路线是对的，批判区党委的错误是允许的，但它的方向不完全对，以后又转向军区，区党委不能行使职权了，如军区有错，可以提意见批评嘛！你们对报社解决是好的，一直没开枪嘛！”“你们虽然捕人不多，但压了人家，犯了错误，这个责任不在那个组织，是你们负责。两派还都是革命的，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要搞大联合。”

10月20日，在自治区军管会参与下，两派群众组织各派三名代表共同组成“自治区革命大联合筹备小组”。

【1806】西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西藏自治区志·军事志》，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页710。

【1807】指造总派的“专打土皇帝联络委员会”

【1808】苗丕一，原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

1968年1月12日,中央文革复电中共西藏军区委员会称,“去年十二月七日电悉。同意你们在军区报刊《高原战士》上公开点名批判大叛徒王其梅的意见。”

2月26日,西藏自治区在北京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次学习班是一个有军队干部、群众组织头头和地方干部三百多人参加的西藏“三结合”性质的学习班,为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作准备。

4月17日,军委办事组对揭发批判周仁山问题作出批示称,“同意对原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周仁山进行揭发批判。但不要搞武斗。”

5月5日,自治区军管会公布张国华4日三时传达周恩来4日重要指示精神称,“西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十日前要送上。西藏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大概不超过十五号,应准备和四川同时成立。周仁山不能结合。”

同日,张国华在北京接见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西藏班学员代表讲话时称,“当前两派的同志要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中国的赫鲁晓夫,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刘、邓、陶,彭、罗、陆、杨,彭德怀,还有贺龙,还有杨、余、傅,西南还有李井泉、廖志高。西藏是西南的一个地区,一个自治区,李井泉也必须彻底批判,批倒批臭批垮。在西藏有王其梅,历史上还有范明^[1809],还有惠毅然^[1810],这是走资派嘛!还有周仁山嘛!也要批倒批臭。周仁山这个人,过去我对他没有看得清楚,虽然那时也发现他有很多错误,但没有看得很清楚。我对他看得也不清楚。但是去年以后,逐步看到他的许多材料,以后证实了调查了,看到他的所作所为,这个人不是好人!历史情况,这个人是国民党,加入国民党是隐瞒的,参加共产党找不到介绍人,他说的几个,湖南的同志(插话:杨大易^[1811]),杨大易同志头次来了,我问过他,他根本没有介绍周仁山入党。历史情况还有很多,你们(指军区负责人)详细介绍一下,我只讲这一点,就这一点就行了。我再讲一点,我原来怀疑他是习仲勋、李维汉、汪锋这些人派他到西藏去的。那时只是怀疑,这个怀疑,现在证实了。就是他们派他到西藏去的!所谓叫接替范明。”“‘造总’在一段时间,对周仁山提出保的口号,这是不了解情况,

【1809】范明,1952年1月至1958年8月,任西藏工委副书记、西藏军区副政委。1955年授衔少将。1958年西藏整风反右运动中,被定为反党集团头子、极右分子,开除党籍、军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送陕西省大荔农场劳动改造。1962年6月中央决定对范明案件进行甄别。同年9月以“纠集反坏分子来北京闹事”罪名,被囚禁在秦城监狱长达13年整。1980年恢复党籍,到中央党校学习。1980年12月至1988年5月,任政协陕西省第四届、第五届委员会副主席。

【1810】惠毅然,原中共西藏工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在“四清”运动中受批判和处理,文革中受批判审查,停止一切职务,被关押开除党籍。1979年8月任中共安徽省委纪委书记。1986年3月离休。

【1811】杨大易,时任湖南省军区代司令员。

这个不能怪‘造总’。如果有人要怪‘造总’，我看他就错了。不过‘造总’要吸取教训。……‘造总’是‘造总’，周仁山是周仁山，不能怪‘造总’这是两码事。周仁山是不能结合的，这个意见，中央，总理说过，也提出了意见，现在要狠狠批！要揭要批，要彻底揭，彻底批，要把他那些东西批臭！”

5月7日，张国华在北京接见西藏造总代表时讲话称，“‘造总’是革命群众组织，在西藏文化大革命中是有贡献的，这是事实，是客观存在。当然西藏不只你们这个组织，你们在西藏文化大革命中有贡献。过去我们是这样看的，但不仅仅是你们，这话要和你们讲清楚。当时区党委决定支持你们，因为你们是革命群众组织，‘一月风暴’夺权，这大方向是对的，但不成熟，事后也证明了条件不成熟。军区支持你们夺权，大方向也是对的，但就条件讲，也是不成熟的。军区与‘造总’的关系，本来是好的，军区二月五日支持你们，但那个会开得不好，军区不应退出会场。在那会上群众有过头语言，过头语言不少，还有错误做法，那是不对的。军区对你们提出了是对的，你们应吸取教训。从这以后，你们和军区的关系就紧张了。你们以后又冲击军区，是两次吧！对冲击军区，军区看得过重了这也不好。（任荣：‘二九’冲军区是看得过重了。）看重了，关系就紧张了，但像你们那样做也不对的。我不是各打五十大板，‘造总’的同志也要总结一下，对军队那样做也是不好的。这个关系的紧张，从我个人讲，从军区讲，我们有责任，不怪群众，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不够，军区应吸取教训，对部队也要加强教育，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总之，一个不能对准群众，一个不能对准解放军。要对准刘、邓、陶，西南区有李井泉，西藏是周仁山、王其梅。对任明道、郭锡兰也要揭发批判。^{【1812】}惠毅然要坚决斗争。历史上还有范明，两大派联合了，要和军区合作，共向对敌，这样革命委员会就好搞了。”“最后讲一点，任荣同志、阴法唐同志、陈明义同志等，中央都很清楚，这些都是好同志。尽管他们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那是工作上的问题，和周仁山、王其梅有根本区别。听说你们‘造总’对任荣有意见，可以提，可以帮助，但不能当敌人，当成敌人就错了。”

6月6日晚，周恩来等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在京接见了西藏军区党委在京常委和地方领导干部苗丕一、杨东生。^{【1813】}周恩来在接见时称，“慕生忠^{【1814】}现在

【1812】任明道、郭锡兰，均为原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

【1813】杨东生，原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

【1814】慕生忠，原中共西藏工委常委、青藏公路管理局局长兼党委书记。1955年授衔少将。1959年庐山会议后，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60年下放到甘肃省八一农场任副场长。1961年任甘肃省交通厅副厅长。1979年4月，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撤销处分决定，恢复其名誉。

在哪里?国民党本来在西藏不多,范明带进去了一些,然后就多了。要清理阶级队伍。”“‘大联指’占优势,正在不在于给‘大联指’说多少话,没压那么厉害,一直关系好。周仁山一否定,‘造总’在受压,要照顾‘造总’,要向‘造总’做工作,保周仁山有什么好处嘛!”

6月7日,周恩来的秘书周家鼎给张国华打了一个电话,传达周恩来指示称,“特别要指出压‘造总’是不对的,尤其拿周仁山问题压‘造总’更是不对的。不能压一派,支一派;亲一派,疏一派。中央早已决定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军队应特别注意这一点。”

同日,拉萨警备区部队进驻造总控制的财经大院和大昭寺。部队进驻大昭寺时,受到阻挠,发生冲突,造成伤亡。

6月12日,在京学习的群众组织签订《关于立即停止西藏地区武斗的协议》。6月22日,中央文革关于西藏地区立即停止武斗协议的批示称:

西藏两大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在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代表的帮助下,签订了《关于立即停止西藏地区武斗的协议》,中央文革认为,这个协议很好。希望西藏两大革命群众组织坚决地、完全地贯彻执行,使西藏地区的武斗迅速地停止下来,保证交通、广播电台、邮电、气象、银行和其他生产、商业部门的正常工作,保证《西藏日报》的出版。

8月17日晚,周恩来等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在京接见西藏军区师以上干部代表。8月26日晚,周恩来等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在京接见西藏军区在京常委。周恩来在接见时称,“十一中全会文件李井泉不传达,李大章传达了几句,国华同志还不错,支持了‘造总’。八条、十条,‘九五’讲话,‘九二六’讲话,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林副主席讲话,你们宣传是不够的。‘七三’、‘七二四’布告宣传虽比较好,但大学习、大宣传还很不够。部队是好的,是有功的,广大指战员是好的,你们纠缠在派性的争论,你们的政治领导是很差的。”

8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称:

中央同意中共西藏军区委员会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中央热烈祝贺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

西藏是我国反对美帝、反对苏修、反对印度反动派斗争的西南前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阶级斗争十分复杂。它长期受反动的农奴主阶级的残酷统

治和英帝国主义、印度反动派的掠夺，美帝、苏修、蒋匪帮也派遣了许多特务，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赫鲁晓夫等人及其在西藏的代理人周仁山、王其梅等勾结达赖，班禅叛国集团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妄图复辟封建农奴制度和资本主义。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西藏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各族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阶级敌人进行了激烈的搏斗，粉碎了他们的反革命迷梦。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广大指战员，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巨大的成绩。

中央同意由曾雍雅同志任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任荣、陈明义等十三位同志任副主任。另留二名副主任，以后增补。

中央希望：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广泛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英明领导下，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统一行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1815]

9月5日，拉萨召开五万多人大会，正式宣布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同时成立了拉萨市革委会，主任梁超（拉萨军分区政委）。

11月1日，阿里专区革委会成立，主任刘少雄（阿里军分区政委）^[1816]

12月7日，军委决定，从1969年1月1日起，西藏军区由大军区改为省军区，归成都军区领导。司令员曾雍雅，政委任荣。

1969年3月28日，那曲专区革委会成立，主任张兴佐（那曲军分区司令员）。3月29日，山南专区革委会成立，主任刘籍甫（山南军分区司令员）。4月6日，昌都专区革委会成立，主任陈琅（昌都军分区司令员）。9月24日，日喀则专区革

【1815】《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1968年8月28日。中发[68]136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1968年8月30日发出。曾雍雅时任西藏军区党委副书记、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在谭冠三被免职后为西藏军区的第二号人物。曾倾向造总，在军区内是少数派。1969年4月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西藏军区改为省军区后仍任军区党委副书记（书记缺）、军区司令员。1970年12月调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自治区革委会主任一职，由倾向大联委派的西藏军区政委、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任荣接任。

【1816】1968年2月，决定成立阿里军分区，仍属南疆军区领导。1969年12月，中央决定，阿里地区的党政全部工作委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负责领导，阿里地区的行政区划仍属西藏自治区。

委会成立，主任赵衍祥（日喀则军分区政委）。至此，西藏5专区、1地市级革委会全部成立，第一把手全为现役军人。

第七十五节 新疆：文革进程与军队

一、新疆驻军简况

新疆地处西部边疆，全区面积164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1/6。边界线全长六千多公里，战略地位非常重要。1967年1月至1968年12月，新疆境内军以上单位共6个，即新疆军区及其辖下南疆军区、伊犁军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空军第九军及国防科委第二十一基地。新疆军区师级部队5个。

（一）新疆军区

领导和指挥新疆全境及西藏阿里地区所属武装力量。领率机关驻乌鲁木齐市。司令员兼政委王恩茂。1968年8月龙书金任司令员。1968年9月萧思明任第二政委。副司令员陶峙岳、赛福鼎·艾则孜、郭鹏、张希钦、徐国贤、丁盛、幸元林、张竭诚、刁谦斋，副政委左齐、裴周玉、谭开云、曹达诺夫·扎伊尔、张仲瀚、熊晃、胡华居，参谋长何家产，政治部主任金忠藩。^[1817]至1968年12月，下辖2个省级军区，12个军分区（其中哈密、乌鲁木齐、巴音郭楞、昌吉军分区直属新疆军区领导），4个陆军师及1个独立师。领导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文革期间，先后派出7万余名干部战士参加三支两军工作。

（二）南疆军区

省级军区。领率机关驻疏勒县城。司令员刘发秀，政委曾光明，第二政委马洪山，副司令员毛少先、王志廉、李双盛、连承先，副政委黎斌，参谋长连承先兼，政治部主任黎斌兼。^[1818]1967-1968年，辖阿克苏、喀什、克孜勒苏、和田和西藏阿里（1968年3月组建）5个军分区及39个县（市）人民武装部。1967年1月南疆地方各级党、政机关陷于瘫痪状态后，为稳定地方局势，南疆军区从1967年3月开始，陆续抽调干部战士执行三支两军任务，成立各级生产指挥组，协同地方工作。

^[1817] 陶峙岳，1955年授衔上将。幸元林、张竭诚、谭开云、胡华居、金忠藩，1955年授衔少将。何家产，1961年晋升少将。刁谦斋，1965年大校军衔。

^[1818] 曾光明，1955年授衔少将。刘发秀，1961年晋升少将。马洪山、毛少先，1964年晋升少将。王志廉、李双盛、连承先、黎斌，1965年大校军衔。

(三) 伊犁军区

省级军区。领率机关驻伊宁市。司令员龚兴业，政委张世功（伊犁州委第一书记）兼，第二政委廖明，副司令员江子炎、任书田、萧飞，副政委李国清、李昭明，参谋长许欣之。政治部主任李昭明兼。^{【1819】}辖塔城、阿勒泰、博尔塔拉3个军分区和30个县（市、矿区）人民武装部。1967年3月，伊犁军区奉命抽调干部战士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并相继成立各级生产办公室，协同地方抓工、农、牧业生产。

(四)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原属国务院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领导，1967年2月后，受新疆军区领导。军委决定，从1967年3月至1968年，先后抽调一批现役军、师、团级干部到兵团担任各级领导职务。1967—1968年，领导机关驻乌鲁木齐市。司令员陶峙岳（1968年9月免）、张竭诚（1968年9月任），第二司令员丁盛（1968年2月调广州军区），政委王恩茂兼，第二政委张仲瀚（1967年5月免）、裴周玉（1967年5月任），第二副司令员陶晋初（1967年5月免），副司令员孔瑞云、杜海林、杨宗胜、王振东，副政委曾如清、李荆山，参谋长陈实、杨贯之（1968年10月任），主任李荆山（1968年2月免）、侯全智（1968年9月任）。^{【1820】}此期间，兵团下辖农业建设师9个，管理处2个，建筑工程师3个和一批直属企事业单位。

(五) 空军第九军

领率机关驻乌鲁木齐市，代号7335部队，归兰州军区空军建制领导。军长王香雄，政委于应龙（1968年4月免）、李全春（1968年5月任），副军长李全春、张毅、郭子潭（1968年11月任）、吴胜凯（1968年11月任），副政委穆博彦（1968年5月任），参谋长李全春兼（1968年5月免）、吴胜凯兼（1968年11月任），政治部主任穆博彦（1968年5月免）、陈冠（1968年5月任）。^{【1821】}1967年初，空九军奉命在新疆部分地区执行三支两军任务。1967—1972年，先后有3,500人（其中干部1,550人，战士1,950人）参加三支两军工作，有120人被结合在革命委员会。根据上级通知，1972年底，空九军参加三支两军人员陆续撤回部队。^{【1822】}

【1819】 龚兴业、廖明，1964年晋升少将。江子炎、任书田、许欣之，1965年大校军衔。

【1820】 曾如清，1955年授衔少将。孔瑞云、杜海林、王振东，1964年晋升少将。杨宗胜、侯全智、李荆山，1965年大校军衔。

【1821】 王香雄，1964年晋升空军少将。于应龙、张毅，1965年空军大校军衔。

【1822】 《中国共产党空军组织史资料丛书》第2集，页276—277。

(六) 国防科委第二十一训练基地

位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境内，罗布泊的西端，占地 10 万多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江苏省的面积，为中国唯一的核武器试验基地。领率机关驻和硕县，代号 8023 部队。司令员张蕴钰（1968 年 11 月免）、白斌（1968 年 11 月任），政委廖鼎琳（1968 年 12 月任），副司令员张志善、张英，副政委邓易非，参谋长谷震东，政治部主任任中咸。^{【1823】}

新疆军区师级部队

1. 陆军第四师

1949 年进疆部队统一整编保留下来的唯一一个陆军野战师。师部位库车县，代号 7969 部队。师长赵增林，政委向新。辖步兵第十团、第十一团、第十二团和炮兵第三〇四团。

2. 骑兵第一师

1962 年 8 月移驻新疆。师部位乌苏县，代号 8010 部队。师长路克杰，政委崔虎。辖骑兵第一团至第五团。该师师史称，“根据军区安排，从 1967 年 4 月开始，我师在担负战备值班的同时，分期分批先后共派出 3,217 人进入乌鲁木齐市、石河子市、克拉玛依市、独山子矿区、乌苏县、沙湾县、托里县、精河县、额敏县、和丰县、农七师和农八师等地区宣传毛泽东思想，实行军事管制，开展军训，制止武斗，组织恢复生产。1970 年 3 月 12 日全部撤回，历时三年。”^{【1824】}

3. 新疆军区独立师

1966 年 7 月，新疆公安部队整编为独立师，隶属新疆军区。师部位乌鲁木齐市，代号 8015 部队。

4. 陆军第五师

1968 年 1 月在山东组建，1968 年 7 月进驻新疆昌吉州，直属新疆军区指挥。代号 8846 部队，师长刘致中，政委白镜。

5. 陆军第六师

1968 年 5 月正式组建，归南疆军区领导。主要担负中印方向作战和中印边境天、空、阿防区的守防任务，进行战场准备，同时担负中苏方向机动作战任务。师部位莎车县，代号 8027 部队。师长蔚福恭，政委林忠。辖步兵第十六团（代号 8028 部队）、第十七团（代号 8138 部队）、第十八团（代号 8139 部队）和炮兵第

【1823】廖鼎琳，1955 年授衔少将。张蕴钰，1961 年晋升少将。张英、谷震东、张志善、邓易非，1965 年大校军衔。

【1824】步兵第八师：《光辉的六十年》，1992 年，页 231。

三一一团(代号 8141 部队)。该师师史称,“一九六八年我师组建后,随即派出大批人员到南疆各地担负了‘三支两军’任务。据一九七〇年统计,全师派出‘支农’指战员一千一百八十二人,遍布南疆十六个地县。”^{【1825】}

新疆驻军分布图(1967-1968)



二、1967-1968 年新疆文革进程与军队^{【1826】}

1967年1月25日,一派群众组织宣布夺了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委、乌鲁木齐市委、市人委的权,向全国、全疆发表了“夺权声明”,成立了“自治区夺权指挥部”。随后,自治区各单位、各地、州(市)、县也先后被夺了权,自治区各级领导机关完全陷于瘫痪,全疆陷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

【1825】陆军第六师政治部:《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六师简史》,1982年,页127-128。

【1826】主要资料来源: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校:《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下册,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10-21;新大星火燎原兵团:《新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68年。

1月28日,中央军委致电新疆军区党委称:王恩茂、郭鹏、左齐、张希钦、徐国贤、熊晃、丁盛、裴周玉等八同志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他们不是三反分子,望你们向大家作和善解释。

新疆地区1967年2月间情况,见本书第三十三节。

3月3日,新疆军区对新疆日报社、新疆人民广播电台和乌鲁木齐有线广播站实行军管,并立即停出“造字号”《新疆日报》,改出军字号《新疆日报》。此后,新疆军区还陆续对公安、交通运输、重工业、轻工业、商业、邮电、卫生和财贸等系统150多个机关、厂矿、企业实行了军管。

3月12日,根据中央指示,在新疆军区党委领导下,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办公室。张英明(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任主任。

同日,新疆军区在人民广场主持召开由一派群众组织10余万人参加的“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会上提出“打倒武光、吕剑人、祁果、张仲瀚、陆学斌、包尔汉、伊敏诺夫”^{【1827】}的口号。3月26日,周恩来总理指出:“3月12日大会,不要红二司及其他造反派参加是错误的。”

5月8日,乌鲁木齐一派群众组织“查封”了军管的新疆日报社,另一派群众组织反对查封,组织群众强行夺回报社,双方发生武斗,致伤多人。当天,中央文革办事组、全军文革小组办公室给新疆军区和两派群众组织来电,要求双方“立即停止武斗”,“新疆日报社为军管单位,各群众组织都不要去冲,也不要查封,进入报社的外单位群众组织要立即退出报社。”但是这一指示并未得到执行,形成军字号《新疆日报》与造字号《新疆日报》并存的局面。此后,两派群众组织矛盾加剧,武斗不止。据1983年整党时统计,文革期间新疆共发生较大的武斗事件125起,致死700多人,伤5,000多人,经济损失无法估量。

11月24日,中共中央开始解决新疆问题。新疆军区王恩茂、郭鹏、张希钦,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丁盛、裴周玉,空九军王香雄、于应龙奉命赴京。随后中央又通知赛福鼎等人赴京参加学习和商谈。

12月31日,毛泽东接见来自全国两万多革命干部。新疆军区领导王恩茂、赛福鼎、郭鹏参加了这次接见。毛泽东对王恩茂说:“你好好地作一个检讨。”

【1827】武光,原自治区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人委常务副主席。吕剑人,原自治区委书记处书记。祁果,原自治区委书记处书记。张仲瀚,原新疆军区副政委兼兵团第二政委。陆学斌,原自治区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包尔汉,原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伊敏诺夫,原自治区人委副主席。

1968年1月23日，新疆军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空九军在京代表向乌鲁木齐市各派群众组织发出《关于迅速达成立即全面彻底制止武斗，上交武器的协议的倡议书》。

2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批准了新疆军区王恩茂、赛福鼎、郭鹏、张希钦，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丁盛、裴周玉，空九军王香雄、于应龙等八人《关于建议召集新疆各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和支左代表到京开会，解决新疆问题的报告》。《报告》规定新疆各派群众组织和支左部队共派出156名代表到京开会，《报告》还建议乌鲁木齐地区各派群众组织和各地区选派的代表，要有一定比例的少数民族代表。

3月18日，在新疆军区主持下，乌鲁木齐市两大派群众组织经过充分协商，达成“立即全面彻底制止武斗，上交武器的协议”。新疆军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空九军负责人参加签字仪式，表示祝贺。

5月2日，周恩来对乌鲁木齐地区两派群众组织抢夺解放军武器事件，尤其对“四二六”抢枪事件提出严厉批评，要求迅速交还全部所抢武器。但这一指示没有得到认真执行。

5月4日，周恩来等在京接见新疆军区、兵团负责人，对兵团问题作指示称：
(1) 石河子的案是毛主席定的，不能翻。(2) 十二条是毛主席批准的，不能反。(3)

在北京召开的解决新疆问题会议与会者，前排左起：裴周玉、郭鹏、赛福鼎、丁盛、王恩茂、张希钦、徐国贤、何家产、曾如清，京西宾馆，1968年5月。



兵团把斗争矛头对准走资派，打张仲瀚及其余孽是正确的。八野在石河子问题上站在正确方面。王兵那一派还没有完全揭开，他们支持红二司是对的，但也有错误。丁、裴两个是执行了资反路线，是认识问题嘛！不同于军区、自治区。

5月26日，周恩来指示新疆军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空九军在京负责人，要他们对新疆大学一派群众组织做工作，制止将于5月27日在乌鲁木齐举行的数万少数民族人员参加的所谓“打倒王恩茂大汉族主义”大会。为了贯彻周恩来指示，新疆军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空九军联合发表声明，号召各派群众组织、各族人民群众一致起来反对和制止召开这样的大会，坚决不去参加这样的大会。新疆两派群众组织全体在京代表也作出《关于坚决执行周总理五二六指示的联合紧急决定》，要求两派群众反对和抵制这次会议。

6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北京、沈阳等部队负责人时，同赛福鼎谈话，希望在京开会的新疆代表尽快统一认识解决新疆问题。

6月15日，新疆两派群众组织在京代表经过充分协商，达成《新疆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关于立即全面、彻底制止武斗，上交武器的协议》。6月22日，周恩来批准给“六一五”联合检查小组配备五个解放军武装连队，坚决支持联检小组的工作，保证“六一五协议”的贯彻执行。

6月30日，毛泽东在接见济南、广州、兰州部队干部学习班时，同赛福鼎谈话，希望新疆制止武斗，实现两派大联合。

7月28日，新疆两派群众组织在京代表达成《新疆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关于大联合的协议》。

8月1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任命原湖南省军区司令员、湖南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龙书金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8月29日，晚上九时半至次日一时半，周恩来等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接见新疆两派群众组织全体赴京代表并作重要指示称，武光是中央揭出来的，军区在三支两军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王恩茂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的，有许多时候是跟刘邓走的，他犯了独立王国的错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还想给王恩茂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

8月31日，新疆军区党委向毛泽东、林彪、中央呈送了《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报告》。9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作出《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批示点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赫鲁晓夫等人及其在西北和新疆的代理人习

仲勋、刘澜涛和武光、吕剑人、张仲瀚、伊敏诺夫、包尔汉等”的名，称他们“同这些内外敌人相勾结，妄图把新疆变成修正主义的基地，复辟资本主义。”^{【1828】}

9月2日晚，周恩来等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接见新疆军区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周恩来称，“新疆必须有很强大的军队。过去，新疆党、政工作没有做好，王恩茂同志有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军区工作有错误，执行过反动路线，也作了自我批评。伟大统帅毛主席，副统帅林副主席委任龙书金同志为新疆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虽然，龙书金同志没有在新疆工作过，但我们解放军是个整体。……所以派龙书金同志去，是加强新疆军区的领导，希望广大无产阶级革命群众要支持新疆军区的新领导。当然，我们同样相信，王恩茂同志作了检查，也在中央面前许了诺言，作出了保证，一定能在党委集体领导中支持龙书金同志工作的。”

9月5日作为全国最后两个省级革委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同时成立。《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称：至此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主任龙书金，副主任王恩茂、赛福鼎、郭鹏、裴周玉、李全春、杨立业、胡良才、孜牙、吴巨轮^{【1829】}。乌鲁木齐市革委会同时成立，各地区、自治州的革命委员会，则到1969年上半年才陆续成立起来。

龙书金为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四野谱系一位战功卓著的将领。这一谱系的将领当时尤受重用，惟龙从一普通的省军区司令员，直接越级提为一个地域极其宽广的大区军、政第一把手，多少有点出人意料。龙本人对此没有思想准备，更缺乏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深感力有不逮。

龙书金对新疆的历史情况很不熟悉，没有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在他的主持下，1968年10月至12月，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二次全委（扩大）会议和新疆军区四级干部会议同时召开。会议主要批判“两个主义、一个王国”，批判已经担任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新疆军区政委的王恩茂，并于12月12日，以新疆军区党委名义向军内各级党委下发“打倒王恩茂”的电报，在全疆军内外引起极大混乱，会议之后，下令地方、军队都揭发、批判王恩茂，并株连到一大批党政军干部、群众，已经在革委会结合或解脱了的为数不多的党政领导干部，有的又被“回炉

【1828】《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1968年9月1日。中发[68]137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1968年9月2日印发。

【1829】杨立业，新疆十月拖拉机厂工人，新疆三新派新工总负责人。胡良才，新疆八一钢铁厂车间党支部书记，新疆三促派乌鲁木齐地区工促会负责人。孜牙，乌鲁木齐东风人民公社牧民。吴巨轮，新疆大学数学系学生，三新派红二司负责人。

重炼”，还未完全拆除的两派组织的“山头”又垒了起来，“内战”再起，社会秩序再次陷入混乱。1969年1月，王恩茂奉调离开新疆。

1969年4月，龙书金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同年8月13日，位于新疆裕民县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的铁列克提战斗失利。据中方资料称，1969年6月，苏边防军人在该地区私设国界标志，构筑工事，绑架并打死中国牧民。7月3日，总参谋部、外交部批准新疆军区塔城军分区边防分队进入该地区巡逻。8月13日，边防分队共25人（含掩护分队11人）进入该地区巡逻。苏边防军300多人在装甲车和直升飞机配合下，对中方巡逻队进行突然袭击。由于中方边防部队战前缺乏周密准备，寡不敌众，后援不济，造成战斗失利，巡逻分队25人及随同执勤的3名民兵全部阵亡。此一事件使龙书金威信大失。

在1970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中，自治区革委会开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对原区级机关干部进行集中审查，学习班成立若干“专案组”，对干部进行监护审查和批斗。地、州、市、县和许多基层单位，都开办类似的学习班，集中关押、审查本单位干部、群众。清队中给一批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乃至部分工人、农民、牧民群众扣上“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分子”、“里通外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给一批知识分子则扣以“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对他们进行批判斗争，有的被打倒，有的被迫害致死。许多单位成立了“专政队”，有的单位私设公堂，搞刑讯逼供。据不完全统计，全区共造成了23万多起（人）冤、假、错案，使一大批干部、知识分子，乃至部分工人、农民、牧民遭受摧残迫害。

1971年5月，龙书金任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1972年7月16日，中共中央在批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新疆军区党委报告的批语中称，“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龙书金同志站在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上了贼船，陷得很深，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转移斗争大方向，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龙书金同志经过批林整风会议的教育，认识有所提高，中央希望他加强学习，进一步检查和改正错误。”同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决定，免去龙书金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革委会主任，新疆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的职务。

龙调离新疆，被下放到郑州工厂劳动。后从郑州回到北京，接受审查处理。最后审查结论为在新疆工作时犯有错误，去掉了“上了贼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的帽子，按大军区副职待遇离休，在广州安置。1988年被降级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3年4月16日在广州病逝。

三、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文革进程^{【1830】}

兵团1967年3月底前情况，见本书第三十三节。

1967年3月30日至5月8日，兵团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先后作出决定，呈报新疆军区，将兵团副司令员陶晋初、参谋长陈实、副参谋长曾继富、干部部副部长杨兆元、计财部部长毛乃舜、供销部代部长陈明池、石管处副政委汪培模、农一师师长林海清、工二师师长傅志华、农六师政委赵予征等10人停职反省。

6月，中共中央决定：任命裴周玉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二政委、党委第二书记；丁盛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司令员，党委第三书记。

8月，军委任命现役军人孔瑞云（陆军第六十七军副军长）、杜海林（陆军第十六军副军长）为兵团副司令员，曾如清（江苏省军区第二政委）为兵团副政委，朱铁谷（陆军第五十九师师长）为兵团司令部副参谋长。

1968年2月22日，《新疆日报》报道：生产建设兵团公布所属单位举办各种类型毛泽东思想学习班2,000多个，10万多人参加了学习，200多个单位实现了大联合。

同月，丁盛奉命调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

3月7日至5月15日，兵团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林彪接见了与会人员。周恩来以及江青、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等多次接见与会人员。丁盛由广州专程赴京陈述意见。5月15日，兵团党委常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决议》（简称“八条决议”）。9月13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转了这个决议。

6月10日，兵团党委专案领导小组成立，李荆山任组长，黄振江为副组长，下设专案办公室，以兵团机关“左派”干部为骨干，抽调一批人员，开展专案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全兵团发生冤假错案3,543起，涉及2.8万多人，死亡2,700余人。

6月14日，兵团党委、兵团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要求各革命群众组织认真执行。至10月24日止。全兵团共清理出各种“阶级敌人”13,834人。

9月21日，兵团党委发出通知：经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免除陶峙岳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兵团司令员职务，作退休处理。1970年陶峙岳离开新疆回湖南长沙。1978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1830】主要资料来源：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志编纂委员会，http://www.chinaxinjiang.cn/bingtuan/btdsj/4/201408/t20140820_440076.htm，最后访问：2020年4月23日。

10月3日,兵团党委决定,兵团司令部、政治部机关除少数干部坚持日常工作外,其他人员分别集中到乌鲁木齐郊区兵团养禽场和教导大队举办“学习班”,进行清队整党,继续搞斗、批、改。

10月30日,据兵团党委统计,文化大革命期间,师职以上干部被“打倒”115人,靠边38人,合计153人,占同级干部的84%;团职干部被“打倒”925人,“靠边”122人,合计1,047人,占同级干部的54%。

11月,中央军委决定:任命张竭诚(现役军人,沈阳军区副参谋长)为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任命吴登云(现役军人,解放军政治学院第二大队大队长)^[1831]为兵团政治部副主任。

四、各地、市、州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1967-1968年,新疆辖6专区、5自治州与1自治区辖市(其中塔城专区、阿苏泰专区由伊犁哈萨克自治区管辖)。除乌鲁木齐市外,其余地、州革委会建立时间普遍较晚,均在1969年间。

(一) 乌鲁木齐市

1967年2月1日,“乌鲁木齐市接管委员会”(群众组织)制定“关于市委、市人委有关部门权限的规定”,宣布将市委、市人委的一切权力予以接管。3月15日,乌鲁木齐军分区成立生产办公室,代行市党政机关部分职权,领导全市生产和工作。生产办公室主任由军分区司令员孙绍荣担任。3月21日至5月2日,新疆军区先后抽调211名解放军干部、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市属35个厂矿企业开展工作。4月20日,人民广场、八道湾、新疆日报社等处相继发生大规模武斗事件。至7月15日,因武斗死亡28人。1968年7月29日,乌鲁木齐10万人在人民广场集会,庆祝两派群众组织实现联合。9月5日,乌鲁木齐市革委会成立,乌鲁木齐军分区副政委黄瑜任主任。^[1832]

(二) 哈密专区

1967年1月28日,专区群众组织夺权指挥部宣布夺取地区党政财文大权,各党政机关瘫痪。3月15日,哈密军分区成立生产办公室,组织和领导地区经济、文化、教育等工作。3月20日,对哈密报社,县广播站、邮电局、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汽车运输公司等单位实行军事管制。7月,两派群众组织在哈密城镇发生大规模武斗。以后,武斗逐步升级,炸毁二层邮电大楼,中断铁路交通。10

【1831】 吴登云,1965年大校军衔。

【1832】 乌鲁木齐市党史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乌鲁木齐市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103-105。

月4日，铁路系统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发生冲突，兰新铁路哈密车站铁路运输第一次中断。10月6日，周恩来指示国务院发出《关于立即开放哈密车站》的特急电。10月14日，两派群众组织协商，达成立即开放哈密车站的“四条”协议。但均未遵守，双方武斗不止。10月19日，周恩来发出《关于解决哈密地区铁路交通问题》的指示，责成哈密两派群众组织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并以中央名义委托第八航校派出部队负责监督和保护铁路运输畅通。10月21日，地区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在驻军调查组监督协助下，又达成“四条”临时协议，并定于10月22日零时执行，铁路开始通车。11月30日，新疆军区、兵团、空军组成联合监督检查小组到哈密，封存武器，制止武斗。1968年2月13日，专区两派代表在哈密地区联合监督检查小组的指导下，协商达成《关于实现革命大联合》的10条协议。10月，哈密城镇又发生大规模武斗，炸毁专署大楼。文革中，全专区发生武斗14次，死亡210人，炸毁大楼2座和影剧院、大型商店各一座。1969年1月23日，哈密地区两派的代表赴乌鲁木齐协商成立哈密专区、县革委会，驻军、哈密军分区、空字129部队（空军第八航校）代表也一同前往。3月18日，哈密专区革委会成立。^{【1833】}主任周立云（哈密军分区司令员）。

（三）阿克苏专区

1967年1月27日，一派群众组织夺了阿克苏专区党政大权，接管了地委、专署的一切权力。3月11日，阿克苏军分区奉命介入地方文革，对阿克苏报社、公署公安处、专区邮电局、运输公司和阿克苏县公安局、广播站等单位实行军事管制。3月19日，阿克苏军分区、各县人民武装部和县驻地部队奉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成立阿克苏军分区生产办公室和各县武装部生产办公室，先后向一批厂矿企业、学校派出军代表。1969年3月31日，自治区革委会批准成立阿克苏专区革委会。^{【1834】}主任林友章（农一师政委，现役军人）。

（四）昌吉回族自治州

1967年1月26日，昌吉州党政大权被造反派夺取，党政领导机关陷于瘫痪。2月11日，州委书记吴鉴群、州长马明亮等州、县21名领导干部被挂黑牌批斗，并拍摄了“群丑图”，散发全疆。3月3日，昌吉军分区奉命对昌吉州党政机关及昌吉报社实行军事管制。建立生产办公室，负责组织领导昌吉州的工农业生产。9月后，州属各县相继发生较大规模武斗。文革期间，全州共发生武斗160起，死

【1833】哈密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哈密地区志》，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7年，页51-52。

【1834】阿克苏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阿克苏地区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页1474-1475。

亡65人,致残403人。1968年8月,陆军第五师奉命进驻昌吉州,接替昌吉军分区三支两军。12月11日,吴鉴群被逮捕入狱,1970年1月3日被迫害致死。1969年4月5日,新疆区革委会同意中共陆军五师委员会和中共昌吉军分区委员会关于成立昌吉州革委会的报告。^[1835]主任白镜(陆军第五师政委)。

(五)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1967年3月13日,自治州、县党政机关相继瘫痪,博尔塔拉军分区奉新疆军区命令,正式介入地方文革,担负三支两军任务,对州公安处、邮电局、博尔塔拉报社实行军事管制。3月15日,博尔塔拉军分区成立生产办公室,开始负责领导全州的工农业生产。3月18日,博尔塔拉军分区奉新疆军区指示,对州人委工交科、博乐县公安局、博乐县有线广播站实行军事管制。3月27日,对州商业局、州气象台、州人民银行实行军事管制。1968年8月,州、县政法机关全面实行军事管制,由自治州公、检、法机关管会行使公检法的一切职权。1969年4月8日,自治州革委会成立。^[1836]主任萧升旭(博尔塔拉军分区司令员)。

(六) 和田专区

1967年2月,由和田军分区、驻军和地委、专署群众组织负责人共同组成和田专区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3月11日,和田军分区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对和田报社、和田县有线广播站、公安处、邮电局、第七运输公司实行军事管制。3月18日,撤销和田专区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成立和田专区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由和田军分区直接领导。3月24日,专区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改称军分区生产办公室,负责和田专区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工作。9月26日,和田专区、和田县两派群众组织爆发第一次武斗。9月30日,和田发生第二次武斗。此后,两派在专区水利局一带持续武斗48天,双方死亡43人^[1837],重伤209人,致残20余人。1968年7月30日,和田地区两派组织在京代表达成革命大联合协议。1969年1月29日,和田专区、和田县两派在驻军支左领导小组调解下,达成停止武斗协议。4月12日,经新疆区革委会批准,和田专区革委会成立。^[1838]主任傅子英(和田军分区司令员)。

【1835】昌吉回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昌吉回族自治州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页51-52、1327、1360。

【1836】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志》,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49-51。

【1837】和田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和田地区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1年,页1058。

【1838】《和田地区志》,页40-41。

(七) 喀什专区

1967年1月25日，造反派夺了喀什地委、专署、市委、市人委的权，从此，喀什专区、市党政机关处于瘫痪状态。3月11-13日，南疆军区对喀什专署公安处、专区邮电局、专区粮食局、喀什日报社、新疆交通厅喀什运输公司、喀什市有线广播站实行军事管制。3月17日，喀什专区生产办公室成立，喀什军分区司令员萧升旭兼任主任。8月16日，喀什三促一些人与疏勒县联委联合组织农民攻打三新把守的七星桥，造成2人死亡，40多人受伤。事后，三新将七里桥堵塞。周恩来亲自过问，要求制止武斗，开放交通。至10月15日，路障被拆除，经过喀什的南北交通恢复。1969年4月16日，喀什专区革委会正式成立。^[1839]主任李双盛（南疆军区副司令员）。

(八)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1967年1月27日，州人委被群众组织夺权。3月15日，巴音郭楞军分区奉命成立生产办公室，行使原州人委的部分权力。1969年4月25日，经自治区革委会批准，成立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革委会，农二师政委马秉需（现役军人）兼州革委会主任。^[1840]

(九) 塔城专区

1967年2月18日，塔城军分区经请示新疆军区同意，对地委和专署实行军事接管，成立塔城专区夺权指挥部，4月改称革命委员会，阎泽民（军分区政委）任革委会主任。3月10日，塔城专区公检法军管会成立。3月27日，塔城军分区发出文件，决定派军队代表参加县以上夺权指挥部或“三结合”革委会；派民兵代表参加公社以下单位、工厂、财贸、文教、党政机关和学校的“三结合”权力机构。3月，塔城军分区和驻塔城8010部队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七师、农九师，先后成立支左办公室，派出干部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专区和各县三支两军，全面介入文化大革命。1967年初，塔城专区群众组织分裂为互相对立的两大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全专区两派群众非正常死亡计434人。1969年4月26日，经自治区革委会批准，塔城专区革委会成立，主任刘月（塔城军分区政委）。^[1841]

【1839】喀什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喀什地区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100-101、1122。

【1840】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页1500。

【1841】塔城专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塔城地区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页40-41、576、663。

(十)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1967年1月29日,伊犁群众组织成立“夺权筹备委员会”,控制了伊犁州党政财文大权,随后,各专区、县(市)党政机关均被夺权。3月13日,伊犁军区党委决定成立生产办公室,伊犁州各级实行非常时期的财政、经济管理,各县(市)均成立由武装部牵头的生产办公室。3月19日,伊犁军区、塔城和阿勒泰军分区及驻州各部队、生产建设兵团,先后成立支左办公室,派出由军队、兵团干部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各州各地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全面介入地方文革。9月3日,伊犁首次发生两派群众组织间的大规模武斗。随后,派性斗争日趋激烈,1967-1969年的3年中,全州发生数十起武斗,死亡61人,受伤上百人。文革十年间,伊犁直属县(市)非正常死亡472人,塔城专区434人。1968年9月,各地举办两派群众组织学习班,实施大联合。1969年5月,伊犁州革委会成立,主任钟良树(伊犁军区政委)。自治区革委会在批复中规定,伊犁州革委会暂管辖伊犁地区8县1市。^{【1842】}

(十一) 阿勒泰专区

1967年3月12日,阿勒泰军分区发布命令:自3月11日20时起对专区公安处、邮电局、中国人民银行阿勒泰中心支行、阿勒泰报社和阿勒泰有线广播站实行军事管制。同日,阿勒泰军分区党委主持召开专区党、政、军三级干部会议,研究文革中出现的各种实际问题,讨论春耕生产和各项工作。3月18日,军分区生产办公室成立,行使特殊情况下的政府职能。1968年1月14日,阿勒泰城区两派群众组织在阿勒泰县拖拉机站持枪武斗,县拖拉机站站长等6人被打死。1969年10月1日,阿勒泰专区革委会成立。主任马瑞云(阿勒泰军分区政委)。^{【1843】}

(十二)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1967年1月26日,州交通局一派群众组织与介入地方支左的克孜勒苏军分区部分指战员发生冲突。南疆军区军法处同意群众组织的要求,将军区司令员吴仕智、政委尉祖光等6位领导关入监狱,造成极为严重的“一二六”事件。1月27日,南疆军区在阿图什武装游行,支持一派群众组织“革命行动”,从而加剧了自治州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1月31日,州一派群众组织夺了州委、州人委的权,使自治州党政机关处于瘫痪状态。2月24日,南疆军区执行新疆军区命

【1842】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53-54、248-249。

【1843】阿勒泰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阿勒泰地区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39-41、820。

令，释放被关押的军分区6位领导干部，遭到州一派群众组织的抵制，并煽动群众到军分区门前静坐示威。3月10日，军分区宣布对州公安处、邮电局、报社、交通局、阿图什县有线广播站实行军事管制。3月13日，自治州“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成立，主任吴仕智。8月14日，两派群众组织在州体委发生武斗，阿图什地区武斗逐步升级。1968年秋季，自治州公检法军管会炮制所谓“帕米尔前进联盟叛国外逃集团案”，拘捕了原州长塔依尔·买买提力等一批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1969年10月1日，自治州革委会成立。^{【1844】}主任李进攻（南疆军区党委常委）。

至此，新疆12个地、州、市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第一把手全为现役军人。

【1844】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史志编纂委员会：《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38-39。

第九章

1968：檣倾楫摧

第七十六章 对中共中央工作机构等的军事管制^{【1845】}

一、中共中央工作机构

1967年1月，中共中央工作机构计有：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央调查部、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高级党校、人民日报社、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红旗杂志社、光明日报社、中央档案馆等。其中中宣部、中央统战部、中联部、中调部、中央高级党校先后实行军管；中组部由军队干部组成业务组；人民日报社、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红旗杂志社、光明日报社先后由工宣队、军宣队进驻。

（一）中央办公厅

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兼中办警卫局局长，具现役军人身份。

1969年11月15日，中发〔69〕78号中共中央文件通知：经毛、林、中央批准，任命中央办公厅政治部主任（原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王良恩、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团长张耀祠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张耀祠均具现役军人身份。

（二）中央组织部

1966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派陆军第一军政委聂济峰^{【1846】}任中组部文革筹委会顾问。1967年1月18日，中组部几个群众组织夺了文革筹委会的权，并宣布筹委会主任曾涤、顾问聂济峰停职反省。5月6日，康生宣布：经中共中央批准，由解放军组成业务组，朱光^{【1847】}为负责人。按照规定，业务组不管运动，只管业务，主要是管好档案，保证中央使用档案，并保证档案的安全。朱工作两个月后，即被揪回部队看管批斗。^{【1848】}10月25日，康生宣布郭玉峰^{【1849】}为业务组主要负责人。1969年2月21日，中共中央批准中组部业务组《关于中组部中监委机关工作人员下放劳动的报告》，中组部除留机关工作的55人（其中干部35人）外，其余全部下放五七干校劳动（该部五七干校原在吉林通榆双岗，1969年底迁至河南长葛）。10月20日，中共中央调中央党校军代表车志英^{【1850】}为中组部业务组负

【1845】主要资料来源：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六卷、附卷四，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

【1846】聂济峰，1964年晋升少将。

【1847】朱光，时任总政干部部副部长。1965年大校军衔。

【1848】朱光：《我的人生之路》，北京：蓝天出版社，2008年，页233。

【1849】郭玉峰，时任陆军第六十四军政委。1964年晋升少将。

【1850】车志英，时任武汉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1965年空军大校军衔。1974年1月回部队后历任武汉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1987年离休。

责人。1971年2月8日，调中央专案组一办负责人郑屏年^{【1851】}为中组部业务组负责人。1975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同意中组部建立核心小组，部长郭玉峰任核心小组组长。

郭玉峰1967年10月至1975年6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业务组组长。1975年6月至1977年12月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据郭称，到中组部后他曾三次给中央、毛泽东、周恩来去信，要求回部队。委任为中组部部长后，他又为回部队事再次去函毛、周，均未获准。1969年4月当选中共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后又为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1977年12月被免去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胡耀邦取而代之。由于他的关系还在六十四军，至1980年方被令办理转业手续，同年5月被隔离审查，关进秦城监狱。1981年2月在陈云、邓颖超的过问下得以释放。1983年7月被开除党籍。9月被下放到河北省邢台市安置，每月发给生活费150元。2000年1月20日，在北京病逝。

郭玉峰是派至中共中央工作机构的军队负责干部中受处分最重的一个。主要原因，恐怕是他在位时得罪了一些老人，如文革初期的沈阳军区政委、1978年12月后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宋任穷。郭后来申辩称，“我是毛主席党中央调来的。任中组部业务组组长是周恩来同志签署报中央批的。1975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是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由他签署报毛主席，周恩来，党中央批准的（四人帮只有四人，其他政治局委员都是同意的）。难道他们调我来中央按他们的指示办事是篡他们的权吗？他们不是中央吗，他们不代表中央吗？在我工作期间，对你们这些人，大部分也是解放使用的。调中央之前，我不认识康生、‘四人帮’，我只知道党中央。我服从党中央，按中央指示办，中央交办的去办。有请示，有报告，有批件可查。我不搞阴谋，不搞小动作，不搞见不得人的事。中央交办的事我办了。如果说有错误，甚至有罪，也只能由中央负责，或主要的首先应由中央负责。把上边交办的事来追究下边的工作人员的责任是不正确的。强加罪名搞莫须有，歪曲事实，掐头去尾，看现象不分析实质，断章取义更是错误的。”^{【1852】}惟郭的这些申辩，未被中央接受。

（三）中央宣传部

1967年6月1日，中央文革小组宣布撤销中宣部，开办原中宣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由群众组织勤务员组成八人小组负责部内具体事务。

【1851】郑屏年，时任陆军第四十军政治部主任。1965年大校军衔。1976年后任中组部副部长至1979年。军内仍任军政治部主任至1978年。1987年离休。

【1852】郭玉峰对在中央组织部工作十年的回忆。阎晶明：《我的丈夫郭玉峰》，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年，页92。

1968年7月24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任命中共中央宣传部军事管制小组组长的通知》（中发〔68〕114号中共中央文件），决定对原中宣部实行军事管制，任命李虓为军事管制小组组长，王少平为副组长。^{〔1853〕}

1969年8月，陈伯达批准原中宣部除老弱病残者外，全部人员下放宁夏贺兰县劳动，开办五七干校。12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任免旧中宣部军管小组组长的通知》（中发〔69〕92号中共中央文件），任命康应中^{〔1854〕}为中宣部军事管制小组组长，免去李虓的组长职务。

1970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旧中宣部军管小组副组长任职通知》（中发〔70〕24号中共中央文件），任命张学茂^{〔1855〕}为中宣部军管小组副组长。军管人员先后共达38名。6月12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宣部贺兰县五七干校由兰州军区代管。11月6日，中共中央宣布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取消中宣部，其五七干校和安置工作归中央办公厅管理（中发〔70〕60号中共中央文件）。12月，经中组部同意开始分配干部的工作。

1975年2月，五七干校从宁夏贺兰县迁回北京。9月，原有干部226名，已分配调出154名，死亡3名，尚有69名。9月26日，汪东兴批准军事管制小组撤销，成立干校领导小组，由童大林（原中宣部秘书长）任组长，继续负责分配干部工作等。11月25日，军管人员全部撤走。

（四）中央统战部

1966年11月底，群众组织相继成立，部领导被停止工作，业务工作陷于停顿。

1968年5月12日及6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两次发出《关于任命中央统战部军代表的通知》（中发〔68〕79号、102号中共中央文件），任命刘友法、赵静轩为统战部军代表，^{〔1856〕}主持工作。9月，刘友法派出统战系统军代表小组到国家民委、民族宫、民族出版社、国家宗教局等单位。

【1853】李虓，时任兰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65年大校军衔。王少平，时任甘肃省定西军分区副司令员。

【1854】康应中，时任陕西省军区政治部主任。1970年1月任陕西省军区副政委。

【1855】张学茂，时任兰州军区守备师副师长。

【1856】刘友法，时任海军舟山基地政治部主任，1965年海军大校军衔。赵静轩，时任海军军械学校副政委。

1969年4月，部内全体干部（除参加中央专案审查工作的外）下放吉林双辽农场中央统战部五七干校。1970年2月因战备不宜留在东北，五七干校搬迁至湖北沙洋黄土坡，后转到沙洋七里湖。^{【1857】}

1971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决定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原副秘书长李金德恢复工作，和刘友法一起领导统战部工作。

1973年1月，干校全体人员回部，在河北固城县和中央民族学院另成立干校，实行轮流半年制度，当时部内仍是军代表负责。6月，中央决定派童小鹏到部工作，并决定由刘友法、李金德、童小鹏三人负责，刘友法牵头，负责领导统战部、全国政协机关、民委系统、宗教局工作。

刘友法文革结束后回部队，为派至中共中央工作机构的军队干部回部队后职务提升最高者。他于1977年11月后历任海军烟台基地政委、军旅顺基地政委、海军政治部主任、海军党委常委。1985年8月至1990年4月任海军纪委专职书记（副大军区职）、海军党委常委。1988年9月被授予海军中将军衔。1998年7月离休。2007年6月29日在北京病逝。

（五）中央对外联络部

1967年1月至4月，副部长许立及一大批局级干部被停止工作。1968年3月前，部的工作和文化大革命主要由代部长刘宁一领导。1968年4月后，刘宁一、副部长伍修权、赵毅敏等部主要领导也先后被“监护”。1968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决定对中联部实行军管（中发〔68〕63号中共中央文件），任命任允中为军管小组组长，刘宏贤为副组长。以后又增派杨玉衡任副组长。^{【1858】}军管小组主要抓文革运动，不管业务，业务仍先后由秘书长张香山、副秘书长申健主持。

1968年5月，在军管小组的促成下，中联部两派群众组织达成协议，正式成立了统一的群众组织——革命大联合委员会（简称大联委）。此后，成立了由军管小组、群众组织代表、干部三方面参加的“专案指导甄别小组”，具体负责中联部的专案调查。不久，成立了刘宁一问题等六个专案小组。

1969年4月，经康生批准，中联部精简机构，将原来的8个业务处（局）合并为4个组。工作人员除留下207人外，其余678人（含先遣组71人）于6月

【1857】《中国统一战线全书》编委会：《中国统一战线全书》，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页717-718。

【1858】任允中，时任黑龙江省军区副政委。1965年大校军衔。刘宏贤，时任炮兵第六十一师炮兵第六〇三团政委，后任炮兵第六十一师副政委。杨玉衡，时任陆军第一三七师副师长，后任陆军第四十六军副参谋长。

乘火车赴黑龙江肇源五七干校劳动。1970年1月，由于战备需要，中联部五七干校由肇源迁往河南沈丘。

1971年1月，中共中央任命耿飏为中联部部长。耿飏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恢复和健全领导机构，从干校陆续调回工作人员，开展工作。9月，成立了由耿飏等11人组成的党的临时核心小组。11月，耿飏请示中央，建议撤销军管小组。此后，军管小组成员陆续回到原部队工作。

1973年8月，中共中央同意中联部核心小组由12人组成，耿飏任组长，冯铨、任允中、张香山、申健为副组长；任命冯铨、任允中、张香山、申健为中联部副部长。^{【1859】}

（六）中央调查部

1968年6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任命中央调查部军代表的通知》（中发〔68〕97号中共中央文件），任命陈新华为军事代表，朱道良为副军事代表。^{【1860】}

1969年6月13日，经毛泽东、林彪批准，中央、军委决定，中央调查部与总参情报部合并。随后成立“中央调查部、总参情报部合并领导小组”，成员为彭绍辉（副总参谋长）、罗青长（中调部原副部长）、张挺（总参情报部部长）、陈新华。1970年1月6日，中央批准两部合并方案。5月13日，中央、军委向有关省、直辖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及有关军区、警备区党委常委发出关于中央调查部与总参情报部合并问题的通知。通知称：两部合并后，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情报部”。总参情报部是我党政军的对外军政情报统一机关（不担负国内治安情报工作），隶属于总参谋部。两部合并后，总参情报部迁入中央调查部。中调部编余人员以“中共中央直属西苑机关”名义，由军代表陈新华带领，到山东邹县举办“中共中央直属西苑机关东风五七干校”。1973年6月，总参情报部与中央调查部重新分开。总参情报部从中央调查部驻地搬出，干校撤销，全体干校人员离开山东，军代表也随之撤离。^{【1861】}

（七）中央高级党校

1966年6月至1969年10月，中央高级党校校长、副校长全部停职，教学工作陷于停职。1968年6月1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任命

【1859】任允中1975年9月回部队，任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政治学院政治部副主任、顾问，1985年7月离休。

【1860】陈新华，时任陆军第六十七军副军长。1965年大校军衔。朱道良，时任陆军第二十六军第三十三师副师长。

【1861】陈新华回部队后1978年5月起历任陆军第六十七军军长、青岛警备区司令员（正军职），1983年离休。朱道良回部队后1969年8月起历任陆军第三十三师师长、第二十六军司令部代理党委书记、第七十七师师长，1989年去世。

中央高级党校军代表的通知》(中发[68] 80号中共中央文件),任命车志英为中央高级党校军代表。1969年6月,全校干部下放河南西华五七干校劳动,由中央党校五七学校领导小组主持工作。1969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调中央党校军代表车志英为中组部业务组负责人。

1970年9月,根据预定方案,总参办公厅、军务动员部、政治部整体搬迁至中央党校。1972年8月,根据中央要求,总参办公会议决定,总参机关驻中央党校的房屋逐步退还。1977年,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央党校。总参机关腾房工作直至1979年5月方全部完成。^{【1862】}

二、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和政协机关

(一) 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

1966年8月,康生、徐冰、刘宁一、周荣鑫组成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领导小组,主持常委会机关工作。1968年6月1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任命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和政协机关军代表的通知》(中发[68] 83号中共中央文件),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人大常委会机关实行军管。1969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任免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和政协机关副军代表的通知》(中发[69] 8号中共中央文件)。1969年11月,全国人大机关工作人员分批下放湖北省沙洋范家台五七干校劳动。机关在工作人员下放干校期间成立留守处,在军代表李启煌领导下,处理日常工作。1973年3月军管组撤离,6月干校撤销。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同年2月,人大常委会机关在人民大会堂恢复办公。

(二) 全国政协机关

1968年6月1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任命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和政协机关军代表的通知》(中发[68] 83号中共中央文件),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全国政协机关实行军管,建立了军代表室机构,其任务是搞“大联合”、消除“派性”,继续搞“斗批改”。军代表室除了管人大、政协,还负责领导八个民主党派中央机关的运动,此外还有全国工商联、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职业教育社,共管辖13个单位。

1969年9月,军代表决定人大、政协等13个单位联合办一个五七干校,地点在湖北沙洋。据当时不完全统计,下放人员占干部职工总数的95%以上。^{【1863】}

【1862】总参谋部管理保障部:《总参谋部管理保障部部史》,2010年,页173-176,246-247。

【1863】汪东林:《十年风暴乍起时的政协知名人士》,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页73-74。

三、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

(一) 最高人民法院

1968年3月2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任命最高人民法院机关军事代表的通知》（中发〔68〕48号中共中央文件）称，经中央决定，对最高人民法院机关派驻军事代表，并任命了军事代表和副军事代表。1968年8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任免最高人民法院机关军事代表的通知》（中发〔68〕125号中共中央文件）。

(二) 最高人民检察院^[1864]

1967年1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被造反组织夺权，工作陷于瘫痪。

1968年3月2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任命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军事代表的通知》（中发〔68〕49号中共中央文件）称，经中央决定，对最高人民检察院派驻军事代表，并任命了军事代表和副军事代表，军事代表黄庆祥。全国各地检察机关被陆续派入军事代表，实行军管。

1968年10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军代表向中央提交干部下放劳动的请示报告。同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军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军代表、内务部军代表和公安部领导小组联合向毛泽东、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提出《关于撤销最高检、内务部、内务办三个单位，公安部、最高法留下少数人的请示报告》。这个报告经毛泽东批示同意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先后被撤销。

1969年2月2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160多名干部、职工，由军事代表和临时革命领导小组带队，下放到湖北荆州地区沙洋劳改农场进行劳动锻炼，成为最高人民检察院五七干校。

1973年10月4日，撤销最高人民检察院军事代表，在五七干校学习的干部大部分被分配了工作，五七干校也随之不存在。同时，在北京设立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留守组。

1975年1月17日，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修正通过了第二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从而检察机关被撤销的事实，在国家的根本大法上予以确认。

[1864] 本节内容参考百度百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条目及《人民检察大事记》。

四、中央群众团体组织

1968年，中央群众团体组织机构计有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科协、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和全国侨联共八个，其中对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实行军事管制。

（一）全国总工会

1967年1月11日，中央政治局决定：停止全总作为全国工会的领导机关的一切活动。

1968年6月1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任命中华全国总工会军代表的通知》（中发〔68〕81号中共中央文件），任命蔡传云^{【1865】}为军事代表，胡瑞国为副军事代表。

1968年12月16日，汪东兴传达周恩来有关全总的批示：“拟建议全总本身在军代表领导下，只实现革命大联合，进行革命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不搞革命三结合，其所属机构亦如此。”

1969年1月7日，全总在河南罗山、息县筹建全总五七干校。当年3月至10月，全总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绝大多数干部、工勤人员先后到五七干校。

1969年12月7日，中共中央任命王俊青^{【1866】}为全总军事代表，免去蔡传云的军事代表职务（中发〔69〕80号中共中央文件）。蔡传云回军委工程兵任政治部副主任。

1975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组的通知》。决定筹备组由55人组成，组长金祖敏。9月11日，中共中央批准撤出派驻全总的军事代表。王俊青回军委工程兵任政治部副主任。

（二）共青团中央

1967年1月，团中央机关“革命造反军团”召开夺权大会，宣布团中央机关的领导干部一律停止工作。

1968年3月8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任命共青团中央机关军事代表的通知》（中发〔68〕36号中共中央文件），任命尹忠尉^{【1867】}为军事代表，张立顺为副军事代表。

1969年4月，团中央机关和直属单位的干部、工人、学生以及工勤人员1,400余人到河南潢川黄湖五七干校下放劳动。1970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团

【1865】蔡传云，时任军委工程兵政治部干部部部长。

【1866】王俊青，时任军委工程兵科学研究部部长兼政委。1965年大校军衔。

【1867】尹忠尉，时任陆军第十二军第三十一师政委。

建团的通知》。各省、市、自治区逐步恢复共青团组织。1975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组的通知》，筹备组由50人组成，组长谢静宜。9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撤出团中央机关军事代表。^{【1868】}

（三）全国妇联

全国妇联于1967年1月23日被组织内部造反群众夺权，地方绝大多数妇联在夺权后停止组织活动。^{【1869】}

1968年6月1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任命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军代表的通知》（中发〔68〕82号中共中央文件），任命李少初为军事代表，任水江为副军事代表。

1969年12月，全国妇联机关干部到河北衡水五七干校下放劳动。

1970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任免全国妇联军代表的通知》（中发〔70〕65号中共中央文件），任命崔仲民^{【1870】}为全国妇联军事代表，免去李少初的军事代表职务。

1975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筹备召开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四次妇女大会筹备组，组长杨波兰。9月，军代表撤出全国妇联。

第七十七节 “杨余傅事件”

一、中央两道命令与杨成武三个错误

进入1968年3月下旬，以毛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突然发生了新的分裂，这就是著名的“杨余傅事件”。

3月22日，中央连续发布了两道命令，分别如下：

命令

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决定：

（一）杨成武犯有极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职务，并撤销其中央军委常委、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职务。

（二）余立金犯有极严重错误，又是叛徒，决定撤销其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二书记职务。

【1868】《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附卷四，页285-586。尹忠尉1970年12月任陆军第十二军副政委，后任国家体委革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江苏省军区副军职顾问。

【1869】耿化敏：《文革时期妇联组织危机与成因初探》。《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年第5期。

【1870】崔仲民，时任通信兵学院训练部部长。1965年大校军衔。

(三) 傅崇碧犯有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

此命令发到团，传达到全体指战员。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命令

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决定：

(一) 任命黄永胜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二) 任命温玉成同志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此命令发到团，传达到全体指战员。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上述两道命令，随即分别以中发[68]52号、53号中共中央文件发至全军全国。

3月24日晚九时三十分至25日凌晨一时三十分，林彪和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驻京军事机关、部队、院校的十四级（正团级）以上党员干部，并作了重要指示。25日凌晨一时三十五分，毛泽东接见了全体到会人员，以示对这一会议的支持。

林彪首先讲话称，“今天，这个会是要向同志们宣布中央最近的一个重要的决定。最近，我们党的生活中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发生了新的矛盾，发生了阶级斗争中间新的情况，这个问题。虽然没有像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罗、陆、杨那样大，但是要比一般的其他问题要大些，如主席说的，这是一个不很大不很小的问题。这就是，最近从空军里面发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排挤韩先楚，排挤黄永胜以及与他地位不相上下的。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会，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的。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的职务；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办！撤销北京的卫戍司令傅崇碧的职务。决定由黄永胜同志当总参谋长；决定由温玉成副总长兼北京卫戍司令。”^{【1871】}

林彪称，“杨成武的错误，主要是山头主义、两面派和曲解马克思主义。”

【1871】《林副主席、中央首长重要讲话》。《湖南文艺战报》编辑部、省戏工室倚天剑战斗队、省戏工室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翻印。1968年，页1-2。



毛泽东与杨成武、余立金在巡视途中交谈，1967年9月。

二、对杨成武的“山头主义”的指控

关于杨成武的第一个错误——山头主义，林彪称，“杨成武他只相信他一小撮的人，同他关系密切的人，而不相信别人。这个同中国革命胜利的事实是违背的。整个的战争的胜利就是最后的这个时期，几个野战军嘛！四个野战军嘛！一、二、三、四野嘛！晋察冀也是这个解放军的一部分，可是他仅仅是晋察冀里面的一部分（第一分区这一部分），其他还有三个分区。照原来的老底子讲，晋察冀这个地区是115师的这些干部，就是115师的干部在这个地区只放下了四分之一，还有四分之三不在这个地方。之后四个野战军，有的有晋察冀的，有的没有晋察冀的；有的有一分区的人，有的没有一分区的人。他只用他那一伙子；而不是他的，采取排挤的态度。如果照他这一套，那我们就要把吴法宪拿掉，把谢富治拿掉，把许世友拿掉，把韩先楚拿掉。逐渐发展起来，与他相同地位的这些人，黄永胜、陈锡联、杨得志都会被排挤。所以我们选择了，不能采取他的做法。第一，他是不对的，第二，他是少数，而其他的是多数，其他的是对的。所以权衡两个方面，我们只有采取不是打倒别人，就把他打倒的做法。”^{【1872】}

【1872】《林副主席、中央首长重要讲话》，页3-4。

林彪称“最近从空军里面发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这在后来出版的《吴法宪回忆录》、《邱会作回忆录》中都有所述说。据邱会作称，吴私下对他们说，“杨同我说过，今后我的主要精力应当协助他，总政瘫痪了，还要我多管，总参的日常工作要以我为主。这样我对空军的工作是时间和精力都照顾不来了，杨考虑空军的工作主要由余立金负责，余也是老空军，工作能力又不错，这样对空军的工作是有好处的。问我有什么需要考虑的，如果我没有意见，他就去向林总和江青同志去汇报。这是他要免去我空军司令员的职务嘛！”吴法宪很快就把杨成武的话报告了林彪。林听了有些吃惊，对吴说，“杨的考虑不妥，一切要由主席来定。”林对解决杨的问题总的原则是“争取息事”。但杨一点错也不认。邱称，“林总在不可能说服杨成武的情况下，才让叶群去向毛泽东报告。主席对杨的事，格外地重视，主席亲自召开了四次会，反复详细地听汇报，主席感到不拿掉杨成武是不成的了，甚至要影响到毛和林的关系，当时林比杨重要得多。”^{【1873】}

吴法宪在回忆录中所述吴杨冲突的主因却与邱说不同。吴称其与杨、余立金在处理杨在空军工作的女儿与余立金已婚秘书的不当恋情时意见相左，杨的夫人赵志珍和余立金到林彪住处向叶群告了吴一状，林听了很生气，告之吴说，“赵子珍和余立金来告你的状，看样子是要夺空军的权，想利用余立金把你搞掉。这种行为是错误的。”^{【1874】}

虽然至今未有材料能证实林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排挤韩先楚，排挤黄永胜以及与他地位不相上下的”这些指控，但杨成武的山头主义还是有迹可寻的。

杨1940年代曾为六十三军的前身——华北冀中部队司令员，以后对该军旧部尤为关照。1966年5月担任代总长、首都工作组副组长期间，北京卫戍区扩编，杨提出调清一色原华北部队六十三军一八九师和六十五军一九三师进京。北京军区提出异议后，方将后者改为调二十四军七十师。北京军区参加首都工作组的两个副司令员郑维山、傅崇碧，曾先后任六十三军军长。扩编后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由傅崇碧兼任；第三政委由曾任六十三军政委的黄作珍担任；政治部主任由六十三军政治部主任周树青调任。杨掌管并兼任代主任的军委办公厅，第一副主任由曾任六十三军政治部主任的路杨担任，杨卸任代主任后，遗缺即由路杨补上。

如此说来，说杨成武有山头主义，也不是一点缘由也没有。

【1873】《邱会作回忆录》下，页552-554。

【1874】《吴法宪回忆录》下，页717-721。

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8月30日，中共总参委员会在开展“三查三整”运动的情况报告中称，杨成武问题大体是两段。“一段是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以前，杨成武同志紧跟林彪，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为林彪歌功颂德，搞什么‘大树特树’，为自己树碑立传，特别是六八年初总参‘四代会’，吹捧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杨成武同志参与了对贺龙、罗荣桓、徐向前等老师，和罗瑞卿、徐海东、张爱萍、彭绍辉、王尚荣、萧向荣等老同志的迫害活动；他诬蔑罗瑞卿同志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头子’，说自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以我为核心，划线站队，煽动派性，分裂群众，造成恶劣的影响。三部一些同志说，在那一段，杨成武同志‘红’得发紫，‘左’得出奇，很多问题，不仅影响总参，而是影响全军。”^{【1875】}

三、对杨成武“两面派”的指控

关于杨成武的第二个错误——两面派，林彪称：

再一个就是杨成武是政治品质很坏，是一个两面三刀的人，是一个正如毛主席说过的：“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就是这种人。

……

他（杨成武）大家知道的，以为他是反罗瑞卿的，实际上他是一个罗瑞卿分子，是紧跟罗瑞卿的。他当面好像是反对罗瑞卿，但实际上不是反对罗瑞卿的。他参加了反对彭真的斗争，但是实际上是拥护彭真的。所以这种行为都是一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阳一套、阴一套。

做了事情不承认，例如傅崇碧前一个时期带了几辆汽车，全副武装，冲进中央文革的地点去抓人，这件事情本来是杨成武的命令，三次给傅崇碧的指示，但是杨成武不承认。傅崇碧做这个事情是不对的，但是杨成武在这一方面表现了他这种不承认做错的事，做坏了的事情，他为了一个问题跟了几个同志去找聂元梓，他讲错了话，讲了坏话，可是他事后又赖帐，他说他没有讲。

在总参，一方面说不要宣传他，但另一方面又在底下布置宣传他。这都是一种两面作法。

【1875】《中共总参谋部委员会关于坚决贯彻中央和军委首长指示精神深入开展‘三查三整’运动的情况的报告（讨论稿）》，1978年8月30日。

他也反对贺龙在空军罢官夺权，可是他自己又在空军罢官夺权。空军里面恰恰没有一个角色是晋察冀的，因此他就拉了余立金来夺权，把余立金的关系搞得很火热，利用男女关系同余立金结合。

空军里面有一个秘书搞男女关系^{【1876】}，那么他的老婆就出来告，这个秘书自己就要离婚。这种情况空军采取了措施，防止出问题，把这个秘书隔离起来。本来是一个好心好意，为了保护杨成武的名誉，保护他的女儿的名誉。可是，杨成武是不但不感谢这个好意，反而乘机打击吴法宪，而且要把空军党办里面几个揭出了这个问题的，接受了这个秘书的控告的几个人，控告她的丈夫的人的情况向吴法宪讲，他就要把这几个汇报情况的人，打成反革命，坚决的要吴法宪认错，坚决地要把这几个人打成反革命，这种作法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完全是欺负人的，目的就是要把吴法宪打倒。

本来中央规定的不能够在党内搞侦听的，这是对阶级敌人的办法。可是他在空军里面搞侦察。对吴法宪的一举一动，车子几点钟出去，到了什么地方，几点钟回来，他都侦察，并且甚至于侦察中央文革同志的行动，总理的行动。

在斗争罗瑞卿的时候，他不同意写组织结论，不许提和杨献珍、杨尚昆的关系，所以你看他表面上以为他是反罗的，实际上他是袒护罗。他本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中间，讲了罗瑞卿的问题，可是看了邓小平和彭真的发言，是袒护罗瑞卿的，以后他就要求撤回他的讲话。

他同王、关、戚是勾结在一起的，很多王、关、戚的坏事情是有他的份的，他才是王、关、戚真正的一个后台。所以他是很标准的，政治品质很坏，阳一套阴一套的人。表面上他对毛主席司令部、对毛主席是拥护的，但是实际上，他是对主席不忠诚的，对中央文革不忠诚的，并且用这种特务手段来侦察毛主席的行动，侦察江青同志的行动。

去年夏天，主席要他去北戴河同我谈谈王、关、戚，那时是王、关的问题，当时我身体有点不好，在北戴河住着，可是他不肯去，是经过主席再三催促才去的。所以你不要看他表面上拥护毛主席，实际上不是那么一回事情。

……表面上他是拥护江青同志的，但是实际上，他是对江青同志不满的。江青同志有病的时候，他同戚本禹这些人就搞江青同志，过去的在（江青：那还早呢，在去年春天就搞了）啊！早在去年春天就搞江青同志的黑材

【1876】指杨成武在空军工作的女儿杨毅与余立金的已婚秘书单世充之间的不当恋情。

料，实际上成立了专案，来迫害江青同志。（总理等：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誓死保卫江青同志！向江青同志致敬！向江青同志学习！）

很显然的，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的女同志中间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的干部中间很杰出的干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热烈的革命情感，同时又很有思想，对事物很敏感，很能看出问题，能发现问题，能采取措施。过去由于她多年身体不怎么好，所以大家不了解她。

在这个文化革命期间，就看出她伟大的作用。她一方面，是忠实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在另一方面，她有很大的创造性，能够看出问题，发现问题。文化革命中间，树立了许多丰功伟绩，固然是主席的领导，全体中央文革同志的努力，党中央同志的努力，但是，她是有她独特的作用，始终在这个运动中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叶群：江青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整江青同志的黑材料罪责难逃！誓死保卫江青同志！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1877】}

值得十分注意的，是林彪上述讲话最后部分对江青的吹捧。类似林彪这些吹捧性语言，周恩来在当晚的讲话中，说得并不比林彪少。周恩来称：

在这里，我提几句江青同志在中央文革所起的作用。江青同志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无产阶级战士。她不是从今年，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三十年代她就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就是一个跟叛徒，跟假共产党员、特务和社会反动派斗争的受迫害作斗争的勇敢的坚强的女战士。如果说，现在或者是两面派，或者是特务、坏分子，他们所收集的江青同志那个时候的材料，两种，一种是江青同志自己为战斗而写的东西，那不是黑材料，那是红材料，革命的材料。至于社会上，那时是反动派统治着，那时写的东西，诬蔑、造谣、迫害，那都是反革命的东西嘛！把那些东西如果拿出来，作为黑材料，那你只要在那个地方登一登，江青同志自己说得很清楚，那就是台湾的话，香港的话，那就是被打倒的那些人的话。三十年以前，江青同志成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的战友和学生，得到毛泽东思想长时期的修养和学习锻炼，经过战争年月。解放以后，正是江青同志身体很差的时候，就受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及其代表人物，刘、邓、陶、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谭震林等等，以至受到萧华的迫害。尽管如此，江青同志坚强不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教育的时候，进行了文艺的改革。大家都知道，一九六四年演出

【1877】《林副主席、中央首长重要讲话》，页6-9。

的样板戏八个，都是经过江青同志亲自指导、修改出来的。到了一九六六年，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反革命、叛徒、内奸彭真，写了“二月提纲”，可是江青同志受到了林副主席的委托，写出了革命的“二月座谈纪要”，这是人民解放军大家都人手一册读过的了。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这些值得提一提的，她的成绩的一两点已经是足以证明江青同志的伟大成绩。那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刚才提到了她还有很多著作、还有很多的演说，现在已印成小册子，大家读了的。这就看出来，江青同志是我们党的杰出的女战士、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值得我们向她学习，向她致敬！^{【1878】}

在揭露“杨余傅”问题的大会上，为什么会突出地宣扬、吹捧江青？又提出“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誓死保卫江青同志！”？原因是当时认为杨成武整了江青的“黑材料”。

据当事人、时任总参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的陈虹后来回忆称：1967年4月间（亦就是江青所说的1967年春天），江青、叶群、戚本禹、杨成武布置，派陈虹等四人去上海收集饶漱石、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的档案材料。江青称，这个案子过去有人包庇，没有搞透。江青还交代杨成武对此事负责抓一抓。陈虹等在上海查找档案过程中，上海市公安局管理材料的人反映：有一箱材料是市局领导交其保管的，说是“通天”的，放在这里不安全，请陈等带回北京。陈两次报告杨成武，杨最后说：“关于那一箱‘通天’材料，下午已报告了周总理、江青同志，他们说，管他什么通天不通天的，把材料先拿回来再说。江青还特别交代，一个字也不能丢！”材料拿回北京后，杨说，那一箱“通天”材料，江青叫你们看一下，别人不得插手，不许扩散，看后向中央报告。陈等将箱子打开看，原来是一个1954年写给江青的匿名信，经公安部立案，由上海市公安局侦察破案的材料，共计二十三个卷宗。陈等看了材料后报告建议仍由公安部专人负责处理。报告送上去后江青大为不满，向林彪告状称保存这些材料就是整她。林彪令重写报告，将材料销毁，让杨成武落实。杨把陈虹等找来说：“报告送上去了，江青看了。她说案子已经破了，作案人林伯渠的妻子朱明白杀身亡，材料也没有必要保存了。你们重新写一份建议中央指定专人集体销毁材料的报告。”林彪看了报告后批示：“由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关锋四人负责集体销毁。”并将批件转给了周恩来。周阅后加批：“连同北京图书馆保存的材料和吴（法宪）、傅（崇碧）送来的一包材料一并销毁。”转呈毛泽东。毛看后说：烧它干什么，这是历史。批示传下来后，正

【1878】《林副主席、中央首长重要讲话》，页18-19。

值谢富治去昆明调查，不在京，7月13日起，杨成武和汪东兴随毛视察大江南北，8月关锋又被抓了起来，销毁材料的事被搁下来了。9月23日，杨成武随毛回到北京。谢富治告诉杨，江青几次大发脾气，说是杨整了她的黑材料，要放长线钓大鱼。杨据实向周恩来报告，周明示：由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三人监销，9月27日上午，材料在中南海里烧毁。^{【1879】}

材料虽已烧毁，惟江青仍对杨成武耿耿于怀。“杨余傅事件”后，仍多次称杨立了她的专案，与戚本禹勾结搞黑材料。

三、对杨成武“曲解马克思主义”的指控

关于杨成武引起毛泽东反感的《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彻底清算罗瑞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一文，林彪称：

杨成武他在表面上看来是没有野心的人，但是，实际上，他是有野心的。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不久，杨成武就想把那个代总长的“代”字去掉，他很不舒服这个“代”字，而主席和中央早就看出他并不是一个恰当的人选，当时主席说做做看，行不行呢？当时实在是没有把握。现在看来，是主席看对了，是不行的。可是他自己缺乏自知之明，还觉得自己很行，还觉得那个“代”字不舒服，还想去掉那个“代”字。在总参宣传说要树立他的绝对的领导，有的人不同意他这种提法，就被他隔离反省，拿哨兵盯梢，盯着一个女同志。表面上看来他是不要名的，可是他争名争得厉害，不该他出名的事情，他也要去争一分，就是最近不久，在上海搞了一批材料，不归他署名的，他没出过力的，还要把他名字写上。还有那个什么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文章，他拼命活动要登，后来登在《人民日报》第二版上，他还不满意，那个第一版上当天登的是毛主席的教育指示，他认为他的文章还应当登在毛主席的前面，要占第一版。

他那个文章发表以后，他还要下命令，发命令给全国的军队都要学习，后来这个命令叫吴法宪同志扣了。虽然扣了，他还用电话通知全军都要学习他那个东西。他的事实是可以说是很多，山头主义的表现，两面派的表现以及其他许多坏的表现。就是这两天在会议中间，我零零碎碎的听到一些，不全，也不准确。事实上，还有很多事实没有揭出来。讲这一部分事实，大家也可以看到他的思想，他的政治品质。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

【1879】陈虹：《我参加饶漱石专案组的遭遇》。《炎黄春秋》2015年第10期，页71-75。

第三点，就是讲他那篇文章的问题。毛主席今天同我讲了，他说要我讲一点马克思主义，除了讲山头主义以外，可以讲这个题目，还讲一个两面派以外，还要讲点马克思主义。这是指什么问题？就是指这个关于这篇文章里面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绝对权威这个东西，毛主席是不赞成这样提的。这个东西本来是一个普通的战士提的，那么，《人民日报》就宣传开了，那么，大家宣传开了。这个宣传作为对毛主席的一种唯一信任的态度，像那一个战士的想法是有可说的，但是，如果作为一个科学的语言，作为一种哲学上的语言，是不正确的。而杨成武认为从哲学的角度上来说，也是正确的，这就不对了。这就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提法了。毛主席在去年十二月十七日的批示是这样说的：“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只能存在于相对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这就是毛主席对这个问题的说法。【1880】

陈伯达在当晚的讲话中，说明了杨成武文章的发表经过：

杨成武这样的人，充满了资产阶级世界观，大概跟他接触过的人可能会感觉到的。现在可以考虑想一想，这个人有他的特点。自我吹嘘，以我为核心，刚才林彪同志讲过的，自我吹嘘，以我为核心，唯我主义。他搞了一篇文章，“大树特树”那篇文章，这篇文章实际上是要大树特树杨成武的绝对权威。这是真的呀！他在总参，在军事机关里面，就是说要大树特树杨成武的绝对领导，他改了一个字。毛主席教导我们，在阶级斗争中，革命的阶级或是反革命的阶级要夺取政权，都要先做舆论准备，做夺权的舆论准备。杨成武利用这一篇东西名义上是要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实际上就是要做他的大树特树杨成武的绝对权威的准备，大树特树杨成武的绝对领导。这篇文章的发表，我也是有错误的，我在这个会上作自我批评。杨成武当时把这篇文章交给我和姚文元同志的时候，搁在我床头一个多月，那个时候我们的确两个人商量过的，谈过的，就不大愿意发表他这篇东西；可是他不断催，不断打电话，可是他是代总长呀！这使我们相当的愁眉苦脸，这个东西怎样处理呢？他看我们没有动，就找戚本禹去了，直接、间接地对我们施加压力。虽然是这样我们还是可以把关的，不发表它。结果，还是没有把好，没有把好关，让它发表了；最后商量这篇文章不要让它突出，登在第二版。这时候他又串通戚本禹，

【1880】《林副主席、中央首长重要讲话》，页9-11。

说他的文章是代表全世界人民的声音，（江青：文章也不是他写的，他是写不出来。）对，他写不出来。戚本禹又向姚文元同志和我施加压力，说是为什么不登这些消息呀！说他是代表全世界人民的声音为什么不登哪？我们说他杨成武怎么代表全世界人民的声音呀？这不是比毛主席还更高吗？所以，这一点，我们顶住了，没有给他机会。（姚文元：同志们，那一天各报的第一版登的都是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最新指示，杨成武居然要求，公开地来施加压力，要把他这个文章登在第一版，这不是要驾凌于毛主席之上吗？）（众呼：打倒杨成武！誓死保卫毛主席！）（江青：我昨天才听说，戚本禹为这个事，跑到他家里去，代表中央文革向他道歉，他全家送给他勋章。我们过去不知道。）这个事情很可笑，很可笑。（江青：小丑！）这是卑鄙的资产阶级政客，真正是一个变色的小爬虫。^{【1881】}

所谓“杨余傅事件”，一口气打倒了三人，其实焦点在杨。杨护女心切，在与吴法宪等人的关系处理问题上惹恼了林彪；马屁没有拍对，在黑材料问题上惹恼了江青（此为重中之重）；名为树人实为树己，在“大树特树”问题上惹恼了毛泽东。有此“三得罪”，加上所谓“华北山头”的问题，杨难逃此劫！

3月25日凌晨，杨成武被押往西郊机场，用专机武装押往武汉山坡机场，关押在武空的地下室。3月30日，杨成武妻子赵志珍及家人被押至洛阳香山寺秘密关押。5月27日，杨成武由武汉转押洛阳香山寺。1971年2月3日，杨成武夫妇及其妹杨玉娣转押至河南开封。1972年1月29日，杨成武大女儿杨毅在单独关押期间身亡。2月，杨成武夫妇及其妹被转移至山西侯马。1974年1月，解除监禁。5月22日，杨成武夫妇及其妹回到北京。7月31日，杨成武与吕正操、王尚荣、余立金、傅崇碧在三座门军委办公处受到周恩来、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的接见。周代表中央传达了毛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上的讲话，特别强调毛所称：杨、余、傅都要翻案。所谓“杨余傅事件”是林彪搞的，我听了一面之词，所以犯了错误。11月28日，军委发出电报称：经毛批准，杨成武、王尚荣、胡炜、何正文任副总参谋长。^{【1882】}

3月23日凌晨，余立金在空军大院内被捕，直接押往秦城监狱。其妻陆力行亦于当日被捕，几经辗转也关进了秦城监狱。余立金夫妇于1974年7月30日出

【1881】《林副主席、中央首长重要讲话》，页29-30。

【1882】《杨成武年谱》，页483-493。



毛泽东与陈伯达中间的是傅崇碧，1966年9月15日。

狱。12月21日，余立金被任命为民航总局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1975年8月30日，任空军第二政委兼民航总局政委。^{【1883】}

3月23日凌晨，傅崇碧被专机押送至沈阳。在沈阳关押期间被换过几个地方，后被送至辽源监管。1974年9月回京。1975年4月恢复北京军区副司令员职务。^{【1884】}

【1883】空军政治部：《空军高级将领传》，北京：蓝天出版社，2002年，页257-260。

【1884】傅崇碧：《傅崇碧回忆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页296，309-317。傅回京时间据其回忆录，据《杨成武年谱》应为1974年7月。

四、聂荣臻受牵连遭炮轰

周恩来在“三二四”大会讲话时高调声称，“那末，今年这一次揭发杨成武等人的事情，可以说是一个新的‘二月逆流’。而这个新的‘二月逆流’还是继续去年‘二月逆流’，公开出来的，揭发出来的，我们林副主席提出来了，我们中央文革坚决揭发这件事情。证明这一次事情，还要继续揭发，我们甚至要研究，要在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同志们要继续揭发，有可能在杨成武后头，还有黑后台！”康生在讲话中附和周恩来称：“我相信杨成武背后还有后台的，还有黑后台的，我相信我们的解放军，我们的人民是会将他们揭露出来，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的最后的胜利的。”^{【1885】}

因为林彪在“三二四”大会讲话中提及杨成武“他仅仅是晋察冀里面的一部分”，令人联想到周恩来所指的“黑后台”是否就是晋察冀军区的领导人聂荣臻。

4月7日，聂写信给毛泽东，希望就杨成武“黑后台”问题同毛泽东面谈一次。4月10日，周恩来电话转告毛泽东在这封信上的批示：“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4月20日，周恩来接见国防科委、国防工办等单位的各派群众组织代表时指出：国防科委提出“坚决拥护以聂荣臻同志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的正确领导”，并作为选举出席“国防科委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的条件是错误的。但聂荣臻事前不知道，他知道后很不安，写了检讨。要允许别人犯错误，不要把别人一棍子打死。聂荣臻同志我很熟，我们是老战友，毛主席要我帮助他。^{【1886】}

6月24日，毛泽东的女儿、国防科委八局（院校局）参谋李敏等九人贴出题为“炮打聂荣臻——彻底揭开科委机关阶级斗争盖子”的大字报，称“身为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国防科委主任的聂荣臻竟敢明目张胆地捏造最高指示，蒙骗群众，包庇大叛徒唐延杰；滥用林副主席指示，压制群众揭发安范死党，从政治上陷害毛主席，陷害林副主席，不择手段地包庇和重用一小撮叛徒、特务和走资派，大刮右倾翻案妖风；……”自此在国防科委系统掀起炮轰聂荣臻的高潮。^{【1887】}

7月17日凌晨，周恩来令军委办事组通知国防科委：查封国防科委军管办公室和“五一六”专案组的全部材料。7月8日，李敏等十一人贴出题为“聂荣臻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罪责难逃”的大字报。7月15日，李敏等十一人又贴出“关于贯

【1885】《林副主席、中央首长重要讲话》，页17-18，38。

【1886】《聂荣臻年谱》下，页1096-1097。

【1887】七机部916革命造反兵团宣传勤务组：《造反有理》第84期，1968年7月16日。

彻执行周总理‘七七’重要指示的严正声明”，提出“坚决粉碎聂荣臻等科委某些领导人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的妖风。炮打聂荣臻，保卫毛主席！炮打聂荣臻，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炮打聂荣臻，彻底揭开国防科委机关阶级斗争盖子！”^{【1888】}

8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彻底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多中心论’”的社论。其后，国防科委系统掀起了批判聂荣臻“多中心论”的高潮。

10月13日-31日，聂荣臻参加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小组会上作检讨并接受揭发批判。在全会上被定为“二月逆流反党集团”成员，全会后处于闭门思过的状态。

第七十八节 新的军委办事组成立

一、“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常委可以不开会了”

杨成武的倒台，标志着军委最高领导层自1966年初的毛—林—（周）—叶、萧、杨“三驾马车”时期及短暂的毛—林（周）—杨成武时期正式结束，进入毛—林（周）—黄永胜为首的新的军委办事组时期。

3月25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向林彪报告称：“中央文革碰头会议讨论过新的军委办事组名单，拟了五个同志，现先送上，请考虑是否妥当，并在您考虑后，向主席报告请示。名单：黄永胜组长，吴法宪副组长，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当天，林彪批示：“呈主席批示。”毛泽东批示“照办”。^{【1889】}与旧的办事组名单相比对，除组长由黄永胜替代了杨成武外，成员中李作鹏替代了张秀川，原成员李天焕、刘锦平除名。值得注意的是，新的军委办事组名单是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讨论通过的，获陈伯达、康生、江青同意。

三天以后，3月28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接见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毛问办事组现有哪几个人，黄永胜等回答后，毛称：还可以增加刘贤权。政工小组可以考虑取消。今后军委办事组由林副主席直接捏到手里。毛又称：“军委办事组要订个制度，至少一周到林彪同志那里汇报一次工作，一次谈一两个钟点。有事无事都要去，除非林彪同志身体不好。过去我们两个处在第二线，让他们去

【1888】北京工业学院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首都红代会北京工业学院东方红公社《北工东方红》编辑部：《北工东方红》第105期，1968年7月，第106期，1968年8月。

【1889】《关于“军委办事组”的一些资料》。黄永胜时任总参谋长，仍兼广州军区司令员。吴法宪时任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叶群时任林彪办公室主任，国防部办公厅党委常委。李作鹏时任海军第一政委，1968年9月又任副总参谋长。邱会作时任总后勤部部长，1968年9月又任副总参谋长。

搞，他们也不汇报，搞封锁，实行隔离，隔离不反省。”林彪称：“不了解情况。”周恩来称：“军委常委不要开会了吧？”毛称：“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常委可以不开会了。”林彪称：“把它悬空起来。”毛称：叶剑英说过，杨成武是接班人。现在换了黄永胜，你这个黄永胜为什么不可以接班？^{【1890】}

毛泽东的话里，隐含有以黄代替林主军的意图。惟事实上军委办事组并不能与军委常委会划等号，充其量仅起到原军委办公会议的作用。事后证明，黄永胜本人亦没有丝毫要“接班”的言行。

3月30日，吴法宪在军委办事组会上称：“经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批准，改组办事组，由总部、军种主要负责人组成，在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直接领导下主持军队工作。办事组成员由黄、叶、李、邱和吴5个人组成，将来还可以加一个刘贤权同志，黄为组长，吴为副组长。……李天焕、刘锦平不参加办事组。”^{【1891】}

4月1日，黄永胜、吴法宪报告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称：由于军委常委不再开会，军队文电今后除发到团级文电照发各常委外，重要文电不再抄送陈毅、刘伯承、徐、聂、叶等同志，粟裕同志与工作无关文电亦不抄送。毛批示：“此事待议。”4月4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收缴了军委印章。同日，李天佑以书面形式报告黄永胜：文件已立即停送徐向前、叶剑英、刘伯承、聂荣臻。^{【1892】}

6月11日晚，黄永胜、吴法宪接见军委办事组全体工作人员。黄永胜称，军委办事组分两个阶段，以前是杨成武任组长，揭杨后办事组进行了改组，增加了3个同志，李作鹏、刘贤权和我，加上原来的吴、叶、邱，共6人。吴法宪称：“中央决定，军委停止工作，军委常委工作实际上已集中到办事组来了，起到过去军委办公会议的作用。在主席、林副主席领导下，直接对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负责。黄总长来了以后，权力集中了，实际上代替过去军委办公会议的职权。”^{【1893】}

【1890】《关于“军委办事组”的一些资料》。

【1891】《关于“军委办事组”的一些资料》。

【1892】《关于“军委办事组”的一些资料》。

【1893】《关于“军委办事组”的一些资料》。

二、重新明确规定部队调动使用权限^{【1894】}

新的军委办事组成立后，吸取杨成武的教训，对部队调动使用权限重新作了明确规定。

4月26日，军委办事组下发《关于部队调动使用权限的规定》。规定要求，执行各种任务的陆、海、空军部队，营（相当于营）以上部队的行动和部署变更，一律呈请毛泽东主席、林彪副主席审批后才能行动；凡执行作战任务的部队，无论部队大小均报请毛泽东、林彪批准后方可行动；执行生产、施工、野营训练任务的部队和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部队换防，连以上、不足1个营，由军委办事组批准，连（含）以下分队的行动，由各军区、军兵种批准。

6月12日，军委办事组对上述规定作了补充：营的建制部队，支农劳动离开驻地30公里以内，劳动时间3天；不足1个营的部队离开驻地50公里以内，劳动时间5天，均由军区、军兵种批准，报中央军委备案。超过上述距离和时间，营以上部队支农劳动，应预先作出计划，报中央军委批准。部队在紧急情况下执行抢险救灾任务时，可一面行动，一面上报中央军委备案。上述补充规定，以电话传达各军区、各军兵种执行。

1969年1月10日，军委办事组重申北京卫戍区部队调动使用权限的8条规定。其中有关部队调动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卫戍区部队和民兵武装的任务、部署、兵力调遣、临时警卫勤务等，都必须报告总参谋部，经呈毛泽东主席、林彪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作出决定后，由卫戍区具体组织实施。卫戍部队的部署调整、兵力调遣、执行会场路线警卫和押解勤务等，不足1个排的兵力，由卫戍区决定，报总参备案；1个排的兵力，报请总参批准；2个排以上至2个连以内的兵力，由总参报请军委办事组批准；2个连以上的兵力，一律报请毛泽东、林彪、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批准。执行训练、施工、生产、助民劳动和野营任务的部队，早出晚归，不足1个连者，由卫戍区党委决定，报总参备案；1个连至1个营的部队，由总参批准；1个营以上的部队，由总参视情报请军委办事组或中央军委批准。

1969年1月11日，军委办事组对部队调动使用权限规定又作了补充。即凡属部队调动，必须由各级党委集体讨论，主要军政首长签署文电才有效。对国民党军小股入窜，应将依据情况作出打击的预案和使用部队的计划报总参谋部。当发生紧急情况时，为不失战机，军区可一面行动，一面报告；如情况来得及，应

【1894】本小节资料来源：《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作大事记（1949.10—1987.12）》上册，页335—337。

事先报总参批准后行动。遇有抢险救灾时，应先电话报告后行动，尔后再正式补报。

三、新的军委办事组办的几件事

6月22日，军委办事组发出关于在全军深入传达坚决贯彻毛泽东和林彪对于加强军队组织纪律性的指示的通知。通知称：

伟大统帅毛主席和林副主席5月20日对于加强军队组织纪律性的重要指示^{【1895】}，已经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批准向全军指战员进行传达教育，这对于加强我军集中统一的领导，促进我军的思想革命化、组织革命化，具有伟大的深远意义，对更好地完成“三支”“两军”光荣任务，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在伟大统帅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的直接领导下，全军指战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大大提高，特别是经过“三支”“两军”的锻炼，无产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有很大提高，捍卫毛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大量出现。这是我军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好形势，是全军工作的主流。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有些单位的领导干部和少数指战员中暴露出无组织、无纪律，极端民主化的现象，有的还比较严重。他们有的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片面理解，各取所需，各行其是，甚至借口“错误的领导不要听”加以顶回，有少数分队不执行调动命令；有的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和资产阶级派性，在军内、军外支一派、压一派，发枪，挑动武斗，破坏团结，制造混乱，搞分裂活动；有的擅自开枪，违背“五不”政策；有的少数指战员擅离岗位，外出串连，长期不归。有的竟发生将党和军队机密泄露给自己支持一派的严重违犯纪律的行为。有些领导干部怕字当头，对错误的不敢批评，对正确的不敢支持，不敢大胆管理。这些

【1895】5月20日毛泽东称：现在有一种说法：要抵制错误的领导。这在群众中是可以的，但在军队中不能这样。如果各人按各人的意见办，军队怎能打仗？军队各人都按各人的意见办怎么行，这样军队就不象个样子了。……还是你（林彪）说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林彪称：这两句话是很普通的两句话。还是主席说得好：“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要说对的就执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对，行动起来各行其是，不就乱了套了吗？

现象严重地影响“三支”“两军”工作和军队建设，阻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前进。

我们认为对过去犯有这种错误的少数指战员，只要认真接受教训，改正错误，不予追究，今后不得发生这种现象。^{【1896】}

9月6日，军委办事组发出《关于轮换“三支”“两军”干部的通知》称：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已经批准军委办事组“关于轮换‘三支’‘两军’干部的报告”，现印发你们，望遵照执行。该报告称：

为使军队有更多的干部得到锻炼，拟将参加“三支”“两军”的干部有计划地进行轮换。现将情况和轮换的办法报告如下：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伟大统帅毛主席发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和“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后，我军担负了“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据最近不完全统计，全军担任“三支”“两军”任务的干部×××××人，约占全军干部三分之一（×××万支左部队的干部未计算在内）。各军区和海空军派出的干部，比例最大的单位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最小的也在百分之二十左右。北京军区派出干部×万余人，占全区干部百分之五十一。总部、海军、空军直属机关派出干部占机关干部百分之三十五左右。

参加“三支”“两军”的干部，分布在全国各条战线上，范围之广，规模之大，人员之多，时间之长，是我军建军史上前所未有的，……

为了使我军广大干部都能到“三支”“两军”去锻炼，实行有计划的轮换是十分必要，非常正确的。

（一）各级党委应根据本单位的情况，全面规划，分期分批，逐步轮换。每次轮换的数量，必须服从“三支”“两军”任务的需要，与当地革命委员会、军管会共同协商，统一安排。在轮换时，应先到后走，切实做好交接工作。在一个单位内由几个部队共同负责支左的，应以一个单位为主组织轮换工作。

（二）参加“三支”“两军”的人员，已经“三结合”的主要领导干部和机要保密、公安部门中的支左负责人，一般的不轮换。如需要轮换，必须保证干部的政治质量。在“三支”“两军”工作中犯有错误的干部，应继续在支左中锻炼，给予改正错误的机会。在原单位不宜继续工作的，可以调换地区和单位。对个别政治不纯的人员坚决调回。

【1896】《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教学研究资料（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页454-455。

(三) 认真做好轮换人员的政治思想工作。对前往轮换的干部，应组织深入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三支”“两军”工作的先进经验，打好思想基础。^{【1897】}

9月16日，根据毛泽东关于部队不要在一个地方驻久了，驻一个时期可调调防的指示精神，军委办事组上报从1968年秋冬至1970年上半年陆军军分批调整部署的报告。经中共中央批准，第一批五个军的调防，于10月25日开始到12月30日完成。即陆军第十三军由云南调至四川地区，陆军第五十四军由四川调至云南地区，陆军第十四军由滇西调至滇南、贵州地区，陆军第四十一军由粤东、赣南调至粤西、广西地区，陆军第五十五军由粤西、广西调至粤东、赣南地区。^{【1898】}

四、军委办事组权威的逐步建立

经过大半年时间，军委办事组在军事系统逐步建立了自己的权威。

11月2日-5日，经毛、林、中央文革批准，军委办事组召集军委总直属队、各军区、各军种、兵种负责人开了座谈会。11月26日，毛、林、中央文革批准，将《军委办事组召集的座谈会纪要》印发军以上单位。该纪要摘要如下：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批准，军委办事组于11月2日至5日召集军委总直属队、各军区、各军种、兵种负责同志开了座谈会，讨论了贯彻落实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各项决议和军队建设方面的一些问题，并征求了对军委办事组的意见，交流了经验。除军队出席“九大”代表的产生办法、设防问题和军队院校问题另有专题报告外，现将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关、征兵退伍等问题的讨论情况纪要如下。

(一) 清理阶级队伍问题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军队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绝大多数单位已经开始。大家认为，当前要抓好以下几点：

1. 清理阶级队伍的重点是军以上机关，是干部。军队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但在各个革命时期，也混进了少数坏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清理阶级队伍以来，据不完全统计，全军已揪出各类坏人

【1897】总政治部干部部：《干部工作文件汇编（1966-1976）》第三辑，1981年，页27-28。

【1898】《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作大事记（1949.10-1987.12）》上册，页336。部分内容根据实情作了更正。

1489名，在正师职以上干部中，发现有各种问题的人，就占7.8%。因此，在领导机关，在干部中，充分发动群众认真清理阶级队伍是十分必要的。

师以下部队进行正面教育，要保持部队的稳定，防止发生问题。有问题的战士调离连队，由师办学习班进行审查处理；有问题的干部调到军以上机关办学习班审查处理。

2. 贯彻执行稳、准、狠的方针，集中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清理阶级队伍要稳、准、狠。不要为了求稳就不搞，也不要为了狠就搞得很“左”。要特别注意准字，不准就狠不起来，也就不会稳。稳、准、狠，准字是关键。要准就要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

3. 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严格执行党的政策，要正确区分：一般性问题与政治性问题；一般历史问题与叛徒、特务问题；家庭出身问题与混进来的地富反坏右问题；过去交代过的问题与长期隐瞒的问题；好人犯错误与坏人办坏事；认罪好与顽抗的；坏头头与受蒙蔽的群众。

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不搞逼供信，不准抄家、戴高帽子、搞喷气式。对清理出来有各种问题的人，要按照党的政策慎重处理，分清是非，区别对待。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走资派，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要给出路。对叛徒、特务、走资派和其他坏人的子女，不要歧视，要做好思想工作，教育他们划清界线，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4. 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对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的领导。认真做好思想动员和组织准备、材料准备工作；充分发动群众，反复交代政策，号召群众检举揭发，本人坦白交代；抓紧重点对象的专案调查，做好核定案和组织处理工作。

(二) 关于整党建党问题

(略)

(三) 关于精简机关问题

军队各级机关特别是大军区以上机关很庞大，不适合战争需要，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关于精简机关的指示，做好机关精简工作。

1. 精简的重点是大军区以上机关。大军区以上及省军区系统的机关，都应根据减部门、减层次、减人员的精神提出精简方案，上报军委审批。

军以下作战部队的机关(包括陆军、空军的军和海军基地)，一律暂时不动。

关于军队院校的取消、合并和精简问题，另行研究。

2. 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做好被精简干部的工作安排。全军需要精简的干部，据初步估算，约有××万人。其中：超编的干部约××万人，机关、院校要精简的约×万人，团以下单位不适合部队工作的约×万人。对这些干部，要认真做好思想工作，妥善地加以安排。(1) 连以下干部原则上复员回乡；(2) 营以上干部安置到部队农场、工厂，进“五七”干校；(3) 加强、充实现有的生产建设兵团和组建新的生产兵团；(4) 根据地方需要，继续选调一批优秀干部参加地方的“三结合”和地方工作；(5) 政治条件好、年轻、有发展前途的机关干部，下放基层单位培养锻炼；(6) 对失去工作能力的老、弱、残干部，要妥善安置，但要改变过去的那种办法。

3. 精简处理的干部，暂不办转业手续，生活待遇也暂不变动，待安排就绪后，再提出办法，报请中央、中央文革决定。

(四) 会议还讨论了征兵、退伍问题

大家认为，部队中1964年以前入伍的老战士很多，为保持老战士的正常比例，需在今冬明春进行征兵、退伍工作。关于征兵、退伍工作的具体问题，另有专题报告。^{【1899】}

11月18日，黄永胜报告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称：“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确定增加谢富治、温玉成两同志为办事组成员，我们非常欢迎。还要求增加李天佑一人。……”11月22日，陈伯达、姚文元批：“是否等几天之后，征求一下江青同志的意见。”黄永胜于11月24日批：“完全同意文元同志意见。”^{【1900】}

第七十九节 军内“清理阶级队伍”

一、毛泽东对北京新华印刷厂经验的批示

1968年5月13日，掌管宣传口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将载于新华社《文化革命动向》1220期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

【1899】《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教学研究资料（社会主义时期）》，页456-460。

【1900】《关于“军委办事组”的一些资料》。谢富治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中央军委常委，北京军区政委兼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温玉成时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李天佑时任副总参谋长。谢富治、温玉成当月增补为军委办事组成员，李天佑迟至1969年4月九大以后才成为办事组成员。

一文，呈交毛泽东参阅，并称“此件总结了清理队伍中一些政策性问题”，首次使用了“清理队伍”一词。

5月19日，毛泽东批示称，“文元同志：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先印若干份，分发有关同志，然后在碰头会上宣读一次，加以修改，再加批语发出。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此厂情况，我已从个别同志那里听过两次。你是否可以去那里看一看，问一问？”

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是由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负责派出的，负责人是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荣温。毛身边的机要员谢静宜^[1901]，当时也被派至该厂参加军管。毛所谓“我已从个别同志那里听过两次”，不排除就是听谢静宜说的。

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的“经验”开头即称：

这个厂在北洋军阀时代，是一个印制钞票的工厂，后来又变成日本人手下的印刷厂。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成为国民党伪中宣部的正中书局，当时所有成员都加入了国民党。现在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就是由伪正中书局和由国民党投资的上海华厦书局、东北的几个小印刷厂以及我们的冀中平原日报印刷厂合并而成的，现在已变成有千多职工的大厂。解放后虽然吸收了大批工农青年入厂，但是由于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尤其是彭真反革命集团的直接把持和控制，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仍然受到重用，其中许多人还篡夺了我们的各级领导权，变成了“三开”干部。据统计，在这个厂的二十六个加入过国民党的工段长一级干部中，有二十二个已经混入了共产党。因此，建国十八年来，这个厂的阶级斗争一直是极其复杂、尖锐、激烈的。针对这种情况，军管人员今年二月二十一日进厂后，牢记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教导，狠抓阶级斗争。不论是搞革命大联合还是促进革命三结合，不论是开展革命大批判还是进行本厂的斗批改，他们都狠抓阶级斗争不转向。

此一“经验”的重点指向，就是“混入了共产党”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以中发〔68〕74号中共中央文件转发了毛泽东的批示和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的“经验”。转发通知称：

根据毛主席五月十九日的批示，中央决定将此件转发全国，参照执行。

【1901】谢静宜，1959年起，任毛泽东的机要员。1968年7月随“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以后历任北京大学革委会常委、党委常委，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北京市委常委、市委书记，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76年10月后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1981年1月两案审理期间，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其免于起诉。

毛主席在批示中特别指出：“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

望你们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学习新华印刷厂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并且注意总结本地区的经验。在清理厂矿、机关和文教系统中的教职员工的阶级队伍的工作中，要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学习、掌握毛主席历来关于对敌斗争的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以充分发挥群众专政的巨大威力，有步骤地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

研究者普遍认为，此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很快就席卷全国。然而，毛泽东关于“清理队伍”的想法，并非自此际才产生。

二、毛泽东关于“清理队伍”的指示

早在1967年1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马共总书记陈平等时即称，“过去上海是由解放军接管，不是发动群众起来接管。那里有许多留用人员，有几百万国民党旧人员在大陆，对他们的情况很不清楚。过去出版界、文艺界的人有些很不好，没有经过改造。我们党内也有不纯。1936年我们党内有一批人被国民党抓去，后来在北京报纸上发表了自首书，就被释放出来。这件事是刘少奇决定的。这些叛变的人中有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廖鲁言、赵林。有相当的一批。”^{〔1902〕}

1月30日，毛泽东把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关于国务院农口几个单位的情况报告批转给林彪、周恩来称，“此件值得一阅。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质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都自己跳了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倒，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请你们注意这个问题。谭震林的意见是正确的。此件请周印发较多的同志看，引起警惕。”^{〔1903〕}

2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卡博、巴卢库等时称：

我们党内暴露出许多人，大概可以分这么几部分：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合作，他的目的是民主革命，要搞资本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他是赞成的；打倒官僚资本主义，他也赞成；实际

〔1902〕毛泽东会见马共总书记陈平等谈话记录，1967年1月17日。

〔190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209。

上打倒民族资本主义他就不赞成了。分配土地，他是赞成的，分到农民手里，要组织合作社他就不赞成了。这一部分人，就是一批所谓老干部。

第二部分人就是解放以后才进党的一批人，80%是1949年以后进党的。其中有一部分人当了干部，支部书记、党委书记，甚至更高的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省委书记，还有中央委员，这么一批人。

第三部分就是我们收容下来的国民党的这些人，其中有些过去是共产党被国民党抓去，然后叛变了，在报上登报反共。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反共，不知道他们所谓“履行手续”是一些什么东西。现在一查出来，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

第四部分人就是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的子弟，解放以后他们进了学校，甚至进了大学，掌了一部分权。这些人也不是都坏，有许多是站在我们方面的。但是，有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

大概就是这几部分人。总之，在中国人数并不多，百分之几。他们的阶级基础只有百分之几，比如地主、富农、资本家、国民党等等，顶多有5%。那么，七亿人口里面也不过是3,500万人。他们也分散，分到各个乡村、各个城市、各个街道。如果3,500万人集中到一起，手里有了武器，那就是一股大军了。^[1904]

毛泽东在上述谈话、批示中，将打击矛头向下，对象是“留用人员”、“几百万国民党旧人员”、“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质分子”、“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的子弟”、“地主、富农、资本家、国民党等等”，这些人是社会的底层，完全有别于文革中毛的另一个重点打击对象“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8年4月1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热烈欢呼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社论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最近的一句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这是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性质的一个新提法。“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表明毛认为文化大革命此阶段打击的重点对象又回到了传统上的“阶级敌人”。

【1904】毛泽东会见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46。

5月11日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集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等开会时称：有坏人，由工人、农民、学生自己去清理。什么叫反革命？“十六条”规定，现行反革命就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国家财产。贴了几张反动标语，也不一定要抓嘛！总之，现在现行反革命的范围相当扩大。坏人总是极少数。对工厂、学校就要注意点。百分之九十是左派、中间派。上海交大、复旦、师大二百多反动学生，弄多了，正在检查。任何肃反都要约束在百分之五。整顿队伍，把坏人抓出来，基本上是对的。自从我说了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战争的继续后，抓了一批国民党坏人。抓坏人还是要搞，但是要有条件，要有人掌握。搞到什么时候，就要煞车，搞红了眼，势必搞逼供信！对文艺界，无论哪一界，不要登报点名，只能搞骨干分子。总之，要重证据和旁证。包括反革命，也要给他一条出路。另一条是不要老是检讨没有个完。如果在本厂不行，可换一个厂，也可监督生产。^[1905]

6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时称，“过去我们留下了一些表现比较好的国民党人，这是我们的政策。我们没有教授、教师，没有办报的，没有艺术家，也没有会讲外国话的，只好收罗国民党的一些人或者比较好的一些人。有一些是国民党有计划地隐藏在我们的工厂、政府机关和军队里。军队中也收罗一些国民党的士兵。我们还留下一些人，如医生、技术员、工程师、无线电技术员等。当然不是所有教授、教师、技术人员一个也不好，不是这样，但有一部分很不好。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清理他们，加以清理，好的继续留下来做工作，坏的踢开。”（尼雷尔：……你们吸收了一些替国民党做过事的人，我们一部分就给殖民者做过事。……）这要谨慎，要有辨别。坏人总是少数，好人总是多数。如外交部有3,000多人，搞了那么庞大的机构，但坏的也只有几个。在3,000中清除30个，也只是1%。那地方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司机、烧饭的、勤务员等人员里也很复杂，有旧社会来的。（周恩来：特别是司机。）^[1906]

10月5日晚上，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巴卢库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到清理阶级队伍问题时，毛称：“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所以我们不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大陆上有国民党残渣余孽，有些人钻到我们中央领导机关来了，或钻到地方领导机关来了。这一次算是一个一个作了清理。在过去，一些工厂主要领导权掌

【190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162-163。

【1906】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谈话记录，1968年6月21日。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169。

握在这些坏人手里。你们不是已去参观过了北京针织总厂了吗？（马尔科：他们那个厂的保卫处长是一个富农的儿子，这一次被清理出来了。）只有一个吗？（马尔科：他们还在继续搞，对那些犯了错误的同志正在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比如，他们那个副厂长犯了错误，家庭出身好，就是一直思想不通。）所以思想工作是需要的，包括对一部分犯了错误的同志，要作思想工作。思想工作这是一件头等重要的工作。这需要时间，不能把这些人丢在那里不要。这一部分人，不是刚才讲的国民党残渣余孽，这是属于共产党犯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的范围。（巴卢库：这是人民内部矛盾。）有两种矛盾，第一是敌我矛盾，第二是人民内部矛盾。所以这一次文化大革命比我们过去打仗困难得多。”毛泽东在谈话中再次提及北京新华印刷厂时称，“新华印刷厂有四朝元老，北洋军阀时印钞票，日本人占领时期也印钞票，以后国民党接管了这个工厂还印，解放以后帮我们共产党印，里面主要的人没有动过。这次运动动了他们，不清理清理不得了！有些国民党的中将、少将摇身一变，变成工人了，什么上校、中校、少校、尉官多得很。（众笑）有一个过去是西安市的警备司令，现在变成了我们一个厂的看门的。（巴卢库：他现在也是把关。）我们18年来都不知道，现在知道了。（马尔科：尽管他在大门口，你们也不知道。他在大门口是检查，把关的。）怪事多呢！他（指张春桥）那个上海，国民党也钻进了我们工厂、机关、学校，还有文艺团体。”毛又提及广东的“清队”，“这个事情我们没有想到过。不是讲文化大革命吗，怎么变成武化大革命了呢？这是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它的背后有各种因素，有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因素，也有敌我矛盾的因素，在社会会上有坏人。比如，广东‘红旗’派背后就有国民党。（黄永胜：军队中有两个人，一个是政治部主任，一个政治部副主任，两个人支持两派。他不光是支持的问题，搞了一些错误的东西。）（查尔查尼：他是有意识的这样作的。）这一次党、政、军、民来了一个比较大的清理，自己清理，自己暴露。拿7亿人口来说，坏人大概千分之一，这是指敌我矛盾严重的。广东清除出来的包括国民党士兵、宪兵、警察、国民党军官、国民党部的人、三青团、一贯道，大体清理一下，有40万人，广东省有4,000万人，40万占4,000万的百分之一。这40万过去当过国民党的宪兵、警察、党员，不都是坏人。如果按千分之一计算，4,000万中有4万人。这4万人怎么办？杀掉吗？我们是不主张杀人的。送到台湾去也不好。还得给他工作，给他劳动，在劳动中改造他。他还是劳动力。他有孩子，你把他杀掉，他的孩子会永远记仇。主要把以前我们不知道的、隐藏起来的，清理出来了。现在知道了，好办，我们可以改造他。（查尔查尼：如果他

们伪装起来，没有发现，那就不好了。)对，那是危险。大概还有半年到一年搞清理阶级队伍、整党。这样可以保持一个时候的安宁，10年到20年。”^{【1907】}

11月28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澳共(马列)主席希尔时，再次提及北京新华印刷厂的“清队”经验：“这些工厂我们从来没有清理过，学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农村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坏人统治的，看来搞修正主义并不那么困难。譬如我们一个公社里面，一个大队有的几百户，有的几千户，就说两千户吧，1万人口，组成一个支部，这个支部书记如果不好，大队的工作就不好办。你在北京看了两个工厂吗？(希尔：是的。)那个工厂的党委书记不是坏人吗？(希尔：我不记得他们是怎样讲的，领导人是经过更换的。)(向姚文元)新华印刷厂你去过吗？(姚文元：去过。厂长、党委书记都不好。)这个厂有3,000工人，连家属有1万人，清朝时期印钞票，北洋军阀时期替北洋军阀服务，日本接管时替日本服务，国民党接管时又替国民党服务，我们接管了十几年又替我们服务。其中有许多人是没有动的，主要人员是没有动的，都还是清朝末年，北洋军阀时的一些人。(周恩来：现在我们另外增加了一部分工人，我们扩大了一部分。)我主要指那些负责人员过去基本上没有动。这就是中国搞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这些问题不发动群众，不彻底发动工人就搞不清楚，而且这还不够，要派解放军去帮助，才能解决问题。”^{【1908】}

毛泽东显然认为，“清理阶级队伍”的对象——“国民党残渣余孽”、“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质分子”等是敌我矛盾，其余“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犯了错误的同志”都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这些话，揭示了文革进程中的一次重大的转折。

三、军内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由于毛泽东宣称“党、政、军、……，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质分子”，“清理阶级队伍”不可避免地延伸至军内。

以下引用军方自己编纂的材料，简述军内几个大单位的“清理阶级队伍”的情况。

(一) 海军

海军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编纂的《海军政治工作大事记》中称：

【1907】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8年10月5日。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202-203。

【1908】毛泽东会见澳共(马列)希尔谈话记录，1968年11月28日。

1968年9月30日，海军党委发出《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的指示》和《关于院校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的指示》。指示开列了8种清理对象：（一）资产阶级分子，反动学术权威；（二）没有改造好的留用旧人员和起义人员；（三）地、富、反、坏、右分子和敌特嫌疑分子；（四）有反动海外关系，并确有联系的；（五）亲属被杀、被管制、被判刑，本人至今界限不清，心怀不满的；（六）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表现极坏，又不知悔改的；（七）偷听敌台广播，中毒很深，有现实危险的；（八）有反动言论的。11月16日，海军党委又下发了《关于正面教育单位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的指示》，把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列为清理对象，这样，清理对象就增为10种人。指示提出，清理办法主要是办学习班，干部经军以上党委批准调军以上办的学习班，战士经师党委批准调师级机关办的学习班，查清问题。

10月30日，海军在北京召开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师以上单位、海直各大部负责人，组织、保卫工作干部及参加整党试点工作的干部共122人。会议首先讨论了关于清理阶级队伍问题，后期讨论了整党、建党的问题。海军政治委员李作鹏、第二政治委员王宏坤、副司令员吴瑞林、副政治委员张秀川到会讲了话。会议于11月20日结束。^{【1909】}

从海军的材料来看，“清理阶级队伍”的清理对象似乎都是由各大单位自行划定的，未见中央有统一的划定范围和标准。

（二）沈阳军区

沈阳军区政治部1992年编纂完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政治工作史》称：

1968年4月，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军区开始进行考察干部工作。军以上单位在党委的领导下抽调很多干部专门成立考干办公室。9月，军区又制定了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意见，强调“要增强阶级斗争观念，狠反右倾思想，坚决地、认真地做好清队工作”。11月，军区党委又作出《关于深入开展清队工作的意见》，并召开了军级干部会议，对清队工作作了研究和部署。提出清队要贯彻稳、准、狠的方针，并决定考干、清队工作要分四个步骤：一是思想、组织准备。学习党的有关方针、政策；确定负责人，组成办公班子；普遍审查干部档案，摸底排队，明确重点；二是组织外调，调查取证；三是分级办学习班；四是审查、定案，进行组织处理。

【1909】《海军政治工作大事记》，页283-284。

这次审干、清队，首先是用“左”的观点，重新审阅干部档案。1968年7月，军区有关部门根据上级指示精神提出：“要大破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做到死材料活看，老材料用新观点看，重新审阅干部档案”。军区有关部门根据上级指示精神认为：“‘历史问题看现在，重在政治表现’、‘定性从轻’等党的政策，是修正主义路线。有些干部的历史结论，受修正主义影响，性质定轻了”。把有些干部的历史，本来没有问题，看出有问题；把一般历史问题，看成重大问题；把有的已有结论的问题，看成新问题。仅在正师职以上干部档案中，过去有批注的或本来没问题的，又看出所谓新的重大问题45人，这样，就把大部分干部都划在被审查外调对象之中了，据统计，正师职以上干部被审查外调的占75.2%，副师职干部被审查外调的占57.9%，团职干部被审查外调的占51.2%。

其次是派出大批人员到全国各地外调。全军区共抽调2400多人，专门搞审干外调工作，从1968年到1969年一年多时间，光外调经费就用掉458万多元。背靠背地调查了排以上干部3.2万多人。其中正师职以上干部501人，副师职干部660人，正团职干部1757人，有的外调人员带着框子找证据，有的专门挑选能说明被调人有问题的证据，个别外调人员甚至搞逼、供、信要证据。因此，不少外调材料有很大水分，影响了定案处理。

第三步是对重点人办学习班审查。所谓重点人就是有敌我性质或疑是敌我性质的人，1968年底到1969年上半年，军区和各军办清队学习班34期，审查重点对象536人，其中军区办一期正师职以上干部学习班，审查了19人，此外，师一级办职工和战士的清队学习班50个，审查了401人。办清队学习班一般做法是：一是确定重点对象，并配好一定数量的骨干；二是学习有关文件，开展革命大批判，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三是动员清队，讲明政策；四是号召个人坦白交代，群众（骨干）检举揭发；五是对重点人进行批判斗争；六是适时召开所谓体现政策大会，公开宣布从宽从严处理的典型。

最后是审查定案，进行组织处理。这次审干、清队，军区虽然一再强调“要稳、准、狠”，“打击面要小”，要防止“宁‘左’勿右”。但由于总的指导思想是“左”的，实际仍然是搞扩大化。从审查方式上看是“左”的。全区受监护审查2人，被军事看管审查的1人，停职反省审查的4人，办学习班审查的535人（不包括战士、职工）。从定性处理上看，也是定性偏高，处理偏重。1969年，军区向中央军委报告：拟定敌我矛盾220人，其中叛徒48人，特务16人，走资派13人，没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93人，

现行反革命分子 50 人。此外，还有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重大历史问题 197 人。军区从 1970 年到 1973 年，先后四次进行复查、落实政策，再三强调定案一定要有充分证据，要实事求是。但是，至 1975 年复查后，定敌我矛盾的仍有 46 人（其中正师以上干部 4 人待中央军委批准，三名副师职干部军区党委尚未批准），已批的 39 人中，有叛徒 12 人、投敌自首分子 4 人、特务 2 人、历史反革命分子 18 人、阶级异己分子 2 人、现行反革命分子 1 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 138 人（其中军职干部 5 人、师职干部 16 人、团以下干部 117 人）；经各军级单位审查批准处理的 595 人（不含一般批注）。这些人的问题，大部分把性质看重了，定性偏高，处理也过重。在军区党委定性为敌我矛盾的人员中，开除党籍、军籍、判刑的 2 人，开除党籍、军籍、戴帽、资遣还乡交群众监督改造的 5 人，还有开除党籍、军籍、每月发给生活费、放部队农场劳动的，有开除党籍、军籍、发一次性生活费返乡劳动的，有开除党籍、军籍、作复员处理的。在审干、清队中自杀 7 人。1978 年以后，反复落实政策，这些人的问题大部分平反，恢复了名誉，或者改为人民内部矛盾，减轻了处分。^{【1910】}

沈阳军区材料中列为敌我矛盾的清理对象，有叛徒，特务，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投敌自首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共 8 种，与海军材料中的 10 种略有不同。

（三）广州军区

广州军区史编纂委员会编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史》称：

“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阶段，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重大部署，也是误判国内政治形势、推行阶级斗争扩大化政策的一个突出表现。军区的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从 1967 年底着手准备，军区机关和“四大”单位于 1968 年 2 月开始进行，军和省军区机关到 10 月份亦全面铺开。

1968 年 2 月，根据毛泽东圈阅的军委办事组给中共中央的请示报告的精神，广州军区召开了干部工作会议，部署对师以上干部的考察工作。军区和各军、省军区及直属各大单位成立考察干部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审阅干部历史档案，考察现实表现，组织外调。同年 10 月，军区召开有各大单位领导和干部处长参加的会议，总结前阶段清理阶级队伍的经验，全面部署军区部队的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工作。要求军以上机关和“四大”单位通过办“学习班”的

【1910】《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政治工作史》第二卷，页 30—32。

办法，将有重大问题的人员分期分批地调“学习班”进行审查；师以下部队结合整党进行正面教育，同时对团职干部进行审查。

.....

到1969年年中，军区的清理阶级队伍工作进入定案处理阶段。5月26日—6月3日，军区召开有各军、省军区及直属各大单位专案负责人参加的定案工作座谈会。会议在肯定军区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的同时，承认定案工作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宁左勿右”的倾向。比如，有的认为“抓出的坏人越多，成绩越大”，如果自己搞的专案没有定上反革命，就说是没有成绩。有的主张：“我们看问题过头点，定性高一点，处理严一点，我们冒一点，上级削一点。”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军区党委于6月5日向军委办事组发出一份请示电报，就清理阶级队伍中定案处理审批权限问题提出了建议。7月30日，军委办事组向全军发出《关于清理阶级队伍中定案处理审批问题的通知》，明确了处分正师职干部和需要处以极刑者的审批权限。8月9日，军区党委根据通知精神，结合军区部队情况，对清理阶级队伍中定案处理审批权限作了明确规定，对于防止和纠正越权审批、滥施处罚，抑制“清队”定案工作中的扩大化倾向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

“清理阶级队伍”的重要举措是办“学习班”。全军区共办学习班27个，配备干部和战士骨干9000余人。其中以军区办的5个“学习班”为重点。1967年12月—翌年1月，军区在广东办了2个月的“从化学习班”。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和政治委员刘兴元认为，这期“学习班”没有“真正揭开军区阶级斗争盖子”。1968年2月—1969年1月，军区在广州市办了“沙河学习班”，重点“审查”和错误地批判了326名干部，其中师以上干部109名。期间，1968年4月至年底，军区还在广东省办了“花县学习班”，重点批斗了军区文体单位的20名干部。1969年11月—1971年5月，军区在湖南省军区西湖农场办了“西湖学习班”，将“沙河学习班”和“花县学习班”重点“审查”的所谓有严重问题并已基本查清的80人送到这里监督劳动。该班后并入军区在湖南办的“耒阳学习班”。“耒阳学习班”是由“沙河学习班”和负责重点专案的军区“二十号办公室”以及院校解散后遗留的一些“专案组”合并而成的，1969年11月开班，1975年1月结束，受“审查”的干部共有95人。^{【1911】}

【1911】《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史》中册，页674—677。

广州军区的材料，并未如沈阳军区材料般清楚地列出该军区清理对象的具体类别和人数。

（四）济南军区

济南军区史编审委员会编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史》述及该军区“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称：

1968年5月19日，毛泽东批发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经验。随后，“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在全国展开。

按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部署，根据中央军委办事组对《广州军区关于通过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清理阶级队伍”的情况报告》的批示，军区党委于10月7-10日，在济南召开了有军区党委常委、军区各大部和各军级单位领导参加的工作会议。会议分析了机关部队政治、组织状况，着重研究了军以上机关“清理阶级队伍”的问题，确定了清理的重点单位和打击对象、审查对象以及方法步骤，规定了政策界限，并对全区的“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做出具体安排。随后，军以上机关的“清理阶级队伍”工作逐步展开。

军以上机关的“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均以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形式按照学习文件、坦白交待问题、重点斗争、定案处理四个阶段进行。到1969年7月下旬，大多数单位都进入了最后的定案处理阶段。全区（不含军区空军）有4239人（含战士876人）参加了以“清理阶级队伍”为主要内容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共清理出叛徒83人，特务24人，现行反革命分子14人，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37人，阶级异己分子11人。上述169人中，有师以上干部10人，团以下干部149人，战士、职工、家属10人。另有81人属于有“敌我”矛盾问题嫌疑。此外，还清查了476名干部的政治历史问题。

这场“清理阶级队伍”的斗争，作为“文化大革命”“斗、批、改”阶段的重要内容，是要把所谓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地主、富农、资本家、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阶级异己分子等清理出去，做到“阶级阵线分明”。在斗争中，虽然军区各部队也注意了贯彻毛泽东关于“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要“过细地做工作”的指示精神，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规定，但由于“文化大革命”全局性的错误，因此各部队“清理阶级队伍”带有极大的主观随意性。加上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极“左”思潮的影响以及派性的干扰，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普遍存在夸大敌情、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审查了许多

不该审查的干部，造成了打击一大片的严重后果。“清理阶级队伍”使许多干部战士和职工家属的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不仅没有达到“纯洁组织”、“划清阶级阵线”的目的，反而影响了军区机关和部队的干部队伍建设，给广大干部战士和职工家属的思想造成极大的混乱。全区清理出的被定性为“坏人”和有“敌我”矛盾问题嫌疑的人员中，绝大部分属于冤、假、错案。【1912】

济南军区下辖陆军第二十六军军史称：

1968年10月下旬至次年9月，军举办了四期“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简称清队）。参加学习的363人，其中干部258名，战士67名，重点对象38名。学习班通过所谓“个人献忠心”，组织内查外调，最后定叛徒11名、特务3名、历史反革命2名、阶级异己分子2名、未改造好的地主分子1名。清队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不可能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也不能达到纯洁革命队伍之目的。后对冤假错案的同志给予了平反。【1913】

该军区下辖陆军第六十七军军史称：

根据中央军委办事组、济南军区党委关于“考核干部、清理阶级队伍”的部署，我军从一九六八年十月至一九六九年九月，举办了三期考清学习班。参加学习共五百四十人（干部四百七十七人，战士六十三人），其中军机关干部二百三十人，占机关干部总数的85.5%；师以下干部二百四十七人。结果，定敌我矛盾的二十三人，并受到了错误处理。一九七九年给这二十三位同志甄别了问题，落实了政策。【1914】

（五）福州军区

福州军区军史编纂委员会编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军史》称：

1968年11月26日，中央军委根据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关于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的精神，指出：“清理阶级队伍的重点是军以上机关，是干部”，“师以下部队进行正面教育，要保持部队的稳定，防止发生问题。有问题的干部调到军以上机关办学习班审查处理。”遵照军委指示，全区军以上机关和开展“四大”的单位迅即开办了28所封闭式的“清队学习班”，学习班成

【1912】《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史》第一卷，页269-297。

【1913】《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二十六集团军军史（1937.12-1988.12）》，页358。

【1914】《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六十七军军史》，页322。

立了由几个人组成的领导小组，抽调一部分干部战士作骨干，至1969年9月基本告一段落。“清队学习班”完全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一是把有些干部一般性历史问题看得太重，无限上纲上线；二是派性作怪，以人划线，以派划线，打击了不同观点的同志；三是搞逼供信，搞扩大化，无中生有地制造了一批集团性的假案冤案。在学习班受重点审查的干部有4830人，占全区干部总数的10.9%。不少同志被打伤致残，有61人被迫害致死。当时曾宣布挖出坏人822名，受处分的人员963名。军区政治部被诬蔑为“黑班子”、“黑窝子”，受重点审查的干部150人，占政治部干部总数的43%，其中副部长以上干部24名，占该干部数的75%。清队后，80%的干部被处理离开军区政治部，给军区的政治工作建设造成了极大损害。^{【1915】}

四、国防科委系统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1916】}

国防科委系统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牵涉甚广，以下仅以地处青海的核武器研制基地——二二一基地为例。

早于1967年3月4日，聂荣臻即宣布：经周恩来批准，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二二一厂实行军事管制。军管小组长为国防科委第二十二器材基地司令员贾乾瑞。二二一厂实行军管后，两派群众的对立情绪有所缓和，逐步恢复了正常的科研秩序。1968年1月后，国防科委接管九院，并授予九院代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字819部队”，二二一基地代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字839部队”。

1969年1月，二二一基地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九〇八厂”，10月开始战备搬迁、人员调动，大批技术干部开始陆续往四川九〇二地区转移，一些技术干部被发配走“五七”道路，到河南省驻马店上蔡农场劳动，改造世界观（私下传言是经过解密后调出），其它仍留在青海。此阶段留传甚广的是“三品”论，即：到四川的是“正品”，留在青海的是“次品”，下农场的是“处理品”。职工人心涣散，思想混乱，技术骨干感叹“卸磨杀驴”，对前途、未来感到渺茫。在这种状态下，发生了所谓的“三大案件”。

11月4日，电厂发生输电电缆线短路爆炸事故，引发了全厂停电；11月14日，第二生产部229工号发生恶性TNT爆炸事故，炸死四名职工；此期间还传说“机密资料”失窃事件。

【1915】《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军史（1949—1985）》，页225。

【1916】本小节主要资料来源：王菁珩：《青海核武基地的劫难》。《炎黄春秋》2013年第7期。

11月25日，周总理听取关于“三大案件”的情况汇报，指示“加强领导，充分发动群众，查清问题。”随即派出以海军副司令员兼国防科委副主任赵启民、公安部领导小组成员、原空军第八军副军长赵登程为正副组长的工作组赴二二一地区调查处理。

“二赵”进入基地最先的动作是禁止职工对外的通信联系，来信全部扣住，必须经军代表验看，认为没问题后才交还本人。

原定到驻马店上蔡农场的人员，改为在青海多巴办学习班（后转移到西宁杨家庄大院）。调来了军代表和成建制的核试验基地复员的工程兵，这些人不幸沦为帮凶和打手。

然后是全厂大抄家，美其名曰：“保密大检查”，扬言“谁怕保密大检查，只有阶级敌人才害怕”。为掀运动高潮，草菅人命，枪决无辜职工，称之“杀鸡给猴看”。

大搞刑讯逼供，提出“革命群众掉几斤肉，让阶级敌人去几层皮”的口号；轻证据，重口供，称“一人供听，二人供信，三人供定”，抓“五一六”分子“一个不漏”，破“四旧”要“刺刀见红”等等，逼迫职工无所不用其极。

“二赵”以开杀戒来打开“清队破案”的局面。1970年2月17日，召开全厂“宽大大会”，无辜枪杀一名技术员（宋应松）、一名外科主任大夫（陈长贵）。为配合运动的开展，又无辜枪杀三人（张邦鹏，技术员；赵德，工人），其中包括一名不到16岁的孩子（刘剑，学生）。

开大会时，会场四周架上机枪对着全场群众。“犯人”剃光头，绳子套在脖子上，令全厂职工面向杀人现场。枪杀人后，赵登程讲话称，“你们听到枪声没有？没有听到枪声，下次我拿大炮轰，拿机枪扫。”

强令出差、探亲的职工三天内返厂参加运动，逾时不归就开除；切断一切与外界的联系，包括电话和通讯；夜里厂区实行戒严，三声口令不回就开枪；几乎所有集体宿舍的窗户都用木板封死，整个二二一厂成了一个大监狱。

赵登程带头搞“逼、供、信”。他随身带着手铐，亲自审讯逼供。厂里使用的刑法闻所未闻，什么“站圆筒”、“冻冰棍”、“烤电炉”、“假枪毙”、“假活埋”等无所不用其极。

在全厂开展大搜查，把搜查来的材料作为罪证搞展览。其中：把电灯开关说成是特务用的发报机；把黄豆、沙子说成是敌人从核试验厂带回来的效应物；把假牙说成是特务用于自杀的工具；把连号的人民币说成是特务的活动经费……把二二一基地说成是“小香港”、“小台湾”、“资产阶级大染缸”，说各类反革命分子

都是“一串串的”、“一窝窝的”；说“要杀一批，清一批，还要控制使用一批”；说“要把草原独立王国彻底砸烂”，“要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他们进厂后就宣布，他们是“永久牌”的，不是“飞鸽牌”的。军委首长给了他们“尚方宝剑”，“可以先斩后奏，边斩边奏”。赵登程在杀人大会上称，“九院院长这样的人我都可以处理，你们下面的人就更不在话下了。”

在“二赵”进行的“清队破案”、“清查五一六分子”、“一打三反”、“荡涤污泥浊水”等一系列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特务”的各类人员达3,200余人。其中，被逮捕、拘留、隔离审查的733人，看押批斗的2,500余人；被逼自杀108人（其中死51人），被打致死4人，其中包括副院长王志刚和炸药专家钱晋；冤杀5人，被关致死3人；因刑讯致残、致病400余人，包括九院创始人之一吴际霖，因备受摧残致英年早逝。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赵启民被解除一切职务，隔离审查，后被降级处理（1988年降格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赵登程1972年10月被逮捕，1983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二赵”的处分程度差异较大。

第八十节 红卫兵运动的终结与军队

一、毛指示中央警卫团率队“捅马蜂窝”

1968年，全国范围的派性斗争仍然方兴未艾，难以遏制。以最早造反的清华大学为例，1967年4月14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分裂为井冈山兵团总部（团派）和四一四总部（四派）。两派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文攻”，终于由团派于1968年4月23日发动了大武斗，以图压倒和消灭四派。^{【1917】}清华园内持续百日的武斗，共有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30余人残废，国家财产损失数百万元。校内到处构筑武斗工事，设置关卡，师生员工不能正常生活。^{【1918】}

清华百日武斗，不过是全国性大小规模武斗的一个缩影。它标志着曾经狂飚般横扫整个中国的红色造反风暴，在1967年夏季以后已失却方向，步入迷途。旷日持久的动乱，必须要有一个终结。最后的终结者，正是这一场红色风暴的发起人——毛泽东。

据谢静宜回忆：1968年7月24日上午，毛的护士长吴旭君打电话到北京新华印刷厂找到随中央警卫团在该厂参加军管的谢，叫她回中南海一下。毛先问了谢

【1917】唐少杰：《清华文革“七·二七事件”》，<http://www.aisixiang.com/data/3249.html>，最后访问：2020年4月10日。

【1918】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九十年》，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页274。

新华厂的情况，然后布置了由北京市和中央警卫团共同组织工人和农民进驻北大或清华制止武斗“捅马蜂窝”的任务，由谢传达给中央警卫团有关领导。

谢静宣称：

我领受任务后，立即乘公共汽车赶回工厂，将主席指示向张荣温副团长及迟群（革委会主任）^{【1919】}作了传达后，他们同我一起回部队报告了杨德中政委。之后，杨德中政委带我们三人又一起到汪东兴同志处，做了详细汇报。

遵照主席指示和东兴同志意见，由杨德中政委带领张荣温、迟群和我，到北京市委作汇报。^{【1920】}

听取汇报的是谢富治、吴德、吴忠、杨俊生、刘绍文^{【1921】}等领导同志。他们很重视、很赞成、很支持。他们说，清华大学武斗最严重，科学馆被烧，压在科学馆下面的人既没有吃的，也断水、断电，快困死在里边了，先进清华好。

市委书记们表示由市委帮助组织联络工厂。并找来清华大学地图多张，研究部署工人宣传队去清华的路线。为了不让北大、清华的人发觉，那几天，由北京市委组织工人在大专院校周围游行，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不进校，游一阵子回来。

……

7月25日，在市革委工交口、支左办的帮助下，联络了大联合、三结合均比较好的工厂61家，约3万产业工人队伍。

26日，市委领导同志参加，在新华印刷厂召开了去清华大学宣传的工人领导人会议。

……

【1919】迟群，时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1968年7月随“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后历任北京大学革委会常委，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1976年10月后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1983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1920】谢此处及下文多处提及中共北京市委，其实当时旧市委已不存在，新市委尚未成立，领导北京市的是市革委会。

【1921】谢富治时任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吴德时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北京卫戍区第二政委。吴忠时任北京卫戍区第一副司令员。杨俊生、刘绍文时任北京卫戍区政委。

市委除谢富治、吴德、吴忠、杨俊生、温玉成^{【1922】}参加研究、布置行动方案外，直接参加指挥小组的是市委副书记、卫戍区副政委刘绍文^{【1923】}。还有市委支左办公室的同志。

27日，指挥小组一声号令，8个团，3万产业工人和部分农民组成的工人、农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解放军驻各厂军代表的配合下，从各自厂地出发，浩浩荡荡向清华大学进发。到后，仍像前两天一样，先在学校周围游行，麻痹他们一下，10点钟准时，8个团的宣传队按事先的分工，同时从各大门一齐进校，到达各分工地段，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向武斗的双方念毛主席语录，念要文斗不要武斗，念中央制定的“七三”、“七二四”布告。并以演节目、说快板书的文艺形式进行宣传。

工人、农民、解放军代表，手中只拿着《毛主席语录》、小彩旗，带着一天用的口粮。其中不少男同志因天热穿短裤，女工穿裙子，并未作长期打算。

进校时，北京市委负责人、卫戍区负责人谢富治、吴德、吴忠和8341部队负责人在离清华大学不远的一处宾馆院子里组织指挥，在院子里搭了一个大篷，临时安了红机和几台普通电话。^{【1924】}

谢静宜回忆的多处误差，多少影响了其著述的可靠性。惟透过谢的回忆及参照其他资料，我们至少可以得到如下结论：（一）宣传队进驻清华、北大，是遵从毛泽东的旨意。（二）宣传队进驻的组织、指挥者，是北京卫戍区和中央警卫团的负责人。（三）进驻准备工作是秘密进行的，为的是“不让北大、清华的人发觉”。（四）宣传队是由中央警卫团率领的。

二、“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在军队的策应下，声势浩大的三万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事前并没有向不及千人的两派武斗队伍宣告是毛本人的亲自指示。惟势力相对弱小的四派知趣地放下了武器，却遭到了自认老大的团派负隅顽抗。

据清华校史称：

7月27日上午，北京新华印刷厂等61个工矿企业3万名工人组成的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8341部队、北京卫戍区、海军等军代表配合下（总指挥为张荣温），从四面八方开进清华大学。工人们手持毛主席语录和

【1922】温玉成时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1923】刘绍文职务有误，刘时任北京卫戍区政委。

【1924】谢静宜：《毛泽东身边工作琐记》，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页177-179。

“七三”、“七二四”布告，对两派喊“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11时30分，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卫戍区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办公室负责人刘丰电话通知蒯大富：“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去清华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七三’布告，请你们大力支持宣传队，并积极与宣传队合作。”但蒯大富等拒不执行，并在静斋召集团派总部头头开会，指责这一行动是“杨余傅黑后台背着中央搞的阴谋”，“是来支持老四（414派）压团派的”。会议决定：“1. 紧急请示中央，问清情况；2. 坚守已有据点，不让工人进楼，如果工人硬攻，就抵抗还击”。通过电话、广播以命令方式将第二条决定向武斗据点下达。从下午开始到晚12时，在武斗头头指挥带领下，武斗人员在大礼堂、明斋、10号楼、9003大楼等处，用长矛、步枪、手榴弹等武器，驱赶袭击工宣队。但工宣队员和军代表继续宣传制止武斗。在遭受袭击中，有5位工宣队员遇害，731位工宣队员受伤（其中149位受重伤）。^{【1925】}

在宣传队已基本控制（尚未完全控制）清华局势的情势下，7月28日凌晨三时半至上午八时半，毛泽东、林彪召见了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组长聂元梓、副组长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1926】}五人，破天荒地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之进行长达五个小时的谈话。陪同召见及参与谈话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吴德和黄作珍^{【1927】}。毛、林以下15人中，现役军人8人，占一半以上。

毛在召见谈话中称，“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工人去‘镇压’红卫兵，黑手到现在还没有抓出来，这黑手不是别人，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抓我好了！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就是我派去的，你们就给吹。我问他们怎么对待校园的武斗，我说你们去做做工作看看。结果去了三万人，其实他们恨北大，不恨清华。”^{【1928】}

毛称：“你们看大学武斗怎么办？一个办法是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管，谁想打就打，过去北京市委、卫戍区对武斗的态度是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另一个方法是帮助一下，这个问题深得工人的赞成，深得

【1925】《清华大学九十年》，页274-275。

【1926】聂元梓，北京大学校文革主任。蒯大富，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一把手。谭厚兰，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一把手。韩爱晶，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一把手。王大宾，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一把手。

【1927】黄作珍，时任北京卫戍区政委。

【1928】韩爱晶：《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的谈话记录》，<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712.html>，最后访问：2020年4月10日。以下谈话记录同此出处，不再一一注明。

农民的赞成，深受学生大多数欢迎。大专院校五十九个，打得凶的大概五、六个，试试你们能力，至于如何解决呢？你们提出意见。我看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你们北京大学要那么大干啥？如果解决不了，不一定住在一个城市，一个住在南方，一个住在北方，都叫新北大，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井’，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公社’。就像苏联共产党打一个括弧‘布’，另一个苏联共产党打个括弧‘孟’。”

毛说得大家都笑了，又接着称：“如果你们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第三个办法，那么军管。请林彪同志挂帅，还有黄永胜，问题总能解决。你们搞了两年了，一是斗，二是批，三是改。斗是斗，你们是搞武斗，也不斗也不批，也不改，现在是少数学校搞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部队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的那一派也有人不高兴，就这样一统天下！你新北大老佛爷，你是多数，是哲学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没有反对你的人哪？我才不信呢！当面不说，背后还是说怪话。”

当陈伯达说到“蒯大富不尊重工人群众，如果仍然不听我们的，就是不尊重中央，不尊重毛主席”时，毛称，“是相当危险，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周恩来接着称，“毛主席早就讲过，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毛在后头的谈话中多次自认黑手，“你们在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对于你们毫无办法，你们打下去没有出路，要消灭四一四也不行。我还是倾向你们这派，因为四一四那个思想，我不能接受。但是对四一四要争取群众，领袖也要争取些。”“蒯大富，你真蠢哪，我们搭梯子让你下来，你不下来。你们这样和中央的政策对抗，黄作珍讲话不听，谢富治讲话不听，市委开会不算数，中央才出来，伸出‘黑手’，调动革命，制止武斗，宣传多大，敲锣打鼓，你们又不理，你们脱离群众，脱离工农兵，脱离绝大部分学生，甚至脱离自己领导下的部分群众，你领导下的学生，说你的坏话的不少。没有打招呼，是我的错误，间接打了招呼。”

毛泽东召见谈话的基调，是对五大领袖既有批评，也有呵护。惟这已经不能改变五大领袖所代表的造反派红卫兵群体迅速走向消亡的命运。毛泽东一旦将由军队指挥的“工人阶级”推上前台，红卫兵们的退场已是历史的必然。

三、清华的做法推广至全国全军

1968年7月31日，驻清华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929]发出《几个具体问题的规定》，宣布“清华大学教职员在校内恢复一切正常活动”，工宣队“人数减到

【1929】1968年8月下旬后更名为“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5,000人”。据8月10日统计，驻清华工宣队共8个团，来自61个单位，共5,147人，军代表105人。总指挥张荣温（8341部队），副总指挥阮世民（北京特殊钢厂）、高士昌（北京无线电厂）、刘洪生（北京起重机械厂）、邢云有（北京针织总厂）、王士尧（北京塑料厂）、王宝仁（北京第一建筑公司），盛其林（541厂）、张世忠（北京新华印刷厂）。1969年1月25日，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主任张荣温。^{【1930】}

1968年8月19日，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京大学。宣传队由北京第一机床厂（92人）、第二机床厂（60人）、北京齿轮厂（60人）、外文印刷厂（60人）、财经印刷厂（20人）和陆军第六十三军（代号4587部队，200人）等6个单位组成，共492人。六十三军政治部副主任刘信任宣传队总指挥部总指挥；副总指挥有：荣长风（一机床厂军代表）、局成俊（一机床工人）、魏秀如（女，二机床厂工人）、华广信（齿轮厂工人）、焦克琛（外文印刷厂工人）、李景斌（财经印刷厂工人）等6人。指挥部领导小组成员还有宋双来（六十三军一八八师政委）和田双喜（一八七师参谋长）。宣传队共编3个团，每团3个连，连为军、工分编。1969年3月21日，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向北大军工宣传队指挥部传达派8341部队进驻北京大学的指示。总指挥刘信连夜召开六十三军团以上干部座谈会，对8341部队进驻北大统一思想认识。3月24日，8341部队81名军宣队员在杨德中政委、王连龙副政委率领下进驻北大。宣传队指挥部向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卫戍区报送《关于北大宣传队成立领导小组的报告》。报告提出由8341部队杨德中、王连龙、张跃忠、迟群、谢静宜，工人宣传队李兰亭、魏秀如、焦克琛、华广信、局成俊，4587部队刘信、田双喜、杨德顺等13人组成驻北大宣传队领导小组；由刘信任组长，杨德中、王连龙、李兰亭、魏秀如、杨德顺任副组长。刘信在报告中提出由杨德中担任组长。9月27日，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主任杨德中。^{【1931】}

1968年8月5日，毛泽东将外宾赠送的芒果转送给驻清华大学的工农宣传队。15日，毛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代表。

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以向全国推广向清华大学派驻宣传队的做法。通知称，“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而进驻大学的北京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已经获得显著的成效，在全国起了巨大的影响，中央认为：整顿教育，时机到了，各地应该仿照北京的

【1930】《清华大学九十年》，页275-276。

【1931】《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页673、679、684。

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校逐步管起来，在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工人中已经实行革命大联合，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已经有了显著成效的大、中城市，都要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的，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入各学校，先搞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普及，先进大学，后进中、小学，没有两派组织，也没有武斗的学校，也要进入。”

8月26日，《人民日报》刊载《红旗》杂志第二期发表的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文中公布了毛泽东的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文中还提出“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都应由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

清华的做法甚至延伸至军内院校。9月2日，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工人进军事院校及尚未联合起来的军事院校实行军管的通知》称：

（一）伟大领袖毛主席批示：如工人条件成熟，所有军事院校均应派工人随同军管人员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

毛主席的伟大批示是搞好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大动力，应坚决执行，坚决照办，进军事院校的工人，可由实行了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并清理了阶级队伍的军事工厂或民用工厂选派。

（二）凡未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院校一律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人员除派领导干部之外，应派工人，解放军共同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凡成立了革委会的院校不实行军管，但要派工人，解放军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其任务是领导学校实现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和斗、批、改。

……

四、大专院校红卫兵群体逐步瓦解

在1968年7月27日前，老五届大学生^{【1932】}中的1966年及1967年毕业生，中央早于1967年9月决定分别在当年9月及12月开始进行分配。中央在分配通知

【1932】老五届，指1966年文革爆发时，按时原定学制应该分别在1966年至1970年暑期毕业的在校大学生。

中强调，“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分配大专院校毕业生，必须面向基层，面向工厂，面向农村。可以分配到全民所有制单位，也可以分配到集体所有制单位，与工农群众相结合。”^{【1933】}

惟 1967 年 12 月开始分配 1967 年大专院校毕业生的计划，未能如期实现。1968 年 6 月 1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一九六七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称，“一九六七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原定去年十二月进行分配。为了适应教育革命的需要，同时考虑到一九六六年毕业生尚有未离校的实际情况，中央决定，推迟到一九六八年六月开始进行分配。”通知再次强调，“毕业生的分配，必须坚持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方针。”“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包括研究生），一般都必须先当普通农民，当普通工人，虚心向工农群众学习，……分配当农民的毕业生，由各地区、各部门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安排到解放军、地方和中央部门举办的各种国营农场去。根据国家需要，分配去当中小学教员和担任医疗工作的毕业生，也必须一面工作，一面劳动。”



在新疆库车陆军第四师农场“接受再教育”的大学生，
1970年9月-1972年4月。

【1933】《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一九六六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1967年9月7日。中发〔67〕290号中共中央文件。

6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分配一部分大专院校毕业生到解放军农场去锻炼的通知》称，“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一九六七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中规定，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包括研究生）一般都必须先当普通农民、当普通工人。为了使毕业生很好地得到锻炼，决定安排一部分毕业生到解放军农场去。”“解放军农场，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遵循办抗大的方针原则，做好毕业生的管理教育工作。组织毕业生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培养他们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分配到解放军农场的毕业生一律实行军事管理，过战士生活，按部队组织形式单独编成连队，但非现役军人。”

7月15日，军委办事组批发总后勤部《关于接收地方大专院校毕业生到军队农场锻炼问题的报告》。总后报告称，“中央各部门直属大专院校到军队农场锻炼的毕业生为三万六千五百九十四名。根据各军区、各军种现有农场的情况和可能接收的人数，我们作了一个分配计划（详见附件）。各省、市、自治区的大专院校毕业生需要到军队农场锻炼的，由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军管会直接同大军区协商办理。”^{【1934】}

据总后勤部《中央各部门直属大专院校毕业生到军队农场锻炼的分配计划》称，分配到北京军区7,165名，沈阳军区4,240名，广州军区5,713名，南京军区8,718名，济南军区4,300名，武汉军区1,506名，兰州军区804名，新疆军区700名，空军2,672名，海军776名。^{【1935】}

上述文件清楚表明，无论是否有清华“七二七”军工宣队进驻一事发生，在1968年7月前，中央已决定对大专院校在校生中的40%进行毕业分配，实际上是对大专院校造反红卫兵群体进行了局部瓦解。“七二七”之后，不过是加速了这一瓦解过程。

11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一九六八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决定一九六八年大专院校毕业生约15万人，“从今年十一月中旬开始分配”，使毕业分配离校人数达到大专院校在校生的60%。通知再次强调，“毕业生的分配，应当坚决贯彻执行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的方针。一般都必须去当普通农民、普通工人，大量的必须去当普通农民。大专院校毕业生，要坚定地走毛主席指出的同工农兵相结合的

【1934】总后勤部财务部、军事经济学院：《军队财务史料（1967年—1969年）》，1994年12月，页449。

【1935】《军队财务史料（1967年—1969年）》，页449—450。

道路，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要坚决服从党和国家分配，不要强调一定要分配到自己所学的专业部门去……分配当普通农民的毕业生，除了继续安排到解放军农场、国营农场外，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可以按照当地的实际情况，有计划地组织他们参加改造盐碱地、兴修水利等改造大自然的斗争。在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以分配一部分毕业生到农村人民公社（队）去，进行插队试点。”通知严格要求，“一九六八毕业生的分配工作，应在十一月落实接收计划，开始派遣，十二月底以前毕业生应全部到达接收单位。除了个别特殊情况，经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毕业生分配领导小组批准的以外，过期不报到的，就不再分配工作。”

至于余下的40%在校大专生，在当权者眼中已完全失去红卫兵的气焰，没有什么影响力。这一部分后来在1970年7月开始分配，当月底前分配完毕。



在牛田洋陆军第二一九师锻炼的大学生，1970年3月。

五、军队院校学员全部扫地出门^{【1936】}

1968年6月后，军委将在全国造反浪潮中起过重大作用的军队院校学员，全部扫地出门，作毕业分配或下放锻炼。

6月20日，军委以军委〔68〕4号文件发出《关于军队院校一九六八年毕业学员分配的通知》称，“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关于军队院校一九六八年毕业学员分配的请示报告》，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各院校学员毕业分配事宜，务于八月底前办理完毕。”请示报告称：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的教导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报告的批示精神，我们研究认为，军队院校的学员，凡是已到毕业期限的，应一律毕业分配。

这批学员，政治质量是比较好的。……

目前，绝大多数院校还没有成立革命委员会，有的两派还没有联合起来，就是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和实现了大联合的单位，教改方面的问题也尚未解决，多数院校短期内难以复课。同时，这些学员，入学时间较长（大都在四年以上），年龄较大（大都在二十四、五岁，大的二十六、七岁），绝大多数迫切要求出校。因此，我们认为不宜再延长学制，继续留校学习。未学完的业务课，可到实际工作中去继续学习和锻炼。

在分配学员的工作中，需要明确的几个问题：

……

（三）分配原则。从部队调来的学员，一律各回原部；青年学生学员，统一分配。分配时要面向边疆海防、面向连队、面向基层。凡是沒有当过兵的，都应先到连队当兵一年，然后再根据工作需要和本人情况分配工作。

（四）对犯有严重错误或发现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不能作毕业分配的学员，可暂留学校，待后处理。……学员中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子女，未改造好的，不作毕业分配，待运动后期处理。

（五）被选为院、校革命委员会委员和调到各级革命委员会办事机构工作的应届毕业生学员，都应作毕业分配。

【1936】主要资料来源：总政干部部：《干部工作文件汇编》第三辑，1981年。

6月29日，军委以[68]军字第338号文件发出《关于军队院校一九六七年毕业学员至今未到分配单位报到问题的处理的通知》称，“据查，军队院校的一九六七年毕业学员，至今还有少数人未去分配的工作单位报到。为此，各院校应再次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一九六七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向全体人员宣读，认真组织学习，坚决贯彻执行。军队院校的一九六七年毕业学员，尚未到被分配的工作单位报到的，限于今年八月底以前报到，逾期不报到者，一律停止供应，接收单位不再接收，并取消其现役军人资格。特此通知，望严格遵照执行。”

11月18日，军委以军委[68]17号文件发出《关于军队院校学员下放锻炼的通知》称，“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已经批准《关于军队院校学员下放锻炼的请示报告》，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所有学员（包括参加学校革委会的成员）一律下放，并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底以前下放完毕。各有关单位应即提出学员下放锻炼的安排方案，报军委办事组审批。”军委办事组的请示报告称：

目前在全军院校中，还有××所院校有学员××××人（不包括飞行、潜艇学员）。其中：工程技术院校×所，××××人；医药卫生院校×所，××××人；外语学院×××人；兽医大学×××人。

这些学员都是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从社会上招收的青年学生。他们入校的时间都三、四年了。根据各院校的情况，在短期内多数还不可能复课。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的教导，建议：将这些学员，一律下放基层锻炼。有的可以按所学专业对口下放，有的可以到连队当兵。经过锻炼之后，表现好的，即可在部队分配工作，有的可以回校再进行短期训练后分配工作表现不好的，即作复员处理。

六、中学红卫兵群体顷刻瓦解

比大专院校“老五届”庞大得多的，是中学“老三届”^[1937]的队伍。1968年10月后，城镇“老三届”除一部分留校继续读书、进工厂或极小一部分当兵外，半数“上山下乡”，中学红卫兵群体在两三个月内顷刻瓦解。

【1937】老三届，指1966年文革爆发时，在校的1966、1967、1968年三届初、高中学生。

据有关方面统计，“老三届”人数在1968年达1,001.6万人。据测算，其中家居城镇的约占40%，即400万人。1968年11月至翌年2月，为“三届”上山下乡的高峰期，尤其是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后，“上山下乡”形成高潮。据统计，1967年至1968年合计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为199.68万人，其中插队165.96万人，国营农场（以后的生产建设兵团）33.72万人。1969年一二月间，仅仅两个月就有155.6万人下乡落户。到1969年底，全国共下去267.38万人，加上1967、1968年下乡人数，总数达到467万多人。其中到国营农场80万多人，到人民公社插队387万多人。^{【1938】}城镇“老三届”中的半数，完成了从“红卫兵”到“知识青年”的身份转换。

中国知青史资深研究者刘小萌称，“与到农村插队落户当农民相比，去生产建设兵团应是比较理想的选择。在兵团，生活待遇有基本的保证，有固定的经济收入，医疗卫生条件较好，组织上有人管理。这一点尤为知青家长所看重。知青本人则往往为兵团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所吸引，对于众多因种种原因不能加入到解放军那所学习‘毛泽东思想大学校’锻炼成长而沮丧不已的热血青年来说，参加兵团，‘屯垦戍边，’在‘反修的前哨’当‘不戴领章帽徽的解放军’，未尝不是一种心理上的慰藉。因此，当这种兵民合一、军政一体的庞然大物于60年代末在中国大地炫煌一时之际，立即成为面临下乡抉择的青年的首选。”^{【1939】}

从1968年到1976年，全国新组建12个生产建设兵团。加上前设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共计13个兵团。按组建先后情况如下。

（一）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1967年2月，在新疆军区领导下，实行军事管制。1969年12月，划归新疆军区建制。文革中未有大批接收外省市知青。1970年代初统计留兵团知青尚有7万人，约占职工人数的8%。1975年3月撤销。

（二）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1968年3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决定，将农垦部所属东北农垦总局，改建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划归沈阳军区建制。兵团机关

【1938】 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页104-105、112-113、301。

【1939】 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页207。

和各师、团主管，师、团机关领导由现役军人担任。文革期间安置知青近40万人，^{【1940】}安置人数高居各兵团之首。1973年8月纳入省革委会领导，1976年2月撤销。

（三）南京军区安徽生产建设兵团

1969年1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复同意组建，归安徽省军区建制。该兵团于9月组成。下辖4个师。文革期间接收知青3万余人。1975年6月5日撤销。

（四）南京军区江苏生产建设兵团

1969年1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复同意组建。归江苏省军区建制。兵团辖4个师41个团，知青约8万人。1975年8月撤销。

（五）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1969年1月22日，中央同意组建，统管改编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区在文革前建立的6个农建师和水土保持建设师，57个团场。1974年2月撤销。

（六）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1969年1月24日，中央批准成立。北京军区从下属各部队抽调现役军人组成各级领导班子。当年，兵团组建了4个师、24个团，接收北京、天津、上海、呼和浩特、包头等城市上山下乡知青5万余人。1971年，兵团已有41个团，职工10.1万人，其中有知青7.6万人，现役军人5,600人，另有家属3.8万人，共计14.5万人，知青比例在诸兵团中最高。^{【1941】}1975年6月24日撤销。

（七）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1969年4月1日正式成立，归广州军区建制领导。兵团接管了原海南、湛江的国营农场和华南热带作物学院、研究院。兵团按部队编制，下辖10个师，148个团，3个独立营。现役军人2,900多人。至1973年底，共有知青11万余人，主要来自广州、汕头、海口、湛江、韶关等地。1974年6月撤销番号。

（八）昆明军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1969年10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组建，1970年3月1日正式成立，建制归昆明军区，行使军级权限。组建时为4个师，23个团。到1972年底，干部、战士、职工共计18.7万余人，总人口达29.6万人。累计接收北京（8,000多人）、上海（4.76万人，包括上海郊区青年农民2万余人）、成都（1,700人）、重庆（24,000人）、昆明（1万人）知青11万人。1974年9月6日撤销。

【1940】《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页210。

【1941】《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页211。

（九）福州军区福建生产建设兵团

1969年12月7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组建。兵团下辖第一（工矿）、第二（农业）、第三（林业）、第四（基本建设）师，共21个团。1970年4月，又将3个企事业单位改编为团。全兵团1970年底总人数89,521人，其中现役军人2,239人，地方干部、职工65,785人，兵团战士21,497人。另有劳改犯、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释放就业人员共9,136人。1974年11月撤销。

（十）福州军区江西生产建设兵团

1969年12月7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组建。兵团没有师的编制，下设农业团和工业团两种。其中，农业团共有十一个团和一个独立营，大多为劳改农场或国营农场；工业团共有十二个团和一个独立营，大多为劳改工矿企业。隶属江西省军区，又称福州军区江西农建师。1975年撤销番号。

（十一）济南军区山东生产建设兵团

1970年3月，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组建。兵团建制归济南军区，党政、军事行政工作和现役军人的后勤供应由山东省军区负责。济南军区从下辖各部队抽调现役军人组成连以上各级领导班子，率领山东各地的复员军人前往胶东半岛，胶济铁路沿线，垦利、微山湖等地区，整体接管山东省公安厅劳改局下属监狱和部分国营农场，组建兵团。1974年11月根据国务院、军委命令撤销。

（十二）南京军区浙江生产建设兵团

1970年5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在杭州正式组建，共划进14个农场。9月至12月各兵团农场陆续安置城市知青（1969—1970年中学毕业生）。共有职工3.2万人，其中知识青年2.74万人。兵团下辖第一、第二、第三师和直属第十三、第十七团及工业第一、第二、第三团。受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和浙江省军区双重领导。1975年6月撤销。

（十三）武汉军区湖北生产建设兵团

1971年5月，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组建。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湖北省军区双重领导。兵团原计划以16个农场为基础组建4个师，1个独立团，实际只建成一个第二师，下辖6个团（场），其余10个农场由兵团与农场所在地、县双重领导。1972年11月13日撤销番号。

第八十一节 八届十二中全会

一、会议出席人员的组成与议程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为中共九大作准备的中共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毛泽东主持下在北京举行。这是自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进行文化大革命以来，经过两年多时间才召开的一次重要的中央全会。这次全会的目的，是为彻底打倒刘少奇完成组织手续，也是为召开中共九大作准备。

在10月13日的开幕会上，周恩来报告了出席会议人员的组成、编组和会议的开法，并宣布了大会议事日程。关于会议人员的组成，周恩来称：

今天开的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决定召开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人数商定的是一百三十三人。

这次出席的中央委员，原有能到会的为四十位，要补选十位，因为从十一中全会到现在已死去十人。通过无产阶级司令部商定，提出下述十位同志补为中央委员：黄永胜同志、许世友同志、陈锡联同志、张达志同志、韩先楚同志、潘复生同志、刘建勋同志、李大章同志、吴德同志、刘子厚同志。他们原来是候补中央委员，今天在十二中全会上补为正式中央委员。（鼓掌）

这样，中央委员出席的就是五十位。中央委员原来定额是九十七人，现有五十人出席，过半数了。其他能出席的还有九位候补中央委员。这次出席十二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一共五十九人。

其次，就是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中央文革是我们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一个新生的力量。中央文革，在两年前十一中全会上已经肯定了。那个时候，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领导下，中央文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了直接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个前线发动群众的机构。经过这两年工作，逐步地扩大为中央文革碰头会。今天出席的五位同志：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都是中央文革成员。五位以外，参加成为碰头会成员的有：周恩来、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这七位同志，一共十二人。

再次，在军委处理日常工作的，在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成立了军委办事组，得到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批准了的有六位同志，就是：黄永胜同志、吴法宪同志、叶群同志、李作鹏同志、邱会作同志、刘贤权同志。

这次出席会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大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

现在除台湾省外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除了与上面重复的以外，每省出席两位，共五十二人。各省、市革委会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新生的力量。他们是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直接领导下的地方的革命权力机构。

人民解放军的大军区各出席一个人。有的大军区同志在前面已兼有别的任务，也就没再来人。举例来说，福州军区韩先楚同志、皮定均同志就是福建革命委员会的正副主任，那个大军区就再没来人了。这样例子别区也有。所以，全国十二个大军区只出席九位同志。

最后一项，就是中央直属机关，出席了四位同志：郭沫若同志、李天佑同志、曹轶欧同志、郭玉峰同志。

总人数合在一起，重复的不算，共为一百三十三位同志，这是出席会议的全体成员。^[1942]

上述由候补中央委员增补为中央委员（未按惯例依名次递补）的10人中，现役军人为5人，占50%。在除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之外的74名出席者中，据不完全统计，现役军人为56名，约占74人的75%强。精心挑选的这74人，在全会上全力支持毛，次年九大上全部成为中央委员会成员，一部分甚至进入了中央政治局。

周恩来在开幕会上宣布的全会议程有四项：一是九大代表如何产生的原则和方法；二是修改党章草案；三是讲一讲形势；四是专案审查报告。^[1943]这里讲的专案审查报告，是指刘少奇问题。

惟林彪在10月26日全会上的讲话则称，“会议对《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进行了讨论；讨论了产生‘九大’代表的问题；对大叛徒、大内奸、大卖国贼刘少奇的处理作了讨论。同时，对‘二月逆流’进行了严肃地批判。还学习了一些文件。”^[1944]

【1942】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节录），1968年10月13日。《“文革”十年资料选编》上册，页273-275。

【1943】《毛泽东传（1949-1976）》下，页1530。

【1944】佚名：《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1968年12月24日，页10。

林彪讲话中的“对‘二月逆流’进行了严肃地批判”，在周恩来宣布的议程上是没有的。这似乎可以说明，对“二月逆流”的再批判，显然是全会进行中临时增加而非早有准备的内容。

二、毛泽东一口气点了一连串党内“坏人”的名字

毛泽东在会前、全会开幕和结束时的讲话中，多处谈到了形势问题，中心是谈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

在全会开幕的前一天，他对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称：这次文化大革命要不要搞？你们说没有问题，我看是有问题的。十一中全会决定，文化大革命该搞不该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是主要的？这里包括红卫兵、三支两军等。此外，中央领导、各级领导中的一小撮该不该垮？这个问题是存在的。【1945】

10月13日，毛泽东在全会开幕式讲话的开头即称，“形势问题大概有这么二个。一个国内，一个国际。国内问题主要总结上次全会到现在两年多的工作。两年文化大革命，无非是两种看法：一是还不错，认为决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二也有人说：不见得。十一中全会时我就说过，我在十月工作会议上也打过招呼，不要认为决议通过了都能执行，实际上在会上举手是一回事，真正同意又是一件事。招呼是打了，但同志们认识未过关，后来证明，还是不理解，有的人出了问题。”【1946】

毛泽东在开幕式讲话时最后称：

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这是一个问题，我们说，要搞到底。什么叫到底呢？估计有三年差不多，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工厂不整，你们看，不搞文化大革命怎么得了。比如，北京一个木材厂，有那么千把人，是两百家资本家合起来的。资本家之多，这个厂就二百家。有的厂三朝元老，有的四朝元老。还有新华印刷厂，第一北洋军阀时期他给印票子，第二日本来了给日本人印报纸传单，第三国民党接管又跟国民党，第四共产党来接管也吃得开。他都吃得开。有一部分三开、四开干部，其中有些是隐藏的反革命，我们派的人也不得力，思想状况精神状况也不好，不清清，不

【1945】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10月12日。《毛泽东传（1949-1976）》下，页1530。

【1946】《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页1。

整整，工厂究竟是谁的呀，很成问题，据说农村要好一点，但是也有问题。今冬明春，春耕以前没有搞好的大队、公社，要好好抓一下。这还是靠人民解放军，靠革命委员会，省、地、县革命委员会。有一个省组织一百万人宣传队，解放军只是少数，1-2万人，九十几万都是贫下中农。这是广东。江西也不错。江西，中等人口省，两千二百万人。有的地方人太多，省级机关就七千人，这么多人至少要减六千人。减到那里去？还不是在中国境内，中国境内地方很多，一个城市，一个农村，还是到农村为主，因为工厂一下子不能容纳好些人。【1947】

在10月31日讲话的结尾部分，毛泽东一口气点了一连串党内“坏人”的名字，不过，还是说了邓小平的几句好话：

不要以为中央出了王明就没有好人了，陕北不要以为出了高岗就没有好人了。共产党出了一个陈独秀，认识他的人恐怕不很多，总理认识吧？（周恩来：我认识，康老也认识）将来写党史，陈独秀的名字没有恐怕也不好。开始是他，我们讲他不好是后期不好。他整个思想是社会民主党的思想。

不要以为我们这个党出了陈独秀、瞿秋白、王明、李立三、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张闻天等人，就说我们党不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我看不能这样说。

坏人是有的，开头不是当作坏人出现的。井冈山两个师长，范××、杨××，还有两个团长都叛变了。有这么多叛变的，井冈山矮了一截吗？我看没有！我前几年去过，还是那个样子，还是那么高。

这次又清出了刘邓陶彭罗陆杨贺彭这些人。邓小平大家要开除他，我有点保留。应该说邓小平同刘少奇有区别，事实上也有些区别。要开除一个人很容易，我们一举手那还不容易？你们要开除，将来开除可以嘛，我是有保留的。至于怕他造反，我看不要怕。他造不起来。邓小平的特点是太脱离群众了。我这个思想可能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我给邓小平讲几句好话。不过，邓是摇鹅毛扇子的，真正决策的还[不]是他，北京来了，招降纳叛他是有份的，“八大”搞招降纳叛。“七大”搞招降纳叛是刘少奇、彭真搞的。那时审查党代表，是刘少奇、彭真，他们还在延安开了一个白区工作会议。

【1947】《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页4。

过去我跟一些同志讲过，对贺龙是一批二保，因为他是二方面军的代表。现在看来贺龙这个人不能保了。因为他搞的事那个时候我们还不清楚，从成钧、许光达、廖汉生等揭发的材料看，他是破坏我们这个军队的，他背地里搞一些事情，篡军、反党企图是有的，但没有来得及。有贺龙、刘震、王尚荣、许光达这些人，不要扯这了，就到此为止，散会。^{【1948】}

三、批准中央专案小组关于刘少奇的审查报告

八届十二中全会的一个重要议题，是批准中央专案小组关于刘少奇的审查报告。这个审查历时近两年，主要是审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1968年5月间，毛泽东最终相信了“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制造的材料。5月20日，毛称，“刘少奇这个案子，现在差不多了。”7月下旬左右，中共中央领导层认可了刘少奇的“罪名”。^{【1949】}

10月18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正式向全会提交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报告列举了刘少奇历史上的三大“罪行”：

(1)“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叛变”。报告说，刘少奇于1925年11月，“借口养‘病’”，“私自从上海潜逃长沙”，12月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湖南省省长、军阀赵恒惕亲批“斩决”，迫使他完全接受“活命的条件”，“投降了敌人，背叛了革命”。随后，“奉赵恒惕的旨意，捧着赵恒惕赏赐的《四书》，离开湖南前往广州，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重新钻进党内来”。

(2)“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充当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汪精卫、陈公博的走狗，进行了一系列出卖工人阶级、破坏革命的内奸活动”。报告认定，刘少奇在1927年大革命紧要关头，窃据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的职位，充当内奸，破坏工人运动。列举的“罪名”是：①在“四三”惨案后，为日寇保镖；②与汪精卫、陈公博勾结，被指定为“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向敌人献策调走武汉工会骨干，解散工人纠察队；③为掩盖其“内奸面貌”，还演出了一场假逮捕的“苦肉计”；④在武汉“七一五”事变前，受汪精卫指使，“躲往庐山”，“继续进行贩卖勾当”。

(3)“一九二九年窃据满洲省委书记时的大叛卖”。报告称，刘少奇1929年8月22日在沈阳奉天纱厂被捕后，供认自己是满洲省委书记，出卖了省委领导成员

【1948】《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页8-9。

【1949】《毛泽东传（1949-1976）》下，页1536。

和所属党组织，并向统治阶级“积极出谋献策”，张学良“颇为赞赏”，因而释放；由于他提供情报，“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捕被杀”；还说他按照敌人旨意，“利用中东路事件，配合进行反苏反共”。

审查报告称：“以上，刘少奇在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叛变革命，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的罪行，都经过反复查实，证据确凿，铁案如山。长时期以来，刘少奇使用各种卑鄙无耻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段，掩盖他的这些罪行。刘少奇在一九五二年写的简历底稿中，把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履行投降条件离开湖南，写成‘多方营救，驱逐出境’；把一九二九年在奉天‘被一叛徒出卖’投敌，涂改成‘在罢工中’被捕。刘少奇利用他窃据的职权，对他叛变投敌充当内奸的知情人，大批的加以包庇，重用，对即将暴露他的叛变罪行的杨剑雄等人，则杀人灭口。刘少奇还指使叛徒安子文等在解放后秘密销毁许多敌伪档案。然而，这一切，今天都已完全破产。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的丑恶面目，已经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10月31日，全会在最后一天通过决议，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提交的审查报告，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全会结束后，刘少奇在报刊上被公开点名批判。翌年11月12日，重病中的刘少奇在河南开封囚禁处含冤去世，终年七十一岁。

四、对“二月逆流”的再批判

对“二月逆流”的再批判，本来并不在全会的议事日程中，但在全会进行过程中被重新提起，成为一个重点问题。

10月17日，朱德、陈毅、陈云、李富春、叶剑英、徐向前等在全会分组会议上因“二月逆流”问题受到围攻批判。康生在全会第一小组会议插话时称，“二月十六日大闹怀仁堂，十六日前就酝酿了。当时有两个地方，富春同志讲了，在他家开了三次会，是俱乐部，另外一个地方是京西宾馆，军队干部开会，徐向前在会上叫干部有什么意见尽量讲，表面上对着中央文革，实际上是反对主席、林副主席，反对十一中全会，反对文化大革命。京西宾馆是个中心，富春家是个中心。（文元同志：一个是京西宾馆，一个是国务院的一部分。）徐向前二月十三日讲，还要不要军队？不要军队，我回家去。（文元同志：天塌不下来，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在会上拍桌子。就在这时内蒙不是在闹嘛！要开军队包围报馆，就是徐向前下的指示。四川用飞机撤的传单，是甘渭汉起草的，叶剑英批准的，接着抓了十万人。在会上赵永夫介绍抓人的经

验，当典型。这里面究竟是那个搞的？‘二月逆流’大闹怀仁堂也不是谭震林第一炮。首先打第一炮的是叶剑英，说‘不教而诛’。第二炮是徐向前，第三炮是谭震林，陈毅、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都开了炮。徐向前他怕军队搞乱吗？他‘保护’老干部吗？”【1950】

10月17日，叶剑英在中南组会议上遭到围攻、批判。他对一些人的质询和围攻作了解释和回答，说：对这个运动，我不理解，跟不上，把支流看重了，我有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右倾思想，但我同他们是组织上无联系，思想上有共鸣。我不同意群众对领导干部乱批乱斗，是为了保护干部。1967年初解决青海问题、成都问题、万县问题，我是担心军队搞垮了，是想保护军队。对叶剑英这些解释和回答，许多人十分不满，继续进行围攻。10月18日，叶剑英借故不到会，向中南组递交书面检讨发言，被迫“检讨”在对待中央文革、处理青海事件、成都问题等方面的“错误”。叶剑英承认自己“对中央文革的态度不是拥护的，而是反对的”！10月22日，叶剑英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不得不向中南组递交“第二次书面检讨发言”。【1951】

10月28日，康生在全会第四小组会上发言时严厉批判“参与‘二月逆流’的人”时称：

刘、邓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妄图从内部进行颠覆，篡夺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权，复辟资本主义，“二月逆流”的干将们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继承者，同志们看到“二月逆流”的成员并不是从国外派进来的敌人，而是民主革命时期一道战斗的同志，就是这样一些所谓老同志进行了“二月逆流”的罪恶活动，危险性也就在这里。

“二月逆流”的性质是很严重的，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是和平演变的预演。1956年的二月四日赫鲁晓夫在苏联二十大上作了反斯大林的报告，那是一次反革命改变的“二月逆流”，随着这种逆流，社会主义的苏联就一步一步地迅速地全面地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蜕化为社会帝国主义。在我们国家里有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坚强领导，中国的“二月逆流”的干将们想要像赫鲁晓夫那样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绝对办不到的，尽管在一定的時候，他们可以起一定的干扰和捣乱作用，但是他们的面目很快被揭露了，他们的阴谋很快被粉碎了；清算了“二月逆流”的罪

【1950】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小组会议上的插话（节录），1968年10月17日。《“文革”十年资料选编》上册，页276-277。

【1951】卢荻：《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后的叶剑英》。《百年潮》，2012年第8期，页36。

恶活动，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参与“二月逆流”的人，我们希望他们翻然悔悟，痛改前非，但是阶级斗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尽管他们现在赌咒发誓说愿意改正，又假定他们能够作出较好的书面检讨，那也还是不能保证，一旦时机来了，他们又可能再反复，最根本最可靠的保证，就是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武装亿万革命群众，迫使那些妄想复辟的人不敢乱说乱动。^{【1952】}

相对于文革极左派，毛、林（尤其是林）对“‘二月逆流’的几个老同志”态度还是比较缓和的。10月26日，林彪在全会讲话中称：

毛主席原定在一九六七年三、四月份见眉目的这种打算，由于“二月逆流”的出现，使毛主席这一伟大战略部署受到了严重的干扰。

他们大闹怀仁堂，毛主席在二月十八日召见他们，指出“二月逆流”黑干将的错误，严肃地进行了批评，中央文革碰头会也多次对他们批评，全国群众都声讨“二月逆流”。“二月逆流”的破产，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这次八届十二中全会严肃批判、清算“二月逆流”，是完全必要的。如不批判，这次文化大革命就要流产。但参加“二月逆流”的几个老同志，除谭震林外，他们同彭德怀、贺龙那还是有点区别的。他们犯了错误，但毛主席宽大为怀，允许他们改正，毛主席、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意见：一是严肃的批，但还要保，并希望选他们为“九大”代表。但他们应更加警惕，不要轻松起来，把尾巴翘起来，坚持错误不改。今天会议中间还有几位职务较高的老同志，一贯有右倾的错，他们也应当接受教训，同时毛主席也希望选他们为“九大”代表。^{【1953】}

10月31日，毛泽东在全会讲话时称：

在这次全会上，有犯错的同志说明他们的问题，大家对他们有些质问，他们答复，再质问，再答复，经过几次反复，问题比较清楚了。每天都有简报。

【1952】《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页33。

【1953】《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页21-22。

这件事，要说小么，也不算小，你要说了不起么，依我看也不是什么了不起。在北京的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是一种自然现象。他们有意见么，总要说嘛！几个人在一起，都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军委副主席，讲一讲，也是允许的，我看党的生活也是允许的，是公开的，“两个大闹”：一个大闹怀仁堂和一个京西宾馆，就是公开讲的。没有什么秘密，有些细节大家不晓得，我过去也不清楚。细节，如往来多少次，有过什么交往，不要过分注意追这些，不要把党内生活引导到细微末节，大问题不大注意就不那么好了。这不是一件小事，你说天就塌下来，地球就不转了？！我看不一定，地球照样转，六七个人还能使地球不转吗？

在接下来的讲话中，毛称“我们还是推荐你们各地把他们选作为代表”：

统统是左派我不赞成，没有那么纯。那有的事。那样的纯也不见得。我们的党经过这次文化大革命，我看比较纯了，从来没有这么搞过。但太纯了也不太好。比如“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志们如不参加我看就是缺点。所以我们还是推荐你们各地把他们选作为代表，陈毅同志我看他讲话说，他没有资格。我看你有资格，你就是右的资格！你对“九大”代表三个条件中的第二条，不那么合，可以协商嘛！有这么少数人参加，我看有好处。【1954】

五、全会的氛围

有关全会上对刘少奇及“二月逆流”批判的现场氛围，列席全会的军委办事组成员邱会作后来回忆称：

在会上，真是畅所欲言，各种意见都可以发表。如叶剑英对朱德就发表了系统的批评意见。胡耀邦对刘少奇做了长篇的批判和在刘少奇的问题上所犯的错误的自我批评，王震批刘少奇也相当厉害。还有不少人，对刘少奇和“二月逆流”都提出了系统的批判，特别是对刘少奇利用职权打击老干部表示出极大的愤恨！

第三，是对刘少奇的结论。全会对刘少奇进行了认真的批判，印发了大量审查材料。周总理对刘少奇也说了很重的话。那些材料，极大多数有时间、地点、事实真相，并有旁证材料和实物照片。当时，对材料本身是没有不信的理由的，后人对那些材料的否定，从政治上讲也是正常的，刘少奇受了极大的冤

【1954】《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页5-6。

枉，现在平反完全应该。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冤枉刘少奇的问题上责任不能乱推，不负责任地推给林彪、江青，使别人对我们党的公信程度有质疑。

（二）批判“二月逆流”。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批判“二月逆流”是重点。这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其实在批判“二月逆流”的时候，大家发言都很积极，被批判的人也是什么都承认，自己骂自己，骂得狗血喷头，尤其几个元帅，他们批判自己甚至比批判他们的人调子还高。

总理在会上批判“二月逆流”也是重头戏，他挨个批判了这些老同志，尤其是几个元帅，总理批得很厉害，也很具体。在我的记忆里，总理对聂帅特别不满意，说他把国防科委系统搞得乱七八糟，甚至说他把赵尔陆给逼死了。对于总理的讲话，我当时就有些不同的看法，因为我认为在坚持部队不能乱，在保护军队老干部方面，叶帅、聂帅和徐帅的态度和做法是有区别的。^{【1955】}

列席全会的中央组织部业务组负责人郭玉峰回忆称：

一九六八年某月某日接到中办通知，叫我参加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某月某日开会，我坐在后排，与郭沫若同志在一排坐。我对郭老久闻大名，但未见其人。这次相见也无多少话可说。会议开始了。陈伯达说文化大革命取得很大成绩，应归功于江青同志。而江青则说功绩应归于陈。二人相互吹捧一番。到写会议文件很多人就把文革功绩归功于文革小组。组长是陈伯达，副组长是江青。会上毛主席问苏振华同志情况。前边不知什么人讲了他一些坏话。会上印了刘少奇的罪行材料。通过了开除刘的党籍决定。有人提开除邓小平党籍。毛主席说：开除党籍很容易。一举手就行了。可是邓小平有两大功劳，一他会反修，指他带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说小个子打败了大个子苏斯洛夫。二是他会打仗。还是不开除党籍好。主席又很风趣的问汪东兴把邓给办公厅工作怎么样？汪东兴当即回答不要、不要。他还说邓很小气。下放时他把窗帘都拿走了……等。这时张云逸同志发言批判邓小平在右江红七军工作时逃跑。说当时白色恐怖很厉害，他不辞而别了。毛主席听不清他的发言。周恩来同志叫张云逸同志到主席跟前去讲。他讲了后，毛主席又问陈毅同志来了没有？陈说来了，我反过主席。毛主席说你反过几次。陈答我反过六次。毛主席说反我多少次我也团结你。毛主席问郭沫若，郭老，你是尊孔的，我赞成范老范文澜同志，他是反孔的。在这次会议后我编在黄永胜、姚文元，

【1955】《邱会作回忆录》下，页601-602。

徐向前、刘伯承、王震、丁盛小组里。会上丁盛批王震在新疆建设兵团的问题很系统很严厉。我把中组部文革中揭发的问题和中央安子文专案组审查的问题作了发言。黄永胜批了徐向前。参加这样高级党的会议我是头一次，党的会议上应该说是知无不言，言者无罪的。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正常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批评和反批评的自由。会上王震找我要了几本中组部编的组工手册语录。他看后说很好。这个会议上批了二月逆流。毛主席说：你说说，他说说好吗。说了就行了吗！我听了感到党内民主很好。什么二月逆流错误啊？说说就算了。陈毅还检讨了苏联大使尤金在某年某月给他谈话叫他在毛主席不在北京时搞什么事。陈毅同志曾向毛主席讲过汇报过。尽管是过了一段时间讲的，总之多大的事给组织上讲了，批评批评检讨检讨你说说我说说就算了。【1956】

八届十二中全会是为召开中共九大作准备的。10月31日，全会通过关于中共九大代表产生的决定和附件，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全会决定印发全党的党章（草案）中称，“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关于以上党章（草案）确定的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康生在10月28日全会第四小组会上发言时解释称，“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为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百年大计，是关系到我党、我国今后命运，关系到我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林彪同志很谦虚，他要求把党章（草案）中提到他的那一段删去，我们的意见这一段还需保留。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全党公认的，是当之无愧的。”【1957】

10月31日，全会公报宣布：“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1958】

【1956】郭玉峰：《在中央组织部工作十年回忆录》，未刊稿。

【1957】《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页30。

【1958】《人民日报》，1968年11月2日。

第八十二节 军管总政

一、总政机关完全瘫痪

1967年下半年，总政机关已完全瘫痪。总政当时所有的领导人，被戴上大小“阎王”的帽子。萧华被宣布为大阎王，刘志坚、徐立清、梁必业、傅钟、袁子钦等是二、三、四、五、六号阎王，给正副部长戴上“判官”的帽子，给正副处长戴上“牛头马面”的帽子，给一般干部和群众戴上“小鬼”的帽子。总政40多名副部长以上干部被反复批斗，20多名副部长以上干部立了专案，长期进行关押、审查，总政治部副主任袁子钦被迫害致死。^{【1959】}

1967年11月21日，经毛泽东、林彪批准，军委政治工作小组成立，刘锦平为负责人。该小组作为临时过渡性机构，根据林彪指示，“主要精力是抓好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熟悉了解干部这两项中心工作。”同时，“在中央文革直接领导下，加强对文艺单位的政治思想工作”，“指导总政治部机关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帮助总政治部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搞好革命的大批判、革命的大联合、本单位的斗批改，坚决斗倒斗臭总政治部机关党内一小撮走资派。”^{【1960】}

1968年1月25日，总政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斗批筹备处向军委办事组、政工组提交《总政机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内称：“在这一段时间内，我们还对副阎王、判官和牛头马面进行了揭发批判斗争。六个副主任群众都提出打倒，五十一名二级部领导干部中（不包括报社），群众提出打倒的二十八人（其中叛变自首五人，特务二人，历史反革命一人，假党员三人），占正副部长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四点九。一百五十七名正副处长中（不包括报社、画报社、文艺社、军人俱乐部），群众提出打倒的十名，占正副处长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四。以上，群众提出打倒的共四十五人，占二百一十五名副处长以上干部的百分之二十一。”

二、军管小组进入总政

1968年10月22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发出中发〔68〕150号中共中央文件《关于任命总政治部军管小组组长的通知》，任命王宏坤为总政军事管制小组组长，刘江亭为副组长。^{【1961】}

【1959】《“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页54。袁子钦1968年2月被关押，遭受非人折磨，经三〇一医院抢救无效，于2月23日含冤去世。

【1960】军委政治工作小组：《关于贯彻执行林彪对政治工作指示的报告》，1968年1月3日。

【1961】王宏坤，时任海军第二政委。刘江亭，时任陆军第二十一军副军长。

1973年4月25日，时任驻陕西的陆军第二十一军军长的刘江亭，在参加中共陕西省常委（扩大）批林整风会议期间写的《我的检查和交代》中，谈及军管小组进入总政的情形时称：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五日下午，我们刚到北京两三天，林贼死党黄永胜、邱会作就在京西宾馆接见我们负责搞军管的五个人（王宏坤、刘维成、赵天元、潘德田和我）^{【1962】}，给我们交了五项任务：清队、整党、大批判、人员分工和档案材料问题。在交代任务时，他们极端仇视总政广大革命群众，向我们灌输了林贼提出的“要战斗，要突击，要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的反革命纲领。他们恶毒地说：“总政水深王八多”，“是一筐烂梨，要先倒出来再拣”，“要狠揭总政的阶级斗争盖子，彻底砸烂总政这个阎王殿”。他们还说：“五一三”是重大政治事件，要以“五一三”站队划线；总政坏人很多，整了很多“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你们要严加管理，防止“毒素”扩散。当时，黄永胜宣布：王宏坤任军管组长，原则上挂帅，刘江亭任副组长，负责具体工作。同时还向我们交待说：“你们进总政以后，要依靠‘斗批筹备处’”（这个“筹备处”是他们一手扶植和操纵的）。后来，黄、吴、李、邱一伙在十一月三日、七日接见我们时，又进一步交待要依靠那些人，他们把“斗批筹备处”的头头和他们的亲信芦前安、魏建群、辛国治、萧麦萍、林谦、国光等人说成是“好干部”，要我们“依靠这些人，重用这些人”。同时，他们还点了一些所谓“坏人”，并说秘书处和政工研究室是萧华的“黑心脏”，保卫部是专他们政的，联络部是联络敌人的，干部部是配黑班子的，宣传部的坏人很多，等等，把总政说成漆黑一团，叫我们不要相信总政的广大革命干部和群众。他们还别有用心地说：“你们进了总政，要提高阶级斗争警惕性，头脑不能太简单。”就这样，我们带着林贼提出的这条反革命路线进入了总政。

进入总政后，我根据黄、吴、李、邱一伙的黑指示，就找“斗批筹备处”的头头和林谦、萧麦萍等人了解总政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我们到军委办事组汇报，我比较系统地汇报了所谓总政“阎王殿”的问题和军管工作打算。黄永胜一伙听了我的汇报后比较满意，这说明我的思想符合他们搞阴谋的意图。当时，我们感到军管人员少，工作展不开，他们就确定两条措施：一是增加军管人员，从兰州军区和二十一军调六十个人和一个连队，又从总后军工厂调二十个女同志作为工宣队，实际上是加强了在总政实行

【1962】刘维成时任陆军第九十一师步兵第二七一团（“济南第二团”）政委，赵天元、潘德田时任职未详。

他们反革命阴谋的力量；二是把总政机关和直属单位编成连、排、班，指定他们所谓可靠的人担任连排领导职务，并组织一批“骨干力量”，加强对总政人员的控制。一九六九年元月下旬，增加的军管人员全部到齐，办了一周的学习班，我亲自向大家传达了林彪及其死党黄、吴、李、邱一伙“要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的黑指示和我所了解的总政文化大革命情况，给军管人员灌输了这条黑线。

军管小组进驻总政后，对总政机关和直属单位 767 名干部进行了专案审查，其中 17 人被迫害致死，总政 95% 以上的机关干部和一大批直属单位的干部被赶出总政，分散处理到全国 2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部队单位。^{【1963】}

三、毛泽东对总政的“一二八”指示

刘江亭在《我的检查和交代》中称，1969 年 1 月 28 日，毛泽东对总政问题作了“一二八指示”称：

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总政的文化大革命十分关怀，于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八日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指出：对总政就是要像清华一样，不要把他们看成落后单位，不要封锁他们，要向他们开放，要向他们做工作，工作做得好，落后单位还可能赶到前头来。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是非常英明、非常正确的，指明了总政斗、批、改的方向，彻底揭露和批判了林彪一伙“要砸烂总政阎王殿”的阴谋。

林贼及其死党对毛主席的“一二八”指示怕得要死，千方百计地进行抗拒和干扰。他们迟迟不传达“一二八”指示，经过精心策划，一直拖到一月三十日晚上，才找我们军管组人员到军委办事组开会。会议开始，他们先叫我们汇报工作，还是大讲总政干部中坏人很多，研究如何加速“砸烂总政阎王殿”等等。会议开了近三个小时，只是在会议最后，死党吴法宪才把“一二八”指示给我们草草地念了一遍，当时，还有许多同志没听清楚。更恶毒的是，吴法宪对封锁总政的问题，造谣说，自军管后军委办事组已向毛主席报告过八次总政的情况，并借机攻击周总理。在传达毛主席的“一二八”指示时，黄、吴、李、邱一伙都不表态，也不提出如何贯彻。当时，军管组同志提出是否可以“一二八”指示印发给大家学习，吴法宪说：不准翻印，不准上街，不准上街。他们妄图封锁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抗拒毛主席的指示。

【1963】《“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页 54-55。

我们从军委办事组回来后，即向总政机关干部传达。我主持大会，但没有亲自传达“一二八”指示，而是叫刘维成同志传达的。在他传达之后，我极为错误地提出：要以“一二八”指示为动力，动员群众，以实际行动加速砸烂“阎王殿”。我在给各连领导干部传达时，更是十分错误地传播了死党吴法宪恶意攻击总理的话，放了毒。在传达“一二八”指示中，我们虽然也开了两次总政全体人员的传达动员大会，组织大家学习了半个月，但是，只是口头上讲要贯彻“一二八”指示，实际上还是落实到“砸烂阎王殿”。在我的错误思想影响下，军管组的同志不仅没有认真学习“一二八”指示，制定贯彻措施，反而对总政的干部有对立情绪，当总政有的干部提问“是谁封锁总政”时，我们军管组有的同志说：“你们不要误会”，甚至有的还说“我们准备被你们赶走”。王宏坤同志和我还布置军管人员“要注意群众的动态”。后来，在写传达学习“一二八”指示的情况报告时，不仅拖了很久，写得很空，而且实际上是向毛主席、党中央作了假报告。

当时，我虽然也意识到毛主席的“一二八”指示是针对林贼死党黄、吴、李、邱一伙说的，但由于自己对他们一伙坚信无疑，追随很紧，一开始就接受了他们“砸烂总政阎王殿”的黑纲领，中毒很深，因而，把“一二八”指示误解为只是对他们工作上的一般批评，认识不到是两条路线斗争。加上自己跟人不跟正确路线，认为不按他们一伙的黑指示干，军管就搞不下去。尽管当时看到总政广大干部听了毛主席“一二八”指示后激动得热泪盈眶，不少同志泣不成声，自己心里也有所触动，但我还是站在林贼一伙的反动立场上对待“一二八”指示，同总政广大革命群众的感情是截然不同的。我没有执行毛主席的“一二八”指示，使总政军管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我犯了极大的罪过。

四、销毁了大量档案材料

刘江亭在《我的检查和交代》中称，军管小组进入总政后，根据黄永胜、吴法宪的指示，销毁了大量档案材料：

销毁他们的罪证材料，这是黄、吴、叶、李、邱一伙蓄谋已久的反革命阴谋，也是交给我们军管组的一项重要“任务”。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们就想把这些罪证材料搞到手，但是没有得逞。军管组进驻总政之前，他们就具体交待：总政有人整了很多“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要严加控制，防止“毒素”扩散。他们所指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就是林贼及其死党

黄、吴、叶、李、邱等一伙坏蛋；他们所说的“有毒”材料，就是林彪及其死党的罪证档案；他们要“严加控制”，就是怕在群众中暴露自己的反革命面目。我秉承黄永胜一伙的黑旨意，军管组一进总政就采取控制措施：封存了所有文件资料、档案；收缴了工作记录本；把总政干部集中起来办学习班，规定不准回家、不准串连，并切断了电话。到了一九六九年二月下旬，根据黄、吴、李、邱一伙的黑指示，为了进一步清查和控制所谓“黑材料”，又把总政干部包括保密员都搬到红山口高等军事学院搞清队，同时收缴了全部文件柜、办公桌的钥匙，指定一部分“可靠的人”留下看房子和清查档案材料。在“紧急战备”前的半年多时间里，我们一方面清查“死材料”，一方面抓“活材料”，对整过林贼及其死党材料的人进行追查和批判，并不断向黄、吴、李、邱一伙汇报清查情况。

一九六九年十月，林贼发布所谓“第一号令”以后，黄永胜一伙加紧搞反革命阴谋，他们背着毛主席、党中央，以战备为名，要我们抓紧清查和销毁他们的罪证材料。到十二月初，军管组给军委办事组写了一个报告，请示“有毒”材料如何处理，他们批示由军管组销毁。开始，我叫鲍奇辰、徐元亮、邱永裳等同志办这件事，但他们都有顾虑不愿干。以后，我就叫秘书杨志文同志管这件事，他也很担心，对我说：“我们不要太积极啦，要防止人家以后把我们甩掉。”当时，我思想上也有些顾虑，明知烧档案是违反中央规定的，怕将来万一出问题会沾上自己，但是，为了给黄、吴、叶、李、邱一伙效劳，人家不敢干我干，人家不积极我积极。由于我思想上多少还有些顾虑，加上清查登记目录的工作也比较费事，因而拖了一个多月，这些材料还未销毁。到了一九七〇年元月十一日，清查登记目录的工作基本搞完，我亲自给黄永胜写信，向他报告清查“黑材料”的情况，并提出准备在元月十五日焚毁。我以私人名义给死党黄永胜写信，既是为了讨好他们，也是为了进一步取得所谓合法手续。接着，我又于元月十三日，亲自给李德生同志写了一封含糊其词的信，请示如何处理这些材料。后来，我又把请示销毁材料的报告批示拿给黄志勇、田维新副主任看，目的也是让他们知道这件事，以后万一出了问题，首先是你们上边这些人负责，最后才轮到我刘江亭。总之，我既想为黄永胜一伙干坏事立功，又千方百计地想为自己推卸罪责。

大约在一九七〇年元月十五日，黄永胜的秘书打来电话，叫我们把清查“黑材料”的情况附上目录，再写一个正式报告。到十八日，这个报告就批下来了，黄、吴、李、邱伙改变了原来的主意，确定：有关各军、兵种和各军区的

材料送给他们自己处理；总政的材料暂时保留待后处理。我认为这样比我们军管组直接销毁好，就很快派人把近三千份档案材料分送给各家，其中空军、海军、总后的占多数，还有总参、工程兵、装甲兵、广州军区等单位。这些材料都是黄、吴、李、邱的老婆或他们的亲信收下处理的。后来，他们利用这些材料，对揭发他们罪行的同志进行迫害，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可见，黄永胜一伙改变处理材料的方法，是一个更大的反革命阴谋，而我为他们的阴谋出了力。

在销毁林贼死党的大量罪证材料中，主要有：关于空军、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的材料，其中揭露吴法宪、李作鹏等人陷害领导干部、阴谋篡军夺权的罪行；关于黄永胜在车口会议上的讲话材料，黄在这次讲话中竭力鼓吹林贼搞大比武的反动路线；关于邱会作乱搞男女关系的罪证材料；关于叶群随林贼在长春休养时与特嫌分子有联系的罪证材料等。更严重的是，我亲自销毁了黄永胜和北京女特务周述蓉有关系的罪证材料。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一日晚上，死党黄永胜打电话给我，叫我把他的“黑材料”送给他看，第二天我送去这份材料，后来根据他的黑旨意，我亲自把这份材料烧掉了。

我明知销毁档案事关重大，违反党纪国法，但我在政治上信任他们，总想保护他们，同时，为了讨好他们，取得他们对我的信任，因而我积极参与了他们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他们很早就想毁灭这些罪证而没有办到，而我做了他们的帮凶，达到了他们的罪恶目的，敌人干不成的事我替他们干了。死党李作鹏曾说：“凭这些材料，十年以后，还可以把我们李、王、张打成反革命。”我给党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

五、关于清查唐益、李英儒问题

刘江亭在《我的检查和交代》中透露，对被视作“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骨干分子”的原总政联络部办公室主任唐益和文化部创作组长李英儒，军委办事组是有意保护的，有意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对唐、李穷追猛打、不依不饶的，是中央文革江青等人：

原总政联络部办公室主任唐益和文化部创作组长李英儒，都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骨干分子，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进行反革命活动，疯狂反对总理和江青同志，破坏革命样板戏。中央指示，李英儒交群众批斗，对唐益实行“拘留批判”，关在拘留所里。但是，林贼死党黄、吴、李、邱一伙却对抗中央指示，千方百计地对唐益、李英儒进行包庇，对他们的反革命罪行，一直

没有审查和批判，还让李英儒长期在家“养病”休息，不管不问。后来，交给了总政军管组，名义上是进行审查，实际上是对唐益、李英儒继续实行保的方针。我执行黄、吴、李、邱一伙的黑指示，参与了包庇这两个反革命分子的活动。

一九六九年二月，原军委办事组政工室通知：把唐益、李英儒交给我们军管组。黄、吴、李、邱一伙既不向我们说明唐、李有什么问题，也不交代对他们的审查方法，只是简单地要我们审查唐、李的历史问题和“五一六”罪行。并且规定：查历史问题要结合总政的运动来搞；对他们的“五一六”问题，一定要在小范围内搞；军管组不能擅自外调，要调查的问题和单位要经军委办事组确定等等。一开始就对唐、李问题的审查设置了许多障碍。当时，我理解他们的意图是：对唐、李作为人民内部矛盾看待，查一下证明没有事就解放他们。因此，我对唐、李的问题也不积极组织调查，更没有认真批判。我虽然把审查李英儒的任务交给了一连军管组，但是，指示他们“结合清队先搞他的历史问题”，以后也没有具体过问。实际上继续听任李英儒在家装病休息，连历史问题也没有认真进行审查，一直到五、六月，在群众的强烈反映下，才把他搞到学习班里进行审查。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军委办事组把唐益从拘留所里放出来交给总政军管组，就戴上了帽徽领章，实际上已经把他“解放”了。我把他交给了四连军管组，虽然也建立了专案，规定唐益不准回家，要他到学习班好好交代自己的罪行，但是，对他的“五一六”罪行并没有认真进行内查外调。所以，直到八月份，对唐、李的“五一六”罪行没有查出一点结果来，只是初步查出李英儒是个投敌叛变的可疑分子。

一九六九年七月（也可能是八月），据说中央文革追查唐益是谁叫放出来的，是谁叫戴上帽徽领章的。林彪死党黄、吴、李和温玉成，慌忙召我和管唐益专案的两个同志到京西宾馆，查问释放唐益和他审查的情况，最后，只交待我们要唐益“停职反省”，再没有说别的。当时，我已经察觉这里边有问题，感到事情比较复杂，心里有些紧张，但又想：对于唐益的处理，都是按照黄、吴、李、邱一伙的“指示”办的，情况也都向他们汇报过，有什么问题由他们承担责任，找不到我头上。事实上，他们把我们叫去查问，不过是一场“贼喊捉贼”的把戏，只是为了瞒哄中央，掩盖罪责，继续包庇唐、李。我回去以后，也只是要四连军管组宣布了唐益“停职反省”，仍然没有对唐、李进行积极的审查和批判。

一九六九年八月底，中央芭蕾舞团和中国京剧团的军代表，先后来总政军管组调查对唐、李的审查情况，并告诉我们李英儒是“五一六”文艺口的副司令兼政委，矛头指向总理和江青同志。在此之前，我还听说过李英儒参加了反革命的“北京图书馆事件”，整理攻击江青同志的黑材料；又听说江青同志在八月中旬亲自召集样板戏团的同志开会，研究抓“五一六”问题。这些事一联起来想，我感到两个剧团来军管组调查，实际上是江青同志在抓这件事，明显地看出了黄、吴、李、邱一伙对唐、李的态度，是對抗中央文革指示的。因此，心里感到非常紧张，认为这个事搞得“很被动”，“弄不好会出大问题”。但是，由于我已经陷在林彪死党的贼船里，根本没有勇气向中央揭发黄、吴、李、邱一伙的阴谋，交代自己的错误。相反，还是想既不得罪黄、吴、李、邱，又竭力掩盖自己的罪责。九月初，我交待军管组同志对来总政调查唐、李问题的同志要热情接待，同时，找两个专案组了解情况，并交待他们抓紧对唐、李斗一斗，以此来应付中央。直到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晚上，黄、吴、李、邱一伙听取我们汇报唐、李问题时，死党黄永胜还说：“李英儒的问题要在小范围内搞……”。“唐益这个人如果没有别的问题，至少是没有革命热情，斗志衰退”。还说：“不要拿到中央乐团去斗，拿到地方就不好啦……总政会斗嘛。”死党吴法宪也说：“李英儒问题查清后，该保就保，该打倒就打倒，能挽救就挽救，能不打倒就不打倒。”仍然对抗中央指示，为保唐、李定调子、划框框。我完全贯彻了他们这些黑指示，对唐、李假批真保，“五一六”问题始终没有查清楚。到十一月中旬，中央批示把唐益、李英儒交给中央乐团和中国京剧团进行批斗，很快就查清了他们的“五一六”罪行。

在对待唐益、李英儒问题上，一个要批，一个要保两种不同的态度，反映了两个司令部的尖锐斗争。我在这场斗争中，站在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执行了黄、吴、李、邱一伙的旨意，包庇了坏人。而对于总政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我却坚决按照“砸烂总政阎王殿”的黑纲领，把他们摆在自己的对立面，对许多同志进行了迫害。

我跟着黄、吴、李、邱一伙，大讲“五一三”是个重大政治事件，在群众中以“五一三”站队划线，凡是反对“三军”观点的同志，在清队、整党中重则批判，轻则检讨。在清队运动中，我提出“总政敌情严重”，“要深挖反革命”，“大抓美特、苏特、蒋特、日特……”，“大揭鬼人鬼事鬼现象”，把总政说成是坏人很多，问题很严重，造成了互相怀疑、人人自危的气氛。我积极执行黄、吴、李、邱一伙的黑指示，对他们所谓“专无产阶级政”的部门和同

志进行了迫害。如原干部部处长李恩荣同志，因为在文化大革命前按照中央关于对军委副主席的秘书进行政审的指示，审查过叶群的档案，被林彪死党专案审查一年多。总政军管后，我秉承黄、吴、李、邱一伙的指示，继续对他进行了追查和批斗。原保卫部技术处长马联德同志，就因为批判林彪关于军队干部出了反毛主席的人是军队的耻辱这话没有阶级斗争观念，没有辩证法，因此被林彪死党关了起来，我们军管后仍对他审查、批判。尤其对于原总政保卫部，林彪及其死党把它看作眼中钉、肉中刺。林彪说过“保卫部是专无产阶级的政”，把它作为“总政阎王殿”里要砸烂的一个重点部门。一九六六、六七年就已抓了三个正、副部长。一九六九年三月到五月，死党黄永胜、吴法宪多次指令军管组对保卫部进行调查。我积极执行他们的黑指示，把保卫部列为重点，对保卫部干部进行了审查和迫害，对好几名副部长和正副处长实行了专案审查，有的还搞了所谓“群众专政”，对技术处的所有干事也都逐个进行了审查，弄得保卫部一片恐怖气氛。审查持续进行到一九七〇年一、二月，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有查出来，说明对他们审查的问题，都是毫无根据的造谣和诬蔑。我积极执行黄、吴、李、邱一伙“砸烂总政阎王殿”的反动路线，打击和迫害了许多同志，犯了严重的罪过，现在想起来，内心感到非常沉痛。

六、组建新总政

1969年12月，总政治部恢复办公，李德生任总政治部主任（正式任命时间为1970年4月）。这距离1967年11月军委政工小组取代总政治部，已有足足两年时间。

在李德生的任命公布以前，中央已任命黄志勇、田维新^[1964]两人为总政治部副主任。于是，李德生与两位副主任等一起，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一个能体现“五湖四海”的总政机关人员的组成方案，即大体上按从原总政机关选五分之一，原军委办事组政工组选五分之一，各大军区军兵种机关选五分之一，军师机关和团营各选五分之一的比例选调干部。按照这几个“五分之一”选定的正副部长是秘书长王迪康、副秘书长萧麦萍，组织部长李宝奇、副部长孙子斌，干部部长魏伯亭、副部长王如炎，宣传部副部长栗光祥、翟鸣武、刘永寿，保卫部部长蒋润观、副部长周学臣，群工部部长吕村夫、副部长李平。但这13人中没有从西北地区调来的干部，于是又从新疆军区调来宋英奇任群工部副部长。接着，又按照毛泽东不超过200人的要求，组织了精干的总政机关。编制方案为199人，既包括

【1964】黄志勇此前任装甲兵政委。田维新此前任沈阳军区副政委。

主任、副主任，又包括4个打字员，分成一个室（办公室）、五个部（组织、干部、宣传、保卫、群工）。

在总政机关恢复办公前后，军委办事组对总政工作也作过一些指示。1969年12月25日，黄永胜、吴法宪、谢富治在京西宾馆接见了总政治部全体干部，1970年1月10日，他们又听取了总政副主任黄志勇、田维新的汇报。^{【1965】}

刘江亭在《我的检查和交代》中，谈及组建新总政时干部选调经过：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死党邱会作通过原军委办事组干部室给我打电话说：要从原总政干部中抽调一百人左右参加组建新总政，条件是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好、出身历史好、工作水平高、年纪轻。各部都要照顾，每部要提出二至三名处级干部。这件事要刘副组长亲手办理，只能一个人知道，办好交给黄、田副主任。

这是黄、吴、李、邱一伙的一个阴谋，他们妄想“砸烂”原总政以后，通过阴谋手段，排斥异己，安插亲信，架空李德生主任，把新总政操纵在自己手里，达到篡军夺权的罪恶目的。但是，当时我却认为这是一件大事，一定要认真选留干部，把新总政组成一个拥护黄、吴、李、邱一伙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班子。虽然也感到这样背着军管组其他领导成员的做法不正常，但又认为这是军委办事组“首长”对我的信任，就积极执行他们的黑指示。我大搞非组织活动，首先找我的老部下、原干部部副处长王之光了解了总政干部情况，又给各连军管组长分别单独地交代了任务，分配了数字，提出了条件，要他们严格保密，办好把名单直接送给了我。然后又找黄、吴、李、邱一伙的亲信林谦、萧麦萍、国光等人征求了意见。最后确定一百三十多人的名单，向黄志勇和军委办事组干部室的邓××、王如炎作了汇报。我在推荐人员中，主要是以“五一三”划线，以拥护和支持“三军”为标准，当然绝大多数人还是好的，但是，对萧麦萍、国光、王之光等人，我特别为他们说了许多好话，以致像萧麦萍这样一个家庭出身和政治历史复杂的人，竟窃据了新总政副秘书长的要职。

在分配处理原总政干部中，黄、吴、李、邱一伙也施展了阴谋诡计，包庇坏人，重用亲信，搞宗派，拉山头，为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培植势力。我在这个阴谋活动中，完全听从他们的黑指示，为他们出了力。早在一九六九年

【1965】瞿定国、刘先廷：《曾经沧海：李德生调中央工作前后》，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页166-167。

一月，李作鹏提出要原总政青年部部长辛国治，说：“林×××信任他，文化大革命里他拥护‘三军’，工作水平高，能干……。”当时辛的问题还没审查清楚，群众还正在对他批判，我却毫无原则地让他调出去了，当了北海舰队政治部主任，不久又当了副政委，成了林贼的死党。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六日，军委办事组讨论原总政正副部长的工作分配时，死党黄永胜指名要原宣传部部长、反党分子姜思毅，把他分配到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当政治部副主任，不久，姜就投靠了林彪反党集团。死党吴法宪指名要原干部部副部长朱光和保吴的群众组织“八家”的头头魏建群，张秀川要林谦和国光。凡是这些死党指名要的人，我都满足他们的私欲，完全听从他们的安排，充当了他们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工具。

刘江亭还谈及，黄永胜指示要结束总政军管，催其离开总政回部队：

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二日下午，就是我送材料给黄永胜的那一次，他同我进行了大约一个半小时的个别谈话。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结束总政军管的问题，我向他汇报了总政干部的分配处理情况、军管人员的思想情况以及专案情况。最后，他提出要我尽快结束军管回部队去。我说：“大家都想走，光我一个人走不好。”他说：“不行，你要回部队去，要撤销军管，你要离开。”我说：“这问题我不好说，我一个人先走，下边有意见。”他说：“你这个人怎么老是粘粘糊糊提意见，叫你走你就走嘛，这里不需要一个副军长。”我表示服从命令，但提出军管工作还得有一个月时间，要到三月底才能走。黄永胜表示同意，并要我把他的意见向总政黄、田副主任汇报。

1970年3月，总政军管无疾而终。

王宏坤虽任总政军管小组组长，实为挂名，管事不多。王在“九一三事件”后侥幸避过了清洗，却在文革结束后受到处分。1977年6月，海军党委报经中共中央批准，在海军范围内对王宏坤等进行点名揭发批判。10月，中央军委免去王宏坤海军第二政委职务。1983年4月，海军党委上报了《关于王宏坤同志问题的审查结论及处理意见》，“建议给予撤销党内外的职务，行政上由五级降为七级或六级的处分，按大军区副职或正兵团职待遇离休。”1984年4月6日，中央军委纪委下达《关于王宏坤同志所犯错误审查结论和党纪处分的批复》：“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同意你们关于王宏坤同志问题的审查结论，决定给予王宏坤同志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4月18日，总政治部下达《关于王宏坤行政处分和离休的批复》：“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同意给予海军原第二政治委员王宏坤行政撤

职，由行政五级降为行政六级的处分。按正兵团职待遇离职休养。”1988年7月降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3年8月20日在北京病逝。

在总政军管小组实际负责日常工作的刘江亭，1970年回二十一军任原职，1971年7月升任该军军长。1973年批林整风时受审查。1975年9月降任甘肃省军区副司令员。1985年8月离休后恢复正军职待遇。1988年7月被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2019年2月4日在西安病逝。

第十章

1969-70：魃风骤雨

第八十三节 军队院校的调整撤并

一、毛泽东批准方案

1969年2月3日，军委办事组提交总参拟制的《军队院校调整方案》。经毛泽东批准后，2月19日，下发《军委办事组关于军队院校调整方案的通知》（军委〔69〕1号文件）称：

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了军队院校调整方案。现转发给你们，并将执行推广方案的有关注意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单位对院校的调整应有准备、有步骤地执行。对撤销合并的学校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

（二）各院校待清理阶级队伍大体告一段落即进行调整和处理。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南京军事学院由中央军委办事组处理，其余学校由各总部、军种、兵种调整和处理。广州体育学院、长沙政治学校由广州军区处理。

（三）各撤销院校的房产、营具、各种教学设备和一切公共财物均不准动用损坏。如要使用一律报总参谋部、总后勤部批准。^{【1966】}

《军队院校调整方案》称：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军队就是一个大学校，现在的学校应当减少。现将军队院、校调整方案报告如下：

一、军队现有学校（含飞行学校）一百二十五所。按学校的性质区分，计：指挥、政治学校四十五所，技术学校六十五所，飞行学校十五所。

二、调整学校的原则：①指挥、政治、体育、艺术学校一律撤销；②技术学校：凡是在部队能学到技术，一律在部队培养，高级技术学校（含维护修理学校）基本上保留；③撤销各军区的步兵学校，陆、海、空军的军、师建立小型教导队（机构很小，十人左右），担任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轮训部队干部。

三、根据调整学校的原则，全军拟保留学校四十三所。减少八十二所，占百分之六十五点六。保留的学校，计：军政大学一所，工程技术院校二十所，医务学校六所，兽医学校一所，飞行学校十五所，共计四十三所（详见附表）。

四、为了轮训中、高级干部及担负外训任务，建议成立一所精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这所学校的任务是：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轮训陆、

【1966】总后勤部财务部、军事经济学院：《军队财务史料（1967-1969）》，1994年，页490。

海、空三军的中、高级干部和担负外训任务。校址拟利用现在的高等军事学院。

五、学校调整方案经批准后，对撤销的学校在清理阶级队伍暂告一段落后，拟逐渐处理。处理方法：①有的整建制使用，如用于新建生产兵团、“五七”劳动学校等；②适合部队工作的干部即调出分配工作；③下放农村劳动锻炼。

对保留的学校必须坚决实行毛主席的教育路线、教育方针，进行彻底的教学改革，缩短学制，改革教材，改革招生（主要从部队招生）方法，精简机构，其措施待研究后再报。^{【1967】}

毛泽东历来对正规的军事教育不以为然。1965年1月27日，他在接见印度尼西亚第一副总理苏班德里约时即称：“军事学校办得一塌糊涂，正在整理。过去没有军事院校可好了。打了几十年仗，就是没有军事院校。我们的军队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不识字和小学程度的。国民党尽办军事学校，什么陆军大学毕业，就是我们这些不识字的兵打倒了它。我们各军区的司令过去都是老粗嘛！”“进军事院校的时间太长了。蒋介石办的黄埔军校，二个月入伍训练，四个月学校毕业。蒋介石的军队主要是这些人，这些人还比较能打，陆军大学毕业的实在不能打。”“书可以读一点，但是读多了害人，的确害人。是革命斗争培养干部。战场就是学校。”^{【1968】}

1965年3月24日，毛泽东在接见巴基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时称，“我打仗从来不看书。少看一点，看多了不好。”“战场就是学校。军事学校我不反对，可以办，但不要学得太长了，一读二、三年，太长了，几个月就行了，什么陆、海、空学校，不怎么高明。”“有些现代科学需要长一些时间学，例如导弹、原子弹，就要讲研究和制造。单单武器的使用、训练士兵不需要很长时间。训练炮兵一个月就行。训练驾驶员、飞行员，几个月就够了，最多一年，主要是在战场上训练。”^{【1969】}

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在召见北京高校“五大领袖”时称，“现在办军事学校害死人，黄埔军校你们知道多长，三个月，六个月。（林彪：一、二、三期只有三个月，到了四期加长了。）就是训练一下，改变一下观点，至于有什么学问呢？不太多，实际学一些军事，教练。（林彪：有一点，学了就忘了，学几个

【1967】《军队财务史料（1967—1969）》，页490。

【1968】佚名：《学习文选》（二），1967年11月，武汉，页753。

【1969】《学习文选》（二），页754—755。

礼拜的东西，到军队里几天一目了然，读书结合不起来，百闻不如一见。)我就是没上过什么军事学校，我就没读过什么兵法，人家说我打仗靠《三国演义》，我说《孙子兵法》我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1970]

对已成规模的正规军事院校大砍大杀，直至砍剩原来数量的百分之三十五不到，正正符合毛泽东一贯的思想。

二、军事院校调整撤并的具体情况

(一) 军委直属院校

撤销高等军事学院、军事学院和政治学院。以三大学院部分人员为基础，在位于北京的高等军事学院原址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1970年8月6日，军政大学宣告成立，9月15日正式开学。

原高等军事学院、军事学院和政治学院共有军政教员1,060人，三所院校被撤并成立军政大学后，仅保留了103人，其他编余人员有的被分配到部队工作，有的被分配到边疆生产建设兵团或“五七干校”，更多的是转业流失到了地方。军事学院图书馆内收藏着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上百万份军用地图，其中包括战争时期敌我作战计划图等珍贵资料，这是学院费了很多心血收集起来的一笔宝贵财富，但遭遗弃之灾；高等军事学院的大批图书资料也被送到造纸厂打了纸浆，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1971]

(二) 总参谋部院校

撤销无线电技术学校、测绘学院、体育学院、机要学校。保留技术工程学院，改称第一外语学校；外语学院，改称第二外语学校。1970年2月20日，根据军委办事组的决定，总参批复第一外语学校和第二外语学校行使军级权限。

(三) 总政治部院校

撤销艺术学院、政治学校。

(四) 总后勤部院校

撤销后勤学院、后勤学校、通县军械学校、南京军械学校、大同汽车学校、镇江汽车学校、天津运输学校、沈阳技术兵学校。保留后勤工程学院，改称后勤高级专科学校，第二、第四、第七军医大学，军医学院，兽医大学。1969年7月25日，总后勤部以3所军医大学和军医学院“建立以来就没有搬动过”为由，向军委办事组报告，要求将第二军医大学由上海迁往西安，第四军医大学由西安迁

【1970】韩爱晶：《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的谈话记录》，<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712.html>，最后访问：2016年5月12日。

【1971】《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院校教育发展史》总卷，页159-160、167。

往重庆，第七军医大学由重庆迁往上海，军医学院由齐齐哈尔迁往长沙。8月29日，军委办事组批准了此报告，4所院校遵照命令于11月底搬迁完毕。1970年2月3日，根据军委办事组关于将广州军区卫生学校和驻长沙的军医学院合并，仍称“军医学院”的决定，军医学院又由长沙迁往广州。^[1972]

（五）海军院校

1968年10月29日，经军委批准，海军命令撤销海军潜水艇士兵学校，将其改建为海军“五七”劳动学校，校址由青岛迁至天津草坨子。1969年2月19日，《军队院校调整方案》将全军125所院校裁减82所，其中有海军学院、海军潜水艇学校、海军政治学校、海军第四航空学校、海军通信学校、海军军械学校、海军卫生学校、海军预备学校等8所海军院校和海测系。根据这个方案，海军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于同年12月23日发出有关通知，上述8所院校和海测系自1969年至1970年先后撤销，所有营房、营具、教学设备和教学资料，按通知移交有关院校、部队或其他单位，人员作调动、派出执行三支两军或转业复员处理。军委1969年1月9日批准，同年2月1日海军命令，将海军预备学校机构改建为邓家埠“五七”劳动学校，后于1969年10月改为河溶“五七”劳动学校，由江西上饶迁至湖北河溶。至此，原有的14所海军院校和1个海测系，竟被砍去2/3，只剩下5所院校，并撤销了海军管理院校工作的海军司令部军校部。

仅剩5所院校中的4所院校，撤离沿海地区，迁移到远离海军部队的地方，有的上黄土高原，有的到华中腹地。经中央军委批准，海军于1969年8月30日、12月18日、1970年1月6日、1月26日分别电令：海军工程学院由大连迁驻武汉原汉口高级步校校址（同年9月搬迁完毕）；海军高级专科学校由烟台迁驻南京原海军学院院址（1970年11月搬迁完毕）；海军第二航空学校和海军第四航空学校调整给海军第二航空学校的人员、设备，分别由青岛和四川阆中迁驻太原原空军第三机务学校校址，组成海军第二航空学校（1970年4月搬迁完毕）；海军第一航空学校校部率第二、第四、第五训练团由锦西、山海关迁入山西长治机场，第一训练团进驻河南安阳机场，第三训练团由兴城机场转入锦西机场（1970年2月搬迁完毕）。各校原校址营房按海军通知，就地移交各海军部队或有关单位。

由于上述13所院校的大撤大搬，加之原来12所地方高等院校为海军培养专业干部的渠道也被割断，使多年建设不断探索和调整所建立起来的海军院校教育体系和院校的布局遭到全面的破坏，大量教学设施、设备器材、教学资料和校舍、营具等，在撤销和搬迁中遭到严重毁坏和散失。尤其是在教学实践中经过

【1972】《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院校教育发展史》后勤卷，页123-124。

长时间培养和建设起来的教员队伍，损失更为惨重，被处理离校离队的教员多达2,400多名，占原有教员队伍的63%。有些院校搬迁后，因不利于教学训练，不利于院校的发展，以后又不得不以重大的代价重新调整布局。

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海军党委《关于海军五所学校定点、任务及行使权限的报告》，于1970年1月7日经军委办事组批准正式执行。报告对海军院校的名称、任务和学制等，都作了重大改变：1. 第一海军学校，由原海军指挥学校为基础，抽调原海军学院、海军潜水艇学校、海军通信学校、海军政治学校和海测系的部分人员组成。任务是：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轮训营、团干部和海军舰队机关工作人员，轮训三级以上战斗舰艇部门长（不含机电长）和支队、水警区以下机关参谋（不含机电专业参谋）；培训、轮训海道测量干部；轮训政治机关业务干部，承担外训任务。2. 第二海军学校，以原海军工程学院为基础，抽调原海军通信学校、海军军械学校部分人员组成。任务是：培训部队舰船、机、电、导航、军械、通信、雷达、声纳技术维修干部；轮训三级以上战斗舰艇机电部门长及支队、水警区以下机关机电业务参谋；承担外训任务。3. 第三海军学校，由原海军高级专科学校改称。任务是：培训导弹部队技术检修基层干部；轮训岸舰导弹部队指挥干部和岸炮、高炮部队连长、参谋人员。4. 海军第一航空学校，校名和任务不变。5. 海军第二航空学校，以原海军第二航空学校为基础，抽调原海军第四航空学校部分人员组成。培训、轮训飞机维修技术干部。同时规定，以上5所学校的学制一般为1年左右，比较复杂的专业也不超过2年。学员全部来自部队战士和干部。按照以上对院校任务的规定，把海军院校教育中最具特色、成效显著、为系统培养海军指挥干部打基础的一级专业，即舰艇部门长（技术指挥）专业，改成了轮训班：除第一海军学校设了一个轮训营、团干部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外，竟然没有一处系统培养舰艇长和编队以上指挥员（即海军战术指挥和战役指挥）的院校或专业，破坏了舰艇指挥干部按部门长、舰艇长和编队以上指挥员三级培训的体制。也取消了海军工程技术干部按工程师、技术员两类培训的体制。^{【1973】}

（六）空军院校

按照《军队院校调整方案》提出的调整原则，空军撤销了10所地面院校和仅有的2所航空预备学校。撤销的院校占空军院校总数的37.5%，训练定额由21,922名减至5,650名，减少了78.8%。保留地面院校6所、空勤航校14所。

【1973】 海军编写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院校教育发展史》海军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页164-168。

撤销的12所院校是：空军学院，空军第二高级专科学校，第十七航空学校，第三、第四航空机务学校，空军高射炮兵学校，空军通信学校，空军政治学校，空军后勤学校，空军卫生学校，第一、第二航空预备学校。

保留的20所院校是：空军工程学院（改称空军第一专科学校），空军技术学院（改称空军第二专科学校），空军第三高级专科学校（改称空军第三专科学校），空军雷达兵学校（改称空军第四专科学校），第一、第二航空机务学校，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六航空学校。

被撤销的12所院校的教员干部大部分改行分配到部队工作，部分作转业、复员处理，文化大革命中有“问题”尚未搞清楚的到“五七农场”劳动待查，“问题”基本搞清楚的到“五七干校”锻炼待分配。空军高射炮兵学校被撤销后，570名教员干部中，改行调部队安排工作的333名，到地方“支左”的11名，到“五七干校”锻炼的84名，复员的139名。空军政治学校撤销后，除29名干部直接安排外，其余198名干部、教员全部进入第三机械工业部所属贵州航空工业基地的49个单位执行“军管”任务。各撤销的院校教员、干部基本上都脱离了院校，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院校减少，专业撤并，学制缩短，训练定额减少。因此，又处理了一大批教员和干部。空军技术学院仅1969年6月就复员干部96人，教员166人。该院1966年有654名教员，到1970年底留校教员已不到200人。第十六航空学校在1967年-1969年3年内，因学制、训练定额等变化和撤销理论训练处，绝大部分空勤理论教员和航空理论教员都作了处理。有的停飞，有的进了“五七干校”，有的改行，行政19级以下的教员几乎全部复员。到1969年底，处于分散状态下的航空理论教员只剩下50名。大批教员、干部流失，使教学力量和干部队伍受到极大削弱，给以后继续办校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尽管空军对撤销院校的教材图书、档案资料的移交和保管工作有明确规定，但在实际工作中并未做到，也无法达到正规管理的各项要求。在人们的心目中，学校都不办了，还留下教材图书、档案资料有何用，而被视为一堆废纸，有用的拿走，无用的烧掉，即使保存下来的也是残缺不全。在以后因需要查阅被撤销院校的有关档案资料时，几乎一无所有，许多问题无据可查。

被撤销的院校基本上没有落实空军的有关规定，对营房、营具及教学设备的移交、保管没有尽到责任，破坏和丢失相当严重。空军政治学校在撤销后的8年中，营院基本上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各种设备、设施，散失、破坏严重，操场

成了露天仓库，球场成了自留地，屋破墙塌，积水成沼，杂草丛生，完全看不出这里曾经是一所军校的痕迹。空军学院撤销后，营院被外面的几个单位占用，校舍惨遭破坏，大量营具丢失，院内秩序一片混乱，给后来恢复建设造成了极大困难。^{【1974】}

（七）炮兵院校

1969年12月17日，中共炮兵党委发出《关于撤销炮兵学院、重庆、南京炮校革委会，成立留守处领导小组及郑州炮校临时党委会的通知》，指导各院校的撤并，并按照中央军委办事组的指示，将重庆炮兵学校校舍拨给第五机械工业部改建为生产工厂。^{【1975】}组建炮兵技术学校（行使军级权限）。

（八）第二炮兵院校

撤销武威炮兵学校。1969年9月，军委命令以该校为基础，组建第二炮兵第五十六基地，代号总字126部队。保留西安技术学院，改称第二炮兵技术学校（行使军级权限）。

（九）装甲兵院校

1969年2月3日，中共装甲兵党委根据军委办事组的指示，对装甲兵现有6所院校的机构和营房使用作了如下安排：西安装甲兵工程学院校舍拨给第五机械工业部改建为生产工厂；装甲兵工程学院和北京长辛店第二坦克学校合并组建坦克技术学校；撤销大同装甲兵学院和第一坦克学校，两所院校的营房、营具移交北京军区使用；撤销徐州第四坦克学校，学校的营房、营具移交工程兵使用，其余人员、物资移交北京军区；撤销长春第五坦克学校，学校的营房、营具移交沈阳军区使用。^{【1976】}

（十）工程兵院校

1969年8月-9月间，工程兵党委作出决定：撤销南京第一工程兵学校、洛阳第二工程兵学校、昌平第三工程兵学校、长沙工程兵学院、西安工程兵工程学院，撤销工作分别由建筑第五十一师、第五十二师、第五十四师、工程技术总队负责组织实施。^{【1977】}在江苏南京市原第一工程兵学校校址合并组建新的工程兵学校（行使军级权限）。

【1974】《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院校教育发展史》空军卷，页144-147。

【1975】陆军编写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院校教育发展史》陆军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页205。

【1976】《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院校教育发展史》陆军卷，页205。

【1977】《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院校教育发展史》陆军卷，页205。

(十一) 铁道兵院校

撤销绵阳铁道兵学校，将铁道兵学院改建为铁道兵学校（行使军级权限）。

(十二) 通信兵院校

1969年9月9日，军委办事组办公会议决定，撤销通信兵沈阳通信兵学院、重庆通信兵工程学院、上饶通信兵学校、宣化通信兵学校、汉口通信兵技术学校、重庆通信兵技术学校和重庆通信兵雷达技术学校。^{【1978】}组建通信兵工程技术学校（执行军级权限）。

(十三) 防化学兵院校

1969年11月26日，总参谋部根据军委办事组11月10日通知，将防化学兵学院、防化学兵学校两校合并，改建为防化学兵技术学校（行使师级权限）。

(十四) 军区院校

撤销各军区的步兵学校及归武汉军区建制领导的高级步兵学校。撤销绝大部分军区卫生学校，仅保留北京军区军医学校和广州军区卫生学校。

(十五) 附：国防科委所属地方国防院校

1969年12月15日，军委决定：调整国防科委院校领导体制。将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拨归总参谋部领导；将北京工业学院、华东工程学院、太原机械学院拨归总后勤部领导；将上海交通大学、西北电讯工程学院和哈尔滨工程学院海军工程系拨归海军领导；将北京航空学院、南京航空学院、西北工业大学和哈尔滨工程学院空军工程系拨归空军领导；哈尔滨工程学院和哈尔滨工业大学仍归国防科委领导。以上领导关系，从1970年1月1日开始执行。^{【1979】}

至1970年2月20日，院校调整小组完成了全军院校精简合并后多余机构的处理和营房调整工作。保留的院校已全部定点，大部分进驻。撤销的82所院校的校舍，移交给第四、第五、第六机械工业部和科研单位使用的16所，其余66所院校的校舍分别调整给部队、机关和保留的院校使用。保留的43所院校中，搬迁或局部搬迁的有18所：第一外语学校由张家口迁至洛阳；长春防化学院、江山防化学校合并组成防化学技术学校，迁至北京密云；第二军医大学由上海迁至西安；第四军医大学由西安迁至重庆；第七军医大学由重庆迁至上海；军医学院由齐齐哈尔迁至长沙，后又与广州军区卫生学校合并迁至广州原暨南大学校址；工程兵技术学校由西安迁至南京；坦克技术学校由西安迁至北京长辛店；炮兵技术学校由宣化迁至南京；高等军事学院、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

【1978】《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院校教育发展史》陆军卷，页205。

【1979】《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作大事记（1949.10—1987.12）》上册，页576。

组建军政大学，校址设在北京；铁道兵学校与铁道兵学院合并组成新的铁道兵学校，校址设在石家庄；第二海军学校由大连迁至武汉；第三海军学校由烟台迁至南京；海军第二航空学校由青岛迁至太原；空军第三专科学校迁至南京军区原步兵学校校址；西安空军通信学校一部分与雷达学校合并，组成空军第四专科学校，校址设在武汉；空军第一机务学校由沈阳迁至河南信阳；空军第十三航空学校由北京迁至济南。第二外语学校、后勤高级专科学校、兽医大学、西安技术学校、通信工程技术学校、空军第一专科学校、空军第二专科学校、空军第一至第十二航校、空军第十六航校、空军第二航空机务学校、第一海军学校、海军第一航空学校、北京军区军医学校、广州军区卫生学校等 25 所院校仍驻原校址。^{【1980】}

第八十四节 珍宝岛事件

一、沈阳军区成立虎、饶前指

据中方资料，珍宝岛位于黑龙江虎林县境内，完达山脉东侧，乌苏里江中游主航道中心线中方一侧，历来是中国领土。惟苏联方面认为，在乌苏里江的边界线应划在中方江岸边，故珍宝岛（苏方称达曼斯基岛）在 1947 年被苏划入其警戒线以内（中方一直未有承认）。1963 年，中苏两国政府曾达成维持边界现状协议。1964 年 2 月至 8 月，中苏进行边界谈判，谈不下去。以后，中苏边境形势日趋紧张，1968 年后尤甚。

1969 年 2 月，沈阳军区令黑龙江省军区加强合江军分区的指挥和防御（珍宝岛在合江军分区辖区范围内），又令陆军第四十六军一三三师两个侦察排，第二十三军六十七师两个连，加强合江军分区所辖虎（林）、饶（河）地段边防力量。省军区决定，在公司边防站成立“公司临时指挥所”，由合江军区参谋长王子良负责，统一领导边防斗争。^{【1981】}

2 月 7 日，中方两巡逻组登岛巡逻，与苏方在岛上就珍宝岛归属问题发生争执，中方巡逻组撤回。

2 月 19 日，总参谋部和外交部联合向沈阳军区、黑龙江省革委会、省军区发出指示：同意暂时推迟在绥芬河边境架设铁丝网的斗争，选择珍宝岛作为边防斗争目标。2 月 7 日事件以后，必将有新的斗争。要求按既定巡逻线进行不固定的正常巡逻，一次派出 2—3 个组，兵力不少于 1 个加强排。自卫还击严格控制在主

【1980】总参谋部军训部：《总参谋部军训部简史》，1999 年，页 443-444。

【1981】军事理论教研室：《中国人民解放军 1950-1979 年战史讲义》（试用稿），1987 年，页 93。

航道中心线中方一侧，行动突然，动作迅速。不纠缠，不恋战，取得胜利后，立即撤至有利地区。同意增调1个侦察连参战。由合江军分区指定1名主要军政干部负责。^{【1982】}

沈阳军区决定，由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萧全夫率领一个工作组，前往虎、饶方向检查战备工作。稍后，军委指示沈阳军区成立虎、饶前指，由萧全夫、政治部副主任李少元^{【1983】}统一领导，黑龙江省军区、合江军分区、陆军第二十三军抽调部分干部组成，下设作战、政工、战勤三个组，前指位五林洞。^{【1984】}

为保障边防巡逻，中方在珍宝岛我岸派出2个步兵连、1个侦察连、3个侦察排、1个无后座力炮排和1个重机枪排进行掩护。

3月2日上午，边防站30人分两组到珍宝岛巡逻。9时17分苏军两路尾追第1巡逻组上岛。中方巡逻队发出警告，令其退回。苏军不予置理，首先开枪打死打伤中方6人。当即予以还击，苏军岛上战斗打响后，中方第2巡逻组正在岛西江叉与第3路重创苏军分队相遇，当其正要向中方开枪，班长周登国争取主动，将苏军边防小分队队长伊万上尉等7人全部击毙。9时22分苏军第4路由岛东中部侵入。向警戒分队冲击，中方巡逻组立即还击，至9时50分将这一路苏军大部歼灭。苏军装甲车向中方岛上分队开枪开炮，中方岸上炮兵火力予以还击，击毁装甲车、指挥车、卡车各1辆。击伤装甲车1辆。战斗于10时30分结束。

在3月2日的战斗中，中方参战人员估计苏联边防军死伤共60余人（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数字苏军死亡31人）。中国军人阵亡17人，负伤35人，并有1名通讯员失踪。中国边防部队在战斗结束后即带着伤亡人员从岛上撤回，苏联边防军随后派人登岛，将苏方伤亡人员运回己方一侧。^{【1985】}

二、珍宝岛武装冲突：3月15日、17日的战斗^{【1986】}

3月2日珍宝岛战斗结束后，苏联军队在远东方向进入了临战戒备状态。苏军多次派出配备有装甲车的武装部队越过乌苏里江上封冻的冰面，于3月4日、5日、7日、10日、11日、12日和14日登上珍宝岛。中央军委在珍宝岛战斗结束后要求当地部队以不示弱的态度继续上岛巡逻，中方部队几次上岛都未与苏军遭遇，所以没有发生冲突。

【1982】《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1979年战史讲义》（试用稿），页94。

【1983】时沈阳军区没有副政委，同年8月李少元方与李伯秋等共八人提为副政委。

【1984】《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1979年战史讲义》（试用稿），页94。

【1985】徐焰：《1969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党史研究资料》1994年第5期，页7。

【1986】本小节资料来源：《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1979年战史讲义》（试用稿）；《1969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

中方也加强了力量，进行再次反击入侵的准备。在珍宝岛方向，部署2个步兵连、1个侦察连、3个侦察排、1个重机枪排、1个82迫击炮连、1个75无后座力炮连又1个排。在七里沁岛方向，部署5个侦察连、2个75无后座力炮连、1个120迫击炮连、1个重机枪连。在纵深增调第六十七师1个步兵团、2个侦察连作为机动部队。以2个加农炮营和1个高炮营组成炮群，支援作战。

3月15日早晨，虎饶前指命令第七十三师二一七团一营营长冷鹏飞率领一个排、边防站站长孙玉国率领一个班于7时40分登上珍宝岛。部队上岛后，即于8时2分与岛上的苏军潜伏人员发生火力接触。激战一个多小时后，苏军的装甲车和步兵撤回对岸，第一次战斗结束。

当天9时46分，苏联空军以3架飞机向珍宝岛地区俯冲，进行威胁，随即苏军又以坦克6辆、装甲车5辆分两路向珍宝岛上的中国军队实施攻击，并以4辆坦克沿着冰面向珍宝岛南侧江叉运动，企图从后方迂回攻击岛上的中国军队。这时中国军队的一个无后座力炮班刚刚登岛，迅即在江边架炮向苏军坦克射击。苏军坦克遭射击后队形混乱，1辆坦克驶入雷区被炸毁，其余3辆慌忙回对岸。11时以后，中国守岛分队在岸上掩护分队的火力支援下，顽强抗击苏军的冲击。然而中国军队使用的75毫米无后座力炮和40毫米火箭筒都系四十年代设计，破甲能力低，因而只击毁装甲车2辆，未能击毁坦克。战斗中营长冷鹏飞负伤，孙玉国接替指挥。苏军在遭到顽强抵抗后，于中午12时以后撤回己岸，第二次战斗就此结束。

还在进行第二次激战时，第六十七师师长黄浩奉命率1个营到无名高地待命，这个营跑步前进，到达指定位置，完成战斗准备。前指令85加农炮2门向前至209高地西北侧公路占领发射阵地，做好直接瞄准射击准备。十六军75无座力炮连由虎头立即进到五林洞待命。六十四军和一三三师侦察连随时准备加入战斗。

当天下午12时50分，苏军又以大口径火炮、坦克炮向珍宝岛及江岸中国一侧的防御阵地、边防站和后方桥梁猛烈射击，火力正面达10公里，纵深达7公里。在持续2小时的炮击后，15时13分，苏军又出动坦克10辆、装甲车14辆和步兵约100人，向珍宝岛上发起第三次攻击。岛上的中国边防分队以近战开火的方式，用无后座力炮、火箭筒在几十米、十几米的距离上开火，一再打退了苏军的冲击。15时30分以后，在中国江岸一侧的中国炮兵群加入战斗，以火力急袭给岛上苏军和苏方岸上的指挥机构以突然打击，击毙了苏军指挥官上校边防总

队长列昂诺夫。下午 17 时以后，天色转黑，苏军从珍宝岛上全部撤出，第三次战斗也就此结束。

1969 年 3 月 15 日珍宝岛上的战斗，是中苏边界冲突中最激烈的一次战斗。当天苏军共出动坦克、装甲车 50 辆以上，发炮 1 万多发，并出动了飞机 36 架次（未投弹）。中国方面仅以步兵和炮兵协同，打退了苏军三次攻击，共击毁坦克 2 辆、装甲车 7 辆，估计苏军死伤在 140 人左右（其中死亡约 60 人）。中方伤亡 39 人（亡 12 人，伤 27 人）。

3 月 16 日苏军出动人员和车辆登上珍宝岛，拖回前一天战斗中遗弃在岛上的尸体和被击毁的车辆。17 日，苏联边防军再次出动坦克 5 辆、步兵 70 余人，在炮火掩护下又进入珍宝岛，在岛上大量埋设防步兵地雷，并企图将珍宝岛和中国江岸之间江叉上被地雷炸毁的 T62 坦克拖回。中国江岸一侧的炮兵群猛烈开火后，苏军急忙从岛上撤走。后来，苏军向这辆坦克发射大量炮弹，企图将其炸毁。然而苏军的炮弹落到这辆坦克周围后，即将冰面炸裂，坦克沉入江中。5 月 2 日中国海军潜水人员和黑龙江省有关部门在民兵配合下将这辆坦克捞出，以后送往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出。

通过 3 月 2 日、3 月 15 日和 3 月 17 日的战斗，中方共击毁苏军坦克、装甲车共 17 辆，估计毙伤苏军人员约 250 人（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报道的数字，苏军在边界冲突中死 58 人，伤 94 人）。苏军因其进攻被打退，加上岛上已大量布雷，即不再进入珍宝岛。中国军队为保证日后上岸巡逻的安全，派出工兵上岛进行了排雷作业。因珍宝岛面积很小，全岛又都在中苏双方高地的目视范围之内，夏季洪水季节岛上多数地区又有积水，从军事角度看难以在岛上驻兵。因此，中方此后也只是间或派人前往该岛巡逻。

珍宝岛战斗结束后，公司边防站站长孙玉国临时被增补为中共九大代表，并在大会上作为解放军代表做了发言。毛泽东在 4 月 14 日九大上讲话时，对珍宝岛战斗一事说，这次仗是孙玉国指挥的。没有打过仗，也可以打仗。我们一没有用飞机，二没有用坦克、装甲车，三没有指挥车，打了 9 个小时，敌人三次冲锋，都被我们打垮了。我们不是不要飞机、坦克、装甲车，但主要靠勇敢。要破除迷信，这次珍宝岛就破除了迷信。

三、毛泽东利用珍宝岛事件大做文章

据新华社讯：3 月 2 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称：“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晨，苏联边防军侵入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开枪打死打伤我边防军

人员多名，制造了一次极为严重的边境武装冲突。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奉命向苏联政府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3月3日，毛泽东圈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抗议苏修武装挑衅，组织群众游行示威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军民在游行中要严格遵守中央关于“五不”、“一划”的指示，即不冲、不砸、不烧、不抓、不打苏联驻中国使馆、机构和苏联在中国人员，群众队伍在同外国驻中国使馆之间划一道线。^{【1987】}

据新华社讯，自3月4日起，北京、天津、上海等二十几个城市军民举行游行示威和声讨大会，“抗议苏联边防军入侵珍宝岛”。在4日至12日不足十天时间里，全国参加示威游行的军民已过四亿人次以上。

3月7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讨论九大准备工作和中苏边境冲突。关于中苏边境冲突，毛泽东说：如果苏联打到我们岸上，我们就打到他的岸上。苏联为什么这么挑衅，总有他的需要，不能说苏联、美国不想占领欧洲和亚洲，包括中国在内。^{【1988】}

3月15日，毛泽东与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首先谈了打仗问题：

一个县成立一个团，全国都要搞。大县三个营，中县两个营，小县一个营。平时坚持地方，战争起来了就补充野战军。战争打起来，依靠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是不行的。

（当汇报到珍宝岛地区敌炮击到我纵深七公里时）打进七公里有什么要紧，最好是打进七十公里、七百公里、七千公里。七千公里就打到郑州了。一个县一个团，战时就像割韭菜一样。苏修，要给他一点面子，让他打进来，进来就好了，我们就有理由了，“充足理由律”。打进来，地球照样转。他打进来，就使我们动员起来。它也需要动员，它有一个缺点，就是纪律不好，一个是要东西，一个是要女人，他们同国民党一样，他们的军队很穷，发一套衣服还是家里出钱。我们的衣服是国家发的，也是人民的，但是经过了国家征的，因此就比较公正了。这次会议要动员一下，请总理讲一讲，请总长也讲一讲，动员大家。

日本人打败了，就是国家小，没有根据地。另一方面，政府投降了。我们的领导机关被打掉了，下面要照常打。东北、华北、西北要准备一下。准备好了，他不来也不要紧。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苏联知道我们不会到

【198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231。

【198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232。

他那里去，他们那里很冷。我们是后发制人。原子弹基地要有准备，防止他用飞机轰炸。（林彪：今天的行动是莫斯科指挥的，不是前面人指挥的。）抗议他不听，双方都在抢时间。它们是要面子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我们有的人说：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应当改为我必自卫。人家犯我，我为什么不能犯人？无非是东西，坛坛罐罐打烂，把人消灭一半，地球还是照样转。^{【1989】}

3月21日，周恩来召集军委办事组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及总参作战部有关人员开会，针对苏军可能强占珍宝岛的态势，商定加强我岸兵力，大力部署，以逸待劳，准备后发制人。同时，就柯西金通过载波电话要求同毛泽东、周恩来通话事，召集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商定以备忘录形式复苏驻华临时代办：“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你们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3月22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林彪书面报告3月21日商定的措施，毛泽东批：同意备忘录的立场，即准备外交谈判。^{【1990】}

无论如何，珍宝岛事件仅仅是一场小规模边界冲突。双方投入直接交战的兵力，仅相当于营一级（中方处于纵深地带的1个步兵团、3个炮兵营作为机动支援部队待命，并未直接参战）。毛泽东在九大上说，珍宝岛打了一个小仗。“小仗”一词，倒是恰如其份。

此外，当年有苏军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的普遍说法。后来有学者指出，从1990年代的有关研究成果分析，苏军部署在中苏边境的军队，其实不足当年所说的一半。^{【1991】}

聪明莫如毛泽东。深知中苏之间的全面战争根本打不起来，却需要利用两国之间的一场规模十分有限的边界小仗，大做文章，以此绷紧国内人民的神经，转移国内因文革出现的社会矛盾，巩固自己的权力。故而，也就有了毛类似3月15日的讲话：“东北、华北、西北要准备一下。准备好了，他不来也不要紧。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无论那一年，我们要准备打仗。人家就问了，他不来怎么办呢？不管他来不来，我们应该准备。”

所谓动员、准备，除却军事上的之外，大概还包括了如下两方面。

【1989】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的讲话，1969年3月15日。《“文革”十年资料选编》上册，页302-303。

【1990】《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页286。

【1991】杨奎松：《1969：中苏战争即将爆发？——从珍宝岛事件到缓和和对美关系》。《党史研究资料》1997年第12期。

其一，虚张声势，大造舆论，以期将全国的注意力转移集中至对外的“反帝反修”（主要是反修）之中。认定“苏修叛徒集团”已堕落为“彻头彻尾的社会帝国主义者，是地地道道的新沙皇”，“企图建立沙皇式的殖民帝国。……他们的胃口比沙皇还大。”^{【1992】}毛泽东甚至公开呼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1993】}

其二，以文革以来前所未有的强力态势，稳定国内部分地区仍然严重的武斗、动乱局面。7月23日及8月28日，中共中央连续发布毛泽东指示“照办”、措词强硬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布告》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布告》针对山西地区指称：混在各派群众组织中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坏头头，利用资产阶级派性，蒙蔽一部分群众，犯下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反革命罪行，而“武力强占地盘、拒不执行本布告、负隅顽抗者，由人民解放军军事包围，发动政治攻势，强制缴械。逃跑流窜者，由人民解放军实行追捕，归案法办”。《命令》则针对边疆地区称：绝对不准任何人冲击人民解放军，不准抢夺军队的武器、装备和车辆，不准妨碍军队的战备行动，不准泄露和盗窃军事情报。如有违反，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四、中苏关于边界问题的接触和谈判^{【1994】}

根据目前公开的材料，中苏之间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争端的建议，是苏方首先提出来的，而中方亦一直未有将谈判大门封死。

3月29日，苏联政府在交予中国政府的一份声明中，“呼吁如果发生分歧，要在心平气和的气氛中通过谈判解决”，并提议苏中两国官方代表在最近恢复1964年在北京开始的协商。

4月11日，苏联外交部致中国外交部的照会中再次建议恢复协商，并表示愿意在4月15日或对中方合适的另一个最近时间在莫斯科开始协商。4月14日，即中共“九大”期间，中方答复称，“正在研究”苏有关缓和边境局势的建议，并且

【1992】《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打倒新沙皇》，1969年3月4日。

【1993】毛泽东审阅周恩来等1969年9月8日送审的国庆二十周年口号时所加的一条口号。《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页66。

【1994】本小节资料来源：《1969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苏]A. 普罗霍罗夫：《关于苏中边界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将给予答复。5月24日，中国政府回应苏联政府3月29日的声明，原则上同意举行谈判建议。

6月13日，苏联政府再次发表声明，提出了解决边界问题并使苏中关系全面正常化的意见和建议。7月底，苏方再建议举行苏中双方高级会晤。

8月13日，新疆铁列克提战斗中中方失利。据中方资料称，1967年7月，苏边防军多次入侵新疆裕民县巴尔鲁克山西部铁列克提地区。1969年6月，苏边防军人在该地区私设国界标志，构筑工事，绑架并打死中国牧民。7月3日，总参谋部、外交部批准新疆军区塔城军分区边防分队进入该地区巡逻。8月13日，边防分队共25人（含掩护分队11人）进入该地区巡逻。苏边防军300多人在装甲车和直升飞机配合下，对中方巡逻队进行突然袭击。由于中方边防部队战前缺乏周密准备，寡不敌众，后援不济，造成战斗失利。巡逻分队25人及随同执勤的3名民兵全部阵亡。^{【1995】}

铁列克提战斗给中苏关系投下新的阴影。所幸中方独自吞下了铁列克提战斗失利的苦果，并没有怎么拖慢中苏接触的进程。9月上旬，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利用赴越南参加吊唁胡志明之机，向同时前去吊唁的中国党政代表团提出要在回国时“途经”北京，同中国总理会谈。接到柯西金要求到北京的信息后，毛泽东同意了这一要求。

当毛泽东同意柯西金“途经”北京的消息发给苏联方面时，柯西金经原航线已返回了苏联中亚的塔什干。可是柯西金仍乘飞机折向东方，于9月11日到达北京，同周恩来在首都机场贵宾室进行了为时三个半小时的会谈。周恩来同柯西金见面后，对他仍以“同志”相称，并表示说：“约五年前，毛泽东同志对你说过，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可以吵一万年。但这是理论的争论，对这些争论，你们可以有你们的见解，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见解。这些争论不应该影响我们两国的国家关系。”周恩来并指出，在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是被动的，打开地图就会知道，今年发生冲突的地方都是争议地区。你们总说我们要打仗，我们现在国内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呢？

柯西金当时表现出争取和解的态度，向周恩来保证说，苏联没有对中国发起核袭击的打算，并承认两国边界存在着争议地区，两国没有必要为边界问题而打仗。在这次会谈中，两国总理最后根据中国方面的提议达成谅解：首先采取临时措施，使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避免武装冲突，维持边界现状。在这种谅解的气氛下，两国总理还就恢复互派大使（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两国在对

【1995】《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作大事记（1949.10—1987.12）》上册，页341-342。

方大使馆只有临时代办)、扩大贸易和两国间通车通航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最后周恩来提议以两国政府换文的形式把会谈的成果肯定下来,柯西金表示同意。会谈结束时,双方对会谈的成果都表示满意。

9月13日,周恩来将有关中苏会谈内容报毛泽东,认为:中苏这样政府性质接触还是第一次,我们争取和缓边境局势四条协议实现,发表外交文件,促进边界谈判。毛泽东批“同意”。

9月18日,周恩来致信柯西金:1969年9月11日,在北京机场的会见中,我们双方同意长期悬而未决的中苏边界问题,应该在不受任何威胁情况下,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在解决前,双方采取临时措施,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这些临时措施如能得到你来信确认,即作为中苏两国政府之间的协议,立即生效,并付诸实施。我相信,如果这个协议能够达成,将有助于两国边境局势的缓和和中苏边界谈判的举行。该信内容于16日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并于17日报毛泽东。

9月26日,柯西金复信周恩来,称:我方已采取实际措施旨在使边境局势正常化,其出发点是中国政府将根据相互原则采取类似措施来实现已达成的有关协议,我方已任命以库兹涅佐夫为首的谈判代表团,建议自10月10日起在北京开始中苏边界问题谈判。

9月29日,由周恩来审定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给苏联驻华代办叶里扎维金的“口头通知”中说,柯西金的信正在研究中;边界谈判改到10月20日开始。

10月14日,柯西金再致信周恩来,告之苏谈判代表团于10月20日前抵北京。

第八十五节 九大：“团结”“胜利”表象下的暗涌

一、九大政治报告起草过程中的分歧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姗姗来迟的、与中共八大相隔了十三个年头的中共九大,终于在北京举行。以毛泽东的话来说,“我们希望这一次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在这个团结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取得胜利?就这个大会来说,能不能开成一个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能不能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以为,可以的。可以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1996】}实际上,这一次会议,在“团结”、“胜利”的华丽外表下,内里却暗涌四起。

【199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239。

九大的具体准备工作，是从1969年2月份开始的。在各项具体准备工作中，毛泽东最关心的是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具体起草过程，官方《毛泽东传》称：

二月七日，他（指毛泽东—引者注）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开会时说：“搞出第一稿就有办法了，无非是全部推翻再搞。让他们几个人搞，伯达牵头，伯达、春桥、文元，林彪同志挂帅。文章写出后才好开会。现在讲几个里程碑，我就不赞成。”^{【1997】}会上初步商定报告稿在二月二十日交卷，九大在三月十五日开幕。十九日，毛泽东催促陈伯达：“你报告写得差不多了吧！二十号交卷有希望吗？你们三人要一齐找林彪同志谈一谈。”^{【1998】}三月三日，期限已过了十多天，仍然没有消息。毛泽东很生气，在找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时说：“原定二月二十日交卷，交不了又不说明道理。会议决定的，一个人（指陈伯达—引者注）推迟时间。”^{【1999】}七日，他在谈话时表现出更大的不满，说：“开会，一个主要的是文件，一个是党章，一个是选举。做了决议又不办，不办又不报告。还是准备两手：一个是写出报告可用，一个是不能用。”他问陈伯达：你究竟什么人在搞。陈伯达回答：我自己一个人在写。毛泽东说：“你这个人每次都说过必改，可就是不改，永世不变。”^{【2000】}十二日，他就提出换人的问题，说：“是不是请你们三位：康、张、姚三位。”“两家各搞各。”并且点明报告的主题：“总之，要提出矛盾来，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斗争，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阻碍群众运动，就是有这个东西，相当严重。”^{【2001】}这以后，九大报告就由张春桥、姚文元来起草。三天后，毛泽东说：“报告没有写好，迟几天开会不要紧。给陈伯达是一个月，给你们半个月，索性四月一日开会。”^{【2002】}张、姚两人从十六日起陆续将报告稿分批送审，毛泽东改了多遍，在三月三十一日完稿。

陈伯达起草的报告稿同林彪有很大关系。这个稿子被否定，林彪很不高兴。据当年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吴法宪回忆“陈伯达写时天天跑到林家，商量怎么写，林讲了个大概。从这以后，陈开始靠林了。”“主席否定陈伯达的报告，林彪很不高兴，因为这是林、陈两人商量的。”在由张春桥等起草后，

【1997】原注：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2月7日。几个里程碑，指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

【1998】原注：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陈毅等谈话记录，1969年2月19日。

【1999】原注：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3日。

【2000】原注：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12日。

【2001】原注：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15日。

【2002】原注：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2月7日。

“林说：写什么就是什么，我林彪一字不改。”“九大报告，是林彪在会上照着稿子念的。”^[2003]

1973年8月24日，周恩来在中共十大政治报告中谈及九大政治报告起草过程时称：

“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林彪、陈伯达的这个政治报告，理所当然地被中央否定了。对毛主席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林彪暗地支持陈伯达公开反对，被挫败以后，才勉强地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线，在大会上读了中央的政治报告。

按周恩来所称，1969年4月1日下午九大开幕后，林彪“读了中央的政治报告”。报告分为八个部分：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三、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四、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五、关于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六、关于党的整顿和建设；七、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八、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个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核心，肯定文化大革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关于国际形势，报告提出，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

毛泽东否定了陈伯达所谓“鼓吹唯生产力论”的稿子，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毛不给陈伯达面子最严厉的一次。更重要的是，陈伯达的稿子虽然只是陈一人起草的，但却被视为同林彪有很大关系，以周恩来后来的话来说，就是“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的”。毛泽东虽然表面上没有说林彪什么不好听的话，惟心头上不可能不狠狠记下这一笔。

[2003] 原注：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至25日。《毛泽东传（1949—1976）》下，页1545—1546。

二、确立林彪的接班人地位

根据九大议程，会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4月1日至14日，听取并讨论通过林彪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4月14日，会议一致通过了政治报告和新党章。

新党章总纲中关于林彪一段称，“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以书面形式指名确立党的第一把手的接班人。

关于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康生在4月14日九大全体会议上简短地称，“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最勇敢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对毛泽东思想学得最深，用得最好，执行最坚决。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新党章明确规定林彪同志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和命运的大事，是我们党和国家永不变色，彻底遵照毛泽东思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航道胜利前进的根本保证。”^{【2004】}

与康生略有不同的是，在同一天，周恩来对林彪的地位和作用则作了长篇大论的阐述：

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同志自始至终紧跟毛主席，不愧是广大革命群众公认的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副统帅。

林彪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后，在他的倡导下，在一九六一年首先在军内出版了《毛主席语录》，然后很快就推广到全国直至全世界。可以说，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这一红宝书，把毛泽东思想所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大众化了，使毛泽东思想在中国人民以至世界革命人民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传播，从思想上武装了亿万革命群众。这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有力的舆论动员，并且具有深远的影响。

一九六五年底，在毛主席发动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之后，林彪同志揭发了罗瑞卿反党、反军的反革命阴谋，并且在他的倡议下，召开了形成与彭真《二

【2004】康生同志的发言——在1969年4月14日“九大”全体会议上。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1969年4月30日印发。

月提纲》针锋相对的部队文艺座谈会，发表了它的纪要。这都有力地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前进。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林彪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阐发了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提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林彪同志的这一重要讲话，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

在近三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许多关键时刻，例如一九六六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一九六六年十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的工业会议，一九六七年三月的军以上干部会议，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揭发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问题的大会，一九六八年十月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林彪同志都作了重要讲话。他根据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彻底揭露了刘少奇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严厉批判了来自右的和极“左”方面的逆流和翻案邪风，牢牢地把握住了毛主席指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航向。林彪同志这些讲话，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支持和赞扬，成为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全国亿万革命人民，特别是对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人民解放军在“三支”“两军”工作中的战斗号令。

林彪同志成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经开始。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从此，林彪同志一直紧跟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和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反对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在抗日战争时期反对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在解放战争时期反对刘少奇、彭真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在全国解放后反对彭德怀、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的斗争中，林彪同志都是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坚定地站在斗争的前线。

在彭德怀的篡军、篡党阴谋被揭发后，林彪同志亲自主持军委的工作。林彪同志发扬毛主席古田会议的建军思想，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四好连队、五好战士，重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提倡把我军建设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林彪同志提出“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有力地宣传了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林彪同志提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群众性的学习毛泽

东思想的方法，这就是他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说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这一整套方法，对毛泽东思想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以至在世界革命人民中的大普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这次在新的党章中明确写上：“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从林彪同志四十多年的革命奋斗中自然引伸出来的最正确的结论，是完全符合事实的。它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革命人民的热烈拥护，也得到全世界广大革命人民的支持。我们不仅为有着我们的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了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2005】}

如果没有政治报告起草过程中的那些分歧和冲突（更何况毛是站在对立意见那一边），以新党章关于接班人板上钉钉的白纸黑字，以周恩来、康生带头唱的赞歌，九大应该确确实实可以成为林彪最辉煌的一页，成为其政治生涯中的顶峰。有了那些分歧和冲突尤其是毛的态度，这一切变得不那么确定了。而且，即使是顶峰，难道就是什么好事？既然是顶峰，还有更高更好的路可走吗？这预示着林彪的政治生涯“泰极否来”，开始走下坡路了。

三、有关九大的回忆

有关九大代表、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及中央政治局的产生过程，出席九大的中央组织部业务组负责人郭玉峰回忆称：

第九届党代表大会代表如何产生、数字分配等都是中央直接管。代表条件也是中央直接规定的。中直机关是由汪东兴和我负责组织协商选举的。先在各部、工、青、妇、新华社、党校……等单位提名，然后中直召开代表会议选举。国务院各部由国务院政工组具体负责，开会前代表报到。山东王效禹为了多搞些支持自己的代表，而把人武部的也算在地方代表数。周总理知道后批评了王效禹。王作检讨，改变了做法。还有徐州为争名额各派争执不下，只好少两名。周总理指示不要减要把名额留着。但直到开会也未把这名代表选出来。大会代表住地是京西宾馆、北京饭店、前门饭店。而前门饭店因为文化大革命弄得很乱，无人居住，要住代表得整理一番。周总理派王良恩（中

【2005】周恩来同志的发言——在1969年4月14日“九大”全体会议上。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1969年5月2日印发。

办副主任)和我找前门饭店军代表,说饭店有重要任务接待,要把房间、食堂等整理好,各房都要铺上地毯等。饭店收拾好后,在代表到来的前一个晚上十二点左右总理突然带王良恩到前门饭店去,叫我也去。到饭店后总理问了情况,然后看了食堂代表住处。指示食堂各大窗都要挂窗帘。有一大挂像是一大群众跟毛主席后边,指示摘下。总理工作之细可想而知。所以挂窗帘是为了保密,因为前门饭店就与光明日报对门,又临大街,可见总理考虑问题周到。京西宾馆、北京饭店在“文革”期间未停业务,来了代表不准外出,说明保密即可以,无须其他准备。开会期间代表去大会堂是保密的,京西宾馆代表是坐大客车从京西宾馆南路绕道去大会堂。车停在大会堂后院里,每次会如此。而会议外边很多猜测,说代表是坐地铁去大会堂的。大会有三项议程,一政治报告;二修改党章;三选举中委。华北代表团(包括中直小组)。团长是李雪峰,副团长董必武、郑维山、解学恭、刘子厚。中直小组长董必武,副组长邓颖超、王良恩、郭玉峰。我在小组里帮助董老通知小组人员开会及通知会议有关事项。大会在听取了林彪的政治报告就分组讨论。有些同志在小组会议上联系自己作自我批评。胡耀邦同志写了份自我检讨叫邓大姐送周总理审阅。并请邓大姐帮助。在团中央支左的是十二军的尹忠尉同志。我知道胡在六十四军(当时是四纵队)当过政委,时间很短。他不认识我,我在战争年代也未见过胡。只知他是我的老上级。会上我们未交谈过。胡在北京工作多年,我来北京多次开会,从来未到胡那里去。因过去上、下级离的太远。去找他也不会认识。因为战争年代既未见过,也未谈过话,可以说久闻大名,从未见过。这时在会上相见他不理我。我也不便去找他。我想如找胡交谈,他会想你找我干什么?你想显露一下自己吗?再说我从来不愿串门。在北京不管是台上的,台下的我都不去。一切都是公事公办。就是陈锡联司令是我的顶头上司,他调来北京多年,我除为他爱人工作问题同组织部干事一同去过他家一次。从来未去过。我说这一段话是因为有人说:如果你在台上时看看胡的话,不会有今天。其实也不是上述情况。对胡我是尊重的,就是他倒霉的时候也是如此。现在回头来说这次会议,在小组会上胡除写检讨外未见他发言。他写检讨我也未看。他请邓颖超大姐送总理看,会上滕代远发言,陈云发言,都从历史上讲了自己的工作和缺点。董老讲了他对“共产党修养”一书的赞扬文章。当时还作了自我批评。朱总讲到斯大林在卫国战争前缺乏准备,张云逸同志不同意朱的说法等。会议进入选举议程前,通过林的政治报告。这个报告原没有小标题。是在分组讨论时,周恩来同志又叫每个

组出一个人对政治报告在文字上作些推敲，中直小组是武葆华（中央党校造反派）。国务院小组是郭沫若，找了老、中、青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参加。经过物色推敲定稿大会通过。大会还通过了修改的党章。这次大会无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只是康生对新党章作了五点说明。大会进入选举议程。这次大会共选出中委一百七十名。候补中央委员一百零九名。我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选举是采取了几上几下的办法，经过充分讨论，然后大会选举产生的。先是各小组、各代表团提出候选人。中直小组提了朱德、董必武、张云逸、陈云、滕代远。邓颖超、曹轶欧、胡耀邦、郭玉峰作候选人。报代表团汇总送大会秘书处，然后大会主席团讨论又把全部候选名单下发小组讨论。我未参加主席团对候选人名单的讨论。第一次下发小组讨论的名单有三十七名原八届中委作候选人。八届中委原是九十七人。候补中委七十三人。为什么只剩三十几人作候选人？这个名单如何产生的不得而知。周恩来同志、康生从未征求我的意见，也未找我研究过。这次大会是在经过文化大革命，对修正主义、走资派大批判，对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的清洗，经过了清理阶级队伍召开的。中央人事变动是很大的，是一次大改组。在三十七名原八届中委作为九届中委候选人中有胡耀邦。在中直小组提候选名单中也有胡。但在主席团讨论下发讨论时无胡的名字了。据王良恩讲，周恩来同志告诉他把胡耀邦拿下来，换上了谭启龙，说谭是山东省委书记，解放出来参加中委更有代表性。经过讨论又把候选名单交主席团讨论，这次会议我参加了。作为大会工作人员列席会议。讨论中谢富治提出李震作候选人。讲了他很多优点。康生又提出于桑作候选人，并说了他很多好话。候选名单是老、中、青，六十岁以上为老年。三十六岁到六十岁为中年。三十五岁以下为青年。这次下发候选名单后再由各代表团讨论。晚上华北代表团（包括中直小组）讨论候选人名单。在讨论过程中有几位老同志谦虚的说：我有错误，我不够格，把自己让出来叫别人当候选人等。会上突然有人站起来发言，说朱老总，你有错误，你反毛主席，你是总司令，可实际上打仗是毛主席指挥的……等。少数代表（主要是青年）起哄，这一来把会议搞得很紧张。这时董老讲话了。说大家不要讲了，我叫郭玉峰同志帮朱总写个检讨吧！大家都同意。董老在散会后把我找到他座位跟前说：明天你帮朱总写个检讨，我说我文化水平低，写有困难，我再找一个人共同帮朱总写，董老同意。我当即找到党校武葆华请他帮助。武又找了中调部军代表帮忙。第二天上午八点朱总拿着一堆材料到京西宾馆，由我和武葆华到朱总住地请示他如何写。朱总讲可参照他过去写的检讨（下发的检讨材料）

写，武葆华接受任务后写完交朱看。武说：朱反过毛主席。朱说我不反毛主席。武葆华把帮写的检讨经朱总看后给我，并对我讲有人说老总糊涂，我看也不糊涂。我把朱总这检讨交董老，他给周总理转呈毛主席。……九大选举期间，对陈毅、李富春等几位老同志能否当选，周总理很关心，在计票过程周总理找我和王良恩去问他们得票情况。直到统计完华告诉周恩来、康生后他们才松了一口气。在选举前王良恩曾在小组传达布置过对“二月逆流”几位同志既要选上，又不要得全票。王说这是开主席团会议时布的。按党的原则这种布置选举是不妥当的。当然在当时批二月逆流的情况下，他们几位老同志得全票是不可能的，如不布置确有选不上的可能性。

九届一中全会选政治局委员，在候补委员名单中增加了李德生、纪登奎。据周恩来同志讲这是毛泽东主席提名的。纪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分工他管中组部。到七月份他来中央工作，先是住在北京饭店，他找我谈中组部的运动、工作情况。开始他协助康生管中组部。到九届二中全会后康生得病，主要的就由纪登奎管中组部的事情了，有时也去康生处看看，共同谈谈情况，不过康生病后对中组部的事基本不管了，由纪登奎管中组部的工作了。^[2006]

四、新班子中的军人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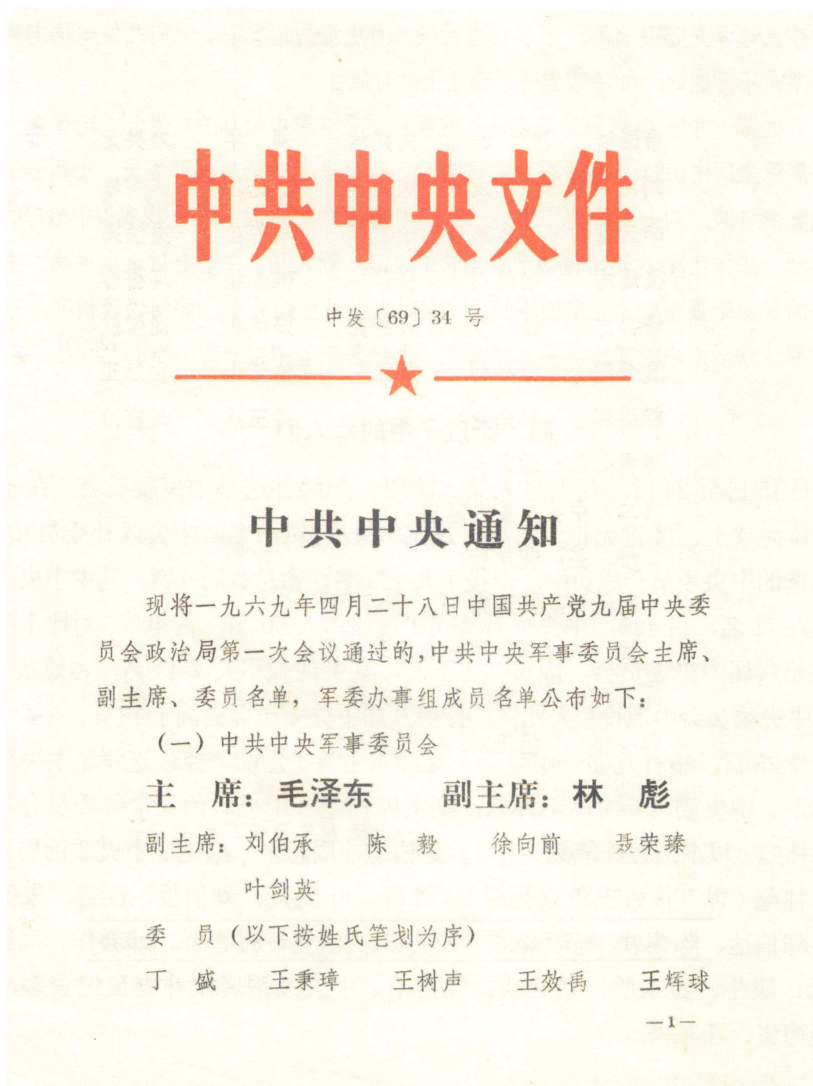
4月15日至24日，九大进入第二阶段，酝酿并选举中央委员会。在4月24日的全体会议上，经过无记名投票，选出中央委员170名，中央候补委员109名。在新当选的中央委员会成员中，现役军人123名，占总数的44%。其中中央委员中现役军人73名，占43%，中央候补委员中现役军人50名，占46%。对比十三年前的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共171人，其中现役军人仅43名，占总数25%。第九届中央委员会中现役军人比例，比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提高了19%。

4月28日，举行九届一中全会。毛泽东主持了会议。会议选举了中央机构，结果如下：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陈伯达、周恩来、康生；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

【2006】郭玉峰：《在中央组织部工作十年回忆录》，未刊稿。

第九届中央政治局成员 25 人中，非第八届中央政治局成员的新人 13 人，占总数的 52%。其中“第一夫人”江青、“第二夫人”叶群双双进入中央政治局，这是中共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异常现象。

第九届中央政治局成员中现役军人 13 人，亦占总数的 52%。对比第八届中央政治局成员 26 人（至 1958 年 5 月）中现役军人仅 5 人，占总数 19%，大幅上升 33%，反映了文革期间现役军人在中央政治核心层地位大幅上升的现实。



关于新军委组成的中共中央通知，1969年5月。

4月28日，新的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委员名单及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如下：

(一)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林彪

副主席：刘伯承 陈毅 徐向前 聂荣臻 叶剑英

委员（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丁盛 王秉璋 王树声 王效禹 王辉球 韦国清 叶群 皮定均

刘丰 刘兴元 贤权 许世友 陈士榘 陈先瑞 陈锡联 李天佑

李作鹏 李雪峰 李德生 吴法宪 张达志 张池明 张国华 张春桥

邱会作 杨得志 杜平 萧劲光 郑维山 冼恒汉 袁升平 梁兴初

黄永胜 曾绍山 曾思玉 彭绍辉 韩先楚 粟裕 温玉成 谢富治

谭甫仁 潘复生

(二) 中央军委办事组

组长：黄永胜 副组长：吴法宪

成员（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叶群 刘贤权 李天佑 李作鹏 李德生 邱会作 温玉成 谢富治

6月1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以中发[69]34号中共中央文件，向党内公布了以上名单。

新军委组成人员名单有以下四点值得注意：

(一) 军委副主席共6人，即包括除却朱德以外，在世而又未被打倒的6位元帅（包括林彪）。相对于林彪在中央委员会内唯一的一位副主席的政治地位，林在新军委中的位置就显得不怎么耀眼，他不过是六位副主席的其中一位，不仅没有被毛授予第一副主席的名分，更未如十年前般被授权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二) 新军委并未设立常委会（如设立常委会，主席、副主席理所当然为常委）。军委办事组行使军委常委会部分职能，而非其全部职能。军委办事组的一切重大举措，均须经毛泽东、林彪（实质上是毛一人）同意。在此前提下，毛泽东批准军委办事组可以军委名义行事。

(三) 军委办事组成员共10人，其中政治局委员6人，政治局候补委员1人，整体政治地位高于林彪之外的其他军委副主席（林彪之外的其他军委副主席中，政治局委员2人，即叶剑英、刘伯承，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则在九大已降为中央委员）。



左起：温玉成、刘贤权、邱会作、吴法宪、黄永胜、李作鹏、李德生
在西山军委前指，1969年。

（四）军委组成人员共49人，其中政治局常委2人，政治局委员11人，政治局候补委员2人，其余全部为第九届中央委员。委员中非现役5人（王效禹、韦国清、李雪峰、张春桥、潘复生），军委办事组10人，在京总部、军兵种、国防科委8人（王秉璋、王树声、王辉球、陈士榘、张池明、萧劲光、彭绍辉、粟裕），大军区正职15人（刘丰、刘兴元、许世友、陈锡联、张达志、张国华、杨得志、杜平、洗恒汉、袁升平、梁兴初、曾绍山、曾思玉、韩先楚、谭甫仁），大军区副职4人（丁盛、皮定均、陈先瑞、郑维山）。^{【2007】}大多数军委委员在军队内的地位和作用，远逊于军委办事组成员。

4月28日，毛泽东在对新的中央委员会全体成员讲话时称：

现在苏修攻击我们，什么塔斯社的广播，王明的材料，以及《共产党人》的长篇大论，说我们现在不是无产阶级的党，叫做“小资产阶级的党”。说我

【2007】此大军区副职4人已拟定升任正职。其中郑维山、陈先瑞于当年6月升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政委。丁盛于当年7月升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于当年11月调升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改任炮兵司令员）。

们搞一元化，回到了过去根据地那个时代，就是讲倒退了。什么叫一元化呢？他们说就是军事、官僚体制，按照日本人的话叫体制，按照苏联的话叫做“军事官僚专政”。他们一看我们这个名单里头，军人不少，这就叫“军事”；还有什么“官僚”，大概就是我呀，恩来呀，康生呀，陈伯达呀这批“官僚”。总而言之，你们凡是不是军人，都属于“官僚”系统就是了，所以叫做“军事官僚专政”。这些话嘛，我看让人家去讲！人家怎么讲，就怎么讲。^{【2008】}

所谓“军事官僚专政”，将“军事”放在前面，压了“官僚”一头。毛的讲话虽然是借用苏联的讲法，却有意无意地表露了其内心深处对以林彪为核心的军人集团权势日盛的疑心和忧虑。

第八十六节 九大以后的毛、林关系

一、高度戒备状态时期的毛、林关系

“珍宝岛事件”后，全国、全军的战备工作摆到了突出的重要位置。具体划分，战备工作状态可分为三个阶段：1969年3月至10月中旬前的高度戒备状态；1969年10月中旬至1970年4月下旬的临战状态；1970年4月下旬后，再次转入高度戒备状态。

1969年4月1日，林彪在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中称：“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放松自己的革命警惕性，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毛主席早就说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他们一定要打，我们奉陪到底。”^{【2009】}

4月14日，在九大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在九大解放军代表、公司边防站站长沙孙玉国发言后称：所有一百多人都没有打过仗，只有一个副营长打过仗，还负了伤下去了，可见没有打过仗的也可以打胜仗。对方有飞机，有装甲车，有坦克、指挥车，我们一没有飞机，二没有坦克，三没有装甲车，四没有指挥车，我们就是步兵，结果3月15日，打了五个钟头，对方三次冲锋都给打垮了。他们躲在“乌龟壳”里，把人的勇气都搞掉。当然我们也有点，但我们主要不靠那些东西，我们主要靠人的勇敢，靠抬得走的枪和炮，靠近距离作战，就是林彪同志提倡的二百米过硬功夫。三百米不打，二百米不打，一百米也不打，五十米左右才开火，他

【2008】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69年4月28日。中发[69]21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1969年5月12日发出。

【2009】林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69年4月28日。

的“乌龟壳”一翻就没有办法了。我们打了几十年仗，抗日战争没有乌龟壳，没有飞机大炮，解放战争没有飞机，但却打胜仗。当然我们不是不要装甲兵，也不是吴法宪同志那个空军也不要了，大炮、坦克、装甲车、飞机都要一点，但我们主要靠我们的勇敢，靠破除迷信，这次珍宝岛打了一个小仗，破除了一个迷信。【2010】

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称：此外，过去讲过了的，就是要准备打仗。无论那一年，我们要准备打仗。人家就问了，他不来怎么办呢？不管他来不来，我们应该准备。不要造手榴弹都要中央配发材料，手榴弹到处可以造，各省都可以造。什么步枪、轻武器，每省都可以造，这是讲物质上的准备，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准备打仗的精神。不仅是我们中央委员会，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我在这里讲的，不包括专政对象，什么地富反坏那套人。因为那套人是很高兴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打来的，他以为打来了，这个世界就翻身了，他就可以翻身了。还要准备这一条，社会主义革命过程还要革这个命。

人家打来，我们不打出去。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看你是小打还是大打，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中国这个地方不小，他不得点好处，我看他也不会进来。要使全世界看到我们的打仗是有理的，有利的，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不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至于什么飞机、坦克、装甲车之类，现在到处经验证明可以对付。【2011】

5月26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军委办事组的工作汇报。会议决定：重新组建军委办公厅和一个小规模的总政治部；由省军区 and 省市自治区革委会负责落实城市防空工作；不再增加陆军定额，把定额留着扩建海军、空军和二炮；同意将国防工业部门和原属国务院系统的第三、四、五、六机械工业部移交军队管辖。会议还讨论了组织地方部队，野战军调防，一批军队高级干部调动任免以及大学生毕业分配，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第六卷等问题。在谈到组织地方部队问题时，毛泽东说：现在不打仗，打起仗来，敌人打到哪里，就在哪里组建地方部队。当汇报到对犯严重错误的高级干部，要改变看管的办法时，毛泽东说：不要关，关他干什么。搞专案，许多是靠不住的，是道听途说的。内查外调搞不出什么东西，搞逼供信，一逼就供，一供就信。关着的人不让见面，不让看大字报，报都不让看，几年来脱

【2010】《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传达提纲》，1969年5月。

【2011】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69年4月28日。

离了世界，出了什么问题都不知道，“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种政策不那么好，这些人也不知道我们的政策。一个群众运动一来呀，总是要出点问题。北大清理阶级队伍抓了十分之一，这种风气不教育一下，我看不好。当周恩来谈到现在武汉在“反复旧”时，毛泽东说：个别的复旧是有的，但提“反复旧”的口号是错误的。谈到军宣队、工宣队时，毛泽东说：军队里头也有派性，有些军宣队、工宣队不那么公平，没有很好地执行政策。军宣队不要在所驻单位包办代替，你是帮助别人，这一点要特别清醒。谈到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第六卷时，毛泽东说：“我兴趣不大，我也不看。”^{【2012】}

5月29日，毛泽东乘专列离京到外地，随卫人员150人。历经邯郸（5月30日）、郑州（5月31日）、武汉（5月31日—6月26日）、长沙（6月26日—27日）、南昌（6月28日—29日）、杭州（6月29日—9月18日）、上海（9月18日—21日）、南京（9月21日）、济南（9月21日—22日）、天津（9月22日），至9月23日方返抵北京，合共在外地时间长达118天。这是文革以来毛泽东离京外出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随卫人员最多的一次。^{【2013】}

毛泽东选择在这一时候离京长时间逗留外地，与此际全国高度戒备状态下的紧张备战氛围并不合拍。在离京期间，毛并未有指定任何一位政治局常委——包括“接班人”林彪——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而在文革前，毛不在京时通常是指定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毛执意在外地遥控中共中央及军委办事组的日常运作。愈是晚年，毛与其党内同志的关系就愈似是君臣关系。

毛泽东在武汉期间，审阅了《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并批示“照办”（见本书第四十六节）。6月12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的这一中央正式文件如此全面地指责了文革以来对毛的造神运动的种种不是，多少损伤了人们心目中不遗余力地树立毛形象的林彪的威望。

九大之后不久，林彪去了北戴河，又去了井冈山。^{【2014】}9月，林彪授意别人代他作了《重上井冈山》一首词，他将别人代拟稿中的“坚信英明领袖”改为“志壮坚信马列”，将“何疑星火燎原”改为“岂疑星火燎原”。改后的全首词如下：

【201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252—253。

【2013】铁道部专运处：《铁道部专运处四十五年》，1998年，页117。

【2014】张云生、张丛莖：《“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香港：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页546。

西江月(重上井冈山)

繁茂三湾竹树，苍茫五哨云烟。井冈搏斗忆当年，唤起人间巨变。红日光弥宇宙，战旗涌作重洋。工农亿万志昂扬，誓把敌顽埋葬。

四十年前旧地，万千往事萦怀。英雄烈士启蒿莱，生死艰难度外。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辉煌胜利尽开颜，斗志不容稍减。^{【2015】}

林彪词中“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一句，颇有由头。事缘1930年初，毛泽东曾给林彪写过一封长信，批评过他对时局估量的悲观情绪。此信在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时，标题定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删去了林彪的名字和信中对林彪点名批评部分。问题是林彪为什么会在此时重提三十九年前的这桩旧事，为自己打抱不平？这是否与前些时候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一事有关联？林彪是否已经觉察到毛对他的疑忌？据说毛看了林的词，在“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下打了问号，说：“这是历史公案，不要再翻了。”

9月30日，林彪视察空军第三十四师所属的西郊机场。据称，林彪视察后即令军委办事组负责人到其住处谈战备问题。林彪称：这个仗看来八成是打不起来，但要作八成可能打起来的准备。明天就是国庆节。在节日举行大型群众集会，在人们正欢欢乐乐的时候，说不定战争就打响了。如果敌人知道我们过节，对我们来个突然袭击怎么办？苏联设在外蒙的空军基地，距北京只有几百公里，飞机用不上一个小时就到了。如果打导弹，只要几分钟。我刚才坐车到西郊机场去转了一下，看见飞机还一排排地在那里明摆着，似乎没有一点应付意外的准备。这不行，也很危险。因此，要立即采取措施，改变这种等着挨打的情况。第一，北京附近几个机场的飞机，除留下作战值班的以外，其余的一律要在今日夜间转移到外地的机场去；第二，要在机场跑道上设路障，以防止敌空军实行机降；第三，留在机场的值班人员，要全部配发武器，准备打敌人的伞兵。另外，节日的其他战备工作也要搞好。关键是10月1日、2日、3日，1日又是关键中的关键。只要在这关键的几天里不出什么事，问题就不大了。^{【2016】}

【2015】《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中发[1972]24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1972年7月3日印发。

【2016】林彪视察事，见《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简报》总138号，1972年6月10日。林讲话内容引自《“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上册，页552-553。



中排左起：刘贤权、邱会作、吴法宪、黄永胜、李作鹏、李德生、温玉成与工作人员
在西山军委前指，1969年。

林彪的指示，空军当日即以“一等紧急战备演习”的名义进行了落实。^{【2017】}空军这一“一等紧急战备演习”，在资料中未见毛已批准的记载，似有违军委办事组有关部队调动使用权限的规定（有关规定详见下文）。

10月1日，建国二十周年纪念日是在严峻的战备氛围中度过的。国庆节后，战备形势依然紧张。

10月9日-10日，林彪在军委办事组副组长吴法宪、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副总参谋长兼总参作战部部长阎仲川等陪同下，乘飞机到张家口、宣化地区视察，接见了驻当地的陆军第六十五军、第二十七军和空军部队的有关负责人。^{【2018】}

10月14日，林彪在住处听取了郑维山、陈先瑞有关北线设防问题的汇报。^{【2019】}

【2017】《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作战战备工作大事记（1949-1994）》，页419。

【2018】林彪视察张家口地区具体日期，目前有多种说法。张云生早期的《林彪秘书回忆录—毛家湾纪实》（香港：存真社出版公司，1988年初版）并无具体日期记载；后来的《“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一书，“正式动身的这一天”，注明为10月5日；张家口地区档案缩编《张家口地区大事记》（北京：档案出版社，1987）记载为“10月8-10日，林彪、叶群、吴法宪等人由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陪同到我区进行活动”；《陆军第二十七集团军军史》记载林彪视察该军日期为10月9日。本文从10月9日-10日说。

【2019】《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简报》总212号，陈先瑞发言，1972年6月22日。

二、临战状态下的“战备疏散”

9月11日中苏两国政府首脑会面后，中苏关系其实有缓和的迹象。

10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称，“为了使两国边境局势得以和缓下来，使中苏边界谈判能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举行，中国方面建议，中苏双方首先就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脱离接触的临时措施达成协议。对此，中国政府在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八日已有正式信件送交苏联政府。一九六九年十月六日，中国政府在给苏联政府的另一正式信件中，又重申了这一建议。”“中国政府始终认为，不应当回避中苏边界存在问题的客观事实，要认真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进行全面谈判。现在中苏两国政府已经商定，中苏双方就中苏边界问题在北京举行外交部副部长级的谈判，谈判开始的时间正在协商中。”^[2020]

诡异的是，毛泽东并不相信摆在眼前的中苏缓和的现实，相反，毛认为战争的危險迫在眉睫。10月中旬，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作出疏散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决定。^[2021]在京的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批党政机关及其干部家属被“战备疏散”到外地。^[2022]

10月14日，毛泽东乘专列离京。这是毛泽东在本年内第二次长时间离京到外地，随卫人员150人。10月15日，专列抵达武昌，毛在此间居留至翌年4月11日返京。^[2023]

与5月至9月那一次离京同样的是，毛离京期间未有指定任何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10月16日，林彪乘专机抵达江苏硕放机场，下午乘汽车转抵苏州。次日下午，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乘军用吉普到苏州晋见林彪。林彪在苏州居留至翌年4月26日返京。^[2024]

10月中旬以后，“最高统帅”毛泽东远在华中的武昌长驻，“副统帅”林彪“战备疏散”至华东的苏州，周恩来和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等留守北京。整个临战状态下的统帅部，在中国大地形成了武昌—苏州—北京这样一个大三角形，

【2020】《人民日报》，1969年10月8日。根据中苏两国协议，10月19日，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到达北京。10月20日谈判开始。

【2021】《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六卷，页108。

【202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页329。

【2023】《铁道部专运处四十五年》，页117。

【2024】黄厥明：《关于林彪及其死党叶群来苏活动情况的揭发》，1974年5月。黄1969年为林彪在苏州住地南园的上级主管部门——苏州市革委会外事组主要负责人，负责林在苏州期间的接待工作。不少著述（如张云生的《“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将林彪到达苏州的时间误为10月17日，应不确。

三个点之间各自相距：武昌—北京 1,150 公里，北京—苏州 1,150 公里，苏州—武昌 750 公里！这哪像是一个处于临战状态下正常运作的统帅部？！说白了，武昌决策，北京执行，苏州不过是被晾在一边，可有可无。

10月17日，周恩来与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批会见在京的一些“老同志”，向他们宣布毛泽东和中央关于战备疏散的决定称：主席根据当前形势，决定一些老同志在20号或稍后从北京疏散到外地。主席指定了每个人的去处。各地安置工作，均由我打电话安排，中央办公厅负责准备专机或专列。^{【2025】}

随后，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叶剑英、刘伯承、朱德、董必武，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徐向前、聂荣臻被疏散离京。董必武、朱德与李富春及蔡畅、张鼎丞、张云逸、滕代远、陈奇涵到广州从化，陈云、邓小平、王震到南昌，陈毅到石家庄，徐向前到开封，聂荣臻到邯郸，刘伯承到武汉（后转上海），叶剑英到长沙，谭震林到桂林，邓子恢到南宁，王稼祥到信阳，徐海东到郑州。这种“战备疏散”的直接结果是造成了一个客观态势：整个中央政治局被拆散，其成员（尤其是曾参与“二月逆流”的人）分散在各地，不可能相互串联，根本无法形成对毛泽东集权的威胁。

监护中已患病的刘少奇、陶铸，亦在疏散名单上。刘少奇疏散到开封，陶铸疏散到合肥。由于疏散地医护条件远劣于北京，刘少奇在离京的第26天，11月12日因急性肺炎逝世于开封，终年71岁。陶铸则在同月30日因癌症逝世于合肥，终年仅61岁。

原大将徐海东1970年3月25日病逝于疏散地郑州。原上将郭天民、李涛分别于1970年5月26日、12月22日病逝于疏散地广州从化。

三、《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

10月17日，林彪在抵达苏州后的第二天，就军队“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口述了四点紧急指示。^{【2026】}

10月18日晚，已疏散到北京西山的新组建的军委前进指挥所，由阎仲川经手，将林彪的指示根据黄永胜的传达整理后，未经请示已入睡的黄永胜，即冠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的标题，以前指名义下达全军。该指示全文如下：

【202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页329。

【2026】林彪作出紧急指示的时间，根据《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页29的紧急指示复印件。材料之三原注：“林彪口授的‘紧急指示’，是原林彪办公室工作人员李根清誊抄的，是从林彪住地查获的。”

林副主席指示

(第一个号令)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二十一时半

第一，近两天来，美帝、苏修等有许多异常情况，苏修的所谓谈判代表团，预定明(十九)日来京，我们必须百倍提高警惕，防止苏修搞欺骗，尤其十九、二十两日，应特别注意。

第二，各军区，特别是“三北”各军区，对重型武器，如坦克、飞机、大炮，要立即疏散隐蔽。

第三，沿海各军区也应加强戒备，防止美帝、苏修可能突然袭击，不要麻痹大意。

第四，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兵器的生产，如四〇火箭筒、反坦克炮等(包括无后坐力炮和八五反坦克炮)。

第五，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

第六，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

执行情况，迅速报告。

(这个指示传达到十一个大军区和海、空军、卫戍区)^{【2027】}

同日，前指还传达了林彪给第二炮兵的指示(第二个号令)，要求二炮部队要加强本身防护，同时待命，必要时参加战斗。同日，前指还传达了军委办事组给各总部、各兵种、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和总参各有关部局的指示(第三、四个号令)，要求按照国庆期间战备工作要求转入战备状态。凡已组织精干指挥班子、有隐蔽指挥位置的单位，应立即进入指挥位置；全部人员要做好就地疏散的一切准备。^{【2028】}

全军各部队依照前指的四个号令，立即行动，当夜即疏散到位。按照四个号令紧急疏散的部队，约有陆军90余个师、520余个团，海军430余艘舰艇，空军4,100余架飞机。^{【2029】}

前指四个号令尤其是第一个号令下达后，全军完全进入了紧张的临战状态。这一状态延续了半年多时间，到1970年4月下旬方稍有缓和，全军再度转入高度戒备状态。

关于《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汪东兴文革结束后在其回忆录中称：

【2027】《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页29；《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六卷，页108-109。

【2028】《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作大事记(1949.10-1987.12)》上册，页344-345。

【2029】该数字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六卷，页109。

10月19日，林彪采用电话记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主席。

他们先送交周恩来总理阅。周总理阅后批示：请主席阅。

我拿此急件送到主席住处，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又要烧。我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

主席听我这样说，这才作罢。

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问我：“主席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

我对周总理说：“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

周总理惊诧地说：“烧了？”

我回答：“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

周总理听到这里没有说话。

林彪和黄永胜等人知道了此事，慌了手脚，下令撤销了这个命令。^[2030]

汪东兴上述回忆中，除了最后一句“林彪和黄永胜等人知道了此事，慌了手脚，下令撤销了这个命令”不实，这个命令并没有撤销外，其余有关毛“一脸不高兴”的描述，大抵是真实的。

毛泽东为什么会“一脸不高兴”？推测起来，不外是以下三个原因。

1. 该事件涉及调动军队权限的敏感问题。军委办事组确实在1968年4月26日下发过《关于部队调动使用权限的规定》，严格要求：执行各种任务的陆、海、空军部队，营（相当于营）以上部队的行动和部署变更，一律呈请毛泽东、林彪审批后才能行动；凡执行作战任务的部队，无论部队大小均报请毛泽东、林彪批准后方可行动。

1969年1月10日，军委办事组重申北京卫戍区部队调动使用权限的8条规定。其中有关部队调动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卫戍区部队和民兵武装的任务、部署、兵力调遣、临时警卫勤务等，都必须报告总参谋部，经呈毛泽东、林彪、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作出决定后，由卫戍区具体组织实施。卫戍部队的部署调整、兵力调遣、执行会场路线警卫和押解勤务等，不足1个排的兵力，由卫戍区决定，报总参备案；1个排的兵力，报请总参批准；2个排以上至2个连

[2030] 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页14-15。

以内的兵力，由总参报请军委办事组批准；2个连以上的兵力，一律报请毛泽东、林彪、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批准。^{【2031】}

阎仲川所拟《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内容在军委办事组上述两个规定范围内，理应在下发前征得毛泽东及林彪两人的批准同意（林彪没有独立于毛泽东之外的任何一个等级的批准权限）。前指尤其是阎仲川并没有依规定执行，在程序上确甚为不妥。阎仲川的任命命令是1969年5月8日发出的，到10月18日已足足有五个月时间，阎作为主管作战的副总参谋长，如果说他不了解有关军队调动的必要程序，恐怕是很难说过去的。

2. 除未经毛本人同意就命令全军进入临战状态外，引起毛极反感的应该还有“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这一标题。据阎仲川后来说，他是考虑林彪指示发出时需加个编号，而这是前指开设之后发出的第一个指示，因而“就从一号编起，叫‘一号号令’吧！”但是，“一号”这一字眼，在中央高层是毛泽东的代称，不是其他人所能用的。林彪在党内军内是二号人物，为什么他的指示（况且未经真正的一号毛泽东同意）是“第一个号令”呢？阎仲川之子阎明后来著书也写道：“那时‘一’字不是什么人都能使用的。父亲来京时间短，涉世浅，又没人提醒，实在不知这里还有这些规矩，不经意间捅了篓子。”^{【2032】}

3. 毛泽东将林彪放在苏州，本身就有将林冷落一旁，自己直接指挥在北京的周恩来及军委办事组的考虑。没想到林一到苏州即对战备发出指示。林这种反其道而行之，主动显示存在感的举动，有违毛的意图，因而有不寻常的“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这么强烈的反应。

常言道：魔鬼存在于细节之中。由于上述原因，“第一号令”事件已经超出简单的“工作程序”范畴，而被毛视为挑战或侵犯他所独掌的军权的政治问题。周恩来正是读懂了毛的肢体语言，所以当时知道后“没有说话”。而在“九一三事件”后，这个事件自然成了重点追查的问题。在一般人看来，阎仲川因“程序”问题被查很冤屈，但在当时极其特殊的政治环境下，这一事件确实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

10月22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颁发《关于部队调动使用权限的规定》。规定指出，部队执行生产、施工、训练、助民劳动任务和正常部署调整的调动，营以下由各军区、军兵种批准，报总参谋部备案；团（不含）以下由军委办事组批准；团以上报毛泽东及林彪审批。部队执行抢险救灾任务，仍按以前规定执

【2031】《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作大事记（1949.10—1987.12）》上册，页335、337。

【2032】阎明：《往事不忍成历史》，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页42。



左起：董其采、胡敏、李作鹏、叶群、黄永胜、吴法宪、
邱会作、项辉方、陈绥圻在京西宾馆前。

行。师、团机关离驻地野营训练，一周以内由各军区、军兵种批准，报军委办事组备案；一周以上报军委办事组审批。执行作战任务的部队行动、原则上仍按军委办事组 1968 年 4 月 26 日规定执行；对中苏、中印边境地区，无论大小部队的作战行动，均报毛泽东及林彪或中共中央常委批准后方可行动。为不失战机，可预先报告方案。对内地的平叛剿匪和东南沿海以及中缅边境的国民党军残部小

股袭扰的反击作战，可边行动边报告。对执行三支两军任务部队的调动，营以下由各军区、军兵种批准，报中央军委备案，营以上报毛泽东、林彪或中央常委审批。^{【2033】}

中共中央、军委 10 月 22 日的规定，似乎是针对前指 10 月 18 日发出的《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的修正。自此以后，再未见到林彪对战备和军事问题独自发出任何新的指示。惟自此以后，毛、林之间的嫌隙更加难以愈合。

第八十七节 军委办事组主导的全军战备工作^{【2034】}

1969 年一整年间，中国都是处于紧张的战备氛围之中。军委办事组在全军战备工作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主导性作用。有关史实，列举如下。

一、空军部队扩编

1 月 6 日，遵照军委 1968 年 8 月 27 日批复，空军第十军军部在山西大同成立，隶属北京军区空军建制。张宪章任军长，高德襄任政委。该军负责指挥驻大同、张家口、包头地区的空军部队，担负保卫首都和华北部分地区的防空作战任务。

3 月 20 日，军委批复空军，同意 1968 年 12 月 21 日《关于空军一九六九年部队组建计划》。据此，6 月，空军兴宁指挥所改为空军第十二军军部。兴宁指挥所主任解耀宗、政委彭由分别任十二军军长、政委。7 月 17 日，空军高射炮兵第十八师由南京军区空军抽组在江苏南京成立。郭广权任师长，刘蔚林任政委。7 月 31 日，空军第四十师由沈阳军区空军抽组在辽宁丹东浪头机场成立。赵俊山任师长，黄则奇任政委。8 月 10 日，空军第四十一师由北京军区空军抽组在内蒙古公庙子机场成立。杨节才任师长，崔三英任政委。8 月 26 日，空军第四十二师由广州军区空军抽组在广西桂林机场成立。杜玉福任师长，陈仲强任政委。9 月 21 日，空军第四十三师由沈阳军区空军抽组在吉林二台子机场成立。马山亭任师长，张玉生任政委。11 月 10 日，空军第十一军军部在陕西西安组建，隶属兰州军区空军建制，担负陕西地区的防空作战任务。姚长川任军长，张廷桂任政委。11 月 24 日，空军第四十四师由武汉军区空军抽组在湖北山坡机场成立。王贵申任师长，黄祥任政委。同日，空军第四十五师在安徽蚌埠机场成立。马健中任师长，竹虚任政委。12 月 24 日，空军高射炮兵第十七师在陕西西安成立。王志忠

【2033】《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作大事记（1949.10—1987.12）》上册，页 345。

【2034】本小节资料来源：除特别注明外，全部出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作大事记（1949.10—1987.12）》上册，不再一一注明。

任师长，张克仁任政委。12月26日，空军高射炮兵第十九师由武汉军区空军抽组在湖北武汉成立。师长暂缺，邢祥任政委。

9月1日，经军委办事组1968年8月27日批准，空军高射炮兵第十六师由成都军区空军指挥所和南京军区空军抽组在四川成都成立，归成都军区空军指挥所建制。李长松任师长，纪忠明任政委。

10月3日，经军委办事组1969年9月26日批准，空军第四十六师在甘肃鼎新机场成立。李春吉任师长，刘自力任政委。

综上所述，空军1969年内组建了3个军部、7个航空兵师、4个高射炮兵师。^{【2035】}

二、成都军区部队扩编及四川省军区成立

1月13日，军委电复成都军区，同意成都军区以独立师师部及所属第十六、十七、十八团和军区步兵第七团为基础，编为军区独立第一师。以军区步兵第九、十一、二十、二十二团和独立师的第二十三团等5个团为基础，编为军区独立第二师。

1月29日，军委批复成都军区1月10日请示，为加强对军分区和独立团等地部队的领导，同意成立四川省军区，该军区10月1日成立，隶属于成都军区建制，成都军区副司令员谢正荣兼任司令员，邓经纬任政委。

三、后勤单位的调整扩编

1月13日，军委批复总后，同意总后大同办事处迁往太原市，并改称为总后太原办事处。

3月11日，军委批复总后，同意将青藏办事处与西安办事处合并，称西安办事处。合并后，西安办事处设青藏兵站部（相当于师级，驻西宁），负责统一管理进藏物资的运输和领导驻西宁地区的汽车、工程部队及医院、仓库等单位。

4月27日，军委批复总后，同意在各办事处下，以“站库合一”的方式，组建16个基地兵站。即齐齐哈尔、乌兰浩特、叶柏寿、阳高、原平、太原、长治、灵宝、西安、宝鸡、西宁（由青藏兵站部兼）、资阳、夹江、重庆、龙里、株洲、涟源等基地兵站，各基地兵站行使师级权限。

10月18日，总参、总后电武汉军区，同意在洛阳、郑州、平顶山地区，组建武汉军区后勤部临汝基地兵站，行使师级权限。

【2035】空军政治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大事典》，1994年，页354-367。

11月17日，总参、总后通知武汉军区，信阳大茶沟综合库，再增建3万平方米，称第七三七仓库。以该仓库为基础，组建基地兵站，称武汉军区后勤部信阳基地兵站，行使师级权限。

12月30日，总参、总后电复福州军区，同意将第八十八兵站和第七七八仓库改编为基地兵站，依次称福州军区后勤部永春、南平基地兵站，均行使师级权限。

四、海军部队扩编

1月20日，根据军委1月13日批复，海军命令龙门巡防区扩编为龙门水警区，沿用原龙门巡防区代号，执行师级权限，归南海舰队建制领导。

10月16日，海军命令，根据军委10月14日批复，组建广州、上海、烟台三个基地，番号依次称海军广州、上海、烟台基地，代号分别为9090、9260、9415部队，均执行军级权限，分别归南海、东海、北海舰队建制领导。广州基地辖汕头、川岛水警区和黄埔修船部队，司令员、政委缺；上海基地辖淞沪水警区、陈家港巡防区、上海修船部队，杜彪任司令员，高志荣任政委；烟台基地辖威海、秦皇岛水警区，蓬莱巡防区、海岸炮兵第十一团及其它部队，苏军任司令员，胡汉生任政委。

10月31日，海军命令，根据总参9月29日批复，以北海舰队第一工地指挥部为基础，组建秦皇岛水警区，代号为9416部队，执行师级权限，归烟台基地建制领导。^{【2036】}

上述基地的组建，使海军军级基地由原来的4个（旅顺、舟山、福建、榆林）增加至7个，增幅为40%强。

五、新疆军区部队扩编

1月27日，军委命令，由北京军区和沈阳军区为新疆军区组建1个陆军师，番号称陆军第三师。7月25日，军委决定，该师8月中旬入疆，归新疆军区建制领导。

3月20日，军委批复新疆军区，同意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50个警卫连计6,000人改为现役部队，各项规章制度按军队现行制度执行，但不列入军队定额，各项经费均由生产建设兵团自负。

【2036】海军司令部：《海军组织建设大事记（1949—1981）》，1982年，页279、290—292。

9月13日，经毛泽东批准，军委命令，新疆军区组建1个地面炮兵师，称炮兵第十三师。师部由军委炮兵负责抽组；所属部队由炮兵和新疆军区以及福州、武汉、南京、济南军区抽组。该师于1970年1月5日在河北省邢台成立，7月15日进驻新疆。

9月16日，军委批复新疆军区，同意以步兵第五团和骑兵第一师为基础，整编为1个陆军师，称陆军第八师，归新疆军区建制领导。

六、毛、林、周同意1969年度国防经费预算

2月30日，军委办事组向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报告称：呈上总后勤部关于1969年国防费报告，军委办事组讨论后，拟原则同意。其中关于部队营房工程经费使用问题，我们意见，1969年原则上不新建营房，特殊需要的报总后勤部特殊解决，1968年已开工的工程，在节约原则下完成继建，但不准扩建。该报告经周恩来批示：“拟同意。”毛泽东、林彪均圈阅同意。

总后前于2月16日就1969年国防费预算安排向军委办事组报告称：1969年国防经费、国家预计拨款130亿元。今年经费开支的重点是：人马生活费、装备购置费、国防工程费和装备维修费。行政事业费尽量节约。

11月11日，总后供应部《情况简报》称：今年国防费预算，年初经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批准为130亿元，9月27日中央批准装备购置减少拨款10亿元，国家拨款成为120亿元，9月份我们曾预计可能开支110亿元左右，现在，根据战备需要增开支达8亿余元，这样年终开支可能达117亿元，但现金不会全部支出去。^{【2037】}

七、组建铁道兵西南指挥部

3月11日，军委批复铁道兵2月6日请示，为统一领导西南地区施工部队，同意在成都设立1个精干的指挥机构。6月15日，总参谋部批复铁道兵，铁道兵西南指挥部按200人定编。该指挥部于6月25日在成都市成立。何辉燕任司令员，苏超任政委。

八、入越作战部队全部离越回国

3月14日，入越作战的空军高炮部队最后一批回国。4月，陆军野战高炮部队全部回国。从1965年中起，空军先后有8批7个高炮师部、26个高炮团、8个高炮营、9个探照灯营、14个雷达连入越作战；陆军高炮部队先后有9个高炮师、

【2037】《军队财务史料（1967-1969）》，页479-480。

37个高炮团、80个队属高炮营入越作战。11月下旬，昆明军区组织的援越工程部队全部离越回国。

九、军委办事组召开座谈会研究设防等问题

5月2日—6日，军委办事组在北京召开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各军区、各军兵种及三总部的负责人。会议由黄永胜主持，学习了毛泽东等军委领导人关于设防和防空降等问题的指示，讨论了准备打仗等工作。该座谈会的纪要，经毛泽东、林彪批准，于6月18日以军委[69]9号文件下发各大单位执行。

纪要还称：“遵照毛主席关于精简机构的指示，会议还讨论了各军区、各军兵种、各总部机关精简和体制调整问题。机关精简方案，根据讨论的意见，待综合研究整理，报毛主席和中央批准后实施”。

十、沈阳军区部队扩编

5月9日，军委办事组电沈阳军区，决定以工程第四支队部和建筑第三〇一团为基础，在赤峰地区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守备第四师。该师于10月20日组成，归陆军第四十军领导。

10月21日，军委电沈阳军区，同意以黑龙江独立第二师第六、十团和乌盟军分区骑兵团为基础，组建守备第五师和1个独立守备团。守备第五师于12月31日组成，归黑龙江省军区领导。独立守备团归黑河军分区指挥。

十一、国防工业移交军队管辖

5月26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参加军委办事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汇报会。当谈及准备将国防工业部门和原属国务院系统的第三、四、五、六机械工业部统移交军队管辖时，毛泽东表示同意。^{【2038】}

7月12日，军委批复国防科委第208号请示，同意原由国防科委领导的4个研究院和2个基地，分别移交总后、海军、空军领导。据此，国防科委将第十一、十二研究院和第三十一基地移交总后建制领导；第七研究院和第二十三基地移交海军领导；第六研究院移交空军领导。

8月31日，国务院和军委决定成立：航空工业领导小组，吴法宪为组长；造船工业、科研领导小组，李作鹏为组长；常规兵器工业领导小组，邱会作为组长；电讯工业领导小组，李作鹏为组长。

【2038】《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页300。

11月5日，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向军委、国务院业务组报告：遵照中央的决定，从11月1日起，将二、七机部划归国防科委管辖。^[2039]

12月18日，鉴于三、四、五、六机部已交两部（总参、总后）、两军（海、空军）分别接管，二、七机部已移交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已分别划归军委办事组和国家计委，国防工政已撤销的情况，国防工业军管小组组长粟裕向周恩来及军委办事组提出：国防工业军管小组已无存在的必要，建议即行撤销。12月23日，粟裕电话请示周恩来，周同意军管小组结束。^[2040]

12月22日，中共中央通知称，“经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批准，为了加强国防工业的领导，决定在军委办事组之下，成立国防工业领导小组，邱会作、曹里怀、周希汉、李如洪、周世忠、封永顺、吴信泉等同志为领导小组成员，由邱会作任组长，李如洪、封永顺任副组长，并兼领导小组办公室正、副主任。”“自即日起开始办公。”^[2041]

国防工业移交军队管辖，是在当时形势下不得已采取的非常措施。这一措施前后实行了四年，其利弊都是显而易见的。1973年9月10日，国务院、军委发出《关于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的通知》称，“为了加强对国防工业的统一领导，经中央批准，成立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受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以国务院为主。主要任务是对国防工业的生产、建设和科研，进行统筹规划，全面安排，组织执行。从一九七三年十月一日开始办公。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即行撤销。”该通知标志着军队管辖国防工业这一局面的正式结束。

十二、北京军区部队改编、扩编

6月6日，经毛泽东批准，军委办事组批复北京军区，同意组建守备第三十三、三十四师，分别归陆军第六十九军和内蒙古军区领导。12月22日，根据军委办事组决定，守备第三十三、三十四师依次改称守备第一、二师。

此前2月24日，经毛泽东批准，军委通知北京军区，将陆军第三十八军改编为摩托化军。军部辖3个摩托化师，军直炮兵团、火箭炮团、高炮团各1个。每师辖3个摩托化步兵团和1个坦克团、1个地炮团、1个高炮团。

^[2039] 《导弹与卫星发展大事记》，北京：宇航出版社，1989年，页97。

^[2040]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粟裕年谱》，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页668-669。

^[2041] 中发[69]86号中共中央文件，1969年12月22日。李如洪，原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封永顺，1969年9月升任总后副部长。吴信泉，时任炮兵副司令员。

10月14日，军委批复北京军区9月14日请示，同意以第三、二、四、五、六工区和13个工程兵建筑团，给陆军第二十四、六十三、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九军各组建1个步兵师。北京军区于12月底完成组建任务。该5个陆军师依次称陆军第七十一、一八六（后改一八九）、一九五、一九八、二〇六师。为统一番号排列顺序，陆军第六十九军现辖第二十八、一〇七师，依次改称陆军第二〇五、二〇七师。

十三、总部机关精简整编

6月13日，经毛泽东批准，军委办事组公布总参谋部、总后勤部机关精简方案。据此，总参、总后机关进行精简整编。

总参原编15个部、局，将装备计划部拨归总后，与军械部合并；将军事交通部拨归总后，与运输部合并；将动员部与军务部合并为一个部，称军务动员部；将军委直属的防化学兵部改为总参的一个部，称防化学部。这样，总参共编13个部、厅、局，即办公厅（军委办公厅兼）、作战部、情报部、三部、军训部、军务动员部、防化学部、政治部、机要局、测绘局、外事局、气象局、管理局。

根据中央决定，将中央调查部与总参情报部合并，中央气象局与总参气象局合并，国家测绘总局与总参测绘局合并。

总后原有11个部1个局，加上总参整编中并入的部，共为13个部1个局。整编方案是：将财务部、军需部、物资部、运输部的油料业务部分合并，称供应部；将运输部的运输业务部分与总参军事交通部合并，称军事运输部；将军械部及运输部的汽车、陆军船舶的装备管理与总参谋部装备计划部合并，称装备部；将工厂管理部、军马部的军马生产部分合并，称企业部；将军马部的兽医、药材部分合并于卫生部，仍称卫生部。合并后，总后保留8个部1个局，即司令部、政治部、供应部、卫生部、装备部、军事运输部、企业部、营房部、管理局。

1969年10月，黄志勇、田维新被任命为总政副主任。11月28日，军委办事组公布总政治部机关精简方案。据此，总政机关由原编的13个部、院，缩编为6个部、室。即：办公室、组织部、干部部、宣传部、保卫部、群众工作部。

12月，总政恢复办公，李德生任总政主任（正式任命时间1970年4月）。

这次调整后，三总部各机关编制人数均大幅度减少，总参机关经过调整，原有处、室、科294个，减为123个，减少58%；编制干部由3,886人减为1,944人，减少50%。总后减员幅度也在50%左右。总政人员减少幅度最大，比原编制干部数减少了78%。

与总部机关精简整编同时，1969年9月24日，军委办事组对军事科学院的精简工作作出批示，要缩小机构，精减人员。根据这一要求，军事科学院于11月调整了体制编制。全院在编人员由891人，减少到300人，裁减幅度达66%。整编后，设院办公室、政治部，及战争理论、战术、战史以及外国军队四个研究部，撤销了军事技术直观教研馆。^{【2042】}

十四、组建三个陆军军部

6月16日，军委命令，闽北指挥部改编为陆军第二十九军，原由闽北指挥部领导指挥的陆军第八十四师、守备第七师和由福州军区直属炮兵第五十三团改称的第二十九军炮兵团、福建省军区独立第一师改称的陆军第八十五师划归第二十九军建制。蒋学道任军长，尹明亮任政委。11月，遵照军委指示，二十九军军部由福建连江丹阳移驻莆田后卓，接替闽中防务，领导指挥第九十二师，福建省军区独立第二师和福州军区守备第二师、第三师；原属二十九军建制的第八十四师归还第二十八军建制北调，第八十五师、守备第七师（当月改称守备第一师）划归福州军区直接领导。^{【2043】}

10月22日，军委电复兰州军区8月9日请示，同意从军区机关和步兵学校抽调人员，组建1个陆军军部，称陆军第十九军，军部驻甘肃张掖，归兰州军区建制。杜绍三任军长，王玉昆任政委。11月，陆军第五十五师由青海进驻甘肃河西走廊，归陆军第十九军建制。奉军委办事组9月9日电令，兰州军区守备师于1969年12月组建，隶属兰州军区领导。同年12月，改属陆军第十九军建制。遵照军委8月15日批示，坦克第十二师于10月12日组建，隶属兰州军区建制，由第十九军代管。12月4日，根据军委指示，兰州军区决定军区工程兵第二工区拨归第十九军建制领导。^{【2044】}

11月14日，军委命令：为统一对滇西部队的领导和指挥，同意在该地区组织1个简编的陆军军部，番号称陆军第十一军，辖陆军第四十九师和新建的1个陆军师，并领导滇西3个边防军分区的对敌斗争。该军于11月25日成立。董占

【2042】《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六卷，页139-141。

【2043】《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二十九军军史》编审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二十九军军史》，1999年，页1。

【2044】兰州军区政治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西北）军区组织史》，1994年，页550-558。

林任军长，王玉琨任政委。军委办事组12月8日通知，决定将第四十九师改称第三十一师，新建的一个陆军师称第三十二师。^{【2045】}

至此，陆军军部达至36个，为自1952年全军精简整编以来最高峰。

十五、郑维山等任职

6月17日，经毛泽东批准，军委任命：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为北京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副政委陈先瑞为北京军区政委；济南军区副司令员陈宏为装甲兵司令员；陕西省革委会主任李瑞山为兰州军区政委兼陕西省军区第一政委。

郑维山的任命，结束了北京军区自1967年2月以来没有正职司令员的不正常局面。

此前，5月8日，经毛泽东批准，军委任命：铁道兵司令员张翼翔为第二炮兵司令员；铁道兵政治委员刘贤权为铁道兵司令员，政治学院革委会主任宋维斌为铁道兵政委。

此后，7月12日，经毛泽东批准，军委任命广州军区副司令员丁盛为广州军区司令员。8月2日，任命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周赤萍为福州军区政委。11月12日，任命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为炮兵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为兰州军区司令员。

十六、军委办事组召开“三北”地区作战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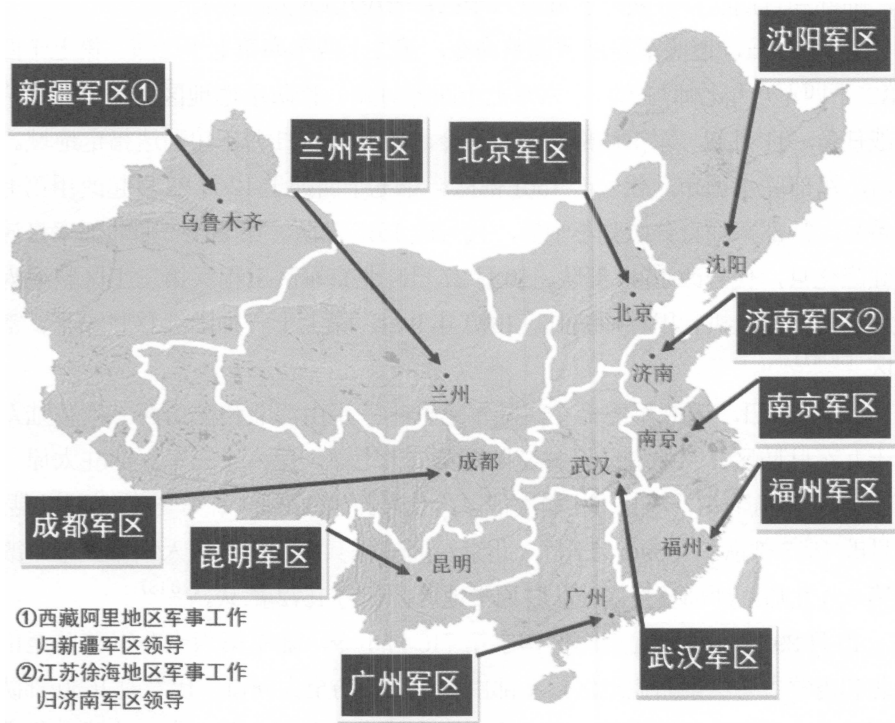
6月20日—7月4日，军委办事组在北京召开“三北”（东北、华北、西北）地区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沈阳、北京、兰州、新疆4个军区主管作战的领导人和各军兵种、三总部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会议研究了防止苏军突然袭击的作战思想准备、作战设想、部署调整和边防斗争等问题。这次会议纪要，于8月16日呈报毛泽东和中央审批。8月20日，毛泽东批示：已阅照办。九十月间，总参、总后组织联合检查组赴北京、兰州、新疆军区检查部队落实军委办事组座谈会和“三北”地区作战会议的情况。

十七、内蒙古：从分而治之到全面军管

7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变更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划的决定。1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批示“照办”的关于内蒙实行分区全面军管的决定。详见本书第六十一节。

【2045】成都军区百科编审室编：《西南军区、成都军区、昆明军区、西藏军区军事工作大事记（1945.5-1985.8）》，1987年，页478。

十一大军区分布图(1969-1976)



十八、北京军区：野战军的调入和调防

8月20日，军委电令：“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批准，为了防止苏修突然袭击，加强张家口地区的兵力部署，决定调二十七军进驻宣化、张家口地区，归北京军区指挥，协同六十五军在张家口地区现有部队，担任阻止敌人沿二连、张家口方向向北京突然袭击的任务。”8月21日，二十七军发出紧急战备命令，开始收拢部队。8月27日黄昏起，部队陆续由铁路输送向预定作战地区开进。第八十师为军第一梯队，9月2日进驻张家口市，代号改1600部队。军部为第二梯队，9月4日到达宣化地区，代号改1591部队。第七十九师为第三梯队，9月8日全部进驻宣化地区，代号改1588部队。第八十一师奉命暂留镇江，后根据上级指示，于同年11月调防河北省邯郸地区待命，代号改1585部队。1970年3月，奉军委和北京军区162号电令，二十七军军部暨第七十九师移防石家庄、邢台地区。七十九师师部进驻邢台市原六十三军一八七师师部营房。军部进驻原石家

庄步兵学校营房。第八十师留驻张家口地区担负国防施工任务。同年10月完成任务，师部和直属队移驻获鹿县城原六十三军一八八师师部营房。^{【2046】}

10月21日，遵照军委部署调整命令，第二十四军率第七十二师、第七十四师（第二十四军一九七师与第六十六军七十四师对调）移防承德地区，担负北线防御作战任务。11月初，军下达部署调整命令，各部队于11月下旬到达指定地域。调防后，军部驻承德市，代号改1501部队。第七十四师于12月25日起改用第七十师番号，师部率师直分队驻丰宁县，代号改1515部队。第七十二师师部率直属分队驻隆化县，代号改1505部队。10月27日，北京军区工程兵第三工区整编为陆军第七十一师，执行甲种师编制。1970年9月，第七十一师陆续移驻滦平、密云地区。^{【2047】}

10月28日，遵照军委命令，陆军第六十三军由河北移防山西，接替陆军第六十九军驻防区，将原驻防区移交陆军第二十七军。第六十三军军部驻太原，代号改1577部队；第一八七师驻榆次地区，代号改1561部队；第一八八师驻忻县，代号改1567部队。1969年12月，北京军区工程兵第二工区调入六十三军，改编为第一八九师。师部及直属分队驻原平地区，代号1572部队。^{【2048】}

10月29日，根据北京军区作字第716号电令，陆军第六十九军移防至山西雁北和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地区。军部由太原市移防至大同市，代号改1650部队。陆军第二十八师改称陆军第二〇五师，由大同市移防至内蒙古集宁地区，代号改1654部队。北京军区工程兵第六工区改编为陆军第二〇六师，由河北石家庄地区移防至内蒙古丰镇地区，代号1664部队。陆军第一〇七师改称陆军第二〇七师，由榆次市移防至大同市，代号改1660部队。11月，守备第三十三师改称北京军区守备第一师，隶属北京军区建制，由陆军第六十九军领导，在内蒙古化德、土牧尔台地区担负要点守备任务。^{【2049】}

11月16日，陆军第二十八军奉命由福建调防山西。从20日起，军率八十二师、八十三师、八十四师、军炮兵团、独立坦克五团，分两路乘火车北上，至12月9日，全军顺利到达山西洪洞、临汾、侯马、运城一线驻防。具体布防是：军部率直属分队驻临汾市，代号改1670部队；八十二师师部率直属分队驻洪洞

【2046】《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二十七集团军军史》，页423、425。

【2047】陆军第二十四集团军：《劲旅雄风——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二十四集团军简史》，1996年，页398-399。

【2048】《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六十三集团军军史》（送审稿），页454-455。

【2049】参见陆军第28集团军司令部：《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69军组织沿革综述》，1991年，页8、123。

县，代号改 1675 部队；八十三师师部率直属分队驻运城县，代号改 1680 部队；八十四师师部率直属分队驻侯马市，代号改 1685 部队；军炮兵团驻浮山县，独立坦克五团驻河南省郟县。^{【2050】}同日，军委命令坦克第九师、高炮第六十七师分别由江苏、山东调往山西地区，归北京军区建制领导。上述部队列入全军总预备队序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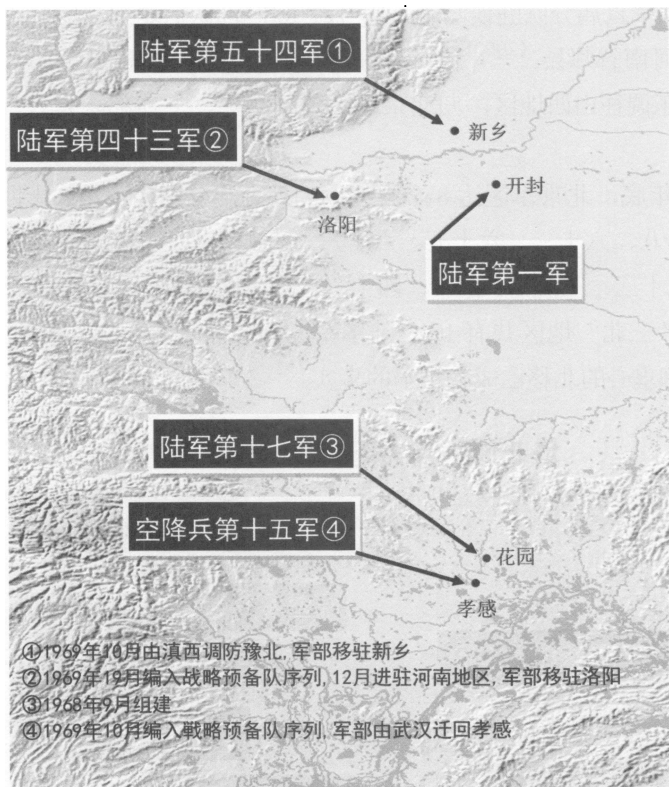
至本年年底，北京军区达 8 个野战军的兵力，分别为：第二十四、二十七、二十八、三十八、六十三、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九军。至此，加之沈阳军区 6 个军（十六、二十三、三十九、四十、四十六、六十四军）、兰州军区 2 个军（十九、二十一军），“三北”地区共有 16 个陆军军，为全国陆军军部总数的 44%，这表明了战略防御重心的北移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华北地区兵力配置图(1969-19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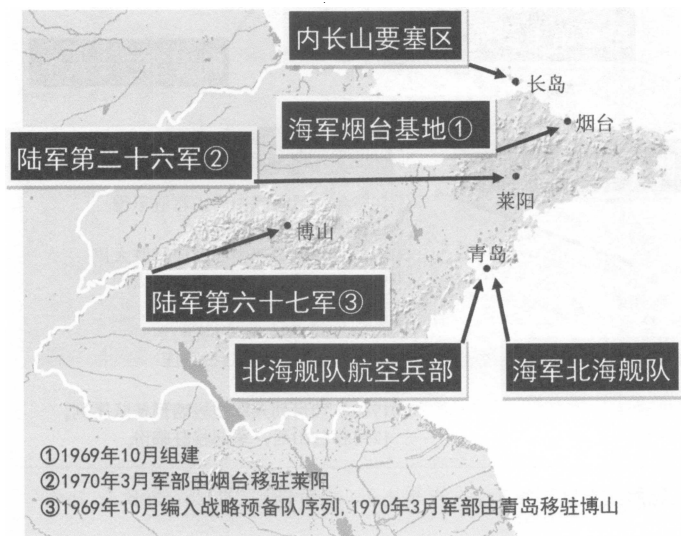


【2050】《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二十八军军史》（送审稿），页 267-2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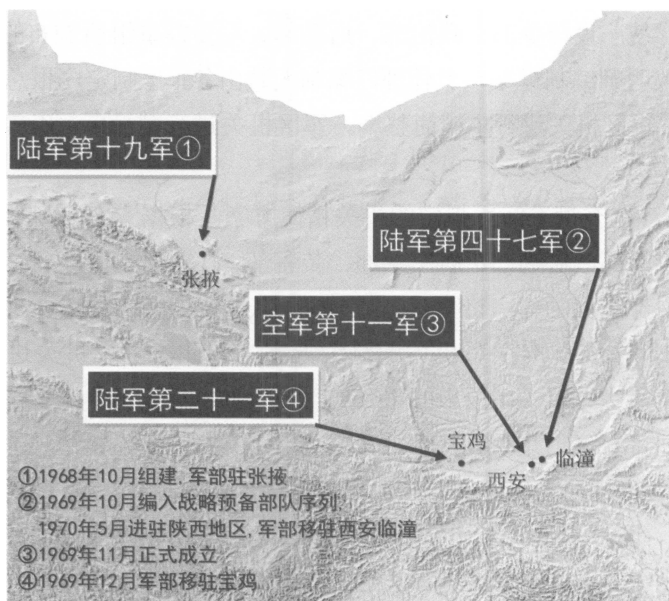
华中地区兵力配置图(1969-1972)



山东地区兵力配置图(1969-1972)



西北陕甘地区兵力配置图(1969-1972)



十九、转发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

8月27日，经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批准，中共中央、军委转发军委办事组8月8日《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报告提出，“为坚决贯彻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准备打仗和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指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考虑这项工作是一项群众性的战备工作，平时、战时任务都很繁重，牵涉的范围很广，必须在当地革命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吸收军队和地方有关同志参加，组成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并建立相应的办事机构，具体组织领导该地区的人民防空工作。”“为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组织领导，建议组织一个全国性的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军委办事组负责同志并吸收军队和地方有关单位和部门的领导同志组成。建议由周总理任组长，永胜、富治、法宪、仲川同志任副组长。在领导小组之下设立一个精干的办事机构，设在总参谋部，根据领导小组的意图，对全国人民防空工作进行督促检查。”

此前，8月10日，经毛泽东批准，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决定成立以谢富治为组长的首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在北京卫戍区设立精干的办公室，负责办理日常业务工作。

二十、各大单位机关精简整编

9月4日，军委办事组公布《大军区机关精简方案》。据此，各大军区机关进行精简整编，统一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军委办事组所颁布的大军区整编方案，只大致明确编制框架，具体部门编制人数由各军区制定，报总参备案。根据这一要求，军区机关进行了精简整编。军区机关进行精简后，干部数大体占原编制数的40%-50%。

9月5日，军委批准海军拟定的机关精简方案。根据方案，海军机关由原来的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航空兵部、装备部、工程部等6个部，合并精简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整编后，海军机关人员比原编制数减少50.1%。

9月5日，军委批准空军机关的整编方案。据此，空军机关进行了精简整编。根据方案，空军机关由原来的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工程部、军训部、军校部、科研部、高射炮兵指挥部、第二高射炮兵指挥部、雷达兵部和直属政治部11个部，合并精简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以上三大部，共设30个二级部（局、处、社），编制人数比原来减少了45.3%。空军机关整编后，按照机构设置对应的原则，各军区空军也进行了整编。在这次整编中，空军还改变了航空兵师的体制编制。1970年2月18日，军委批准，将空军飞行部队和基地统一由航空兵师领导，基地改为场站，由师级改为团级；师属飞行大队改为航空兵团，机务大队编在航空兵团里。航空兵师设司令部、政治部，辖3个团、2个场站。歼击航空兵师还设有1个夜间作战的独立大队。

12月5日，军委发布《军委各兵种机关精简方案》和《军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机构的精简方案》。按照整编要求，军委各兵种机关统一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各军区根据所担负的任务与具体兵种作用的不同，兵种机构的设置与级别各有不同。沈阳、北京、南京、济南军区，保留军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领导机构；广州、武汉军区；保留军区炮兵、工程兵领导机构；广州军区将装甲兵领导机构改为军区司令部装甲兵部；武汉军区保留司令部装甲兵部；福州、昆明军区保留军区炮兵领导机构，将军区工程兵领导机构改为军区司令部工程兵部；兰州军区将司令部炮兵部改为军区炮兵领导机构，军区司令部增编装甲兵部，保留工程兵部；成都、新疆军区，保留军区司令部炮兵部、工程兵部。

12月5日，军委又发布省军区系统机关的精简方案。根据方案，省军区领导机关统一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这一方案要求省军区机关干部精简比例，

一般占原编制人数 20%-30%，少数占到 40%。西藏、内蒙古军区机关干部的精简比例则占原编制人员 60% 左右。^{【2051】}

二十一、福州军区部队扩编

9月6日，军委办事组批复福州军区7月19日请示，同意恢复守备第九师师部，将守备第八十九、九十团归该师建制领导。

12月27日，军委批复福州军区11月17日请示，同意守备第四师和厦门军分区合并，编为厦门守备区，归陆军第三十一军领导指挥。民兵工作仍由省军区领导。

二十二、军委办事组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

9月20日，经毛泽东批准，军委办事组在北京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军区、军兵种司令员、政委。会议研究了苏联的战争动向和对付苏军突然袭击的措施。会议开至月底，因国庆在即，决定休会，各军区负责人即返回各地。休会期间，军委办事组为检查战备工作落实情况，于11月15日至21日，组织北京、兰州、新疆军区和华北、西北8省、市、自治区以及空军、总参、总后领导人赴东北参观见学落实战备的经验。

12月11日—23日，会议继续在京召开。与会人员认真分析形势，检查了战备落实情况，交流了战备工作等方面的经验，提出了今后的战备工作任务。

会议期间，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接见了全体与会人员，并作了指示。会议最后产生了全军战备工作会议纪要，经毛泽东批准，军委办事组于翌年1月7日印发全军。

二十三、空军进行“一等紧急战备演习”

9月30日，空军所有部队、学校、机关和民航进行“一等紧急战备演习”。除担负战斗值班的飞机外，其余飞机全部进入洞库或就地疏散；大部分师以上指挥机构开设了预备指挥所；所有机场紧急配发了武器；70多个机场连夜挖了掩体、防空洞；“三北”地区临时不使用的机场全部设置了障碍；建立了空司指挥所与“三北”地区一线雷达站和技侦分队的直接联络。10月3日演习结束。这是空军自建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备演习。

10月14日，军委公布空军战备值班部队，共有9个高炮师、16个歼击机师、6个轰炸机师、4个强击机师、1个运输机师、2个地空导弹师等。

【2051】《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六卷，页141-145。

10月31日，军委批准空军反空降作战措施，即：（一）加强反空降作战的思想准备；（二）充实反空降作战力量；（三）研制改进射击、轰炸武器；（四）加强反空降训练；（五）加强空军机场的防御。^{【2052】}

二十四、建立全国防止敌人突然袭击警报系统

10月7日，国务院、中央军委转发总参10月2日关于建立防止敌人突然袭击警报系统的报告，要求迅速组织落实。

总参报军委办事组并报周恩来的报告称：

“一、向全国范围发出防止敌人战略突然袭击警报的权力，必须集中于伟大统帅毛主席和副统帅林副主席。在紧急情况下，可授权军委办事组决定，由总参谋部组织实施。局部地区的防突袭警报，授权大军区首长决定，同时上报、下发。

二、防止敌人战略突然袭击警报，由统帅部直接发到各大军区、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以及军一级部队。通信手段：（略）。

三、军队的各级司令部和省、市、自治区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办事机构，必须建立昼夜值班制度，保证及时、准确地接收和发出警报。统帅部防止敌人战略突然袭击警报设备，设在总参谋部作战部，警报信号由总参谋部统一规定（附后，略）。

此前，9月22日，军委批准总参关于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小组成员调整的报告，同意由副总参谋长阎仲川任组长。总参作战部副部长范天恩、总参二部副部长徐敏辉和总参三部副部长冯维精任副组长。

二十五、军委下达建立全军战略预备队的命令

10月16日，经毛泽东批准，军委向有关军区和空军下达建立全军战略预备队的命令。战略预备队由若干个陆军军、空降军和坦克师、地炮师、高炮师组成。

同日，军委命令，陆军第四十三、四十七军编入战略预备队序列。陆军第四十三军（欠第一二九师）于11月上旬由广西柳州地区移防河南，隶属武汉军区。入豫后，军部驻洛阳市，第一二七师师部驻新安县，第一二八师师部驻巩

【2052】《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作战战备工作大事记（1949—1994）》，页419—422。空军这次演习大事记中未见有毛泽东批准的记载。



视察海军战时指挥所，站立者前排左起：吴瑞林、温玉成、李德生、萧劲光、吴法宪、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刘贤权、王宏坤，1969年11月。

县。^[2053]按军委调防命令，四十七军1970年5月20日前调防陕西，部署在渭南、延安地区，属兰州军区领导。^[2054]

同日，军委命令，陆军第五十四军编入战略预备队序列，并于11月15日前到达指定位置。到达豫北后，军部驻新乡市，陆军第一三〇师驻辉县，第一三四师驻焦作市，第一三五师驻安阳市。^[2055]

同日，军委命令，陆军第六十七军编入战略预备队序列。1970年3月，按时顺利分别由青岛地区移防到达集结地域——博山（军部）、周村（一九九师）、莱芜（二〇〇师后移泰安）、益都（先二〇四师后二〇一师）等地。4月，军委命令，二〇一师与二〇四师分别回归六十七军、六十八军建制。^[2056]

【2053】《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三军军史》，页402-403。

【2054】《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集团军军史》，页295。

【2055】《无敌的铁拳——陆军第五十四集团军军史》，页333-334。

【2056】《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六十七军军史》，页323-324。

二十六、军委办事组下达做好疏散部队工作的指示

10月23日，总参向各军区、海、空军和北京卫戍区传达了军委办事组《做好疏散部队工作，继续保持良好的战备状态》的指示。指示指出，疏散出去的部队，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天气逐渐转冷，要做好疏散部队的工作，减少非战斗减员，继续保持良好的战备状态。指示要求，所有疏散的部队不要露营，搞好行政管理 and 物资保障；抓紧时间进行战备训练，保持常备不懈。

二十七、改建、组建和扩编部队

10月27日，军委发布各军区组建和扩编部队的命令。根据该命令，北京军区组建1个加榴炮师（炮兵第十六师）；沈阳军区以该区野战高炮群为基础，组建1个高炮师（炮兵第七十四师）；南京军区以该区野战高炮群为基础，组建1个高炮师（炮兵第七十五师），在安徽霍丘城西湖农场和江苏泰州红旗农场各组建1个陆军师（陆军第七十三、七十四师）；济南军区将陆军第二十六军第七十六师改归福州军区建制，另给二十六军组建1个陆军师（陆军第七十八师），组建1个坦克师师部（坦克第十三师），兰州军区骑兵第二师改为陆军师（陆军第二十师）；广州军区陆军第五十五军第二一五师改归福州军区建制，另给五十五军组建1个陆军师（陆军第一六五师），另组建4个陆军师（陆军第一四二、一四三、一四五、一四六师），分别负责接管调防部队遗留的潼湖、台山、南湾、西湖等大型生产基地；昆明军区组建1个陆军师（陆军第三十二师）。

二十八、军委决定城市改设警备区

11月15日，军委发布《关于城市改设警备区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为加强城市警备工作和便于野战部队随时机动，对一些重点城市改设警备区。各省、自治区机关所在城市和重庆、鞍山、青岛、湛江等重要城市均可根据需要设立警备区机构。其它城市的警备工作，由当地军分区或市人武部负责，不专设警备区机构，必要时对外挂警备区牌子。警备区机构由当地军分区或市人武部改建（行使师级权限），或由当地省军区兼任。现由野战军兼任的城市警备区工作，逐步移交。

据此，北京军区12月23日报告，将呼和浩特军分区改为呼和浩特警备区，仍行使师级权限；石家庄、邯郸、保定、承德、唐山（含秦皇岛）、张家口、长治、包头、集宁等城市的警备工作，均由所在军分区兼任；大同、阳泉市的警备工作均由市人武部兼任；均不设警备区机构，对外挂警备区牌子。

济南军区于11月9日规定，将济南市人武部改建为济南警备区，行使师级权限，归山东省军区领导；以守备第九师师部和青岛市人武部为基础，组建青岛警备区，行使相当军一级权限，归济南军区领导，有关民兵工作接受省军区领导，烟台、威海市警备工作，分别由守备第六、二十五师兼任。

南京军区于12月4日将杭州军分区改设警备区，独立第二师第四团担任杭州市的警备任务，该团建制不变；12月10日将合肥市人武部改建为警备区，统一负责全市的警备工作以及原市人武部所担负的任务，撤销合肥市人民武装部番号。

广州军区于11月25日通知广州警备区，权限仍按军委1967年3月30日指示执行，另在长沙、南宁，湛江设立警备区机构，分别由长沙军分区和南宁、湛江市人民武装部改建，行使师级权限。长沙、南宁警备区分别归湖南省军区和广西军区领导，湛江警备区归湛江军分区领导；汕头、佛山、韶关、海口、凭祥、柳州、桂林、衡阳、株洲、湘潭市的城市警备工作，均由所在市人民武装部负责，不专设机构，对外可挂警备区牌子。

昆明军区于12月4日报告，昆明、贵阳两市警备区，分别由昆明市人武部、贵阳军分区改编组成。

武汉军区于11月23日决定，将武汉市人武部扩建为武汉警备区，行使师级权限，归湖北省军区建制领导。

成都军区于11月16日决定，将重庆、成都军分区改为重庆、成都警备区，行使师级权限，重庆警备区直属成都军区建制领导，成都警备区属四川省军区建制。

兰州军区于12月12日报告，将西安、兰州军分区和银川、西宁市人武部改建为警备区。

二十九、北京军区有关战备工作

11月24日—29日，经中央政治局批准，北京军区在北京召开华北地区第一次战备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北京军区各军、省军区和华北地区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人。会议由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主持。会议传达了东北地区战备工作的经验，并针对华北地区战备工作状况，提出了加强战备工作的措施。此前，沈阳军区、新疆军区在10月份分别召开了战备工作会议。

12月1日—4日，北京军区在北京召开国防工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内蒙古军区、各军主管施工的领导人和担负施工任务的师、工区以及建筑工程团的负责人。会议总结了1969年国防施工情况，部署了1970年国防施工任务。



在二十三基地观看导弹试验，左起：吴法宪、李作鹏、黄永胜、吴瑞林、来光祖、谢富治、邱会作，1969年12月。

12月17日—19日，北京军区为检查坑道内战备设施配套情况，研究解决人员在坑道持续工作、生活所遇到的问题，在军区指挥所组织了坑道密闭演习。参加演习的有军区司令员郑维山、政委陈先瑞等。

三十、组建二炮第五十六基地

12月5日，总参谋部批复第二炮兵10月26日请示，同意以武威炮校机构的部分人员为基础，再由第二炮兵各基地抽调部分干部，组建1个导弹基地领导机构，称第二炮兵第五十六基地。蔡洪恩任第一副司令员，张芳任政委。

三十一、更改部分陆军师番号

12月8日，军委电各军区，为使全军陆军师番号按军的番号顺序排列，改变部分陆军师番号。沈阳军区陆军第三十二、七十三、一三三师，依次改称陆军第四十八、六十八、一三八师。北京军区陆军第七十四、一八六、七十、一八九师，依次改称陆军第七十、一八九和警卫第三、四师。济南军区陆军第三十三、二〇四、二〇一师，依次改称陆军第七十六、二〇一、二〇四师。南京军区陆军第三十一、一八一师，依次改称陆军第三十六、一八〇师。武汉军区陆军第七、二十九师，依次改称陆军第三、四十九师。昆明军区陆军第一三〇、一三四、一三五、四十九师和新建的1个师，依次改称陆军第一六〇、一六一、一六二、

三十一、三十二师。广州军区陆军第一四四、二一九师和新建的1个师，依次改称陆军第一六三、一六四、一六五师。成都军区陆军第五十二、一四九师，依次改称陆军第一四九、五十二师。福州军区陆军第七十六、二一五师，依次改称第八十八、八十九师。新疆军区陆军第三师，改称陆军第七师。

第八十八节 国务院机构改革中的军人

一、毛、周决定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1969年4月九大以后，毛泽东、周恩来随即将中共中央机关及国务院机构精简、改革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1969年5月28日，周恩来与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等商议中央国家机关精简和人员下放问题，并听取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汇报。次日，到毛泽东处参加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召开的会议，汇报国务院业务组改组，国务院各部委合并、撤销、精简和准备成立各单位革命委员会及其领导小组的初步方案，并提出党中央各部门进行改革的问题。毛泽东指示：就照谈定的原则去做；但国务院业务组的人员调整，需等纪登奎、李德生二人到京后，先确定二人分工，再提出正式名单。^{【2057】}

6月10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直属各部门负责人（包括军队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会议上传达经中央讨论过的政府各部门精简方案，根据该方案，将国务院原61个部、委、局裁并为19个工作部门。会上还宣布国务院业务组增加纪登奎、李德生二人。^{【2058】}

6月25日，周恩来就纪登奎、李德生工作安排事书面报告毛泽东。7月3日，再报毛泽东：纪、李两同志的分工已在中央有关会议上谈定，他们在党中央除参加集体会议、接受临时任务外，纪固定管理整党建党工作和工、青、妇的革命运动，李固定管理军委办事组的总政工作，二人均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并保留在外省和军队所兼的职务。^{【2059】}

【2057】《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页300—301。纪登奎，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李德生，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2058】《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页303—304。

【2059】《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页305。原注：集体会议，即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会议，主要由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叶群、谢富治、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纪登奎十三人组成。

7月3日，周恩来将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会议上商议的中央和国家机关精简方案设想书面报告毛泽东。其中，党中央机关拟保留中央文革^[2060]、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中央联络部等，原中央宣传部、中央调查部、中央监察委员会等部门均拟下放、合并或撤消。国务院业务组拟由周恩来、谢富治、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李富春、余秋里、粟裕、苏静^[2061]九人组成，周恩来为组长，李先念、纪登奎为副组长，李震、邱国光^[2062]、刘西尧列席。国务院所属原62个部门拟合并为21个单位，全部下放的行政人员计21万人。报告提出：“这一切工作均需与学习九大文献和主席最新指示，准备打仗，落实政策联系起来。”同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原则同意。”^[2063]

国务院业务组成员，为总理、副总理级别。如拟议中将要召开的四届人大需设立副总理，除周恩来之外的八人都可能成为副总理人选。业务组九人中，现役军人四人：谢富治、李德生、粟裕、苏静，占44%。其中谢富治、李德生为军委办事组成员。惟军委办事组核心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均非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可能毛泽东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个效果——在国务院系统中尽量排除林彪一系的军人。

1970年5月27日、2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主要议程为：（一）修改《关于修改宪法情况的报告》草稿，商定待定稿后报毛泽东、林彪审批。（二）讨论国务院所属各部门精简机构、下放工作人员和成立革命委员会问题，认为现国务院各部、委成立革命委员会条件已成熟，拟上报批准。29日，将政治局讨论情况书面报毛泽东、林彪。^[2064]

6月6日，周恩来在军委办事组建议调济南军区副政委李耀文到外交部任军代表的报告上批注：从现有的国务院各部、委军代表中，还找不到一个可以担任外交部部长的，因此，在政治局会议上谈过多次，凡认识李耀文同志的，均说他加入外交部革委会先当副主任，较别人为适宜，并有发展前途。“至于部长，恐过半年，仍需调黄镇同志回来担任。”^[2065]

6月16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国务院7日《关于国务院各部门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和中共中央对国务院报告

【2060】原注：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未作为党中央的一个常设机构保留下来。

【2061】原注：苏静，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军管会主任。

【2062】原注：邱国光，时任卫生部军管会主任。

【206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页307—308。

【206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页368—369。

【206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页370。黄镇，时任中国驻法国大使。

的批示稿。17、18日，周恩来分别将政治局会议商定事项报毛泽东、林彪。22日，中共中央批发《关于国务院各部门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2066】}

国务院的《请示报告》称：

“一、各部、委建立党的核心小组，直属党中央领导。每个小组都要实行军、干、群和老、中、青三结合。各部、委革命委员会通过党的核心小组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

二、各部、委革命委员会中的革命群众代表应占百分之五十左右。革命委员会设主任、副主任，不设常委。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应为革命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以利一元化领导。

三、各部、委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的工作部门，其大权集中在中央。因此，各部、委革命委员会的权力与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权力有所不同。各部、委革命委员会对本部门的工作方针、政策、计划有讨论、建议之权，对人事、财务有审查之权，对工作实施有监督之权。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千头万绪，必须狠抓根本，必须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各部、委的日常工作，在党的核心小组领导下，由部长、副部长（主任、副主任）负责管理。”

根据国务院的报告，国务院各部委、直属机构与中央工交、国防工业、基本建设、农林、财贸、文教、外事七个政治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国际贸易促进会、最高人民检察院、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央文史研究馆等，由精简前的90个单位，精简为32个单位。国务院拟设立23个部委（包括国防工业6个部）、两个组（文化组、科教组）和一个办公室。国务院各部、委机关工作人员合计原有57,748人，暂定编制9,710人，占原有人数18%。

中央同意国务院设立的23个部委为：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国家基本建设革命委员会、冶金部、一机部、燃料化学工业部、水利电力部、交通部、轻工部、国防部、二机部、三机部、四机部、五机部、六机部、七机部、农林部、财政部、商业部、对外贸易部、外交部、对外经济联络部、公安部、卫生部。

国务院拟设立的23个部委中，划归军委办事组管辖的7个，占30%。即：国防部、二机部（具体由国防科委管辖）、三机部（空军管辖）、四机部（军委通信兵部管辖）、五机部（总后管辖）、六机部（海军管辖）、七机部（国防科委管辖）。

【206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页373、375。

此外，8个单位（包括1个委员会和7个国务院直属机构）由国务院系统分离出来，其中5个调归军队领导。即：国家海洋局调归海军领导；民航总局调归空军领导；中央气象局与总参气象局合并，归总参领导；国家测绘总局与总参测绘局合并，归总参领导；体育运动委员会调归总参领导。另邮电部撤销后，电信部分成立一个电信总局，划归通信兵部领导。

经过此番调整、裁撤，国务院的权力被极大地压缩、分割，可谓是空前绝后的。如规定“各部、委建立党的核心小组，直属党中央领导”，“各部、委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的工作部门，其大权集中在中央”。又在国务院设立的部委中划出近三分之一归军队管辖，将原直属机构调归军队或中共中央机构领导，国务院实际只领导16个部委，2个组，1个办公室，1个直属机构（中国科学院）。而这一切，表面看来，都是周恩来自愿地、主动地进行的。

二、国务院领导机构中的军人

根据国务院1970年6月7日《关于国务院各部门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附件一《国务院各部门建立党的核心小组的请示报告汇集》和附件二《国务院各部门建立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汇集》，国务院22个单位党的核心小组、21个单位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名单如下：

1. 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

核心小组组长余秋里，副组长苏静、陈彬、陈华堂。革命委员会由37名委员组成。军队代表10名占27%，干部8名占21.6%，群众代表19名占51.4%。主任余秋里，副主任苏静、陈华堂、陈彬、袁宝华、邓东哲、顾明。^{【2067】}核心小组副组长3人全为现役军人。革委会副主任6人中3人为现役军人，占50%。

2. 国家基本建设革命委员会

核心小组组长李良汉，副组长缺。革命委员会由19人组成。军队代表3名，占15.8%。主任李良汉，副主任赖际发、李大同、张国传、谢北一。^{【2068】}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李良汉为现役军人。革委会副主任4人中2人为现役军人，占50%。

【2067】余秋里，原国家计委副主任。苏静，时任国家计委军代表。陈彬，时任国家计委副军代表。陈华堂，原国防工业军管小组副组长。袁宝华，原物资部部长。邓东哲，原中央工交政治部副主任。顾明，原国家建委副主任。

【2068】李良汉，时任国家建委军管会主任。赖际发，原建材部部长。李大同，时任建材部军管会主任。张国传，时任建工部军管会主任。谢北一，原国家建委副主任。

3. 冶金工业部

核心小组组长陈绍昆，副组长朱互宁、杨卫群。革命委员会由33人组成，军队代表7名，占21.2%。主任陈绍昆，副主任朱互宁、杨卫群、杨殿奎、郭俊生、林泽生、张振江。^[2069]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陈绍昆为现役军人。核心小组副组长两人全为现役军人。革委会副主任6人中3人为现役军人，占50%。

4. 第一机械工业部

核心小组组长李水清，副组长严庆堤、周子健、徐斌洲。革命委员会由22人组成，军队代表6人，占27.3%。主任李水清，副主任严庆堤、周子健、徐斌洲、马仪、沈鸿、刘湘屏、董桂财、孙成秀、贾鲁峰。^[2070]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李水清为现役军人。核心小组副组长3人中1人为现役军人，占33%。革委会副主任9人中3人为现役军人，占33%。

5. 燃料化学工业部

核心小组组长伊文，副组长徐今强、王星、王素。革命委员会由33人组成，军队代表7人，占21.2%。主任伊文，副主任徐今强、王星、王素、沈昌荣、唐克、孙晓风、范文彩。^[2071]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伊文为现役军人。核心小组副组长3人中2人为现役军人，占67%。革委会副主任7人中3人为现役军人，占43%。

6. 水利电力部

核心小组组长张文碧，副组长梁其舟、钱正英、杜星垣。革命委员会由18人组成，军队代表4人，占22.3%。主任张文碧，副主任梁其舟、钱正英、杜星垣、吴志笃。^[2072]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张文碧为现役军人。核心小组副组长3人中1人为现役军人，占33%。革委会副主任4人中2人为现役军人，占50%。

【2069】陈绍昆，时任沈阳军区副政委。1964年晋升少将。朱互宁，时任冶金部军代表。杨卫群，时任一机部军代表。杨殿奎，原一机部副部长。郭俊生，时任冶金部副军代表。林泽生，原冶金部副部长。张振江，冶金部有色办公室技术员。

【2070】李水清，时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授衔少将。严庆堤，时任一机部军管会主任。周子健，原一机部副部长。徐斌洲，原八机部副部长。马仪，国家计委局长。沈鸿，原一机部副部长。刘湘屏，原八机部综合局局长。董桂财，时任一机部军管会副主任。孙成秀，时任八机部军管会副主任。贾鲁峰，原一机部政治部副主任。

【2071】伊文，时任总后勤部副部长。1964年晋升少将。徐今强，原化工部代部长。王星，时任石油部军管会主任。王素，时任煤炭部军代表。沈昌荣，时任化工部军管会副主任。唐克，原石油部副部长。孙晓风，原石油部副部长。范文彩，原煤炭部副部长。

【2072】张文碧，时任陆军第十二军政委。1955年授衔少将。梁其舟，时任水利电力部军管会副主任。钱正英，原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杜星垣，原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吴志笃，时任水利电力部军管会副主任。

7. 交通部

核心小组组长杨杰，副组长潘友宏。革命委员会由37人组成，军队代表8人，占21.6%。主任杨杰，副主任潘友宏、郭鲁、马耀骥、朱春和、韩卫民、俞侠。^{【2073】}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杨杰为现役军人。核心小组副组长1人为现役军人。革委会副主任6人中3人为现役军人，占50%。

8. 轻工业部

核心小组组长毛洪祥，副组长钱之光、曹鲁、李学实。革命委员会由23人组成，军队代表5人，占22%。主任钱之光，副主任毛洪祥、李学实、曹鲁、谢鑫鹤。^{【2074】}核心小组组长毛洪祥为现役军人。革委会副主任4人中2人为现役军人，占50%。

9. 第二机械工业部

核心小组组长袁学凯，副组长刘伟、黄炜华。革命委员会由19人组成，军队代表5人，占26.3%。主任袁学凯，副主任刘伟、黄炜华、牛书申、李觉。^{【2075】}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袁学凯为现役军人。核心小组副组长2人中1人为现役军人，占50%。革委会副主任4人中1人为现役军人，占25%。

10. 第三机械工业部

核心小组组长周洪波，副组长朱群、张孔修、萧友明。革命委员会由21人组成，军队代表6人，占28.6%。主任周洪波，副主任朱群、张孔修、萧友明、赵绍昌、范英。^{【2076】}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周洪波为现役军人。核心小组副组长3人中2人为现役军人，占67%。革委会副主任5人中2人为现役军人，占40%。

【2073】杨杰，时任铁道部军管会副主任。潘友宏，时任交通部军管会主任。郭鲁，原铁道部副部长。马耀骥，原交通部副部长。朱春和，原邮电部政治部主任。韩卫民，时任铁道部军管会副主任。俞侠，时任交通部军管会副主任。

【2074】毛洪祥，时任纺织部军代表。钱之光，原纺织部副部长。曹鲁，原一轻部副部长。李学实，时任二轻部军代表。谢鑫鹤，原二轻部副部长。

【2075】袁学凯，时任二机部军管会主任。刘伟，原二机部副部长。黄炜华，时任二机部军管会副主任。牛书申，原二机部副部长。李觉，原二机部副部长。

【2076】周洪波，时任三机部军管会主任。朱群，时任三机部军管会副主任。张孔修，时任三机部军管会副主任。萧友明，原三机部政治部主任。赵绍昌，原三机部政治部副主任。范英，原三机部生产局副局长。

11. 第四机械工业部

核心小组组长彭林，副组长李夫克、周涌。革命委员会由15人组成，军队代表4人，占26.6%。主任彭林，副主任李夫克、周涌、齐一丁。^[2077]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彭林为现役军人。核心小组副组长2人全为现役军人。革委会副主任3人中2人为现役军人，占67%。

12. 第五机械工业部

核心小组组长邱创成，副组长张明远。革命委员会由19人组成，军队代表3人，占15.8%。主任邱创成，副主任张明远、张连奎、陈锐霆。^[2078]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邱创成1970年12月恢复军职后为现役军人。核心小组副组长1人为现役军人。革委会副主任3人中1人为现役军人，占33%。

13. 第六机械工业部

核心小组组长黄忠学，副组长边疆、刘世雄。革命委员会由19人组成，军队代表4人，占21%。主任黄忠学，副主任边疆、刘世雄、刘放、史子才。^[2079]核心小组副组长2人中1人为现役军人，占50%。革委会副主任4人中2人为现役军人，占50%。

14. 第七机械工业部

核心小组组长韦统泰，副组长欧阳平、杨国宇。^[2080]核心小组组长、副组长全为现役军人。

15. 农林部

核心小组组长沙风，副组长缺。革命委员会由22人组成，军队代表5人，占22.7%。主任沙风，副主任李树荣、郝建刚、刁炳章、李光勋、杨立功、梁昌武。^[2081]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沙风为现役军人。革委会副主任6人中4人为现役军人，占67%。

【2077】彭林，时任四机部军管会主任。李夫克，时任四机部军管会副主任。周涌，时任四机部军管会副主任。齐一丁，原四机部副部长。

【2078】邱创成，原五机部部长。1970年12月被任命为总后勤部副部长，恢复军职。1955年授衔中将。张明远，时任五机部军管会主任。张连奎，原五机部副部长。陈锐霆，原五机部副部长。

【2079】黄忠学，原六机部副部长。边疆，原六机部副部长。刘世雄，时任六机部军管会主任。刘放，原六机部副部长。史子才，时任六机部军管会副主任。

【2080】韦统泰，时任七机部军管会主任。欧阳平，时任七机部军管会副主任。杨国宇，时任七机部军管会副主任。

【2081】沙风，时任装甲兵副司令员。1964年晋升少将。李树荣，时任水产部军代表。郝建刚，时任农垦部军代表。刁炳章，时任农业部副军代表。李光勋，时任林业部军管会副主任。杨立功，原八机部副部长。梁昌武，原林业部副部长。

16. 财政部

核心小组组长殷承桢，副组长樊九思。革命委员会由21人组成，军队代表4人，占19%。主任殷承桢，副主任樊九思、刘鸿章、乔培新、姚进、王炳乾。^{【2082】}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殷承桢为现役军人。核心小组副组长1人为现役军人。革委会副主任5人中2人为现役军人，占40%。

17. 商业部

核心小组组长范子瑜，副组长刘忍、郭世荣、樊省轩。革命委员会由28人组成，军队代表6人，占21.5%。主任范子瑜，副主任刘忍、赵发生、郭世荣、樊省轩、柳垣、高修。^{【2083】}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范子瑜为现役军人。核心小组副组长3人全为现役军人。革委会副主任6人中4人为现役军人，占67%。

18. 对外贸易部

核心小组组长白相国，副组长林海云、李强。革命委员会由27人组成，军队代表4名（暂缺2名），占14.8%。主任白相国，副主任林海云、李强、王安居。^{【2084】}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白相国为现役军人。革委会副主任3人中1人为现役军人，占33%。

19. 外交部

核心小组组长姬鹏飞代，副组长黄镇、姬鹏飞、李耀文、马文波。革命委员会由39人组成，军队代表8人，占21%。设主任1人，请中央任命，现以姬鹏飞代。副主任5人，建议由姬鹏飞、黄镇、李耀文、马文波、乔冠华担任。^{【2085】}核心小组副组长4人中2人为现役军人，占50%。革委会副主任5人中2人为现役军人，占40%。

【2082】殷承桢，时任财政部军管会主任。樊九思，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军代表。刘鸿章，时任财政部军管会副主任。乔培新，原人民银行副行长。姚进，原财政部政治部副主任。王炳乾，原财政部预算司司长。

【2083】范子瑜，时任商业部军代表。刘忍，时任物资部军管会主任。郭世荣，时任供销合作总社军代表。樊省轩，时任粮食部军代表。赵发生，原粮食部副部长。柳垣，时任工商行政管理局军代表。高修，原商业部副部长。

【2084】白相国，时任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林海云，原对外贸易部代部长。李强，原对外贸易部副部长。王安居，时任对外贸易部副军代表。

【2085】姬鹏飞，原外交部副部长。黄镇，驻法国大使。李耀文，时任外交部军代表。马文波，时任外交部政治部军代表。乔冠华，原外交部副部长。

20. 对外经济联络部

核心小组组长方毅，副组长刘大煜。革命委员会由20人组成，军队代表3名，占15%。主任方毅，副主任刘大煜、钟羽一、谢怀德、张文敏。^[2086]核心小组副组长1人为现役军人。革委会副主任4人中2人为现役军人，占50%。

21. 公安部

核心小组组长李震，副组长于桑、曾威。革命委员会由27人组成，军队代表10名，占37%。主任李震，副主任于桑、曾威、施义之、赵登程。^[2087]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李震为现役军人。核心小组副组长2人中1人为现役军人，占50%。革委会副主任4人中3人为现役军人，占75%。

22. 国务院办公厅

核心小组组长丁江，副组长吴庆彤。^[2088]国务院办公厅不设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组长丁江为现役军人。

23. 中国科学院

革命委员会由45人组成，军队代表10名，占22%。主任郭沫若，副主任李四光、刘西尧、石焯、崔星。成立后仍保留院长、副院长名义。^[2089]革委会副主任4人中2人为现役军人，占50%。

以上中央6月22日批准的国务院22个部门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中，17位为现役军人。另五机部邱创成稍后于1970年12月恢复军职，被任命为总后副部长后，即增至18位，占总数的82%。18人中，文革前的中将2人，少将11人，大校级别5人。在21位革委会主任中，连邱创成成为15位现役军人，占总数的71%。其中文革前中将2人，少将10人，大校级别3人。可以说，此一时期的国务院各部门，基本上是将及大校们的天下。这集中反映了军队介入地方文革、三支两军后的既成事实。

【2086】方毅，原对外经委主任。刘大煜，时任对外经委军管小组组长。钟羽一，时任对外经委军管小组副组长。谢怀德，原对外经委副主任。张文敏，对外经委办公厅打字员。

【2087】李震，公安部领导小组成员，沈阳军区副政委。1955年授衔少将。于桑，公安部领导小组成员，原公安部副部长。曾威，公安部领导小组成员，北京军区工程兵政委。1955年授衔少将。施义之，公安部领导小组成员，陆军第二十一军政委。1955年授衔大校。赵登程，公安部领导小组成员，空军第八军副军长。1965年空军大校军衔。

【2088】丁江，时任国务院直属口军代表。吴庆彤，国务院秘书厅秘书室主任。

【2089】郭沫若，原中国科学院院长。李四光，原地质部部长，1970年8月任国务院科教组组长。刘西尧，原二机部副部长，国务院总理联络员。石焯，时任国家科委军管会主任。崔星，时任国家科委军管会副主任。

三、国防部长仍是林彪

在1970年6月的国务院机构精简、改革方案中，保留了实际虚设的国防部，并明确将其划归军委办事组管辖。

划归军委办事组管辖的，除国防部之外的6个部级机构（第二至第七机械工业部），均任命了新的负责人。惟国防部部长的位置没有变化，名义上还是林彪。

在中共建国以后的军事体制中，国防部及其首长均无实质上的意义，而仅存外交礼仪上的作用。林彪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职务，是1959年新军委成立时任命的。文革前1965年1月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决定再次任命。1966年8月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林彪的党内排名已列于毛泽东之后的第二位，政治地位超越了党内排名第三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惟林在政府系统的职务，却仍旧沿用“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名义，一直未有作出适合其政治地位显著上升而应有的变更。即使林彪在1969年4月中共九大被确立为毛的接班人之后，在政府仍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此后三年“八一”建军节，外国军队领导人的贺电仍是发给“国防部长”林彪。

本来，趁着这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重要的部委首长不再像文革前由中央政治局成员、副总理级别的官员兼任的机会，让林彪卸任国防部长的职务，应该是一个适当的时机。按国务院机构精简、改革方案规定，国防部划归军委办事组管辖后，逻辑上其部长亦应归军委办事组管辖。其时的国防部长一职，似应由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兼任为宜。否则，以林彪的“副统帅”地位却在国家政权体系中仍为周恩来的下属，以林彪的元帅身份却与大校、少将级别的其他部委负责人相提并论，都是极为不妥的。惟只要毛泽东不明确表态，林彪的此一尴尬状况，就一直不会改变。

第八十九节 四届人大的筹备与修宪

一、关于国家主席设否的争议

关于召开四届人大一事，汪东兴后来称，“1970年3月初，毛主席接到周总理的信和附来的一份宪法修改草案提要。信中谈到政治局常委提出宪法中原有国家主席一节，是不是还写上。当时，我们陪着毛主席正在武汉视察，住在武昌东湖宾馆梅岭一号。3月7日，毛主席要我马上回北京传达他的意见：在宪法中不写设国家主席一节，坚决表示他不再当国家主席。8日，我回到北京，向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周总理说：‘你向政治局的同志们传达一下吧。’当晚，在

周总理主持下，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传达了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2090】

毛泽东为什么坚决反对设国家主席，并对此事如此上心？后来说法甚多，惟至今均无可信的答案及确凿证据。但至少有一点不可忽视，此时毛、林之间存在的嫌隙已日益扩大。如果设国家主席，按林彪作为党和国家、军队二把手的地位，他至少可以任国家副主席。如果不设国家主席，那就在林彪一旦卸下“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职务后，封死了林在国家政权体系中居于更高位置的可能性。毛泽东是不愿“再作冯妇”，还是不愿看到出现“刘少奇第二”呢？

《周恩来年谱》称，3月8日当晚的政治局会议，“会议一致拥护毛泽东意见，商定立即着手进行以下工作：（一）成立由周恩来、张春桥、黄永胜、谢富治、汪东兴组成的工作小组，负责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工作，并约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面商；（二）成立由康生、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组成的工作小组，负责修改宪法工作，先将修改要点写出，至四月八日完成修改工作；（三）由周恩来、姚文元主持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稿，集中讲当前政策和计划问题等。”【2091】

以上两个小组名单值得注意的是：一、陈伯达并不在任何一个名单内；二、张春桥是唯一在两个名单里都列名的人。

汪东兴又称，“这次政治局会议，林彪又没有到会，叶群到了。会上，周总理还特地说了句：就委托叶群向林彪转达毛主席的意见，报告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情况。然而，住在苏州的林彪，却在3月9日让叶群对在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说：‘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2092】

如果林彪真的作过这样的表态，是否说明了林其实已看透了毛不设国家主席的真正用心而作的一种抗争姿态？

林彪系将领还有另一说法。邱会作称，汪东兴当晚传达毛的指示最后还有一段话，“国家主席要不要，我的意见是不要。如果大家认为一定要，我是不当这个国家主席的，那么谁来当呢，只有林彪同志来当。”邱会作称，“我当时的认识是：主席对林彪这个接班人很关心，很周到。其实，我的想法和主席的打算相差十万八千里。散会时，汪还真有些余兴未尽的样子，对着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我说：‘走走走，时间还早，到我那里再坐坐。’我们都欣然同意

【2090】《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页18、20。

【2091】《周恩来年谱（1949-1967）》下，页353。

【2092】《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页20。

了。”“在汪东兴家里，大家开始也是扯乱谈。后来，吴法宪又请汪去核实刚才在会上讲的‘要设国家主席，毛不当，要林彪来当’的话，汪东兴很认真地又重复了一遍，听后大家都很高兴。我们要起身走时，汪说：‘不要着急，搞点东西来吃。’不一会，工作人员端上两盘子红薯，吴胖子和叶群吃了，我没有吃。”^{【2093】}

从后来的事实看，即使毛真的说过“只有林彪同志来当”，也不过是一种虚与委蛇的表示，最终还是会用“不设国家主席”来推翻它。这里可以体会得到，林彪系将领对林是否能当国家主席都很在意。惟他们高兴得太早，邱会作说得对，其实他当时的想法和毛的打算相差十万八千里！

3月14日下午，毛泽东审阅周恩来本日关于筹备四届人大等问题的报告。报告说：汪东兴回京后，传达主席关于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指示，政治局在京同志一致拥护，立即着手进行。工作分几个方面：第一，关于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由恩来、春桥、永胜、富治、东兴五人组成一个工作小组，现已起草好了一个决定稿，13日晚已在政治局有关会议上讨论通过。九大中委、候补中委当人大代表的不要超过三分之一，九大代表当人大代表的也不要超过三分之一，非党员代表不应少于百分之四十，爱国人士恐不应少于一百人，党内需要安排的如张闻天、王稼祥等，拟从机动名额中出。第二，关于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已由康生、春桥、法宪、作鹏、登奎五人组成，拟在三天后将修改要点写出，准备一个月完成这项工作。第三，关于政府工作报告，拟在各地同志来京协商后，再由文元、恩来组织人动手起草。第四，关于筹备工作，待汪东兴回程时再请他面报，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央的部署。”^{【2094】}

3月17日，毛泽东审阅周恩来本日关于修改宪法和选举四届人大代表的安排等问题的报告。报告说：16日政治局会议进行了两项工作。第一项讨论和通过了《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及其附件，请主席审阅后予以批示，以便着手修改。第二项通过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和各大军区、各总部、各军兵种17日来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负责人名单，毛泽东批示：“同意第一项所提修改问题的意见，同时请各地方提修改意见。附件留阅。”林彪阅后批示：“完全同意主席批示”。^{【2095】}

3月17日至24日，中央召开由政治局委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负责人以及人民解放军各军区、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

【2093】《邱会作回忆录》下，页675-676。

【209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284。

【209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285。

议。会议在北京举行，到会 103 人，由周恩来主持，主要内容是布置四届人大代表的选举工作，以及对宪法的修改提出初步意见。在工作会议进行期间，3 月 18 日晚上，宪法小组的负责人就小组的工作情况向会议通报。

通报说：“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四届人大要修改宪法。毛主席指示不设国家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受到一致拥护。……”通报说，“第二方面，一些原则性的问题要向毛主席请示。” 这些问题是：1. 关于宪法的结构，按原来的不变。2. 关于序言。3. 总纲。4. 国家机构问题。就是不设国家主席，有关国家主席职权的条款，有些是否可以并入人大常委会职权中。如不设主席，宪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这一条怎么解决？是毛主席统率。国防委员会要不要？值得考虑。原宪法第四十三条关于最高国务会议问题，如何处理？可否删去？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名称不变，各级人民委员会的名称要不要？现在是革命委员会，是否要把原来的名称改过来，仍用人民委员会？省长、副省长等是否改为主任、副主任？我们认为，用革命委员会的名称为好，检察院取消了，主席早有指示。还保留法院。5. 关于公民权利问题。通报最后说：“宪法工作小组将于 3 月 31 日把宪法修改草案提到政治局讨论，再经地方讨论，人大代表讨论。”^[2096]

汪东兴在回忆录中称：

在此期间，林彪却让他的秘书给毛主席的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主席则让秘书回电话：“问候林彪同志好！”

4 月 11 日夜间 11 点 30 分，林彪在苏州让他的秘书于运深给中央政治局值班的同志挂电话，传达他的三条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4 月 12 日，毛主席看到中央政治局关于林彪的意见的报告，立即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4 月下旬，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借《三国演义》中的典故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

【2096】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下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 年，页 266-268。

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2097】

《毛泽东年谱》、《周恩来年谱》关于4月11日一事的经过与汪东兴的说法有所不同。两年谱均称林彪当日是直接给毛泽东处打电话，提出国家主席“仍然建议由毛泽东兼任”。这个电话记录同时传给中央政治局。4月12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林彪关于要毛兼任国家主席的意见。多数政治局成员同意由毛担任国家主席，并将讨论意见报告毛，方有毛4月12日的批示。【2098】

汪东兴在回忆录中又称，“据吴法宪1971年10月21日交代说：1970年5月中旬，有一次我见到林彪时，问他对宪法修改有什么意见，他说主张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要我和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要写上设国家主席。7月，叶群又向吴法宪当面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很明显，这是示意林彪想当国家主席。7月中旬，在中央修改宪法的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毛主席得知仍有些坚持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时，第四次提出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2099】

惟吴法宪多年后在其本人的回忆录中，否认叶群说过“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吴声称，“这里，我要特别声明一下，过去很多文件及文章都说，这句话是叶群亲自对我讲的，这根本不是事实。实际上，这句话是我从程世清那里听到的，是汪东兴传来的话。叶群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句话，这是一个多年的冤案，我要在这里更正一下。这里当然我有一定的责任，但历史就是历史。当年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对我审查时，专案组为了收集林彪有‘野心’的证据，千方百计地诱导我，非要我把这句话安到叶群的身上。我开始拒绝了，后来迫于他们施加的种种巨大压力，就顺从他们，说了违心的话。”【2100】

吴法宪前后两种不同说法，孰真孰假，难以分辨。以叶群的性格，私底下对亲近者说点“体己话”，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或许叶群担心林彪如果在国家政权体系中没有适当位置，对他的接班人地位会有影响。

如果林彪真的说过“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这样的话，认识上也颇为肤浅。如果“头”是指国家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林彪难道

【2097】《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页20-21。

【2098】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291-292；《周恩来年谱（1949-1967）》下，页361。

【2099】《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页25-26。

【2100】《吴法宪回忆录》下，页788。

不明白，类似中国这样的共产党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必定就是党的第一把手？如果“头”是指类似国家主席这样的国家元首，即从来只是徒具虚名而已（更何况中国的国家主席只能算半个国家元首。刘少奇说过，我国的国家元首职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家主席结合起来行使，是集体的国家元首）。如当时的近邻苏联，掌权的“三驾马车”由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三人组成，波德戈尔内即为名义上的苏联国家元首，在苏共领导层仅排名第三，实权在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手上。

在斯大林时代，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先后是加里宁和什维尔尼克。在赫鲁晓夫时代，先后是伏罗希洛夫、勃列日涅夫和米高扬。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从来都不屑于扮演“国家元首”的角色。在中国，毛泽东其实也不屑于扮演这个角色。然而，即使这么一个徒具象征意义的角色，毛泽东自己不要也不许林彪要。毛泽东对林彪这位“接班人”实际上的制约和防范，在此表露无遗。

按汪东兴的说法，到了1970年7月，毛泽东已第四次明确提出不同意设国家主席。文革以来毛、林之间最具争议性的话题，到此暂告一段落。此后，林彪没有再为这一问题发声。

二、中央的工作计划和修宪起草委员会名单^[2101]

7月12日，中央制定了（经报毛泽东批准）关于准备召开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的工作计划。该计划的主要内容为：

1. 成立修改宪法的起草委员会。

2. 完成宪法修改的准备工作，预计用两周时间，即自7月11日至7月24日。具体安排为：(1) 从7月11日至7月17日或者20日，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再进行一次简化宪法的修改工作，提交政治局会议通过。然后“请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这一修改草案”，作为修改草案的基础。(2) 从7月18日至7月24日，召开党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会议，讨论并通过宪法修改草案，并布置动员群众讨论修改宪法和选举四届人大代表的工作。

3. “动员全国革命群众”讨论修改宪法和通过四届人大代表名单，预计约20天的时间，即自7月25日至8月15日。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在收到全国革命群众对宪法修改的意见后，立即加以研究，对前一阶段的宪法修改草案进行再一次修改，“并提交起草委员会审定，送请毛主席、林副主席”（这段工作安排在8月

【2101】本小节主要资料来源：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下卷。

6日至8月20日)。从7月25日至8月15日,准备政府工作报告及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四五”计划设想的报告提纲。

4. 召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时间为8月21日至8月28日,议程是:(1)讨论和通过宪法修改草案。(2)国民经济计划报告提纲。(3)备战工作。

5. 第二次动员全国革命群众讨论中共中央提出的宪法修改草案,预计用15天左右时间,即自8月25日至9月24日。

6. 召开四届人大,预计10天时间,暂定自9月15日至9月24日,议程为:(1)听取政府工作报告。(2)讨论和通过宪法修改草案。(3)批准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4)选举。在四届人大开幕前,召开一次三届人大常委会,通过和批准召开四届人大的提案及其议程。

上述工作计划,从第1点至第3点,基本按计划安排进行。第4点召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未料及在全会上发生了激烈斗争。这场争斗及随后第二年“九一三”事件的重大变故,使第6点召开四届人大实际上比预定计划拖延了四年又四个月,到1975年1月方能举行。

7月17日,中共中央成立了“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该修宪起草委员会由毛泽东担任主任,林彪担任副主任,委员55人:

中央政治局委员19人: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

各省、市、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负责同志24人:潘复生、王淮湘、吴德、解学恭、谢振华、吴涛、冼恒汉、李瑞山、张江霖、康健民、赛福鼎、杨得志、南萍、韩先楚、程世清、刘兴元、韦国清、华国锋、曾思玉、刘建勋、张国华、天宝、谭甫仁、蓝亦农。

其他(工农兵代表和知识分子代表)8人:王洪文、倪志福、蔡树梅(女)、尉凤英(女)、陈永贵、吕玉兰(女)、张积慧、郭沫若。

三、中央修宪起草委员会七月会议情况^[2102]

(一) 7月17日会议情况

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于7月17日中午在京西宾馆举行。周恩来主持会议。实际到会人数53人(毛泽东、林彪、刘伯承、谢富治缺席)。

【2102】本小节主要资料来源: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下卷。

会议主要讨论：(1)为什么要修改宪法。(2)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3)怎样修改宪法。会议分发了两个文件，一是工作计划，一是宪法修改的草稿。周恩来作了讲话。

周恩来称，今天第一件事就是宣告我们“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委员会”成立了。周对修宪委员会名单的组成情况做了简要说明后，接着称：“总之，要使宪法简明扼要，通俗易懂。正如新党章一样，工农兵能背诵。修改的宪法当然不会这么短，但是要能够容易记。这是毛主席的要求。”周恩来称，原来的宪法106条，9,000多字。现修改的有两个稿子，一个是60条，6,000多字；一个是30条，4,000字，经请示毛主席，主席指示，把这两个稿子都发给大家，让大家看一看，提出意见。大家把原来的宪法作为基础，原来的宪法是在毛主席主持下制定的，是成功的，是革命的宪法。这次正式成立的起草委员会把这两个稿子议一议。

周恩来称，第二件事，要召开四届人大，宪法必须修改。因此要把原来的宪法拿到群众中去讨论，提出修改意见。要在公社、厂矿、机关、部队、学校、街道中去讨论，提出意见。要拟个《通知》，明天就要讨论。拟《通知》的问题，根据工作计划，地方的讨论意见由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集中，军队由部队自行负责。从7月25日开始到8月5日第一次集中，8月15日第二次集中。意见汇总后，向毛主席报告，再由党的九届二中全会讨论，准备于8月下旬开九届二中全会，从党的方面可以定稿。定稿后再发动群众讨论一次。周恩来称，8月25日至9月10日发动群众讨论宪法修改草案，因为9月15日至24日开四届人大，所以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的同时应将四届人大代表正式由群众通过。

（二）中共中央7月20日通知

这一向全国基层单位发出的通知称，为了进一步筹备“四届人大”的召开，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中央军委，接到本通知后，认真动员各厂矿、公社、军队、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组织的革命群众：一、广泛讨论修改宪法，提出修改意见；二、讨论和通过“四届人大”的候选代表。通知在需要掌握的几个原则中称，“各族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核心力量，毛主席是全国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林副主席是副统帅。”

该通知7月21日由中办发出。

(三) 7月20日会议情况

7月20日晚上举行的中央修宪起草委员会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主要讨论关于贯彻中央《通知》的问题。

在7月20日晚间的会议上，宪法工作小组的负责人还作了讲话。他说了四个问题：(1)从今年3月到7月，宪法工作小组共出了8个稿子，其中6个稿子认为不要设国家主席。地方的同志认为，应该设国家主席，让毛主席当主席。政治局讨论，也认为还是要主席的好。向主席报告，主席说，不要，我不当主席。不要因人设事。(2)所有制只写两种，不留单干的尾巴。(3)武装的最高统帅归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4)主席讲，要允许罢工，反对官僚主义。60条的稿子，7,000字，主席不愿看，又压缩成30条，4,000多字。宪法工作小组希望最好能减到3,000字至3,500字。

(四) 7月22日会议情况

7月22日晚，中央修宪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继续在京西宾馆举行，会议讨论的问题为：(1)关于修改宪法的问题。(2)关于民主协商四届人大代表的问题，会议由周恩来主持。

四、吴法宪与张春桥的争论

8月13日，吴法宪与张春桥就宪法修改稿中的一些提法发生激烈争论。官方《毛泽东传》如是说：

八月十三日下午，也就是九届二中全会开会前十天，在康生主持下，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召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稿。会上，吴法宪同张春桥就草案稿再次发生激烈争吵。草案稿序言部分有一段话：“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张春桥提出：“已经有了理论基础一句，后一句可以不写了。”又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吴法宪不知道去掉那几个副词是毛泽东的意思，也不知道后一句话是毛泽东在会见罗马尼亚外宾波德纳拉希时针对赫鲁晓夫说的，而以为这下可抓住了张春桥的把柄，找到了对他们发动猛烈攻击的突破口，立刻情绪激烈地反驳：“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肯定了的。这样说不是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吗？”又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会议休息时，吴法宪打电话向黄永胜通报情况。会后，陈伯达又邀吴到他家里进一步磋商，最后由

黄永胜向正在北戴河的叶群作了汇报。叶群在电话里告诉黄永胜：林副主席听了很高兴，夸吴胖子“放炮”放得好！

十四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宪法修改草案。会前，叶群分别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要他们准备有关“天才”和“四个伟大”方面的语录，以便在政治局会议上继续同张春桥等“斗争”。但出乎他们的意料，很有心计的张春桥没有再作争辩，宪法草案稿顺利地通过。^{【2103】}

按理说，以吴法宪的地位，他不可能不知道，从1969年6月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之后，所有对毛宣传的降温，都是毛本人的意愿。他不可能不知道，毛在此后审批文件时多次删去了类似“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的列宁”等吹捧性语言。吴法宪这样做，可能是认为这些评价都出自于林彪，由于保护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心切而作出了过于激烈的反应。

五、8月22日对宪法修改稿的讨论^{【2104】}

周恩来主持8月22日的会议，周恩来请康生讲话，下面是康生讲话的主要内容：

第一，是关于宪法序言。……

是总纲部分，有以下几个重要的修改：

1. 增加了第二条。那第二条原来在第三稿中是没有的，就是7月起草委员会讨论的时候的那个稿子是没有的。因为那个稿子写的时候，觉得已经在序言中讲了，总纲就不讲了。后来根据大家的意见和各地方的反映，认为要加上这一条，所以现在增加了“毛泽东主席是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是全国全军的最高统帅。林彪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是全国全军的副统帅”。这一条的文字方面同志们还可以讨论。有人提议，把关于副统帅的一句摆在前头，也就是讲了“毛主席是全国全军的最高统帅”，就接着讲“林彪副主席是全国全军的副统帅”，然后讲“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以此作结。大家看，这个顺序调动不调动？另一方面，这一条还增加了“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

【2103】《毛泽东传（1949—1976）》下，页1569—170。

【2104】本小节主要资料来源：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下卷。

第三，是国家机构部分，有以下几个重要的修改：

1. 第十六条。关于人民代表大会问题，删去了一句话：“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立法权”。陈伯达特别提出这个问题。立法权主要的还是共产党。今天主席也讲了，共产党、国务院，都立法，单独地写这一句，恐怕不合乎实际。所以就不写那句了。

2. 第十九条。删去了国务院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这一条简化了。国务院就是中央人民政府。删去执行机关、行政机关，就不那么绝对地把三权鼎立突出了。这样合乎事实。

3. 第二十一条。关于国家行政区划，增加了地区一级。……

4. 第四个问题，意见比较多的是人民法院。这个问题嘛就是有人提议人民法院不要了，同公安机关合并，也就是司法、检察、公安统一起来。咱们老根据地的办法就是这样子的。但在延安的时候法院还有。有的提议，法院作为国务院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有一种不占多数的意见，说注意到国际的影响，还是暂时保留着好。我们现在还是留着，所以专门写了那么一条。法院院长到底怎么组成？原来的稿子根本没有，马马虎虎的没有说。后来，郭老提出，法院怎么产生呢？他想了个办法，说是写成由法律规定好了。由法律规定，是一句空话，政治局讨论时说，还是写上由本地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来任免。那就是说，地方的法院由革委会任免。看这样子成不成？我记得程世清同志说，地方法院根本不要。这也是一个意见，没有把握，写上供大家讨论就是了。

第四，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部分，有以下几个重要的修改：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动，但是提的意见不少。这就是关于国旗、国徽、首都，还有国歌。有的人提议说，“五星红旗的4颗星要减去2颗，即减去一个资产阶级，减去一个臭知识分子。只要工农就行了”。有的讲：“一共要8颗星，那一颗大的是毛主席，那7颗个小的的是7亿人民。”那么，将来再8亿人民怎么办呢？那就又要添了。对于有的说，“这边画上一条枪，那边画上一枝笔。枪杆子，笔杆子，两杆子要画上。”还有的说：“当中要画上毛主席的书。有笔就要有书。”画上毛主席的书，那么，毛主席呢？就要再加上毛主席的像了。所以，这方面没有改动。关于国歌，意见也很多。有的讲把《东方红》作为国歌；有的讲，用原来的曲子，改写歌词。（有人插话，上海已经有了两个稿子了。张春桥插话，江青同志已经组织了好几次，而且修改过好几次，现在还没有完全修改出来。）这方面的积极性很高，群众的创造

性也有，是有好的。（江青插话，有个工人同志写了一个。王洪文插话，上海写的都寄给于会泳同志了，他不是集中改吗？现在好多意见都集中到他那里去了。）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是蛮可爱的。但是可惜现在也不晓得吸收哪个意见好，所以结果还是照原来的，没有动。

康生说：“我就讲这些，恐怕还有漏掉的。请总理补充。”

下面是周恩来的讲话：

下午见主席，我们特别提了国家主席的问题。报告上已经说了嘛，但我们又说了：大家热切希望，既然是一元化嘛，党的主席、国家主席也要一元化。尽管是个形式，但群众热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当然副主席。这样就满足群众愿望。领导嘛，当然是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领导了。但在国家形式上，是国家元首、副元首。我们并且还提了个方案，说接待外国使节可以由元首授权，国家主席授权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接待使节。大概几位同志，伯达、康老、我、林副主席，四个人都说了，主席说，那是个形式。（康生插话，主席还有句话，说“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主席”。）当然，起草的稿子还是照顾那个一开始由东兴同志传达的主席的意思。但我们还是反映一下子，还提出了一个方案。主席说，现在当然也见了不少外宾，也可以不见，有些不是也没有见嘛。主席说，当国家主席、元首嘛，就是有点好客，不大好不见，虽然接待使节可以由别人。实际上，这个问题主要的还是党的领导和行政上国务院，党的本身也还有一件事。设立人大常委会为的培养干部。外国人不是说，党的决议人民代表大会保证通过，人大常委会更是保证通过。资产阶级也是这样的，你看嘛，英国的国会制，还不是多数是工党的决定？然后国会通过就是了。甚至还没有通过就已经宣布了。现在是保守党是多数了，是保守党的国会。美国也是一样。资产阶级也是一个党和一个行政机构。主席说，那两层都有必要，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委会。后来康老也说，有人主张把人大常委会同国务院合在一起。主席说，那也不行了，总还要有那么一个机构才行。

“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当然副主席”这句话，侧重点其实是“林副主席是当然副主席”。“国家元首、副元首”，侧重点其实是“副元首”。到最后一刻，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还是想为林彪说说情，解决林在国家政治体系中没位置的问题，被毛以“那是个形式”一口回绝。康生还透露了毛提议修改宪法

的最终本意，“就是考虑到不要主席”。周、陈、康不理解毛说“不要主席”其实就是不要林当主席？

会后，由中央办公厅发文。从时间上说，这个宪法修改草案稿就要交党的九届二中全会讨论通过。因此，这个稿子实际上已经是定稿了。

提交九届二中全会并由其于9月6日“基本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当然不会有国家主席的设置，但却创造了一个“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的尊号，并将此一尊号毫无悬念地授予了毛泽东。草案第一章“总纲”第二条全文正如康生所述：“毛泽东主席是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是全国全军的最高统帅。林彪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是全国全军的副统帅。”却无周恩来所期望的林彪是“副元首”的提法。

1970年宪法修改草案首创的“特色”在于：毛泽东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极左理论完全浸透于宪法条文之中；以人入宪，与现代民主精神背道而驰；毛泽东在国家政治体制中无具体职务，却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国家元首的部分实际职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集体行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改称主任，却无实际权力，等等。尤其奇葩的是，所谓“元首”不是国家的元首，而是“专政”的元首。本来，“专政”只是国家的一部分功能，远远不是国家的全部。可是，这个宪法修正案里却创造了一个“专政的元首”的概念，不能不令人对极左的荒唐叹为观止！

第九十节 九届二中全会

一、林彪不点名地针对张春桥的讲话

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举行。会议原定议程为：(1)讨论修改宪法问题；(2)国民经济计划问题；(3)战备问题。重点是第(1)项，以为召开四届人大作准备。

会议开幕前，吴法宪通过叶群向林彪报告了8月13日他与张春桥在修改宪法问题上的争论。关于这次争论，吴法宪在1971年4月9日检讨时称，“在那次会议上，对宪法的写法有过一些不同的意见。在宪法讨论稿的序言部分有这样一段内容：‘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张春桥同志提出，已经有了理论基础一句，后一句可以不写了。这个问题本来是提供讨论的，是正常的。由于我平时对张春桥同志积累了一些成见，所以对张春桥同志提出这个问题很反感，后来又听张春桥同志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我情绪就更加激动，

自以为是，非常主观，错误地顶驳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肯定了的，这样说不是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吗？还极其错误地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等等。我完全忘记了在讨论‘九大’新党章时，主席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圈了，也没有搞清楚张春桥同志所说的那句话的来由，就主观片面地给张春桥同志扣上了大帽子，把会议气氛搞得很紧张。这是完全错误的。当时张春桥同志非常冷静，没有反驳我。我还错误地认为是讲对了。在会中休息时，我离开了会场，用电话把我主观片面的错误意见，报告了黄永胜同志。直到在九届二中全会犯了错误以后，经总理指出，才弄清楚张春桥同志的那句话，是主席在接见波德纳拉希时，针对赫鲁晓夫讲的。”“八月十三日那次会，由下午三时半一直讨论到下半夜一时半左右才结束。这次会，陈伯达也参加了，中间他溜走了，到我发言快结束时才回来。散会后，在怀仁堂门口，他问我今天发言为什么这样激动，当我要给他讲的时候，他说这里不好谈，要我到他家里去谈一下。于是，分别坐车到了他家里。在他办公室，我就把会议情况和发言的内容告诉了他。陈伯达洋洋得意，抓住我的错误情绪，乘机挑拨，吹捧我‘能坚持原则，风格很高’。经他这么一挑一捧，就中了他的毒，更加头脑发热，就用陈伯达家里的电话把我的错误看法报告了总理（当时未向总理说明是在陈伯达家里打的电话）。因为时间很晚，打完电话很快就回到家里，又急忙用电话把我的错误的意见报告了叶群同志。”

吴法宪的报告，促使林彪在8月23日下午大会宣布开幕后，发表了不点名地针对张春桥的即席讲话。林彪在讲话中称：

你们大家是不是觉得老三篇不起大作用呀？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起作用。另外还有其他的这些具体的政策思想，以及哲学思想，这些都起作用，还有政治思想，多了。几十年嘛！各种问题都接触了，各种问题都有指示。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我们这些人都是参加革命嘛，毛主席几十年写的东西，我们现在都觉得是比我们现在，比我的水平高，是有创造的。不但说是科学社会方面可以是创造的，自然科学里面你看那一天不在创造？毛主席的学说就是科学嘛，社会科学嘛，解放人民的科学嘛，解放无产阶级的科学嘛。他处在新的时代嘛，当然有新的发展。怎么能够说没有发展？说是没有发展，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说事物是不发展的，思想也是不发展的。这是过去的思想，已经结束的思想，毋用发展嘛，只要旧的就行了嘛。……现在我们是处在一种世界革命的时代，帝国主义崩溃的时代。同一百

年前，百把年前的马克思时代，我们这个时代是前进了很多了。比列宁所处的时代也前进很多了。所遇到的重大事变，跟当时他们所遇到的重大的事变，也多的多，大的多，快的多。如何能说是没有发展呢？毛主席不是都是回答了这些问题吗？不是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来回答了这些问题？把马列主义的这种普遍真理与现在的国际和国内的实际相结合，毛主席个人的这种天分、学问、经验来创造出新的东西来。而毛主席这些著作中间所发挥的地方，所具体化的地方，所增加的新的东西，你们翻开马列著作中间他不可能有的。他没有，而且是不可能有的。这也很自然的，他没有那个客观嘛。因此，不能对于新的问题作出预先的答复和解决。所以不能说是没有发展。这还是形而上学的观点，事物是不动的，是凝固的，僵死的，而不是生命的，可变化的，而是随着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这种观念不符合马列主义的起码的原则的，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因为他那个中央不同，在我们这个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当权的国家，最高的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就把整个的事情改变面貌，改变面貌，改变面貌。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值得把脑筋静下来想一想，是不是这回事情。^{【2105】}

林彪在这里其实是将对毛“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简略地重新阐述了一遍，以此影射张春桥“反对毛主席”。问题是张春桥的意见并非个人自作主张。毛在审阅九大党章时即圈掉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林彪是不知道，还是知道了仍坚持己见？

二、陈伯达打印“称天才”语录

接下来事情的发展，吴法宪在1971年4月9日的检讨中称，“到庐山之后，陈伯达利用我八月十三日对张春桥同志这个错误情绪，更进一步地进行挑拨和煽动。八月二十三日晚上，在政治局会议后，他来找我和作鹏、会作同志。这次谈话，主要是攻击和污蔑张春桥同志，煽动性很大。陈伯达谈了一九六七年处理安亭事件和上海夺权的经过，说是他派张春桥同志去处理安亭事件的。他说当时情况很紧张，陈丕显要找他讲电话，他就不接，后来张春桥同志给他打电话，他就

【2105】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1970年8月23日，根据录音整理。中发[1972]5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1972年1月15日发至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省、军级。

接了。说他是支持张春桥同志，不支持陈丕显的。是他写了几条办法，由张春桥同志宣布，才解决问题的。然后又在上海开了一个群众大会，讲话的内容也是由他打电话告诉张春桥同志的，结果大会开好了，夺权成功了。以此吹嘘他自己，贬低别人。他还攻击张春桥同志既没有读多少书，写什么文章，还好表现自己。他还谈到关于‘天才’问题，我们就问他有没有马、恩、列、斯关于天才方面的论述？他说有，回去查查书，给你们找一些。他回去后，过了一段时间打电话传给我七条（第一次三条，第二次两条，第三次两条），在电话上我同他逐条进行了校正，然后交给秘书打印了几份，第二天给了作鹏、会作、叶群同志。”

汪东兴在回忆录中则称，8月23日，“这天晚上，周总理主持召开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区召集人会议，安排会议各组分别讨论宪法和计划问题。吴法宪却在会上说林副主席的讲话很重要，提出要很好学习，要求再播放他的讲话录音，大家附和了。周总理只好根据大家的意见，决定24日上午会议代表听林彪讲话的录音，下午讨论林彪的讲话。”^{【2106】}

关于陈伯达打印“称天才”语录的过程，汪东兴的回忆与吴法宪的检讨亦有完全不同的说法：

24日上午散会时，陈伯达在礼堂门口塞给我一份材料，他对我说：“这份材料请打印5份。

我问：“你是要发给常委吗？”

他说：“是。”

我一看要打印的材料是几条语录。我考虑常委看完后，可能要发给政治局委员，就交代会议秘书处打印20份。

陈伯达要打印的几条语录如下：

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

一、恩格斯称马克思为天才

恩格斯称赞马克思写的《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一书为：“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

卡·马克思著：《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中弗·恩格斯为本书德文第三版作的《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21页

二、列宁称马克思、恩格斯为天才

【2106】《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页39。

1、“当你读到这些评论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是在亲自听取这位天才思想家讲话一样。”

《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选集》
第一卷第 769 页

2、“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
第二卷第 378 页

3、“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最先从这里得出了全世界历史提示的结论，并且一贯地推行了这个结论。这一结论就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
第二卷第 382 页

4、列宁在《预言》一文中，在引用了恩格斯谈到未来世界大战时所说的一段话后，赞扬恩格斯：“这真是多么天才的预见！”

《列宁选集》第三卷第 593 页

5、“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怎么办？》《列宁选集》第一卷第 422 页

三、毛主席称马、恩、列、斯为天才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 264 页^[2107]

汪东兴在这里并没有推诿打印陈伯达材料的责任，故似较为可信。

【2107】《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页 41-43。

三、林彪讲话后群情激愤

8月24日下午，分组讨论林彪讲话。根据现有材料，以华北组的发言和讨论最为激烈。

陈伯达在华北组发言时引用了林彪关于天才问题的三段话后，不点名地批评张春桥称：

下面我想讲一下关于天才的问题。

林副主席经常说，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是当代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这里我引林副主席以下三段话：

林副主席说：“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

林副主席说：“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伟大的天才。”

林副主席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这是多年的话了。林副主席这些话已发表了多年。但是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

如果大家不忘记的话，我想大家会记得，林副主席这些话写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是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中全会公报上就是这样写的：“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是宣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公报，但是竟有人说这些话是一个讽刺。这样的人要否定公报，要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吴法宪同志说过一句很好的话，就是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这是绝对办不到的。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已经觉悟了全国人民，很快就识破这种虚伪、阴谋诡计，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之后，有的人竟然怀疑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想搞历史的翻案。我就提出这个问题。

有的人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天才，但是他认为自己是天才。我们知道，恩格斯多次称马克思是伟大的天才，他的著作是天才的著作。列宁多次称赞马克思是天才。斯大林也称马克思、列宁是天才。我们也称过斯大林是天才。否认天才，是不是要把马克思、列宁全盘否定呢？更不用说要把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一笔勾销。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才。要赶快觉醒起来，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2108】}

汪东兴接着发言，表示同意陈伯达对张春桥的不点名批评，并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汪的发言全文如下：

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的讲话。林副主席的讲话是很重要的，对这次会议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林副主席是我们活学活用主席思想的光辉榜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学得好，用得好。在关键的时刻，林副主席的态度是正确的。这种态度代表着我们的心意，代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心意。我很受感动，坚决向林副主席指出的这个方向前进，并且努力紧跟。

刚才伯达同志的发言，我也同意。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野心家，这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我看，这种思想是最反动的。我们不容许这种思想在我们党内泛滥。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林副主席昨天讲话中说，毛主席的领导地位，是几十年斗争中形成的，是在党内两条路线较量中比较出来的。这个领导地位，除极端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

林副主席还说，毛主席是我们党、政府、国家、军队的缔造者和领导者。毛主席的领导，是我们取得胜利的各种因素中的决定因素。我还记得林副主席早就说过，没有毛主席，也没有我们自己。

林副主席特别强调说，在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这一条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中最重要的一条。这一条是我国革命经验中最根本的经验。

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这些精辟、透彻的阐述。

【2108】陈伯达在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的发言，1970年8月24日。《“文革”十年资料选编》中册，页48-49。

另有一点建议，根据中央办公厅机关和八三四一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有的说不当国家主席可以减少些事务，如接见外宾等，事实上凡到中国来访问的外宾，绝大多数主席都接见了，到中国来的外宾，主席不接见他就不走。主席的接见，影响是巨大的。

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

有的人不仅不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连毛泽东思想都不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可以识破这些坏蛋。（伯达同志：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的跳起来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把刘少奇篡夺去的权夺回来了，这个权如果再被坏蛋夺走，我们是不甘心的。我们的权一定要掌握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2109】}

陈、汪的发言产生很大的影响，尤其是汪东兴声称中办和毛的“御林军”8341部队都“热切希望”毛当国家主席、林当副主席，更让人们以为这是毛的本意。陈、汪发言后华北组群情激愤的情况，充分体现在由李雪峰、吴德、解学恭签发的华北组第二号简报（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上：

大家听了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在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为了反击这种反革命阴谋活动，钱学森同志首先建议在宪法上，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接着汪东兴同志进一步建议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大家热烈鼓掌，衷心赞成这个建议。大家认为，不能让妄图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主席的阴谋得逞，不能把

【2109】汪东兴在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的发言，1970年8月24日。《“文革”十年资料选编》中册，页51-53。

减少毛主席接待外宾的事务工作作为借口，实际上现在绝大多数外宾，毛主席都接见，几乎到中国的外宾是毛主席不见不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不是一样在接见外宾吗！

马福全同志说：我们河北省广大群众在讨论宪法时，一致认为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领导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只有林副主席，才能百分之百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强烈要求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我代表河北省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要求宪法上写上。^{【2110】}

吴法宪在西南组发言时针对张春桥称：

修改宪法的过程，也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过程。确实是这样。对宪法中到底怎么写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是有不同意见的，写什么不写什么，写多写少，在认识上都是有不同意见的。

开始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怎么写，有人就提出不要“突出”。在全国人民讨论后，有人还不同意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说是在序言中有了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就可以了。把“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写进宪法，这是全国三十二个单位一致的意见，如不写，会产生什么影响？昨天康生同志讲的群众愿望不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了吗？我们说，全国哪项工作，只要离开了毛主席的思想就要失败，就要垮台。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这伙人就是反对学习毛泽东思想。这是他们犯的一条最大的罪行。

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竟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这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就肯定下来的，林副主席《再版前言》中肯定下来了，怎么能不写？不承认，就是推翻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推翻了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

关于这个问题，宪法是本来没有写，是讨论中题外的问题，可是有人却借这个机会进行贬低。

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现在全世界广为传播，全党全国人民一致公认。如果这股风吹下去，这怎么得了？所以，林副主席特别

【2110】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华北组第二号简报），1970年8月24日。《“文革”十年资料选编》中册，页45-46。钱学森，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九届候补中央委员。马福全，时任石家庄市革委会副主任，九届中央委员。

强调，在中央工作的老同志要冷静的想一想，对我自己教育很大，值得我们深思。

（曹轶欧同志插话：向大家介绍一个情况，我们同外宾接触时，发现不少把毛主席的“老三篇”印成小册子装在口袋里。世界革命人民对毛泽东思想是非常热爱的。）

我们现在在墙壁上挂语录，这是为了便于学便于用。举个例子，我们有一次在大会堂讨论修改宪法，从下午三时一直讨论到第二天凌晨一时，对于人民这个问题如何表达，想不出办法，就是后来看了墙壁上毛主席的一条语录：“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受到启发，于是就成了现在宪法中的一段话，“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我国各族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历史事实，是几十年革命斗争所证明了的。关于天才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毛主席对马克思和列宁也都有过论述。林副主席关于毛主席是天才的论述，并不是一次，而是多次。

（念毛主席、林副主席，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有关天才的语录，因念的较快，未记下，略）。

大家听了这些语录，怎么能说没有天才呢？怎么能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是个讽刺”呢？毛主席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等各个领域都发展了马列主义，社会科学方面发展了，自然科学方面也发展了，都发展了。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们的一切，就没有今天我们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党，伟大的军队。对这个问题，一种是迷迷糊糊，是认识问题。但是也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2111】}

四、毛泽东严厉批判陈伯达

据《毛泽东年谱》，8月25日中午，毛泽东听取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汇报各组对全会第六号简报的反应。随后找汪东兴谈话，说：他们已经来过了，他们说六号简报的反应很大，你汪主任了解我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还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过，你怎么又要我当国家主席呢？同汪东兴谈话后，又分别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进行单独谈话。同日下午三时，毛泽东召集有各大组组长

【2111】 吴法宪在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西南组的发言（节录），1970年8月24日。《“文革”十年资料选编》中册，页55-57。

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向到会的人宣布：刚才，我和几位常委商量，认为现在各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讲到这里，毛泽东对着林彪补了一句：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又说：本来我们这个会议，方针嘛，是开好的会议、团结胜利的会议呢，还是开不好的会议，变成了分裂失败的会议呢？还是要争取开一个团结的会，争取更大的胜利。如果开不成，仍要分裂，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过去党是经过挫折的，千锤百炼。如果搞不好的话，那我就下山，你们去开，开完了会我再上山，就不下去了。再不然，我就辞掉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毛泽东还批评陈伯达说：我们共事三十多年，你阴一套，阳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政治局在山下商议不设国家主席，大家没有发表不同意见。上了山你就变了卦，搞突然袭击。我毛泽东是不当国家主席的，要当，你陈伯达去当好了，你们去当！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第六号简报，责令陈伯达等人作出检查。^[2112]

8月26日，九届二中全会各小组传达关于暂停开各组会议的决定。26-30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不分昼夜地找人谈话或开小会，进一步了解情况。毛泽东同李雪峰谈话时，批评他出简报没把关，说你这组长怎么当的？27日上午，召集周恩来等开会。同日，阅汪东兴关于8月24日在华北组发言的书面检查，称这个检讨书可以发到会上。8月29日晨，陈伯达将写出的检讨送周恩来和康生审阅。同日，林彪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传达25日下午毛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的讲话。陈伯达、汪东兴、吴法宪在会上作了检讨。同日，毛泽东同本日到达庐山的黄永胜谈话。^[2113]

8月31日，毛泽东针对陈伯达编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写批语称：“这个材料是陈伯达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2114]，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2115]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

【211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326-327。

【211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327-329。

【2114】原注：指恩格斯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德文第3版写的序言中的“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这句话。

【2115】原注：今译《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2116] 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2117]，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陈伯达摘引林彪同志的话多至七条，如获至宝。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俩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2118]

9月1日晨，毛泽东把对陈伯达编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所写的批语交周恩来等，周恩来将批语送张春桥阅，上午又送林彪阅。中午，毛泽东约周恩来谈话，在批语的抄件上加上题目《我的一点意见》，并在文中陈伯达名字后加“同志”二字，在印发全会前，毛泽东删去了批语中的“陈伯达摘引林彪同志的话多至七条，如获至宝”一句，并把修改件送给林彪看。同日下午三时，周恩来将《我的一点意见》给陈伯达看并同他谈话。随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判陈伯达。^[2119]

[2116] 原注：见李白《梁甫吟》。

[2117] 原注：指陈伯达摘录的毛泽东《实践论》中的一段话：“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

[2118]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329-331。

[2119]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331。

五、毛心目中文革派比军人集团更重要

9月6日下午五时半，在庐山人民剧院召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议，林彪主持会议。会议基本通过宪法修改草案和全会公报。林彪请毛泽东讲话，毛泽东要周恩来讲。周恩来说，我们昨天开了政治局委员和各组组长、副组长会议，通过了几个文件，然后到主席那里报告。主席认为，我们这次全会，经过讨论，还是按照他的要求，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主席总说我们的会议总要有个新的任务提出，我们大家就奔向各方去奋斗了，所以这次公报里就把这个任务都提出来了。首先，向人大常委会建议，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人大。第二件事，批准了国务院关于一九七〇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报告。关于国际形势，主席把几年来所观察的问题都发表在“五二〇声明”中了。主席还提了一个地方跟军队两方面的关系问题，主席提出的办法就是不要责备对方，地方干部应该拥军，军队干部应该拥政爱民，这样就会合作了。

接着，康生讲话。他说：多年以来主席就教导我们要读几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昨天晚上主席又提出来了。毛泽东说：这是我过去交给罗瑞卿搞的。读几本或者十几本也可以，过去说是罗瑞卿扰乱了林彪同志要求读我的著作的事情，其实是我扰乱了你，不是罗瑞卿扰乱了你。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2120]呀，就照着吹呀，那末，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嘛。毛泽东说：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所谓讲团结，当然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提出团结的口号，总是好一点，人多一点嘛。党内党外都要团结比较多数，事情才干得好。对于陈伯达同志，还要看一看，有些问题再研究一下，我赞成同志们的意见，只保留他的中央委员。

最后，林彪说，这个会议整个进程中间都是毛主席亲自指导的。会议过程中间出现的问题，主席很敏锐地发现了，顺利地解决了。这个会，可能成一个团结的会，还是分裂的会？经过主席的这种指导，依然变成了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2121]

[2120] 原注：指陈伯达编辑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中编入的恩格斯的一句话：“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这句话在恩格斯为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德文第3版写的序言中。

[2121]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333—334。



黄、吴、李、邱在九江机场为林彪送行，1970年9月7日。

九届二中全会的最终结局是：陈伯达被清洗；李雪峰、郑维山受牵连相继倒台；汪东兴检讨过关；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地位进一步巩固；林彪一系从此不被毛信任，处于被动挨打状态。而四届人大的召开，则变得遥遥无期。

为什么以林彪为首的军人集团会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败北？究其原因，固然有毛泽东对军人集团迅速崛起存有很大戒心，唯恐其尾大不掉的高度警惕，要借此将其压制下去的因素，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毛泽东坚决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立场和考虑。

毛泽东后来说过，他的一生办了两件事，一件事是打败了蒋介石，把他赶到一个海岛上去了，另一件事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前一件事赞成的人多，反对的人少；后一件事反对的人多，赞成的人少。毛是把文化大革命视为与中国革命夺权政权同样重要的事，是改朝换代的事，是他开创的新的千秋大业。为了维护文革，他是不惜一切代价，不惜排除一切阻碍的。在毛的眼里，文革的主体力量是以中央文革为代表的造反派，而军队则是为文革开路，保障文革顺利进行的借助力量，或者说是工具。在毛的心目中，二者的分量明显是不一样的。

不可否认，林彪一系的军队将领都是跟毛干革命的“红小鬼”，是建国功臣，在战争年代对毛忠心耿耿，毛对他们也是有感情的。但在毛看来，文革是一场新的革命，要“吐故纳新”，需要新的革命力量、新的血液。而江青、张春桥等人才是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真正传承者，其地位比林彪一系的军人们更为重要。为了强行推进文革，毛可以利用林，甚至对林许以“接班人”的储君地位。平时毛可以在军人们与文革派之间搞平衡，但在双方矛盾激化的时刻，毛的天平是向文革派倾斜的。毛宁愿不要林彪这个接班人，也要文革派，因为文革派没有“战功”，他们是靠文革起家的，他们的利益与文革紧密相连，所以绝不会在毛百年之后抛弃文革的衣钵。

相比之下，林彪、陈伯达、叶群和汪东兴等人错误地估计了毛泽东。他们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不满，但因为毛的关系，不敢直接向江青发难，便想先扳倒张春桥，以此“清君侧”，并考验毛对他们的态度。在此之前，林彪几次使用类似“边缘”手法，如反罗瑞卿、反贺龙、反杨成武，都成功了。他们以为，这次以同样手法反张春桥也会成功，结果却头撞南墙，犯了大错，正像林立果说的“翻车了”，“倒大霉了”。

从客观结果的角度看，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一场失败的预演。汪东兴1970年8月这一次，只不过是干早了五年。对于毛泽东家族而言，毛犯的最大历史性错误就是让汪东兴检讨过关，信任如故。惟对中国而言，中南海御林军的掌控权仍旧在汪手中，这未免不是一件幸事。毛放过了汪，汪却没有因此而感恩戴德地放过他的老婆，还有毛远新。没有汪主动、坚定的支持和参与，1976年十月之变绝对不可能成功。

第九十一节 吴法宪、叶群检讨

一、吴法宪检讨

林彪曾说：“我培养的干部（好的）不多，李作鹏、吴法宪在我死以前，不能达到。”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为了保黄、吴、叶、李、邱等人，曾试探毛泽东的态度。1970年9月林彪从北戴河回北京后即去看毛泽东，林对毛称，他在庐山划了一根火柴，几乎把房子烧了。毛答：那也没有这样厉害。毛的话，很快传给了黄、吴等人。^{【2122】}

惟毛泽东是不会让这些入轻易蒙混过关的。1970年9月22日，周恩来和康生到林彪处，将毛泽东对汪东兴书面检讨的批件给林看，提议约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在一起阅读该件，在他们想通后，应给主席、林副主席写一书面检讨，揭露事实真相，与陈伯达完全决裂。这样做，对党对己都极有利。林彪表示同意由周恩来、康生约黄等谈。过了一个星期，吴法宪向毛泽东交上第一篇书面检讨。^{【2123】}

10月14日，毛泽东在吴法宪的书面检讨上严厉谴责了吴法宪等人。毛泽东称：“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200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毛泽东还称：陈伯达“是个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揭发过，又同个别同志打过招呼。”“个别同志”就是指林彪，这里就是指责林彪不听招呼。当吴法宪说到陈伯达说“中央委员会也有斗争”时，毛泽东批示：“这句话并没有错，中央委员会有严重的斗争，有斗争是正常生活。”毛泽东还批示：“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所谓“其他宣讲员”，就是指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毛不断敲打林彪一系将领及叶群，就是要降低他们在党内军内的政治影响和威信。

吴法宪9月29日第一次书面检讨及毛泽东10月14日的批示全文如下：

【2122】邱会作1980年7月的交代。

【212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338。

此件已阅。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

一九七〇年十月十四日

主席：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主席亲自主持的二中全会，干扰了林副主席，破坏了主席教导的要把全会开成团结的会，胜利的会的方针，我内心万分沉痛。我辜负了主席的教导和培养，对不起主席，对不起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对不起受我发言影响的同志。我犯了错误，是主席及时挽救了我，主席的教导对我是最亲切的关怀和爱护。在庐山，林副主席对我两次严厉的批评教育，总理对我多次批评教育，康生同志对我两次批评教育，使我对错误逐渐有了认识。

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是一篇最精辟的马列主义的光辉文献，我坚决拥护，一定按照主席的教导办事。主席英明伟大，一针见血，深刻地揭露了陈伯达的反动本质，学习后，我受到了极大的教育，使我猛醒过来，认清了陈伯达这个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假马克思主义者的真面目和他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妄图分裂党、夺毛主席、党中央的权的罪恶阴谋，知道陈伯达三十多年来在重大的关键时刻，都是反对毛主席、反党、反马列主义的。明白自己上了大坏蛋陈伯达的当。

在二中全会上，我先后在政治局会议上，西南组会议和四川小组会上作了五次检讨。回京后，九月十四日，总理、康生、永胜同志传达了主席极为重要的指示和林副主席的指示，传达了九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十五日，空军听过传达的十五位同志进行了学习讨论，我以接受教训的态度向到会的同志作了自我批评。最近，黄永胜同志又把主席对汪东兴同志检讨的批示传达给我。主席对我们这样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亲切教导，使我更加感动难过。

我带着最沉痛的心情向主席检讨认错，同时揭发坏蛋陈伯达的几个问题。

我这次犯的错误主要是：

一、没有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革命没有革自己的命。我对主席的书没有读懂，没有学好用好主席思想，也不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反而不懂装懂。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西南组会上的发言有严重错误，传播了错误的看法，造成了思想混乱，使西南组有些同志跟着我的发言上纲上线，影响了会议的正常进行，干扰了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幸亏主席明察秋毫，及时发现了问题，端正了航向，指出了我的错误，挽救了我。

由于我对陈伯达这个坏人没有识破，盲目地认为他读的书多，是“理论家”所以对他搞的语录就相信，根本没有通过自己的脑子想一想是否对，在发言时就念了这些语录，上了当，受了骗。

我自己也选择了林副主席的一些话。这些话是从一本政治学院编印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的小册子上选来的。没有查对这些话是不是林副主席讲的就在会上念了，这是非常错误的。林副主席一九六七年就指示过不要搞他的语录，我这样做也违背了林副主席的指示。

二、我这样做，不论从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来说，都是错误的。我发言中引用的材料，没有查证核实，没有同对方正式商量交谈，又没有准备稿子，由于我有错误的认识和错误的情绪，话匣子打开后，越讲越多，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在庄严的二中全会上，讲这样关系全局的原则性的大问题，事先没有请示政治局的同志，更未向主席、林副主席请示报告，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又不从全局考虑，不顾影响，不考虑后果，这是极不严肃、极不谨慎的不负责任的态度。

三、主观主义，自以为是。思想方法简单片面，有骄傲自满、偏激情绪，听不进不同意见，心里有话就憋不住。总认为自己是热爱毛主席的，因而对

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

这些话似乎不真实。

听到的有些话就很敏感，凭主观的框框，不加分析和深思，随便顶撞，随便说话，只讲主观的动机，不问客观效果。

四、政治上极端幼稚，看问题、处理问题水平都很低，又没有在上面工作和政治生活的经验，还同过去一样，随便讲话，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完全忘记了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教导：不要心血来潮忘乎所以。

总之，我违背了主席的谆谆教导，犯了极为严重的错误，这是我参加革命以来最深刻的一次教训，痛心之极，永远也不能忘记。请求主席给予严厉批评和处分。

这次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揪出了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反党分子陈伯达，消除了隐患，使我们全党更加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周围。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

今后，我一定认真地活学活用主席思想，认真学习主席的哲学著作，学习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下功夫改造自己的世界观。遵照主席的教导，认真读一点马列主义的书，努力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和路线觉悟，忠诚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和大坏蛋陈伯达划清界限，一定谦虚谨慎，夹着尾巴做人，老老实实在地接受组织和群众的监督和教育，多作自我批评，虚心向地方同志学习，言行一致地维护党的团结，只有做到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的一致，才能真正的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一定牢记主席的教导，痛改前非，跟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九月一日，我在政治局扩大会上，对陈伯达作了初步揭发，现再补充揭发如下：

是个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揭发过，又同个别同志打过招呼。

一、在庐山他几次来找我。八月二十二日上午，我外出到大月山去看空军的一个雷达连。中午回来，听服务员讲，陈伯达来找过我。下午三时，他又再来，我因当时还没有识破他，出于礼节，就主动去看他了，坐了一会回来了。他说他到了山上不舒服，还告诉我政治局常委已经开了会，研究了会议的日程，今晚可能开政治局扩大会，总理会传达。

二、八月二十三日晚十二点前后，他来找我和李作鹏、邱会作同志，这次他谈了一九六七年上海安亭事件的经过，吹嘘他对上海的一月革命有“功劳”，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他又谈关于“天才”方面的问题，我们就问他有马、恩、列、斯关于天才方面的论述没有？他说：有的，可以找一百多条，回去给你们找一些。他回去后隔不久就打电话传给我七条语录。（第一次三条，第二次两条，第三次两条），我自己没有带书，又没有读过马列主义的书，就同他在电话上逐条进行了校正，然后打印了几份，给了办事组几个同志。现在来看，这是大坏蛋陈伯达利用我对天才问题的错误认识和错误情绪，利用我的无知，用这些语录煽动我放炮，为他煽风点火，制造混乱，达到他破坏二中全会，分裂党的目的。

三、八月二十六日黄昏，他打电话给我，说他到了主席那里，主席要他找我和李作鹏、邱会作三个同志谈谈，因此，我们三人就去了。我们到后，告诉他，今天你找我们谈话，要报告总理。后来，他就出去打电话，回来后他说，主席今天下午批评了他，看了他二十四日在华北组的发言稿。后来，他又到江青同志和康生同志那里，也受到了批评。他还说，主席也批评了你们，我们问他主席批评了什么，他不肯说。我们三人当时都回答说，主席批评我们是对我们最大的关怀和教育，批评什么我们都接受，坚决改正。当时陈伯达说话神态异常，说时吱吱唔

又忘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
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

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

？

次，企图挽救他自己。

无非是想再骗你们一

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

斗争，有斗争是正常生活。

中央委员会有严重的斗争，有斗争是正常生活。

这样对。

唔，对主席的批评毫无沉痛的心痛，没有一点悔过的表示，我们在那里呆了约二十分钟就回来了。

四、八月二十七日晚二十四点以后，他突然来找我，说他受了总理的批评，说他的发言稿用了我的一句话，问我这句话（指“有人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讲过没有。我说，讲过，你自己也在场嘛，（这时候我才知道他用了我的话）他还把他的稿子给我看，现在看来，这是陈伯达的一种极其阴险毒辣的手段。

五、二十七日晚，他来和我核对那句话时，我看到他的发言稿上造谣说：“中央委员会也有斗争”（大意），但他的发言印出以后，这句话没有了。这肯定是他后来删了的。

六、八月二十四日晚，他来电话找我，我去参加小组会不在家，他就告诉我的秘书说，他想把他对宪法的修改意见划一份出来送呈主席看，要秘书转告我。我开完会回来，秘书告诉了我。我当即表示，宪法修改工作小组是康生同志主持的，经过了半年多的讨论修改，又经过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和宪法起草委员会讨论，最后交全国人民讨论的。他只参加过两次会，也没有提出什么意见，怎么能这样做，并且告诉秘书不要答复他。

（以上五、六二点我已在九月一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初步揭发过）

吴法宪

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九日^[2124]

【2124】毛主席对吴法宪、叶群和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书面检讨的批示，中共中央办公厅1972年5月23日印发。

二、叶群检讨

10月12日，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叶群与吴法宪一样，也不得不向毛泽东交出了一份书面检讨，称“我犯了严重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中央和到会同志，……心情是沉重的”。说她上了陈伯达的当，自己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言的“动机是出于对主席和主席思想的热爱，但效果是很不好的”。

10月15日，毛泽东对叶群的检讨作出严厉的、不留情面的批示。叶群在检讨书中说，她“这次犯的严重的是路线性的”。毛在“路线性”三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了一句：“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叶群在检讨书中谈到她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反映情况的电话，而她没有注意核实情况时，毛在旁边写道：“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叶群在讲到林彪要写信给毛，她出来劝阻，结果帮了倒忙时，引了毛过去讲过的话“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毛在这句话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了这样一段话：“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倾向。‘九大’胜利了，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呢？”

在叶群的检讨书末尾，毛写道：“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不给叶群面子，不就是不给她丈夫林彪面子吗？！毛泽东给高级干部的检讨写下如此详细如此严厉的批语，从1959年那一次庐山会议批“彭黄张周”后从未有过！林彪、叶群表面上服从，惟对毛泽东的怨恨，必然悄悄在内心滋长。

叶群的检讨及毛泽东的批语全文如下：

主席在信封批：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阅后退中办存。

在书面检讨上批：此件已阅。

毛泽东

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五日

思想上政治上的
路线正确与否是决
定一切的。

爱吹不爱批，爱
听小道消息，经不
起风浪。

这是马克思的
话，我不过复述一
遍而已。

主席：

二中全会期间，我犯了严重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中央和到会同志。自己虽然在大组会上作了初步检查但心情是沉重的，最近听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东兴同志检查报告的亲切批示，特别是国庆节在天安门上见到了主席，主席耐心而亲切地倾听了我的检查，并谆谆教导，我内心感到非常温暖受到极大的启发和教育，文化大革命以来主席让我参加各种会议，从多方面培养我，我辜负了主席的培养和教导，这次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是路线性的，深感对不起主席，对不起中央和到会同志，心里非常难受，我决心从这次错误中吸取深刻教训一生牢记，坚决改正。

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是一部伟大的纲领性的文献，我完全拥护，这个文献言简意赅，含意非常深刻丰富，字字闪烁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学习以后对自己教育很深，使我从错误中猛醒，猛醒。我这次犯的错误，主要是这样几个问题：

(一) 没有注意核实情况。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的电话，他们当时是出于热爱主席向林彪同志反映。但我没有提醒他们去同有关同志谈心，交换意见，核实情况。

主席讲过：“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我情况未经核实，就把电话记录念给林彪同志听，这是不符合主席教导的，认识不符合实际，事情就不能得到好的处理。

(二) 建议林彪同志不写信是错误的。林彪同志对主席和主席思想非常热爱，听了电话内容后很生气，说要放炮，要给主席写信。当时我对林彪同志说，主席正在南方，天气暑热，这些问题不是直接听到的，详情又不太清楚，保护主席健康至关重要，还是不去干扰主席为好。而且北京来电话的同志

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倾向。九大胜利了，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呢？

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

们说，已报告东兴同志处，为了保护主席健康，他们也让东兴同志在适当时候再报告主席，他们都这样保护主席，我们更应当注意了，因此我建议林彪同志多看看，不要写信，那时林彪同志也答应了。我建议不写信，虽然是出于对主席的朴素热爱，但效果适得其反，反而干扰了主席。另外对林彪同志在身体不好的情况下容易急躁这一点，我也是估计不足的。

现在看来，建议不写信是错误的。主席讲过：“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掩盖矛盾是不符合辩证法的。由于自己没有提到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来认识这个问题，总以浮浅之见劝林彪同志不生气，和稀泥，力求息事宁人，结果帮了倒忙。如果他当时及时给主席写了信，使主席有充分的考虑时间，并找有关同志谈清楚这个问题，可能不会给主席和中央带来这样大的干扰。

（三）八月二十四日晚在中南组会上发了言。虽然当时讲了宪法中明确写上主席领袖作用的重要性，和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的重要性，但也讲了天才问题。本来不准备发言，后来听其他同志发了言，又听说会议快要转到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自己也憋不住了，也讲了这个问题。由于情况没有核实清楚，误以为主席思想的贯彻受到阻碍，发言时激动。过去军队学毛著受到资产阶级司令部很大迫害和阻挠，因而听到这方面的情况就容易敏感和激动。

虽然自己的动机是出于对主席和主席思想的热爱，但效果是很不好的。主席讲过“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自己由于没有弄清情况，情绪又易激动，发言时很不冷静，对会议产生了不好的影响。

在那天到会时，刚好接到办事组同志寄给我的一份论天才的语录，当时以为是办事组同志和他们

直接地利用材料，所以不必加以分析材料是一种。无论谁搞的都一样，难道别人搞的就不算上当吗？

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

带来的工作人员搞的，自己是办事组成员，所以他们寄给我一份。在发言时为了省事，部分地引用了几句（因发现语录引得不全，未全用。根据自己回忆又讲了几句列宁等的教导）当时不知道这个材料是陈伯达搞的，讲完回家后才从办事组同志的电话中知道是陈伯达连夜搞的。自己虽然没有参与搞那个语录（当时我正在和总参的两位干部完成总理交办的研究办事组起草的战备报告的任务）但由于自己嗅觉不灵，不加分析地部分引用了它，这就间接地被坏人陈伯达利用了，上了他这个反革命假理论家的当。

（四）由于缺乏高级政治生活经验，会上插话有时不够政治化。例如一次政治局的会上，提醒林彪同志还有两页提纲遗漏，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今后在会议生活中、家庭中都要十分谨慎，要时刻注意政治化，坚决改正嘴快话多的缺点，要注意简炼、谨慎、冷静，时刻严格要求自己。

关于对陈伯达问题的认识，过去由于主席在会议上打过招呼，江青同志也几次对我们打过招呼，对陈伯达的错误言行是有所察觉的，在一些问题是抵制了的。例如：他建议造五十万吨的大轮船问题，动不动撂挑子、不干工作的问题，三十八军的问题，攻击“九大”报告稿是伯恩斯坦观点等等问题都进行了抵制。在杨成武的问题揭发前两天，他拼命打听、企图套话，我也没有告诉他，当时只报告了总理和江青同志。但由于自己路线觉悟、政治水平低，对陈伯达的反动本质认识不足，警惕不够，因而过去对他的斗争是不够有力的。

这次在庐山同陈伯达来往不多，仅仅在上山第二天看望过他一次，那天是，中午先去看江青同志，然后去看邓大姐，因外出未遇，见到了总理，又去看了曹大姐康老也在，因为我们是从外地来的，同大家好久不见了。后来听电话说陈伯达要来看林彪同

志，当时林彪同志刚吃完晚饭，出汗，不能见客，叫我先去看他，并劝他不要来。这次看他完全是礼貌性的，他说常委才开了会，总理会向政治局传达会议日程，然后就谈怎样写毛笔字的问题。我即告辞。

这次全会在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把陈伯达打着红旗反红旗，造谣诡辩，煽风点火，搞突然袭击，妄图分裂党，破坏党的罪行，揭出来，对我教育很大。陈伯达是个野心家，阴谋家，狡猾狠毒的阶级敌人，他反党的手段非常阴险，毒辣，欺骗和陷害了不少同志。事实证明，他三十年来一贯反党、反主席、反主席思想，他跟刘少奇跟得很紧，实际上他是刘少奇、周扬一伙的坏人。据最近揭发的材料，陈伯达可能是个叛徒、内奸、里通外国分子，这次把他揪出来，是党的伟大胜利，主席思想的伟大胜利。

庐山开会期间对陈伯达的许多问题，我在政治局扩大会上，当面揭发批判了他，在中南组也揭发批判了他，这里再补充几点：

一是八月二十三日林彪同志开完大会后回家，陈伯达坐车未经电话打招呼就跟着林彪同志的车子进院里，又进了会客室来见林彪同志，林彪同志说开了几个小时会太累，请他回去，我们也劝他回去，把他撵走了。现在看来他这次闯来是别有用心，是想趁机搞阴谋的。

二是最近会上听说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和旧中宣部陆定一、周扬、童大林这些人搞在一起，而童大林在六六年一月以前就老早知道严慰冰给我们全家写匿名信的全部内容，而陈伯达的老婆刘叔晏在运动初期就坚决拒绝参加严慰冰专案组的工作，这件事也是很可疑的，我怀疑陈伯达是否和匿名信案件有关。怀疑陈伯达是刘邓及旧中宣部阎王殿反动罪行的同谋者。

不上当是不会转过来的，所以上当是好事。陈伯达是一个十分可疑的人。

这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共产党人不读一点马列怎么行呢？我指的主要是担负高级职务的人。

由于自己毛主席思想没有学好用好，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政治路线觉悟很低，我在这次全会上犯了错误，教训是极为深刻的，是一生难忘的。这次也可说是坏事变好事，给自己打了防疫针，不然将来很可能犯更大的错误。今后我一定要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尤其是主席的哲学著作），并按主席教导认真读几本马、恩、列、斯著作，联系实际，改造世界观，不断提高政治路线觉悟，牢牢掌握大方向，时刻保持冷静的政治头脑。要加强组织纪律性，遇事要注意请示报告，反映情况要注意核实，注意政治，防止偏差。切实做到顾全大局，全力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学会听不同意见，情况不明时不随便发言，遇到问题时注意交换意见，不随便反映。同时要警惕坏人钻空子，防止给坏人当枪使。

主席教导我们：“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我一定要牢记主席的教导，谦虚，谨慎，戒骄，戒燥，努力改造自己、工作，永远坚持主席革命路线，永远紧跟主席革命到底。

以上认识是否恰当请予指示

敬礼

叶群

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二日

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2125]

【2125】毛主席对吴法宪、叶群和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书面检讨的批示，中共中央办公厅1972年5月23日印发。

三、毛再一次明确声称“四个伟大”“讨嫌”

1970年11月6日，经毛泽东、林彪批准，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全文如下：

一、为了党在目前进行的组织宣传工作，实施统一管理，中央决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

二、中央组织宣传组设组长一人，由康生同志担任，设组员若干人，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同志担任。

三、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新华总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中央编译局的工作，以及中央划归该组管辖单位的工作。

四、工、青、妇中央一级机构和它们的五七干校，均划归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

五、中央组织宣传组可设短小精干的联络办公室。

六、中央旧中宣部、政治研究室均取消，归中央办公厅负责管理它们的五七干校和安置工作。

（此件发至省、军级）^{【2126】}

此一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掌握了中央组织、宣传大权的小组，有点儿类似已停止活动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翻版。其由原中央文革小组班底的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加上纪登奎、李德生共六人组成，将林彪一系的人马完全排除在外，为毛明显限制林彪一系权力的措施之一。

12月18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毛在谈话中谈到个人崇拜问题时，自我辩解称：（1966年发动文革时）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 Great Leader, Great Supreme Commander, Great 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斯：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斯：我有时不知道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有三种，

【2126】中发[1970]60号中共中央文件。

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斯：听说进城前夕开的一次中央全会上，曾经通过一项决议，禁止用党的领导人名字命名城市、街道、山村等。）这个现在都没有，没有什么用人名来命名的街道、城市、地方，但是他搞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标语、画像、石膏像。就是这几年搞的，红卫兵一闹、一冲，他不搞不行，你不搞啊？说你反毛，anti-Mao！^{【2127】}

毛再一次在外国人面前明确声称“四个伟大”“讨嫌”！再一次在外国人面前不点名地羞辱了林彪。12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毛会见斯诺的消息，并刊载毛泽东、林彪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的合影照片。197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明示省军级以上地方及军队党委或党的核心小组，将“此件请印发党的基层党支部，口头传达至全体党员”。

第九十二节 华北会议与改组北京军区

一、“批陈整风”的开展

197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将毛泽东批示“照发”的《中共中央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发至地、师级。在同一个文件中，转发了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指示全文如下：

（一）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立即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粉碎了陈伯达的反党阴谋，拨正了全会的航向。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全会揭露了陈伯达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行，揭露了他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这是我们党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二）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在一部分党的高级干部中口头传达过陈伯达反党的问题。为了教育干部，让较多的同志了解这个问题，中央决定将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一文印发给你们，请你们立即向党的地区级核心小组成员、部队师级党委委员和同级党员负责干部以及中央各专案组人员宣读和传达。传达内容主要以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为准。

【2127】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已经主席审阅），1970年12月18日。中发【1971】39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1971年6月1日发出。

(三) 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文献，对于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在这个文件中，毛主席揭露了陈伯达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驳斥了他的谣言和诡辩，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号召全党同志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同陈伯达划清界限，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各单位要组织听传达的同志认真学习和讨论毛主席的这个重要文件，结合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和党中央一九七〇年59号学习通知所规定的著作，自觉地改造世界观，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和识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能力，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四) 各单位应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传达陈伯达反党的问题。

陈伯达历史复杂，是一个可疑分子。中央正在审查他的问题。各单位在传达时，要号召了解他的情况和问题的同志，进行检举和揭发，并请你们将揭发材料妥送中央。

对陈伯达的问题，外间有一些猜测，敌人也在探听消息。传达时请你们注意保密。有关文件不准翻印、抄传，听传达的同志不准记录、不准传播。

各地传达情况和反映，望及时报告中央。^[2128]

此后，全党全军立即开展了批判陈伯达实质上就是批判林彪一系的“批陈整风”运动。

1971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中发[1971]8号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1971年2月25日发出）。材料分为四个部分，基本不符合事实。第一部分为“陈伯达的反动历史”。主要内容有：“家庭出身和入党前的个人历史”，“和国民党军阀张贞的关系”，“被捕叛变”，“失掉党的关系问题”，“托派问题”，“在天津工作时的错误和叛徒、特务、工贼刘少奇为陈翻案的问题”，“写反共文章”，“里通外国嫌疑”。第二部分为“投靠和追随王明、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主要内容有：“追随王明，鼓吹‘国防文学’和‘国防哲学’”，“一贯投靠和追随刘少奇，是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秀才和头面人物”。第三部分为“对抗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党乱军，阴谋篡权”。主要内容有：“大派工作组，又把自己装扮成反工作组的‘英雄’”，“陈伯达是萧华、杨、余、傅、王、关、戚、‘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进行的几次突出的反党阴

【2128】《中共中央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1970年11月16日。中发[1970]62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1971年1月8日发出。

谋活动”，“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的阴谋活动”。第四部分为“投靠王明、刘少奇，招降纳叛，搞独立王国”。

2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批示“照发”的《关于扩大传达反党分子陈伯达问题的通知》（中发[1971]17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1971年2月22日发出）。通知称，“现在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为了把批判和揭露陈伯达的反党罪行作为重点，……中央决定仿照华北地区办法，在全国适当扩大关于陈伯达问题的传达范围。”传达范围，“部队传达到团（县武装部）党委常委，相当于团级的军管会正副主任；地方传达到县和相当于县级的厂矿、企业、学校、机关、党委常委或党的核心小组成员。”

4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批示“同意”的《关于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知》（中发[1971]33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1971年5月1日发出）。通知称，中央决定将陈伯达的罪行，扩大传达范围到党的基层骨干。“传达范围。大中城市的大工矿企业的车间、小厂矿和城区街道的党委书记、副书记，农村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副书记，部队的连长、指导员，机关相应的党委书记、副书记或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副组长。”

二、三十八军检举揭发陈伯达

12月10日，中共陆军第三十八军委员会^[2129]作出《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送军委办事组并报中共中央。报告将对陈伯达“罪行”的揭发材料综合为三个部分：（一）“陈伯达千方百计地突出自己，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陈伯达在各种场合很少提到毛主席，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陈伯达从来不提林副主席。一九六七年秋、冬，他在首都接见保定赴京汇报代表团和到保定‘视察’时，在公开场合共讲话十二次，其中有二百零八处提到他自己，大讲他‘是小小的学生’，‘是小小老百姓’，‘是华北人’，‘河北人’，‘是经过几十年政治风浪的’共产党人，有十七处提到郑维山同志，但却只字不提敬爱的副统帅林副主席。”（二）“陈伯达不择手段地插手军队，搞宗派活动，妄图乱军、夺权。我军于一九六七年初奉命调华北以来，越来越感到，陈伯达的手伸得很长，活动反常、手段恶劣。”“陈伯达在军内拉一

【2129】1970年12月，三十八军党委第一书记王猛（军政委），第二书记刘海清（军长）。当月，王猛升任北京军区副政委，邢泽接任军政委。1971年3月，增补刘海清为军党委第一书记，邢泽为第二书记。

部分，压一部分，制造军队之间的分歧和对立。”“陈伯达用各种阴谋手段，挑拨各部队之间的关系，孤立、打击、陷害三十八军。”“陈伯达还公开造谣陷害，妄图从政治上把三十八军搞臭。”“与此同时，陈伯达勾结杨成武，严密封锁三十八军的情况。”（三）陈伯达在处理保定问题中，大搞分裂，挑动武斗，镇压群众，破坏大联合、三结合。^{【2130】}

三十八军党委的报告，意在借批陈一吐自调防华北后所受的鸟气。报告一如当时众多的揭发批判材料，不乏牵强附会、言过其实之词。惟毛泽东正愁没有攻陈的炮弹，三十八军报告正中下怀，使毛泽东找到了一块“石头”，砸向了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

12月16日，毛泽东对三十八军报告批示称：

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传达，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全军更好团结起来。以上建议，是否可行，请酌定。^{【2131】}

毛泽东的批示，促使北京军区党委召开扩大会议（即华北会议），宣告了北京军区改组，李雪峰、郑维山下台的命运。

三、周恩来关于召开华北会议的请示报告

12月19日，周恩来就拥护毛泽东在对三十八军报告中提出的，要北京军区党委召开扩大会议的建议一事，致函毛泽东、林彪称：

主席、林副主席：

昨（十八日）晚政治局会议传达和讨论主席对三十八军报告的批示和林副主席批示。华北到会的同志有：郑维山、李雪峰、陈先瑞、解学恭、萧文玖、吴先恩、张南生、郑三生、尤太忠九人，北京卫戍区有吴德、吴忠、杨

【2130】《中国共产党陆军第三十八军委员会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1970年12月10日。中发〔1970〕76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1970年12月22日发出。

【2131】中发〔1970〕76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1970年12月22日发出。

俊生三同志^[2132]。会上，先发了中央印发的讨论文件（[1970]134号），读后，大家一致拥护主席要北京军区党委召开扩大会的建议，集中讨论北京军区和华北地区对陈伯达问题的认识和揭发，人要多一些（每个师二至三人，军四人，省军区、北京卫戍区、天津警备区党委常委，军分区二至三人，同级军、兵种和代管部队、机构亦来相应人数，预计要有四百多人），时间要长一些。在昨晚讨论中，解学恭、吴德、吴忠、杨俊生等同志都强调主席批示中“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的两点。政治局同志也指出：为何连林副主席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为何北京军区两次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一次传达九届二中全会的通知，一次传达中央62号指示）都是分片传达，为何河北省的两次传达也是那样草率，一次了事，然后由各军、各地零星揭发，而不能集中讨论，追究原因。经过大家发言，对郑维山、李雪峰两同志有了触动，郑说过去上当犯错，现在有信心痛改；李说过去在思想上有共同性。

为开好这个会，打通思想，更好团结，政治局同意吴先恩同志提议，在人到齐、开大会之前，先以三天时间（十九、二十、二十一日）开北京军区党委常委会（北京三人参加，约十五人），初步统一认识，利于接受大家批判；同时，由永胜、作鹏两同志也找三十八军开会同志谈谈，指出他们的报告是好的，起了推动作用，在会中也要从揭发批判达到团结。

以上处理，妥否，请主席批示。

周恩来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九日^[2133]

同日，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报告批示称：

照办。

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建议李德生、纪登奎二同志参加会议。

【2132】郑维山，时任北京军区党委书记、军区司令员。李雪峰，时任北京军区党委书记，军区政委。陈先瑞，时任北京军区党委书记，军区政委。解学恭，时任北京军区政委，天津市革委会主任。萧文玖，时任北京军区党委常委，军区副司令员。吴先恩，时任北京军区党委常委，军区副司令员。张南生，时任北京军区党委常委，军区副政委。郑三生，时任北京军区党委常委，军区副司令员。尤太忠，时任北京军区党委常委，军区副司令员。吴德，时任北京卫戍区第二政委，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忠，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杨俊生，时任北京卫戍区政委。

【2133】周恩来同志给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请示报告，1970年12月19日。中发[1970]77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1970年12月22日发出。

永胜、作鹏应同德生、登奎一道参加华北会议。

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2134】}

毛泽东指定李德生、纪登奎二人参加华北会议，又称“永胜、作鹏应同李德生、登奎一道参加华北会议”，从而使原来地位高于李德生、纪登奎的黄永胜、李作鹏，处于前者的从属位置，明确表达了毛对李德生、纪登奎的信任程度已超越了黄永胜、李作鹏。

从周恩来的报告和毛泽东的批示更可看出，华北会议是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及李德生、纪登奎一手操办的，没有林彪及黄吴李邱的什么事。

四、周恩来在华北会议上的讲话

1月24日，周恩来代表中央在华北会议上讲话。周首先谈了陈伯达的问题，又详尽列举了李雪峰、郑维山的错误，并宣布了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军区及河北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等的决定。

经毛泽东批示“同意”的周恩来讲话提纲如下：

一、会议情况

这次华北会议是遵照毛主席、林副主席两次极为重要的批示，从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开始召开的。参加会议的共四百四十九位同志。遵照毛主席指示，一月九日起，中央军委座谈会的一百四十三位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学习了毛主席、林副主席最近批示的七个重要文件，听了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发言，进一步揭发批判了反党分子陈伯达的叛变罪行，揭发批判了李雪峰、郑维山等同志的严重错误。

二、对会议的估价

(一)会议通过对陈伯达的揭发批判，更加认清了他的反党罪行，进一步同他划清了界限。

根据现在揭发和调查的可靠材料，证明：

1、陈伯达的反动历史。

陈伯达出身于所谓“四代书香”门第的破落封建官僚家庭。他先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充当过国民党军阀张贞的少校秘书，后钻入共产党，留学苏

【2134】中发[1970]77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1970年12月22日发出。

联，有托派重大嫌疑。他回国不久，即被捕叛变，后为刘少奇恢复他党的关系，一直埋藏在党内三十四年。

陈伯达追随王明、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他回国叛变后，宣传叛徒哲学，鼓吹“国防文学”和国防哲学”，为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大造舆论。他反对毛主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理论和实践。

他同刘少奇一道，在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实现后，提出了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谬论。

……

他第一次庐山会议参与了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第二次庐山会议私自下山，不知干什么去了。

他积极帮助刘少奇整理和修改黑修养，在《红旗》重新发表。他竭力吹捧“桃园经验”，并提出要刘少奇管四清和农业，帮助刘少奇篡夺权力。

陈伯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党乱军，阴谋篡权。

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大派工作组，忠实执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他在中央文革名为组长，实则反对中央文革，背着中央文革搞坏事。他打着红旗反红旗，中央文革碰头会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各种措施，他常常或明或暗地进行破坏和反对。他是萧华、杨、余、傅、王、关、戚、“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是反党乱军的罪魁祸首。他是支一派，压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支持武斗的指挥者。

他一贯反对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在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上同毛主席唱反调。……他借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疯狂反对毛泽东思想，而对毛主席和中央肯定的“九大”政治报告草稿又诬蔑为伯恩斯坦主义的文件。

他在编辑毛选《五卷试选》期间，对毛主席的文章肆意篡改。后来，又对康生同志奉林副主席（毛选编委主任）之命主编《毛选五卷》送审本进行怠工破坏，并组织了一个地下黑班子，私自整理毛主席的著作，与毛选编委会相对抗。

他背着中央搞了一个秘密班子，专门研究中央政治局历次的宪法修改稿，伺机向党进攻。他反对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最后，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搞突然袭击，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

陈伯达投靠王明、刘少奇，招降纳叛，搞独立王国。

他在组织上初期投靠过王明，后来长时期投靠刘少奇。……他对彭德怀、高岗、彭真、罗瑞卿、陆定一、陶铸、胡乔木、周扬、杨献珍等反党分子都很亲。他包庇大批坏人，招降纳叛。

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成了北京军区和华北地区的太上皇。他把自己领导的部门搞成独立王国，任何中央同志都不容过问。

会议通过对李雪峰、郑维山等同志的揭发批判，对于毛主席提出的“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为何林副主席“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为何北京军区和河北省两次传达都是那样不集中开会，草率了事等问题，有了深刻的认识，从思想上初步肃清陈伯达的流毒。

会议开展了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开得很严肃，大家对李雪峰、郑维山等同志的揭发批判，基本上坚持摆事实，讲道理，既很尖锐，也很中肯。

会议贯彻“批陈整风”的精神，使大家受到了一次生动、深刻的路线教育，提高了觉悟，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更好地团结起来了。我们相信，这次会议将对全党全军起重大作用。

三、李雪峰、郑维山同志的错误和中央的决定

(一) 李雪峰、郑维山同志紧跟反党分子陈伯达，反对党的“九大”路线，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伯达在华北各地乱跑乱说，到处联络人，进行反党的舆论和组织准备。李雪峰、郑维山背着中央，同陈伯达勾结在一起，把他捧为太上皇，扩大他的影响。

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搞突然袭击，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李雪峰积极配合，郑维山表态支持。李雪峰有布置地抢先出简报，大造反党舆论，发出了向党进攻的檄文。李还煽动几位工农同志发言，指名攻击中央领导同志，事后又推卸责任，嫁祸于人。陈伯达被揭发后，李还背着中央，为陈伯达打掩护。

九届二中全会后，李雪峰、郑维山违背中央指示，对陈伯达的反党问题不认真开会传达，不讨论，不揭发，不批判，仍然站在陈伯达一边。毛主席路过石家庄当面对李雪峰作了重要指示，李还是执迷不悟，存心抗拒，既不揭发陈伯达，也不交代自己的错误，更未向党的核心小组传达。

李雪峰、郑维山紧跟陈伯达在庐山搞反党活动，决不是偶然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就追随刘少奇、陈伯达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天津支持坏人（江枫、胡昭衡、王亢之、方纪、李树夫等）夺权，在保定地区先取缔“八一红卫兵”，捉了几百人，后撕毁大联合协议，支一军压一军，支一派压一派，搞明抢暗发枪支，使武斗升级，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严重损失，干扰和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二）李雪峰、郑维山一贯地闹宗派、拉山头，搞独立王国，在组织上犯了严重错误。

李雪峰、郑维山追随陈伯达、杨成武，打击和陷害三十八军。李雪峰对中央不满，在刘少奇倒后，只听陈伯达的话，他在河北省把革委会的权力集中在他一个人手里，排斥对自己有意见的人，甚至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同志。在杨成武被揭发批判之后，郑维山坚持错误，继续搞山头主义，排挤外来部队，任人唯亲。他还在北京军区大搞以他为首的反动的多中心论，以是否拥护他为标准划线、排队。他们都打击反对过自己的人，破坏了军队之间、军政之间、军民之间和上下之间的团结。

（三）李雪峰和郑维山，一个是家长制的“一言堂”，一个是军阀主义，作风严重不正，这是封建资产阶级思想的集中表现。

李雪峰把个人凌驾于党委之上，做官当老爷，唯我独尊，一个人说了算，动辄骂人训人。

郑维山飞扬跋扈，称王称霸，竟然下令开枪镇压群众，伸手向中央要开枪权、扫荡权。他对同级以家长自居，对下级蛮横霸道。

他们经常说假话，欺上瞒下。他们同陈伯达、杨成武串通一气，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编造假情况，诬告三十八军在保定支持保守组织。李雪峰、郑维山追随陈伯达点名摧垮保定的一派群众组织，却又向中央说“促进了两派的革命大联合”。

（四）李雪峰、郑维山的错误是有历史性的。

郑维山过去紧跟杨成武搞山头主义、独立王国，这次又紧跟反党分子陈伯达，站在错误路线一边。李雪峰过去紧跟刘、邓，同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坏人混在一起，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他紧跟刘、邓、陶。主席挽救了他。他不但不改，这次又跟着陈伯达跑了。他和陈伯达在思想上有共同性，有个人野心。李雪峰还在庐山会议上搞了准备翻案、算账的材料，这次会议上又派人回去销赃灭证，在背后捣鬼。他对有

的同志的揭发批判很反感，甚至反咬一口。这种态度如不转变过来，那是很危险的。

(五) 根据会议中李雪峰、郑维山的检查和大家的揭发批判以及表现出来的情绪，中央认为李、郑两同志继续留在北京军区和河北省担任原来的领导工作是有困难的，因此，中央决定：将李、郑两同志调离原职，继续进行检查学习，接受群众教育，待有成效后，再由中央另行分配工作。

我们希望李雪峰、郑维山同志与陈伯达彻底决裂，划清界限，向党交心，改正错误，真正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六) 中央决定：李德生同志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同志任第一政委，纪登奎同志任第二政委；谢富治同志任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德生同志任第二书记，纪登奎同志任第三书记。刘子厚同志任河北省革委会主任，郑三生同志任第一副主任兼河北省军区第一政委，曾美同志任第二政委；刘子厚同志任河北省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郑三生同志任第一副组长。尤太忠同志任内蒙前指司令员。

四、今后意见

这次华北会议结束后，在北京军区师以上的党委，在华北各省、市、地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要按照中央既定的部署，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一步开展“批陈整风”，彻底肃清陈伯达的流毒，纠正李雪峰、郑维山同志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的影响。……【2135】

周恩来在讲话中称，“中央决定：将李、郑两同志调离原职，继续进行检查学习，接受群众教育，待有成效后，再由中央另行分配工作。”李雪峰随即被免除北京军区党委书记、第一政委，河北省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河北省军区第一政委职务。郑维山随即被免除北京军区党委书记、北京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内蒙前指司令员职务。所谓“待有成效后，再由中央另行分配工作”，在毛泽东时代不过是一句空话。1971年9月后，李雪峰被秘密押送至安徽，隔离审查。1973年7月被定为“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永远开除党籍”。直至1979年方结束隔离，被批准回京治病，1982年获平反后未担任过重要职务。郑维山亦被下放到安徽一个农场管制劳动，被幽禁达八年之久。文革结束后于1979年方获平反，后任兰州军区司令员。

【2135】周恩来：在华北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71年1月24日。中发[1971]6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1971年1月16日发出。

第十一章

1971：回穴冲陵

第九十三节 军委办事组检讨

一、毛泽东对林彪一系不断敲打施压

在基本解决了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的问题之后，毛泽东立即将矛头转而集中对准了林彪一系尤其是军委办事组黄、吴、叶、李、邱诸人。

1971年1月8日，毛泽东阅批济南军区政治部1月5日报军委办事组和总政治部的《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称，“林、周、康三同志：此件很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请你们看一下，是否可以转发全军。如同意，请总理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宣读、讨论、通过，并加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军委总政治部的几句指示，即可发出。除军外，中央机关和地方党、政机关也要发出。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1月11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央、军委、总政发出《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一月八日重要批示的通知》。^[2126]

毛泽东提出“军队要谨慎”，又对济南军区政治部的报告批示称“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是又一次借机敲打了林彪。

1月9日至2月15日，军委召开批陈整风座谈会，各大军区、军委各总部和军兵种一百四十三人参加。自1月9日起，出席军委座谈会的全体成员均参加华北会议，华北会议主要议程结束后，座谈会从1月26日起转入原定议程。

2月19日，在中央政治局邀集各地来京参加国家计划会议的各大军区党委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或党的核心小组主要负责人到会的会议上，宣读了毛泽东对会议的指示：“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主持时期那样。”2月23日，中共中央将毛的这一指示转发至各大军区党委常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或党的核心小组，中央机关、中央军委、国务院主要负责人，^[2127]等于向他们公布了毛泽东对军委办事组十分严厉的批评。

2月20日，毛泽东阅军委办事组本日报送的关于学习讨论毛泽东“重点在批陈”指示情况的报告并批示称，“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的，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周、康阅后，退军委。”报告称，“这次军委座谈会，由于我们对‘批陈’的

【2126】中发[1971]3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1971年1月14日发出。

【2127】《中央转发毛主席关于批陈整风的指示》，1971年2月23日。中发[1971]18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1971年2月24日发出。

重要性认识不足，因此，在‘批陈整风’时，对‘批陈’没有作为重点来进行。”毛泽东批注称，“为什么老是认识不足？三十八军的精神面貌与你们大不相同，原因何在？应当研究。”报告称，“我们已将主席关于‘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的重要指示，向正在开会的各总部、各军兵种作了传达，要求他们首先切实抓好‘批陈’，坚决把反党分子陈伯达从政治上、思想上、路线上、理论上批深搞臭，彻底肃清其流毒，提高全军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毛泽东批注：“这些话好。”^{【2128】}

二、军委办事组的检讨报告

面对毛泽东的极严厉批评，2月28日，军委办事组再次向毛、林、周、康作出检讨报告，承认“这次军委座谈会，我们没有抓住‘批陈’这个重点，结果，会议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对全军的政治思想建设是一个重大损失，教训是非常沉痛的。”又承认“我们军委办事组有几个同志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本应在军委座谈会上联系自己的错误，通过‘批陈’进行自我教育，清理思想，但没有这样做，造成被动，一错再错，心情十分沉重。”

检讨报告全文如下：

毛主席、林副主席、恩来、康生同志：

为了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主持时期那样。”极其重要的指示，我们于二月二十二日晚七时，召集各总部、各军兵种、国防科委、军委直属院校和北京卫戍区的主要负责同志共三十六人开了会。

会上，原原本本地传达了毛主席极其重要的指示。永胜、法宪、作鹏、会作、德生、贤权同志都发了言，进行了自我批评。我们深切地感到，毛主席的英明指示和对我们的批评，完全正确，非常及时，是对我们的亲切关怀和深刻教育，是对全军“批陈整风”运动的巨大推动力量，我们完全拥护，坚决贯彻执行。对主席极其重要的指示，驻京各单位当晚立即进行了认真的传达学习，大家一致热烈拥护。各单位的“批陈”，都由主要负责干部亲自领导，现在群众情绪很高，形势很好，运动正深入发展。

【212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369—370。

这次军委座谈会，我们没有抓住“批陈”这个重点，结果，会议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对全军的政治思想建设是一个重大损失，教训是非常沉痛的。

我们军委办事组有几个同志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本应在军委座谈会上联系自己的错误，通过“批陈”进行自我教育，清理思想，但没有这样做，造成被动，一错再错，心情十分沉重。这几个同志在这次传达会上，对自己过去对反党分子陈伯达有迷信，上了他的当，受了骗，引用了他搞的语录等所犯的严重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表示要在“批陈整风”运动中认真检查自己，并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和马、列著作，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认真改造世界观。

二十二日晚，政治局会议讨论印发主席的指示（即中发十八号文件）时，永胜、法宪、作鹏、会作同志又作了沉痛的检查，不仅检查了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的严重错误，还检查了在陈伯达反党事件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会中，江青同志传达了主席的指示，对我们是最亲切的关怀，最大的教育和鼓励。这几个同志即将向主席写出书面检讨。认真清理思想，检查自己的错误。黄永胜同志表示，几个同志所犯严重错误他负有主要责任，诚恳接受主席的批评教育。

我们坚决把主席对我们的批评作为动力，以主席的指示为指针，切实抓好全军的“批陈整风”运动。我们要求各单位认真学习和坚决贯彻执行主席关于“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的重要指示。要求各级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亲自领导“批陈整风”运动，开展革命大批判，要像批判王明、刘少奇那样搞好“批陈”。一定要吸取这次军委座谈会的教训，“批陈”不深不透的单位，要进行“补课”。要深入揭发批判陈伯达的反党反革命罪行，剥掉他的“老革命”、“天才理论家”、文化大革命“有功”、“小小老百姓”等种种画皮，把他在哲学上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经济学上的唯生产力论、社会科学上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等反动思想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肃清他的流毒，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不达目的，决不收兵。

特此报告，妥否，请批示。

军委办事组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八日^{【2129】}

【2129】《军委办事组关于传达毛主席批示的报告》，1971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1971年4月15日印发。

3月1日，毛泽东阅批军委办事组2月28日报告称，“已阅，很好。有了主动，力求贯彻。”此一批示，对黄、吴、叶、李、邱的批评口气表面上似有所缓和。

三、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检讨

3月21日，黄永胜就其本人在九届二中全会问题上所犯方向、路线错误向毛泽东作出检讨，全文如下：

毛主席：

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光辉文献和最近期间一系列的重要批示，以及对军委座谈会、对军委办事组两个同志检讨的批示、对我的两次当面批评和林副主席对我的批评，对我震动极大，是极其深刻的教育，是我有生以来，得到主席最直接的教育。主席从政治上关心我，亲切地教导我，使我终生难忘。我一定把主席的教导作为座右铭，很好学习，认真检查和改正自己的错误，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二中全会上，军委办事组有几个同志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虽然二中全会前阶段我没有参加，但我有严重错误。

一、过去我对反党分子陈伯达这个人有迷信，被他所谓“天才理论家”、文化大革命“有功”、“小小老百姓”等假象所迷惑。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不认识他，也没有来往。我来北京工作后，参加当时碰头会和后来政治局会议，虽然对他的印象并不那么好，但思想上有个错觉，总觉得他好象“有理论”、“能写文章”，又是文革组长，因而被他迷惑。对他装的一副可怜像有某些同情。在对某些工作的看法上，跟他有相同的地方。“九大”前期，关于陈伯达这个人，主席曾打过招呼，我只认为他在政治上犯有错误，而没有警惕他是反主席的。没有识别出陈伯达这个假马克思主义者。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出来后，我才恍然大悟，才对陈伯达的反革命面目有所认识。原来他根本不是什么“理论家”，而是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骗子手。他根本不是跟毛主席的，而是反对毛主席的。根据现已揭发的材料证明，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所以他反党乱军，挑动武斗，挑动军委办事组干部及华北、军区干部，都是由此而来。他打着“红旗”反红旗，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主席的革命路线。到九届二中全会，他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造谣惑众等恶劣手法，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主席洞察一切，立即粉碎了陈伯达的反党阴谋，揭露了他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

家、阴谋家的真面目。全会在主席的领导下，把反党分子陈伯达揪了出来。这是我们党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我非常悔恨、责备自己过去没有能认出反党分子陈伯达，把坏人当成好人，受了骗，上了当。这不仅说明我政治上缺乏敏锐性，也说明我在紧跟主席，按主席教导办事上，还有很大问题。我脑子不清，眼睛不明，不辨真伪，盲目迷信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这非常错误，非常危险。如果不是主席察觉了陈伯达，把他揪了出来，就可能给党造成更大危害，我个人也可能犯更大的错误。现在，事后检查，不寒而慄。我越想越感到主席对我的教育和批评，非常亲切温暖，意义非常重大。同时，对陈伯达这个坏蛋，欺骗、毒害人，进行反主席、反党活动的罪恶行径，无比愤慨。我一定站在党的立场上，彻底清算他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滔天罪行。清算自己的错误。

二、对军委办事组几个同志在二中全会上犯的方向、路线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第一、我作为组长，缺乏高度的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因而传播了某些不真实的情况，起了不好的作用。

去年八月十三日下午，吴法宪同志在怀仁堂给我打电话说，在宪法小组会上有争论。大意是，有人不同意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说什么“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讽刺”。我听后，很不冷静，未把情况弄清楚，就信以为真，便急急忙忙向周总理、叶群同志报告了这种情况，后来，又向汪东兴同志报告了这种情况。其实，宪法小组会上怎么争论的，因我不在场，我并不清楚。我理应叫吴法宪同志把情况弄清楚，但我没有调查研究，就向上报告。这样做的本身就犯了极严重的错误。更严重的是，八月十三日下午，我接过吴法宪同志的电话以后，回到办公地点，即向当时在一起办公的邱会作同志说。大意是，刚才法宪同志来电话说，宪法小组会上有分歧，有人反对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及什么“讽刺”等两句话（当时，德生同志去安徽，作鹏同志外出，法宪同志在开宪法小组会议）。李作鹏同志八月十八日回来后，我又把这一情况告诉了他。这就起到了推波逐浪的作用。对党的高级领导成员中，这样重大的问题，我没有以严肃的态度认真弄清，就急忙向上反映，向同志传播，这是很错误的。

在二中全会上，办事组几个同志被反党分子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所迷惑，上当受骗，发言“放炮”，犯了错误。我当时虽未上山，对他们的发言，

除吴法宪同志的发言在庐山看到中央印发的之外，其他几个同志的发言内容，至今我都不知道。但从思想上检查，我与他们的思想有共同性。对上述那些不真实的情况，我听了，信了，报了，传了，这对他们这次犯错误，有着直接的影响。

第二、我在平时，没有督促大家很好读马、列的书，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改造世界观，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更没有组织大家很好学习主席发出的“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提高大家的路线斗争觉悟。在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上，我既没有尽到宣传、教育的责任，又没有把好关，也没带好头。我在传播上述不真实情况的时候，就没有从贯彻执行“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上去考虑和处理问题，而是忘记了主席的教导，忘记了林副主席在“九大”政治报告中强调团结的精神，忘记了党章的规定，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我的这个错误，影响了军委办事组几个同志这次也犯了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

第三、五月十七日下午，政治局七、八个同志在一起谈了一些问题，涉及的人和问题比较多。当时，我们感到问题较大，所以法宪、作鹏、会作同志和我曾两次在一块商量，一致意见要向主席报告。当天晚上，我和法宪同志便到主席那里去汇报。结果，干扰了主席，问题也没有说清楚。两次四个同志在一起商量，而德生同志没有参加，这实际上是一种宗派主义的情绪。^{【2130】}

办事组有的同志对张春桥同志有些意见，我是知道的。对这个问题，我没有能按“九大”路线很好作团结工作，相反自己也有不满情绪。我这种态度，也影响他们，起了不好的作用。这个问题，总理曾经给我打过招呼说，要注意团结春桥同志，但我没有听进去。这是很错误的。

三、这次军委座谈会，我没有领导好。重点没有批陈。我本应结合办事组几个同志受过反党分子陈伯达的骗，上过他的当，犯有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和自己的错误，进行自我批评，肃清陈伯达的流毒，清理自己和同志们的思想，以教育自己，教育办事组几个同志，教育全军到会的高级干部，提高

【2130】1970年5月17日，江青召集黄、吴、李、邱及谢富治、李德生、姚文元到其钓鱼台住处，言谈中主要是攻击周恩来。黄永胜等四人请示林彪后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说了三句话：“一个政治局委员找部分政治局委员谈一些问题是可以的。”“你们知道江青也是一霸。”“你们今天同我说的这些问题，不要叫江青知道，我也不跟她说，她要是知道了，你们就不好混了。”邱会作认为，毛对江青攻击周恩来不以为然。此事经过，见《邱会作回忆录》下，页682-683。

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改造世界观，但没有这样做。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对全军的政治思想建设是一个极大的损失。这个错误，我应负主要责任。

四、我当军委办事组组长和总参谋长没有当好，是失职的。首先是没有领导好大家学习毛泽东思想，提高大家的政治思想水平和路线斗争觉悟。我在抓办事组自身的思想革命化方面作得很差。我自己的世界观改造得不好，更没有帮助大家很好改造世界观。在办事组的政治生活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很不够。

我在工作中，对毛主席、林副主席许多重要指示，认真学习很差，贯彻落实得不好。终日陷于事务，抓大问题少。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也很差。工作缺乏预见，形成被动应付。有关部队建设的重大问题，没有向毛主席、林副主席提出过什么建议，没有当好参谋。正如主席批评的那样，是不参不谋。

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把我放在这样重要的岗位，我理应加强学习，提高觉悟，作好工作，特别是搞好政治局内部的团结，紧跟主席的指示，认真执行主席的革命路线，完成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所交给我的各项任务。但我都没有做好，有负主席、林副主席对我的希望。

五、“九大”以后，我没有很好接受主席关于“不要心血来潮，忘乎所以”的教导。没有用主席这一教导，时时警惕自己，严格要求自己，虚心谨慎地工作。而是觉得自己还可以，又参加了政治局，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因而思想上就放松了自己，不谦虚，不谨慎，看问题存在主观、片面性。正如主席教导的那样：“有许多的东西，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的负担。”这一段时间，我正是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背了“包袱”，所以工作得很不好，犯了错误。

我的错误是极为严重的，教训是深刻的。辜负了主席对我的教育和期望，想起来，非常痛心，内心深受责备。这都是因为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没有认真学习主席的教导，世界观未得到很好改造的缘故。我主观上是想跟毛主席的，是要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但是我学习不够，觉悟低，水平低，看不清问题，结果客观上离开了毛主席的指示，以致同主席的革命路线背道而驰。我一定记取这次沉痛的深刻教训，今后下决心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著作，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不断提高思想和政治路线的觉悟，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永远坚定地紧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保持革命晚节。勉励自己，并且同大家一起坚决贯彻执行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坚决克服宗派主义情绪，努力做好工作。

对于反党分子陈伯达，我一定和军委办事组同志一起，按照中央的部署，在全军深入发动群众，坚决把他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深批臭，剥掉他的画皮，肃清他的流毒，提高全军干部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在当前全军“批陈整风”运动中，坚决执行主席关于“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的极为重要的指示，把这次运动搞好，使全军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更好地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特此检讨报告，请批评指示。

黄永胜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一日晚^[2131]

邱会作于3月21日、李作鹏于3月22日亦就在九届二中全会问题上所犯错误，分别给毛泽东写了检讨报告。

3月22日晚，毛泽东将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关于在九届二中全会所犯错误的书面检讨送周恩来等阅，并让江青转告称，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先商量一下，给黄永胜等人创造一次机会，让他们在一定范围内作检讨，不要再失去机会了。当天晚上，江青告黄、李、邱，称毛泽东对他们的书面检讨比较满意。他们表示希望能得毛泽东的亲笔批示。23日下午，周恩来、康生、江青讨论黄永胜等三人的书面检讨，并提出召开一次批陈整风汇报会议，让黄、吴、叶、李、邱在会上作检讨。周、康、江于23日将上述有关情况书面报告毛泽东，并将黄、李、邱的书面检讨送还毛泽东。24日，毛泽东在黄永胜的书面检讨上批示：“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三同志的检讨都看了，我认为写得都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2132]

3月24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周恩来、康生、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谈批陈整风问题。毛泽东称：我捡了两块石头，一是三十八军的报告，砸了一家伙，这一下与陈伯达划清了界限。这块石头，我砸出去以后，起了一些作用。真理不一定在我们这一边，往往在下边，三十八军做了很好的调查研究，他（指陈伯达）讲了几次话，文件在那里，都清清楚楚。我看了济南军区的报告，又砸了出去，砸了骄傲自满的人。又称：积代会这么多不好，有的青年人去讲假话，不联系实际。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次事情（指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发生的事情）就出在没有调查。毛泽东同意召开一次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提出吴法宪、叶群二人需重写检讨，让周恩来把黄永

【2131】《黄永胜同志的检讨》，1971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1971年4月15日印发。

【213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374。

胜、李作鹏、邱会作的书面检讨及毛泽东的批示送林彪阅，并要求在场的人，除康生外，乘火车去北戴河向林彪作一次汇报，时间在林彪看完黄、李、邱的检讨之后。【2133】

第九十四节 林立果及其“小舰队”

一、“小舰队”的形成

林彪唯一的儿子林立果，1945年冬国共内战时期出生于东北共军总部所在地哈尔滨。1958年至1964年就读于北京市第四中学。1964年高中毕业后升读北京大学物理系。文革期间于1967年3月入伍，直接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兼空军党委办公室）秘书。

林立果自己后来说，“我来到空军以后，空军首长和大家，在工作上、学习上各方面关心我，帮助我，给我提供了最好的工作条件。我和空军有很深厚的感情，和大家有很深厚的感情。”【2134】

两年多的时间，在林立果周围，逐步形成了一个以中青年军官组成的小圈子。其核心人物为：王飞（空司办公室主任，1969年9月升任空军副参谋长，仍兼前职）、周宇驰（1969年10月与林立果同时被任命为空司办公室副主任）、于新野（空司办公室副处长）和刘沛丰（空司办公室处长）。此外，还有李伟信（空军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刘世英（空军党办副主任）、程洪珍（空军党办一处秘书）等人。这个小圈子，被他们自己命名为“舰队”或称“联合舰队”。



“小舰队”的灵魂人物周宇驰。

【213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374—375。

【2134】《林立果同志一九七〇年七月三十一日在空直机关干部会上的讲用报告》。

两年多时间，林立果主要的工作是“调研”。据他自己说，“我搞调查研究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一部分是现实的，就是部队、工厂、学校、农村，还有些科研单位；一部分是历史，翻一些历史资料，研究一些历史上的专题，像日俄战争，第二次大战，苏军进军东北等；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专题研究一些外国资料，例如阿以战争、印尼政变、苏修侵捷等等国际上的一些大事，以及向国外回来的同志作调查，与入越作战和见学回来的同志座谈。大体就是这么几方面。”^[2135]

1969年6月6日，毛泽东对林立果参与起草的空军党委一个关于技术革新的报告作出批示称，“看了以后，很感兴趣。对每一具体技术改革说来，称为技术革新就可以了，不必再说技术革命。技术革命指历史上重大技术改革，例如用蒸汽机代替手工，后来又发明电力，现在又发明原子能之类。”^[2136]毛泽东的批示，在毛林关系尚好阶段，成为抬高林立果身价的重要资本。1969年10月，林立果被任命为相当副师职的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

自1968年始，叶群即四处张罗，在全国范围内为年仅23岁的林立果找对象。“选人”虽然是在小范围内秘密进行，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此事难免弄出不小的动静，为人诟病。最后选中了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张宁，那已是“九一三”的前夜了。

二、林立果的讲用报告

1970年7月31日，林立果在空军直属机关干部会上作了一个讲用报告，主要讲了五个方面的问题：一为“关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二为“中国一定要强盛”；三为“学习毛泽东思想”；四为“空军作战方面的几个具体问题”；五为“关于调查研究和学习主席思想的方法和体会”。关于第三方面的问题，林立果既吹捧了毛，又附带吹捧了其父林彪。林立果称：

林副主席主持军委工作以后，发动了活学活用主席思想的群众运动，到现在十年了。十年来，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不断提高，不断前进。十年里头，我们同刘、邓司令部进行了反复的激烈的斗争。这里也有两条路线：一条路线是坚持发动群众学习毛主席思想；另一条是刘、邓路线，他们干扰、阻挠、破坏、封锁，不让群众学习毛主席思想。这是对主席思想截然相反两种态度，截然相反的两种做法。斗争的结果，还是学习毛主席思想的群众运动占了上风，胜利了。

^[2135]《林立果同志一九七〇年七月三十一日在空直机关干部会上的讲用报告》。

^[213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页49。

但是，回顾过去十年的历史，我们看到一点，就是学习毛主席思想的群众运动几起几落（当然这个“落”也不是完全没有了），有时候高涨一些，有时候由于刘邓或彭罗陆杨的破坏、阻挠，受到一些干扰；而学习主席思想运动的几起几落，也就影响了各项工作的几起几落。什么时候学习主席思想群众运动开展得好，各项工作也就搞得好，什么时候学习主席思想的运动受到冲击，各项工作也就下落。比如说一九六〇年，林副主席提出要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首先在全军开展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部队冲破了阻力，学习主席思想的群众运动不断发展。这是在调查中听到基层同志的看法。从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四年这一段，学习运动不断上升，各项工作就越来越有生气。由于学习主席思想群众运动的上升，引起了各项工作的上升，四好运动也开始上升，各个单位的四好连队都是比较多的。一九六四年，在大比武的冲击下，学习运动就有些下落，随着各项工作也有下落，四好运动也有下落。一九六五年，林副主席又提出突出政治，部队又走上突出政治的轨道，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又重新上升了，部队的各项工作也开始上升，四好运动也开始上升。逐渐又超过了大比武冲击以前的最高水平。主席提出全国学习解放军。学习解放军，首先的，主要的是学习解放军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这样就在全国把学习主席思想的群众运动发动起来了。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林副主席又提出要把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提高到新的阶段。

用毛主席思想武装解放军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很重要的准备。下面也有这个反映。要是不经过开展学习主席著作这一段，我们部队的政治水平就会差一大截。在文化大革命中，要完成这样复杂艰巨的政治任务，是很难想象的。比如三支两军，主要是支毛泽东思想，而自己就首先要有毛泽东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部队所以能够稳定，能够成为一个长城，也首先是因为有主席思想这个思想长城，才建立起了物质的长城，建立了政权的基础，才能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擎天柱。如果按彭德怀、罗瑞卿那个搞法的话，那我们军队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绝不会有今天这样高的政治地位。我军这所以有今天，不靠别的，最主要的就是靠毛泽东思想。

十年来的历史证明，那一个时期主席思想学得好，那一个时期各项工作就搞得好；那一个部门主席思想学得好，那一个部门的工作就做得好，正像解放军学习主席思想领了先，各项工作就领了先，成了全国学习的榜样。反之，那一个时期主席思想学得差一点，那一个时期的工作就要差一点；那一个部门主

席思想学得稍差一点，那一个部门的工作也就差一点。所以说学习主席思想群众运动的水平是衡量各个时期工作、衡量各个部门工作的标准。

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学习主席思想的大考试、大普及。主席思想学得好的，文化大革命就搞得好；主席思想学得差一点，文化大革命中出问题就多一点。部队里几个过去大比武搞单纯军事观点的所谓“尖子连队”，在文化大革命中思想就乱一点，因为没有主席思想就没有政治方向，就统一不了大家的思想，出问题就多。

现在，广大工农兵群众学习主席思想的自觉性更高了，他们为改造世界观而学而用，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学而用，为支援世界革命而学而用。广大群众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毛泽东思想在群众思想中扎下了根子。从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中，更懂得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好处和不学的坏处。活学活用主席思想的群众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亿万人民不论男女老少都学习毛泽东思想。

群众在学习实践中发展和创造了很多好的学习形式，比如天天读、讲用会，机关的半日制，学习班，学习小组，搞大批判，学习最新指示，从阶级斗争教育起步，在路线斗争教育中提高等等。

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深入到各个领域，各行各业，改变了群众的精神面貌，出现了很多奇迹。

空军××医院用毛主席思想治好精神病，创造了奇迹。最近三年多来治了三百九十名精神病患者，其中六十名没有打一次针，没有吃一次药，恢复了健康。病人高兴地说：“毛泽东思想是打开精神病枷锁的金锁钥。”资产阶级治疗精神病靠三件法宝，吃药、通电、捆绑。例如电休克，用80至120伏的电压在病人的头部通过，使病人全身抽动，皮肤发紫，口吐白沫，昏死过去，然后再用人工呼吸的办法，使他苏醒过来。病人看到这种可怕情景，有的跪倒求饶，有的跳墙逃跑，甚至有的卧轨自杀。××医院的同志们说：“精神病是精神因素引起的，因此要靠毛泽东思想这个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来摧毁。”他们对几百名精神病人发病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大多数精神病人发病的主要原因是心胸狭窄，对一些问题思考过度，以致精神失常。他们除了用少量药物配合外，主要是运用主席思想解开病人的思想疙瘩。

有一个病人，躁狂、暴跳，乱砸玻璃，但是一给她念毛主席语录时，她就停下来了。可是过了一會兒她又犯病。从这里他们发现这种病人的特点是忘得快。后来他们经过调查，发现她原来是工人家庭出身的，追求资产阶级生

活方式，得不到满足，因此得了精神病。于是抓住不发病的点滴时间，同她学习主席著作，让她忆苦思甜，斗私批修，经过三个多月，恢复了健康。病人出院时热泪盈眶地对着主席像说：“资产阶级思想给我套上了无形的精神枷锁，一直折磨我几年，是毛泽东思想冲刷了我灵魂上的污泥浊水，使我这个疯子又获得了解放。”她出院二年多，至今没有再犯病。类似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充分显示了毛泽东思想无比强大的威力。

三、《“571工程”纪要》

林立果作讲用报告不足一个月，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几近与林彪翻脸，毛、林关系跌至冰点。林立果由此对毛大为不满，一改曾经在公开场合吹捧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做法，与“小舰队”核心成员私下加紧商讨对付毛泽东的对策。1971年3月下旬，完成了体现“小舰队”核心成员明确的反毛思想体系及行动纲领的《“571工程”纪要》。目前尚无证据证明林彪、叶群知道及看过该纪要。

据官方称，《“571工程”纪要》是“九一三”后“从林立果在北京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查获”的。官方又称，经李伟信、刘世英、程洪珍等人证实，并经与于新野的其他记录本笔迹核对，证明是于新野手迹。

《“571工程”纪要》与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形成强烈的反差。很难想象，两者的撰写者会是同一伙人。《“571工程”纪要》的批判精神是锐利的，惟其行动的计划，尤其第（七）部分“实施要点”，却又非常粗糙，显得幼稚。换言之，如此粗疏的政变行动计划，成功的机率等于零！但无论如何，林立果及其身边几个人，是导致“九一三事件”得以发生的重要因素。

《“571工程”纪要》全文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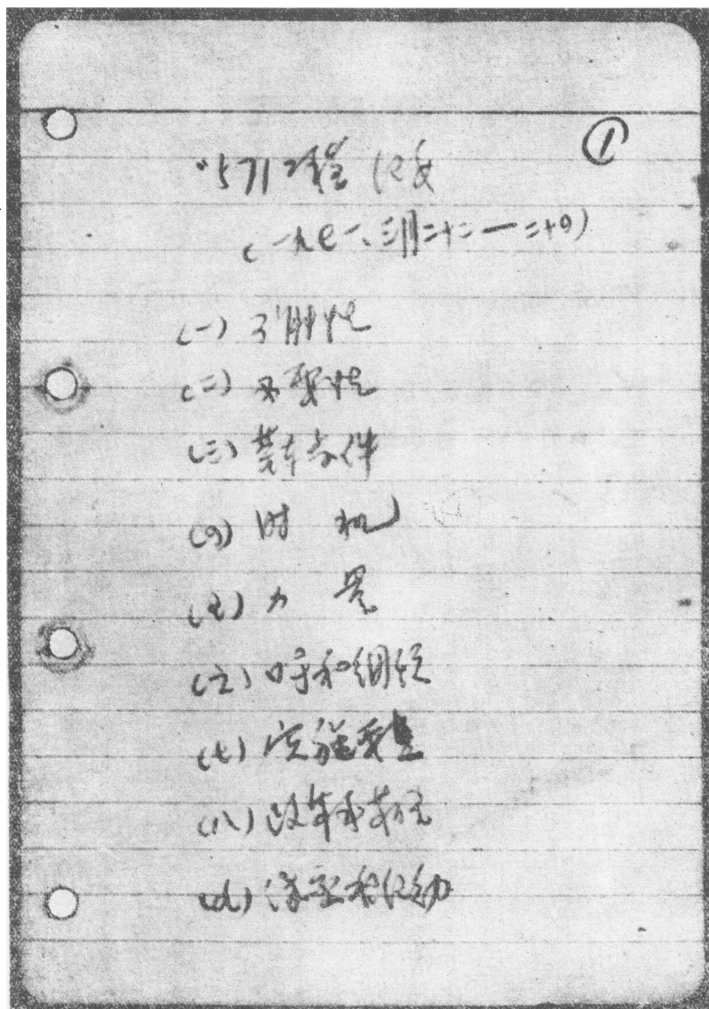
“571工程”纪要^{【2137】}

（一九七一、三月二十二——二十四）

- （一）可能性
- （二）必要性
- （三）基本条件
- （四）时机
- （五）力量

【2137】571为“武装起义”的谐音。《纪要》原件用铅笔编了页码。原件页码编到二十四页，但缺第八页。从原件记载的情况看，应为漏编码。文中划□者，是原件中删去的句、段。明显的错别字，改在〔〕内。

- (六) 口号和纲领
- (七) 实施要点
- (八) 政策和策略
- (九) 保密和纪律



《“571工程”纪要》首页，为于新野手迹。

可 能 性

△ 9·2 后^{【2138】}，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
军队受压

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

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

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

众叛亲离

(1) 一场政治危机正在蕴[酝]酿，

(2) 夺权正在进行。

(3) 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

(4) 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地和平演变式的政变。

(5) 这种政变形式是他们惯用手法

(6) 他们“故计[伎]重演”。

(7) 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

(8) 因此，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反之，如果我们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变，一旦他们得逞，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

(9) 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

我方力量

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

在全国，只有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蓬勃。

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

在中国未来这场政治革命中，我们“舰队”^{【2139】}采取什么态度？

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

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

和国外“五七一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

【2138】指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

【2139】“舰队”、“联合舰队”是林立果小圈子的代号。

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

地理回旋余地大

空军机动能力强。

比较起来，空军搞“五七一”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

两种可能性：

夺取全国政权，

割据局面

必要性、必然性

B-52^[2140]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

对我们不放心。

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

在政治上后发制人，

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

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

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

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

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

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

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

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

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 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

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

他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 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2140】B-52 是美国空军一种亚音速远程战略轰炸机的代号，这里用以指代毛泽东。

基 本 条 件

有利条件：

国内政治矛盾激化

危机四伏

- 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
- 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几乎白热化。
- 军队受压 [军心不] [高级] 中上层干部不服、不满，并且握有兵权
- 一小撮秀才 [仗势] 横行霸道，四面树敌 头脑发胀，对自己估计过高。
- 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 [高级] 干部敢怒不敢言。
- 农民 [生活] 缺吃少穿
-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 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国外矛盾激化

中苏对立。整苏联。我们行动会得到苏联支持。

最重要的条件：我们有首长 [威] 名望、权力和联合舰队的力量

从自然条件上讲

国土辽阔、回旋余地大，加之空军机动性强，有利于突袭、串联、转移，甚至于撤退。

困难

△ 目前我们力量准备还不足

△ 群众对 B-52 的个人迷信很深

△ 由于 B-52 分而治之，军 [队] 内矛盾相当复杂，很难形成被我们掌握的统一的力量

△ B-52 身 [深] 居简出，行动神秘鬼 [诡] 窄 [诈]，戒备森严，给我们行动带来一定困难

时 机

敌我双方骑虎难下

目前表面上的暂时平衡维持不久，矛盾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

是一场你死我活斗争！只要他们上台，我们就要下台，进监狱。卫戍区。或者我们把他吃掉，或者他们把我们吃掉。

战略上两种时机：

一种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

一种是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时候，我们受到严重危险的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

战术上时机和手段

△ B-52 在我手中，敌主力舰^[2141]均在我手心之中。

属于自投罗网式

△ 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

△ 先斩局部爪牙，先和 B-52既成事实，逼迫 B-52 就范，

逼宫形式

△ 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543^[2142]、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

基本力量和可借用量

基本力量：△ 联合舰队和各分舰队（上海、北京、广州）

△ 王、陈、江^[2143]掌握的四、五军骨干力量

△ 九师、十八师

△ 二十一坦克团

△ 民航

△ 三十四师

借用量：国内

△ 二十军

△ 三十八军

△ 黄军委办事组

△ 国防科委

△ 广州、成都、武汉、江西、济南、福州、新江、西安

△ 社会力量、农民、红卫兵青年学生、机关干部、工人

【2141】指张春桥等人。

【2142】空军地空导弹的代号。

【2143】指王维国、陈励耘、江腾蛟，下同。

国外：

苏联（秘密谈判）

美国（中美谈判）

借苏力量拊[箝]制国内外其他各种力量。

暂时核保护伞。

动员群众口号、纲领

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

全党团结起来！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打倒当代的秦始皇—— B52，

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

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

对外：

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我们对外政策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承认现有的与各国的外交关系，保护使馆人员的安全。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全军指战员团结起，全党团结起来

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

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 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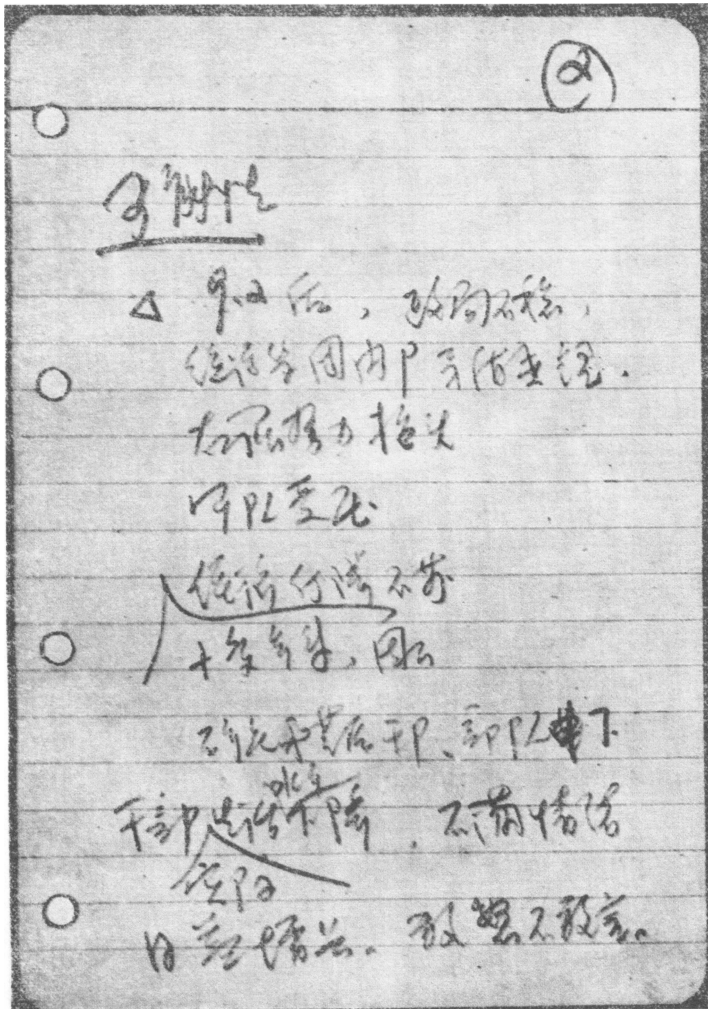
用真正的马列主义作为我们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 B-52 的

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

全国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各行各业要坚守岗位，努力生产，保护国家财富和档案，遵守和维护社会秩序。

因此，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之间，不准串联。

全国武装力量要服从统率部的集中统一指挥，坚决严厉镇压反革命叛乱和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



《“571工程”纪要》第二页

实施要点

三个阶段

第一、准备阶段

(1) 计划

(2) 力量

△ 指挥班子

江、王、陈

△ 两套警卫处

公开的李松亭^{【2144】}

秘密的

上海小组负责。

新华一邨

教导队

△ 四、五军部队训练（地面训练）

△ 南空直属师工作

（十师）

周建平负责

争取二十军

（江、王、陈）

——扩大舰队

——加速根据地建设

京、
沪、
杭、
蜀、
穗

(3) 物质准备

武器

领

自造

通讯器材（包括 01 工程^{【2145】}）

车辆

掌握他们仓库地点、主要军械库

(4) 情报保障

掌握三个环节

搜集

【2144】李松亭，时任中共上海市委警卫处处长。

【2145】指林立果小圈子设计制造的一种收发报机。

分析

上报

第二阶段

. 实施阶段

奇袭式

一个先联后斩 上面串联好，然后奇袭。

一个先斩后联。

一个上下同时进行。

一定要把张^[2146]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

总的两条：

一是奇袭

二是一旦**进行**开始、坚持到底。

第三阶段

巩固阵地，扩大战果 **夺取全部政权**

(1) 军事上 **首先** 固守 **阵地**

△ 尽力坚守上海

· 占领电台、电信局，交通

把上海与外界联系卡断。

△ 力争南京方面中立，但做好防御

△ 固守浙江、江西

△ 掌握空降、空运

(2) 政治上 **采取** 进攻

△ 上面摊牌

△ 掌握舆论工具

开展政治攻势

(3) 组织上扩大

△ 迅速扩军

△ 四方串联

【2146】指张春桥。

政 策 和 策 略

打着 B-52 旗号打击 B-52 力量

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

缓和群众的舆论

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解放大多数

集中打击 B-52 及其一小撮独裁者

打着 B-52 旗号来打击 B-52 力量

我们的政策：

解放一大片（大多数）

保护（团结）一大片

打击一小撮独裁者及其身边的

他们所谓打击一小撮保护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派批，各个击破。

他们一批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他们这样做，不他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

他们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巩固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的目的。

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今天拉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

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

今天甜言蜜语[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

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不被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

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压[押]的关压[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身儿子也被他逼疯。

他是一个怀疑狂、疟[虐]待狂，他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 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

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像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过去，对 B-52 宣传，有的是出于历史需要；有的出于顾全民族统一、团结大局；有的出于抵御外 [来侵] 敌；有的出于他的法西斯的压力之下；对广大群众来说，主要是有的是不了解他的内情。

对于这些同志，我们都给于 [予] 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予以谅解和保护。对过去 B-52 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于 [予] 政治上的解放。

保 密、纪 律

此工程属特级绝密，不经批准不 [得] 准向任何人透露。

坚决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发扬“江田岛”精神^[2147]。不成功便成仁

泄密者、失责者、动摇者、背叛者严厉制裁。

第九十五节 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

一、吴法宪、叶群重写检讨

3月30日，毛泽东阅批河北省批陈整风会议综合简报第21期《刘子厚同志在大会上作检查》称：“此件留待军委办事组各同志一阅。上了陈伯达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以来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三月十九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会议上的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在刘子厚检查的最后一页又批注：“这还只是申明。下文如何，要看行动。”^[2148]

3月30日、31日，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纪登奎在北戴河向林彪汇报批陈整风几次会议的情况，毛泽东对批陈问题的多次批示和谈话，以及准备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安排等。同时还介绍了陈伯达的历史情况和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严重问题”。林彪表示：完全拥护毛主席自庐山会议以来的一系列指示、工作部署和今后工作方针、措施，对军委办事组几位同志的检讨很高兴，要法宪、叶群同志重新写一次书面检讨，完全同意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把批陈引向深入。^[2149]

【2147】江田岛是日本海军学校所在地。所谓“江田岛精神”，就是日本武士道精神。

【2148】中发 [1971]34 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 1971 年 5 月 6 日发出。

【2149】《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 376。

4月1日，毛泽东圈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到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的情况报告。同日，听取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汇报北戴河之行情况。^{【2150】}

4月5日，毛泽东阅批周恩来4月4日晚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的通知稿称：“照发（时间暂定七天为好，实际上可能延长）。”通知指出，中央决定从4月15日起召开一个全国性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2151】}

同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决定纪登奎、张才干^{【2152】}为军委办事组成员。经“掺沙子”（毛泽东语）后，此际军委办事组成员共10人，其中林彪系5人（黄、吴、叶、李、邱），非林彪系5人（刘贤权、李德生、谢富治、纪登奎、张才干）。

4月9日，吴法宪、叶群按毛泽东的要求交出重写的检讨。对比起半年前的第一次检讨，吴、叶重写的低声下气的检讨并没有什么新意，只是使毛抓了更多“证据”，再次得到羞辱林彪一系的机会。

叶群的检讨很长，共四大部分，其中第（二）、（三）部分全文如下：

主席：

由于我没有听主席的话，受了陈伯达的骗，上了他的当，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我以非常沉痛的心情，恳切地再次向主席检讨认错，并保证坚决改正错误。

（一）

（略）

（二）

对我所犯错误的交代

一、不调查研究，反映了片面的、不真实的情况。去年八月十三日晚，我在北戴河接到了黄永胜、吴法宪同志先后来电反映，在宪法小组上，有人不同意写“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还说什么“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对这样重大的问题，我既没有核实，更没有回忆起“九大”新党章已被主席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勾掉的经过，就匆忙地作了电话记录，送给林彪同志了。过两天政治局将修改的新宪法草案送到，明明白白地有“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也没有引

【2150】《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377。

【215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377。

【2152】张才干此前为南京军区副司令员，1971年4月任副总参谋长。1955年授衔中将。

起我重新思想这个问题。我这样做，违背了主席一贯提倡的要“调查研究”的教导。本来我自己应该向主持宪法小组会议的康老问一下，或动员黄永胜、吴法宪同志找张春桥同志交谈一下，就可以把问题弄清楚，但是我没有这样做，而是对自己熟悉同志的话一听就信了。这充分表现了我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情绪。在处理这件事上，我忘记了“九大”路线，不照顾团结和全局，给林彪同志带来干扰，以后事情的发展又干扰了主席和全会。这是非常错误的。主席教导我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次事情就出在没有调查上，教训是极其深刻极其严重的。

这几个月，经过学习主席有关著作，我体会到我没有搞调查研究，这不单单是我工作方法上的错误问题，它还反映了我的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我听到反映以后，不作实际调查，只凭想当然办事，这种毫无根据地主观地瞎说一顿，正是主席批评的那种“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的唯心论的特征。主席教导说“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他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我正是这样，所以滑到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上面去了。原来我还不认识自己错误的严重性，以为自己只是转报了一下别人反映的情况，没有把好关，现在认识到这次我出的大乱子并不是偶然的，是由我一贯的唯心论的世界观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所决定的。我的这种思想基础，加上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又忘记了“九大”路线，所以才导致我这次犯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

继续干扰林彪同志。林彪同志对主席和主席思想非常热爱，在他听了电话内容以后，说要给主席写信，而我又从旁劝阻。林彪同志一有事就想到给主席写信，多年来都是这样的。我既然已经把片面的、不真实的情况报告了林彪同志，但又劝阻林彪同志不给主席写信，这件事本身就是矛盾。林彪同志要给伟大领袖毛主席写信，我是不应该乱作建议的。这不论从我的职务上说，或是从主席和党给予我的政治地位上说，都是极不应该，极端错误的，我每想到此事，内心就深受责备。我将引为终身之戒，永不忘记。

八月二十四日下午，我在中南组会上最后一个发言，讲了新宪法写上主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以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同时也讲了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的问题。由于我对“指针”和“讽刺”等那些反映没有核实，把不真实的情况当成了真实的情况，把错误的意见当成了对的，于是就发言表态，而且发言时很激动。在讲到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时，引用了吴法宪同志送来的陈伯达搞的语录。当时一收到这个语录，一看有

革命导师的名字，也不问来源，不看是肆意歪曲原意的，是别有用心的，就相信了。这也说明我马、列的书和毛主席著作没有学好，引用了这样的语录完全是不懂装懂，受骗上当，害己害人。更严重的是在反革命分子野心家陈伯达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造谣惑众的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情况下，我的发言对他起了呼应，支持，“放炮”助威的作用。

(三)

我犯错误的原因

我所以犯错误，虽然是由于上了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的当，受了他的骗，但这是客观原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主观原因是最主要最最根本的，这就是因为我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我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太低；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忘记了“九大”路线；政治警惕性太差；世界观改造得不好，爱吹不爱批，严重的骄傲自满，直至发展到唯我独革的程度；对陈伯达有迷信，还有某些思想共鸣。例如：

在对张春桥同志有不满情绪上有思想共鸣。当我知道军委办事组有的同志对张春桥同志有意见后，不但没有动员他们去谈心，没有按“九大”路线去做团结工作，相反自己也就对他有一些感觉；加上听到“指针”和什么“讽刺”等话以后，就对他产生了不满情绪。

对陈伯达这个“理论家”很尊重。我过去以为他“读书多”、“有学问”，就尊重他，就信他的话，容易相信他的造谣和诡辩，叫他“老夫子”。对他的所谓“学问”也不作阶级分析，没有嗅一嗅他散布的东西尽是极反动的唯心主义的毒素和形形色色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观点。

对他装的一付可怜相有同情。陈伯达经常装一付“可怜相”、“苦相”，好象有什么过不去和委曲，对他这种情况我内心产生过同情。有时在开会休息时，他还假心假意问我们对他有什么意见，我就认为他很谦虚，其实，我只看了他的表面现象，没有认出他阴险凶恶的本质。

支持了他的一些错误，例如，当我听到他讲“自己无权，要求下放”等牢骚话，直至在会上讲的错话，我都没有抵制，不批评，不斗争。对他在工作中“撻挑子”，领导上分配的工作不愿干，有时不到会，有时到会又打瞌睡，或中间拂袖而去等错误行为又觉得他有旧文化人习气，不拘小节而原谅他。对他要造五十万吨轮船，明知不对也不顶回去，就用将电话记录转到海军去的办法应付他。上述我的这些做法和态度等于是支持他。

有些他个人的事情又迁就他。特别是去年夏季他伪称教他小孩读书的女教员盛玉华患盆腔炎，请我给总后打电话把盛介绍到解放军传染病医院去医治，我给总后打了电话。但万万没有想到这个盛玉华就是和陈伯达、陆定一、严慰冰、童大林等一道搞匿名信的家伙。从最近揭发材料看来，陈伯达很可能是这一伙反革命分子的黑后台。陈伯达来找我就是要用匿名信受害者介绍治病的名义，来保住他们一伙反革命和盛玉华，以达到他个人的卑鄙目的。这说明陈伯达用心险恶，手段毒辣，也说明我原则性、警惕性太差，就在这个问题上也上了他的当。

过去我曾认为陈伯达这个人很“老实”，但落实能力很差，作不了多少工作，现在看来他专能作坏事，干起反革命的事来非常凶狠毒辣，非常迅速狡猾。一些同志包括我在内受了他的害，犯了错误，当了炮弹。

幸亏主席及时察觉和及时粉碎了陈伯达分裂党的阴谋，才挽救了我，不然就会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更严重的损失和危害，我也会犯更大更严重的错误，现在回忆起来，真有后怕之感。我越想越觉得沉痛，越觉得危险，越想越对陈伯达这个狡猾狠毒的反革命万分愤慨，越想越悔恨自己没有及早听毛主席的话，以致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内心深受责备，越想越感到主席对我严格要求和耐心等待教育的亲切和伟大。

(四)

从这次错误中吸取的教训和今后努力的方向。

(略)

我的错误非常严重，教训极其深刻沉痛。遵照主席关于“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的教导，我一定认真吸取教训，迅速彻底地改正错误，保持革命晚节，紧跟主席，积极工作，一定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更好地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永远紧跟毛主席革命到底。

敬祝主席万寿无疆。

以上检讨，请主席指示。

叶群

一九七一年四月九日夜^{【2153】}

【2153】《叶群同志的检讨》，1971年4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1971年4月15日印发。

4月11日，毛泽东阅批吴法宪、叶群重写的检讨称：“恩来同志：吴法宪、叶群二同志重写过的自我批评，我已看过，可以了。请连同黄、李、邱三同志的自我批评，向政治局会议报告，作适当处理。”^[2154]惟怎样才算“作适当处理”？毛并没有讲清楚。

二、对军委办事组五人的定性

4月15日，毛泽东阅周恩来本日上午九时报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安排的报告。报告请示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上印发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吴法宪、叶群五人的检讨和毛泽东的批示的问题。关于出席会议的人员，报告说遵照主席指示，增加了军委副主席陈毅、徐向前、聂荣臻三同志。毛泽东批示：“同意。”^[2155]

4月15日—29日，中共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中央和地方及军队的负责人共九十九人参加。15日晚，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周恩来报告会议筹备经过并传达毛泽东的有关指示，黄永胜、吴法宪作了简短的表态性发言。当晚，周恩来将会议情况书面报告毛泽东，毛泽东批示：“同意。”^[2156]

4月18日，毛泽东阅周恩来本日晚报送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情况的报告。报告说：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各小组会议除表态外，多数联系到自己在庐山会议上受骗上当的错误，这些发言只要是属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拟一律登简报，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实现团结。如其中有别有用心，也正好暴露；如属认识错误的，仍应进行教育。妥否，请主席批示。毛泽东批示：“同意。会议时间（原定七天）不够，应延长。”^[2157]

4月19日晚，毛泽东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情况的报告。报告说：反党分子陈伯达罪行第二批初稿，已经多次修改，拟作初稿印送政治局同志审阅。现分呈主席、林副主席各一份，请予亲阅，看是否可以在20日晚先印发会议备用。毛泽东批示：“同意。”报告称：这两天（19、20两日）仍先集中揭发、讨论庐山会议及其前后问题，以加深认识和检讨，并利团结。毛泽东批示：“这样好。如不够，时间延长。”同日，林彪从北戴河回到北京。20日，周恩

【215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378。

【215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378。

【215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378—379。

【215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379。

来将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文件及毛泽东有关批示送林彪阅，并示意林彪到会并讲话。林彪没有出席会议的意思。^{【2158】}

4月24日，毛泽东阅周恩来本日晨七时半报送的关于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情况的报告，批示：“已阅。基本同意。”报告介绍了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九天来的情况。在报告说到要商定批陈整风如何向基层党员传达问题处，毛泽东批注：“暂时似还不必向基层党员传达。”报告说会议希望主席、林副主席能见大家一次，毛泽东批注：“我这几天不出门。”在报告称“如主席还有新的设想，亦请批告，如能约我们一谈，更所盼望”处，毛泽东批注：“可以不要谈了。”^{【2159】}毛的这些批示表明他的决心已下，因此不愿见林彪，不给林当面申辩的机会。

4月28日，毛泽东阅周恩来《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讲话提纲》，批示：“看了一遍，觉得可以。先同六人小组^{【2160】}商酌，再同政治局各同志（包括各大组负责人及犯错误的五同志）商酌，取得同意，或加修改，然后去讲。”^{【2161】}

4月29日，周恩来在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全体大会上，代表中央政治局作总结讲话。周恩来在讲话中为军委办事组黄、吴、叶、李、邱五人定性称，“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的错误，是人民内部问题。”“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的错误，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在组织上是宗派主义错误。”当日，经毛泽东、林彪同意，中共中央印发周恩来的讲话提纲如下：

一、会议的过程和评价

这次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从四月十五日到二十九日，共开了十五天。前七天主要是讨论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位同志的书面检讨，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结合自我教育，并读有关文件。后八天主要是阅读和讨论陈伯达罪行第二批材料，进一步揭发和批判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罪行，交流各地批陈整风的经验。

到会同志一致拥护毛主席、林副主席决定召开这次批陈整风汇报会议，认为这是非常必要、非常适时的。大家完全拥护毛主席对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书面检讨的批示。

【215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379。

【2159】《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380—381。

【2160】指由周恩来、江青、张春桥、黄永胜、姚文元、纪登奎6人组成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总结讲话大纲起草小组。

【216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381。

会议是遵照毛主席关于批陈整风的一系列指示进行的，是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本着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精神进行的。

1、进一步揭发和批判了陈伯达的滔天罪行，进一步认清了陈伯达的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丑恶面目。

2、军委办事组的五位同志，对自己在庐山会议和庐山会议前后所犯的错误，经过同志们的善意批评和帮助，并有个别揭发，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五位同志表示愿意通过实践和学习，改造自己，到会同志表示欢迎。

3、许多同志接受庐山会议的经验教训，作了自我批评，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同志们表示，今后遇事要冷静，多作调查研究，不要心血来潮，忘乎所以，更不要一哄而起，轻率表态。

4、交流了批陈整风的经验。各地方、各单位向中央写了批陈整风报告，推荐了批陈整风文章。其中好的，如周兴同志在昆明军区和云南省批陈整风会议上的传达报告，陈锡联同志在沈阳军区和辽宁省批陈整风会议上的讲话，毛主席有批示的刘子厚同志在河北省批陈整风会议上检查摘要和他给毛主席的信。这是在三十八军党委会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和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之后，进入批陈整风第三阶段时，值得一读的文件。但像这样的还不多，希望各地继续推荐。相信经过这次会议，将推动批陈整风运动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二、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陈伯达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

(略)

三、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所犯的错误的，是方向路线错误

(一) 错误的性质

在庐山会议上，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但是，他们的错误，同反共分子陈伯达问题的性质根本不同。陈伯达是五毒俱全的阶级敌人，他的问题是敌我矛盾。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的错误，是人民内部问题。这两类矛盾，必须严格区别，不能混淆。甚至上了贼船很久，中毒很深，如李雪峰、郑维山等同志，现在也还是人民内部问题，正在继续检查错误。

至于那些不明真相，跟着起哄的同志，是受骗上当的问题，不要都说成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笔帐应当完全记在陈伯达身上。当他们一旦知道受骗上当后，他们参加批陈整风的斗争就更加坚决。

(二) 错误的严重性和犯错误的原因

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的错误，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在组织上是宗派主义错误。

五位同志犯这样严重的错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不听毛主席的话，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有的同志把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不真实情况，向上报告，向下传播，有的同志未经核实，就信了，报了，传了，更严重的是，上了陈伯达的圈套，干扰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和九届二中全会。这些不真实的情况是：

1、关于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是经过斗争或长期斗争才写入宪法修改草案的问题。实际上，提交一九七〇年七月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论的宪法修改草案，并无此句，经各组讨论提出的修改意见中，也没有提这个问题。只在八月十二日才由修改宪法小组的工作同志根据康生同志的指示，综合一些地方和单位的意见，将此句列在序言里。八月十三日由修改宪法小组移至总纲第二条。八月十四日在政治局会议上无任何争论就通过了。

2、关于不设国家主席和毛主席表示不再重新担任国家主席的问题，就更清楚了。从一九七〇年三月八日在政治局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起，直到八月二十二日在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各省都有人参加）通过宪法修改草案传达毛主席指示时止，不到半年，毛主席六次表示不再重新担任国家主席，并且最后一次在政治局常委会中坚决地说，谁要当国家主席，就可加上。

3、关于称“天才”是讽刺的问题。八届十二中全会时，毛主席在新党章草案上两次把三个副词（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圈掉了，因而“九大”的政治报告，也未再提。如果有的同志健忘，本可查明原因。在宪法条文中，也未涉及这一问题，至今宪法修改草案上也无此语。陈伯达拿这一条作借口，提供称“天才”的语录，歪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他篡党夺权制造舆论，挑动群众。毛主席在《我的一点意见》中指出：“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只要一查《实践论》原文，就会发现，陈伯达删掉了最本质的话：“没有这后一个条件（指人们的社会实践），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这正是反对唯心论的先验论的。

4、关于“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康生同志在一九七〇年八月十四日政治局会议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就批评这句话是错误的。他说，毛主席的谦虚，决不是“谦谦君子”，而是实事求是。毛主席自己也说：“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这些无中生有或者是而非的事情，是从具有宗派成见和长期隔阂中产生的。这些同志自以为是在拥护毛主席，实际上把毛主席的指示、林副主席“九大”政治报告和新党章忘记了，因而被陈伯达所利用，就站到反“九大”的陈伯达分裂路线上去了。

错误的政治路线，必然带来错误的组织路线，带来不正之风。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三日修改宪法小组在康生同志主持下，修改工作从下午一直进行到深夜才告完成。会上张春桥同志提出的要接受修改党章经验的意见，是正确的，即使有些争论，也是正常现象。但是遇到陈伯达这样的坏人，就乘机挑动，变为他在庐山会议篡党夺权的借口。

在庐山会议上，陈伯达继续挑动。军委办事组几位同志囿于宗派成见，受其影响，有的还进行宗派活动。陈伯达认为时机已到，采取突然袭击，并选定华北组抢先编出有他发言的简报，四出“煽风点火”，挑动各组一些人起哄，“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但是，无产阶级的天下是乱不了的。毛主席戳穿了陈伯达的阴谋。上了当的绝大多数同志明了了真相，后悔失言，立即掉转矛头，批判陈伯达的罪行。

这里，值得引以为训的是：陈伯达是坏人，是反革命的两面派，他遇到机会就干坏事，欺骗我们的同志，挑拨是非，已无足怪。严重的是军委办事组几位同志，就在毛主席、林副主席身边，既不请示，也不与其他政治局常委商量，那样容易地受陈伯达挑动，其最根本原因还是不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早就说过，陈伯达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在“九大”前后，党中央对陈伯达作过多次斗争。例如，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等，都有过斗争。这种情况，有的同志是知道的，有的同志不知道，但是不作调查，偏偏相信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站到反“九大”的陈伯达分裂路线上去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军队要谨慎”。林副主席也指示：“现在更要特别注意谦虚谨慎”。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违反毛主席在古田会议决议和延安整风时所创造的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党风一定要正。党风不正、党性不

纯的人，就易为陈伯达这样的坏人所挑动所利用。我们的同志一定要记取这个教训。还有，不调查研究事情的真相，一哄而起，也是一种歪风邪气，也应引为教训。

要认真接受庐山会议的教训，对中央委员特别是政治局委员来说，更重要的是要遵照毛主席历来的特别是在庐山的教导，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和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为此，就应认识学习的重要，认真读几本马列的书和毛主席著作，并按照林副主席指示，要带着问题去学。毛主席在对姚文元同志报告的批示中说：“我的意见二百七十四个中央委员，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

（三）对待错误的态度

五位同志的检讨，是好的。各组有几点共同的想法：1、承认了，检讨了，这是好的；2、错误是严重的，自我批评不够深；3、希望今后好好改正，在实践中逐步加深认识，也就是毛主席在三月二十四日批示中所说的：“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的问题。”我们军队有一个好的传统，就是军队同志犯了错误，一旦经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指出，就会坚决迅速地改正。我们相信，这次犯错误的同志，也会这样做，而且已经开始这样做了。

至于同志之间有些不同的意见，甚至有些隔阂，也应采取正确的态度。毛主席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四日在李德生同志的一个报告上批示：“事关大局，出以公心，不应当避嫌。我历来认为，同志之间有隔阂，有问题，应当耐心商量，多做谈心工作，不宜急躁，也不应久拖不决。工作不顺利，有中央帮助，总会解决。”

对同志间的不同意见，有些隔阂，大家都应当遵照毛主席的教导，顾全大局，不计较小事。主席说：“事关大局，出以公心，不应当避嫌。”帮助解决问题的人，不应当避嫌，当事人也不应当避嫌。主席指示的办法有两条，“不宜急躁，也不应久拖不决”。总之，“应当耐心商量，多做谈心工作”。

犯错误的同志，只要真正愿意改正，我们就要采取欢迎帮助的态度。没有犯错误的同志要防止骄傲，也要加强路线学习。大家按照主席批示的精神去做耐心的工作，互相帮助，互相勉励。我们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一点，包括我们政治局的同志在内，都应当这样做。

(四) 今后办法

(略)

经过这次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我们一定会更好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团结，努力学习，把工作做得更好，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2162]

第九十六节 表面平静的四个半月

一、林彪信稿

在周恩来为军委办事组五人定性为“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在组织上是宗派主义错误”之后，5月23日，林彪向秘书口授了给毛泽东的一封长达一千一百多字的信函，全文如下：

主席：

五月二十日，我找了周总理谈了谈有关党的团结和相当于中央局以上的安全问题。我要总理考虑和请示主席。现将我谈话的大意报告主席，请主席考虑并盼主席能找总理一谈，由总理采取落实的办法。我的意见如下：

经过五年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这个大革命是非常必要的和正确的，我们党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现在是要巩固胜利，是要贯彻“九大”的团结路线，保证“九大”以后，特别是批陈整风以后（批陈整风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因为陈伯达是反革命分子，是大坏蛋，他利用庐山会议的机会乘机作乱，因此必须肃清他的影响）党中央和中央局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保持巩固的团结，预防思想糊涂的人和冒险家，采取意想不到的冒险行为，破坏党的团结，导致秩序的紊乱，引起国内国外的不良反映。为此，要想出具体办法。我想到了以下的办法，不知妥否，盼主席酌量。

第一，实行“四不一要”的做法。即是在暂定十年之内，对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军区的第一把手、第二把手（经过批陈整风以后，现任中央和中央局人员，基本上应当说是可靠的）实行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等“四不”，如果他们某个成员有错误，可经过党内思想批评来解决，他们有病，可找人代替工作，如果病故，则提升其他人接替。对于久病要求

【2162】周恩来：《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讲话提纲》，1971年4月29日。中发[1971]32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1971年4月29日发出。

主席：

五月二十日，我找了周总理谈了谈有关党的团结和相当于中央局以上的安全问题。我要总理考虑和请示主席。现将我谈话的大意报告主席，请主席考虑并盼主席能找总理一谈，由总理采取切实的办法。我的意见如下：

经过五年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这个大革命是非常必要的和正确的。我们是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现在是要巩固

我很想和主席谈。如主席什么时候有时间，请约我一谈。

此致

敬礼！

信稿由林彪口述，于运深记录，李根清眷清。

从毛家湾抄出的信稿没有落款署名及日期。

退休者，则按退休干部处理。“一要”就是遇特殊情况，要执行主席面授的机动指示。

第二，将以上规定传达到北京，以至其他必要城市担任卫戍部队的每一士兵，要他们根据这个规定，任何时候，不执行除主席以外的任何首长有关对中央和相当于中央局以上人员的捉人、关人、杀人等乱命。如果他们借口是执行命令而执行乱命，则其本人应受法律的严厉制裁。无论逃至何处，均应归案严办。而绝不可托辞是执行命令而推卸自己的责任。

第三，为保证首都安全，首都附近的三个人造山，建议由华东、东北、山东各派一个独立营来担任固守。

第四，建议将三十八军调离华北。这个部队虽然是很好的部队，但放在首都附近不甚适宜，以调往别处，换一个原二野、三野或一野的军来接替他们的任务为宜。

我的以上想法，是看了这次批陈整风会议文件，有的同志在担心着安全问题。他们的心情是忧虑的，因而是值得重视和深思的。我想，为了防止万一发生事故起见，所以想到以上的做法，但这些方法必然是不完备或甚至是不正确的，特报告主席，请主席考虑交总理遵办。

关于第一条和第二条，甚至可以召集首都所有担任警卫部队的干部开会宣布，由他们口头上或文字上传达到每一个士兵，并且每隔两三个月重复向士兵传达一次，十年不懈。十年后再看情况，基本上也应当根据这个精神办理。首都以外的部队，可传达到师、团以上干部。

这些内容，对外都应严格保密，尽可能免除付作用的发生。

我很想和主席谈谈。如主席什么时候有时间，请约我一谈。

此致

敬礼！

这一份已誊清的信稿，末尾没有署名，没有落款日期。

2016年3月31日，笔者在北京见到了原林彪办公室保密员李根清和林办机要秘书于运深。笔者向李、于两人展示了上述林彪信稿原文的影印件。

李根清看了信稿影印件后承认，信稿是他的笔迹，毫无疑问，这份信稿是他誊清的。于运深亦称，信稿是他根据林彪口述记录，再由李根清誊清的。其中“对于久病要求退休者，则按退休干部处理”这一句话，是他对照林彪口述记录稿，发现李根清的誊清稿漏了这么一小段，于是由他添写上去的。

重见自己45年前的笔迹，引发了李根清更多的思绪。李称，这封信的内容，出自林彪之口无疑，思想、语言、口气都是林彪的风格，如称陈伯达“是大坏蛋”，就与他“五一八讲话”所说的“王八蛋”、“坏家伙”如出一辙；“思想糊涂的人”、“冒险”、“冒险家”，也与“五一八讲话”所说的“糊涂虫”、“他们想冒险”几乎相同。又如称大军区一级的单位为相当于“中央局”，称南京军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为“华东、东北、山东（军区）”，也是林彪的一种习惯用语，就像毛泽东称黄永胜“参谋总长”一样。信稿的思想也是林彪的，实行“四不一要”这样重大的建议，只有林彪才敢于提出来，步步深入的批陈整风使林彪担忧一批党政军高级干部的政治安全和人身安全。再如，“我很想和主席谈谈。如主席什么时候有时间，请约我一谈。”除了林彪，又有谁还敢向毛泽东提出这样的请求呢？

笔者赞同李根清以上说法，更注意到了林彪信中有关“乱命”的提法。^[2163]

林彪称，“不执行除主席以外的任何首长有关对中央和相当于中央局以上人员的捉人、关人、杀人等乱命。如果他们借口是执行命令而执行乱命，则其本人应受法律的严厉制裁。”林彪声称“除主席以外”，恐怕是语带双关的“客气话”，恐怕林内心所指，其实也隐含了毛在内。给毛本人的信函，用上“乱命”这样强烈的带刺激性的语言，在那个年代，除林之外，何人敢说？！

以当日情势而言，林彪致毛信中所表露的对“有关党的团结和相当于中央局以上的安全问题”的担忧，并非多余。林在这里提出的“党的团结和相当于中央局以上的安全问题”，是因陈伯达问题无辜牵连至李雪峰、郑维山有感而发，所涉不仅包括黄、吴、叶、李、邱和林自己，还应包括陈锡联、杨得志、许世友、韩先楚等一批高级将领以及汪东兴等人。

林信中“建议将三十八军调离华北”，表面上是避嫌，其实是直接宣示了对毛的不满。三十八军是毛手上打击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的有力工具，正如毛所称，“我捡了两块石头，一是三十八军的报告，砸了一家伙，这一下子与陈伯达划清了界限。这块石头，我砸出去以后，起了一些作用。……三十八军做了很好的调查研究，他（指陈伯达——原编者注）讲了几次话，文件在那里，都清清楚楚。”^[2164]

林明知毛所好而欲要其弃之，明知事不可为而言之，以林对毛了解之深，为什么他还要这样说？笔者认为，这恰恰反映了林最后对毛的抗争心态。毛、林走到此时，裂痕不可愈合，已是必然。

李根清称，2013年10月，他曾与于运深一起回忆，两人都记得，当时做了两份眷清稿。只是为什么搞了两份？个中缘由，怎么也想不起来了。现在看到了眷清稿的复印件，才豁然省悟——原来信稿眷清后，于运深发现漏了一小段，就给补上了。林彪给毛泽东的信件，是不应该有这样的修补文字的，李根清便又工工整整眷清了一份。于是，信稿就有了两份眷清件，一份可以送毛，另一份存底。

[2163] 乱命，指人临死前神志昏迷时留下的遗言或指悖谬的命令。典出《左传·宣公十五年》：“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颖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颖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又冯梦龙《东周列国志》第二回：“望吾王收回乱命，庶可免亡国之殃也。”李希圣《庚子国变记》：“当伪诏命各省焚教堂杀教民，诸疆臣皆失措。李鸿章久废，居京师，方起为粤督。乃各电商鸿章，请所向。鸿章毅然覆电曰：‘此乱命也，粤不奉诏。’”蔡东藩、许廑父《民国通俗演义》第十一回：“老袁欺人太甚，既召他进京，又令他南返，不但失信芝祥，并且失信直人，这等乱命，我尚可副署么？”

[2164]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374。

李根清回忆道，林的信没有再交给他经机要渠道送出。于运深也这么说。没有送出的原因，据于说，叶群给周恩来打了电话，告诉他林彪信稿的内容，被周劝阻了。

笔者对李根清称，据了解，中央专案组在毛家湾林彪住处发现的，仅有存底的这一份。那么，李、于记忆中重新誊清、可以送毛的另一份，到哪儿去了呢？李称“道不明”。

更重要的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份誊清件，并没有林彪签名，没有署上日期。另一份信稿是不是签了名，经叶群通过另外渠道送达了呢？如果不是这样，中央专案组在向毛泽东和中央报告查抄到这封信的时候，何以能认定它是5月23日写的呢？笔者再三询问李、于，当年他们被审查时，有没有人问过这封信的产生经过？他们均答，肯定没有。这样，中央专案组在认定5月23日这一日期的过程中，很可能有其他的证据。

据此，笔者大胆假设：重新誊清的另一份信稿，很有可能最终由林彪签名并署上日期送了给毛。李根清称，他没有这样的印象（收、发、办文是李的本职工作）。但他说，也不能绝对排除另一份送了给毛的可能性。

无论这封信最终是否送到了毛的手中，林彪在信中所表达的对“有关党的团结和相当于中央局以上的安全问题”的担忧是明白不过的。这封信是林彪当日思想的明确表达，是林毛歧见的一份重要证明。5月20日，林彪已与周恩来谈过并要周“考虑和请示主席”，周极可能不敢隐瞒林的要求而随后报告了毛，加上5月23日的信很可能已送到毛的手上，因此，我们可以合理推断：不排除毛在当时已经知道林的这些想法。惟毛不但没有理会林的建议，反而促使他进一步加紧了最终彻底解决林彪问题的行动。

二、表面平静的四个半月

自4月29日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结束至9月12日毛泽东南巡返京前的近四个半月时间，虽然毛、林争斗的暗流仍旧在地下涌动，但北京政治舞台上表面却风平浪静。

5月1日晚，毛、林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五一”庆祝晚会，这是毛、林最后一次登上天安门。据新华社讯，同毛、林一起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庆祝晚会的有；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除因病假事假未到外，按姓氏笔划为序）：叶群、叶剑英、江青、朱德、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

文元、黄永胜、董必武，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2165]有人说，与毛同坐一桌的林，入席后神情冷淡，未有与毛打招呼，不几分钟后即离席不辞而别。又有人否定以上说法，称林未见异常，神情还颇为愉悦。惟无论如何，这天晚上，毛、林之间缺乏语言交流却是千真万确。

5月10日，由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率领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从莫斯科乘专机到达北京。周恩来、黄永胜、张春桥、姚文元、邱会作前往机场欢迎。5月11日，周恩来、黄永胜、张春桥、姚文元、邱会作同黎笋率领的越劳动党代表团会谈。5月11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宴会和文艺晚会，热烈欢迎黎笋和由他率领的代表团。周恩来、江青、黄永胜、张春桥、姚文元、邱会作出席。^[2166]

6月1日，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率领的罗党政代表团下午乘专机抵达北京。6月3日上午，毛泽东、林彪会见齐奥塞斯库率领的罗党政代表团全体成员。周恩来、康生、黄永胜、姚文元、李先念在座。毛、林、周、康等与齐奥塞斯库等进行了“友好的谈话”。^[2167]这是林最后一次见到毛。毛泽东在谈话时称，“你们参观一下我们的防空洞这些东西，这是准备打仗用的。你们到不到东北去？（周恩来：准备到南京、上海去看看，在北京也看一点，可以安排。）这些东西也可以做准备啰。（齐奥塞斯库：分裂带来了许多损失，这是事实。犯了很多错误，这是事实，但应该改正错误。）我们不改，我们‘教条主义’一直坚持下去，永远不改，一万年不改！柯西金来一趟，减少一千年；你们罗马尼亚波德纳拉希来一下，减少一千年。我说：哎呀！一下就减少两千年，再减非常危险噢！现在不过剩下八千年了。（齐奥塞斯库：还可以减少一些吧？）一年都不减了！你拉屎到我头上，我要还敬！小国不在内，一句话不讲，可以。大国啊，不买它的账！谁人作说客也说不动我们，越说关系越不好！我们都是‘军阀’、‘官僚’啊，在这里‘专政’啊，‘叛变’了马列主义啊，毫无资格参加那个‘大家庭’。你们有资格，我们没有。（扬·格·毛雷尔：我们是‘民族主义者’。）你们啊？也有点帽子啊。（毛雷尔：少一点，但还有。）就是说，人们顶了几下就少了一点嘛。我们不多不少，八千年（伸出八个手指。）大家听着啊，不减了！（林彪：坚决不减了！）你看，‘军阀’说话了。（指林彪）他是‘军阀’头子之一。我也是‘军阀’，‘军阀’加‘官僚’。”^[2168]

^[2165] 《人民日报》，1971年5月2日。

^[2166] 《人民日报》，1971年5月11、12日。

^[2167] 《人民日报》，1971年6月2、4日。

^[2168] 毛泽东会见齐奥塞斯库谈话记录节选，1971年6月3日。

6月2日，毛泽东阅周恩来关于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的报告。报告说：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传达和讨论中美关系及国际问题。为使这一问题讨论得更深入更广泛，政治局同志赞成这次会议要比4月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参加的人更多一点，面更广一点。为争取时机，政治局商定在6月4日至6日开会。毛泽东指示：“都同意。会议时间改为十天。”并将会期“9月4日至9日”改为“6月4日至14日”。6月4日-18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6月5日，毛泽东阅周恩来关于中央工作会议安排的报告，批示：“同意。”报告说：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已于四日晚开过，在会上我宣读了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并作了若干解释。6月14日，毛泽东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情况综合简报和关于会议延期三天的请示报告。报告说：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各小组召集人均认为，毛主席与斯诺谈话纪要应为传达为这次会议的主题。为使参加这次会议的同志能够回去向各级领导干部谈清楚这次工作会议的精神，并能预见到一些问题的的发展，大家同意以三天时间（14-16日）专门学习和讨论毛主席与斯诺的谈话纪要，并印发斯诺发表的七篇文章的摘要作参考，然后再以一天时间（6月17日）结束这次会议。毛泽东批示同意会议延期三天。^{【2169】}

6月5日，越南南方共和驻中国大使阮文广，下午举行盛大招待会，热烈庆祝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成立两周年。董必武、黄永胜、姚文元、李先念、叶剑英、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等应邀出席招待会。^{【2170】}

7月4日，周恩来、黄永胜下午会见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国防部副部长陈参率领的越南军事代表团全体成员。中越两国政府关于一九七一年无偿补充供应越南军事装备物资议定书在北京签字。黄永胜出席了签字仪式。阎仲川和陈参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议定书上签字。^{【2171】}

7月9日，林彪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名义，致电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巴卢库，最热烈地祝贺阿人民军建军二十八周年。阿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哈卡尼晚上举行招待会，热烈庆祝阿人民军建军二十八周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应邀出席了招待会。^{【2172】}

7月9日-11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三天内，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基辛格进行了六次会谈，着重就台湾问题和尼克松访华安排等进行磋商。7月14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周恩来谈话。此前，周恩

【2169】《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382-385。

【2170】《人民日报》，1971年6月6日。

【2171】《人民日报》，1971年7月5日。

【2172】《人民日报》，1971年7月10日。

来于13日乘飞机到河内，同黎笋、范文同会谈，通报中美会谈情况。7月16日，中美双方发表基辛格访问中国公告：“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至十一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一九七二年五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同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周恩来的谈话。此前，周恩来于15日乘飞机到平壤，同金日成会谈，通报中美会谈情况。^{【2173】}

7月10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致电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和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热烈祝贺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十周年。朝鲜党政代表团上午到达北京。黄永胜、姚文元、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等前往机场欢迎。下午，周恩来、黄永胜、张春桥、姚文元、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纪登奎等会见了朝鲜党政代表团。7月11日，北京一万人隆重集会热烈庆祝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十周年。周恩来、黄永胜、张春桥、姚文元、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纪登奎等出席大会。7月12日，中朝两国党政领导人会谈，周恩来、黄永胜、张春桥、姚文元、李作鹏等参加。^{【2174】}

7月16日，林彪夫妇离开北京抵达北戴河。^{【2175】}林彪在京期间，江青为林彪照了一幅捧读毛泽东选集的免冠照片。这幅照片题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作者署名“峻岭”，发表在1971年7-8月合刊的《人民画报》上。这是毛、林关系濒临绝境前的回光返照。

据新华社讯，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巴卢库、朝鲜民族保卫相崔贤、越南副总统兼国防部长武元甲、越南南方共和国国防部长陈南忠、老挝人民解放军最高指挥西番敦、罗马尼亚武装部队部部长约尼查自7月27日至7月31日打电报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林彪，最热烈地祝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四周年。7月31日晚，国防部举行盛大招待会，隆重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四周年。在主宾席上就座的党政军领导人有：周恩来、江青、黄永胜、张春桥、姚文元、朱德、李先念、叶剑英、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纪登奎、李德生、徐向前等。黄永胜在招待会上讲话。^{【2176】}

【217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386。

【2174】《人民日报》，1971年7月11、12、13日。

【2175】林离京时间据李根清：《林彪“散记”中对毛泽东的思考》。《炎黄春秋》，2014年第10期。

【2176】《人民日报》，1971年8月1日。

7月31日，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宾努亲王写信给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林彪，最热烈地祝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四周年。^{【2177】}

8月6日，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和政府总理奈温前来中国进行友好和非正式访问，下午乘专机到达北京。周恩来、黄永胜、李先念等前往机场欢迎。8月7日晚，毛泽东会见奈温，周恩来、李先念等在座。毛泽东称，“有一段时间，1967年，我们控制不住我们外交部，管不了了。有那么两个月，天下大乱。你们大使馆还算好的，汉有烧掉，英国代办处烧了。（奈温：是的。）你有什么办法？！现在我们给他们修。你烧了人家的大使馆，成什么话呢？！你要好好赔啊！所以我们给他们起了一个，而且向他们赔不是，认错。（奈温：是的，中国驻仰光使馆的事也是这样。）那时候也是无政府主义，不过我们烧大使馆是在那两个月，都是极‘左’派当权，自己向国外发电报，都是极‘左’啊！这些都是中国人做的事，所以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好人。（奈温：应该说只有个别人要负责。）他们有一个集团，一个阴谋集团，搞破坏的。（周恩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国际关系，破坏文化大革命。（奈温：不过十分幸运的是，那些事情已经过去了。现在管理国家已经比较顺利了，一切事情都好了。）（周：不能这样说。）（奈温：当然，这里那里可能有些小问题，但同那时比较好多了。）就是‘五一六’的问题还在这里清查。极‘左’思潮有些不是‘五一六’，要进行教育。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成果就是把这些坏人暴露出来了。”^{【2178】}

8月1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所听取本日下午回京的周恩来汇报陪奈温前往广州参观访问情况。毛泽东提出在国庆节后召开四届人大。当天，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讨论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由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组成筹备小组，着手召开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会议同意周恩来等在近期内去北戴河向林彪作一次工作汇报。^{【2179】}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明显地将林彪一系排除在外。

8月16日上午，周恩来带领张春桥、黄永胜、纪登奎乘火车到北戴河林彪处汇报工作，主要谈国际形势问题。张春桥、纪登奎、黄永胜分别谈了宣传、党务、生产、军事等工作情况。汇报结束时，周恩来说：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党中

【2177】《人民日报》，1971年8月2日。

【2178】毛泽东会见奈温谈话记录节选，1971年8月7日。

【2179】《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387。

央决定在国庆节前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四届人大，现各项准备工作正逐步就绪。^{【2180】}林彪作了“加强战备训练”的指示，还提出总参要多设几个副总长。

8月18日，以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吴振宇为团长的朝鲜军事代表团，应黄永胜邀请下午乘专机到达北京。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前往机场欢迎。8月19日下午，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同朝鲜军事代表团会谈。9月5日，朝鲜军事代表团由李作鹏陪同，由长沙乘专机到达武汉访问。9月6日，朝鲜军事代表团到达北京。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同朝鲜军事代表团继续会谈。中国政府和朝鲜政府关于中国向朝鲜无偿提供军事援助的协定在北京签字。周恩来、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出席签字仪式。黄永胜和吴振宇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9月7日，朝鲜军事代表团乘专机离开北京回国。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前往机场欢送。^{【2181】}

8月22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致电罗共总书记齐奥塞斯库和罗部长会议主席米雷尔，热烈祝贺罗马尼亚解放二十七周年。^{【2182】}

8月23日，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并在北戴河度假后乘专车到达北京。周恩来、黄永胜、叶剑英前往车站欢迎。^{【2183】}

8月27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热烈欢迎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和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国内特使英·萨利。出席宴会作陪的有：黄永胜、张春桥、姚文元、李先念、叶剑英、吴法宪。^{【2184】}

9月1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致电越南国家主席孙德胜、越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越南政府总理范文同，最热烈地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二十六周年。9月2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致电孙德胜、黎笋、长征和范文同，就越南北方遭受严重水灾向越南劳动党、越南政府和越南人民表示最深切的慰问。^{【2185】}

9月7日晚，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罗博举行宴会，欢迎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阿归来。黄永胜、姚文元、李先念、吴法宪、纪登奎应邀出席了宴会，罗博和李德生讲了话。9月10日晚，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杜马举行宴会，欢迎中国军

【2180】《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第475页。

【2181】《人民日报》，1971年8月19、20日，9月7、8日。

【2182】《人民日报》，1971年8月23日。

【2183】《人民日报》，1971年8月24日。

【2184】《人民日报》，1971年8月28日。

【2185】《人民日报》，1971年9月2、3日。

事友好代表团访罗归来。黄永胜、李先念、纪登奎应邀出席了宴会，杜马和李德生讲了话。^{【2186】}

9月8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致电金日成和崔庸健，最热烈地祝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三周年。^{【2187】}

据新华社讯，“为纪念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五十周年而编辑出版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的光辉形象的彩色照片，共五十幅。从九月十二日起将在北京和全国城乡陆续发行。”“这套照片中，有几幅是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在一起的照片，使人亲切地感到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学习的光辉榜样。”^{【2188】}

然而，在表面的风平浪静掩盖之下，历史的车轮，正悄悄地、不动声色地驶近“九一三”。

第九十七节 毛泽东南巡“吹风”^{【2189】}

一、毛泽东在武昌的谈话

在北京的政治气氛表面风平浪静了一段日子之后，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是，一场更猛烈的黑色风暴悄然降临。

8月15日^{【2190】}，毛泽东乘专列从北京出发，南下中南、华东等地，就庐山会议“没有完”的问题向沿途党、政、军负责人“打招呼”，亲自发动各地诸侯，为召开九届三中全会作准备，以彻底解决林彪一系问题。

为此，毛泽东在沿途各地的谈话，无一不是尖刻地、明白无误地针对林彪及黄、吴、叶、李、邱。毛这些谈话，成为林彪出走的直接诱因。

8月16日，毛泽东到达武昌。在武昌车站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汪东兴谈话。17日，毛在武昌与刘丰，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河南省委书记、省军区第二政委王新和汪东兴谈话。

据汪东兴称，毛泽东先问刘丰关于湖北、河南的情况，接着话锋一转称：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

【2186】《人民日报》，1971年9月8、11日。

【2187】《人民日报》，1971年9月9日。

【2188】《人民日报》，1971年9月12日。

【2189】本节内容，参考王海光《“九一三”事件循时考》。

【2190】该日期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页91。《周恩来年谱（1949—1976）》误为8月14日。

要搞阴谋诡计。接着又称：中国也怪，中国的党没有分裂，已经经过五十年没有分裂过。苏联的党分裂过，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中国没有。有人要分裂我们的党是困难的。

毛在讲述了中共的历史后，把话题转到九届二中全会，称：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能是心里有鬼。（在座的人纷纷检讨自己犯了错误。）你们就是太急了，问题不在你们。你们是属于上当受骗的，问题在北京。就是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他们都跟着起哄，犯了错误，进行了检查，允许改正错误，还是可以工作。这次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毛说：什么“天才的”，我不是天才，读六年孔夫子，读七年资本家的洋学堂，我到二十五岁那一年，正是一九一八年开始读马列主义。

（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错误的人的时候）毛称：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2191]改了没有？没有改。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也可能救不过来。有错误就要改，如汪东兴同志。

毛接着说：胜利以后，朝鲜战争时，我管了一下军队，以后就没有管了。朝鲜战争后，军委的事，主要是彭德怀管。我征求总理的意见，我说还是他好，他在长征中是靠在我们这边的，抗美援朝，人家打了胜仗，不叫人家管这个事行吗？管点事有什么要紧呀！以后就是林彪管了，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

毛对刘丰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开九十九人的会不行，要开军长、政委，地方上相当军一级以上干部的会议，把问题讲清楚。听说连总参二部部长这一级的人都还不知道，这怎么能行呢？你们军区、省军区常委要研究一下。暂时不忙，待提中央讨论后定。

【2191】据1972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的《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毛在此处还点了彭德怀、刘少奇的名。

毛还说：不要把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秘书。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还有黄永胜那里是不是？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只有两个文件，当时因为身体不好，我口述，别人记录的，最后还是经过我自己修改印发的。其中一个就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毛继续说：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脚。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了三十八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军委办事组准备叫李先念、纪登奎参加，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

毛说：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呢！这不符合实际。^{【2192】}

8月25日，毛泽东把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从北京找到武汉，晚上毛与华谈话。

据汪东兴称：毛泽东先问华国锋现在忙些什么，然后不无严肃地说：我看你是满脑子的农业，我是满脑子的路线斗争。

毛给华简单讲述了党史后又称：我批发了广州军区三支两军座谈会的纪要，在中央的批语中加了“认真研究”四个字，不加怕各大军区马虎过去。

毛接着称：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天。是否定“九大”路线，否定二中全会三项议程，要改成讨论天才和要设国家主席问题。他们名为反对张春桥，实际是反我。是我把天才划掉，是我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上一中、一师七年是读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到马列主义。

（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印发的反映华北组讨论情况的六号简报时）毛称：这个简报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这是我个人认为。将来党中央还要讨论。说大有炸

【2192】毛与刘丰、刘建勋、王新的谈话，见《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页91-100。

平庐山之势是有用意的，空军才能炸平。他们发称天才的语录，不给李德生同志发，他们几位是井冈山山头一方面军的。一次当着他们的面，我说李德生你好蠢呀，不是一个山头的，宝贝如何能给你呢？会上念的称天才的语录，事先也没有谈过，也不知是哪本书、哪一页的，是说假话嘛。

（在谈到解决九届二中全会出现的问题时）毛称：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看到三十八军的报告很高兴，当即批了。把二十四军、二十一军、三十八军整得厉害，特别是把三十八军整得苦。还批了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文件和刘子厚的检讨等文件，这是打石头。改组北京军区是挖墙脚。中央警卫团、北京卫戍区，他们没有插进来。掺沙子，掺了李德生、纪登奎。还少，叫李先念参加军委办事组^{【2193】}。不能不管军队，开会不一定到，中南也要有人参加，可以不到会。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要当武官。

毛还称：路线要搞正，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的可以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汪东兴同志他管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团七千多人的范围，他分几次在一千多人中讲了自己犯的错误。犯错误愿意改正就好。

最后，毛称：不要搞山头主义，山头主义害死人。全国都要团结，还是几个原则。三个办法，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有些话不能听，一句话顶一万句，能相信吗？有的连半句也不顶，顶个屁。实际有的不算数，如天才和国家主席问题，我说了多少次，半句也不顶。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哩。^{【2194】}

8月27日，毛泽东准备由武昌去长沙。下午2时，刘丰去看毛泽东，毛与他进行了第二次谈话。

据汪东兴称：（刘丰称：这几天我想得比较多，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我也犯了错误，起了哄，干扰了主席。去年主席谈了以后，我心情很沉重。）毛泽东对刘丰称：你沉重什么？问题不在你。问题在北京。又再次给刘丰谈党内的路线斗争，点明了陈伯达也是反党阴谋集团的人。毛称：我们党五十年，十次分裂，都没有分裂了。又称：我犯了个错误。胜利以后，军队的事情我管得不多。还说：我要管军队了。我光能缔造就不能指挥了吗？（很快又把话题转回九届二中全会问题上）又是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的人犯错误，他们想搞我的山头。四方面军的同志，从张国焘事件后，比较谨慎一点了。（再次提到九届二中全会后采取的措施）我的办法是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在庐山，五天时间我写了七百字，打了这样一块石

【2193】李先念后来参加军委办事组，“九一三”后为军委办公会议成员。

【2194】毛与华国锋的谈话，见《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页100-103。

头。以后批了三十八军的报告。他们把三十八军整得那样苦。还批了济南军区政治部的报告、刘子厚同志的检查。（谈到军队的问题时）毛称：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指挥解放军？郑维山能指挥解放军？华北八个军，就有五个军反对他们。天津的六十六军就不听他们的嘛！就是那三个军，还有军长、政委，师长、政委，团长、政委，会听他们的吗？（毛谈到掺沙子的办法）李先念这个人比较正派，比较好。我要李先念同志也参加军委办事组，考虑再增加一些人，掺沙子。是不是其他军区也参加些人。毛泽东接着说：我七老八十了。你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搞团结，不要搞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党的方针是允许改正错误的。如某些同志，我们还是信任的。（再次给刘丰讲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毛称：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他们在庐山不是一天半，而是三天。毛又称：我讲的话，什么一句顶一万句？有时顶一句，有时连半句也顶不了，顶个屁！他们的话才是一句顶一万句，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他们才是天才，陈伯达才是天才。（还称）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毛生气地称）他们要捂住。总参二部部长都不知道。怕开二百家人的会议。毛还对刘丰讲：他不赞成老婆当秘书、当办公室主任，对一些负责人向林彪请示问题时要经过叶群这类事很不高兴。毛还让人给刘丰找《国际歌》歌词，同刘丰等一起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给刘丰说：是呀！你看，就是要步调一致嘛！不一致还行呀？^{【2195】}

据邱会作称：（1990年，邱在武汉见到刘丰，刘丰给邱说了他当年见毛的情形）刘丰去看毛时，表态称：完全拥护主席的指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听主席的话，跟主席革命到底。“我认为，如果因林彪副主席的讲话影响了主席的健康，我建议林副主席在适当的小范围内，向主席做个检讨。”毛听了，非常兴奋，拍着大腿说：“你说得好！这个意见在北京是没有人提的，黄永胜是不会提的！你的态度很好，在九届三中全会会上，就由你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希望你实践自己的申明，表里一致应当是一切共产党人的态度，但这不容易做到，更不容易一贯做到。”刘丰很激动地对邱讲：我是在劫难逃啊。如果没有“九一三”，我也自身难保。主席让我在九届三中全会上，把林的问题提出来，这不是找死吗？我提吧，林不会放过我；我不提吧，主席更不会放过我。^{【2196】}

【2195】毛与刘丰的谈话，见《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页103-109。

【2196】《邱会作回忆录》下，页784-785。

二、毛泽东在长沙的谈话

8月27日夜间，毛泽东专列抵达长沙。当晚即与华国锋，湖南省委书记、广州军区副政委兼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卜占亚谈话，汪东兴也参加。毛问上午提前飞抵长沙的汪，是否向已奉命抵达长沙的刘兴元（广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丁盛（广州军区司令员）、韦国清（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广西区委第一书记）传达了他前几天的谈话内容。汪说传达了。毛说明天要找他们谈话。

据汪东兴称：毛首先给华、卜谈党史，讲中国党有十次要分裂，没有分裂成。又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带着在座几人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接着称：你们不光要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它的要求去做。你们找几本《国际歌》看看，《国际歌》里边什么都有了。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结果我们党里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活动。这次不做结论，也是分裂行动了。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

（谈到在军队开展的“四好”运动）毛称：一好带三好，你那一好也许带得对，也许带得不对。还有那些积极分子代表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有些是开得好的，也有好多是开得不好的，主要是路线问题。路线不对，那积极分子代表会就开不好。你在那里搞什么所谓“超天才”（注：指林立果）。有人说我是天才。我只读了六年土学堂，七年洋学堂，我算什么天才呢？青年人，哪有那么多天才呢？【2197】

8月28日晚9时，毛泽东在长沙与刘兴元、丁盛、韦国清谈话，汪东兴参加。

据汪东兴称：毛对刘兴元、丁盛两人不熟，正式谈话前，先分别问了他们的简历，还问了一些部队的情况。然后开谈。

毛在谈及中共历史上的路线斗争，历数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后接着称：以后就是高岗、饶漱石，想夺权。还有去年庐山会议。这次会议搞出来的那些东西，我看他们搞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这就是他们的纲领。他们是有组织的，瞒着人去搞的。中央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二中全会前一段开得不好，后一段开得好，引起大家对读书学习的重视。

毛对刘、丁、韦等人强调称：近一个时期以来，我的方针有三条：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起来，不要搞山头主义；要惩前毖后，治病救

【2197】毛与华国锋、卜占亚的谈话，见《汪东兴回忆：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页109-116。

人。办法也有三条，就像程咬金的三板斧，一个是甩石头。头一块石头是批陈伯达搞的语录。第二块石头是批三十八军的报告。他们整三十八军实在是恶劣，对自己的队伍怎么能那个样子的整法。整二十四军、整二十一军、整六十九军、整三十八军，为什么要整？第三块石头是批济南军区的报告，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第二个办法是掺沙子。第三个办法是挖墙脚。

毛问刘兴元、丁盛、韦国清：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法？接着称：犯了错误，就做检讨。你们犯的错误不就是拥护我这个天才，要我当主席。我怎么能是天才呢？我读过六年孔夫子的书、七年资本主义的书，1918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管理员，可不简单呢！一个月的薪水八块大洋。不过宿舍很小，冬天很冷，没有煤炭烧炕。我们八个人挤在一个炕上，不能平着身子睡，只能侧着身子睡，面积不够。那七个人都是要出国留学的，到法国搞勤工俭学的。那时图书馆里有暖气，我晚上就到那里去睡觉，又取暖又看书，开始看马列主义的书。我就在这个时候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

毛对韦国清称：我看你这个人太文了一些。打奠边府的时候，你是坚决主张打的。开头他们不听你的，你很厉害，他们就听了。

在听完刘兴元、丁盛汇报后，毛强调称：军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要犯错误。我很久没有抓军队工作了，现在要抓军队工作。抓军队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要讲团结这些事情。进城以后，管军队工作开始时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他是打了胜仗的人嘛。以后就是林彪。他管不了那么多，实际上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以后是杨成武。再以后是黄永胜当总长，又是军委办事组的组长。办事组里面有一些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出那么些事来。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样强。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上也要谨慎。军队要谨慎，首先不要搞山头主义。庐山会议上他们搞的那些语录，李德生同志就有意见。我说李德生这个人好蠢，你不是那个山头的人，别人的山头可以给你呀？好的宝贝怎么会给你呢？

（毛对丁盛、刘兴元、韦国清称，你们几个人都是我这个山头的啊，可要注意！）毛称：你们（指广州军区）写的三支两军的文件，我看了，一些问题解决得不算彻底，但还可以。我在中央的批语上加了四个字：“认真研究”，就是要引起大家重视。我们的干部，大多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不好的要给予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过分。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人说“超天才”，对二十几岁的人就捧得这样高，这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是害了他。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地方党委定的事，要拿到部队党委来讨论，这不进颠倒了吗？地方没有成立

党委以前可以，地方已经有党委了，就不能那样办了。毛最后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和办公室主任。你们这几位夫人怎么样？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免得误事。今天就讲到这里。【2198】

8月29日，汪东兴向毛泽东汇报：昨天毛与刘兴元、丁盛、韦国清、汪东兴谈话后，他们进行了座谈讨论。刘、丁、韦在座谈会上检讨了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错误。毛称：现在看来，是马列主义没有学好。又对汪称：你发言被人利用，这是事实。在湖北检讨以后，我对你比较放心了。你没有什么问题。毛还称，光读马列主义的书是不够的，还要读点历史，读点经济学，读点小说，读点哲学史。接着称：《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金瓶梅》，这都是文学作品，很重要的，是反映政治性的小说，体现了艺术性和思想性相结合的完美，写得很好，语言也很生动活泼。嘱咐汪东兴把这些话向刘兴元、丁盛、韦国清等人传达，另有机会时向政治局传达。【2199】

8月30日，毛泽东在离开长沙去南昌之前，又找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谈话。

据汪东兴称：（大家汇报了这两天学习主席指示的情况）毛称：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作。九十九人的会议【2200】，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位大将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做了总结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大家也都认为陈伯达做得不对，搞了一个称“天才”的语录。什么论“天才”，二中全会做了相当的结论，《我的一点意见》就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能靠一个人吗？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嘛。

在谈到党的状况和历史后，毛又再次强调称：听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不注意了。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第五条，都很重要。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没有政策怎么样做工作呢？要很好地抓住重点，学习和讨论，不借鉴历史和政策，怎么行呢？当然现在你们还不能向战士们讲庐山会议的问题啦。又称：庐山会议他们为什么要搞这个，收场又这么样快，我们也不懂。刘建勋同志说搞了一天半，我说搞了三天，从开始的那一天，他们就搞起来了。如果你们有理，你可以坚持，为什么那股妖风刮了三天就不刮了呢？为什么要

【2198】毛与刘兴元、丁盛、韦国清的谈话，见《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页117-127。

【2199】《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页127-130。

【2200】指1971年4月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

收得那样快呢？各大组组长都参加了政治局常委会的讨论，说要收回简报。总而言之，将来要把简报发给大家看。大家评论，是革命的，是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不要受群众落后议论的影响。这些落后的包括你们在内。不然的话，为什么被人家一股台风一卷，就把你们卷进去了。

（谈到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时）毛称：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看他呀，那些人帮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气。你们经常和我通一通气，也可以嘛。给你们通气了没有？（答：没有）。我这一次也是给你们通个气吧！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嘛。像汪东兴，沾了个边，他在一千三百人的会上做了几次检查，他也没有倒嘛。你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倒不了。当然，也有少数人幸灾乐祸。

（毛专门强调他的谈话与批陈整风会议是不同的）我说的这些，超过了九十九个人的会议总理作的总结了，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的。比如华北组的简报究竟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还应该讨论。总而言之，它是不大好的就是了。不然的话，为什么要往回收呢？有几位大将，在各组放风，也不是那么妥当的吧。后来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以后，又赶快收回记录。你看，才有几天呀，翻来覆去的，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

毛称：我们的高级干部不成熟。那次庐山会议也不过是二百几十个人，我本人也是二百几十个人中间的一个，还有一些高级干部，这次我给我们的高级干部吹一吹风，有中央委员，卜占亚他不是中央委员，我也跟他吹了，跟一个军区的政委吹吹风，还不行吗？华国锋同志，你满脑子的农业，当然，你也讲了农业路线问题，可是光有你的农业也不够，还要考虑到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回去能吹的就吹，不能吹的就守纪律，试试看。我一个人不能做决定。不要普遍搞，你们要个别的吹一吹风。

（谈到各地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毛说：过去，积代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北京开的有缺点。首先是总参谋部召开的那个积代会，他讲“大树特树”，别人一句也不能讲。听说他那里有一个护士，说了一句不赞成的话，他们就不饶她。“大树特树”，不妥当。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其实是树他自己。我还要他来树吗？现在我已经树得了不得了嘛。后来，国防科委开的积代会也不好。国防科委开积代会，有人还打电报祝贺，其实这是造声势，找一班人拥护自己。

（毛对刘兴元、丁盛称）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呀？他是办事组里边井冈山的独生子。黄永胜是湖北咸宁人，17岁就当兵，原是叶挺部队警卫团的一名战士，这个团没有赶上南昌起义，在江西修水参加了秋收暴动，然后上了井冈山。现在南方干部比较少了，高高在上了，稀稀拉拉了。北方干部多起来了，我很高兴，但是不要翘尾巴。总的来说，我们是有缺点的布尔什维克，这也没有关系。

毛特地嘱咐称：不要公开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你们只是说九次路线斗争就可以了。这是说现在的路线斗争还有些问题，不要像我跟你们说的这一套。但是，我们军队应该进行教育，所有的高级干部都应该弄清楚我和你们吹的这些。军长、政委那么多，怕来不及。其实人家都知道了，什么“小小老百姓”啊！（按：指陈伯达）“小小老百姓”是谁呢？河北人都知道。总之，就是路线问题、山头问题、团结问题。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我是到处讲。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大好吧。回北京以后，或者一个一个的，或者三个四个的，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

毛接着称：方法就是三板斧，甩石头、挖墙脚、掺沙子。陈伯达这个“小小的老百姓”，他搞挑拨离间，他的话也不讲完。我们现在在下边，也不公开批评，批陈整风我们还叫批修整风。我们党是有纪律的。庐山这场斗争，还没有听到外国人说什么，华北开了一个多月的会，后来他们又开了三个月的会，可是没有发现外国人说什么。总而言之，无论干部、战士，全国党员有二千多万，讲百分之三的话，稍微大了一点吧？现在我希望你们试试看，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这个问题很简单，不要那么长篇大论的报告。

毛看了看表称：今天我要走了，我这一路都要谈下去。（韦国清说：主席的谈话，对我们教育很大。）毛：又是英明了吧，从来没有听说过吧。九十九个人的会议，已经刚讲了吧。马克思经常讲，不要看人家的声明，要看行动。声明无非是讲在口上，写在纸上，那比较容易，真正地实现，就难了。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可能要看几年、十几年、二十年吧。人们说：盖棺论定。我说有的人盖棺也不能论定。斯大林不是盖棺论定了吗？没有论定。^{【2201】}

据邱会作称：卜占亚后来对邱说：接下来我们几个就开会，研究主席的谈话。主席说：“我的讲话你们不许给北京讲，也不要传达，但可以在常委之间吹

【2201】毛与刘、丁、韦、华、卜的谈话，见《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页132-141。



在湖南韶山整理毛南巡谈话，前排左起：丁盛、华国锋、刘兴元、韦国清、卜占亚，
1971年9月初。

吹风。”主席究竟是希望我们传达，还是不希望传达呢？大家一致认为毛是希望传达的，我们应该传达。^{【2202】}于是刘兴元等就在湖南韶山滴水洞整理了谈话记录，9月5日，召开了广州军区党委扩大会，向广州军区军以上干部传达了毛长沙谈话的主要内容。

三、毛泽东在南昌的谈话

8月31日，毛泽东决定去南昌。汪东兴乘飞机先去打前站，通知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到南昌谈话。下午17时30分至19时30分，汪东兴给许世友，韩先楚，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三人传达了毛在武汉、长沙的谈话内容。

【2202】《邱会作回忆录》下，页786。

晚10点多，毛在住地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和汪东兴进行了第一次谈话，时间一个多小时左右。

据汪东兴称：（毛开门见山，讲党的历史和路线斗争问题，谈到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南京与上海、浙江的关系问题，程世清、许世友分别作了解释）毛接着称：汪东兴向你们传达了武汉、长沙谈话的内容，讲了庐山会议的问题。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另外，我们这个军队是不是哪一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或者是哪几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我看不是，人多着呢。朱德、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

毛再次称：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也是缔造者、指挥者。但是，他指挥军队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来搞分裂，那就不好了。长征时，同我们一起的右路纵队，有四军、三十军，这两个军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他们当时把枪丢给干部团的学生，我还是要他们把枪带上，他们愿意回去就回去，张国焘有命令嘛。他们不愿意回去，我们也欢迎。当时不能帮忙，军队不能帮忙，都拿着枪啊。张国焘打电报让他们回去，他们也愿意回去，那就回去吧！李先念和许世友都是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后来还是回去了。毛对许世友等人称：你们和张国焘是一个部队的，你们要接受这个教训。后来你们不是和我们又会合在一起了嘛。

最后，毛又提出了学习的问题，说：现在有个口号，全国人民学人民解放军。要加一条，人民解放军学全国人民。^{【2203】}

毛谈话后，程世清向汪东兴反映了空军周宇驰两次到南昌，形迹可疑的问题，汪让程直接向毛泽东报告。随后毛两次与程单独谈话，程汇报了周宇驰在江西研制水陆两用汽车等情况，以及林立衡曾讲与林彪、叶群来往“是要杀头”的话。毛泽东称：“你程世清交了心，不要怕挨整。”^{【2204】}

9月1日，毛泽东患了感冒，全天休息。汪东兴按照毛的指示，组织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几人座谈讨论毛昨日和他们的谈话。

【2203】毛与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的谈话，见《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页144-150。

【2204】程世清的交代，1980年6月。

9月2日，毛泽东准备离开南昌，临行前要见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因他们打猎去了，找来耽误些时间，只谈了40分钟。毛询问他们昨天讨论的情况。他们说：听主席的。九届二中全会我们起了哄，犯了错误，要做自我批评。午饭后，毛离开南昌。路上走了近13个小时，抵达杭州的时间是9月3日的零点。

四、毛泽东在杭州的谈话

9月3日，毛泽东专列到杭州后，在笕桥专用线停放。毛找浙江省委第一书记、二十军政委兼省军区政委南萍，省委书记、二十军军长兼省军区司令员熊应堂，省委书记、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谈话一个多小时。

据汪东兴称：（毛向他们简单询问了一下当地情况，很快把话题扯到了九届二中全会上）。毛问陈励耘：庐山会议你们有什么错，吴法宪找了八个人，其中有你一个。陈励耘很紧张，慌忙解释。毛又说九届二中全会六号简报的问题：那份简报影响最大，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我也搞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这样搞？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我看他们是恐惧。（谈到对待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犯错误的人）毛称：我看前途有两个，一个是改，一个是改不了。接着又称：庐山乱了三天，实际一天半，后来停下，逛庐山，到现在一年了。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林彪两次打电话、写信都被他们（指叶群等）阻止了。庐山问题不那么好，但没有庐山会议，也不会有现在的情况。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光开不到一百人的会议不行，军队还可扩大到军长、政委参加，地方也要有相当这一级的同志参加。

（在谈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和陈伯达的问题时）毛称：庐山会议，主要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主席问题，一个是天才问题。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那几个副词，我圈过几次了。毛再次强调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搞山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接下去称：听话要分析，不要听小道的话，不要尽听，人家一吹就听了，受蒙蔽了，不了解情况。所以要调查研究，听话要分析。（再次讲到对“天才”提法和“伟大”提法的态度）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了三个副词，当时兵荒马乱，那时还需要嘛。“九大”后就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现在就要降温。到处挂像，日晒雨淋，可怜噢，还有那个“伟大”。我就有四个“伟大”，你们就一个没有啊！伟大的导师，就是一个教员嘛，当然导师比教员更高明一点。

“九大”党章草案上那三个副词，我就圈去了，“九大”党章已定了，你们为什么不翻开看看。

（最后又谈到军队问题）进城那时，我管打仗，也管军队。朝鲜战争人家打胜了，我就没有管了，要人家去管。军队开始是聂荣臻管的，以后是彭德怀管，后头是林彪管。但他身体不好，也管不了那么多，罗瑞卿、杨成武也不听他的，我帮忙也不够。现在的几位大将，我也不熟悉，不了解，同他们单独谈得不多，集体谈得也不多，黄永胜现在思想状况怎样，也不清楚。过去我没有管，现在我要管军队的事，我不相信军队要造反。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除了他们外，主要是北京军区，他们先整了二十四军，又整了二十一军、六十九军，最后整了三十八军，有的采取组织调整的办法。二十一军调到陕西时，胡炜就讲这下可好了，脱离了他们的指挥。都高兴离开北京军区。对六十六军就说不服，他们的前军长就顶住了，就是不让他们钻到天津市革委会里去。北京卫戍区他们就插不进去，因为有谢富治、吴德、吴忠，不听他们那一套。

毛再一次称：对林要保。同时又批林的讲话：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

（谈话快结束时，毛又提到）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人民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要学全国人民。^{【2205】}

9月10日中午，毛泽东突然决定离开杭州到上海。临行前，毛与南萍、熊应堂、陈励耘及白宗善（空五军军长）又谈了一次。白宗善是因值班上次没有来见毛，毛这次专门叫他来。

五、毛泽东在上海的谈话

9月10日下午4时，毛专列由杭州出发，晚10点前抵达上海。汪东兴行前通知了王洪文（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并要他通知许世友来。王洪文、王维国（空四军第一政委，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来见毛，许世友没找到。

9月11日上午10时左右，许世友来。毛与许世友、王洪文谈了一个多小时的话。

【2205】毛与南萍、熊应堂、陈励耘的谈话，见《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150—157页。

据汪东兴称：（许世友说他到大别山军垦农场去了，形势很好，丰收在望。毛泽东再次给许世友打招呼：不要把领导机关搞乱了，更不能把军队搞乱了。我在江西就同你讲了，要“高抬贵手”。然后回到谈话主题上。）

毛泽东先提了几个问题：对庐山会议你们想得如何呀？是不是在思想上解决了问题呀？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是不是都解决了呀？然后说：我认为犯点错误是不要紧的，有的属于认识问题。现在有的同志对有些问题还认识不到嘛，那就等待，而且耐心地等待嘛。

毛接着称：认识一点就写出来，以便改正错误。犯了错误，也不认识，也不去想办法认识，在哪里顶着，这个不好，可能不仅会使错误不能被认识出来，而且会加深的，甚至把错误当做包袱的。犯错误的包袱，常常是越背越重，这个不好。要把这个包袱甩掉，轻装上阵，那样人就会觉得舒服了。不然总是背着沉重的包袱，你不甩开，那怎么会好受呢？

许世友表态称：坚决按主席的指示办。毛说：不见得吧。让许讲一下什么是唯心论，什么是唯物论。许说不上来，给毛打哈哈。

王洪文汇报称：上海的五、六位中委和革委会的主任、副主任，针对庐山会议出席的问题座谈了一次。称我们突出地讨论了林彪的讲话，当时心里就嘀咕。论天才的语录我们也认为是中央搞的。还称，六号简报，我们一看就火了。这个简报是错误的，当时我们几个人到主席那里谈过了（王洪文没有去）。

毛泽东称：这个简报现在还没有做结论，这个结论将来由中央来做。我认为是反革命简报，起码如你讲的是有错误的简报。为什么有错误的简报要在这个时候发呢？为什么有的同志发了言，登简报，又不先让本人看呢？他接着称：听了你们的意见，六号简报是错误的，是有人捣鬼，有人在搞阴谋诡计，不搞光明正大；不搞团结，是搞分裂。我讲话一句顶一万句？在这个问题上，我看连一句也不顶。不是我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是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2206】}

六、毛泽东在丰台的谈话

9月12日13时10分，毛泽东的专列驶抵丰台。

毛泽东专列到达丰台时，应召前来的总政治部主任兼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纪登奎、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已经等候在此。毛在车厢里与他们谈话。

【2206】毛许世友、王洪文的谈话，见《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页164-169。

据汪东兴称：（毛先问李德生访问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的情况。李谈了阿劳动党对中国邀请尼克松访华的态度和意见）毛称：他们是左派，我们是右派。

（毛谈了历史上有人多次搞分裂，但都未成功）接着称：再就是去年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隐瞒着三个，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出简报煽风点火。这样搞总是有个目的嘛！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我那个文章，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是第五天才写的。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我同林彪谈过，你说欧洲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这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话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

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犯了错误要批评，做好了工作要表扬，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犯错误的人，允许改正错误。但发声明是容易的，无非是讲在口上、写在纸上，问题在于是不是实践他的声明，改正错误。这些人最没有勇气，收场那么快。刘建勋同志说搞了一天半，我说是三天。为什么那股妖风，只刮三天就不刮了，你有理为什么收回？说明他们空虚。我是哪里有石头抓起来就打，在庐山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是一块石头，济南军区三破三立的报告也是一块石头，三十八军的报告是一块大石头。以后又有刘子厚的检讨，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会根本不批陈，我加了批语，这也是甩石头。

（毛对李德生称）他们在庐山搞的那个材料，你向他们要，一连说三次：“你的那个宝贝为什么不给我？”看他们怎么说。

毛接着称：进城以后，我很少抓军队工作，管军队工作的，开始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再以后就是林彪，实际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三任参谋总长罗瑞卿不大听他的。以后是杨成武、黄永胜。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不怎么强，是有头无脑。他检讨最没有勇气，怕得要死。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

（毛对着汪东兴称）他沾了一点边，在一千多人的会议上作了几次检讨。（汪称：正式地做检讨是三次。毛在谈到汪东兴在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团做检讨时称）只有七千兵，连婆娘、娃娃都算上，他也没有倒呀，你把心里话说出来，倒不了的。当然也有少数人幸灾乐祸，说这次汪东兴下不了台了，但是多数人还是说他检讨得好。五个人（指黄、吴、叶、李、邱）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检讨，承认在政治上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是宗派主义的。但是，他们的检讨里面是吞吞吐吐，因而使人怀疑他们能否改好。

毛接着称：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要掺沙子才行。李先念同志过去也是搞军队打仗的嘛，可参加军委办事组，以后还要从各大军区调一些人来参加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北京军区也要从各军调一些人，把那个山头主义的窝子捣烂。华北会议派了李德生、纪登奎同志到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我的办法就是打石头、掺沙子、挖墙脚。

毛泽东问在座的人：陈伯达算不算一次路线？（纪登奎回答说：算！）毛称：还要看一看。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办公室主任。你们是不是夫人专政啊？林彪要给我打电话、写信，说是被他身边的人阻止了。要报告了，他们就搞不成了嘛！毛强调称：我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最后称：要抓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2207]

16时多，毛泽东专列抵北京站。随后，毛乘车回到中南海住地。此时，离林彪、叶群、林立果登机出逃，已不到八个小时。

第九十八节 “九一三事件” 过程述略（一）

本节及下一节的“九一三事件”过程叙述，均以林立衡的回忆为基础，辅以刘吉纯、李文普、汪东兴等直接当事人的回忆展开。这些回忆从整个事件大的脉络方面来说，都是可以相互印证的，各人回忆中小的差异在注释中都作了说明。这些差异并不影响我们对整个事件过程总的判断：

一、林彪外逃出走起始的主要原因，是深感毛泽东南巡谈话已使其政治生命完结，甚至身家性命也受到严重威胁；

^[2207] 毛与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的谈话，见《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页171-176。

二、林立果暗杀毛的计划失败（林立果声称林彪知道他企图刺杀毛泽东的计划），加速了林彪、叶群、林立果仓皇外逃出走的行动步伐；

三、林立果与其姐的谈话及北戴河林彪处的种种迹象表明，外逃出走是林彪、叶群、林立果的一致抉择；

四、林彪出走时的精神状态是清醒的。此说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山海关场站工作人员目击证实，林彪是自己顺着驾驶舱的小梯子爬上飞机的。

五、林、叶及林立果有关行动极为秘密，没有证据显示黄、吴、李、邱知悉他们的计划或行动，或参与谋害毛泽东和发动政变。

以下按时间顺序，逐日回溯当时事件衍变的经过：

一、林立果：“现在情况很紧急”

要点：9月7日中午，林立衡一行刚抵达北戴河，林立果即告诉其姐：“现在情况很紧急。昨天晚上主任要乘三叉戟飞机逃到苏修去，首长不肯跑，被主任逼得同意了。”他还问林立衡：“听听你的意见，到底跑不跑？”

▲ 9月5日

△ 北戴河：李文普的回忆

1971年7月16日，林彪、叶群从北京抵北戴河，一直住了下来。9月5日前，林立果亦到了北戴河。据负责林办警卫工作的卫士长（1971年6月至10月挂名为军委办公厅警卫处副处长）李文普回忆称：

当时，“林办”工作人员一部分留在北京毛家湾，在北戴河的有秘书宋德金、李春生，总参二部的参谋倪煜，总政保卫部调来在8341部队挂名为警卫科副科长的刘吉纯，林彪的保健医生蒋保生、内勤公务员陈占照、张恒昌，林彪的司机杨振刚，叶群的司机小慕，从北戴河空军疗养院调来的护士小王。^{【2208】}

△ 广州 - 北京：顾同舟密报毛南巡谈话内容

9月5日，广州军区空军司令部参谋长顾同舟，参加了广州军区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听了军区领导传达的毛泽东在长沙接见负责干部时的重要谈话。当时会议宣布，不准记，不准传，不准向北京打电话报告传达内容，顾于当晚十一时三十五分，在电话上向于新野密报了毛的谈话内容。9月6日，周宇驰驾驶直升机到北戴河，将于新野整理的顾同舟密报毛泽东谈话内容的电话记录稿送给林立

【2208】李文普口述、高德明整理：《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不说》。《中华儿女》1999年第2期。

果、叶群。9月8日，周宇驰打电话给顾同舟，指使顾派广州军区空军司令部管理处处长陈伯羽去长沙探听毛在长沙时的情况，尔后到北京，顾接此电话后，当日即将陈派往长沙。顾还按照周宇驰的旨意，将毛的谈话内容整理成文字材料，连同其给周宇驰的亲笔信，派其妻以看病为名，于9月9日乘飞机到北京送给周宇驰。^{【2209】}

▲ 9月6日

△ 武汉 - 北京：刘丰密报毛南巡谈话内容

李作鹏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于5日从长沙抵达武汉。6日早晨起床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去东湖宾馆看李作鹏，李向刘打听八月份毛泽东同刘丰谈话的内容。刘明知不能讲，并曾要求别人保密，但还是向李透露了部分内容。李作鹏后来称，听了刘丰讲的内容以后，“有三个想法：一、感觉庐山会议的问题没有完。二、感觉‘纲’上得比庐山会议时更高。庐山会议讲的是路线问题，现在讲的三条‘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仅是路线问题。三、感觉是对着林彪的。因为主席有一句话，就是不同意让老婆当办公室主任，而林彪的老婆是当了办公室主任的。所以，我想，这几条的矛头是对着林彪的。我这样想了以后，有些紧张，把这个问题看得比较严重。”6日从武汉回到北京的下午，李作鹏称，“那天下午要出席招待会，看时间还相隔几十分钟，我就把黄永胜拉在一边，对他谈了。临走时，邱会作钻到我的汽车里，在路上我就大体上把刘丰谈的事情告诉了他。”晚宴结束后，回到西山，黄永胜就打电话报告了叶群。^{【2210】}

李作鹏告诉黄永胜，主席说林彪要把他封为“井冈山王”，主席还说他自己这些年没有抓军队工作，是犯了个大错误。后来李说自己听了刘丰说的话，“当时就吓死了，出冷汗，光抽烟”。

邱会作听后也非常紧张，回到西山家里，对妻子胡敏说：你尽可能别给叶群打电话了，能躲就躲吧。现在打电话嘻嘻哈哈，如有什么事就哭不完了！

黄、吴、李、邱在一起开会，议论即将召开九届三中全会。李作鹏称，这是个大关！黄永胜称，管它什么关，过得去就过，过不去就下放，在军区工作比在

【2209】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刑事判决书，（1982年）刑字第1号，1982年3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军事法院：《审判顾同舟、胡萍、王维国材料汇编》，1982年，页25—26。2002年1月10日，顾同舟在深圳向本书作者承认确有其事。

【2210】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北京：法律出版社，1982年，页112、115-116。



林立衡与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1966年10月1日。

这儿好多了。李作鹏称：下放？你不要忘了‘陈后面还有大人物’那句话！邱会作称：具体是什么样的关，怎样过法，还没听总理说过。

毛的南巡谈话震惊了林彪、叶群、林立果，使林彪、叶群决意外逃，林立果作了刺杀毛和外逃的两手准备。

△ 北戴河—北京：林立衡的回忆

以下林立衡的回忆，引自她于1971年10月26日完成的《对九月十三日事件前后的回忆》。该回忆材料共78页，约2.2万字。在61页至62页之间，有一页没有编号，林立衡在这一页上写道：“主席、中央：送上我对九月十三日事件前后回忆的后一部分。因记忆不清，有些情节可能有出入，请审查。林立衡上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于北京”。周恩来在这一页上亲笔批示：“请王^[2211]印发如前周恩来 1971.11.8”。

【2211】王，指王良恩，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对九月十三日事件前后的回忆》为林立衡最接近事实真相的叙述。即使后来她的立场发生变化，也不敢贸然否认自己当年的叙说。1980年代初，林立衡在写给中纪委并陈云、邓颖超、胡耀邦、黄克诚的材料中称，“为了尊重历史，我们暂不要求退还一九七一年十月至十二月所写的揭发材料的抄件。”

以下【】内宋体字，为本书作者对林立衡有关回忆的缩写，黑体字为林立衡回忆的原文。

【晚上约10点多钟，在北戴河的叶群突然给在北京的林立衡打电话，要她带着男朋友张清林当夜立即去北戴河。】说林彪想见我和张清林。我当时说身体不太好，过几天再去。叶发脾气说：“你这么大的架子，爸爸请你，你都不来。现在他病得快断气了，还没见过张清林。见到你们的事定下来，病就会好了。”

【林立衡只好勉强答应了。后叶同意改为让林立衡第二天上午去。叶群】叫我把林立果的对象张宁及总医院放射科高主任也带去，并问我能否瞒过邱会作的老婆胡敏，还说吴法宪夫妇都不知道我这次去，叫我不要告诉空军。^[2212]

▲ 9月7日

△ 北戴河：林立衡的回忆

【林立衡、张清林、张宁及杨森^[2213]一行于上午10时多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中午11时许抵达海军航空兵第五师管辖的山海关机场。】

【中午12时，林立衡一行到达北戴河林彪住地，被安排住在56楼。林立果住在对面的57楼。去见叶群前，林立果找林立衡谈话，在场的还有周宇驰、刘沛丰。林立果让刘沛丰守着门，然后当着周宇驰的面对林立衡说：】“现在情况很紧急。昨天晚上主任要乘三叉戟飞机逃到苏修去，首长不肯跑，被主任逼得同意了。他们硬要我调飞机，我借口来不及调，推迟了一天，今天早上把周宇驰从北京找来商量怎么办。首长见了周宇驰，抱着他哭，说：‘我们一家老小都交你了。’周宇驰也说有这件事。他说：“过去张云生^[2214]说主任是首长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这次首长可真叫她害苦了”林立果接着又说：“我们过去是盟军，这种时

【2212】林立衡：《对九月十三日事件前后的回忆》，1971年10月26日。

【2213】杨森，随卫林立衡的空军政治部保卫部副处长。

【2214】张云生，1966年8月至1970年10月任林办秘书，1970年11月调陆军第一三八师任副政委。著有回忆录《毛家湾纪实》。

候，我不能忘了你，就让主任把你骗来了。首长、主任都不准把这件事告诉你，这件事只有首长、主任、我和周宇驰知道，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张清林。如果不是我告诉你这件事，你今天坐的三叉戟把你带到苏修了，你还不知道呢！”他冷笑了一声，说：“他们要跑，必须靠我调飞机。上午你坐的飞机还扣在机场，主任不让走，急着下午还要跑，现在就是我下不了这个决心，听听你的意见，到底跑不跑？”

【林立衡听完非常吃惊，问他为什么要逃跑，林立果说：】“因为主任干了很多坏事，怕把她抓起来，在国内呆不下去了”

……

我说：“主任讲的情况准不准确？主任可是一贯造谣的，我们可不能让她牵着鼻子走，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林立果说：“是呀！我也是这样想，我已经再三劝她，她和首长还是非要跑不可，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你要不同意，我就不调飞机，还可以再拖几天。”

【这是林立果第一次告诉林立衡要外逃。随后，林立衡、张清林、张宁见过叶群。接着林立衡把林立果说的情况告诉了张清林、杨森。林立衡说，】我们都很愤慨。

【下午两点多，林立衡、张清林、林立果、张宁一起去见林彪、叶群。时间约十多分钟。】他们表示同意我和张清林的关系，叫我们好好谈，并称赞了张清林和张宁都不错。

【见林、叶后，林立果又把林立衡拉到57楼他房间里单独谈话，周宇驰和刘沛丰在门外守着。林立果更详细地说了他的计划。】

林立果说：“主席最近到南方各地，直接找各大军区头头打招呼，要在‘人大’之前突然开三中全会，在会上要批判‘夫人专政’，并要把军委办事组叶、黄、吴、李、邱都整掉。主席还说事先要绝对保密，瞒过中央。”

……

他接着说：“这次连刘兴元、丁盛、曾思玉都被主席拉过去了，没给我透露消息。还是武汉的刘丰透给李作鹏传出来的，还有广空司令王璞派人送密信给我^{【2215】}。”

【2215】送信的是广空参谋长顾同舟，与司令员王璞无关。

他还说：“江西的程世清也劝我们现在小心点，还说杨栋梁^{【2216】}被江青拉过去了。江青还派人拉五军的陈励耘，可是陈也告诉了我们。”

我说：“这是好事嘛！主任实在太坏了，从庐山会议以来一直还不老实，主席对她也太宽大了。也该把她整掉了，军委办事组这一摊子该垮了。”

他说：“不过叶真的垮了，首长也跑不了。批叶肯定要批到首长身上，所以叶天天吓唬首长，现在首长都听叶的了。他很怕像刘少奇、陈伯达那样坐牢。他说如果不跑，就要自杀！”

……

林立果很火地说：“……主席这样做也够冒险的，这么大年纪，为了搞掉自己树起来的接班人，跑到全国打招呼，也不怕军队起来造反。全世界的政治家都不敢这样干。”

我问：“主席都到过哪些地方？现在主席在哪？”

他说：“到过郑州、广州、武汉、江西等地，现在在上海、杭州一带。”

我接着问：“你怎么知道主席的行动？”

他说：“主席所有的情况，我都能掌握。主席身边也有我的人。”

我问：“什么人？”

他说：“那你就别管了！”

我又问：“黄、吴、李、邱现在怎样？”

他说：“他们当然是主任的人，他们都是草包，现在一个个急的在家里哭！黄说他要被整成郑维山了，成天抱着孙子哭。庐山会议时，他们不听我的，手太软了，让江青、康生和那帮秀才翻了过来。”

……

我问：“总理是什么态度？”

他说：“总理一贯和稀泥，这次也来告急，说：‘现在要保副呀！就怕保不住了。’”

……

我说：“他们真的跑到苏修，去干什么呢？”他说：“吃洋面包，像王明那样当寓公，反正是坐牢好。像刘少奇那样，只是有点感冒，谁也

【2216】应为杨栋梁，时任江西省军区司令员，中共江西省委书记。

不管就病死了。首长身体这么弱，没有现在这个条件，关在监狱里能活几天？就连我们也会像刘少奇、贺龙、罗瑞卿的孩子一样关在监牢里。”

……

我说：“你怎么能用飞机劫狱，到时候部队还会听你的？”

他说：“我是空军的作战部长，这点办法还没有！现在不只是空军听我的，陆军也掌握了不少。广州、武汉、成都、福建大军区都可掌握，像四十三军、五十五军，都是我的人，北京军区也掌握一些，不过三十八军不可靠了，被李敏拉过去了。^{【2217】}现在军、师级干部都很乱，很多人都恨主席，说主席利用完了军队，现在就重用文人，猛整军队干部、任人唯亲，连王海容都掌握了外交部的实权。历史上都是这样，到太平局面时就杀功臣，怕军人有野心再篡权。中国现在的政体是世界上最封建的，搞的是专制集权。不像外国还有个竞选。现在主席活着，谁也不敢讲话，主席一不在，谁讲话也不管用了。中国是个大国，有野心的人很多，都想抢位，将来肯定要打内战。主席把中国这个大国搞成这个样子，钢铁还没有日本多。主席忽左忽右，一贯好政治冒险，五八年搞大跃进惨败，文化大革命也是冒险，全国大武斗，不是靠了军队，差点亡国。现在又和美国拉关系，基辛格小流氓来中国，主席还要见他，在国际上丢尽中国的脸。”

……

他说：“我一跑，我那些精锐力量就要损失大部，我也不甘心，我是主张不跑的，先看一看再说，可以先离开这个地方。”……他说：“北戴河这里没我可靠的部队，很不保险。广州都是四野的部队，都会保护首长的，汕头有五十五军，军长我掌握了。^{【2218】}还有空十二军是我的人，和五十五军配合得很好。以汕头为基地，看形势不行了，还随时可以从香港跑。”

我问：“真的要跑，能跑成吗？你调飞机能瞒过吴？”

他说：“这个我有把握，今天飞机来，吴就不知道，是胡萍调来的。三十四师我能控制住。周宇驰和刘沛丰都会开飞机，我也会开。三叉戟从这里起飞只要四十分钟，就能到苏修。我已派人到苏修联系。我有

【2217】林立果此说法可能是因李敏的丈夫孔令华当时在三十八军一一三师任职。

【2218】林立果此说法是夸大其辞。五十五军军长当时是杨绍良。杨1972年9月被免职审查。1976年1月降任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

三万美金存在外国。我已计划好航线，沿线都没有高炮和雷达。如果有战斗机追击也不怕，空军司令部有我的人，只要稍微按住一下战斗机起飞时间，就放我过去了。”……

他说：“……我们如果不跑，最好的结果就是像苏修那样，形成三驾马车的局面：就是江青、总理和我们。”……他说：“……我就借口和苏修联系不上，要等几天。再去说服首长、主任不跑了。你也好好想一想，关键时候，咱们可要合作。实在要跑，你也得走！”我说：“那当然。”……他说：“……黄、吴、李、邱这些人也不知道，这下可叫主任坑苦了。”

【这是林立果第二次告诉林立衡逃跑的计划。这次谈话直到下午17点多，林立衡才回到她住的56楼。晚饭时节，林立果又找到林立衡说：】“我们研究决定今天不跑了。现在主任老缠住我闹，我先说服首长不跑，叫首长对主任保密，然后再说服她。跑不跑，这一个礼拜是关键，再晚就怕跑不成了。今天晚上送情报的也不来，真急人。”

【当日下午，周宇驰自己驾驶直升机从北戴河飞回北京。】^[2219]

△ 北戴河：刘吉纯的回忆

1971年夏天，我随同林彪、叶群及“林办”工作人员从北京到北戴河驻地。我的任务同往常一样，是协同八三四一部队做好林、叶的安全保卫工作。

9月7日上午，林立果、林立衡等从北京飞往北戴河，^[2220]是我派车去山海关机场接的。午饭后，我刚休息，^[2221]八三四一部队二大队长姜作寿来到房间，对我说，张清林（林立衡的未婚夫）和杨森（空军保卫部副处长、林立衡随从人员）有事找你。我随他到大队值班室，张、杨两人已在那里等我。我问有什么事，他们说，不知豆豆（林立衡）被老虎（林立果）弄到哪里去了，你快去把主任（叶群）、老虎抓起来。听了这没头没脑的话，我大吃一惊：什么事这么严重，况且我怎么敢抓他们。我说，先别着急，去看看再说。我立即赶到林立果住处外面，看到他的车停在那里。我到96楼找李文普（林彪随身警卫员），他是“林办”在北戴河的负责人。我向他报告了张、杨讲的情

【2219】《对九月十三日事件前后的回忆》。

【2220】刘吉纯此处记忆有误，林立果此前已在北戴河，并不是此时才飞来的。

【2221】刘此处时间上亦有误，据林立衡回忆，林立果第二次找她谈话是在下午两点多以后。

况。^{【2222】}他说，你不要听他们的，没有那么回事。回到房间，我翻来覆去地想，到底出了什么事。由于事关重大，也不敢同别人讲。

晚上，林立衡要我到她那里去，问我，他们（张、杨）对你说了些什么？我把张、杨讲的情况告诉了她。她问，你和别人说了没有？我没敢说和李文普讲过。我问，到底出了什么事？她说，主任、老虎在外面做了坏事，被上边知道了。他们怕挨整，在北京待不住了，想挟持首长（林彪）到外地去。我说，怎么办，是否去报告？她问，向谁报告？我说，只有向汪东兴、张耀祠、杨德中报告。她说，汪在庐山也受到了批评，现在对谁都不要讲。首长国庆节还要上天安门。现在离国庆节还有二十多天，等几天再说吧。当时我同她商定，她在里面、我在外面观察动静。^{【2223】}

二、林立果：“我们又决定了一个新的方案”

要点：9月8日下午，林立果对其姐说：“我们又决定了一个新的方案：现在主席在上海一带，在我们四军手里，只要我批准，江腾蛟就动手暗杀主席！王维国也要参加干。”“现在就这两条路，要么逃跑，要么搞政变。或者两个方案同时进行，如果政变失败，就逃跑；如果政变成功，就再飞回来。”

▲ 9月8日

△ 北戴河：林立衡的回忆

【上午，林立衡问李文普北戴河的情况。】他说：“主任这两天很紧张，睡觉很少，她和立果老去首长那里，不知说什么事。”

【下午，林立果又告诉她：】“首长已同意不跑了，我现在还要上去说服主任。我们又决定了一个新的方案：现在主席在上海一带，在我们四军手里，只要我批准，江腾蛟就动手暗杀主席！王维国也要参加干。”

【林立衡吓了一跳，说：】“江腾蛟不怕死吗？”

他说：“江腾蛟对主席有仇。他自己已得了癌症，反正活不了几天了。”

……

我说：“主席威望这么高，你可万万不能干这种事，这会在全世界遭到反对！”

【2222】李文普的回忆无此记载。

【2223】刘吉纯口述、丁丑整理：《难忘的“九一三”前夜——一个警卫人员的回忆》，《历史学家茶座》第1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页74-77。

他说：“那没关系。暗杀后就借主席名义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地点未定，也可能在北京毛家湾内。把我的敢死队埋伏在里边，把中央首长一个个骗来，不听我的就干掉。把江青、毛远新、张春桥、姚文元都扣起来，然后说是张、姚暗害主席。反正那时我们掌权，专案组都是我们的人，案件永远也搞不清。”

他还很得意地说：“这个方案是最理想的，那时，我就掌权了。”

我说：“这个方案失败呢？”

他说：“那我们就逃到苏修去。”

我说：“这两条路都不能走。你干这种事，就算你夺了政权，也掌握不住。谁相信你一个小孩。跟你干的人都有野心，还会用同样的手段干掉你。……”

他说：“是呀！我也不敢保险。但什么事都得冒险。现在就这么两条路，要么逃跑，要么搞政变。或者两个方案同时进行，如果政变失败，就逃跑；如果政变成功，就再飞回来。你说，难道还能有第三条路？”

……

我说：“九月二号，你回北京一天，一字未听你谈过这些事，怎么这么几天，形势变化就这么大？你是什么时候有这些想法的？”

他说：“就是这两天，得到主席要秘密开会的情况，我才准备行动的。”

我说：“主席要整掉首长，那‘十·一’怎么上天安门呢？主席总不能一个人上天安门吧？你们要政变，‘十·一’又怎么上天安门？我看闹来闹去，最后，都还得上天安门！”

他说：“是呀！我看也是这样。‘十·一’前谁政变都掌不住政权，‘十·一’后会有一场大乱。”

我问：“首长也知道暗杀主席吗？”

他迟疑了一下说：“他也同意。”

【在林立果临去机场前，又来单独给林立衡说：】“已说服主任了。我现在马上就走。情况有变化，主席已离开了，原来的行动计划都要改变。我们准备在‘十·一’后行动。就看主席整我们到哪一步，他要是老实点，我们就不升级。不过迟早总有一场斗的。”

【当晚，林立果乘飞机回到北京。】^[2224]

△ 北戴河：刘吉纯的回忆

9月8日，林立果、刘沛丰离开北戴河。^[2225]

▲ 9月9日

△ 北戴河：林立衡的回忆

【上午，叶群、林彪对林立衡说：立果回北京了，要她不要走，过几天要带他们去大连。林立衡出来后向小陈询问林彪身体状况】小陈说：“首长前些日子闹身体不好，这几天不知有什么大事，和主任、立果谈得很多，精神倒好了。”

【林立衡找李文普问林立果和林、叶谈些什么？】李说：不清楚，反正有大事。听叶在林那里哭过。叶对李说桂林有人写信告林立果的八小时报告；还有人对林立果抓飞行安全的事有反映；这次林立果回北京是堵漏洞的。林立果对李说叶还是庐山会议的问题，要继续受批判。【林立衡要李注意，防止主任和立果出事】他说：现在没有什么大的反常现象，要出事总是有迹象的，叫我放心。^[2226]

△ 北戴河：李文普的回忆

9日，北戴河96楼比较平静。海里有人游泳，山上警卫森严，“林办”的人却像平常一样各忙各的。^[2227]

▲ 9月10日

△ 北戴河：林立衡的回忆

【上午，张清林、张宁到秦皇岛山海关游玩。林立衡因身体不好没有去。林彪找她谈话，说要一起去大连，时间要等林立果回来后再定。林立衡从林彪处出来后，即找林彪内勤公务员陈占照、张恒昌谈话。】他们说：“好像要出大事。首长和主任、立果谈话很秘密，我们也不敢去听，只听到主任哭的声音。”【林立衡说：万一叶群、林立果要害首长，

【2224】《对九月十三日事件前后的回忆》。

【2225】《难忘的“九一三”前夜——一个警卫人员的回忆》。

【2226】《对九月十三日事件前后的回忆》。李文普的回忆中没有这一天与林立衡对话的内容。

【2227】《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

你们要保卫首长。根据我掌握的情况，他们可能要逃跑。他们真要跑时，给我通个消息，我通知 8341 部队。陈、张满口答允。】^{【2228】}

△ 北戴河：刘吉纯的回忆

9月10日，我和林立衡碰了一次头，两人都未发现新的情况，只听说准备去大连。^{【2229】}

三、江腾蛟：“一炸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要点：9月8日晚，林立果从北戴河回到北京。惟其主要活动集中在9月11日。当日下午，林立果找江腾蛟、王飞及关光烈策划刺杀毛和攻打钓鱼台事。王飞后来作供称，“林立果提出就在上海搞，如果主席住在机场就用四〇火箭筒配合火焰喷射器干，住在市里就叫几个人用手枪干，不出车站就在车站里干。江同意在机场和市里两个方案，并说，一炸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 9月11日

△ 北京：林立果的活动

1980年11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称，“（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至十一日，林立果、周宇驰先后在空军学院和西郊机场的秘密据点，分别向刘沛丰、江腾蛟、王飞、李伟信和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鲁珉、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刘世英、秘书程洪珍、陆军第一二七师政治委员关光烈等传达林彪的武装政变手令，具体策划部署杀害毛泽东主席，并指派江腾蛟为上海地区第一线指挥，密谋用火焰喷射器、四〇火箭筒打毛泽东主席乘坐的火车；用炸药炸苏州附近的硕放铁路桥；派飞机炸火车；炸毁专列在上海停车点附近的油库，乘混乱之机杀害毛泽东主席；或由王维国乘毛泽东主席接见时动手。”^{【2230】}

1980年11月26日下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问江腾蛟部分记录如下：

法庭宣读王飞一九七二年一月四日的证词（节录）。宣读后，审判员高斌问江腾蛟：“九月十一日下午，你和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又进行过哪些阴谋活动？”江腾蛟答：“九月十一日下午继续在老地方，在西郊机场平房，除了林立果、

【2228】《对九月十三日事件前后的回忆》。

【2229】《难忘的“九一三”前夜——一个警卫人员的回忆》。

【2230】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特检字第一号，1980年11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页32。2003年7月10日，关光烈在洛阳向本书作者承认确有其事。

周宇驰、王飞、我、于新野，增加了关光烈，主要是研究从关光烈那个部队里面调火焰喷射连到上海去，和调动部队到北京来协助王飞攻打钓鱼台的问题。”……问：“林立果和关光烈讲过火焰喷射器、四〇火箭筒的问题没有？”答：“他把关光烈介绍给大家以后，马上直截了当地对关光烈讲了两个问题。第一，说你们那个师的火焰喷射连调到上海，交给他指挥，指交给我指挥。”审判员任成宏问：“你明白不明白干什么？”答：“我当然明白，那是打主席的火车嘛……第二条，说你们调个营到北京来，协助王飞率领空直警卫营攻打钓鱼台。”法庭宣读关光烈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供词。宣读后，审判员高斌问江腾蛟：“什么时候研究过炸硕放铁路桥？”江腾蛟答：“那就是九号上午研究的”。问：“以后研究过没有？”答：“以后那是十一号晚上，派鲁珉去执行那个任务。”法庭宣读王飞一九七二年一月四日的供词（节录）：“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下午，林立果、周宇驰找江腾蛟和我，以及关光烈，进一步策划谋害毛主席和攻打钓鱼台。……林立果提出就在上海搞，如果主席住在机场就用四〇火箭筒配合火焰喷射器干，住在市里就叫几个人用手枪干，不出车站就在车站里干。江同意在机场和市里两个方案，并说，一炸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宣读后，审判员高斌问江腾蛟：“九月十一日晚饭后，你和鲁珉到过什么地方？干什么？”答：“晚饭以后到西郊机场，也是那个平房子，那次是林立果、周宇驰二个，加上鲁珉、我，四个人，那次主要是叫鲁珉到硕放去指挥谋害毛主席的行动。”问：“林立果当时怎么讲的？”答：“……说以检查为名，到那里去，借口说有些坏人坐着主席的火车到处搞阴谋活动，对硕放就这么讲。”^{【2231】}

据“鲁珉的亲笔供词”称：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晚约八点半钟，我被江腾蛟用汽车拉到西郊机场的平房里，林立果看到我就说：现在要进攻啦，付统帅有命令，拿出来给他们看看，周宇驰就拿一张硬白纸林立果递给了我，我看到是用红铅笔写的：盼照立果宇驰同志的命令办 林彪 月 日。林立果说：现在情况很紧张，马上就要召开三中全会，会一开林付主席就不占优势了，付统帅下了命令，要主动进攻，江腾蛟你这个歼一七在上海打头阵，争取在上海搞掉（指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成就看鲁部长的第二次攻击了，有的是炸药，在铁路上一放，就

【2231】第二审判庭开庭审问江腾蛟记录，1980年11月26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页125-128。

是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再不成就让陈励耘派依尔-10轰炸。九月十二日晚我参加了王飞召集的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七人黑会。

林彪一伙要我去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不肯去干，我就有意把眼睛搞红肿了，第二天住进了医院。九月十四日我主动向党中央投案，交待了自己的罪行，并揭发了林彪一伙的阴谋。

鲁珉 1971年9月18日^[2232]

△北戴河：林立衡的回忆

【上午，林立衡找内勤陈占照，要他偷听林彪和叶群的谈话。陈说：】“我在走廊听过主任哭时说：‘现在人家说我是特务，我要逃走’。首长说：‘我有什么办法，你走就走吧！’我们不敢进卧室偷听。被抓住不得了。”【林立衡要他们望风，掩护她去偷听】

【中午，叶群找林立衡，谈结婚的事情，还要林立衡去见了林彪。晚上，林立衡找李文普打听林彪、叶群情况。李说：】林讲这次坐飞机要看地形，在空中转两三个小时，人不要带的太多；叶说这次和过去一样，到大连不带秀才，部队少去一个中队；叶和林立果、黄永胜通电话很多，一般不经过秘书。打电话在最里屋，把门加了门，还问过李，警卫员在外面能否听到。

【林立衡问李：叶群和林立果会不会跑？】他说：“现在没有什么迹象，真有事，我们都会在飞机上跟他们拼！我也在观察这些事，有事我负责。部队我和刘吉纯都可掌握。”^[2233]

△北戴河：李文普的回忆

11日上午11点左右，叶群叫我给毛家湾打电话要家里把副军以上干部名册和全军部队部署情况登记表拿来，说：“首长要准备研究一下战备问题。”这一天，叶群试探性地向我讲了一下想去广州。我当时回答说，“现在天气这样热，去广州干什么？”叶群没有深说。^[2234]

【2232】鲁珉的亲笔供词影印件原文，中发[1972]24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1972年7月3日印发，《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页64。

【2233】《对九月十三日事件前后的回忆》。李文普的回忆中没有这一天与林立衡对话的内容。

【2234】《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

第九十九节 “九一三事件” 过程述略（二）

四、林立衡：“那你报告北京吧！”

要点：9月12日晚十时半左右，林立衡向中央警卫团在北戴河的副团长张宏和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报告了情况。并问道：“是不是先不要报告北京？张耀祠、汪东兴是否可靠？”张回答：“我和他们二十多年，他们都是忠于毛主席的。”林立衡称：“那你报告北京吧！……”

▲ 9月12日

△ 北戴河：林立衡的回忆

【上午，林立衡找陈占照、张恒昌摸情况。陈、张说：】这两天林、叶谈的很少，林的行李都未收拾，也没从北京要什么东西，也没听林再说要走。前几天说过坐飞机时，人不要太多，怕飞机的空气不好。

【15时多，叶群突然叫林立衡、张清林去见林彪。叶群提出要他们当天晚上就结婚，林彪也表示赞成。林立衡没有思想准备，表示坚决反对，遂改为订婚仪式。晚饭后，在96楼走廊放映香港电影《甜甜蜜蜜》，后又加放了《假少爷》。林立衡、张清林、张宁等和工作人员看电影。】

【20时许，叶群又去林彪处谈话。林立衡从看电影处出来，偷听林、叶谈话。听到叶群说：“许世友也是那边的啦，……主席在世界上威望也不高……。”没有听到林彪的声音。】

【21时许，林立果、刘沛丰从山海关机场来到北戴河，就紧张地跑到林彪处与林彪、叶群密谈。林立果、叶群从林彪处来回进出多次。】

我回来，在走廊上碰到林立果，他对我说：“明天早上六点行动！”我问他：“到哪去？”他说：“以后再跟你说，我马上到首长那去！”我就回来看电影。

小张来找我：“我听到主任说：‘就是到香港也行呀！’立果说：‘到这时候，你还不都交给我！’没听见首长的声音。”

【林立衡随即把李文普找到厕所里说：“他们要逃到苏修去，你赶快报告部队。”让李阻止林彪上飞机。李文普不相信她的话，说首长是去大连，他没有理由不让首长上飞机，不同意报告部队。林立衡又找刘吉纯，说服他一起去8341部队报告。】

这时约十点半之前，刘吉纯就扶我从小路摸黑跑到58楼对面的树林里。我一个人在树林里等，刘到58楼找来江大队长^[2235]。我把情况简单报告给江，并请江找张副团长^[2236]来，请刘还到96楼去。

等张副团长和于副大队长来后，我又向他们报告了情况。并说：“是不是先不要报告北京？张耀慈^[2237]、汪东兴是否可靠？”张说：“我和他们二十多年，他们都是忠于毛主席的。”我说：“那你报告北京吧！不过现在情况很紧急，光等北京指示就来不及了。你们要随时准备指挥部队，独立战斗！”我又说：“现在关键是上不上飞机。李文普说上了飞机再干；我看不能上，上了飞机搞不清到哪；怎么能干？我是提着脑袋来报告的，你们相信不相信我？”

张说：“你放心，我们相信你！我们研究一下，你先回去吧。”

我到56号楼找到杨森，叫他到部队找辆车，我们一起上96号楼。这时还不到十一点。我又去看电影，并叫杨森掌握一辆车，随时在外面等着。

我把情况告诉了张清林。张说，叶和林立果在放电影的走廊里穿来穿去。林立果还几次送礼物给张，并问我到哪去了。张按照我们预先约定的说法，回答：“找钢笔去了，拿夜餐去了。”

接着，叶的卫生员小王来，说叶找我，我就对张说：“你还是不要动，稳住敌人。要是我出不来了，你就和老杨跑到部队去！”

我到叶的房间里，看见叶在整理卡片，刘沛丰坐在叶旁边，两眼通红，瞪着我。我叫了叶几声，她才抬起头，冷冷地说：“明天早上带你们到大连去，首长飞机上还要看看地形。你告诉张宁、张清林收拾一下。我们过几天还回来，杨森不去了，留在北戴河看东西。”我问：“明天早上几点走？”叶很凶地说：“你还管那么多！我也不知道几点走！你们早点睡觉，明天我派人来叫你们。你去吧！”我即出来，通知张宁等。张宁问林立果送给她的大蛋糕带不带？我说：“随你自己吧！”

接着小张突然来找我，说：“他们现在就要走！”

我赶快找李文普。他正在打电话。他说：“首长现在就要走，不叫刘吉纯先去了。给大连电话也打不通！”我说：“你现在还打什么电话！要赶

【2235】应为姜大队长，指中央警卫团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下同。

【2236】指当时在北戴河负责警卫工作的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宏，下同。

【2237】应为张耀祠，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警卫处副处长，中央警卫团团长，下同。

快拖住他们上飞机的时间，就说今天太晚不能走。还可以叫张副团长上来劝一下。”他说：“现在还是要上飞机，不行再拼！”

当时刘吉纯也在旁，宋德金在屋外，我怕宋听见，就说：“咱们换个地方”，刘说宋已知道这件事，没关系。我就问：“你们带枪没有？”刘说带了，李没带。我说：“到这时候，你们连枪都不带，还怎么拼！”李赶快带枪。我说：“我去叫部队拦！”

我出来正碰上林立果，我问：“怎么样？”他说：“现在就走。到广州去！军阀割据！”边说边往林那跑去。

我又找到正在看电影的李春生，说林、叶今晚要逃跑，叫他注意点。随即又告诉了张清林和杨森，叫杨在门口把住车子。

第二个影片《假少爷》快要演完时，叶突然叫停演，对我们说：“今天晚上就到大连去。你们马上回去准备。杨森留下来看东西。”说完她慌张地来回走动。我故意问：“张宁的蛋糕还没吃，带不带？”叶发火地说：“现在这时候还带什么蛋糕！你们快走吧！”说完，推了我一把，她就走了。

我出来，看到江大队长已守在门口。我和他握手示意。就和张清林、杨森、张宁四人乘车到56楼。

我叫张清林留在56楼，应付林立果来找我。然后我和杨森跑到58楼。找不到一个干部，这时约十一点半，我叫杨森马上把张副团长找来。我对张说：“他们现在就要跑！”张给李文普打电话，我对张说：“你告诉李文普，我已到部队！”张打完电话，我问他说了没有，他说没有。我急着说：“你们赶快上去拦住！别让他们跑了！快把57楼和96楼包围起来。”

张说：“我哪来的兵！”

我说：“十点多不是就通知你们了吗？”

他说：“我哪来得及调！我们已经报告北京，你不要在这里指挥！”我急得喊起来：“到这个时候，你们还这样，要误大事！党和国家你们都不管啦！”这时张清林也跑来了，告诉有人打电话到56楼找我。他也急得对张副团长说：“他们很快就要跑！在这关键时刻，我们都要忠于毛主席！如果你把他们放跑了，就是犯罪！”

张副团长不吭气，又和北京通电话，然后说：“北京指示你们还是跟着一块上飞机，飞机上有我们的人，你们放心好了。”

我气得坐来说：“我死也不走了，要走你们跟着走吧！”杨森也说：“不能上飞机，上飞机就跟着跑了！黑呼呼的，你知道飞到哪！”

张副团长又和北京张耀慈同志通电话，我把电话抢过来，说：“我是豆豆，他们马上要跑，千万不能让他们跑！”

张耀慈说：“你们还是跟着走，不要惊动他们。”

我哭着说：“不能让他们上飞机，飞机上有敢死队，拼不过的！他们还要暗杀主席！你可要保卫主席的安全呀！求求你！我死也不能跟着走，你们快点拦住他们！”他说：“那好，我马上报告。你叫部队赶快拦！”

正说着，战士报告一辆卧车开走了！我又报告了张耀慈，他叫查一下是什么车，我把电话转给张副团长。这时，小张从96楼打来电话说：“首长、主任、立果、刘沛丰和李文普都坐老杨开的车走了。”

突然，几声枪响，张副团长慌忙跑出去。我叫参谋要电话找张耀慈，我报告了小张讲的情况，和枪响的事，请张耀慈赶快派部队包围秦皇岛机场和东山的据点，从反方向派部队阻截林、叶的汽车。

张副团长回来，给北京报告了情况。对我说：“现在车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我马上追去！”就气喘呼呼地带上枪走了。

这时，李文普已到58楼，我看到他胳膊上打了个洞，张清林和部队医生正在包扎。我叫杨森告诉部队派人把李送到医院去。我出来看到战士都在喊，就叫杨森指挥部队，杨说已叫战士扔掉背包，赶快上车追。我已告诉部队派些人到东山和空疗去。

我又给张耀慈报告了情况，并问机场是否包围了？他说总理现在直接掌握情况，他不清楚。他叫派人把96楼看起来。^{【2238】}

△ 北戴河：刘吉纯的回忆

9月12日，午饭后，叶群叫我去。我到她办公室时，李文普已在那里。叶群问我，现在部队情况怎样？我说，很好。她说，没什么，随便问问。我见她一脸严肃地看着我，我说，没有事，我可以走了吗？她点点头，我就回去了。当时我很纳闷，她为什么忽然问起部队情况，是否对部队不放心？下午，叶群吩咐工作人员为林立衡、张清林操办订婚活动，并放风说要去做去大连的准备。晚饭后，我们在院里纳凉，忽然听到空中有一架大飞机飞往山海关方

【2238】《对九月十三日事件前后的回忆》。

向。这时，叶群打来电话说，老虎专程从北京来这里祝贺豆豆和张清林订婚，你快去机场接他。出来后，我很生气，飞机都该降落了才让派车去接。我只好找司机驾一辆“吉姆”同去机场。过秦皇岛不远，看到前方有车过来，我叫司机把车停靠在路中间。这时对面的车也开过来了，里面正是林立果和刘沛丰。我说，主任叫我来接你们，因为通知晚了，所以才到这里。林立果什么话都没说，与刘沛丰各提一个小箱子，改驾“吉姆”车走了。我同司机上了他们从机场借来的吉普车返回驻地。

回到驻地后，我一直没有见到林立果，怀疑他来北戴河一定有别的事情，不像是为林立衡订婚而来。我见到李文普，问，怎么看不到老虎，他的房子准备好了没有？我和李文普一同看过林立果的房间之后，回到96楼院子里。我见李文普不说话，便说，我觉得老虎回来有点不对劲，是不是要出事呀？李文普说，等上飞机后再说。我说，上了飞机可就晚了，工作人员中就咱俩有枪，是不是从部队挑选几个人上去？他没表态。

过了一会儿，叶群给秘书办公室打来电话，是李秘书接的，她派我去大连看房子。我问，怎么去？叶群说，坐火车去。我说，夜里没有开往大连的火车。叶群改口说，机场不是有架小飞机吗？我想了一下，说我不想去。她说不去就算了。当时我感到很蹊跷，因为夜间乘火车去大连，第二天晚上才能到达，而他们第二天上午乘飞机，一个小时就可以到大连了。况且，大连的房子，林彪多次住过，不用做什么准备，先给那边打个电话就行了。我想，叶群是否要把我支走？

当晚10点半左右，林立衡对我和李文普说，主任、老虎要挟持首长到广州去，在广州呆不住就去香港。她想要报告去，李文普说怕林、叶找他，他不去。我见李文普不去，便和林立衡一起去部队值班室。那时部队干部战士早已休息，我把林立衡带到小树林里，然后找到姜作寿大队长和陆军医，说林立衡有重要情况向中央报告。我把姜作寿领到小树林后，说，你们谈吧，我过去看看动静。并嘱咐姜作寿，为了林立衡的安全，就不要让她回去了，在队部会安全些。我回到96楼后，心情十分紧张，但因事关重大，又不敢对别人讲，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我对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情况一无所知，只看到陈伯达不参加会议，觉得他可能出了问题，至于别的情况，就不清楚了。

11点多钟，听到叶群在走廊上大喊，快走快走！我以为是去大连，就跑到秘书办公室，让宋秘书给大连打电话。他刚拨通，把话机交给我，恰好林立果进来，问我给哪里打电话？我说大连，他立即按断话机。这时，

八三四一部队张宏副团长打电话给李文普，询问情况。林立果又把电话按断，并大声喊：“谁都不要打电话，也不准接电话！”接着，他拉李文普出去，李文普立即叫司机杨振刚备车。我跑到大队部，让姜作寿赶快派人去机场，先把飞机看住，别让起飞。他们本想派一名区队长带人去，我说不行，要让于仁堂副大队长去。等去机场人员上车后，我回到96楼。刚到楼前，看到林彪的车已经开了出来。由于没有看见叶群的车，我到秘书办公室，让李秘书看叶群的车走了没有。他看过后，说还没有走。就在这时，林彪内勤张恒昌跑来说，他们都坐一辆车跑了。我看到院子里停着一辆“伏尔加”车，就跟宋秘书、李秘书和小张一同上去。考虑到四个人中就我一个人有枪，又拉一个有自动步枪的战士，直奔山海关机场。^{【2239】}

五、周恩来：“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

要点：9月12日晚十一时半，周恩来打电话给叶群，劝叶群不要晚上飞行，不安全。最后，周称：“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周恩来转而告诉李作鹏，256号专机要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人同意才能起飞。周恩来以为这样，已是万无一失啦。

△ 北京：汪东兴的回忆

晚上9点20分左右，^{【2240】}张宏、姜作寿听到林立衡的报告，姜作寿立即打电话将情况报告给在北京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2241】}张耀祠立即赶到我的办公室，说：“情况很紧急，林彪要走动，怎么办？”我马上打电话找周总理。周总理当时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主持讨论将在四届全国人大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

我将林立衡报告的情况向周总理报告后，周总理问我：“报告可靠吗？”

我回答说：“可靠。”

周总理对我说：“你马上打电话通知张宏，如果有新的情况，立即报告。”

我和张耀祠都守在我的办公室的电话机旁。过一会儿，张宏又来电话报告说：林立衡还报告，她听接林立果的汽车司机讲，林立果是乘专机从北京来的，这架专机现在就停在山海关机场。由于林立衡的报告，我们掌握了林

【2239】《难忘的“九一三”前夜——一个警卫人员的回忆》。

【2240】据林立衡回忆，她的报告时间为晚上“约九点半之前”。刘吉纯回忆称林立衡“想要报告去”的时间是“当晚10点半左右。”

【2241】中央警卫局于1969年中已改称警卫处，张当时职务应为中央警卫处副处长。

立果是乘专机去北戴河，山海关停有专机的重要情况。我马上又将这个情况报告给周总理。

这时，周总理听了这些情况后，已经不能继续主持开会了，他也紧张起来。他安排其他人继续开会，自己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的一间小房子里处理北戴河方面的问题。他打电话给我，要我不离开电话机，随时掌握北戴河那边的情况。我说，不会离开，我就在电话机旁边等着。周总理接着打电话把在大会堂参加《政府工作报告》稿讨论会的吴法宪从会场上找出来，问他知不知道有一架飞机从北京飞到北戴河去了。吴法宪回答说不知道，并说他要问一问空军调度室。周总理要求吴法宪立即去问。吴法宪就到另一个房间去打电话了。周总理这时又打电话给我，让我立即转告北戴河的张宏，让他查一查，山海关是不是有一架专机，如果有什么新情况，马上向他报告。张宏很快答复说，他已问过山海关机场，确实有一架专机，专机的机组人员正在休息，这个机场归海军管理。

晚上 11 点半钟，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叶群。

周总理问叶群说：“林副主席好不好呀？”

叶群说：“林副主席很好。”

周总理问叶群知不知道北戴河有专机，叶群说她不知道。

叶群稍微顿了一下后，又改口对周总理说：“有，有架专机，是我儿子坐着来的。是他父亲说，如果明天天气好的话，他要上天转一转。”

周总理在电话里又问叶群：“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

叶群回答周总理说：“原来想去大连，这里的天气有些冷了。”

周总理说：“晚上飞行不安全。”

叶群说：“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

周总理又说：“别飞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

接着，周总理还说：“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

周总理提出要去北戴河，这一下子叶群警觉了，她慌了。周总理要是一来，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的阴谋也就搞不成了。叶群劝周总理不要到北戴河来，对周总理说：“你到北戴河来，林彪就紧张，林彪会更不安。总之，总理不要来。”

这些情况、对话，是周总理后来告诉我的。周总理后来对我说，他确实打算去北戴河，已经让杨德中准备飞机了。

这时，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我在中南海的南楼，他和我都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周总理派李德生到空军司令部作战值班室去协助他临时负责指挥，还派杨德中陪吴法宪去了西郊机场。

林彪听了叶群的汇报，得知周总理要来北戴河。他说：“我也不休息了，今晚反正睡不着觉了。你们赶快准备东西，我们马上走。”此时，叶群更加惊慌，她也说：“越快越好。”

林彪要走的命令一下，62号楼的人忙开了，慌了，都不知为什么要走得这样快。林彪的汽车马上调到了他的住房门口。林彪快要上车时，叶群派人找过林立衡。^[2242]

△ 北京：李作鹏的回忆

这一天很安静，没有别的事情打扰。既到颐和园散了心，又把“自留地”的事处理完。心里很高兴。老伴进我的办公室说：“既然事情都办完了，就早点休息吧。”她一边帮我收拾文件，一边与我闲谈。

此时，刘秘书进来说：“总理秘书来电话说，总理要找首长讲话。”我听后又说：“立即转过来。”刘秘书拿起我办公桌上的军委一号台电话说：“请把总理电话接过来。”

……

在电话中，总理向我做了四点指示，按照通常接受上级指示的习惯，也为了让我老伴能够记录准确，总理每说一句，我都要按原话复述一遍：

第一、北戴河那位（我一听就明白是指林彪）可能要动，要飞夜航，夜航很不安全，不宜飞夜航。

第二、他要飞夜航，你就告诉山海关机场，待他到达机场后请他给我来个电话。

第三、空军那架飞机的行动，要听北京我的指示、黄总长的指示、吴副总长的指示和你的指示才能放飞。

第四、我已告诉吴法宪到西郊机场去了，作必要准备。

总理指示完毕后，我示意要过老伴做的记录，再次向总理复述了他的四条指示。在复述时，将第一条指示的“北戴河那位”改为了“林副主席”。总理在电话中听完我的复述说：“那就这样吧。”此时大约是23点30分左右。

……

【2242】《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页203-207。

接完总理的电话，当时给我的第一感觉是，林彪可能要回北京，但总理出于安全考虑，不同意林彪飞夜航。

23点35分，我要通了山海关机场调度室电话，随即将总理指的前三条（因为第四条与机场无关）向调度室值班员做了传达。同时，我在此次与机场调度室值班员的通话中，对总理的第三条指示，又补充说：“四个首长中，其中任何一个首长指示均可放飞”。这是我当时对总理电话指示精神的理解：其一，除周、黄吴、李的指示外，其它人的指示不可放飞；其二，难道周总理一人，或黄总长一人决定放飞也不行吗？

我要求值班员复述了一遍总理的指示。

23点45分左右，周总理又打电话问我三叉戟飞机号码，我又立即打电话询问机场调度室，机场值班员开始报告为256号，我将飞机号码报告了总理，几分钟后，机场调度室又来电话更正为252号，我又将更正后的情况再次报告了总理。此时大约是23点55分左右。

在9月12日23点之后的约一小时中，周总理（包括总理办公室）给我打了两次电话，我回总理四次电话。同时，我给山海关机场场站航行调度室值班员打了三次电话，机场调度室值班员给我回了一次电话。

通完电话后，我对照总理的电话指示，又仔细地想了想与机场通话的情况。我感到，在传达总理的第三条指示时，我曾补充说：“四个首长中，其中任何一个首长指示均可放飞”的话不够准确。当时我考虑，虽然周总理一人，或黄总长一人完全可以决定是否放飞，但又想到总理电话指示的第四点，吴法宪已受命到达西郊机场，空军直接领导的中央首长专机师和指挥系统都在西郊机场，而且山海关机场那架飞机是属于空军专机师的，机组人员也是空军的，如果吴法宪不知道总理“夜航很不安全，不宜飞夜航”的指示，他可以随时直接调动飞机。这样就不能保证总理指示的落实。

因此，我觉得应向机场再强调、再明确一下总理的指示。

9月13日0时06分左右，我又接通了山海关机场调度室的电话，还是值班主任李万香接听的。

我说：“空军那架三叉戟飞机要经北京周总理、黄总长、吴副总长和我四人联合指示才能放飞，如果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不管是谁的指示要报告我，你们要切实负责。”

在这次通话中，我特别强调和明确了两点：第一、强调“四人联合指示才能放飞”；第二、强调“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不管是谁的指示要报告我”。

当时我认为，这样是更准确、更完整地传达和落实总理的指示。但我有一点疏忽，就是没有让接听电话的对方复述一遍。

通话结束后不久，山海关机场场站航行调度室又接连来了两次电话。

第一次大约是0时20分左右。电话接通后，值班员先报告我说：“李政委，场站领导要同你通话。”

我答：“好，请讲。”

顷刻对方说：“我是场站站长潘浩，李政委你还有什么指示？”

前几次电话都是机场调度室值班人员接的，现在场站领导来了，我再次向他传达总理电话指示的前三条。其中，总理指示的第三条，我是按照0时06分给李万香的指示，即“联合指示才能起飞”向潘浩传达的。

通话中，潘站长请示我：“你传达的总理指示，可不可以告诉空军机组的负责人？”我回答：“可以告诉。”

潘站长突然在电话中又请示：“如果飞机要强行起飞怎么办？”我拿着电话思索片刻：潘浩的请示出人意外。即使总理不同意林彪专机夜飞航，也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呀？况且，总理并没有指示飞机强行起飞该怎么办，是阻止？还是不阻止？我不敢决定。

我答：“可直接报告周总理。”当时，在总理没有明确指示也没有授权他人处理的特殊情况下，我只能先答复机场紧急处置的办法，因为总理在亲自了解和处理林彪专机的问题，只有总理有决定权。^[2243]

六、林彪：“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

要点：谁也没有预料到，林彪是不按常理出牌的！李文普回忆称，“当时已是深夜，天很黑，车开动了。叶群对林彪说：‘李文普和老杨对首长的阶级感情很深。’我和杨振刚都没有说话。车到56楼时，我突然听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林立果说：‘不远，很快就到。’汽车开到58楼时，姜作寿大队长站在路边扬手示意停车。叶群说：‘8341部队对首长不忠，冲！’杨振刚加快车速，过了58楼。”

△北戴河：李文普的回忆

【2243】李作鹏：《李作鹏回忆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页693-696。在1980年“两案”审判中出示的李作鹏的几次电话记录（影印件）上，没有李作鹏后来所讲的他传达了“四个人联名指示放飞”的内容，而有周恩来后来在原件上作的批注：我说要四个人一起命令才能飞行。

“9.13事件”发生的前一天——9月12日，是我一生中最紧张、思想斗争最激烈的一天。

这天，我两次去空军疗养院找院长、政委办孩子当兵的事。向他们说明叶群的意见，傍晚又送孩子入院。

上午，林彪叫我收拾一下东西，准备去大连。大连是林彪常去的地方，中央首长一般都住棒槌岛宾馆。

棒槌岛靠海边，林彪怕见水，不愿住，住过黑石礁铁路招待所。那里房间小，空气不好，后来看中一座原大连市副市长住过的二层小楼，经过改建成了林彪去大连居住的寓所。我以为林彪真是去大连，按惯例给大连市交际处打电话，要他们检查一下房间，调控好林彪住房的温度，并对其他注意事项提出了要求。我又收拾了林彪随身带的东西。

就在这天下午，我在平台上乘凉，林立衡突然对我说，“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走。”

林立衡说这番话，我确实感到突然，不相信。当时我不相信的原因有几条：一是林彪让我准备去大连，并没说去广州。另外，林立衡和叶群感情不好，“文革”以后，叶群为她选美，选了一个又一个，她不要，自己选中了空政保卫部的某干事，叶群知道后大发脾气，林立衡以死抗争，服了一大瓶安眠药自杀，幸好被她的公务员王淑媛及时发现，送301医院抢救才免于死。除此外，林立衡和林立果也有矛盾，感情平淡。现在，林立衡冒出一个这么大的“阴谋”来，真把我吓得一大跳。但我首先想这是林家儿女又闹矛盾了。同时也问有什么证据，但她也不说任何证据，我当然就不会很相信了。还有一点，就是长期在“林办”，对林家真真假假的事见多了，听多了，也遇多了，所以就又用平常的心态去看待了。尽管我很吃惊，但心里还是没吃紧。

当时，我想林立衡既然知道林立果要害毛主席，搞反革命活动，这样大的事，为什么自己不去向林彪报告，加以制止，却要我不让首长上飞机。我从来没有干过这样的事，负不起这个责任。

我对她说：“你有什么证据？我有什么理由不让首长上飞机？如果他上要，我强行阻止，不让他上，能行吗？”

林立衡见我这样，就没有往下说，我就到空军疗养院办事去了。可能林立衡又去找“林办”其他工作人员说了此事，叫他们注意观察叶群的动向。所以

气氛就紧张起来。我从空疗回到96楼，几个人问我，“你到哪里去了？我们以为有人把你害了呢！”

晚上，北戴河畔风云骤起，但谁也弄不清风从何来？我仍然在值班室值班，林立衡又突然把我叫到小厕所里，再次对我讲了不能让林彪上飞机的事。对她的话，我心中还是没有底，仍然问她：“有什么证据，没有证据，我怎好不让首长上飞机？”

……

真实情况是：林立果谋害毛主席的计划落空后，准备和林彪、叶群带着林立衡、张清林、张宁及林办工作人员于13日晨6时去广州。叶群在10点多钟向张恒昌说“明天早上6点去大连”。林立衡把我拉到小厕所，还是要我阻止他们上飞机，我还是说没有什么理由，不好说。她要我注意林立果的动向，自己带着杨森去8341部队打电话向中央报告。^[2244]张清林继续留在96楼看电影。林立衡的报告引起中央的注意，周恩来总理找吴法宪询问林立果私调飞机的情况，并派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随同吴法宪一起到西郊机场查问，原已做好去广州准备的周宇驰紧急打电话报告已回到北戴河的林立果，林彪、叶群这才决定马上就走。

大约11点多钟，叶群拉我到林彪卧室门外叫我等着，她先进去和林彪说了几句话然后叫我进去。这时，林彪早已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林彪对我说：“今晚反正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现在就走。”我说：“等要了飞机再走。”叶群插话骗我说：“一会儿吴法宪坐飞机来，我们就用那架飞机。”

我当时怀疑为什么不让我调飞机，有些反常，心里越来越没有底。我从林彪那里出来，叶群也跟着出来，叫我快点调车，并说“快点吧，什么东西也别带啦！有人要来抓首长，再不走就走不了啦！”

究竟往哪里走？我越发怀疑。就到值班室给北京打电话，找到空军主管专机工作的副参谋长胡萍。我说：“首长要马上走，什么也不带，我觉得方向不明确，你知道去哪里吧？”

胡萍在电话中很不耐烦地说：“你不要问了，不要问了，你不要再往北京打电话了！”不容我再说，他就把电话挂断了。

这时，林立果把我叫到叶群的办公室，给在北京的周宇驰打电话，叫我在门外看着。我听到林立果说：“首长马上就走，你们越快越好！”他放下电话出来，催我快去调车，我回到秘书值班室给58楼8341部队张宏副团长打电

【2244】据林立果和刘吉纯的回忆，林立衡是和刘吉纯一起到8341部队报告的。

话，告诉他：“首长马上就走”。张副团长问我：“怎么回事。”林立果又走了进来，问是谁来的电话，我说：“是张副团长。”林立果立即伸手把电话压了。我拿了林彪常用的两个皮包走到外边。杨振刚把车开上来，刚到车库门口停下，林彪光着头出来和叶群、林立果、刘沛丰走到车旁。这是一辆三排座大红旗防弹车，林彪第一个走进汽车坐在后排，叶群第二个走进汽车，坐在林彪身边。他们坐定了，中间第二排座才能放好。第三个上车的是林立果，他坐在第二排在林彪前面。第四个上车的是刘沛丰，坐在叶群的前面，我最后上车，坐在前排司机旁边。身后就是林立果坐的位置。

当时已是深夜，天很黑，车开动了。叶群对林彪说：“李文普和老杨对首长的阶级感情很深。”我和杨振刚都没有说话。车到56楼时，我突然听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林立果说：“不远，很快就到。”汽车开到58楼时，姜作寿大队长站在路边扬手示意停车。

叶群说：“8341部队对首长不忠，冲！”

杨振刚加快车速，过了58楼。

听林彪说要去伊尔库茨克，我才知道不是去大连，是要到苏联去，当时一听去苏联的地方，脑子里第一个反映就是叛逃，所以，在这一瞬间，我思想上产生了激烈的斗争。跟着跑，这不是当叛徒了吗？自己的老婆、孩子不成了叛徒的家属了吗？便决心下车。

我本能地大喊了一声“停车！”

杨振刚把车停下来，我立即开门下车。

叶群气冲冲地说：“李文普！你想干什么？”

我说：“你们究竟要到哪里去？当叛徒我不去！”

我转身朝58楼喊了一声：“来人哪！”与此同时，我听到了车门响声和枪栓声，林立果就向我开枪。

当时距离很近，只一米左右，我侧着身，手扬着，所以子弹从前胸擦向左臂。受伤后，我倒在路边，先后听到三辆车通过……后来，是8341部队二大队的卢医生给我包扎的。他们要送我去空军疗养院。我想女儿刚去那里，不好说话。我说去军区疗养院。到那里检查，子弹穿透手臂，造成粉碎性骨折。

医生问我怎么受的伤，我不好说林彪父子如何如何，因为这是重大机密，我们做这项工作不用谁教都知道的。所以，只好说是自己“枪走火”。^[2245]

【2245】《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

七、山海关场站：零点三十二分，飞机强行起飞。

要点：据海军山海关场站工作人员回忆，9月13日零点二十二分，林彪乘坐的红旗轿车抵达机场，在没有客机梯子的情况下，林彪、叶群、林立果等顺着驾驶舱的小梯子爬上飞机。零点三十二分，256号专机强行起飞。

▲ 9月13日

△ 北戴河 - 山海关场站：刘吉纯的回忆

虽然车已开得很快，我们还是不断催促司机开得再快一些。由于车速太快，天黑又没路灯，司机突然刹车，拐了一个大弯后才停了下来。原来前面正有一辆长长的火车通过，我们的“伏尔加”车已接近铁轨，若不是司机年轻机敏，我们不是撞上火车便是翻到路边沟里。如今回想起来，还很后怕。

当我们赶到机场时，那里一片黑暗。林彪乘坐的“红旗”车停在那里，先赶到的战士不知所措地站在车边。我问，飞机呢？他们指着前方的飞机跑道说，在那里。这时，飞机已经起飞了。我问于仁堂，怎能让他们上飞机呢？于说，我们也是刚到机场。而且，事前只向干部讲了一点情况，战士们根本不知道林彪要跑的事，所以都站在那里，不敢动。我想，也不该埋怨部队，没有上级命令，下面谁敢动“副统帅”呀。如果中央早下命令，林彪他们是跑不了的。稍后，张宏副团长也赶到机场，把没有上飞机的机组人员集中起来。我和一起去的几个人乘车返回北戴河。下车后，才知道李文普已受伤住院。“林办”所有在北戴河的工作人员一起被软禁起来，开始接受长达四年的审查。^[22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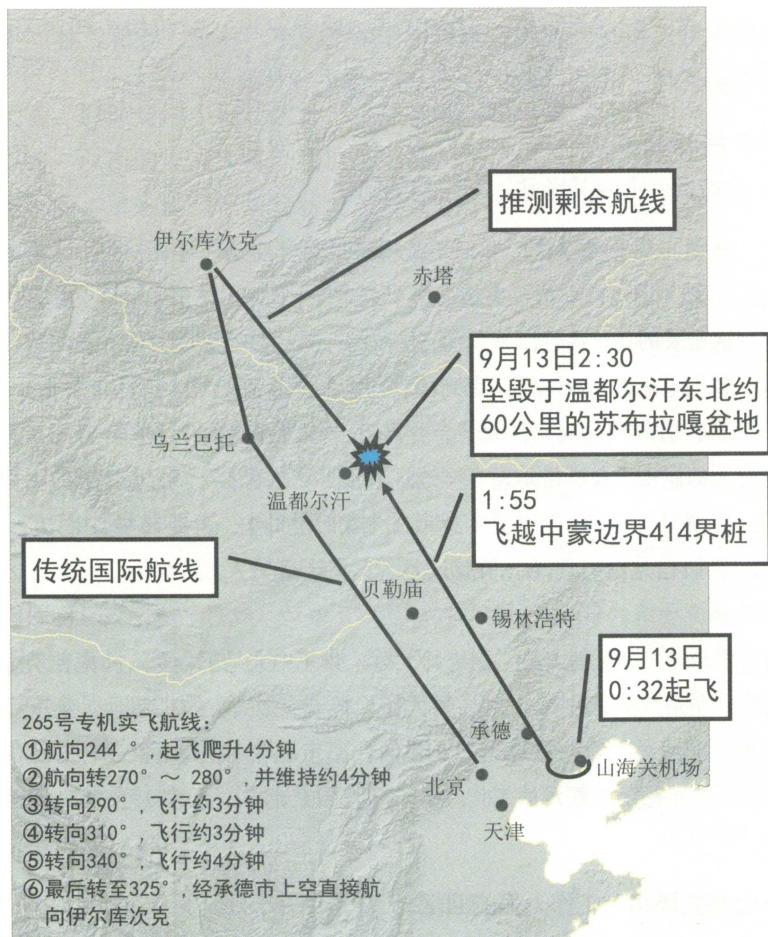
△ 山海关场站：工作人员的回忆

据山海关场站赵雅辉等工作人员1972年4月的回忆“林彪、叶群等仓惶逃命目击记”称：

我们在现场亲眼看到叛党叛国分子林彪、叶群、林立果及其死党刘沛丰等人仓惶逃命，狼狈投敌的情形。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零点二十二分，林彪一伙乘坐红旗轿车，极高的速度开到停在机场的三叉戟飞机附近。车还未停稳，林彪一伙就急忙下车。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拿着手枪，乱喊乱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飞机快起动！飞机快起动！叶群披头散发，林彪光着秃头，慌慌张张地跑到飞机驾驶舱门底下，在没有客机梯子的情况下，这伙

【2246】《难忘的“九一三”前夜——一个警卫人员的回忆》。

256号专机外逃航线还原图



叛徒卖国贼慌忙顺着驾驶舱的小梯子，一个一个往上爬。第一个上去的是刘沛丰，叶群往上爬的时候，林彪紧跟着往上爬，林彪的秃头都顶着了叶群脚。他们没等机组人员上齐，连付驾驶员、领航员、通讯报务员都没上机，飞机滑行灯也没敢开，机舱门还未关上，飞机就急促起动，强行滑出。在滑行中，右机翼撞坏停在滑行道旁的加油车罐口盖，刮掉了机翼上的铝皮，撞碎

了机翼上的绿色玻璃灯罩和有机玻璃等。在没有夜航灯光和一切通信保障的情况下，便在一片漆黑中，于零点三十二分，强行起飞，仓惶逃命。

赵雅辉 佟玉春 王学高

周振山 刘三儿

一九七二年四月七日^{【2247】}

△北京：汪东兴的回忆

林彪的红旗牌轿车时速开到100公里左右，张宏他们乘坐的吉普车根本追不上。等张宏他们追到山海关机场的时候，林彪已经上了飞机。由于紧张和慌乱，林彪的帽子和叶群的围巾都掉在了地上。飞机那时还未加完油，就起飞了。专机的两个驾驶员，只上去一个，领航员、通讯报务员都没有来得及登上飞机。

张宏他们在机场上将林立果找对象选来的几个“美女”拘留了。这些“美女”当时都发了枪，她们拿着枪不让我们的警卫战士进屋。张宏对她们说：“你们这是要干什么！我们是保卫林副主席的，你们怎么这个样子？”警卫战士一进去，就把她们的枪缴了。

13日零点32分，我接到张宏从山海关机场打来的电话，说飞机已经起飞了。

与此同时，林立衡也打电话来对我说：“听到飞机响了，好像是上天了。”

我对她说：“你报告得迟了一点。”

她对我说：“刚听到飞机声。”

我对她说：“我现在没有时间接你的电话。”就把电话挂了。

我立即打电话给周总理，说：“毛主席还不知道这件事，您从人民大会堂到毛主席那里，我也从中南海南楼到主席那里，我们在主席那里碰头。”我叫张耀祠同我一起去，我说，你要去主席那里接电话。我们和周总理几乎是同时到了毛主席那里。^{【2248】}

【2247】林彪、叶群等仓惶逃命目击记影印件原文，中发[1972]24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1972年7月3日印发，《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页83。赵雅辉，山海关机场场站副站长。佟玉春，场站参谋长。王学高，场站油料科科长。周振山，场站机械师。刘三儿，场站油车司机。

【2248】《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页207-208。

以上为各有关当事人从不同的角度述说9月5日至13日的情况，大致勾勒出“九一三事件”过程，基本轮廓比较清晰。尤其是林立衡于1971年10月26日完成的回忆材料，距“九一三事件”发生仅一个多月，述说的是她自己的亲身经历，其记忆是清晰的，也与其他有关人员的述说基本吻合。而且她是写给毛泽东、中共中央的正式材料，态度是严肃、慎重的，所以应该是可信的。

第一〇〇节 毛周收拾残局

一、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仓惶出逃

林彪、叶群、林立果不顾一切，突破重围，登机外逃，远远出乎毛、周及黄、吴、李、邱的意料，使毛在九届三中全会内部全面清算林彪的计划彻底破产。毛、周不得不立即全力处理党内第二号人物出逃后留下的尴尬局面。

9月13日凌晨，256号专机强行起飞后，周恩来即令李德生前往空军司令部作战室指挥跟踪，随时报告情况；派杨德中随吴法宪去西郊机场；派纪登奎去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同时，向全国发布禁空令：关闭所有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要求调度员用无线电向256号飞机呼叫，要林彪等人飞回来，告不论在何地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但256号飞机不予回答。^{【2249】}

同日凌晨，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听取周恩来汇报林彪、叶群、林立果乘飞机出逃的情况。在256号三叉戟飞机起飞三十多分钟快接近中蒙边境时，吴法宪请示是否派飞机拦截，毛泽东称：林彪还是副主席嘛，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随后，批准发出全国禁空令，并要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紧急会议，通报林彪外逃情况并研究部署应变措施。在周恩来安排下，毛转移到人民大会堂118厅暂住。晨三时许，毛接到空司报告称，北京沙河机场有一架军用直升机起飞，机上有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现正向北飞行。毛、周当即指示：下命令，要空军派飞机拦截。这架直升机在怀柔被迫降。晚上，阅周恩来报送的为应对林彪出逃事件中央政治局和总参谋部拟定的紧急战备指示，批示：“照办。”^{【2250】}

从清晨至下午，周恩来亲自给十一个大军区和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打电话，通报林彪外逃情况，要求各地听从党中央、毛泽东的指挥。派李先念、华国锋、邱会作分别到京西宾馆、海军司令部和总后勤部主持工作，报告

【2249】《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页481。

【2250】《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405—406。

情况。指示外交部，密切注意外电报道，研究并提出因林彪事件引起的对外交涉及应对方案。和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与总参负责人共同拟定紧急战备指示，指定叶剑英处理善后问题及战备事项。当日，致信毛泽东，汇报以上工作情况。^{【2251】}

9月14日中午十二时二十分，中国驻蒙古大使将蒙古外交部告知的一架中国飞机在蒙古失事机毁人亡的情况，用专线电话报告中国外交部。外交部立即报告周恩来。周恩来获知后，即到人民大会堂118厅向毛泽东报告。周恩来代外交部起草致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特急电。电报要许大使即约见蒙外长，告以奉命通知：对中国失事飞机误入蒙境表示遗憾，请蒙方协助中国使馆人员前往失事现场视察，交还死者骨骸和其他遗物。毛泽东批示：“照发。”同日，毛泽东就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问题对周恩来说：看他们十天，叫他们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交待好了就行。^{【2252】}

傍晚，周恩来主持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会议，通报林彪等人机毁人亡的消息，并在会上分发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报告。^{【2253】}

9月16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稿。该通知稿称：

一、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

现已查明：林彪背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极其秘密地私自调动三叉戟运输机、直升飞机各一架，开枪打伤跟随多年的警卫人员，于九月十三日凌晨爬上三叉戟飞机，向外蒙、苏联方向飞去。同上飞机的，有他的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及驾驶员潘景寅、死党刘沛丰等。在三叉戟飞机越出国境以后，未见敌机阻击，中央政治局遂命令我北京部队立即对直升飞机迫降。从直升飞机上查获林彪投敌时盗窃的我党我军大批绝密文件、胶卷、录音带，并有大量外币。在直升飞机迫降后，林彪死党周宇驰、于新野打死驾驶员，两人开枪自杀，其余被我活捉。

对林彪叛党叛国事件，中央正在审查。现有的种种物证人证业已充分证明：林彪出逃的罪恶目的，是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根据确实消息，出境的三叉戟飞机已于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全部烧死，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

【225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页482。

【225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405—406。

【225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页483。

该通知稿最后称：

注：本件第一步应先印送和传达到各大军区党委常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中央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如无常委，即传达给各单位领导机构正副职人员），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和党的核心小组。九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分别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和中央党、政机关领导小组和党的核心小组中一道听取传达和讨论。如其中有不宜听传达和讨论的，可由各单位领导机构决定除外，并报中央备案。^{【2254】}

9月17日晚八时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周恩来谈话。审阅周恩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稿，批示：“照发。”这个通知于18日传达到省、军级。29日，经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决定将这个通知的传达范围扩大到地、师级党委。^{【2255】}

9月21日晨二时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同日，毛泽东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汪东兴关于成立林彪、陈伯达专门小组的报告。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说：拟同意汪东兴的报告，在中央政治局下设一林、陈专案工作小组，掌握和整理全部案件材料，分类摘要呈送主席和政治局同志审阅。这个工作小组以纪登奎为主、汪东兴为副，领导进行工作。毛泽东批示：“同意。”^{【2256】}

9月23日，毛泽东让汪东兴向周恩来了解黄永胜等人情况。晚十一时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听取周恩来和汪东兴汇报，得悉黄永胜等人正在拼命烧材料时说，他们是在毁灭证据，这些人是要顽抗到底了！24日，周恩来召集军委办事组成员开会，代表中央宣布对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实行离职反省。在此前后，林立果“联合舰队”在各地的骨干分子相继被捕归案。晚十一时，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周恩来谈话。^{【2257】}

9月26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向群众解释今年国庆节不举行游行的通知称：

中央已经通知各地，今年国庆节不举行庆祝游行。现接到一些单位的反映，希望有一个向群众说明解释的材料。现将中央如下的解释发给你们，供你们组织庆祝活动和向群众口头说明时参考：

【2254】该通知在发出时编为中发[1971]57号中共中央文件。

【225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406—407。

【225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407。

【225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407。

为了加强战备，防备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同时也是为了实行中央前几年就已经考虑的节日庆祝方法上的改革，中央决定今年国庆节不举行游行，也不放焰火，而改为各种形式的分散性的庆祝。这一改革，有利于发扬毛主席历来提倡的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作风，有利于领导干部联系群众，有利于推动斗、批、改，有利于加强战备。各地应当认真搞好庆祝活动，保持节日的庆祝和欢乐的气氛，在广场、公园、街头和各单位举办小型的庆祝，领导干部可分头参加，并在群众中广泛教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环境布置的庆祝口号，可以参照今年“五一”中央公布的口号，由各地自行选用。^{【2258】}

9月26日-10月15日，中共中央召集部分“老同志”揭发批判林彪的座谈会。座谈会开了九次，由李富春主持，陈毅、聂荣臻、徐向前、蔡畅、邓颖超、邓子恢、张云逸、张鼎丞、曾山、王震等出席。朱德和刘伯承也分别写信或谈话，揭发林彪历史上的问题。^{【2259】}

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发”的《中共中央关于扩大传达[1971]57号文件的通知》称：

一、中央决定将《中共中央通知》（中发[1971]57号）扩大传达和讨论范围：

- 1、陆军和海军传达到军的党委常委、同级副职党员干部和师的两三个主要干部。
- 2、空军传达到团，民航传达到大队，而后尽快地逐步传达到中队和机组。
- 3、地方传达到地、市委常委。
- 4、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传达到下属部、处、室负责干部。^{【2260】}

该通知还规定了57号文件的传达方法和传达要求。

二、由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9月29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向各大军区党委常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发出关于黄永胜等离职反省的绝密通知称：“中央鉴于黄永胜、

【2258】中发[1971]59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1971年9月26日发至县团级，口头传达到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公社，学校，机关和街道组织。

【2259】《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407-408。

【2260】中发[1971]60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1971年9月29日发出。

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同志参加林、陈反党集团的宗派活动，陷入很深，实难继续现任工作，已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代。军委日常工作，中央已决定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主持，并筹组军委办公会议，进行集体领导。”^[2261]

10月2日，毛泽东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9月30日晚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的军委办公会议、军委各单位、国务院业务组、国防科委和中央林陈反党集团专案组的人事安排与调配情况的报告，批示：“均同意。”^[2262]

10月3日，经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宣布：“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主持，并由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榘、张才千、刘贤权十同志组成，即日成立，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军委日常工作。特此通知。”^[2263]同日，经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宣布：“为彻底审查、弄清林—陈反党集团的问题，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集中处理有关问题。中央专案组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十人组成。在专案组领导下，设立工作机构，由纪登奎、汪东兴两同志负责进行日常工作。各地、各单位今后凡向中央上报有关林—陈反党集团的揭发材料，统请以绝密亲启件送交中央专案组统一处理。”^[2264]

10月4日，叶剑英致函毛泽东称：

主席：

首先敬祝万寿无疆！

林彪、妻、子叛变，黄、吴、李、邱附逆，以为结纳几个死党，掌握几架飞机，散布几句谣言，制造几桩藉口，就可以施展阴谋，篡党篡国，结果作恶自毙，余孽落网，从反面上使全党提高觉悟，提高警惕，增强团结，增强战斗力，证明坏事做到头可以变成好事。

中央57号通知发出后，军委直属各单位、军兵种和院校，按总理指示，分批分片进行传达、学习、讨论、批判和揭发。据各单位初步反映：

一、明摆：各常委会上传达时，讲到林彪谋叛三阶段（暗害主席、广东割据、北窜投敌）同志们初听惊奇，再听愤怒，最后听到林逆机毁人亡，一种沉重心情又爽然消失，转为快慰，发人深省。

【2261】中发〔1971〕61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1971年9月29日发出。

【226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408。

【2263】中发〔1971〕62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1971年10月3日发出。

【2264】中发〔1971〕64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1971年10月3日发出。

二、物证：在军委直属各兵种首长会议上，曾把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照片）给大家传观了一遍，又选了三篇交待材料（王飞、江腾蛟、鲁珉）给大家念了一遍，这种铁证如山，完全粉碎了可能在少数人心中半信半疑的精神状态，收到全功。

三、要快：林彪叛党叛国罪行，是按中央规定，有计划有步骤进行的，我们是逐步扩大，层层下达，严格保密。但从传达效果看来，显比隐好，快比慢好，大家同意中央意图，加快步伐，拟于十月中旬传到基层，这样似台风过后，万里无云，做到思想上充实提高，组织上调整巩固。

估计到十一月以后，工作重点将转到正常，为使政治局参加军委办公会议同志和我，了解一下军委各方面的工作情况，拟提出第一批汇报题目：

- 一、战备情况。由总参负责准备；
- 二、连队建设情况。由总政负责准备；
- 三、军工生产情况。由总后和国防工办准备；

我这个人脑子空，水平低，能力弱，有时也产生：“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的自卑感，这不对。当努力克服，努力学习，努力工作。

这次主席令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我十分感戴主席的信任，但又十分害怕工作做不好，误了大事。

昨天军委办公会上，我坦白地说出我的低能，请求同志们经常提示工作意见。同志们果然在会上提出许多建设性的宝贵的意见。如果我能虚心地经常请教各同志，特别是经过东兴同志能够得到主席指示，加上在政治局会议上能够得到总理和各同志的指示，那么工作上的错误可能比较少些，我当尽力去做，请主席放心！

有时间请赐一见，得到指示，以利工作。

谨致

敬礼！

叶剑英谨上

一九七一年十月四日^{【2265】}

10月4日晚上，毛泽东接见新成立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周恩来陪同。毛泽东说：我这次到外边一个多月，是周游列国，到了四个军区，找了各路诸侯，见了他们就讲路线问题。路线对了，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政权会有政权。路线

【2265】根据广州叶剑英史料研究会存原信复印件核对抄录。

错了就丧失一切。林、陈阴谋活动，蓄谋已久，目的就是要夺权。对于他们这个阴谋集团的办法，就是三句话、九个字：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甩石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写的《我的一点意见》就是甩石头。华北会议后，派李德生、纪登奎到北京军区，改组北京军区，对军委办事组也增加人，掺进沙子。挖墙脚，对他们这个集团的一些人，高级干部，能争取的尽量争取，能拉的尽量拉。反党集团，他们就是空军几个单位，人数就是那么几个人，有什么了不起嘛！把他们挖出来就是一件大好事。谈到军队问题时说：军队要提高理论水平，人们的印象，军队干部头脑简单化，干革命不用马列主义武装头脑不行。军队干部头脑要复杂化，不要那么简单化。要整军，肃清林陈反党集团的影响。政治教育，主要是抓路线教育。讲政治讲那么多，就是不讲路线。把部队作风带坏了，要改变。军队训练也有形式主义，训练要严格要求，才能打仗。军队靠平时训练，靠打仗。谈到老同志问题时，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整几位老师，是林彪搞的。陈毅同志有错误，他在华东工作是很有功的。（对叶剑英）你们那时为啥不来找我嘛，你们写写，我写上几句嘛。整他们是林、陈搞的。谈到军委办公会议的工作时，毛泽东说：这次是叫改组，不是掺沙子。今后办公会议要研究大事，过去批评黄永胜不管大事，一不参，二不谋。要接受他们的教训。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下达指示，要用军委名义，不要用办公会议。政治局讨论的问题，是用中央的名义嘛。要好好准备，开次军委全会，各大区同志来参加，征求他们意见。^[2266]

10月6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在10月中旬将中发[1971]57号、61号、62号、64号中共中央文件传达范围扩大到地方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军队连级党员干部，空军各机组、空勤地勤人员。24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将“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向全国广大工农兵群众传达的通知。29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爱国人士、归国华侨和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传达林陈反党集团问题的通知。^[2267]

10月29日，毛泽东阅周恩来本日晚七时报送的关于27日政治局议事报告。报告说：政治局会议讨论各地揭发批判与林彪事件有关的人和事的情况，一致认为，武汉、成都两个军区问题较大，需要中央给予帮助。根据会前与毛泽东商定的设想，中央政治局准备在北京召开武汉、成都两地区党政军负责人座谈会。会

【226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409—410。

【226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410。

议提出中央帮助解决问题的总的方针是：“遵照主席指示，治病救人，以利团结和工作。”毛泽东批示：“可以。”^{【2268】}

11月13日，毛泽东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报告和附送的梁兴初、陈仁麒的检讨。报告说：12日政治局会议听取了来京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成都军区和四川省党、政的负责人关于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情况汇报，并对成都地区有关负责人进行了批评帮助，要求他们回四川之后，继续揭批林彪一伙，并敢于接受批评，加强领导，搞好团结。他们拟明后日回川，主席能否在今明两日见他们一次，给以教育和鼓励。毛泽东批示：“待议。”^{【2269】}

三、毛同意将《“571工程”纪要》印发至省军级

11月14日晚，毛泽东接见来京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成都军区和四川省党、政的负责人张国华、梁兴初、李大章、陈仁麒等。周恩来、叶剑英、张春桥、李德生参加。谈话开始后，叶剑英到会。毛泽东称：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那个王、关、戚，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师。老师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毛泽东问：杨勇是怎么一回事？廖汉生为什么要抓？（周恩来：廖汉生是与贺龙有关系，就是对贺龙，主席当时也不同意这样搞。）杨勇这个事是林彪支持搞的，林对我说过，后又不承认。谈到林彪集团时，毛泽东称：那时，谁知道他是反革命呢？是副统帅，接班人嘛。《我的一点意见》当时没有题目，撇开一些问题，中心是个主席问题，我就撇开。那个司令部让我当国家主席是假，林当主席是真。也有一些人是真心要我当国家主席，和林彪不一样。有人说，我不当主席，老百姓通不过。我说，我不当主席有十几年了嘛。我这个人，同你们吹一吹是可以的，要我当国家主席，天天去迎接外宾，什么国书啊，那一套，无非是催我见上帝。许多现象与本质不同。林彪的现象是拥护我，其实大树特树他自己。周恩来问《“571工程”纪要》是否可印发大军区和省委常委，毛泽东表示同意，并称：他们也幼稚得很，那样搞，怎么搞得成呢？谈到成都地区问题，毛泽东说：你们的事，我也有责任，没有找你们谈，当然，东北、西北也没有谈，他们没有出事。广州陷得深，我和他们谈了，他们很主动，回去

【226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413。

【2269】《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417。

后马上就开会，把我同他们谈的问题都讲了。你们那里也是个别同志嘛，冲一下也必要，这是大是大非问题，要分清。我看你们比武汉爽快，武汉的报告还未写出来，他们有点顶牛。顶牛也好，不做墙头草。林的事发生已经两个多月了。你们开了半个月的会，我看你们的报告不错，写得好，不拖泥带水。回去开开会，继续做工作。没有什么问题了，错了改了就好。【2270】

同日，经毛泽东批示“照发”，中共中央通知将《“571工程”纪要》发至省、军级党委。该通知称：

中央在审查林彪反党集团案件中，从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在北京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里，查获了林彪一伙制定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这个《纪要》证明，林彪一伙发动这次反革命政变是早有预谋的。

.....

现将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的全文及原件影印本编号发给你们，供你们阅读研究。此件只限于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各大军区党委常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的成员阅读。不适宜阅读的，可由各单位领导机构决定除外，并报中央备案。此件各单位只发一份或两份，定期收回，不许外传、不许翻印、不许抄传，严格注意保密。【2271】

毛泽东对《“571工程”纪要》尤为重视，曾说在所有涉及林彪一伙的证据中，“这一件最重要”。因为这份材料的内容虽然粗糙、幼稚，却集中抨击了毛的文革理论和做法，被视为林彪一伙的“纲领性文件”。有人曾说这个《纪要》是骂毛的，“非常反动”，不能公开。毛却说，别的可以不公开，但这个一定要公开。毛的目的是借此说明：（1）林彪叛党叛国，是反对他的；（2）是林对不起他，而不是他对不起林。（3）林彪这个叛徒反对文革，说明文革是“正确”的。（4）林彪一伙是“形左实右”，所以要继续批右。毛如此使用《“571工程”纪要》，从权谋看是很高明的，扭转了“九一三事件”后他所处的极度被动与窘迫的处境。惟其做法也给后来周恩来和邓小平纠正文革“左”的错误，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和困难。

11月20日晚，毛泽东接见来京参加武汉地区座谈会的武汉军区和湖北省党政的负责人曾思玉、王六生、刘建勋等，周恩来、张春桥、李先念等参加。谈到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时，毛泽东称：我们党历来的方针，对犯错误的同志以教育为

【2270】《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417—418。

【2271】中发〔1971〕74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1971年11月14日发出。

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目前有那么一些人，跟着副统帅，跟着他上当，不光彩。还是跟着党，不要跟着个别人。统帅也好，副统帅也好，个别人容易起变化。五十年起了十次变化嘛，有许多都是跟着个别的人。我跟的是路线，你领导者路线正确，我跟，至于你路线不正确，我不跟。有人提出了新名词说“紧跟”，我不愿听这个话，什么紧跟？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让他们改，表示欢迎的态度。比如对在林彪下面的几十个工作人员和秘书，那些人都不用了？我看那不行吧。要搞清楚，要教育，给他们工作做，不能不用。有些人是跟错了人觉得面上无光，连8341部队在毛家湾的那个中队也觉得无光了。这种思想要解释，是党给的任务，是组织派到他那里去工作的嘛，他那时是副统帅嘛，你怎么知道林彪要叛党呢？要说无光，是中央脸上无光，也是整个党无光嘛，哪是一部分人脸上无光？谈到个人崇拜问题时，毛泽东说：马列主义的党，对人民不利的事不要办，对人民不利的名词要改。“四个伟大”改了吗？（周恩来：只用一个）“三忠于”我就不懂。你们开会讨论一下，把不适当的名词、形容词废掉，不要搞了。国民党是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过去骂国民党“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个话也适用于共产党。保留民主党派比较有利。对个别人说，斗批改是要参加的。对于党，比如民盟、民革还要保留。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谈到武汉的问题时说：你们回去开个扩大会，要讲一遍，无非是北京这一遍，检讨我看可以了，允许人家讲。要注意政策，还是宽大为怀嘛。整人要少，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大，只要坚持这个倒不了的。^[2272]

12月11日，经毛泽东批示“照发”，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讨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的通知。这个材料主要讲从1970年3月毛泽东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到1971年4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这段时间里的斗争情况。^[2273]

12月17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级干部离职审查批准程序的通知。通知称：在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罪行的过程中，牵涉到个别高级干部有严重问题需要进行离职审查的，凡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应报中央批准；凡省、市、自治区一级的领导干部，由省、市、自治区党委讨论决定，报中央备案；省军区、野战军军职干部应报大军区党委批准，并报中央军委备案。

【227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419-420。

【227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420-421。

第一〇一节 外间对“九一三事件”的猜测和调查

一、西方媒体对“九一三事件”的猜测

虽然中方将“九一三事件”对外部世界严格保密，但仍然逃不过西方媒体敏锐的触觉，他们从中国国内的一些反常动向中，还是觉察到中国最高领导层发生了重大问题的蛛丝马迹。

9月21日，中国外交部的下级职员向申请入场券的外国人称今年“十一”不集会游行。当日，法新社即从北京发出一条电讯称，“中共看来会取消这次国庆巡行的行动，使北京的外侨吃了一惊，每个人鉴于北京发动‘外交攻势’之际，都等待着这次本年度最大规模的庆典。……观察家认为，人们期待着北京会发生一些重要的政治大事，然而他们未敢肯定这是否与猜测中的中共可能取消国庆巡行有关。”^{【2274】}

9月30日，美联社、路透社、合众社、法新社分别从莫斯科发出电讯称：苏联塔斯社今天说，一架中共军机，侵入蒙古领空，坠毁于蒙古领土，机上九人全告丧生。塔斯社引述蒙古通讯社说，这次事件，发生于9月12-13日晚，“在该机坠毁的地区里，发现九具烧焦的尸体、武器、文件及装备，显示出该机隶属于中共空军。”该社说：中共大使馆代表，获准访问坠机地区。它说，蒙古已就侵犯领空事件，向中共提出抗议，要求给予官方的解释。^{【2275】}

10月1日，外电认为中国国庆日疑云密布。合众社香港今日电称：

一架神秘飞机在蒙古撞毁，取消阅兵及巡游节目，未照例发表国庆日社论。

上述各点，就是令中共今日“国庆”庆祝情况疑云密布的部分因素。

自从毛泽东于1949年10月1日站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检阅台上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今年“十一”首次取消阅兵及群众巡游仪式。全世界不约而同顿生疑念。

……

在中共“国庆”前夕，苏联塔斯社报导一架中共飞机在外蒙古境内撞毁，该机内有九人，并有文件及武器。

若干外交人士称：是项飞机事件可能就是令中苏共“引起某种十分紧张事件”的原因，分析家指出：“这件事可能令中共领导层内部问题严重化。”

【2274】香港《明报》，1971年9月22日。

【2275】香港《星岛日报》，1971年10月1日。



256号飞机坠毁残骸。

此间中国问题分析家说：那架飞机可能载有重要人物逃离中国，而被另一架中共军机击落。^{【2276】}

10月2日，西方传媒猜测坠毁外蒙飞机中可能载有逃亡军人。合众社台北电称：

消息称：迹象显示：毛林在9月12日，一架军事喷射运输机撞毁于蒙古后，已采取无前例之措施。

他们说：因之他们不能找到除“飞机事件”以外之任何解释，该机显然供应中共要员之军事运输机，载运军事领袖们，集体逃往苏联。

.....

消息来源说，一架载着九名中共人员的飞机坠毁外蒙境内事件，使整个形势顿告改观。

消息来源说，详细情形虽然未悉，但有数点是显而易见的。

中共过去习惯宣布坠机罹难者的姓名，但这次坠机事件发生后，中共迄今仍未公布九名遇难者的名字。

【2276】香港《星岛日报》，1971年10月2日。

该机当时并非进行任何侦察任务，因为载有九名乘客的飞机，是不适宜于负起这种任务的。

定期飞行的班机，没有理由越出航线那么远，最后还坠毁于外蒙境内深处。

他们说，此事唯一合理解释应该是：该机当时载着企图逃往苏联的变节者。^{【2277】}

到了11月初，西方传媒则直指久未露面的林彪，可能已死于蒙古坠机中。合众社华盛顿11月9日电称：

国外交官星期一晚透露：一度由毛泽东“铁定”为继承人的国防部长林彪已告失势，而且可能已死。

这些外交官说：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已把军方企图推翻他们的阴谋，彻底消灭，并且“整肃了”林彪。不过，他们随即补充说：这次整肃实行后，即传出一架中共军机坠毁外蒙古的消息，显示林彪可能是坠机事件中罹难者之一。美官方星期一晚对于林氏的此等最新消息，拒加评论，仅谓显然林氏已发生问题，自9月中旬以来这位曾任毛氏继承人的林氏已没有露面。美官方称，他们不知林氏的命运，或所传内部权力斗争的详情。

但外交界称，林氏的同谋者有陆军与空军首长。他们不知其姓名，但推测是黄永胜及吴法宪。他们指出黄、吴两人与林彪及海军政委李作鹏，在10月1日北京庆祝国庆时均不在场。据星期一晚传出的消息称，阴谋被揭破及失败之后，林彪与其高级军事同谋者，企图乘空军飞机逃往苏联，但机坠于蒙古境内。^{【2278】}

西方媒体逻辑分析能力颇强。如上述10月2日合众社援引“消息来源”指出，“该机当时并非进行任何侦察任务”，“没有理由越出航线那么远”，从而提出“此事唯一合理解释应该是：该机当时载着企图逃往苏联的变节者。”再如11月9日合众社报导西方外交官的揣测，除“林氏的同谋者有陆军与空军首长”不实外，直指“林彪可能是坠机事件中罹难者之一”，已经非常逼近256号飞机坠机事件的真相。

【2277】香港《星岛日报》，1971年10月3日。

【2278】香港《明报》，1971年11月10日。

二、蒙古官方关于 256 号飞机坠毁原因的调查报告

11月20日，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个调查委员会，完成了一份《关于一架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坠毁原因的调查报告》^[2279]。调查报告称：

本委员会由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于1971年10月4日通过之268号决议委任。委员会成立之目的：旨在1971年10月8日至10月18日期间，对一架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坠毁的飞机的出事原因及其飞行使命，进行辨认及鉴定工作。

为了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本委员会认真地分析了该飞机越境侵犯我国领空的情况，参考了当地目击者关于该飞机飞行状态的陈述，当地坠机现场的报告，并仔细研究了在现场发现的物件和坠机有关的文件资料。

此外，本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再次到过坠机现场，对已被焚毁飞机的主体及其他对象进行了仔细的检查。就有关该飞机飞行及其坠机事故，我们也咨询了苏联军事专家，而他们也参与了事故现场的再次调查工作。特将调查结果呈报如下。

该调查报告共18页，其中16页为正文，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叙述了坠机现场的详情；第二部分为“飞机的原产地、性能及其用途”；第三部分记述了坠机事故现场发现的文件资料、物件；结尾两部分为“结论”及“建议”。调查报告最后两页为“在坠机事故现场发现的文件及物件清单”，并附有照片多张。其第一部分首段称，“1971年9月13日凌晨大约2时25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架编号为256的飞机，坠毁于东经111度15分，北纬47度42分，也就是我国境内肯特省伊德尔莫格苏木，名为‘苏布拉嘎盆地’的一个地方。”

“结论”部分称：

1. 我们认为，这架编号256的涂有民用航空标志的飞机，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用于军事用途。在事故现场找到的无数实质性文件足以证明这个结论。

a/ 给飞行员下达的书面指示中，提及“中国空军第三十四师司令部”字样。与此同时，加油收据记录册提及“中国人民解放军3556部队”，每一页均盖有“3726部队”的印章。飞机技术服务文件、使用说明及其它文件（Q-码，地图等）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或空军司令部制作，还有给飞机乘员发的

【2279】该调查报告复印件现存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图书馆。

БНХАУ-ын ИХСХА ОНГОЦ БИРЛЭ-ийн
ХЭТЭГ СЭ ГЭСЭН ХЭВГЭРЭЙНГ
ТӨГТӨХ АКТ

1. 1971 оны 9 дүгээр сарын 18-ны өдөр Зөвлөлийн 1971 оны 10 дүгээр сарын 4-ний 2-р дугаар захирагчар томилогдсон комисс ОХУ тус улсын Иргэдийн Сүхрэл БНХАУ-ын нисэх онгоцор бүхэл нь онгоц болох, нислэгийн зорилго, сүхрэлийн хөдөлгөөнийг тогтоох зорилготой 1971 оны 10 дүгээр сарын 1-нээс 18-ныг дуусгах ажлаар.

2. Комисс дээр дараахыг оруулаад хариу өгөхөд хүнд уг онгоц тус улсын хяналт дээр ирсэн болдыг, онгоц нисэх онгоцны хөдөлгөөнийг хянахын тулд зөвхөн хөдөлгөөнийг хянах зорилготой гэдэг дээр үндэстэй хяналтын протокол, эд гэрлийн болон бусад баримтын зэрэг хяналтын хөдөлгөөнийг харуулах зүйлс.

3. Эен комиссын зарим гишүүд сүхрэл болсон гүзэр дахин очих, онгоцны нислэг гол хэсэг, бүсэд зүнд хяналт үзэгт хийнэ. Онгоцны нислэг, сүхрэлтэй холбогдсон гол зорилготой дээр Зөвлөлийн иргэдийн хөдөлгөөнийг нарийвчлан, төрөл оролцооготой сүхрэл болсон гүзэр дахин үзэгт хийнэ. Онгоцны үр дүнд дөр дүрвэс зүйлийг олж тогтооно.

КОМ. БНХАУ-ын 256 номерын нисэх онгоц
БНХАУ-ын ХН. Хэвгэрэг зорилго нь:

1971 оны 9 дүгээр сарын 18-ны 02 цаг 25 минутын орчим зүүн дэргэд III градус 15 минут, хойт өргөрөгт 47 градус 42 минут бузу тус улсын Хэнтий аймгийн Идэрвэг сумын нутаг "Суврагийн хөндий" гэдэг газар БНХАУ-ын 256 номерын нисэх онгоц сүхрэлд оржээ.

налтанд байгаа.

5. Тус улсын нутаг дэвсгэрийн чухал нэгүүдэд агаараас эсэргүүцэн хамгаалах ажлыг гучтой болгох, хийлийн дэргээс болсон асуудлыг гөвдөө нэдээлэх ажиллагааг боловсролгүй шуурхай болгох арга хэмжээнүүдийг даруу боловсруулах арга нь зүйтэй байна.

КОМИССЫН ДАРГА *Г.Түвшин* /Г.ТҮВШИН/

ГҮНГҮД *Н.Сампалаа* /Н.САМПАЛАА/

Б.Тотов /Б.ТОТОВ/

Н.Гэндэндаржаа /Н.ГЭНДЭНДАРЖАА/

Т.Данзориг /Т.ДАНЗОРИГ/

Х.Бэнцон /Х.БЭНЦОН/

Н.Сампалаораг /Н.САМПАЛАОРАГ/

Л.Цэвир /Л.ЦЭВИР/

Т.Юм /Т.ЮМ/

1971 оны II дүгээр сарын 20

蒙古官方调查报告首页。

蒙古官方调查报告签名页。

那些证件亦来自军队。除了所有这些印章、标志和机组人员的身份证件这类具有军事内容的资料之外，在此飞机上找不到任何与民用航空运输、以及与民用机构或组织、或与民用工作相关的个人有关证据。

b/ 非常清楚，这架飞机由中国军方所拥有，机上人员都是军官。由他们的着装、个人携带的武器弹药（枪支，军服碎片等），编号为 0142、0143 的军官身份证，参考数据如 3726 部队、7196 部队，3726 部队第三大队邵起良，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学校等军队番号或记录，均足以证明上述判断。

c/ 该飞机原用于民用航空运输，后为军用目的而进行改装，拆卸部分乘客座位，增设一些用于军事目的的新设备。除了正常的无线电发射和接收器和其它控制设备以外，机上又增加安装了“Ekho”雷达、“PB-UM”无线电高度测量装置，这些设备均由苏联制造。蒙古和苏联调查人员一致认为，该飞机

上安装使用苏联制造的无线电测量装置，目的是为该飞机的低空、超低空、高空飞行作准备。

2. 该编号为 256 的中国飞机，正在我国领空执行一项特别任务。此结论由下列证据证明：

a/ 该飞机安装有诸如导航雷达、气象雷达、无线电电台设施、高度测量仪等现代通讯导航设备和用于防卫的相关设备。与此同时，该飞机还安装了地面测量设备。

b/ 在事故现场发现的文件和纸张均表明，在最近几个月，该飞机曾经进行过多次夜间飞行，到过中国南部、北部、西部和东部的许多备用机场。记录显示，每个人都接受过很多训练来学习备用代码表及其解决方案、军用机场的经纬度位置、降落地区的地图、各种关于如何使用信号在北京—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之间上空进行联络的说明。机组人员中包括有可以在遇到紧急情况时，即使没有技术支持也可以使飞机在机场强行着陆的专家。飞行员受过良好教育，在飞机上携带武器，以便在遇到袭击时进行防卫。

c/ 蒙古官方天气预报提供的数据显示，1971 年 9 月 12 日、13 日、14 日，我国东部和南部天气晴朗。该三叉戟飞机安装有现代设备 (PLS 级 E190 气象雷达，该装置提供了全天候日航及夜航的可能性)，在这种气候条件下，它绝不可能失去航向，特别是它在进行低空飞行。甚至在事故发生 30 小时后，中方都没有查询他们的这架作为“失去航向”的飞机的踪迹，也没有与任何无线电站联系。上述事实完全与中方所声称的该机因“失去航向”而坠机的解释相矛盾。

3. 该编号为 256 之三叉戟 1E 型飞机的坠毁原因，是由于飞行员所犯的错误所造成。这个结论可以由以下事实证明：

a/ 坠毁前该飞机航速为 500-600 公里/小时，直飞，着陆前没有放下起落架及轮胎，而且襟翼和着陆灯也没有打开。

b/ 飞机残骸碎片坠落及散布于 600×100 平方米范围，这证明该飞机是以上述时速或高于上述时速的航速坠毁的。

c/ 飞机坠毁在大范围内引起爆炸和燃烧，爆炸后的燃烧持续了很长时间，这证明事故发生时，该飞机仍然携带足够燃料可以继续飞行。

d/ 事故发生时的那一瞬间，飞机引擎仍然在全速运行，并没有损坏 (引擎没有燃烧过或被损坏的迹象)。

以上证据，驳斥了该飞机是因紧急情况而着陆的说法。

三、对蒙古官方调查报告的几点辨析

(一) 蒙方调查委员会的组成

根据《调查报告》所披露的蒙古官方调查委员会名单，委员会由九人组成。负责人图门登贝尔勒（人民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少将），成员桑加（边防及内务军事事务局司令部副参谋长兼边防处处长，上校）^{【2280】}、高陶布（外交部领事司司长）、根登达日扎（职务不详）、达希泽伯格（法律专家）、云登（民航局专家，少校）、桑加道尔吉（大夫）、卓乃（大夫）和莫尤（法医）。调查委员会九人中，除图门登贝尔勒、根登达日扎外，其余七人在1971年9月15日与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二秘孙一先等一道到过坠机现场。^{【2281】}

调查委员会虽然囊括了各方面专家，惟从以上已知八人的职务来看，这是一个中等偏低规格的临时班子。这似乎可以说明，蒙古官方对于中国256号飞机坠毁一事，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视。

调查报告虽然承认蒙方“也咨询了苏联军事专家，而他们也参与了事故现场的再次调查工作”，但苏联专家并非调查委员会的正式组成人员。从《调查报告》用语中我们可以意会到，蒙方将其与苏方的关系，仅定位为咨询与被咨询的关系。考虑到当时苏蒙两国政治关系的实际情况，并不排除苏方在调查过程中具有更为重要的指导性作用。

调查报告承认，“为了再仔细研究这一事件，委员会部分成员邀请苏军技术人员在10月19日一起前往视察了飞机坠毁的现场。”但类似“后来，据当时任蒙古外交部副部长的云登讲，在中国使馆人员到飞机坠毁现场视察之前，苏联已派人检查了现场，拆走了机尾上的主发动机”^{【2282】}这样的传闻，在《调查报告》中得不到印证和支持。

(二) 坠机现场发现的尸体和枪支

《调查报告》第一部分，叙述了蒙方在256号飞机坠毁现场发现的机上乘员遗体及所携带枪支的情况。

《调查报告》称，“距坠机点南侧500米处，我们开始检查工作。在那儿发现了第一具尸体。其他散落的尸体之间相隔约3-15米。所有尸体分布在50×20米范

【2280】图门登贝尔勒和桑加职务据《外军资料手册（蒙古部分）》，1973年12月，页56、91。

【2281】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亲历林彪坠机事件和中蒙关系波折》，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页18-19、21。高陶布等人职务据孙一先。

【2282】《在大漠那边》，页27。

围内不同位置。所有的尸体都被烧过，有些尸体的头部和四肢都破裂和压碎了。一共有9具尸体。”

《调查报告》接下来描述了每具尸体的状况。这些描述与孙一先的描述相比较，更为简略。从对尸体描述的细节可以推导出，除第8号女性尸体外，《调查报告》的尸体编号与孙一先所述编号有所不同。

《调查报告》称在坠机现场发现手枪七把、折叠式冲锋枪一支。这与蒙方在1971年9月16日提出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上飞行失事的现场调查纪要》草稿的叙述是一致的。^[2283]根据机上乘员人数及枪支数量推测，机上乘员除林彪、叶群外其余七人都可能有佩枪（除非林立果、刘沛丰两人有多支佩枪），惟九具尸体均“身体外表正常”，没有异常的枪击痕迹。机上乘员俱为飞机坠毁过程中摔撞和被烧而死亡。

9月15日下午，在坠机现场，对机上乘员死亡原因没有疑问及异议的中蒙双方官员，就尸体埋葬达成一致意见。许文益大使称：“按你们的传统埋葬他们吧。”高陶布：“好，就开始埋葬工作吧，请一块参加。”大使：“开始埋葬吧。把坑挖深一点。”高陶布：“医生认为尸体需要解剖并写报告。还有解剖检验的需要吗？”大使：“同志，你认为该怎么办？”高陶布：“医生打算做解剖，你认为有必要吗？”大使：“我建议无须解剖。”高陶布：“我同意。”乌尔金道尔吉（肯特省检察长）：“我也同意这个建议。”大使：“大使馆二秘也没有别的建议。我们不需要再谈别的什么事了。”^[2284]

《调查报告》实际上也就间接地驳斥了坊间的众多不实传闻，如其中之一：“1972年1月，英国《新观察家》驻莫斯科记者听苏联人讲，苏联专家已把烧焦的林彪遗体整理出来，发现遗体上中了9颗子弹，呈蜂窝形。”^[2285]

《调查报告》同时证实：直至1971年11月20日，苏蒙方面对256号飞机乘员的真实身份仍然一无所知。

这样一来，《调查报告》实际上也就否定了孙一先如下一些说法。孙一先称，“后来得知，此时^[2286]苏联和蒙古已揣测到这架失事飞机上有个大人物，但是这个大人物是谁还不能确定，苏联克格勃已准备派专家挖出死者遗体进行检验。……

【2283】《在大漠那边》，页50。

【2284】蒙古国家安全档案：《许文益与桑加及其他人之间的对话》，1971年9月15日。

【2285】转引自《在大漠那边》，页99。

【2286】指1971年9月下旬。

而在9月23日以后提出索要遗体，苏联和蒙古当局对主要死者的身份已有所察觉了。”^{【2287】}

《调查报告》实际上更否定了时任苏联驻华大使馆政治参赞顾达寿在其口述回忆中的一些说法。顾达寿声称，1971年9月间，“苏联外交部已经从情报中获悉林彪叛逃的消息，考虑到我在中国多年而且认识林彪，故特别指定让我去蒙古辨认是不是林彪的尸体。”^{【2288】}

（三）蒙方判断 256 号飞机为中国军方拥有，用于军事用途

《调查报告》结论部分第1点称，“我们认为，这架编号256的涂有民用航空标志的飞机，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用于军事用途。在事故现场找到的无数实质性文件足以证明这个结论。”“非常清楚，这架飞机由中国军方所拥有。机上人员都是军官。”

蒙方这一判断，基本准确。而这一判断，是整个《调查报告》的基调。

据孙一先称，从1971年9月16日至17日，中蒙双方人员在肯特省首府温都尔汗，就坠机事件举行过五轮会谈。在第一轮会谈时，蒙方首席官员桑加上校就强调，“这是一架中国民航标记的为军事服务的乘有军事人员的飞机。”第二轮会谈蒙方提出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上飞行失事的现场调查纪要》草稿中最后称，“这些迹象证明，失事飞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人员使用的。”蒙方提出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失事遇难人员安葬的纪要》草稿中称，失事飞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军事人员驾驶的，1971年9月13日夜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2289】}

蒙方基于坠机现场实物而作出“256号飞机为中国军方所拥有，用于军事用途”的结论，无可厚非。而中国驻蒙古大使馆人员由于当同时掌握该飞机的信息十分有限，在会谈过程中坚持认为，“由于我们的唯一根据是国内的来电，看了现场之后，更加确认这完全是一架中国民航飞机，死难者都是机组人员，‘空中小姐’看上去年岁大了一些，估计是专机的需要。”^{【2290】}

孙一先后来承认，“‘九一三’事件真相大白之后，回头再看看关于‘军’还是‘民’争论的记录，的确就如同在埋葬死难者时，我们四个人毕恭毕敬地鞠躬默哀

【2287】《在大漠那边》，页97。

【2288】[俄]顾达寿口述、郑少锋执笔：《直译中苏高层会晤》，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页78。

【2289】《在大漠那边》，页47-50。9月13日夜应为9月13日凌晨。

【2290】《在大漠那边》，页51。

一样，使人感到有点好笑。有的同志甚至说，蒙方人员讲的256号飞机的性质、机上乘员都是带‘军’字的，符合实际，而我方在会谈中不够实事求是。”^{【2291】}

（四）蒙方误判256号飞机“正在我国领空执行一项特别任务”

《调查报告》结论部分第2点称，“该编号为256的中国飞机，正在我国领空执行一项特别任务”。从报告字里行间推断，蒙方所谓“特别任务”，不外乎就是军事侦察任务。因为这并非事实，所以，除了飞机上安装的保障飞行安全必须的一些普通设备“诸如导航雷达、气象雷达、无线电电台设施、高度测量仪等现代通讯导航设备和用于防卫的相关设备。与此同时，该飞机还安装了地面测量设备”外，蒙方并不能拿出飞机执行“一项特别任务”的更有力证据。

蒙方这一判断，自然离事实真相十万八千里。但这反倒可以证明，直到1971年11月20日止，蒙方调查委员会（自然也包括了协助调查的苏方人员）并不知晓这其实是一架叛逃中的飞机，如上文所述，更不知晓机上乘员的真实身份。

（五）《调查报告》认为飞机坠毁原因是飞行员所犯错误所致

《调查报告》结论部分第3点称，“该编号为256之三叉戟1E型飞机的坠毁原因是由于飞行员所犯的错误所造成。”此结论由4点事实证明。

“九一三事件”后大半年，以空军司令部军训部第二部长王海为首的中国空军专家组作出的报告认定：

（256号三叉戟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野外降落（也就是迫降）没有成功，造成破碎烧毁的。作出这种判断的主要依据有这样几点：其一，失事发生的场地是经过有意选择的。在温都尔汗附近这片戈壁滩上，这块地点地势是比较平坦的，飞机着陆的方向也刻意进行了选择，这些情况不可能完全是偶然的。其二，飞行员实施了野外迫降动作。他在飞机接地前主动打开了前开缝翼，这是着陆前必须进行的动作，前开缝翼只有人工操纵才有可能打开。其三，起落架轮毂完整，没有撞击和磨损的破坏痕迹，主轮胎良好，仍有气压，这说明在迫降时飞机没有放下起落架。其四，飞机是在有操纵的情况下尾部先接地的。而且是主动作出了使飞机迫降的选择。

根据各种情况判断，256号飞机当时之所以没有成功地实施迫降，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飞行员着陆动作不确切，没有做全，着陆速度过大，而减速板却未打开；其二，三叉戟是下单翼飞机，它的机翼、机腹部有油箱，在高速接地时，极易造成油箱破裂、机翼折断，引起燃烧爆炸；其三，当时飞

【2291】《在大漠那边》，页66。

机仓促起飞，机上没有副驾驶和领航员，飞机迫降时正是夜间，又处在完全陌生的区域，一个飞行员难以应付种种特殊情况。^{【2292】}

王海又称：“我们认为，当时 256 号飞机之所以要在温都尔汗实施野外迫降，主要原因是因为该机油料不够。……另外，因为机上没有领航员，地面又没有导航，当日恰逢暗夜，飞行员在空中不可能掌握精确位置，飞机是在这种情况下盲目降落。”^{【2293】}

中蒙双方结论的主要分歧点在于：中方认定该飞机采取了主动迫降措施，只是“着陆动作不确切，没有做全”；蒙方却认定飞机未有采取紧急着陆措施。主要相同点在于：双方都认为飞机的着陆速度过大，油箱存油造成爆炸燃烧。中方认定这两点是导致飞机坠毁的主要原因。

惟降低航速、放尽燃油才迫降，是潘景寅独自一人也能做到的。作为富有经验的资深飞行员，潘为什么没有这样做？中国空军专家组并没有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六）《调查报告》完全否定了“被击落说”和“阴谋说”

无论是蒙方的“坠毁原因是由于飞行员所犯的 error 所造成”或中方的“迫降失败说”，两者实际上是完全否定了坊间长期流传的飞机“被击落说”和“阴谋说”。

“苏联导弹击毁说”以陈晓宁《质疑林彪“9·13”事件》为发端。陈文称：此机既非迷航，也非叛逃，而是在有意利用民航飞机刺探完苏蒙方面的防空雷达后想逃回中国，于是下令向其开火，256 号飞机中弹发生爆炸并引起大火，飞机带着大火进行迫降，飞机着陆时动作有误并且机腹油箱破裂引发大火、大爆炸，导致机毁人亡。^{【2294】}继陈晓宁的文章之后，互联网上出现过的持“苏联导弹击毁说”有王年一、吴润生的《苏联导弹击落林彪座机》。该文称，“从飞机残骸上留下的大洞和目击者看到的飞机着陆前二十分钟已起火的事实，基本可以否定‘飞机迫降时爆炸起火’的结论，应是遭攻击后爆炸坠毁。”^{【2295】}

苏蒙方面击落 256 号飞机的新说法，以顾达寿为代表。顾称，“林彪和叶群、林立果乘坐一架军用飞机在山海关空军机场紧急起飞，却在飞越中国边境上空进入蒙古共和国的领空时被击落，在蒙古境内的温都尔汗坠毁。”“当飞机被击落坠毁后，蒙古共和国外交部立即照会中国驻蒙古使馆提出抗议，同时通过苏联驻蒙

【2292】王海：《我的战斗生涯》，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年，页 233-234。

【2293】《我的战斗生涯》，页 234。

【2294】陈晓宁：《质疑林彪“9.13”事件》。电子杂志《枫华园》特刊总第 32 期，2001 年 10 月 2 日。

【2295】电子杂志《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通讯（118）》，2002 年 1 月 21 日。

古使馆向苏联报告了这个情况。”^{【2296】}由于有国内高层知名人士早在顾的回忆录俄文版出版后，即对其类似言论不加分析地作过正面推介，^{【2297】}使不少不明真相的读者大为困惑。

“阴谋说”似乎始于王年一、陈昭的《256号飞机是在空中先起火后迫降的》。该文称，“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256号飞机空中起火呢？有人认为是被苏军导弹击中，也有人认为是被中国武器击中。除此之外，许多人（包括笔者）认为还有一个可能性是该机在起飞前安放了爆炸物，在空中的适当时机被引爆，造成飞机在空中起火。”^{【2298】}

王年一与人合作的《苏联导弹击落林彪座机》及《256飞机是在空中先起火后迫降的》，在蒙方调查报告面前完全站不住脚。

（七）《调查报告》没有提及256号飞机有“黑匣子”

关于256号飞机上的“黑匣子”，长期备受关注，传说甚多。

“黑匣子”即航空飞行记录器或称飞行事故记录器，其实包含了两个独立部分，一为飞行数据记录器（FDR），专门记录飞行中的各种数据；另一为语音记录器或称舱音记录器（CVR），专门记录驾驶舱及座舱内的各种声音。黑匣子具有极强的耐火、耐压、耐冲击、耐海水浸泡、抗磁干扰等能力，即使飞机已完全损毁，黑匣子内的记录数据亦能完好保存。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的飞行数据记录器并非黑匣子，并不具备黑匣子以上能力。此外，一般提及飞行数据记录器时，如无特别交待，可能仅指FDR，但亦有可能既包括FDR，也包括CVR。

最后没有踏上死亡之旅的256号飞机第二副驾驶康庭梓，在其《真相：专机副驾驶亲历“九一三”》一书中，提及256号飞机的黑匣子时称，“256号专机的事事故记录器是用钢丝或钢带作为录制材料录取信号的。”“林彪专机256号的黑匣子中的飞行数据记录器，是直径约15厘米的扁圆状物体，安装在飞机尾部的垂直安定面内。”“256号专机的语音记录器是一个扁平的长方体，长约40厘米，宽7-8厘米，高约15厘米，它安装在前驾驶舱领航员后面的无线电设备专用架上。”^{【2299】}

笔者对康庭梓以上说法存疑。

【2296】《直译中苏高层会晤》，页77-78。

【2297】阎明复：《前苏联外交官目睹“九一三”事件现场》。《炎黄春秋》，2009年第10期。

【2298】王年一、陈昭：《256号飞机是先起火后迫降的》。《重审林彪罪案》，纽约：明镜出版社，2004年，页470-471。

【2299】康庭梓：《真相：专机副驾驶亲历“九一三”》，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7月版，页261-262。

据有关资料记载，1969年12月，经周恩来批准，中国决定从巴基斯坦进口英国霍克·西德利航空公司1960年代中期生产、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使用过的三叉戟1E型中短程喷气式客机4架，分配给空三十四师作专机使用。1970年8月接收3架，编为250、252、254号，随后不久又接收1架，编为256号。随后，周恩来批准由英国直接进口三叉戟2E型17架，其中6架1973年分配予民航，其余11架分配予空三十四师。

据空军有关资料手册明确记载，三叉戟2E型飞机装有型号为PV726A的飞行数据记录器2个。^[2300]手册中记载的2个是否包含了飞行数据记录器和语音记录器，并未明确。至于三叉戟1E型飞机是否装有飞行数据记录器和语音记录器，手册中未有记载。

康庭梓承认，一旦发生重大飞行事故，“找到黑匣子后，获得其录取的信息，原则上要由飞机制造的国家进行，‘解铃还需系铃人’。因为，录制信息的编码是经过加密的。”但“有的在购买飞机的时候，一并将黑匣子的密码买了过来。”^[2301]

康庭梓上述说法原则上没有错，但至少部分不准确。其一，黑匣子由专业公司而非飞机制造厂商生产。所以，黑匣子信息解码应由黑匣子生产厂进行。其二，由于黑匣子自身并无解码功能，其储存的数据信息，需要通过地面重放设备将其释放出来。因此，要买回来的不是密码，而是解码设备。

据空三十四师有关机务人员称，三叉戟飞机无论是1E型或2E型，进口时均没有同时进口黑匣子解码设备，也没有进口黑匣子的维护、校验设备。故而，机上即使有黑匣子，它的工作情况、完好情况从来没有人要求检查过，工作与否，也从来不知道。^[2302]

虽然256号飞机上是否有黑匣子（尤其是语音记录器）直至今日尚难有定论，但康庭梓“可想而知”、孙一先“似可做出这样的判断”，均认为它已被捷足先登的苏联人拿走了。

康庭梓称，“根据孙一先的回忆，我国使馆人员进入坠机现场的时间，是在蒙古国与苏联的军事专家不止一次去过现场之后才赶到的。飞机坠毁的时间是9月13日凌晨2点30分，距我使馆人员15日下午奔赴现场，已经过去整整两天半

【2300】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机务参谋业务手册》，1975年10月，页380-381。

【2301】《真相：专机副驾驶亲历“九一三”》，页261。

【2302】访问包朝山记录，2016年1月11日。访问侯文仁记录，2016年1月13日。访问时念堂、梁金海记录，2016年1月12日。时念堂，时任空三十四师师长。梁金海，时任空三十四师工程部特设主任。

的时间。到现场时，发现有些遗物已经被整理过，可想而知，对他们有用的东西不会留在现场。反映飞机失事原因的黑匣子也绝不会遗忘在现场。”^[2303]

孙一先则称，“另外，据我国民航专家讲，三叉戟飞机从‘1E’开始，已装有70年代稀有的黑匣子。……因此，似可做出这样的判断：三叉戟256号飞机的黑匣子，连同中间的发动机，都被苏联人拆走了。”^[2304]

康、孙两人以上说法，在《调查报告》中同样得不到印证和支持。更进一步说，对照《调查报告》，康、孙以上说法十分令人生疑。

先不要说苏联方面对坠机事件异常快速的反应令人难以置信，即便256号飞机上确实有黑匣子，即便被苏方取走，也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才有作用：其一，黑匣子能够正常工作；其二，飞机坠毁时黑匣子没有损坏；其三，苏方必须借助黑匣子生产厂的解码设备才能解码。具备以上三个条件也好，不具备以上三个条件也好，基于苏蒙间的紧密合作关系，苏方怎么也应将黑匣子的情况向蒙方通报，作为供蒙方高层内部使用的《调查报告》，不可能不提及黑匣子可否解码的情况。然而，事实上，《调查报告》根本没有提及黑匣子，不仅《调查报告》第二部分“飞机的原产地、性能及其用途”中，没有提及256号飞机安装有黑匣子，而且，在事故原因分析时，《调查报告》无只言片语来自黑匣子。

第一〇二节 受“九一三事件”牵连的军人

“九一三事件”发生当月直到1973年，曾经红极一时的众多被视为林彪一系的军队高级干部先后遭到清查清洗。受牵连者被予以逮捕、隔离审查、免职审查等不同程度的惩处。事后复查，绝大部分人与“九一三事件”并无直接关连，他们的罪名多为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一、正军职以上军队干部（不含空军）

正军职以上军队干部（不含空军）解职审查的，据不完全统计为38人。其中文革前上将1人，中将12人，少将19人，大校6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14人（含中央政治局委员4人），中央候补委员7人。在两案审判时予以判刑4人，免于起诉9人。其余各人处理轻重不一。

1. 黄永胜（1910-1983）1955年授衔上将。建国后曾任第十五兵团司令员兼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华南军区副司令员，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5年任广

【2303】《真相：专机副驾驶亲历“九一三”》，页264。

【2304】《在大漠那边》，页27。

州军区司令员。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1968年增补为中央委员）。1968年3月任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1969年兼任军政大学校长。期间任广东省革委会主任。中共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1年9月24日，中共中央称其“参加林、陈反党集团的宗派活动，陷入很深，实难继续现任工作”，令其“离职反省，彻底交代”。1973年8月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指其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同年保外就医，安置青岛。1983年4月26日在青岛病逝。

2. 吴法宪（1915—2004） 1955年授衔空军中将。建国后曾任第十三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空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空军政委、司令员。1967年9月至1971年9月为军委办事组副组长，1967年12月至1971年9月任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中共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1年9月24日，中共中央称其“参加林、陈反党集团的宗派活动，陷入很深，实难继续现任工作”，令其“离职反省，彻底交代”。1973年8月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指其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同年保外就医，安置济南。2004年10月17日在济南病逝。

3. 李作鹏（1914—2009） 1955年授衔中将（1962年改中将）。建国后曾任第十五兵团参谋长，第一高级步兵学校校长，训练总监部陆军训练部部长，总参军训部部长，海军副司令员。1967年6月任海军第一政委，1968年3月任军委办事组成员，9月任副总参谋长兼海军第一政委。中共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1年9月24日，中共中央称其“参加林、陈反党集团的宗派活动，陷入很深，实难继续现任工作”，令其“离职反省，彻底交代”。1973年8月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指其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同年保外就医，安置太原。2009年1月3日在北京病逝。

4. 邱会作（1914—2002） 1955年授衔中将。建国后曾任第十五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华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南军区政治部第二副主任，总后勤部部长。1967年9月至1971年9月为军委办事组成员，1968年9月至1971年9月任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中共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1年9月24日，中共中央称其“参加林、陈反党集团的宗派活动，陷入很深，实难继续现任工作”，令其“离职反省，彻底交代”。1973年8月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指其确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九大后的海军主要领导，左起：张秀川、萧劲光、李作鹏、王宏坤、吴瑞林，1969年5月。其中李作鹏、吴瑞林、张秀川均因“九一三事件”牵连受审查。

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同年保外就医，安置西安。2002年7月18日在北京病逝。

5. 阎仲川（1922-2002）1965年大校军衔。建国后曾任广州军区副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广州军区参谋长。1969年5月至1971年10月任副总参谋长（曾兼总参作战部部长）。期间任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共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1971年10月隔离审查，1979年4月解除监管，1983年按正兵团职待遇离休。1988年7月获独立功勋荣誉章。2002年6月22日在北京病逝。

6. 黄志勇（1914-2011）1955年授衔中将。建国后曾任军委工程兵政委、装甲兵政委，1969年10月至1972年7月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共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1972年7月因“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有牵连”被撤销职务，隔离审查。1984年12月按副兵团职待遇离休。1988年降格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11年11月21日在北京病逝。

7. 陈 庞（1916-1984）1965年大校军衔。建国后曾任总后勤部司令部办公室主任，总后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1969年9月至1971年9月任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参谋长。1971年9月隔离审查。1981年1月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指其“犯有诬告陷害罪”，对其作出免于起诉的决定。1983年1月被开除党籍。1984年5月病逝。

8. 王希克(1918-1993) 1964年晋升少将。建国后曾任总后勤部军需部副部长、部长。1969年9月至1971年9月任总后勤部副部长兼供应部部长。文革期间为总后文化革命办公室主任。1971年10月隔离审查。1982年1月,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指其“犯有诬告陷害罪和诽谤罪”,对其作出免于起诉的决定。同年3月退出现役,按地市级待遇安置沈阳。1984年回北京由军队安置。1993年8月24日在北京病逝。

9. 伊文(1916-1992) 1964年晋升少将。建国后曾任总后勤部油料部副部长、部长,营房部部长。1969年9月任总后勤部副部长兼营房部部长(1970年免兼)。期间1970年6月至1971年9月任国务院燃料化学工业部革委会主任。1971年9月隔离审查。1982年5月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指其“参与林彪反革命主犯邱会作犯罪活动,犯有诬告陷害罪”,决定对其免于起诉。同月退出现役。1992年1月23日在北京病逝。

10. 张明远(1911-1996) 1955年授衔少将。建国后曾任总后勤部车辆管理部部长,运输部部长,军械部部长。1969年9月至1971年9月任总后勤部副部长。期间1968年4月曾任国务院五机部军管会主任。1971年9月免职后再未任职。1986年2月离休。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6年3月20日在北京病逝。

11. 严俊(1914-1998) 1955年授衔少将。建国后曾任国防部办公厅管理局政委,总参管理局政委。1969年9月至1971年9月任总后勤部副部长。1971年9月免职后再未任职。1979年离休。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8年10月12日在北京病逝。

12. 丁先国(1909-2001) 1955年授衔少将。建国后曾任总后勤部重庆办事处主任兼政委,重庆办事处主任兼后勤工程学院院长。1969年9月至1971年9月任总后勤部副部长兼重庆办事处主任。1972年10月停职审查后再未任职。1983年10月按正兵团职待遇离休。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1年11月11日在重庆病逝。

13. 戴金川(1918-2000) 1964年晋升少将。建国后曾任总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后勤学院院长。1969年9月至1971年9月任总后勤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71年9月隔离审查。1982年1月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指其“犯有诬告陷害罪”,对其作出免于起诉的决定。同年3月退出现役。2000年1月22日在北京病逝。

14. 靳来川(1911-1987) 1964年晋升少将。建国后曾任解放军总医院院长。1965年任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兼解放军总医院院长。1971年9月免职后再未任职。1986年12月离休。1987年7月13日在北京病逝。

15. 白辛夫(1913-1995) 1964年晋升少将。建国后曾任后勤学院军需系主任。1962年至1972年3月任总后勤部西安办事处主任。文革期间曾任西安驻军支援无产阶级革命派统一指挥部成员，陕西省革委会常委，中共陕西省委常委。1972年3月被解职后再未任职。1983年5月离休。1988年获独立功勋荣誉章。1995年10月23日在西安病逝。

16. 萧建飞(1917-1993) 1964年晋升少将。建国后曾任福州军区副参谋长，总参作战部副部长。1969年5月至1971年9月任军委办公厅主任。1971年9月被令停职检查。1972年11月军委命令免职。1975年3月后任总参测绘局副局长，总参军训部副部长，南京高级陆军学院校长。1988年获独立功勋荣誉章，1993年1月6日在北京病逝。

17. 袁升平(1912-2003) 1955年授衔中将。建国后曾任北京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60年12月起任济南军区第二政委。文革中曾任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二书记。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1973年被指“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8月宣布撤销济南军区第二政委、山东省委第二书记职务，留京“检查交代问题”，并撤销十大代表资格。9月被关押在京，销声匿迹长达四年之久。1977年9月解除囚禁，1979年8月平反恢复名誉。后任军事科学院第二政委，北京军区政委。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3年8月27日在北京病逝。

18. 南萍(1918-1989) 1964年晋升少将。建国后曾任陆军第六十军副政委，陆军第二十军政委。1967年8月后以二十军政委兼浙江省军区政委。期间任浙江省军管会主任，浙江省革委会主任，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1972年4月被指“上了林彪的贼船，陷得很深，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6月离职审查。1985年11月离休。1986年5月经中纪委复查，恢复正军职待遇。1988年获独立功勋荣誉章。1989年2月18日在杭州病逝。

19. 熊应堂(1911-1996) 1955年授衔少将。建国后曾任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陆军第二十军军长。1967年8月后以二十军军长兼浙江省军区司令员。1970年4月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二十军军长及浙江省军区司令员)。期间任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1972年4月，中共中央认定熊“上了贼船，陷得很深，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6月离职后到四川绵阳一军工厂边劳动边学习，接受审查。1983年恢复大军区副职待遇离休。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6年2月10日在上海病逝。

20. 周赤萍(1914-1990) 1955年授衔空军中将。建国后曾任东北军区空军政委、司令员, 沈阳军区空军司令员, 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国务院冶金工业部副部长。1969年8月至1972年10月任福州军区政委。期间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二书记。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九一三事件”后因1971年重印发行《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一书受到审查, 1972年4月中发[1972]16号中共中央文件中被点名“林彪死党”, 后在秦城监狱关押。1982年1月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声称其“与林彪集团案有牵连, 犯有参加反革命集团罪”, 对其作出免于起诉的决定。3月退出现役, 保留党籍, 按地师级待遇, 安排在福州定居。1990年8月6日在福州病逝。

21. 程世清(1918-2008) 1955年授衔少将。建国后曾任装甲兵政治部主任, 陆军第二十六军政委。1967年8月率部到江西支左。1970年11月至1972年2月任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政委。期间任江西省革筹小组组长, 江西省革委会主任, 省委第一书记。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因被认定“上了贼船”, “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 1972年6月离职审查。1978年10月被捕, 关押于秦城监狱。1982年1月解放军军事法院声称其“已构成诬告陷害罪”, “鉴于犯罪情节较轻”, “决定免于起诉, 予以释放”。3月退出现役, 按师级干部待遇转地方安置。11月给予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处分(保留党籍)。2008年4月29日在南昌病逝。

22. 杨栋梁(1916-1989) 1965年大校军衔。建国后曾任第二〇三师师长, 陆军第二十六军副军长兼参谋长。1967年8月率部到江西支左, 任江西省军区司令员。期间任江西省革委会副主任, 中共江西省委书记。1972年4月中共中央批转江西的请示报告称其犯了“严重政治错误”, 6月离职反省。后任济南军区装甲兵顾问。1988年获独立功勋荣誉章。1989年1月8日在济南病逝。

23. 韦祖珍(1912-1982) 1955年授衔空军少将。建国后曾任空军第四军政委、第五军政委, 空军工程学院政委, 福州军区空军政委。1971年2月任广州军区政委兼广西军区第二政委, 期间任广西区革委会副主任, 中共广西区委书记。中共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1973年2月被指“上了林彪贼船”, “来广西进行反革命夺权”, 隔离审查, 单独关押在北京原亚非学生疗养院。8月, 被免除党内外一切职务。1978年7月中央专案组决定解除隔离审查。1981年5月总政通知撤销中央专案组所作结论, 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恢复名誉。10月恢复大军区副职待遇。1982年10月11日在北京病逝。

24. 卜占亚(1918-1999) 1965年大校军衔。建国后曾任陆军第四十二军政委, 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1970年5月任广州军区副政委兼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后

改任第二政委)。期间任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湖南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1972年10月被指“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追随林彪反党集团，犯有严重错误和罪行”而受审查。1973年2月到北京汇报其问题，因“认罪”态度好，胡乱招供，得以解脱，中央决定另行分配其工作。3月，中发[1973]12号中共中央文件称其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严重问题，“上了林彪贼船”。8月，任兰州军区副政委。1979年改任兰州军区顾问，1980年1月免职。1982年12月，中共湖南省委通知，中央书记处批准同意撤销中发[1973]12号文件，原结论予以否定，称其“在湖南工作期间有错误，但不是参与阴谋活动的问题”。1983年离休。1999年2月13日在北京病逝。

25. 刘丰（1915-1993）1955年授衔空军少将。建国后曾任空军第三军军长，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1967年7月“七二〇事件”后升任武汉军区政委。期间任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二书记。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1971年11月因向李作鹏泄露毛泽东南巡讲话内容被撤职并被关押。1982年1月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声称其“犯有泄露国家重要机密罪”，对其作出免于起诉的决定。经军委批准，退出现役，政治、生活、医疗按师级干部待遇。1993年2月在武汉病逝。

26. 王新（1919-1991）1964年晋升空军少将。建国后曾任第十五军政治部主任、副政委，空降兵第十五军政委。1967年8月任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1971年7月任武汉军区副政委兼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期间任河南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中共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1972年11月被指“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中，上了贼船，陷得很深”，“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经中央批准离职反省。1978年7月定为敌我矛盾，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军籍，监督劳动。1980年河南省委作出复查报告，指其“没有参加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1981年9月中央书记处讨论同意中纪委《关于王新同志问题处理请示报告》，同意恢复其党籍军籍，由总政分配工作。1983年5月至1985年9月任武汉军区顾问。1988年获独立功勋荣誉章。1991年8月8日在武汉逝世。

27. 蓝亦农（1919-2008）1965年大校军衔。建国后曾任陆军第五十四军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政委。1969年4月任昆明军区副政委（1969年11月后兼贵州省军区第一政委）。期间任重庆市、昆明市革委会主任，贵州省革委会主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中共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1972年9月中央关于解决贵州问题的中发[1972]38号文件同意的《贵州省地、师级干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总结提纲》认定蓝“同林彪死党早就有不正常的关系”，“顽固地站在林彪反党集团一边，态度很不老实”。1973年9月被免除在贵州的党政职务，下放工厂学习、

劳动。1983年5月至1985年6月任昆明军区顾问。1988年获独立功勋荣誉章。2008年2月14日在北京病逝。

28. 梁兴初(1912-1985) 1955年授衔中将。建国后曾任三十八军军长,海南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1967年3月任成都军区司令员。期间任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二书记。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1972年3月中发[1972]14号中共中央文件附件指其“上了林彪贼船”,犯“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而受审查,免职发配太原化工厂监督劳动。1981年10月中共成都军区委员会称“经审查”,梁“未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有牵连”,有错误,“本人认错态度较好”,“建议不给处分”,后按大军区正职待遇安置在北京。1985年10月5日在北京病逝。

29. 陈仁麒(1913-1994) 1955年授衔中将。建国后曾任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军委炮兵政委。1970年12月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政委。中共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1972年3月中发[1972]14号中共中央文件附件认定其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而被免职审查。1973年2月至1979年11月发配兰州炼油厂监督劳动。1983年6月离休。1994年3月27日在北京逝世。

30. 温玉成(1915-1989) 1955年授衔中将。建国后曾任广州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1967年11月后任副总参谋长(1968年3月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军委办事组成员。期间任中央文革碰头会列席成员,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1970年6月降任成都军区第一副司令员。1971年11月被撤销职务,作为林彪同党关押审查。1976年12月解除关押。1983年军委经甄别调查结论为:办过错事,说过错话,不给予处分,恢复大军区副职待遇。1988年降格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89年10月29日在南京病逝。

31. 龙书金(1910-2003) 1955年授衔少将。建国后曾任四十三军军长,广东省军区司令员,湖南省军区司令员。1968年8月调任新疆军区司令员。期间任湖南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主任,中共新疆区委第一书记。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1972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京召开新疆工作会议,揭发批评了龙书金所犯的严重错误,12月中央决定免去龙书金在新疆党内外一切职务。1973年下放河南郑州劳动。1983年离休,享受大军区副职待遇。1988年降格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3年4月16日在广州病逝。

32. 吴瑞林(1915-1995) 1955年授衔中将。建国后曾任海南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南海舰队司令员。1968年8月至1972年10月任海军常务副司令员。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1972年7月至1973年2月被指为“上了林彪贼船”

受批判，1974年5月“因与林彪案有牵连”，经军委同意对其进行审查，“经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两谋’活动无牵连，但有严重错误”。1984年军委同意给予撤销党内外职务处分，按正兵团职待遇离休。1988年降格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5年4月21日在北京病逝。

33. 张敬一（1921-2007）1965年海军大校军衔。建国后曾任东海舰队航空兵政委，东海舰队政治部主任。1968年12月至1971年11月任海军政治部主任。1971年11月免职后再未任职。1981年2月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84年3月以副兵团职待遇离休。1988年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7年12月30日在北京病逝。

34. 易耀彩（1917-1990）1955年授衔海军少将。建国后曾任海军基地司令员，海军潜艇学校校长。1960年8月至1969年8月任北海舰队第一副司令员。1969年8月至1972年1月任北海舰队政委。期间任青岛市革委会副主任、主任。中共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1973年1月中发[1973]4号中共中央文件认定其与“林彪死党”及林立果“小舰队”一些骨干分子“秘密勾结，互相串连，大搞反革命阴谋活动”而被免职。1983年8月至1985年11月任海军军事学术研究委员会副主任。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0年10月3日在北京病逝。

35. 辛国治（1921-2013）1964年晋升少将。建国后曾任总政宣传部副部长、青年部部长。1968年10月至1972年1月任北海舰队政治部主任。1973年1月中发[1973]4号中共中央文件认定其与“林彪死党林立果”及“小舰队”一些骨干分子“秘密勾结，互相串连，大搞反革命阴谋活动”而被关押。1981年10月恢复工作后历任北海舰队副政委，南海舰队副政委。1985年离休后享受正兵团职待遇。1988年获独立功勋荣誉章。2013年7月22日在青岛病逝。

36. 张秀川（1919-2005）1955年授衔少将（1962年改海军少将）。建国后曾任第三兵团政治部主任，总政组织部副部长，海军政治部主任。1968年8月任海军副政委，1969年8月任军政大学政委。中共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1972年10月被隔离审查。1982年1月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声称其“犯有诬告陷害罪”，对其作出免于起诉的决定。3月退出现役。2005年5月8日在北京病逝。

37. 王秉璋（1914-2005）1955年授衔空军中将。建国后曾任空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后兼国务院七机部部长。1968年12月至1971年9月任空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国防科委第一副主任。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1971年10月中央决定对其停职审查，被关押在秦城整整十年。1982年1月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声称其“犯有泄露国家重要机密罪和玩忽职守罪”，对其作出免于起诉的决定。退出现役，恢复党籍，医疗享受师级待遇。1996年医疗待遇改为军级。2005年9

月25日在北京病逝，遗体一直存放在301医院的太平间冷冻。2017年5月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301医院举行，遗体火化。

38. 罗舜初（1914-1981）1955年授衔海军中将。建国后历任海军参谋长、第二副司令员，国防部第十研究院院长。1965年4月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兼国防工办副主任。1972年4月底中央决定：罗暂不参加科委党委常委工作，集中精力检查交代与林彪的关系等问题。1975年4月解除审查，改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同年8月改任沈阳军区顾问组长。1981年2月24日在沈阳逝世。

二、空军副军职以上干部

在“九一三事件”后的清查清洗中，空军是重灾区。空军副军职以上干部解职审查的，据不完全统计为43人（吴法宪主要工作在军委办事组，王秉璋主要在国防科委，未计算在空军人数内）。其中文革前中将1人，少将13人，大校8人。中央第九届中央委员1人，中央候补委员2人。两案审判时予以判刑4人，免予起诉2人。

1. 曾国华（1910-1978）1955年授衔空军中将。建国后曾任广西军区副司令员，沈阳军区空军司令员。1968年12月任空军副司令员。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1971年10月被隔离审查，1978年1月3日在北京病逝。1978年6月空军党委报经军委批准给曾下的审查结论是：“上了林彪贼船，积极参加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陷得很深，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1982年空军党委对曾国华的审查结论复议，报经军委批准，审查结论改为“犯了严重政治错误，并撤销原作审查结论”，“其骨灰建议按军级干部规格存放八宝山革命公墓”。

2. 刘锦平（1918-2003）1955年授衔空军少将。建国后曾任空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东北军区空军副政委，广州军区空军政委。1962年6月至1971年9月任民航总局政委。1966年10月至1971年9月任空军党委常委，1967年11月至1968年3月任军委办事组成员，军委政工组负责人。1971年9月被隔离审查。后被囚禁于秦城监狱。1978年4月被开除党籍。1982年退出现役，按正师职待遇交地方安置。2003年10月20日在北京病逝。

3. 何振亚（1913-1978）1955年授衔空军少将。建国后历任东北军区空军司令部参谋长，沈阳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68年12月至1971年10月任空军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部长。1971年10月2日，经空军党委批准，“隔离交待问题”。1978年10月24日在北京病逝。

4. **王飞**（1922-2014）1969年9月任空军副参谋长兼空司办公室主任。1971年9月被拘押。因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篡党夺权行动”被视为林立果“小舰队”最核心成员之一。1974年患精神病。1978年4月经批准“永远开除其党籍”。1981年保外就医。2014年10月16日在北京病逝。

5. **朱虚之**（1912-2000）1955年授衔空军少将。建国后历任空军技术部政委，空军第二高炮指挥部政委。1969年10月至1971年9月任空军副参谋长。1971年9月被隔离审查。1988年2月正式办理离休手续，恢复党组织生活，同年降格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0年11月8日在北京病逝。

6. **胡萍**（1923-2008）1965年空军大校军衔。建国后曾任空军独三团团团长，空三十四师师长，负责国家领导人的专机派遣和保障任务。1969年10月至1971年9月任空军副参谋长兼空军第三十四师党委书记。1971年9月被拘押，在秦城监狱囚禁多年。1982年3月解放军军事法院指其“为林彪反革命阴谋活动提供飞机，造成严重后果，已构成资敌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释放后安置于山东潍坊，后回北京居住。2008年4月20日在北京病逝。

7. **江腾蛟**（1919-2009）1955年授衔少将（后改空军少将）。建国后曾任广州军区防空军政委，空军第四军政委。1966年12月至1968年4月任南京军区空军政委。1968年4月因反许世友被免职。1969年9月至1970年1月任空军政治部党委书记。1971年9月被拘押。1978年4月被开除党籍。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81年10月保外就医，安置太原。2009年5月8日在北京病逝。

8. **戚先初**（1918-1991）1964年晋升空军少将。建国后曾任沈阳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后勤部政委，空军后勤部副政委。1971年10月4日经空军党委批准停职审查。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1年3月9日在北京病逝。

9. **王宝功**（1921-2014）1965年空军大校军衔。建国后曾任空一师政委，以正军职待遇离休。1988年获独立功勋荣誉章。2014年4月11日在大连病逝。

11. **吉世堂**（1923-1998）建国后曾任空军第二师师长，空军第四军副军长，1968年12月至1971年9月任空军第六军军长。1971年9月22日空军、北京军区空军党委决定其停止工作。此后再未任职。1998年7月12日在上海病逝。

12. **司中峰**（1916-2003）1964年晋升空军少将。建国后曾任空军第十师政委，空六军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1968年12月至1971年9月任空军第六军政委。1971年9月22日空军、北京军区空军党委决定其停止工作，此后

再未任职。1981年离休后享受正军职待遇。1988年获独立功勋荣誉章。2003年6月19日在唐山病逝。

13. 王绍渊(1920—2003) 1961年晋升空军少将。建国后曾任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副政委。1968年4月停职检查。1970年4月任兰州军区空军副政委。1971年11月被隔离审查。1982年4月空军党委纪委通知，中央军委纪委对其结论为在同林彪反革命集团斗争中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经党中央批准，开除其党籍。1983年以副军职待遇离休，安置在北京。2003年1月3日在北京病逝。

14. 李全春(1919—2010) 建国后曾任兰州军区空军副参谋长，空军第九军副军长兼参谋长、政委。1970年4月至1973年3月任空军第九军第一政委。期间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1973年3月军委命令免去其空九军第一政委职务，此后再未任职。此前，新疆军区已于1972年10月停止齐国忠空九军司令部参谋长、陈冠空九军政治部主任职务。齐国忠、陈冠此后亦再未有任职。李全春1988年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10年3月29日在乌鲁木齐病逝。

15. 周建平(1919—2016) 1964年晋升空军少将。建国后曾任总参第二部处长，军委防空军作战处处长，空四军参谋长、副军长、军长。1969年月至1971年9月任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1971年10月经军委批准被隔离审查。1982年1月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指其“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有牵连，犯有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对其作出免于起诉的决定，按师职干部待遇安置地方。2016年11月25日在上海逝世。

16. 王维国(1919—1993) 1965年空军大校军衔。建国后曾任空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空五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空四军第二政委。1969年3月任空四军第一政委。1971年7月任南京军区空军党委副书记兼空四军第一政委。期间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中共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1971年9月隔离审查。1978年6月被开除党籍。1982年3月解放军军事法院以“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策动叛乱”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1985年刑满后被安置在河北邯郸永年县。1993年6月6日在邯郸病逝。

17. 陈励耘(1919—2004) 1965年空军大校军衔。建国后曾任空军师政委，空军第五军政委。1971年7月至1971年9月任南京军区空军党委副书记兼空五军第一政委。期间任浙江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中共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1971年9月被押送中央隔离审查。1976年12月囚禁于秦城监狱五年。1978年6月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开除其党籍。1982年3月，解放军军事检

察院声称其“参予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罪行较轻”，决定对其免于起诉。5月按一般干部待遇退出现役，安置于浙江嘉善。2004年12月病逝。

18. 胡立信（1914-2015）1964年晋升空军少将。建国后曾任空军高炮学校政委，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1969年至1971年9月任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1971年10月经军委批准隔离审查。1982年离休，享受正军职待遇。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15年1月24日在南京病逝。

19. 郑长华（1926-2017）建国后曾任空军第十二师师长、空军第四军副军长、军长。1971年9月南京军区党委决定其为空四军党委第一书记。10月军委电令其兼任空四军政委。1972年2月根据中央专案组决定，被送中央专案组审查。与郑长华一起送中央专案组审查的还有空四军第二政委姬应伍。空四军政治部主任张启文则被送空四军学习班审查。此前，空四军副政委刘志林（兼任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1971年10月已被上海市公检法隔离审查。郑长华1983年离休前任武汉军区空军副参谋长。1988年获独立荣誉章。2017年9月23日在武汉病逝。

20. 冯 键（1921-1978）建国后曾任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保卫部部长，空五军政治部主任。1969年9月至1970年12月任空五军第一副政委。1970年12月至1971年9月任空五军第二政委。1971年11月南京军区空军党委决定撤销冯键的职务，同时被撤职的还有空五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王是桥，空五军副军长兼参谋长马运河。11月军委电令对冯键实行隔离审查。1978年1月30日在上海病逝。逝世时南京军区转达总政指示：“对冯键同志不作结论，不给处分，按原职级（正军级、行政11级）待遇。”

21. 王 璞（1917-1995）1963年晋升空军少将。建国后曾任广州防空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空军第七军军长，1968年5月至1971年9月任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1971年9月被解除职务，隔离审查，后交广州军区空军按师职干部安置。1995年9月28日在广州病逝。

22. 林 虎（1927-2018）建国后曾任空军第十八师师长，广州军区空军军训部部长，空军兴宁指挥所主任。1968年5月任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1971年9月免职审查。1977年9月降任空军第九航空学校副校长，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副主任。1983年5月至1985年9月任空军学院副院长。1985年9月至1992年10月任空军副司令员。1988年授衔空军中将。1994年10月退役。2018年3月3日在北京病逝。

23. 顾同舟(1920-2007) 1965年空军大校军衔。建国后曾任空军第一高级专科学校校长。1970年4月至1971年9月任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1971年9月被隔离审查。1978年被开除党籍。1980年7月被逮捕,1982年8月因将毛泽东南巡讲话内容密报周宇驰转报林立果等,解放军军事法院称其“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提供重要情报,后果严重,已构成资敌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2007年在深圳病逝。

24. 解耀宗(1926-2015) 建国后曾任空军第二十六师师长,广州军区空军军训部部长,空军兴宁指挥所主任。1969年6月至1971年9月任空军第十二军军长。1971年9月隔离审查。与解同时接受审查的,还有空军第十二军副军长沈科、张守恩,军政治部主任马进修。解关押在“亚疗”七年多,后被转押到秦城监狱三年多,与关锋、周赤萍、刘锦平同一牢房。1981年12月解除关押,1984年7月总政治部、军委纪委批复空军党委称:“经中央军委批准,同意对解耀宗同志所犯的错误的审查结论。决定给予留党察看一年(察看期自1984年7月11日至1985年7月11日止),行政撤职,由十二级降为十三级处分,按副师职待遇退休安置。”2015年6月13日在广州病逝。

25. 解长林(1917-2002) 1964年晋升空军少将。建国后曾任空军第一航空学校校长,空军雷达兵部主任。1969年12月至1971年9月任武汉军区空军副政委。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因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有牵连”被停职再未任职。1983年3月离休。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2年1月16日在北京逝世。

26. 查全伦(-1983) 1965年空军大校军衔。建国后曾任广州军区空军工程部部长、政治部主任。1971年5月至9月任福州军区空军副政委。1971年9月“因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牵连”,经中央军委批准,由福州军区隔离审查。1972年1月由中央专案组审查。1978年5月逮捕关押。经侦察核实,犯有严重错误,但没有构成犯罪,经中央批准,于1981年10月撤销案件,予以释放。1983年8月3日病故。1983年8月17日,经军委批准,保留其党籍,按正师待遇安排后事。

27. 鲁鸣(1923-2008) 建国后曾任空军政治部青年部部长,空军师政委。1968年6月任空军第八军政委。1970年12月空军政治部通知,调其以“学习组”成员名义到人民日报社帮助工作,从此再未回空八军。1971年11月进空军路线教育学习班接受审查。1982年12月空军党委批复不作结论。1983年9月离休。2008年4月6日在南昌病逝。

28. 李登云 建国后曾任空军第十四师政委。1970年12月至1972年6月任空军第八军副政委。期间任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政治部负责人，中共江西省委常委。1972年4月中央批转同意的江西请示报告称李登云犯“严重政治错误”。1972年6月中央电示解除其支左任务，回福空检查交代问题，后由福空组织专案审查。1983年3月7日，空军党委批复免作结论。

29. 吴宗先(1916-1994) 1955年授衔空军少将。建国后曾任空军第六军军长。1967年9月至1972年12月任济南军区空军司令员。1972年12月离职接受审查，后再未任职。1973年1月7日中发[1973]4号文件点名“林彪死党先后窜来我省与易耀彩、辛国治、吴宗先、包玉清等秘密勾结，互相串连，大搞反革命阴谋活动”。1983年离休。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4年6月23日在济南病逝。

30. 马杰三(1924-2015) 建国后曾任广州军区空军汕头指挥所副主任，空军第七军副军长，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副主任。1968年年5月至1971年11月任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主任。1971年11月昆明军区党委决定马隔离审查。问题查清后，1973年调任兰州军区空军司令部顾问。2015年4月22日在石家庄病逝。

31. 张东梅(1916-2005) 1965年空军大校军衔。建国后曾任空二十三师师长，空军二航校校长。1965年6月至1971年11月任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副主任。1971年11月昆明军区党委决定张隔离审查。问题查清后，1973年调成指司令部帮助工作。2005年5月26日在成都病逝。

32. 丁钊(1920-2015) 1964年晋升空军少将。建国后曾任空降兵第十五军第四十三师政委，军副政委。1965年9月至1971年10月任成都军区空军指挥所政委。1971年10月经成都军区党委批准，进军区“批林整风学习班”接受审查。1972年1月转中央专案组审查。与丁钊同时接受审查的，还有成都军区空军指挥所副政委周德润，政治部主任李万增。1972年3月中共中央[1972]4号文件称“林贼一伙……又先后派出死党……来川进行反革命串连，同丁钊策划过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1982年6月离休。1988年7月获独立功勋荣誉章。2015年3月28日在大连病逝。

三、“小舰队”成员

“小舰队”成员中，两案审判时判刑12人。其实，“小舰队”除已死去的核心成员周宇驰、于新野、刘沛丰及未死的李伟信外，其余对林立果针对毛泽东的行动意图并不知情。更如鲁珉在9月14日即对林立果刺杀毛的企图作了揭发，应算有功人员，却反被判以重刑，处理显失公允。

1. 李伟信 空四军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直接参与研究制定《“571”工程纪要》的成员之一。1971年9月13日凌晨外逃未成被捕。1981年5月因“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投敌叛变（未遂）罪”，被空军军事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2. 刘世英 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1971年9月被中央专案组隔离审查。1981年5月，因“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罪”，被空军军事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3. 贺德全 空军司令部情报部部长。1971年9月被中央专案组隔离审查。1981年5月，因“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罪”，被空军军事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4. 王永奎 空军司令部情报部技侦处副处长。1971年9月16日在广东源潭被抓获。1981年5月因“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罪”，被空军军事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5. 程洪珍 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秘书。“九一三”当日凌晨在山海关机场现场。1971年9月被中央专案组隔离审查。1981年5月因“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罪”，被空军军事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6. 郑兴和 空军司令部军务部装备处处长。1971年9月被中央专案组隔离审查。1981年5月因“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罪”，被空军军事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7. 鲁珉（1926-2000）建国后曾任空军第十二师副师长，南京军区空军军训部副部长，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党委书记。曾获“一级战斗英雄”称号。1970年4月调任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1971年9月14日，鲁珉向在空军临时主持工作的李德生报告：1971年9月11日，林立果让他驾驶轰炸机轰炸毛泽东的专列，他不干，在妻子的帮助下，用盐水弄红了眼睛，以急诊名义住进了空军总医院。李德生立即报告了周恩来。据说周恩来称：鲁珉的揭发很重要。9月15日以“保护”名义关押在“亚疗”。1978年4月，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开除其党籍。移送至秦城监狱囚禁。1981年5月因“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罪”，被空军军事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并剥夺一级人民英雄称号和解放奖章。2002年12月21日在北京病逝。

8. 许秀绪 空军雷达兵部副处长。1971年9月16日在广东源潭火车站被抓获。1981年5月因“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罪”，被空军军事法院判处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

9. 朱铁铮 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二处处长。1971年9月被中央专案组隔离审查。1981年5月因“犯有积极参与反革命集团罪，参与策划南逃广州”，被空军军事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

10. 陈伦和 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外事秘书。1971年9月至1981年5月被羁押审查。1981年5月因“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罪”，被空军军事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

11. 陈伯羽 广州军区空军司令部管理处处长。1971年9月至1981年5月被羁押审查。1981年5月因“犯有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提供情报罪”，被空军军事法院判处有期徒刑4年。

12. 王琢 空军司令部管理局副处长兼汽车队队长。1971年9月16日在广东源潭火车站被抓获。1981年5月因“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被空军军事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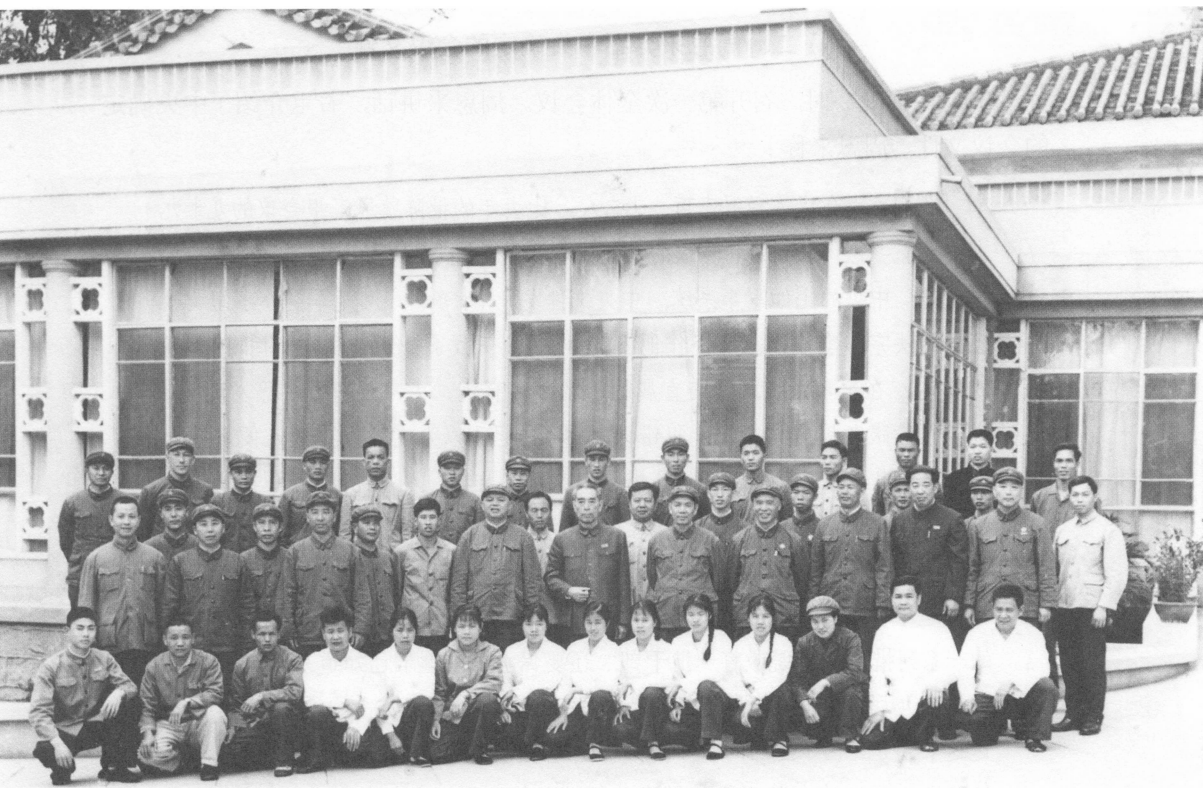
第十二章

1972-76：波瀾不惊

第一〇三节 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

一、毛泽东提出召开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

“九一三事件”大半年后，1972年5月3日，毛泽东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提出，召开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当天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毛的提议进行了讨论。5月6日，毛泽东阅批周恩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的通知》稿：“照发”。通知称：我党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是我党路线斗争中最严重的一次。通知概述了从“九一三事件”发生以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的主要措施。^{【2305】}并称，“为了总结和交流这一时期的经验，以利于进一步揭发和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使全党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中央决定从5月20日起，召开一个全国性的批林整风汇报会议。”



周恩来在广州接见广州军区主要负责人，
二排右五起：孔石泉、丁盛、周恩来、任思忠，1972年4月。

【230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433。

5月19日，毛泽东审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称：这个材料经过专案组多次编写，又经江青、春桥、文元、登奎、东兴等同志多次讨论和修改，最后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读了一遍，并又作了修改，成为送审稿。如大体可用，请批示印发这次批林整风会议。会中会后，还可修改，再发全国。毛泽东批示：“同意印发，征求意见。”材料共三个部分：林彪反党集团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罪证；林彪反党集团准备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罪证；林彪反党集团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和失败后叛国投敌的罪证。

出席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军队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共312人。按六个大区、中央机关、国务院机关、军委直属机关，编了九个大组。至会议结束，会议编发有编号文件八种，参阅文件十七种，未编号文件六种，会议简报二百二十四期。

二、周恩来介绍中央确定的会议文件

5月21日晚9时，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周恩来讲，着重介绍了中央确定的会议文件。周恩来称：

我们这次会议人数是三百一十二人，比去年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的九十九人扩大了。鉴于去年那个会议的人数比较少了一些，因此传达也就不很广。地方还好，中央的比如军事系统，中央文件发了六十多份，可是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他们就扣住了，只发了七份。所以当时批陈整风的传达，在军事系统，军委直属的，就非常窄狭。去年七月被主席发现了，说要继续跟各地方打招呼。犯错误就是要自己引以为戒，就要逢人便讲嘛，这才能够自己得到教训，得到警惕，人家可以监督，人家也可以引以为训嘛。这是主席对于历来犯路线错误的教导嘛。但是，当时黄永胜他们就不是这个态度。

这一次我们这个会议的名字改成批林整风了。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主席的一系列措施，都是教育一批干部，还要保林，使他自己知道那个错误的严重，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也是如此。《我的一点意见》，把打击的矛头对准了陈伯达这个骗子，由于主席的教导使相信他的人、上当的人觉悟了，警惕起来了。使跟他搞阴谋的人就不要搞了嘛。所以，从九届二中全会到去年九月十三日事件以前，一直提的是批陈整风。整个精神，从文件上你们可以看出，也是如此。但九月十三把这个问题真相揭穿了，头子就是林彪，而不是林、陈，

不像高饶联盟那样。林彪搞的是阴谋活动，他反党、反主席的思想是长期存在的。刘少奇以后就是他挂帅来反对主席了。他是搞阴谋的，但是阴谋逐步要暴露，最后灭亡。这次第十次路线斗争，主要矛头就是要批判、揭露、粉碎林彪这个反党集团，教育大批干部，团结大批干部，是这样一种精神。所以，这次开的会议就定名为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也不要再说林彪反党集团了，就是林彪反党集团。

这场斗争，从二中全会以来分成两个段落，是贯串主席一条红线来指导这个运动的。因此人数我们就提议扩大，主席批准了。

这一次批林整风会议，首先要学文件。文件相当多，要把它归一下类。政治局原来讨论了，昨天又请示了主席，刚才政治局又开会讨论，大概初步定为这样的一些文件，正式的会议文件，有六种。

文件之一，就是《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和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毛主席的文章、批示和重要谈话》，一共十二件。《我的一点意见》，主席和斯诺的谈话，以及主席去年八、九月巡视南方各地，跟各地主要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这三个是全文，其他是批件。比如说主席对中联部关于跟荷兰党内的人谈话的批示；对三十八军报告的批示；对济南军区政治部的报告的批示；对华北会议的批示；对去年计划会议的批示等等，这些都可以在会议文件之二大本里找到。这个只印批示，不印原来的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去查就行了。……

文件之二，就是刚才说的，从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有主席批示的、中央发的有关文件都印在一起了。这里头有的是要查的了，比如刚才说的主席的八个批示，从文件之二里头就可以找到报告的原文。同时，也有跟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联系起来学的，如材料之一，材料之二，在那个大本子里也有。从九届二中全会到九月十三日编为第一本；九月十三日以后到现在编为第二本，分为两个段落。

另外有一个单页电报，是批评新疆关于新疆日报擅自登出林彪大幅照片等严重错误的。这样性质的错误，不仅新疆有，浙江也有，比如这回安徽报告上检查也有。恐怕别的省这回讨论，你们回去自己检查也可能有。……

文件之三，这是这回学习的重点之一，就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原来已经发了材料之一、材料之二；现在发材料之三。这个作为送审稿，还不作最后稿。主席在上面批了：“同意印发，征求意见。”就是到会的三百一十二位同志都可以直接提意见，同时也可以拿这些材料深入地批判，深入地揭发。如果在批判和揭发当中，还有新的、好的材

料，更有分量的材料，还可以补充进来。会后我们再进一步修改，作为中央文件发到各地去，层层下达。

文件之四，就是中央专案组关于国民党老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罪行的审查报告以及陈伯达反革命历史的罪证。……

至于材料之三那个前言，主席昨天也说了，“继续审查”那句话可以不写。主席说，大的罪状已经足够了，再多就是补充就是了。这个文件现在都已经印了，主席批评的意见，我们把它说出来，大家知道就是了。当然，也不是说没有材料了，不审查了，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再揭发也就是这类性质的问题了，还有比这个更凶的吗？要谋害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这个谋害罪状千真万确的证据，那么多嘛，人人愤慨的嘛。……

现在确定的文件之五，是最重要的一篇，就是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信。这个信只有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看过，在座的你们各省市的，还有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没看过。就是在“九一三”以后，今年印的吧？这封信是什么时候写的呢？就是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政治局扩大会议林彪在河北厅讲话以后，林彪讲话经过多次改动，送到主席那里，主席总是有点不安，里头有些话过头，叙述政变那种写法也不当。但是当时是为的要发动文化大革命，鼓革命群众之气，要打击、扫除那种修正主义的风，所以说有些过。但是当时的中央修改以后，还是请主席批。主席觉得不批，这篇东西不能发表，不是等于给群众泼冷水了吗？因为大家希望看到这篇东西嘛。实际上这里头有毛病，有些极“左”的话，有些不恰当的。现在大家回想回想恐怕就会看出来。林彪那篇东西是不是可以作为参阅文件印给大家？刚才政治局会议没有讨论，再看一看。毛主席这封信一针见血。主席写这封信是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在武汉写的，我是七月十一日到武汉。那时见了个外宾，我跟主席报告我到国外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以后，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见主席，主席就把给江青同志的那封信的抄件给我看。是一个底子，那个字是徐业夫同志抄的，有些字还抄错，主席还改了的。那个信可写的深刻，现在大家想想看，那简直是完全看到了这些问题。当然了，当时不是说林彪这个人了，也可能想着利用右派来搞。那封信指的林彪那些极“左”的话，这个极“左”，就形“左”实右，就落在林彪身上，是个右派。主席说七、八年后，结果六年就出现这个事了。只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预见到这么清楚。这封信贯穿了整个文化大革命，大家可以看一看。当然了，那封信可能有些事情大家不大懂的，

将来我们参加政治局的作日常工作的九个同志分到各组里，还可以加以解释。这个大概明天可以印给大家。非常深刻的一封信。前天，我们政治局决定要请示主席，我昨天去请示主席，原来主席还说等一等，昨天一请示说可以。这个我们当然先印给到会同志看了，先不外传了。这是会议文件之五。以上这些文件现在有的已经发了，有的明天要印发。

我们的会议除正式文件外，还有参阅的文件，我们也是不多选，选那些重要的。

参阅文件之一，就是军委办公会议收集的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军事路线的罪行，有两本，我们现在选他第一本。……

参阅文件之二就是在学习批林整风的一些文件时，在京的中央委员的一些老同志，有九位同志写了书面意见，我们也把它印出来了。老同志中有朱德同志、陈毅同志、富春同志，聂荣臻同志、还有曾山同志、邓子恢同志（邓子恢同志现在病着，请假）等一共九篇。此外，还有一些老同志，如果还有揭发材料，我们还可以续印。

参阅文件之三，就是李力群同志对林彪罪行的揭发。……

参阅文件之四，就是刚说的《论短促突击》这篇全文找到了。这个事情也说明，尽管林彪死党那么精，到处都控制，就在军事博物馆的军事文献里，就有林彪的《论短促突击》。我看军博的那个管事的人大概也没去看，被我们耿飚同志派人去发现了，抄给我，是全文。……

参阅文件之五，是中央联络部搞的，就是中苏关系里头有十一个问题，它不是编年的，是按问题的性质分的。这个文件里头是讲些事实了，说明中苏关系是怎么造成的，都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搞我们的了，从海军基地、两国联合舰队这些引起的了。也作参阅文件。

今天政治局讨论，打算在会议文件里加一个之六。就是在二年半之中，前年九届二中全会到去年批陈整风，吴法宪、叶群先作了检讨，这个检讨都是前年写的，吴法宪检讨是九月二十九，叶群检讨是十月十二，这个检讨当然不深刻，但是先给主席看了，主席批得很尖锐。这两个批件很值得学习。所以，我们打算把他们这两个检讨印出来，印小一点，把主席批示印大一点，使大家可以学习。主席是批得很尖锐，但是总是教育他们，希望他们改。

然后就是去年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的时候，黄、吴、叶、李、邱五大将的检讨了，那个检讨他们都是对了口径的。我们有时候帮他改，说那些东西应该说的更深刻一点，因为他给我们看过嘛。主席还是启发他们，先得到的是黄

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的；主席还提议帮他们加一段，说，你们如果同意，你们把这段加进去。后来就是吴法宪、叶群的，主席也批了，这些在批陈整风会议上发给大家的，我们这回打算跟前面两个批件摆在一起也把它再印出来。他们的检讨现在看许多是假话了，但是主席根据他们的书面的话，还是尖锐的批了，还寄予希望，要他们改的，我们可以对照来学。我们今天商量这作为文件之六，大概这个报告主席，主席会同意的，因为这样更有利嘛。

从前年庐山会议起，到去年“九一三”，把这一段主席的这些文件汇集起来，这样就更看得完全一些了。所以我们这样学习就会更深入。这一次是我们党内第十次的路线斗争，也是最尖锐、最严重、最复杂的一次阶级斗争。^{【2306】}

三、毛泽东致江青的信

周恩来提及的文件之五，“最重要的一篇”，即1966年7月8日毛泽东致江青的信，1972年5月31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全文如下：

江青：

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追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交以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

【2306】《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录）》，（速记草稿，未经本人审阅），1972年5月21日。《“文革”十年资料选编》中册，页176-189。

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吧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

清华), 盘根错节, 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 他们失败就越惨, 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 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 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 前途是光明的, 道路是曲折的, 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 一写就很长, 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2307】

5月25日至27日, 江青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华东组和中南组会议上作了三次发言, 对毛泽东给她信的来龙去脉作了简单的说明。经过“综合整理”的江青讲话称:

一九六六年, 中央在杭州开四月会议, 当时我在上海, 不知道会议情况。五月初, 中央在北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我还在上海, 也不知道会议情况。一九六六年七月, 我收到了主席给我的信, 当我读到:“我的朋友的讲话, 中央催着要发, 我准备同意发下去, 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他的一些提法, 我总感觉不安。”“在重大问题上, 违心地同意别人, 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我当时虽然不知道主席指的是谁, 但是我感觉到事关重大, 心情沉重。当时和现在, 我始终认为, 这封信不是写给我一个人的, 是写给全党、全国人民的。信中讲了世界革命问题, 所以, 也是写给全世界人民的。不过在当时, 主席不好写给别人, 只能写给像我这样的人。

听说主席写了这封信后, 要秘书抄了一个抄件, 并在抄件上做了亲笔修改。在主席那里(即白云黄鹤之处)首先看到这封信的抄件的, 是总理、王任重。总理看了这封信后, 提出他去大连说服林彪改正。主席同意。总理劝告林彪不要再作那种提法, 据说当时林彪表面上是答应了。因此,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 中央专门发了一个通知。现在事实证明, 他实际上是耍了两面派。最近查了一下过去的批件, 主席把林彪这个讲话, 一直压到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九号才批发。【2308】

江青称, “总理看了这封信后, 提出他去大连说服林彪改正。主席同意。”惟周恩来本人在介绍这封信时却没有这样的说法。更令人不解的是, 1972年印发的据称是此信的抄件, 至于原件的下落, 周、江均未有只言片语提及。后来有一种

【2307】《毛泽东致江青同志的信》，1966年7月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1972年5月31日印发。

【2308】《江青同志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华东组和中南组会上的讲话》，1972年5月25日-2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1972年7月9日印发。

说法：原件当时就烧了，只留下抄件。惟此说法十分蹊跷：在“最高领袖”声望如日中天之际，他若写了如此重要的信，怎么可能被烧掉呢？而且，在公布所谓抄件时，为什么不能像公布《“571工程”纪要》般同时公布该抄件的影印件？由于有悖常理，不免使人心生疑窦：1972年印发此信时，是否对抄件作过文字上的修改，以致公布的已非原文？

四、周恩来关于党的历史的报告

5月22日上午至6月10日下午，会议分组学习文件，重点为学习和讨论毛致江青的信。边读边议，与揭发批判、情况汇报、个人检讨三者相结合。此期间，由王良恩组织安排，与会者参观了毛家湾林彪住地及李作鹏、邱会作的住地。

6月10日，空军王辉球、曹里怀、邝任农、薛少卿、梁璞五人作揭发批判和检讨时称，“空军党委原八个常委中，就有林彪死党和亲信四人，在空军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民航机关，初步查明属于林彪反党集团的死党、骨干以及陷得较深的就有一百七十人，占机关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八，其中：副参谋长、后勤部长和相当于这一级的干部有八人，占同级干部的百分之十九。二级部正副部长四十一人，占同级干部的百分之三十五。处级干部六十七人，占同级干部的百分之二十一。一般干部五十四人，占同级干部的百分之四。”“司令部十五个部门，被他们几乎基本上控制的有六个（党办、作战部、情报部、雷达兵部、军务部、空司政治部），其余九个也被部分控制或安了钉子。政治部七个部处被他们几乎基本上控制的有五个（空军报社、干部部、秘书处、群工部、组织部），其余二个部也都安了钉子。民航政治部各部几乎基本上被他们所控制。”^[2309]

6月10日-12日，周恩来连用三个晚上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报告。报告依次就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瞿秋白盲动主义、李立三冒险主义、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以及抗日战争时期的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历史过程、错误危害等详加论述和说明。在谈到王明“左”、右倾错误问题时，结合个人亲身经历，对自己作了严厉的剖析乃至过分的检讨。在讲述了党的历史之后，表示：“我入党五十年，没有离开党的队伍。经过长期的复杂而又激烈的党内外、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的考验，我还在为党工作，继续坚持对敌斗争；年老了，也还有些革命朝气。”又说，

【2309】《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简报》总138号，1972年6月10日。

这几年我常说按马列主义、毛主席思想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但做起来也并不容易。我平常爱读鲁迅和毛主席的各两句名诗以自勉：“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现在凡是在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中沾了边甚至陷得深的同志，都应该得到启发，不应该有任何顾虑。要彻底交待，认真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2310】}

6月13日-15日，座谈讨论了周恩来的报告。

6月16日-17日，讨论了《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送审稿）和《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送审稿）及其附件。7月2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正式下发了这两份材料。

6月19日-21日，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军事路线的罪行”。

6月23日，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乔冠华作《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胜利》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对1932年国民党特务伪造“伍豪启事”的情况作了详细说明。同时，还讲述了1967年5月19日就此事专门写给毛泽东的报告，公布了毛泽东1968年1月16日为此写的批示。并在会上宣布：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会后将把报告录音、录音记录稿以及其它有关文献资料存入中央档案，并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存档。^{【2311】}会议结束。

五、军内的批林整风与班子调整

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结束后，军内各军级以上大单位均召开了各自的批林整风会议，传达中央会议精神。同时，结合批林整风，调整了领导班子，多人被越级提拔。批林整风运动一直延续至1973年中共十大召开以前。

（一）海军的会议与班子调整

1972年7月17日，海军党委在北京召开四届五次全会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进行批林整风。1973年2月20日，会议结束时，周

【2310】《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页528—529。此前，5月27日，周恩来去毛泽东处后，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称：要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根据毛主席去年巡视南方谈话中着重提到的中共党内十次路线斗争问题，讲一点个人的认识和我个人在历史上所犯的路线错误。次日，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各组召集人会议上宣布此事。6月7日，周恩来将所写《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提纲送毛泽东审阅，并附信称，“两次在主席处听到片言只字关于路线的教训，我更急于要写出初稿。”毛泽东圈阅了提纲及附信。

【231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页531。

恩来等中央政治局成员接见了与会全体人员。2月23日，会议领导小组向毛泽东、中央、军委呈报了《海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会扩大会议情况报告》。《报告》中称，萧劲光、王宏坤、吴瑞林上了林彪的“贼船”。24日，中共中央以中发〔1973〕10号文件批转了经毛泽东批示“同意”的该报告。^{【2312】}

1973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苏振华任海军党委第一书记，萧劲光任第二书记，王宏坤任第三书记。7月24日，中央军委命令，任命刘道生为海军副司令员，马忠全为海军副司令员兼北海舰队司令员，孔照年^{【2313】}、王万林^{【2314】}、高振家^{【2315】}为海军副司令员，杜义德、卢仁灿、王昕^{【2316】}为海军副政委；免去赵启民海军副司令员职务。12月5日，海军党委转发军委批复：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批准，增补刘道生、王万林、孔照年、杜义德、卢仁灿、王昕、刘居英为海军党委常委。

（二）空军的会议与班子调整

1973年3月18日，空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据会议领导小组5月18日报告称：“会议集中揭发批判了王辉球、曹里怀、邝任农、梁璞同志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王、曹、邝、梁四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上了林彪贼船，积极参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九一三’以后，他们仍然不向党交心，捂盖子，保自己。”“长期以来，林彪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在空军搞阴谋，搞什么‘打内堂’（即到林彪那里‘摸底’、‘咬耳朵’）、立‘标兵’，安插吴法宪当空军司令，派子女来空军‘保权’。他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手段，篡夺空军党委领导权，八个常委中有吴法宪、王秉璋、刘锦平三个死党。曾国华问题严重，正在隔离审查。王辉球、曹里怀、邝任农三同志上了贼船。他们私设常委办公室，把不是党委常委的江腾蛟、王飞、陈绥圻等塞进去，控制了空军领

【2312】《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编年史（1949-1983）》，页898。

【2313】孔照年，1965年8月在汕头水警区副司令员任内，以指挥“八六”海战一战成名。1969年12月任海军广州基地副司令员。1973年7月越级提为海军副司令员、海军党委常委。1979年10月降任海军工程学院副院长。1983年8月任海军东海舰队副司令员。1989年8月按副兵团职待遇离休。中共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

【2314】王万林，海军航空兵战斗英雄。1963年5月后历任南海舰队航空兵副司令员、代司令员，1973年7月越级提为海军副司令员，1979年10月降任海军航空兵部副司令员。

【2315】高振家，中国第一代潜艇艇长。1969年5月-1973年7月任海军潜艇第二十二支队支队长。1973年7月越级提为海军副司令员。1979年10月降任潜艇学校副校长，1983年9月后历任潜艇学院院长，海军指挥学院政委，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兼海军南海舰队司令员。1988年授衔海军中将。

【2316】王昕，1966年5月后历任北海舰队、南海舰队政治部副主任，1970年5月-1973年4月任南海舰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73年7月越级提为海军副政委，后曾兼任海军政治部主任。1979年10月降任海军学院第二政委，1983年8月任南海舰队政委。

导核心。‘小舰队’的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刘世英、朱铁铮、程洪珍等人把持空军党委办公室，直接发号施令，使‘党办’成了林彪直接指挥的‘特殊权力机构’和‘小舰队’的‘大本营’。”^{【2317】}

5月20日，军委任命空军新的领导班子。经毛泽东、中共中央批准，任命马宁^{【2318】}为空军司令员，傅传作^{【2319】}为空军政委，张廷发、成钧、邹炎^{【2320】}、张积慧^{【2321】}、曹里怀、邝任农、薛少卿为空军副司令员，高厚良为空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杜玉福^{【2322】}为空军副政委，梁璞为空军司令部参谋长。傅传作、马宁、张廷发、成钧、邹炎、张积慧、曹里怀、高厚良、杜玉福、邝任农等10人为常委。傅传作任第一书记，马宁任第二书记，张廷发任第三书记。

6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空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情况报告》。中央批语称，“中央认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弄清了路线，改组了空军领导班子。它对深入批林整风，加强空军建设将起重大作用。”^{【2323】}

（三）总后勤部的会议与班子调整

1973年6月13日-8月14日，总后党委召开扩大会议，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及邱会作的罪行。出席会议的有306人，各大军区及其后勤领导干部列席了会议。会议指出：总后是林彪、邱会作控制很严的单位，只有彻底清查“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和邱会作在总后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才能消除影响，调

【2317】中发[1973]22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1973年8月3日发出。

【2318】马宁，1964年晋升空军少将。1970年4月任兰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1973年5月越级提为空军司令员、党委第二书记。1977年2月被撤职审查，1984年按副兵团职待遇离休。1988年7月被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

【2319】傅传作，1955年任武汉空军司令员，同年授衔空军少将。1966年吴法宪叫傅传作等人写揭发贺龙的材料，并将材料报给了林彪。1967年9月叶群带着傅等人的材料提出对贺龙立案审查。1969年当选中共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同年4月29日关押中的贺龙称：“傅传作也当了中央委员，这个人在湘鄂西时，是警卫排的一个班长，后来的发展本事也不大，能力一般，不知在什么事情上可能对他们有贡献，不然他是当不了中央委员的。”1973年5月被提拔为空军政委，同年8月当选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1975年10月被免去空军政委职务。

【2320】邹炎，空军二级战斗英雄。1969年3月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1973年5月越级提为空军副司令员，任职至1977年2月。

【2321】张积慧，空军一级战斗英雄。1970年4月任空一军军长。1973年5月越级提为空军副司令员。1980年8月转业后历任成都420厂副厂长，烟台市副市长，烟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0年7月经中央军委决定，关系收回部队，按大军区副职待遇离休。中共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

【2322】杜玉福，1973年2月任空军第十二副军长，同年5月越级提为空军副政委。1975年10月降任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1989年任南京军区空军政委。1988年9月授衔空军中将。

【2323】中发[1973]22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1973年8月3日发出。

动群众的积极性，加强后勤建设。会后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经毛泽东、周恩来审定，形成中共中央〔1973〕32号文件下发到省军级。^{〔2324〕}

6月28日，军委发布命令，任命张宗逊为总后勤部部长；8月6日，任命郭林祥为总后勤部政委；张池明继续任政委；副部长：张令彬、张贤约、张天云、邱创成、封永顺、徐斌、张汝光、詹海英、孙洪珍、白相国、栾学文；副政委：卢南樵、康立泽。当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总后勤部党委常委会由14人组成。张宗逊任书记，郭林祥、张池明、张令彬、詹海英为副书记。

上述名单中，越级提拔的詹海英、孙洪珍、栾学文三人简况如下：

詹海英，1973年8月由总后勤部运输部油料供应处副处长越级提为总后勤部党委副书记，总后勤部副部长。1975年8月免职，降任昆明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副部长兼后勤第二十二分部部长。1983年10月任昆明军区后勤部研究室副军职研究员。1992年6月离休。

孙洪珍，1973年8月由总后勤部装备部计划处副处长越级提为总后勤部副部长。1976年10月降任武汉军区后勤部司令部副参谋长，后任参谋长，兰州军区后勤部副部长。1985年6月任兰州军区后勤部部长。1988年9月授衔少将。1991年7月离休。

栾学文，前任职务不详。1973年8月越级提为总后勤部副部长。1975年8月30日，中央军委通知，总后领导班子调整，栾学文调出总后，另行分配工作。以后情况不详。

以上三人情况表明，对他们的越级破格提拔培养并不成功。

第一〇四节 纠正军队不正之风

一、引致周恩来关注的内参稿件

“九一三事件”之后，军队的威望从天上跌落地下。其日积月累的不当所为，亦开始备受质疑。

1972年6月29日，新华社天津分社向总社电传一篇题为《天津驻军及部分负责同志占用民房过多严重影响军民关系》的内参稿称：

天津一些驻军的负责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占用了一批被查抄的爱国知名人士的私人住宅。这些住宅都是高墙、深院的小洋楼，设施讲究，环境幽

〔2324〕 后勤学院政治部编研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作大事记（送审稿）》下，页601。

静，在天津很引人注目。天津驻军有些师以上干部、一些区局的支左干部，大部分住的是独楼、独院、小别墅。

.....

著名瘤科专家、市政协常委金显宅，私房一所十五间，被天津警备区政委（市委书记）占用，现在金显宅全家只住一小间。妇科专家、政协委员林崧，私房一所十三间，被天津市公安机关军管会主任占用。原天津一中心医院副院长、内科专家杨济时，私房一所十三间，被警备区副司令员占用，现在杨一家三口占一间地下室。河北省军区副参谋长、天津市革委会财贸组组长，占用了政协委员乐肇基私房一所十间。

.....

有的团级干部也通过各种手段占用小洋楼。某部团政治处主任，原来住房一间，文化大革命中换成六间，后来又换成九间三层小洋楼一所。他还把另外一个军人（已调走）占用过的房子私自分配给自己的熟人，房管站出来制止，他坐着小汽车去把女房管员骂了一顿。

.....

现在天津睦南道、大理道、重庆道、常德道一带比较好的小洋楼，几乎大部分被部队占有。有的军队负责同志文化大革命中多次搬迁，每迁一次，房屋都大修一次。如睦南道一四八号政协委员张重威三层八间小洋楼一所，张迁出后，大修一次，六十六军军长迁进；一年后，又大修一次，六十六军副军长搬进；又过一年，又大修一次，警备区副政委搬进。每修一次耗费几千元。而群众住房很难得到修缮机会。

.....

天津驻军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扩大了机关办公用房，搞办事处，设招待所，占用了一大批房屋。六十六军三个师占用了相当五个师的营房。部队占用地方房产后就转为‘军用户’，以后地方就永远没有使用权了。据不完全统计，文化大革命中转为‘军用户’的建筑面积就达三十万平方米。群众最有意见的是：一些部队占用医院和学校，致使一些病人不能住院，一些学生不能上学。

.....

天津中小学校舍本来很紧张的，部队占用校舍，使校舍更为紧张。现天津市共缺校舍四十到五十万平方米，而文化大革命中各部队占用大、中学校达十万平方米以上。如建筑面积三万平方米以上的天津师范学院，被六十六军军

部占用。北空零七七八部队两个连队占用了八十八中学。天津医学院旧址建筑面积一万四千平方米，被京字一六二部队的几十个人占用。

.....

天津一些驻军单位还用了规模较大的医院、疗养院五所，改为办公楼、家属宿舍、部队医院。天津市第二工人疗养院，是过去用工会会费修建的，建筑面积两万平方米，病床七百张，是全市工人唯一的结核病疗养院。现被后勤八分部改做办公室和宿舍，致使有些肺结核病人无法疗养。原河北省在天津的省医院是一个设备较好的大型医院，建筑面积两万平方米，病床五百多张，文化大革命中被天津警备区作为司令部办公楼占用，而把警备区旧址作为自己的招待所，天津市医院病房床位是很紧张的，不少需住院的病人无法住院治疗。在病床这样紧张的状况下，部队又占用了一些医院，引起群众强烈的不满。（天津分社）

上述内参稿件随即刊载于新华社编印的《国内动态》上，被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所关注。周主持部署天津驻军陆军第六十六军及天津警备区以至北京军区，作出检查和处理意见。^{【2325】}

二、六十六军党委的检查、处理报告

7月12日，陆军第六十六军党委作出关于占用地方房舍、车辆的检查、处理报告称：

七月十日，德生、登奎、先瑞同志对解决天津驻军占用地方房舍问题传达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并提出了要求。我军当晚召开常委会，进行了传达、讨论。会上，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军队要谨慎”、“军队要整顿”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有关教导，对照检查了我军占用地方房舍、车辆的错误。十一日，召开各师、独立团党委书记会议，统一了思想，研究了落实措施。大家一致认为，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非常及时，非常重要，是对我们政治上的关怀和教育，把占用地方的房舍、车辆退还地方，是贯彻“九大”路线、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密切军政军民关系、整顿军队、纠正不正之风的有力措施，是一次实际的思想 and 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是深入批林、肃清其流毒的具体行动。

近几年来，我军先后占用地方房产六处，共50,367.3平方米。其中，占天津师范学院院址一处，36,260平方米；天津市农业技术中学校址一处，

【2325】杨继绳：《内参引发的军队大搬家》。《炎黄春秋》2011年第3期。杨时为新华社天津分社记者，是上述内参稿件的作者。

7,124.4平方米；天津市一轻局幼儿园一处，2,349平方米；桂林里七号小楼一幢，408平方米；常德道七十二号平房一处，225.9平方米；一九八师占用天津市唐家口新村新建宿舍楼两幢，4千平方米。

有的支左人员利用职权之便，不经正当手续，占用了地方的一些房屋。

占用地方小汽车六辆。其中，伏尔加一辆，华沙二辆，小六九一辆，天津吉普一辆，罗马一辆。

从这些事实看，我们的错误是严重的。……联系我们在天津支左中所处的实际情况，感到我们在这方面没有做出好样子，而是带了坏头，辜负了毛主席、党中央对我们的期望，辜负了天津市四百万人民对我们的信任。大家一致表示：要坚决、彻底、迅速地将占用的房舍、车辆全部退还地方，并保证今后不再犯类似错误。我们的措施如下：

一、深入学习毛主席关于“军队要谨慎”、“军队要整顿”和“拥政爱民”的教导，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部队，把这个问题提高到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建军路线高度来认识，要作为各级党委和部队正在进行的政策纪律教育和整顿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并把我们的错误向部队进行传达，以提高觉悟，端正作风。

二、占用地方的房舍，除一轻局幼儿园的房舍缓退外，其余全部于八月一日前，打扫干净，退还地方。在师范学院增建的地面上的4,894.1平方米房舍、固定设备和两个地下指挥所及其固定设备一律全部移交地方。

前已移交地方的11,615平方米军产房，除原军部营房新华路二十八号9,215平方米已报请天津市委还回外，其余2,404平方米仍归地方使用。

军司令部、政治部和部分直属分队撤回原军部营房（新华路二十八号），军后勤部、部分直属分队和部分机关干部宿舍，搬至海光寺大街一号（此处原为解放军二五九医院，后改为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研究所，房产也随之移交。一九七〇年该所大部分内迁四川，部分扩建为我军一〇六野战医院，房产随之移交），军工兵营移至汉沽营房。

三、占用地方的六辆汽车经检修后，于八月一日前交还地方。参加三结合的军队干部按地方规定乘坐汽车，一律使用地方车牌。

四、对支左人员个人占用的地方房屋，协同地方于八月一日前进行一次彻底清查，然后分别情况具体处理，该并者并，该退者退。凡利用职权之便占用的房屋，或占居的查抄、压缩的私产房屋，一律退回。

五、“八一”建军节前后，普遍开展拥政爱民活动。主动到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和有关部门检查错误。军的主要领导同志出面，邀请群众开座谈会，征求意见，听取批评，以增强团结，密切军民、军政关系。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2326】}

三、天津警备区党委的检查报告

7月12日，天津警备区党委作出关于占用地方房屋、车辆问题的检查报告称：

壹

七月九日晚，军区党委派工作组来津，传达了军区党委关于认真处理占用地方房屋、车辆的指示，以及人民群众的反映。七月十日，德生、登奎、先瑞同志又专门找警备区负责同志谈话。我们先后于七月十日、十一日召开了常委会和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讨论了军区党委的指示，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检查了错误，研究了措施。同志们一致认为，人民群众的反映，军区党委的指示，抓住了我们思想作风建设上的一个突出问题，为我们纠正不正之风，提出了具体要求，对我们进行了一次实际的路线教育、传统教育和政策纪律教育。我们一定要坚决地贯彻执行，以最大的决心，最快的速度改正错误，挽回在地方和群众中造成的不良影响。

贰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利用支左的方便和人民群众对军队的信任，在警备区机关扩大和独立师换防的情况下，占用了地方的不少房屋和车辆。如警备区六位领导同志和其他单位的三位同志，占用了属于高级知识分子和资本家自有的九个小楼；警备区机关占用了原河北省医院；独立师二团团部和一个营，占用了天津市滑翔学校等，共占用应退还地方房屋26处，计61,762平方米。同时，还占用地方小汽车九辆、中型轿车两辆。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地影响了军政、军民关系，损害了我军的传统作风，影响了我军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妨碍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贯彻落实。

……

叁

毛主席教导我们：“军队要谨慎”、“军队要整顿”。我们决心以彻底革命的精神，坚决改正错误。

【2326】《六十六军党委关于占用地方房舍、车辆的检查、处理报告》，1972年7月12日。中发[1972]28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1972年7月27日发出。

(一)首先提高和统一我们党委的认识。把这次处理房子和车辆问题,看作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问题,是对我们党委路线觉悟高低的一次实际检验,作为当前一件大事,严肃认真地对待,切实抓紧抓好。在省委常委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的基础上,立即对机关、部队进行动员教育,过细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使大家从路线斗争的高度,认识做好这项工作的重大意义,自觉地、坚决地贯彻执行军区党委的指示。

(二)我们决心在七月底前将占用的九所属于私产的宿舍、原河北省医院、市滑翔学校,全部交给地方。其它不应占用的住房,也要陆续交出,占用地方的车辆,一律于七月底以前退还地方。

(三)立即把军区党委的指示传达到全区团以上党委,结合思想实际,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进行加强军政团结、军民团结的教育。对部队普遍进行一次发扬我军艰苦奋斗光荣传统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并把这一教育经常化。同时对所属机关、部队的住房情况,进行一次彻底普查,凡是不该占用的地方房屋一律交出,住房过多的坚决压缩。

(四)为了切实做好这项工作,在党委领导下,由党委书记许诚同志挂帅,朱彪同志和司、政、后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组成一个领导小组,负责具体的落实工作。

关于把全民所有制的泡沫塑料厂改变为我单位所有的问题,已有专题检查报告,目前正在移交中。

处理结果,容后再报。

以上报告当否,请指示。【2327】

四、北京军区党委的报告

7月15日,北京军区党委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提交报告称:

送上六十六军党委、天津警备区党委的检查报告两件。军区党委同意他们的检查和处理意见。

六十六军、天津警备区存在的这些违犯政策纪律的问题,在我区是带有普遍性的一个严重的问题。据初步检查,突出的是:一、大量占用地方房舍。全区共占用学校161所,医院13所,工矿房舍111处,党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房舍369处,共239万平方米。占用上述房舍,有两种情况:一是

【2327】《天津警备区党委关于占用地方房屋、车辆问题的检查报告》,1972年7月12日。中发【1972】28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1972年7月27日发出。

一九六九年部队部署调整时，由军区与地方协商安排临时住下的，部队未建营房，至今还占用着，时间长了，矛盾越来越大。二是有些单位本来有营房，追求宽敞、阔气，利用支左的方便占用的。三、通过各种关系接收了地方一些厂矿和农、牧场，一不上交利润，二不纳税，变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为部队某个小单位所有。四、长期使用和占用了地方一些车辆和物资。五、有的人利用职权，违法乱纪，走后门，抢购、套购物资，有的还用来投机倒把、从中渔利。这些问题，在军内外造成了极坏影响，尤其是长期占用地方的学校和医院群众意见最大，侵犯了人民的利益，影响了军政、军民团结，损害了我军的光荣传统，妨碍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落实。

这些问题的发生和存在，我们军区党委是有责任的。部队长期占用地方的房舍，部队和地方都提出过意见，我们一直未下决心解决。对有些单位违犯政策纪律的现象，群众反映颇多，我们也有所察觉。但是，由于我们对毛主席关于“抓军队工作，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的教导理解不深，对违犯政策纪律的问题，只是发现一件处理一件，零打碎敲，没有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作为部队政治思想建设的一件大事，进行普遍教育和检查，坚决制止和纠正。

……【2328】

五、中央、军委的批语

7月27日，经毛泽东批示“照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北京军区、六十六军、天津警备区三个党委的报告并作出批语称：

现将北京军区、六十六军、天津警备区党委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关于整顿军队纪律，纠正不正之风的三个报告，发给你们。中央同意北京军区党委报告中所采取的四项措施。另附新华社国内动态四件，供参阅。

北京军区和驻天津部队检查报告中所说的侵占学校、医院和工矿企业的房屋，把全民所有制工厂、农场等企业变为部队某个小单位所有，无偿占有地方的车辆和物资，甚至有的人利用职权，违法乱纪，走后门，投机倒把等等违反纪律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不仅天津一地有，全国许多地方也有；不仅军队有，党政机关也有。这种不正之风，必须引起各级地方和部队党委的严重注意，并且采取坚决的措施加以克服。

【2328】《北京军区党委的报告》，1972年7月15日。中发〔1972〕28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1972年7月27日发出。

毛主席指示：“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抓军队工作，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北京军区和驻津部队克服违反政策纪律现象所采取的措施是严肃的、坚决的。这件事，是当前批林整风的一项重要内容。各级党委不应把它看成只是退房子的问题，而应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普遍深入地对部队进行政策纪律教育。

毛主席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并经常用辽西战役时的一个生动事例，对我们进行教育。毛主席说：“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

由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人民解放军为人民立了新功，因而有一部分同志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背上了两个包袱。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减少了，闹名誉、闹地位，贪图享受这些东西多起来了。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

毛主席号召我们学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我们军队和党政机关里头要经常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只要空几个月不搞就松松散散了。我们军队和各级党政机关都应当大力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进行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的教育，要认真进行一次纪律检查，仿效天津办法，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迅速克服这一方面的缺点与错误，增强军政团结、军民团结。检查和处理结果，望于八月间报告中央和中央军委。^{【2329】}

六、几个典型事例

正如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出，侵占学校、医院和工矿企业的房屋等现象，“不仅天津一地有，全国许多地方也有。”总政治部1972年8月9日关于群众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承认：

【2329】《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北京军区、六十六军、天津警备区三个党委报告的批语》，1972年7月27日。中发[1972]28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1972年7月27日发出。

类似天津驻军那样的问题，各大单位也程度不同的存在着，而且表现是多方面的。主要是：

一、长期占用地方房屋。据不完全统计，全军目前占用城镇地方房屋一千七百万平方米。其中有的是由于部队调防、施工，没有营房而住用的；有的本来自己有房子，为了图宽敞，讲阔气，又侵占了地方一些房屋，群众意见很大。山东省一百二十九个人武部，有三分之一搬进原县委、县人委的房子。菏泽军分区十个县武装部，有六个搬进了原县委、县人委的房子。曹县人武部搬进原县人委后，花了两万多元盖了个一丈五尺高的大门楼，群众批评说：“武装部权大了，门楼也高了，真是曹县城里一大户，武装部里尽朝晖！”

特别是占用医院、学校、工厂的房屋，影响了群众福利和生产。武汉军区部队共占用地方大、中、小学一百五十一所，使不少学校实行二部制，有的根本不能开课。山西省共有八所大专学校，被部队占用七所。河南省军区几个领导同志占用了一所妇产医院，使部分产妇住院造成困难。

二、占用集体所有制土地，影响群众生产和生活。据上半年统计，全军在农副业生产中，共占用社、队土地五十八万余亩。有的占地过多，种不了，造成土地荒芜。海军潜艇二支队借生产队土地一千零三十亩，种了一半，荒了一半。有的占地过多，直接影响了群众生产生活。辽宁省朝阳县一个生产队一百三十亩地，部队两个连的单位就占用了四十九亩多，群众地少了，生产的粮食不够吃，只好吃返销粮。有的用“拥军日”、“学军”、办“民兵学习班”等多种形式，无偿占用群众劳力为部队生产。江苏省南通军分区独立二团一九七〇年就动用了群众八千五百多个劳动日。更严重的，有的完全让生产队代耕，自己坐享其成。辽宁省营口军分区把二十一亩水稻田交生产队耕种，军分区净得粮食，只把稻草给生产队作报酬。还有的雇请群众种地。有些单位占用了地方良种场、园艺场和农科所的土地，影响农科试验。^{【2330】}

类似问题的解决，有的阻力小些，有的颇费周折。以下为军方材料等披露的几个典型事例。

（一）总参情报部进、出中央调查部

1970年5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中央调查部与总参谋部情报部合并的通知》，两部合并后称总参谋部情报部，隶属总参谋部。总参情报部机关

【2330】《总政治部关于群众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1972年8月9日。总政治部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群众工作》，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页579-580。

随即迁入中央调查部机关驻地。1973年，中共中央决定，将原中央调查部与原总参情报部分开，分开后的总参情报部仍归总参谋部直接领导。7月，总参情报部办公室迁至总参办公大楼。8月，总参管理局以总参谋部名义向国家有关部门提交报告，提出由于总参情报部从中央调查部住地搬出，需新建营房7万平方米。10月，国家计委批准总参的报告。1975年，总参情报部新营房开始建设，总参管理局先期挤出部分宿舍安排总参情报部干部从原中央调查部住地搬出。

（二）总参气象局进、出中央气象局

1969年12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总参军事气象局与中央气象局合并问题的通知》，决定两局合并后仍称中央气象局，归总参谋部领导，军内仍保留总参谋部气象局名称。两局合并后，总参气象局迁入中央气象局大院。1973年3月，中共中央同意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中央气象局划归国务院建制，恢复总参气象局的决定。根据总参首长指示，总参管理局承办了代表总参与中央气象局协商解决总参气象局办公及家属营房的问题。经双方协商，后又经国务院领导和北京市有关部门批准，中央气象局划出一部分土地交总参气象局兴建新的营区。1974年6月，总参管理局向总参首长呈交《关于总参气象局在中央气象局院内建房的报告》，经批准下达2.6万多平方米的建房任务。建房完工后，中央气象局大院内其余土地和房屋交还中央气象局。

（三）总参机关进、出中央党校

1970年9月，总参办公厅（即中央军委办公厅）、军务动员部、政治部整体迁至已停办的中央高级党校大院（改称085部队大院），共接收中央党校房舍14.7万平方米。1972年8月，根据中央要求，总参办公会议决定，总参机关驻中央党校的房屋逐步退还。当时，除总参机关、干部外，还有一些房屋为工程兵、铁道兵、总政治部及其它一些单位暂借用。到1974年底，原在中央党校的总参机关所占办公用房已基本移交完毕，惟搬迁和移交干部宿舍工作进展缓慢。到1976年底，共移交营房6万平方米。1977年，中央决定恢复中央党校。1978年8月，总参管理局向总参首长呈报《关于继续全部腾出党校房子的安排》。报告称，1970年总参机关接收中央党校14.7万平方米的房子，现已腾还了近13万平方米，尚有1.7万多平方米未还。报告对应迁出单位和住户提出了具体安排意见和时间限度。到1979年5月，总参机关为党校腾房工作方全部完成。

（四）第二炮兵机关进、出中国人民大学

1970年7月3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国务院办公厅报告上批示，同意将已决定停办的中国人民大学西郊校址、房舍（建筑面积139,471平方米）全部拨归第二炮兵使用。^{【2331】}10月，北京市革委会正式通知中国人民大学停办。

1978年4月1日，教育部向国务院上报《关于恢复中国人民大学的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4月10日，邓小平批示：“二炮报告该校房子难于归还，此事如不解决（包括新建），怎么办？应有个方案。”7月7日，国务院批准教育部的请示报告。11月3日，人大校党委向教育部汇报复校以来的工作情况，称校舍问题得到“部分解决”，学校办公楼、教学楼、学生宿舍二炮均未退还。1979年4月10日，邓小平就二炮归还人民大学校舍问题再作批示：“照此材料看，人民大学房子应予退还。”^{【2332】}10月，人民大学部分学生为争取第二炮兵归还校舍罢课、上街游行。在中央的压力之下，二炮决定逐步退还人民大学的全部校舍。此时，距离中共中央[1972]28号文件的发布时间，已长达七年。直至1984年5月，二炮与中国人民大学签订协议，将二炮建在人大田径场的占地约18,000平方米的四座住宅楼归二炮占用，其他场地和房屋全部移交给人大。^{【2333】}二炮机关与中国人民大学的恩怨最终落幕。

第一〇五节 退出三支两军^{【2334】}

一、中央、军委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

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毛泽东批示“照发”的《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并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通知称：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

最近，毛主席建议中央认真研究一次三支两军问题。中央责成总政治部、中央组织部作了一些调查研究，并经军委办公会议讨论，代中央、中央军委

【2331】第二炮兵司令部：《第二炮兵大事记》，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页78。

【2332】据《第二炮兵大事记》页159：1979年9月10日至26日，第二炮兵领导和司令部、政治部机关由中国人民大学校区迁至缸瓦市和南礼土路营区办公。

【2333】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研究丛书编委会：《中国人民大学纪事》上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页316。

【2334】本节主要资料来源：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六、第七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

委起草了一个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央认为,这是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现将这个决定草案发给你们,请你们认真讨论一次,那些意见可行,那些意见不可行,还有那些补充修改意见,将讨论结果于9月30日前报告中央、中央军委。有的省、市、自治区为了集中进行批林整风,可以推迟讨论。

这个决定草案,待中央、中央军委依据各地意见统一研究定稿下发后,再组织实施。^[2335]

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称:

(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人民解放军遵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担负了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光荣任务。五年来,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全军指战员在三支两军中,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取得了粉碎刘少奇、林彪两个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为人民立了新功。在这场伟大的革命斗争中,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野心家、阴谋家妄图破坏我们这支伟大的军队,但是,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恰恰相反,参加三支两军的广大指战员,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经受了阶级斗争的锻炼,密切联系了群众,促进了军队的思想革命化。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经过批林整风,全军指战员提高了政治觉悟,增强了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进一步发挥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作用。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破坏,使三支两军工作在某些方面受到了干扰,这个罪责只能由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来负,广大的三支两军人员是没有责任的。因为没有经验,三支两军工作中出现了某些缺点错误,也是难以避免的。必须肯定,整个三支两军工作的成绩是巨大的,不可以低估了三支两军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党的“九大”以后,全国各地普遍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建立了各级党委。在这种新的形势下,中央于1971年8月,转发了《广州军区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纪要》,毛主席批示对这个文件要“认真研究”,以引起大家的重视。这个文件下达后,各地注意了对三支两军工作的研究,在加强地方各级党委的一元化领导方面也有所改进,但问题解决得还不够彻底。毛主席指出:“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党委已经决定了的事,还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搞颠倒了吗?”没有成立地方党

【2335】中发[1972]32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1972年8月22日发至省、军级。

委以前可以，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就不能那么办了。三支两军工作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情况，符合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

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一个地区，由当地最高一级的地方党委，对党政军民各个方面实行一元化领导，这是我们党的传统。省军区、军分区、县人民武装部这三级军事机关，除了保持军事系统的垂直领导和隶属关系外；同时是同级地方党委的军事工作部，受同级地方党委领导。驻各地的野战军，除了接受军事系统的垂直领导外，在与地方有关的各项工作上，也必须接受所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地方各级党委在对本地区各个部门和各项工作实行一元化领导的时候，必须保证上级党、政府和军队的指示和命令的贯彻执行，严格实行“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以便使我们党的各项工作，都能够更好地纳入党的一元化领导的轨道。

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凡是实行军管的地方和单位，在党委建立后，军管即可撤销。军管人员除少数需要留下担任地方工作的以外，其余调回部队。过去由中央命令实行军管的一些地区和城市，以及各地公安、法院、铁路、航运、港口等部门和广播电台，在建立党委后，授权所在的省、市、自治区党委撤销其军管，并报中央备案。少数有某种特殊需要的地方和单位，对外可保留军管名义，对内不再行使职权。

已经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军宣队应即撤回部队。其人员如地方工作需要，有的也可以留下工作。

地方各级党委建立后，各级支左领导机构（如支左领导小组、办公室、指挥部、联络站等）及其办事机构应即撤销。今后属于部队支援地方的各项工作，由部队政治机关负责。目前，有的地方的支左机构名义上撤销了，实际上还在指挥地方工作，妨碍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应坚决纠正。

对地方工作实行由各部队“分片包干”的做法，在地方党委建立前，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但是，在地方党委建立后，这种“分片包干”的形式，容易助长分散主义、山头主义，应当改变这种做法，由各级党委实行统一领导。

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各级地方党委的成员应当作适当调整。目前，原来担任各级领导工作的大部分老干部已经解放，并且涌现了一批优秀的新干部，使这种调整具备了条件。完全可能和应该根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及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更多地挑选一些熟悉全面工

作和比较有经验的地方干部，安排他们担任主要领导职务。许多地方的经验证明，深入搞好斗、批、改，办好厂矿企业，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充分发挥老工人、革命领导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的作用，进一步开展教育革命，办好学校，要充分依靠教职员和学生中的积极分子。根据这些经验，适当调整领导班子，必将有利于促进各条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继续留在地方工作的军队干部，也不能都兼军职。省、地、县三级地方党委第一书记，应兼任同级军事机关的主要领导职务。参加省、地、县三级党委的主管省军区、军分区、县人民武装部工作的军政主要负责同志，仍应继续兼军职。除此以外，其他留在地方工作的军队干部，原则上都不再兼军职。所有留在地方工作的军队干部，应一律由地方党委统一管理，其党的组织关系和人事档案，都要转到地方。他们的政治学习、思想教育、任免调动、奖励处分等，完全由地方党委负责。

(十)-(十二) (略)^[2336]

二、军队领导干部在中共中央工作机构大部保留任职

中共中央[1972] 32号文件发出后，军队领导干部在中共中央工作机构大部仍长时间保留任职。有关情况分述如下：

(一) 中央办公厅

1972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副主任王良恩、张耀祠均为军队现役领导干部。汪东兴任职至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12月；王良恩1973年1月26日在“批林整风”运动期间自缢身亡；张耀祠1979年1月免职回部队任成都军区副参谋长。

(二) 中央宣传部

1975年2月，原中宣部五七干校从宁夏贺兰县迁回北京。9月，汪东兴批准中宣部军事管制小组（组长康应中，副组长张学茂）撤销。11月，军管人员全部撤走。

(三) 中央组织部

1975年6月，军队干部、部业务组负责人郭玉峰正式任部长。直至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12月方被免职，由胡耀邦接任。军队干部、部业务组负责人郑屏年1975年6月任副部长直至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

【2336】《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发[1972]32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1972年8月22日发至省、军级。

（四）中央组织宣传组

1970年11月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主管组织宣传工作。组长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及李德生。李1973年12月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离京后，该小组成员中已无现役军人。

（五）中央统战部

1973年6月成立部业务组，由军代表刘友法牵头。1977年6月乌兰夫任部长后，刘友法于同年11月回部队任海军烟台基地政委。

（六）中央对外联络部

1971年1月耿飏任部长，原军管小组组长任允中1973年8月任部核心小组副组长、副部长。1975年8月任允中回部队任政治学院政治部副主任。

三、军队领导干部在国务院部委仍占相当比例

1972年8月，国务院部级机构有28个（包括虚设的国防部），有16个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5个革委会主任、1个军管会主任为现役军队领导，各占57%、54%及4%。至1975年1月四届人大设立29个部委，现役军队领导任部长下降至8人，占28%。1976年10月文革结束时，仍有7位现役军人任部长，占24%。

以下为1972年8月至文革结束后现役军队领导担任国务院部委一级副职以上情况。

（一）国家计委

苏静（总参军务部部长）任核心小组副组长、革委会副主任、副主任至1978年9月；陈华堂（福州军区空军原司令员）任核心小组副组长、革委会副主任至1976年12月。

（二）国家建委

张国传（工程兵副参谋长）、李大同（工程兵政治部副主任）任革委会副主任至1973年8月。

（三）冶金工业部

陈绍昆（沈阳军区副政委）任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1975年1月改称部长）至1977年6月；朱互宁（总参作战部七处处长）、杨卫群（空军军训部副部长）任核心小组副组长、革委会副主任分别至1973年7月、1975年6月。

(四) 一机部

李水清(济南军区副司令员)任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1975年1月改称部长)至1975年8月;严庆堤(工程兵副政委)、董桂财(工程兵第五十二师政委)、孙成秀(总参军训部处长)、宋寿昌(第三工程兵学校副政委)、孙琪(总参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任革委会副主任至1973年5月。

(五) 水利电力部

张文碧(陆军第十二军政委)任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副主任及梁其舟(铁道兵司令部通信处处长)任副组长、副主任至1974年12月。

(六) 交通部

杨杰(总参军交部副部长)任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至1974年12月;潘友宏(海军北海舰队后勤部部长)任副组长、副主任至1973年12月;韩卫民(总参军训部副处长)、俞侠(海军机要局局长)任副主任分别至1973年6月、1974年6月。

(七) 轻工业部

毛洪祥(海军后勤部副部长)任核心小组组长至1973年7月;李学实(炮兵学院训练部副部长)任副组长、革委会副主任至1976年10月,1976年11月至1978年1月任部党组副书记。

(八) 财政部

殷承楨(总后物资部副部长)任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至1975年1月;樊九思(空军后勤部财务部部长)任副组长、副主任至1973年6月;刘洪章(总后军马部副部长)任副主任至1975年1月。

(九) 商业部

范子瑜(总后第二物资部部长)任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1975年1月改称部长)至1977年8月;樊省轩(总后营房部副部长)、柳垣(后勤学院政治部副主任)任副组长、副主任至1973年6月;刘忍(空军后勤部副部长)、郭世荣(空军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任副组长、副主任至1975年2月。

(十) 外贸部

白相国(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任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及王安居(海军学院教研室主任)任革委会副主任至1973年11月;陈树福(海南军区副政委)1973年11月任革委会副主任(对外称副部长)至1975年。

(十一) 农林部

沙风(装甲兵副司令员)任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1975年1月改称部长)至1978年1月。

(十二) 外交部

马文波(总参三部副部长)任副部长至1978年2月;刘振华(沈阳军区副政委兼旅大警备区第一政委)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副部长至1979年3月;李耀文(济南军区副政委)任驻坦桑尼亚大使至1977年4月。

(十三) 国防部

叶剑英(军委副主席)1975年1月任虚设的国防部部长。

(十四) 二机部

袁学凯(兰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任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及黄炜华(空军军事科学研究部副部长)任副组长、副主任至1973年5月。

(十五) 三机部

李际泰(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任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1975年1月改称部长)至1977年12月。

(十六) 五机部

邱创成(总后副部长)任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至1973年7月;李成芳(昆明军区原第二政委)1973年7月接任组长、主任(1975年1月改称部长)至1977年12月。

(十七) 六机部

刘世雄(海军航空兵副参谋长)任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至1973年10月。

(十八) 七机部

韦统泰(国防科委副主任)任核心小组组长、军管会主任至1972年12月;汪洋(沈阳军区副司令员)1973年5月至1977年10月任革委会主任、部长;杨国宇(二十三基地副司令员)任副组长、革委会副主任至1974年9月;李光军(武汉军区参谋长)1972年12月至1978年任副组长、副部长。

(十九) 公安部

李震(沈阳军区副政委)1973年10月21日在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任内自缢身亡;施义之(陆军第二十一军政委)继任核心小组负责人、革委会副主任至1977年5月停职审查;曾威(北京军区工程兵政委)任副组长、副主任至1975年1月。

(二十) 卫生部

陈仁洪(北京军区副政委)任军管会主任至1973年8月。

(二十一) 国家体委

王猛(北京军区副政委)任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至1974年12月;姚晓程(陆军第六十军副军长)、于步血(陆军第二十六军副军长)、李青川(海军工程学院副院长)任副组长、副主任至1975年1月;陈培民(陆军第一一二师政委)任副组长、政治部主任至1975年。

(二十二) 国务院文化组

刘贤权(军委办事组成员、铁道兵司令员)任文化组副组长至1974年。

(二十三) 中国科学院

王建中(空军后勤部副部长)任核心小组副组长至1975年1月。

(二十四) 国务院政工小组

苏静(总参军务部部长)任负责人至1979年4月。

四、军队领导干部在省级党委退出过程缓慢

决定草案第(八)项“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各级地方党委的成员应当作适当调整”,在各省级党委执行过程中参差不齐,相当部分省级党委军队干部退出过程缓慢。第(九)项“……除此以外,其他留在地方工作的军队干部,原则上都不再兼军职。所有留在地方工作的军队干部,应一律由地方党委统一管理,其党的组织关系和人事档案,都要转到地方”的规定,在省级党委中更是难以实行。

1972年8月至1976年10月文革结束后,各省级党委班子中军队领导干部调整退出情况如下。

(一) 北京市

市委第一书记至文革结束一直为地方干部吴德。市委书记五人中,仅丁国钰一人为地方干部。军队干部杨俊生(北京卫戍区政委)、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员)、黄作珍(北京卫戍区政委)、刘绍文(北京卫戍区政委)均任职至文革结束后。1973年5月,军队干部谢静宜(中央警卫团干部)与其他地方干部二人被增补为市委书记,1976年10月被撤职审查。

(二) 天津市

市委第一书记至文革结束一直为地方干部解学恭。第二书记、军队干部吴岱(北京军区副政委)任职至1975年11月。市委书记五人中,仅王曼恬一人为地方

干部。军队干部刘政（陆军第六十六军军长）任职至1973年11月，王一（天津警备区司令员）、许诚（天津警备区政委）、费国柱（陆军第六十六军政委）均任职至文革结束后。1973年11月，军队干部徐信（北京军区参谋长）与其他地方干部等共五人增补为市委书记，任职至1977年7月。

（三）河北省

省委第一书记至文革结束一直为地方干部刘子厚。第二书记、军队干部郑三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河北省军区第二政委）任职至1975年10月。省委书记三人全为军队干部，马辉（河北省军区司令员）任职至1979年12月；刘海清（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任职至1973年8月；马杰（北京军区副政委）任职至1975年3月病故。

（四）山西省

省委第一书记、军队干部谢振华（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山西省军区司令员）任职至1975年5月。继任者王谦为地方干部。省委书记三人中，陈永贵、张平化为地方干部，军队干部曹中南（山西省军区政委）任职至1977年3月。

（五）内蒙古自治区

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军队干部尤太忠（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内蒙古军区司令员）任职至1978年10月。区党委书记三人中，军队干部二人，吴涛（北京军区副政委兼内蒙古军区第一政委）任职至1979年1月；徐信（北京军区参谋长）任职至1973年2月。

（六）辽宁省

省委第一书记、军队干部陈锡联（沈阳军区司令员）任职至1973年12月。遗缺由省委第二书记、军队干部曾绍山（沈阳军区第二政委、政委）1975年9月接替至1978年9月。省委书记一人为军队干部李伯秋（沈阳军区副政委），任职至1977年3月。1972年12月，军队干部毛远新（沈阳军区空军司令部处长，后任沈阳军区空军政委、沈阳军区政委）与地方干部等共五人增补为省委书记，1976年10月被“保护审查”。

（七）吉林省

省委第一书记、军队干部王淮湘（沈阳军区副政委兼吉林省军区第一政委）任职至1977年2月。省委书记四人中军队干部二人，何友发（吉林省军区司令员）任职至1982年7月；萧道生（空军第一军政委）任职至1975年6月。

(八) 黑龙江省

省委第一书记、军队干部汪家道(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兼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任职至1974年12月。第二书记、军队干部刘光涛(沈阳军区副政委兼黑龙江省军区第二政委)任职至1977年2月,1977年2月至12月任省委第一书记。省委书记二人中一人为军队干部傅奎清(陆军第二十三军政委),任职至1975年12月。1973年4月增补地方干部五人为省委书记。

(九) 上海市

市委第一书记张春桥、第二书记姚文元为地方干部。市委书记五人中一人为军队干部周纯麟(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上海警备区司令员),任职至1978年6月。1976年10月,军队干部苏振华(军委常委,海军政委)任市委第一书记至1979年1月。

(十) 江苏省

省委第一书记、军队干部许世友(南京军区司令员)任职至1973年12月。省委书记二人全为军队干部,杜平(南京军区第七政委)任职至1974年11月;吴大胜(江苏省军区第一政委)任职至1977年2月。1974年11月,地方干部彭冲接任省委第一书记。1975年9月,增补省委书记三人,其中军队干部一人为杨广立(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任职至1977年2月。

(十一) 浙江省

省委第一书记、军队干部南萍(陆军第二十军政委兼浙江省军区政委)1972年6月离职审查。1973年5月正式免职,遗缺由地方干部谭启龙接替。1972年4月增补省委书记二人,其中军队干部一人为铁瑛(舟嵎要塞区第二政委,后任第一政委),任职至1977年2月接替谭启龙任省委第一书记。1975年7月增补省委书记二人,军队干部一人为张文碧(浙江省军区司令员),任职至1978年5月。

(十二) 安徽省

省委第一书记、军队干部李德生(总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司令员,1973年12月任沈阳军区司令员)任职至1974年12月。遗缺由省委书记、军队干部宋佩璋(安徽省军区第一政委)1975年5月接替至1977年6月。1973年5月增补省委书记四人,其中军队干部一人为梁辑卿(安徽省军区第二政委),任职至1977年2月病逝。

(十三) 福建省

省委第一书记、军队干部韩先楚(福州军区司令员)任职至1973年12月。遗缺由地方干部廖志高于1974年11月接替。第二书记、军队干部周赤萍(福州军

区政委) 1972年8月被隔离审查。省委书记五人中, 军队干部二人。朱绍清(福州军区副司令员) 任职至1979年12月; 倪南山(福建省军区政委) 任职至1975年11月。1975年6月至11月增补地方干部四人为省委书记。

(十四) 江西省

1972年4月, 军队干部余积德(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任省委书记, 主持省委全面工作。其他省委书记四人中, 二人为军队干部。文道宏(江西省军区副政委) 任职至1977年4月; 陈昌奉(江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 任职至1975年8月。1974年12月, 地方干部江渭清任省委第一书记。增补地方干部一人为省委书记。

(十五) 山东省

省委第一书记、军队干部杨得志(济南军区司令员) 名义上任职至1974年11月, 实际上1973年12月已调离。遗缺由地方干部白如冰接替。山东省委未设书记, 副书记三人中, 军队干部一人为张铨秀(济南军区副司令员), 任职至1974年11月。

(十六) 河南省

省委第一书记至文革结束一直为地方干部刘建勋。省委书记四人中, 二人为军队干部。王新(武汉军区副政委兼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 1972年11月隔离审查; 张树芝(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兼河南省军区司令员) 任职至1978年2月。

(十七) 湖北省

省委第一书记、军队干部曾思玉(武汉军区司令员) 任职至1973年12月。第二书记、军队干部王六生(武汉军区第一政委) 任职至1975年5月。省委书记五人中, 军队干部三人。张玉华(武汉军区副政委) 任职至1978年8月; 孔庆德(武汉军区副司令员) 任职至1979年3月; 潘振武(武汉军区副政委) 任职至1979年3月。1972年12月后增补地方干部五人为省委书记。1975年5月, 地方干部赵辛初任省委第一书记。

(十八) 湖南省

省委第一书记至文革结束一直为地方干部华国锋。省委书记一人, 为军队干部卜占亚(广州军区副政委兼湖南省军区第二政委) 任职至1972年10月。1973年7月, 增补地方干部张平化为第二书记, 增补省委书记七人, 其中军队干部三人。杨大易(湖南省军区司令员) 任职至1977年10月; 张立宪(湖南省军区政委) 任职至1981年1月; 李振军(湖南省军区副政委) 任职至1977年10月。

(十九) 广东省

省委第一书记、军队干部丁盛(广州军区司令员)任职至1973年12月。先后继任者赵紫阳、韦国清均为地方干部。省委书记四人中,军队干部一人为孔石泉(广州军区第二政委),任职至1974年4月。1972年12月后增补地方干部五人为省委书记。

(二十) 广西壮族自治区

区党委第一书记先后为地方干部韦国清、安平生。区党委书记一人为军队干部韦祖珍(广州军区政委兼广西军区第二政委),1973年8月免职审查。1973年8月增补区党委书记四人,其中军队干部一人为刘重桂(广西军区第三政委),任职至1977年4月,后历任区党委第二书记、区党委书记。1975年10月增补地方干部二人为区党委书记。

(二十一) 四川省

省委第一书记、军队干部刘兴元(成都军区第一政委)任职至1975年10月,遗缺由地方干部赵紫阳接替。第二书记、军队干部梁兴初(成都军区司令员)1974年12月正式免职。省委书记六人中,军队干部三人。谢家祥(成都军区政委)任职至1975年10月;谢正荣(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兼四川省军区司令员)任职至1977年12月;何云峰(成都军区副政委)任职至1975年10月。1974年12月后增补地方干部八人为省委书记。

(二十二) 贵州省

省委第一书记、军队干部蓝亦农(昆明军区副政委)1973年9月免职,遗缺由军队干部鲁瑞林(昆明军区副司令员)接替,任职至1977年2月。省委书记一人为军队干部张荣森(昆明军区副司令员),任职至1977年9月。1973年9月增补地方干部一人为省委第二书记,一人为省委书记。

(二十三) 云南省

省委第一书记先后为地方干部周兴、贾启允。第二书记、军队干部王必成(昆明军区司令员)1975年10月改任省委书记至1979年1月。省委书记二人全为军队干部,陈康(昆明军区副司令员)任职至1975年5月;鲁瑞林(昆明军区副司令员)任职至1972年9月。1975年5月增补地方干部一人为省委书记。

(二十四) 西藏自治区

区党委第一书记、军队干部任荣(成都军区副政委兼西藏军区第一政委)任职至1980年3月。区党委书记六人中,三人为军队干部。陈明义(西藏军区司令员)任职至1975年9月,封克达(西藏军区副政委兼拉萨警备区政委)任职至

1977年5月；高圣轩（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拉萨警备区司令员）任职至1977年10月。1975年3月增补地方干部二人为区党委书记。

（二十五）陕西省

省委第一书记至文革结束一直为地方干部李瑞山。省委书记二人全为军队干部。胡炜（兰州军区副司令员）任职至1973年9月；黄经耀（陕西省军区司令员）任职至1977年7月。1973年5月增补地方干部三人为省委书记。

（二十六）甘肃省

省委第一书记、军队干部冼恒汉（兰州军区政委）任职至1977年6月。省委书记四人中，军队干部二人。皮定均（兰州军区司令员）任职至1973年12月；张忠（甘肃省军区司令员）任职至1975年8月。1975年1月增补地方干部四人为省委书记。

（二十七）青海省

省委第一书记、军队干部刘贤权（历任铁道兵司令员、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济南军区副司令员）任职至1977年2月。第二书记、军队干部张江霖（青海省军区司令员）任职至1977年6月。省委书记一人为军队干部宋长庚（青海省军区第一政委），任职至1977年12月。

（二十八）宁夏回族自治区

区党委第一书记、军队干部康健民（兰州军区副司令员）任职至1977年1月病逝。第二书记、军队干部高锐（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宁夏军区司令员）任职至1975年6月。区党委书记一人为军队干部张桂金（宁夏军区政委），任职至1978年4月。

（二十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代理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书记赛福鼎·艾则孜为地方干部。第二书记、军队干部曹思明（新疆军区代司令员、政委）1973年6月改任第三书记至1975年8月。军队干部杨勇（新疆军区司令员）1973年6月任第二书记至1977年9月。区党委书记五人中，军队干部一人为何林兆（新疆军区副政委），任职至1977年11月。

以上29个省级党委，1972年8月军队干部任一把手的18个，占62%。至文革结束时的1976年10月，军队干部任一把手的仍有11个，占38%，即四年间军队干部从占六成许下降至占近四成。省级党委书记1972年8月有129人，其中军队干部80人，占62%。到1976年10月省级党委书记增加至169人，其中军队干部53人，下降至占31%。惟退出三支两军四年，省级党委第一把手及书记中仍有

近四成是军队干部，这足可说明，在地方老干部逐步解放和补充一部分地方新干部过程中，对军队干部依存度的递减速度是缓慢的。

第一〇六节 十大：确立新接班人的失败尝试

一、十大的准备工作

1973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以筹备中共十大为主题的工作会议。《毛泽东传（1949-1976）》称，“本来，按照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十大应该在一九七四年举行。但鉴于发生了林彪事件这个特殊情况，九大通过的写有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党章自然急需修改，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急需调整，林彪事件也需要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作出正式决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十大。”^{【2337】}

《毛泽东传（1949-1976）》称，吸收文革中受到冲击的一批老干部出席党的十大，“是毛泽东这时正在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传（1949-1976）》又称：

在十大的筹备工作中，毛泽东着重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央领导班子的组成，包括林彪事件后需要再次选择自己的接班人。

他考虑新进入中央领导班子的条件主要有两个：一是要年轻，二是要从工人、农民中直接选拔一批人。他在九大后，特别是庐山会议和“九一三事件”后，“多次说要提工农出身的同志为党的副主席、常委。”一九七二年七月，他又说：“外国人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要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三十至四十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年、中年还要。你们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扶助。”

正是从这种设想出发，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等被考虑进入新的中央领导班子。

这些人中，毛泽东最看重的是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王洪文。他出生于一九三二年，这时四十岁，做过农民，做过工人，当过兵，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头头。这些使毛泽东对他抱有很大希望，准备在实际工作中加以培养和进一步考察。根据毛泽东的意见，

【2337】《毛泽东传（1949-1976）》下，页1653。

王洪文从一九七二年九月起留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半年后，他又被指定出席筹备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并被宣布正式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2338】}

为准备召开中共十大，有三份重要文件需要在会前拟定。“第一份文件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政治局确定的报告起草小组成员有周恩来、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叶剑英、李先念六人，由张春桥执笔。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对报告的起草工作给予指导，以体现他的意图。这年六月中旬，在听汇报后，他基本认可了报告稿的要点，并提出具体补充意见。七月七日，他看了周恩来报送的几经修改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的报告送审稿，表示‘原则同意’”。“第二份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修改小组成员有康生、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修改稿于七月初基本完成，并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2339】}第三份文件，是《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

二、《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

对于中央专案组负责起草的这一报告，毛泽东事前就表示：不应再搞那些繁琐内容，改为直截了当地列举众所周知的“林彪一伙的罪恶阴谋和叛党叛国的事实。”^{【2340】}按照毛的意见，中央专案组在7月10日完成的该审查报告中称：

中央专案组根据已经调查核实的物证、人证，现已查明：

（一）早在“九大”前后，林彪就招降纳叛，结党营私，伙同他的老婆叶群，勾结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结成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他还通过他的儿子林立果，秘密建立反革命特务组织小“联合舰队”。林彪反党集团是国内地、富、反、坏、右和国际帝、修、反的代理人。它的骨干分子，是一小撮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托派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新的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他们密谋发动反革命政变，妄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二）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反党集团向党发动的突然袭击，是有预谋的。在林彪的直接指挥下，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在会前和会中多次秘密开会，多方串连，阴谋策划，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地向党进攻。从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林彪发表反党讲话，到八月二十五

【2338】《毛泽东传（1949—1976）》下，页1655。

【2339】《毛泽东传（1949—1976）》下，页1659-1660。

【2340】《毛泽东传（1949—1976）》下，页1660。

日上午林彪、陈伯达指使李雪峰炮制的反革命六号简报出笼，他们专了两天半的政。他们的反党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唯心主义的“天才论”，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向毛主席、党中央夺权。它的性质，是一次被粉碎了的反革命政变。

(三)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反党集团立即秘密进行反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准备。他们炮制了《“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并从政治、军事、组织、情报等各方面加紧进行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林彪下达了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手令。九月十日，林彪给黄永胜一封亲笔密信。在林彪的直接指挥下，林彪死党用穷凶极恶的手段，妄图乘毛主席外出巡视的机会，在外地谋害毛主席，并策划于同一时间，在北京谋害中央领导同志。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林彪又通过吴法宪私调飞机，要与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一道，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妄想造成所谓“南北朝”的局面。林彪还企图勾结苏修，对我实行南北夹击。他们的种种阴谋，都遭到彻底的破产。

审查报告又称：

鉴于林彪反党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叛党叛国，罪大恶极，中央专案组建议党中央：

(一) 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的党籍。

(二) 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三) 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特务、叛徒、卖国贼叶群的党籍。

(四) 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雪峰的党籍，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五) 对参与林彪反革命政变的其他骨干分子，由有关部门负责审查，按照党的政策，区别情况，提出处理意见，报中央审批。^[2341]

按照中共惯例，在换届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应该召开中央全会以作前期准备。如为九大召开作准备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即批准通过了《关于叛徒、

【2341】中发[1973]34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1973年9月8日发出。

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关于九大代表产生的决定》和《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惟这一次可能由于顾虑到林彪的问题涉及文革和毛、林关系，因此，在十大召开前反常地没有召开九届三中全会。一切准备程序均在中央政治局内完成。8月20日，对审查报告以“中共中央”名义作出仅一句话的决议称，“中共中央一致通过并批准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

8月29日，十大结束后的新闻公报中，没有直接提及审查报告，惟其称，“大会愤怒地声讨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全体代表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决议：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的党籍；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一致拥护中共中央委员会对林彪反党集团其他主要成员的处理和所采取的全部措施。”^[2342]

9月7日，注明“毛主席已圈阅”的《中共中央关于认真学习十大文件的通知》称，“在学习十大文件的同时，各级党委应按照中发[1972]3号文件的规定，立即向党内外群众广泛传达中共中央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的决议和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中发[1973]34号）。要充分利用林彪这个反面教员，发动群众对林彪反党集团继续展开革命大批判。中央专案组的报告上所列的附件（中发[1971]77号、中发[1972]4号、中发[1972]24号、中发[1972]25号），前已印发，不再补印。”^[2343]

三、现役军人在中央领导层面减退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共十大在北京秘密举行。

十大结束后，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在传达会议精神时曾称，“毛主席特别强调‘十大’要注意保密，不能把消息泄露出去，在会议期间不允许透露风声。在北京的一些外国人，特别是苏修使馆的人围着中央所在地团团转，打听消息，可是他们什么也得不到。正如毛主席说的我们这个党是守机密的。”^[2344]

【2342】《人民日报》，1973年8月30日。

【2343】中发[1973]36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1973年9月8日发出。中共中央8月20日决议和中央专案组的审查报告，同时以中发[1973]34号中共中央文件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

【2344】曾思玉同志一九七三年九月九日上午在宣讲“十大”新闻公报时的插话。彭健飞：《十年浩劫日记》第三卷，自印本，页1244。

8月28日，大会选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195人当选为中央委员，124人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以上第十届中央委员会成员共319人，其中现役军人94人，占总数的29%，比九届中央委员会的比例44%大幅下降了15%。

8月30日，十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机构。选举结果如下：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候补委员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

以上第十届中央政治局成员共25人，与第九届中央政治局成员人数相同。惟第十届中央政治局成员中现役军人仅为7人，比前届成员中现役军人13人减少了5人，其占成员总数的比例亦由52%大幅下降至28%。这些数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林彪事件之后军队在中央政治核心层影响力缩退的状况。

曾思玉在传达十大精神提及新的中央委员会时称：

（五）念公报12-13段

八月二十八日，大会主席团和全体代表分组反复酝酿讨论十届中委和候补中委候选人名单。当晚“十大”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新的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当选的中央委员195名，候补中央委员124名，共319名，十届中央委员会充分说明了我们的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和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

新的中央委员会有六个特点：

第一，充分体现了“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正确的。十届中委产生的办法是在“九届”中委的基础上调整的。“九届”中委和候补中委共279人，这次保留了206人，占三分之二以上。新增加中央委员113人，这次清除林彪及其死党和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严重错误的，还有犯其他错误的和在第九次路线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的人有47人。任爱生^[2345]看了公报就说他完了，为什么呢？他那一伙人没有了，山东的王效禹，还有刘结挺、张西挺、刘格平、张日清、李再含、潘复生这些人没有了。过去被整错了的一些人这次也出来了，乌兰夫不是出来了吗？我看刘丰是个死党。

【2345】任爱生，文革前为湖北省委农村政治部主任，文革中最早站出来支持造反派，1968年2月任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后又批为“死不悔改走资派”。

第二，充分体现了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十届中委和候补中委 39 岁以下的占 24.8%，40 岁至 59 岁的占 44.5%，50 岁以上的占 30%，中年、青年共占 69.3%，老同志中绝大部分是老一辈革命家。

第三，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对犯错误的干部的政策，坚持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如海军的王宏坤，空军的曹里怀，总后的张池明，他们虽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检查交待比较好，表示愿意改正错误，仍然被选进了中央委员会。

第四，体现了工人、农民占多数，九届中委中，工农同志占 27.2%，十届占 33.9%。

第五，女同志和兄弟民族的同志增加了。

第六，照顾了各个方面，各条战线上的代表人物都参加了，待解放的台湾省的党员代表也第一次参加了中央委员会。

我们要善于从三大革命斗争中发现优秀分子积极加以培养，把他们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党中央就给我们做出了样子来了。王洪文同志，东北吉林人，只有三十八岁，当过志愿军，当过工人、种过地。六七年上海安亭事件有八十万人要上北京，中央派张春桥去那里解决，同他们谈了话。王洪文就按毛主席的指示，把这些人带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了。毛主席发现了这个人，同他谈了三次话，说他敢于反潮流，敢顶。例如林彪死党黄永胜向王洪文同志打听毛主席行动时，王洪文同志说：主席到那里，你是总参谋长，还不知道吗？顶回去了。王洪文同志一直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按照毛主席制定的政策办事的，是一个优秀的同志。所以，中央一直培养他。

（六）念公报 14 段

这次大会，认真讨论了中央批准的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愤怒声讨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一致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决议。全体代表还经过讨论，一致拥护中央关于撤销袁升平同志“十大”代表资格的决定。现在传达中共中央的决定（宣读了 5 号文件）。袁升平是什么问题呢？他是济南军区政委，在传达中发（1971）57 号文件时，他在工程兵小组带头哭了，这说明他和林彪感情之深。当王洪文、许世友同志把 57 号文件带到济南，袁升平看到文件并没有哭，为什么后来传达时哭了呢？从他现在的表现，看他的历史，准备打海南岛时，他同黄永胜跑到香港去住旅馆，住了一个多星期，穿着西服照了相。再就是他还包庇坏人，包庇北海舰队的—一个林

彪死党，现在把这个人交给李震同志了。他还不准唱样板戏，还有其他一些问题。【2346】

四、未能接班的政坛新星

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五人中，王洪文、李德生分别被外界视为毛泽东选中的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既定接班人。惟实际上王、李两人很快又被毛泽东摒除出接班人位置。

（一）王洪文

大约在中共十大召开前一年，毛泽东曾称“我的意见就是要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2347】十大召开后，毛泽东的话只兑现了一半，四十岁的王洪文当了党的副主席，惟毛并没有将军委副主席的名衔一并授予他，王在十大后仅被增补为已有九人之多的军委办公会议新的成员。



王洪文在中共十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1973年8月。

【2346】曾思玉同志一九七三年九月九日上午在宣讲“十大”新闻公报时的插话。《十年浩劫日记》第三卷，页1245-1246。

【2347】《毛泽东传（1949-1976）》下，页1655。

1973年9月12日，王洪文与周恩来一起，陪同毛泽东会见了来华访问的法国总统蓬皮杜。^[2348]这种陪同毛会见重要外宾的最高荣耀，在这一天之后延续了16次，直到1974年5月29日，王与周恩来陪同毛会见了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此后周恩来病重住院，已不再陪同毛会见外宾）。这是王洪文政治生涯的最鼎盛时期。

不过，最鼎盛时期也是到此为止。标志性的事例是：三个月后，毛泽东再次露面，1974年9月4日会见多哥共和国总统埃亚德马时，参加会见和谈话的主要陪同人已换成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9月10日会见尼日利亚联邦军政府首脑戈翁时，在座的主要陪同人是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一时间，邓小平、李先念轮番出场，毛泽东的书房会见，失去了王洪文的身影。

1974年的中期，距离毛一手扶持的王洪文突然崛起仅一年后，毛就有意疏远了这位曾经大有前途的继承人，个中缘由，应该在于毛此际在心目中已以邓取代了王。翌年2月，新的军委常委会成立。作为名义上的中共第三号人物，王洪文仅被任命为由十一人组成的此一常委会的其中成员之一。这表明，在军内，他已不能与当时的两位中共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一争短长。这也在客观上为一年多后“粉碎四人帮”行动减少了阻碍。

（二）李德生

在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前，李德生的主要工作范围在军内，他的军内职务是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总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在地方上尚兼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以毛泽东1972年7月的说法推断，在成为党的副主席之后，他极有可能被任命为军委副主席，还极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接叶剑英的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惟实际上连王洪文都未能成为军委副主席，李德生就更免谈了。

事情出人意料的发展是，十一届一中全会四个月后，李德生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离开北京之际，李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总政治部主任两职一并免去，这恐怕是非毛泽东本人无法决定的事。而毛为什么比对王洪文更早更彻底地扼杀了这颗政坛新星的大好前途，却也是更加令人费解的。

1973年12月李德生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时，并未有按惯例同时被任命为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后一党内要职的任命，在十个月以后的1974年10月才迟迟下达。在此之前，毛远新已被任命为沈阳军区政委、军区党委第三书记，成为在

【2348】新华社在电讯中提到王洪文时称，“贵宾们由周恩来总理陪同来到毛主席住处时，首先在门口受到王洪文副主席的接待。”《人民日报》，1973年9月13日。

沈阳军区内制衡李德生的一股力量。与此同时，在毛泽东的默许下，李德生在北京、沈阳受到批判。1974年9月，由中央政治局主持召开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以“解决”李德生、许世友、韩先楚等人的问题。

在调离北京之后，李德生实际上已经不参加中央活动。所谓中共中央副主席，实际上是徒有虚名。李德生尚有自知之明，自称，“我认为有必要主动辞去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的职务。我觉得这样比虚有其名好。中央派人同我交谈后，只同意我辞去政治局常委、副主席职务。我写一封简短的信，提出上述请求，毛主席批示同意。”^[2349]可以说，当初毛泽东重用李德生，既是对李的赏识，但更重要的是以李制约林彪一系，按毛的说法是“掺沙子”。林彪的问题彻底解决后，李自然失去了这个作用。

五、扑朔迷离的“新军委”

中共十届一中全会前是否有一个由军委提出的新的军委组成人员名单？这一名单是否被正式批准通过？多年以来，官方（或非官方）著述、资料呈现了“有”或“无”两种截然不同的记载。

首次披露有一个“新军委”名单的，是1989年出版的非官方著作《“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该书称，“1973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军委提出组成新军委的63人名单。原军委成员保留28人：毛泽东、叶剑英、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丁盛、王树声、韦国清、皮定均、刘兴元、刘贤权、许世友、陈士榘、陈先瑞、陈锡联、李德生、张达志、张池明、张春桥、杨得志、杜平、萧劲光、冼恒汉、曾绍山、曾思玉、彭绍辉、韩先楚、粟裕。增补35人：王洪文、李先念、纪登奎、汪东兴、张才千、张宗逊、詹海英、苏振华、孔昭年、马宁、傅传作、张廷发、毛远新、孙玉国、迟浩田、白如冰、杨育才、胡修道、李志民、王昭莖、孔石泉、王必成、周兴、张贵武、秦基伟、张英才、王六生、陈代富、郝忠云、杨勇、赛福鼎·艾则孜、高焕昌、陶鲁笳、萧克、宋时轮。”^[2350]

上述名单除了是建国以来军委组成人数最多的一次之外，其最显著的特点是打破了建国以来军委组成人员均为高级干部的惯例，破天荒地首次将十名师团职干部增补为军委委员。他们是：毛远新（毛泽东亲侄子，时任沈阳军区空军司令部处长）、孙玉国（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战斗英雄，时任黑龙江省军区独立团团团长）、迟浩田（时任陆军第八十一师政委）、杨育才（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现代京剧《奇

【2349】《李德生回忆录》，页479。

【2350】《“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页145-146。

袭白虎团》主人公严伟才的原型，时任陆军第二〇三师副师长）、胡修道（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时任陆军第三十六师副师长）、王昭莒（时任陆军第八十五师师长）、张贵武（任职情况不详，其人名不在全军副军职以上名册中）、陈代富（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战斗英雄，时任步兵三九〇团政治处副主任）、郝忠云（全国战斗英雄，时任陆军第一四一师副师长）、高焕昌（时任陆军第四师师长）。

1997年5月由中共文献出版社出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纂的《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有如下记载：“全会还部署了军事方面的工作，批准了二十九日由中央军委提出的新军委组成人员名单。”^{【2351】}

2005年1月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史要》则称，“1973年8月30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批准，中央军委提出的新一届中央军委委员63人。”其后列出的军委成员名单与《“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一书相同。

2013年12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纂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对此有一句话的记载：“全会还批准八月二十九日由中央军委提出的新的军委组成人员名单。”

以上四处，为官方（或非官方）著述中有“新军委组成人员名单”及该名单被中共十届一中全会批准的记述。

而官方资料中没有此名单记载的，主要是长征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总政治部组织部编纂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第五卷（文化大革命时期），及中央党史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纂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附卷二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此两种资料有关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央军事委员会沿革的记载，应比前四种“有”的记述更具权威性。

按中共惯例，这样一份中央军委组成人员的名单，是需要毛泽东本人的批准同意的，惟我们至今未见有见到毛泽东批准同意的中央正式文件或有关文字记载。因此，可能存在的一种情况是：的确由叶剑英主持日常工作的中央军委提出过这么一份名单，而且由周恩来主持的十届一中全会亦通过了这份名单，但名单最终未获毛的批准（毛未出席十届一中全会，全会批准不等于毛批准，这似乎表明了毛在此问题上比叶剑英及周恩来更为谨慎的态度），在军委历史上，这份名单当然就不获承认。

【2351】《周恩来年谱》注：“新军委名单共计六十三人，其中保留原军委成员二十八人，增补三十五人。”

第一〇七节 邓小平复出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一、邓小平复出对军队的影响

邓小平是文革前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选之一，其才干在中共总书记的位置上已充分显露，得到毛的赏识。在林彪事件清查工作尘埃落定之后，毛即有意重新起用邓。

1973年2月，在江西南昌郊区下放谪居了三年多的邓小平，接到中央要他回京的通知。3月9日，邓回京后不久，周恩来立即将草拟的《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送审稿）》报送给毛泽东，并在送审稿上写道：“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问题，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报告过。现在邓小平同志已回京。为在全国树立这样一位高级标兵，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同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2352】}3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这个决定称：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多次指出，邓小平同志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与刘少奇是有区别的。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四日，在邓小平同志写给主席的一封信（见附件一）上，毛主席又作了如下的重要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捱整的，即邓、毛、谢、古^{【2353】}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了毛主席的批示和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毛主席的批示，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总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全面地、历史地评价他们的功过，认真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邓小平同志从全国解放以来，特别是在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期间，所犯的

【2352】《毛泽东传（1949-1976）》下，页1650-1652。

【2353】文件原注：即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同志。

错误是严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邓小平同志的揭发批判是正确的，必要的。经过毛主席、党中央的耐心教育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对自己的错误作了认真的检查。有了悔改的表现(见附件二)。我们对他的进步应当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希望他在实践中继续改正自己的错误。遵照毛主席批示的精神，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工作。

在当前深入开展的批林整风运动中，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学习毛主席有关正确对待犯错误干部的一系列指示，对犯错误的同志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进一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在工作中犯过错误的同志，要相信党，相信群众，严于解剖自己，认真作自我批评。全党同志都要从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提高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这个决定连同两个附件，印发到县、团级。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

附：(一) 邓小平同志的信(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二) 邓小平同志的《我的自述》(摘录)(一九六八年六、七月)

附件一：

邓小平同志的信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主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的历史材料，……

对于林彪和陈伯达，我没有什么重要材料可以揭发，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历史我一无所知，只能回忆一下平时对他们的感觉。对林彪，我过去觉得他很会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胜将军，不打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事实上他也不是每

仗必胜的，但认为他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觉得是一个长处。在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次是在长征时，他同彭德怀搞在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他历来标榜自己是反对彭德怀的，但在这样非常困难的关头，却同彭德怀结成同盟，搞秘密串连，如果没有主席的威望和坚强的领导，不知会成为什么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出面反对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按说他是比彭德怀要适当的人选，而他竟拒绝了，在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在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这我是从他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的。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怀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声色俱厉的，他们甚至说刘在二野没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记得在常委也说过），对我这个态度，林彪当然是不高兴的。罗荣桓同志同林彪是老战友，按说他们应该是很好的，罗荣桓同志为人的朴实，诚恳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罗在干部中是很有威信，林彪就说过，四野干部有事都找罗，不找他。记不得是在一九五几年，罗荣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只强调老三篇，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兴，从此对罗的关系很坏。至于对贺龙的关系，大家是知道的。

对于罗瑞卿问题的处理，我是有错误的。在罗瑞卿问题出来前，我一直认为罗同林彪的关系是不会坏的，我一直觉得罗是林的老部下，罗当总长又是林推荐的，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当一九六六年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彪提出罗瑞卿问题时，性质是那样严重，我的感觉是很突然的。而在叶群向我叙述罗瑞卿如何反对林彪，如何企图夺权时，又夹着一些罗如何轻视我的话，我听了并不舒服。我总觉得其中包含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在方式上多少带一些突然袭击的性质，这多少影响我在处理罗的问题犯下那样不容宽恕的错误。

对于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但是过去我一直认为他抓得对，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但是，过去在两点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

林彪只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了，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一是总感觉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特别是损害了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我从阿尔巴尼亚同志的态度了解到这一点，我是赞成强调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列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作用的。

对于军队建设，我过去一直肯定林彪在这方面的作用。过去我只觉得他在强调人的决定因素的时候，忽略了军事技术和战术的训练。林彪多次说，只要人不怕死就会打胜仗，这是正确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见到“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样的提法，觉得有点刺眼，只觉得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法，不敢有别的想法，现在原形毕露，才恍然大悟了。

对于陈伯达，他的历史我一无所知，甚至在延安写的三民主义概论我也不知道。我对陈的印象是，这个人很自负，很虚伪，从来没有自我批评。……

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的胜利！

× × ×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应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〇、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

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其他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

主席万寿无疆！

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附件二（略）^[2354]

邓小平在信中除了表示“对于林彪和陈伯达，我没有什么重要材料可以揭发，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历史我一无所知，只能回忆一下平时对他们的感觉”之外，还表示对于自己的“错误和罪过”，“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同时，邓也不忘在信中再次贬损了刘少奇、彭真、彭德怀、罗瑞卿、杨尚昆等昔日的同僚。

【2354】中发〔1973〕14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1973年3月16日发出。

4月12日，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席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为欢迎流亡中国的前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举行的隆重晚宴，这是邓在被打倒六年多后的首次公开露面，“引起了很大的轰动”。^{【2355】}

8月28日，邓小平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为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三个多月后，1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下达到县团级党委、并传达到党内外群众的通知称，“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请予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特此通知。”^{【2356】}这样，从复出恢复党组织生活、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到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邓只用了九个半月的时间。

1974年1月，邓小平成为受权处理西沙作战日常工作的军委六人小组（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苏振华）成员之一。一年后的1975年1月5日，邓任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同月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邓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此际邓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实际地位和作用，不仅超越了邓自己文革前在党内、军内的位置（文革前邓为中央常委、军委常委），亦远远超越了从1974年中期以后被毛逐渐冷落的王洪文。邓小平受命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军队抵御中共十大后形成的“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极左势力的侵蚀、1975年军队的全面整顿成为可能。

二、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九一三事件”数小时后，林彪在北京和北戴河的住处即被查封。在毛家湾林办的档案中，发现了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三位大军区司令员在九届二中全会初期分别写给毛、林的三封信，提出对“犯错误的人”^{【2357】}不宜留在中央工作，应放到基层去锻炼”这三封信当时在呈送过程中被叶群扣下，叶是有意保护写信的人。1971年当林彪专案组将这三封信第二次呈送周恩来时，周批道，“此件是在传阅中被叶群扣压的。退。周恩来。”意不再追究。未料1972年初江青从另外的渠道获悉此事后报告毛泽东，引致毛不悦，许、韩、杨被召进京谈话以作交待，负责文件传送流程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被揭查批判，于1973年1月

【2355】法新社北京1973年4月12日电。

【2356】中发[1973]44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1973年12月23日发出。

【2357】指张春桥。

26日自缢身亡。1973年5月4日，毛对许、韩、杨三人信一事表态称，“过去的事算了，以《国际歌》为界。”^{【2358】}

毛虽然口头说“过去的事算了”，惟内心对这几位坐镇一方已久^{【2359】}、手握重兵的大军区司令员的忠诚度还是颇有疑惑。到了1973年底，熟读古书的毛泽东决定师北宋初年宋太祖的“更戍法”，调动这些人的职务，使“兵无常帅，帅无常师”，以解心头之忧。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在会议上提出了大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的建议，又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12月13日、14日、15日和21日，毛又对大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等问题讲了一系列的话。

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称：

12月12日晚七时至八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八时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你（指邓小平——编者注）呢，我是喜欢你这个人的，咱们中间也有矛盾啊，十个指头有九个没有矛盾，就是一个指头有矛盾。你（指叶剑英——编者注）以后胆子大一点吧。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我无非是开个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在政治局。我主张找各大军区的司令员来。议什么事，要议军。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你（指叶剑英——编者注）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第一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让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步调要一致，不一致就不行。陈锡联同志当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同志到沈阳军区去；杨得志同志跟曾思玉同志对调；许世友同志跟丁盛同志对调；韩先楚同志跟皮定均同志对调；新疆、成都、昆明，他们都刚去，不要动。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2360】}

【2358】赤男：《林彪事件后三位上将的信件风波》，《党史博览》，2004年第6期。赤男即肖思科。“以《国际歌》为界”指以1971年八九月间毛南巡领头唱《国际歌》时为界。

【2359】许世友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已18年，韩先楚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已16年，杨得志任济南军区司令员已18年。

【2360】《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510。

毛泽东 13 日、14 日、15 日讲话的主要内容，与 12 日大略相同。12 月 15 日，毛泽东圈阅周恩来本日晨五时报送的政治局会议对毛 13 日、14 日两次谈话讨论情况的报告。报告称：到会同志均表示完全拥护主席指示，坚决执行。会议商定，拟电十一个大军区和广西，约司令员和第一政委于 16 日来京开军委会。关于大区司令员兼省委书记问题，拟乘此调动机会，确定一律不兼。关于调动执行时的欢迎、欢送和向各群众组织代表人物打招呼等事，当按主席指示精神落实。12 月 21 日，毛泽东圈阅周恩来、王洪文本日晨二时报送的 19 日、20 日两天政治局成员参加军委会议议事情况的报告。报告称：政治局商定 21 日休会一天，由对调的大军区分四组开会，双方介绍主要情况，并协商欢迎、欢送和对各派做工作、打招呼的办法。拟在 22 日开全体会宣告结束。^[2361]

12 月 21 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全体成员。毛泽东称：

不要相信那些屁话！我们在旧社会，国民党的报纸那么多，广播电台天天吹，又没有把我们就变成国民党了嘛。我们还是共产党。现在贴两张大字报，不要紧呢。

总是两面的。你们说了什么四川不行，有些不听话，不听调。这也是常事，养着嘛！有一个能办事的就好了嘛。你们呢，要交好班呢。有困难啊，人生地不熟。有些人就批你们，大多数呢，舍不得你们走呢。（对韩先楚）我不是跟你讲过嘛，这个世界上这类事啊，心放宽些，胆子壮些，心要宽，胆要大。无非是做官嘛，革命嘛，一个不撤，一个不批吧。这个会差不多了吧。明天一天就“聋子放炮竹”^[2362]了。

许世友同志，你现在也看《红楼梦》了吗？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他那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所以有两个人，一名叫甄士隐，一名叫贾雨村。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这些是掩盖它的。第四回里边有一张“护官符”，那上面说：“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中国古代小说写得好的是这一部。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呢。

^[2361]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 512-513。

^[2362] 这是《红楼梦》第五十四回中王熙凤讲的一句歇后语，意思是“散了”。

你(指许世友)就只讲打仗。你这个人以后搞点文学吧。“常恨随陆无武，绦灌无文。”^[2363]你能够看懂《红楼梦》吗?要看五遍。《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

“随陆无武，绦灌无文。”绦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指许世友)这个人也是少文。

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许世友：把它消灭!不怕，那有什么关系!)不怕啊?你就作周勃嘛。你去读《红楼梦》吧。

到一个新地方有很多困难呢。不熟人，不熟地方，不熟党，不熟军。党、政、军、民都不熟。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慢慢来，就会顺手。

还有什么话讲啊?明天开一个大会就散了罗。(周恩来：还要起草一个命令，鼓励大家一下。)噢，这个好。你们带个头。底下的政委、参谋长、总部、省军区、军、军分区，还有什么人武部，人也很多。这个问题不要紧。世界上总是这样的(把两只手合起来)，总有两面。有廉洁必有贪污，有贪污必有廉洁。只有廉洁，没有贪污，也不行啊，那就只有一只手。这个手(举左手)是廉洁，这个手(举右手)是贪污。是对立统一。

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第七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

苏联现在跟我们又在拉关系。最近有个什么文化部的招待会上，他们跟我们驻苏联武官处的人谈话。我们的条件，主要是两条：一要撤兵。撤到赫鲁晓夫时候那样。二要承认错误，从布加勒斯特会议开始。

你陈司令(指陈锡联)，济南的杨得志同志，南京的许世友同志，这几位同志呢，在一个地方搞得太久。这个李德生同志，曾思玉同志，丁盛同志，倒是搞得不那么久呢。你们带个头呢，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就会照样去做。

这时，周恩来提议唱个歌，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第一段。

毛主席说，不错，就是这一条要紧。还有八项注意，第一注意，第五注意。第一项注意，说话要和气。第五项注意是，军阀作风不要呢。

毛主席又亲自指挥，大家齐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唱后鼓掌。毛主席宣布散会。^[2364]

【2363】《晋书·刘元海传》中刘元海称：“常鄙随陆无武，绦灌无文。”毛称，“鄙”字改为“恨”字。随、陆、绦、灌分别为汉朝的随何、陆贾、周勃、灌婴。

【2364】《毛泽东关于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等问题的谈话要点》，1972年12月。《“文革”十年资料选编》下册，页11-15。



广州、南京军区司令员对调交接时与两军区及广东、江苏两省领导在南京长江大桥前，左起：萧永银、任思忠、韦国清、丁盛、田普、许世友、孟文虹、杜平、刘教湛、王首道、吴大胜、彭冲，1974年1月。

1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称：

为了加强军队建设和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为了使军区主要领导干部交流经验，熟悉更多地区的情况，经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北京与沈阳、南京与广州、济南与武汉、福州与兰州八个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特此任命：

李德生同志为沈阳军区司令员

陈锡联同志为北京军区司令员

许世友同志为广州军区司令员

丁盛同志为南京军区司令员

杨得志同志为武汉军区司令员

曾思玉同志为济南军区司令员

韩先楚同志为兰州军区司令员

皮定均同志为福州军区司令员

望有关军区党委做好交接、迎送工作，做好军内外各方面的团结工作。

上述相互对调的军区司令员，自接到命令之日起于十天内到职。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发至县、团级)^[2365]

【2365】中发[1973]43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1973年12月23日发出。

军委命令中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理由是“交流经验，熟习情况”，而真正的理由还是毛12月12日讲的“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目的是防止高级将领拥兵自重，势力坐大。

第一〇八节 江青插手军队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江青将“批林批孔”渗入军队

1973年中，为了把林彪与“极右”挂在一起，毛泽东在多次谈话中提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批林时要和批孔联系起来。

1974年1月12日，王洪文、江青致信毛泽东称：

主席：

我们看了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觉得这份材料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各地也迫切需要这种简明扼要的材料。

我们建议是否可以把这份材料转发全国各省、市，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委各总部、国务院各部，供批林、批孔时参考。现把材料呈上妥否请主席批示。

王洪文 江青

1974年1月12日^[2366]

毛泽东对王、江的信批示：“同意转发。”1月18日，中央以中发[1974]1号中共中央文件通知全国省军级以上党委称：“现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发给你们，供批林、批孔时的参考。”“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选编的这个材料，对于继续深入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

自此，“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展开。江青以个人名义，多次给军区内多个单位写信，将运动渗进了军队，这是文革以来江青对军队工作最大规模的一次干预。

1月24、25日，江青策动在北京连续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24日，江青以个人名义直接写信给军委领导人，要求军队系统大力开展“批林批孔”。同

【2366】《大动乱的年代》，页501。

日，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召开中央军委直属机关和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军队驻京 14 个大单位一万八千人。大会的内容一是宣读江青以个人名义写给军委领导人的信，二是传达中共中央 1974 年 1 号文件。江青致军委领导人的信全文如下：

洪文、剑英、春桥、小平同志：

首先代我问候全军同志们春节好！

相当长的时间了，从许多材料看来，全国范围内的批林整风运动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批孔则更是深入不下去。而林彪的思想体系和孔老二的关系，更是不清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搞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和《名词简释》是可以帮助全体同志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因此我特请谢静宜、迟群二位同志向全军指战员宣读中央的通知。他们已下过连队蹲点，取得经验，可能对全军有所帮助。批林批孔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大事，这是使国内外帝修反惊恐的事。全国党、政、军、民、学通过这个学习，可以取得更大的团结和胜利。

现送上《林彪与孔孟之道》《名词简释》各 200 份，《五四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20 本，《鲁迅批判孔孟的言论摘录》和《反动阶级的圣人——孔子》各一份，供同志们参考。文件，文章的份数是不足的，但是可以翻印。有什么问题报中央，我们也要和同志们一起学习，我们将努力解答同志们提出的问题。

我相信同志们会努力学习，保持我军光荣传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知难而进，没有攻不克的堡垒。只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将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任务是很艰巨的，但也是光荣的！

毛主席说要能文能武，长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学得文武双才，方能完成毛主席，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

致

无产阶级革命的敬礼

江青

1974.1.24^[2367]

【2367】《大动乱的年代》，页 517-518。

二、江青“指导”二十军防化连的“批林批孔”

1月13日，在中央发出1974年1号文件之前，江青看到了《解放军报》编印的《内部参考》刊登的对陆军第二十军直属防化连批孔问题的情况反映后，命谢静宜和迟群带着材料及江青的一封信直送二十军防化连。江青在信中写道：“二十军防化连的全体同志，当我看到军报《内参》上有关同志们在批孔问题上有困难时，我正好收到了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和《名词解释》，这两个材料对你们会有帮助的。请谢静宜和迟群同志到你们那里宣讲，并送去二百份供批林批孔参考，有什么问题，可请谢静宜两位同志转告我。”^[2368]

1月20日，陆军第二十军所在的南京军区党委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报告称：

最近，江青同志看了解放军报内部参考上刊登的关于二十军军直防化连在批孔问题上的反映后，于一月十三日亲自给防化连全体同志写了信，赠送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编写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及其附件各二百份。随信还附送：(1)《五四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一份；(2)《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一份；(3)《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一份；(4)《孔子的中庸之道是反对社会变革的哲学》一份；(5)读柳宗元《封建论》一份。并派谢静宜、迟群同志专程送到防化连。谢、迟二同志一月十五日到部队后，连夜向防化连全体同志宣读了江青同志的信，发了江青同志赠送的学习材料。防化连的全体同志十分感动，正按照江青同志的指示，认真进行学习。二十军党委除帮助防化连搞好学习外，并要求部队把学习江青同志的信，深入批林批孔，作为加强部队思想建设的大事来抓。

一月十六日，军区党委接到二十军报告后，除连夜派员赶到防化连，请谢、迟二同志转达我们对江青同志的感谢外，并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江青同志的信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对军区部队广大指战员的关怀，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抓大事、抓路线、深入批林批孔的重大战略措施，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加强调查研究、抓好典型的要求。我们决心进一步学习毛主席关于议军、议政，提起政治思想工作的纲等一系列重要指示，把批孔作为深挖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老根，深入批林整风的大事来抓，掀起一个新的批林批孔高潮，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建设；推动战备训练等各项任务的完成。我们打算通过二十军防化连和南京路上好八连，并要求各军、师都抓

^[2368] 周恩来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讲话，1974年1月25日。

一个连队，先学习江青同志送来的材料，取得经验，逐步推广，努力克服不善于抓典型，工作一般化的毛病。我们已将江青同志的信和我们的上述认识，向军区领导机关和各军的同志通了个气，要求他们对当前批林批孔的情况进行一次认真地分析，提出深入批林批孔的意见。军区定于二月四日召开政治工作会议，进一步学习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学习江青同志给防化连的信，认真讨论深入批林批孔的措施，抓紧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抓好反修防修教育，加强反侵略战争的准备。^{【2369】}

1月25日，中共中央以中发[1974]3号中共中央文件将南京军区党委的报告、中共陆军第二十军委员会及防化连给江青的信二件转发全国，“供全国党、政、军、民、学批林批孔时参考。”

三、江青“指导”空军的“批林批孔”

1月13日，江青在给二十军防化连写信的同时，又以个人名义给空军司令员马宁写信称：

马宁同志：

听说，空军批林批孔有些困难，请苏元勋同志送上《林彪与孔孟之道》、《五四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摘录》各100本，可能有助于批林批孔。苏元勋同志一向受林彪死党吴法宪的压制，“九一三”以后才引起大家重视，托他去传达，请指定一个连队，请苏元勋同志参加座谈，有什么问题 and 意见，请告苏元勋同志转告我。

江青

1974年1月13日^{【2370】}

马宁收到信后，与空军主要领导研究，确定由空军副政委杜玉福带领工作组试点。空军工作组于1月16日至3月16日，在空军航空兵三十四师一〇〇团一大队机务中队和三大队空勤七、八中队进行了批林批孔的试点。1月21日，空军党委向空军团以上党委发出《关于贯彻中央(1974)1号文件，深入批林批孔的意见》。《意见》指出，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要充分认识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批判的重要性，切实把这个头等大事抓紧抓好。

【2369】中发[1974]3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1974年1月26日发出。

【2370】《大动乱的年代》，页517。苏元勋（应为苏延勋），谢静宜的丈夫，时任空军司令部机要局参谋。

1月25日，江青对苏延勋说“要先把北京这个司令部冲开”，要苏在空直大会上讲话。25日至30日，苏延勋在西郊、南苑、沙河三个机场和空直驻京单位的大会上，以江青联络员的身份，作了4次讲话。1月27日、28日，空军政治部在北京召开了空军宣传部（处）长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军区空军、成指、昆指、民航及空直机关宣传部（处）长，共14人。空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高厚良到会讲话。会议传达了江青给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邓小平的信，江青给马宁的信，听了苏延勋在空直机关批林批孔动员会上的讲话录音，处并进行了讨论。会议提出，正在召开或将要召开的军区空军党委会，要以传达贯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指示为主，不要再按原来的调子，四平八稳地传达空军党委四届八次全会精神。空军党委常委要把这次在批林批孔问题上的严重教训，告诉军区空军的领导和广大指战员，以求得监督和帮助。空军党委关于“批林批孔”的《意见》与中央的精神、江青的指示有距离，要立即修改。^{【2371】}

1月28日晚，空军党委常委、空直三大部负责人开会研究了放手发动群众，搞好“批林批孔”的问题。会议研究确定：一、江青给中央军委4位领导的信和江青给马宁的信，印发团以上党委，驻京空军机关人员没有听过26日空直大会精神传达的，要立即补课。二、江青送给三十四师的《一份退学申请报告》，印发空军全体指战员。常委走后门送子女参军、上学的，要自己做好工作，处理好并认真检查，吸取教训。三、空军党委《关于贯彻中央〔1974〕1号文件，深入批林批孔的意见》，不符合中央精神，立即收回作废。四、从明天开始，常委都到群众中去，和大家一起学习，听取意见，接受批评，对群众贴的大字报、提的意见，诚心诚意欢迎。五、成立“批林批孔”办公室，由高厚良负责。

2月4日，空军党委常委召开了空军直属机关、部队干部会议。分析了前一段空军“批林批孔”运动的形势，检查了在领导前一段运动中的错误和教训，并提出了关于加强党委（支部）对“批林批孔”领导问题的意见。3月19日，空军党委常委召开空直机关干部大会，传达江青3月5日晚关于“放火烧荒”的讲话。8月13日，中央军委发出《对军区空军批林批孔运动领导问题的批复》指出：“九一三事件后，中央和军委决定军区空军、成指、昆指的批陈整风运动，由各军区领导，这是完全正确的。”“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发展，为了便于空军统一领

【2371】空军政治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大事记（1949—1989）》，1991年，页148—150。

导，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经党中央批准，军委同意空军党委的意见，今后军区空军的批林批孔运动由空军直接领导。”^{【2372】}

四、江青“指导”北京军区试点连队的“批林批孔”

江青在北京军区选择了两个连队作“批林批孔”的直接试点单位，一个是负责警卫京西宾馆的北京卫戍区警卫一师一团六连，另一个是陆军第三十八军一一三师三三八团的八连。关于六连，据《“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称：

1974年1月18日，江青派人到卫戍区某部6连进行所谓“批林批孔”试点，在1年零8个月的时间中，江青以个人名义多次向6连发“指示”，搞接见，先后10次给连队送材料、文件和书籍70多种，9069件(册)。“试点”一开始，江青就派人给6连送材料。这些材料，一部分是吹捧江青的信件和简报，相当多一部分是搞“三箭齐发”，批“走后门”的。在毛泽东严厉批评之后，1975年4月，6连仍收到江青送来的有关“走后门”的材料。1974年6月，江青提出要研究儒家军事斗争史，要6连马上拿出“经验”推广，6月到8月，江青连续给6连送去《三字经》、《女儿经》、《名贤集》、《弟子规》、《神童诗》等材料，要6连研究批判。1975年初，毛泽东提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江青却布置6连批判经验主义，江青在“试点”中借“点”打人，放火烧荒，把“试点”连队当作打《解放军报》，整军队的棍子。试点刚刚开始，江青派驻6连的联络员就组织几个战士按照他们给定的内容给《解放军报》写了一封“批评信”，由《人民日报》通过《情况汇编》送到江青等人手中。江青等人纷纷就此信“批示”，江青称，要把这封信“变成一把更加锋利的匕首”。姚文元说：“告军报加一个有自我批评的按语在《解放军报》发表。并要求“把文字改得更加锋利些”。王洪文也表示，“要揭开解放军报社的阶级斗争盖子”，江青组织另一个“试点”单位少数人专程到北京给《解放军报》贴大字报，随后(3月7日)，派人向6连传达说，“军报的斗争比较复杂”，“在关键时刻和中央唱对台戏”。要6连去《解放军报》社看大字报，连夜写出大字报，第二天一早贴到《解放军报》社的办公楼内。10日，江青又派人对6连说，“给你们一个任务，要经常看军报，就是要找它的毛病”，“军报内部路线不明，可能有坏人，以后继续看，如不行再攻他们”。3月11日，江青以中

【2372】《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大事记(1949-1989)》，页150-152。

共中央政治局名义，强令《解放军报》停止编发自己的稿件，使《解放军报》变相停刊 178 天。^{【2373】}

1974 年 1 月，江青又选定在北京郊区窦店执行生产任务的三十八军一一三师三三八团八连为“批林批孔”试点连，并直接派出工作组，记者指导试点。八连在“批林批孔”中所开展的一切活动，均由驻点工作组和记者直接安排。从 1974 年 1 月至 1975 年 9 月，历时一年零七个月，江青等人几次召见军、师领导和八连代表，作过八次“指示”，送过七十多种书刊、材料。^{【2374】}

1974 年 7 月 28 日，王洪文、江青请北京军区三位负责人和三十八军的四位领导到北京北海仿膳堂吃饭。^{【2375】}

第二天，王洪文、江青、陈锡联、纪登奎等到三十八军呆了一个晚上，召开河北省及驻保军、地主要领导及三三八团八连全连参加的接见会，王、江讲话、赠书，江青又作“顺口溜”夸三十八军称：

顺口溜两首——赠三十八军

(一)

三十八军，子弟兵，善战又能文，能文赛屈原，善战超孙臆。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毛主席、党中央、人民的英雄队。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千难万险，英勇无畏，什么苏修美帝反动派，一塌刮子扫进垃圾堆。

(二)

孔丘遇桓魋，树倒吓掉魂，天马欲行空，仓惶坠胡尘。孔孟之道，流毒甚广，美苏又因袭利用。为了扫除害人虫，必须批孔又批林。三十八军，子弟兵，批林批孔打头阵，工农大军登讲台，誓把孔孟刘林全荡尽。

此前，江青已作顺口溜一首称：“三十八军战斗队，能文能武啥都会；能文超过汉隋陆，善武灌周吓得退。”

五、江青“指导”海军的“批林批孔”^{【2376】}

1 月 23 日，江青派谢静宜、迟群到海直机关进行“批林批孔”试点，带去了江青给海军政委苏振华的亲笔信和《林彪与孔孟之道》及其附件各 200 份。当天

【2373】《“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页 174-175。

【2374】步兵第一一三师师史编审委员会：《火线铸军魂——步兵第一一三师师史》，1993 年，页 301。

【2375】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军史编审委员会：《钢铁的部队——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军史》，1993 年，页 631。

【2376】本小节资料来源：《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编年史（1949-1983）》，页 938、939。

（农历春节）上午九时，海军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海直机关和海军驻京单位的干部和部分战士共 1,900 人参加了大会，苏振华传达了中央 [1974]1 号文件，宣读了江青给他的信，谢静宜、迟群作了动员报告，萧劲光和苏振华讲了话。会后，海政布置海直机关干部在春节期间学习三个半天。24 日，海军党委将召开动员大会和常委学习讨论情况，向江青写了书面报告。25 日，将江青的信和海军给江青的报告，印发至师以上单位。

2 月 7 日，海军党委召开干部大会，海直机关二级部长以上和部分中青年干部共 700 人参加。苏振华代表党委对抓“批林批孔”运动不力和领导干部“走后门”、“开后门”等问题作了检查，并对下一步运动提出了要求，还确定机关半日工作，半日搞运动。

5 月 27 日 -6 月 2 日，海军党委为贯彻中央 [1974]17 号文件，召开了批林批孔汇报会。各舰队、基地、舰航、学校、海直各大部、三院、七院和海洋局的领导共 61 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提出要把以上单位机关的运动较快地搞好。

6 月 22 日，海军党委召开海直连队批林批孔大会。参加大会的有连队干部、战士 1,200 人，机关干部、战士、职工代表 700 人。海军党委常委及海直各大部领导以及各舰队、二十三基地的领导也参加了会议。会上传达了中央政治局于 6 月 14 日召开的连队批林批孔座谈会的精神；有 18 名基层干部、战士和 3 名海军党委常委作了批判发言；苏振华最后讲话强调，要把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9 月 2 日至 15 日，海军党委召开正面教育部队批林批孔经验交流会。会上有 14 个单位介绍了经验。海政主任刘居英作了总结发言。苏振华到会讲了话。

9 月 25 日，海军党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领导和机关干部分期分批下部队参加批林批孔。海直机关第一批 414 名于国庆节前后下到基层，舰队以下各级机关干部也于十月上、中旬下到基层。截至十月底，海军军以上机关（不含学校和东海舰队机关）共下基层 2113 名。十一月，海军领导机关又组织了第二批 293 名干部下部队。

12 月底，海军党委下达通知，要求部队贯彻中央 30 号文件精神，进一步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深入批判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并于 1975 年 1 月 9 日召开了宣讲中央 30 号文件，批判林彪“六个战术原则”动员大会。

六、江青利用西沙海战盗名窃誉

1974年1月19日-20日，中国军队在西沙群岛海域击沉南越海军护航炮舰1艘，击伤其驱逐舰3艘，恢复永乐群岛中的3个岛屿，获得了对整个西沙群岛及其周边海域的控制权。1月23日，中央军委、国务院向西沙海战参战部队发出嘉奖令。

五天后，在军内无任何职务的江青，以个人名义，给军委六人小组及广州军区负责人写贺信称：

洪文、剑英、春桥、小平、锡联、振华同志：请转世友、紫阳同志：

请代我向广州军区全体指战员、海南岛、西沙群岛全体军民同志们，致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敬礼！祝贺西沙群岛全军、民兵、渔民同志们与敌周旋，取得维护祖国主权的伟大胜利！

我身在北京，心逐南海，汹涌澎湃，虽不能与同志们一块持枪战斗，但在思想上、政治上，正在进行着一场大斗争，这场斗争是大是大非，是路线斗争，是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一场持久的斗争——批林批孔运动正向纵深发展，势若燎原。我们是心连心的，我们都要打倒帝修反，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各自在党分配的岗位上战斗着。

为了表示我对同志们的祝贺，特请作家浩然同志、诗人张永枚同志、记者蒋豪济同志代表我前去看望坚持在前线的英雄们！并送你们：《林彪与孔孟之道》五百份；《五四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言论辑录》五百份；《批林批孔文章汇编》（一）、（二）各五百份；《鲁迅批判孔孟之道的言论摘录》五百份。

学习的第一单元是：一，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二，《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三，《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以上三份文件请世友、紫阳同志为你们准备。中央的通知还会告诉你们其他读物。

致

无产阶级革命战斗的敬礼！

江青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凌晨五时^[2377]

【2377】迟泽厚：《一封没有照登的〈来函照登〉》。《记忆》第84期，2012年5月1日。

江青利用西沙海战盗名窃誉，把西沙海战的胜利与“批林批孔”运动生搬硬扯联系在一起。吹嘘自己“身在北京，心逐南海，汹涌澎湃”，“我们是心连心的”。不仅如此，江青还指派作家浩然、军队诗人张永枚、记者蒋豪济代表她“前去看望坚持在前线的英雄们”。临行前，江青特意交代他们回来后要写作品，并要他们给海南一个摄影工作者带去20卷彩色胶卷，要其多拍些照片，江青希望以此把自己塑造为西沙作战胜利的精神领袖。

3月15日，《光明日报》发表张永枚的“诗报告”《西沙之战》，后经《人民日报》转载以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配乐诗朗诵使此诗传遍于世。《西沙之战》不仅将西沙的胜利与正在进行的“批林批孔”紧紧联系在一起，称老船长阿沙“文化革命的暴风雨，使他像战刀又淬火，锋刃加了钢”，人民解放军战士决心“批林批孔当闯将”。而且，更以象征的手法，将西沙之战与毛泽东为江青所写《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联系在一起：“舰长的视线投向挂历，挂历上一幅壮丽的画卷：飞渡的乱云，从容的劲松，无限的风光，巍峨的庐山。……海风过时，仿佛听见，一个响亮的声音，又回响耳边：‘把入侵者从西沙赶出去！革命军人，共产党员，要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战斗打响后，舰长下决心“冲上去！以劲松的意志，劲松的勇敢！”以喻示江青对参战部队的影响，可谓用心良苦。

浩然散文诗体的中篇小说《西沙儿女》上部“正气篇”于1974年6月份出版，下部“奇志篇”于同年12月出版。小说再一次重复了江青拍摄的照片《庐山仙人洞》引导西沙军民取得胜利的神话。小说的女主人公阿宝将江青拍的照片挂在家里，“每一日都要看上几遍。……从那屹立于乱云中的青松的雄姿受到启发，汲取精神力量”，她教育群众，“我们要像青松那样生活和战斗”，准备迎击敌舰之前，“她抬起头，两眼立刻被悬在仓壁上的那幅‘庐山劲松’的照片吸引住了。……她的浑身立刻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1974年10月，《南海诸岛之一——西沙群岛摄影展览》在北京开幕。10月16日，有关方面就影展的有关问题给江青写报告。10月18日，江青在报告上批道：“拟同意发廿五张，第十三、第廿五两张摄影艺术甚佳，可是士兵头上戴着国民党、北洋军阀、沙俄苏修的大盖帽，有失我军的革命传统，似不宜登载，妥否？请洪文、春桥、文元同志批示。”王洪文随即附和：“同意江青同志意见。”10月20日，张春桥批道：“这两张抽掉以后，就没有海军舰艇了，可能使海军同志不高兴，是否还是登载为好。或者找两张没有大盖帽的海军照片，请江青同志酌定。”姚文元也批道：“同意江青、春桥同志意见。可否换一至二张没有大盖帽的？”江青最

后同意：“照春桥、文元同志的意见办。”结果，影展中涉及海军的照片，不仅数量少，而且人们见到的在舰艇上值勤和训练的海军官兵都是头戴钢盔的。^{【2378】}

七、江青等人在军内各大单位“放火烧荒”^{【2379】}

1974年2月8日，王洪文、张春桥在一次会议上称：总参领导“右倾手软，右得不能再右了”；对总政“可以夺权”，总后“垮得越彻底越好”。2月23日，江青在中央办公厅信访处《要信摘报》送阅件[74]第78号^{【2380】}上批示：“洪文同志：海军问题得研究一下，空军也冷下来了，捂盖子、反案，不解决不行了。”2月25日，江青对总参谋部二人2月25日给江青的信上批示：“洪文、春桥同志：……如果真像来信者所说那样，总参问题就太大了，要放火烧荒才好。”张春桥在信上批：“是要烧一烧。”

3月5日，江青、张春桥召集于会泳、陈亚丁^{【2381】}等人开会，江青称，“今天我斗胆，不敢得罪军队，今天把陈亚丁也请来了，就是要整一整军队。”“八一厂造孽了，军阀管你们。”“看来要夺权，陈亚丁你去把权夺过来嘛！我看军队的文化工作还是让陈亚丁管起来。”“放火烧荒，你们去三个人，去放火嘛。”3月17日，陈亚丁召集驻京部队文艺单位一些负责人开会，传达江青的讲话，布置在部队“放火”、“夺权”。他说：“江青同志要我回到总政就是要放火烧荒，今天叫你们来就是叫你们回去放火。”3月6日，王洪文在总参一个部汇报时说：总参的问题“盘根错节”，要“继续发动群众，把盖子揭开，搞总参领导的问题”。又说：“这次我们要下个决心，一定要揭开，揭不开就砸，砸不开就用炸弹炸。”3月13日，张春桥在听取总后勤部汇报时说：“总后已经瘫痪了，我看瘫痪得越彻底越好。”“不要怕派性。打内战也可以，有些问题要靠打内战才能解决。”3月15日，王洪文在总参作战部汇报时又说：“如果苏修、美帝真的打来，我怀疑作战部会有‘维持会’。真的打起仗来，总参会有维持会长、副会长，一套班子都齐全。”3月21日，王洪文对王秀珍说：“总部（总政、总参、总后）多次运动盖子没有揭开。如总参，人换了路线没有换，修正主义路线没有变。”

【2378】《“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页340。

【2379】本小节主要资料来源：《大动乱的年代》，页519-520。

【2380】这份摘报，是对海军报社一人给江青并毛泽东信的摘要。

【2381】于会泳，时任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陈亚丁，原总政文化部副部长。

八、毛泽东降温

1974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毛主席已圈阅”的通知称，“在运动中，广大群众揭发批判了许多同林彪反党集团有关的人和事，这是完全必要的。继续把这方面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领导上必须注意清查的范围应限制在同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问题，不要扩大化。在时间上，应当以毛主席一九七一年八、九月巡视各地打招呼为界；以听到传达中发[1971]57号文件为界。在这以前的事，包括犯了严重错误，只要向党讲清楚，同林彪反党集团划清了界限，就不要再算这些老账。”“确定陆、海、空军的军（省军区、警备区、科研单位、军事院校不含，野战军含）以下领导机关和部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一律坚持正面教育。这样做，有利于集中力量把军以上单位的运动较快地搞好。请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照此方案安排自己的工作和学习，并随时总结这方面的好坏经验报告中央军委。”^[2382]

7月17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毛泽东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同时当面对江青等人提出：“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2383]

毛泽东对江青等人话语不多但态度明确的批评及中央[1974]17号文件，无疑为“批林批孔”运动大大降低了温度，遏止了江青等人借“批林批孔”对军队的冲击（虽然这种冲击仅是浅表层的而未伤及内里）。

第一〇九节 大刀阔斧的军队整顿

一、邓小平主导军队整顿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几天后，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根据毛泽东提议，邓小平其后代替病重的周恩来，首次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掌控了实质性权力之后，邓小平随即开始了对军队的整顿。其对要害问题触角之敏锐，态度之坚决，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皆望尘莫及。

1月25日，邓小平在总参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称，“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军队的人数增加很多，军费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增大，

^[2382] 中发[1974]17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1974年5月18日发出。

^[2383] 《“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页176。

把很多钱花费在人员的穿衣吃饭上面。更主要的是，军队膨胀起来，不精干，打起仗来就不行。我想军队绝大多数同志是不满意这种现状的。所以毛泽东同志提出军队要整顿。军队的总人数要减少，编外干部太多要处理；优良传统要恢复。”^{【2384】}

2月8日，邓小平在听取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张才千、向仲华等汇报时指示：军队定额一定要减，节约下来的钱用在装备上，办法是先搞个编制出来，就好统一思想。步兵师可按大师、中师、小师编；铁道兵、工程兵可以多减一点；大军区、省军区的编制不能一律，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有所区别；炮兵、装甲兵不要改为总参的业务部，但机关人员要减，以后是否改到时再考虑；海、空军的体制现在不宜变，还是双重领导以海、空军为主；后勤机构重叠的要去掉；通信兵部是总参的一个业务部，装备部要划到总参来，军务动员部可以分开；搞编制时要考虑到干部多的情况，第一步有些副职在编制上可多配几个，第二步再压缩；驻厂军代表是否取消，可缓一步，整编任务从今年算起，三年完成。^{【2385】}

为搞好军队整顿，由三总部临时成立一个军队整编研究小组，向仲华副总参谋长任组长，彭绍辉、魏伯亭、张池明、封永顺任副组长，主要负责与军兵种共同研究有关改进体制编制、压缩军队定额、安置超编干部等问题，并向军委提出军队整编方案。整编研究小组抓住军队规模大、编组庞杂、重点不突出、装备不充实、不配套等问题，研究拟制了《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体制编制的初步方案》。^{【2386】}

《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体制编制的初步方案》，总结指出军队组织编制存在的五大问题：(1) 军队人数过多、现有总人数已达到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最高兵力，把大量的钱花在穿衣、吃饭上，加大了军费占国家预算的比重。(2) 军队编成重点不突出，机关、保障部队和非战斗人员多。全军机关、学校、科研机构、后勤单位和保障部队共有291万人，仅工程、铁道部队就有近100万人。海军人数中舰艇部队只占27%；空军人数中航空部队只占29%。有些修理、服务单位，本来可以实行企业化使用职工的，也用了现役军人，既不利于保持技术业务水平，又增加了军队的定额。(3) 有些体制设置不合理，机构重叠，层次多。后勤供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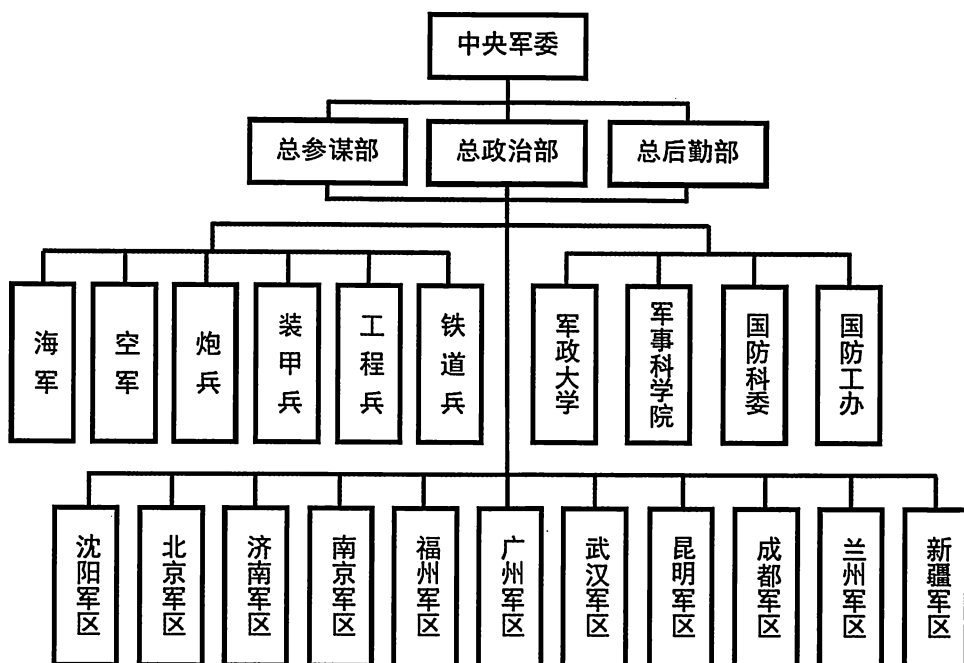
【238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军事科学院：《邓小平军事文集》第三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页6。

【2385】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总参谋部》卷编辑部：《总参谋部大事记（1927.8—1987.12）》送审稿，页725。

【2386】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中国人民解放军精简整编史（1949—2005）》，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8年，页287—288。

军事指挥系统（大军区以上单位）一览表

（1975年3月-1976年12月）



医疗机构，总后在4个战区（东北、华北、西北、西南）设有办事处、基地兵站、仓库、医院、汽车团、工程建筑团，军区编有后勤分部、兵站、仓库、医院，海、空军也各有一套供应医疗机构，互相重叠。海、空军有些地区部队不多，也设有较大的领导机构。(4) 海、空军和陆军特种兵部队，由于装备不充实，不配套，质量差，有不少不能用于作战。如空军作战飞机，因缺乏零备件和质量有问题而停飞的约占1/8；海军舰艇停航待修的约占1/2；坦克部队中还有1/3的苏式旧坦克和自行火炮；二炮多数导弹团长期没有装备。(5) 干部超编多。全军现有干部153万余人，超编46万人。军队定额压缩后，超编干部还要增加。由于干部超编多，不仅增加了服务人员，而且造成机关臃肿，人浮于事。^[2387]

2月底，修改后的初步方案上报军委审议。根据军委首长的指示，研究小组对方案进行了多次修改，形成了《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体制编制的方案》。6月

【2387】《中国人民解放军精简整编史（1949-2005）》，页288-289。

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军委上报的《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体制编制的方案》进行了讨论。^{【2388】}

二、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6月24日-7月15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主持。军委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高等军事院校的主要领导干部共70多人参加了会议。毛泽东批准了这次会议的议题和文件。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形成的文件，是1975年军队整顿最重要的标志和成果。

7月14日，邓小平在会议讲话中称，“这次会议我们搞编制，就是整肿字，但不只是整肿，同时还要注意散、骄、奢、惰，要联系起来解决。解决肿的问题，搞好军队的编制整顿、体制整顿，可以适当解决军队的其他问题。比如，这次整编，要配备、健全各级领导班子，就要同时注意克服散字、惰字，解决软班子、懒班子、散班子的问题。”^{【2389】}

会议之前，军委已形成《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会议结束后，经毛圈阅同意，中共中央通知：“现将经毛主席圈阅的中央军委《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的报告》、《叶剑英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邓小平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发给你们，地方传达到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军队传达到军一级党委常委。”^{【2390】}

军委报告在第一部分论及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问题时称，“这次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的原则，主要是精简机关、裁并重叠机构，安排超编干部，减少保障部队和普通兵员，淘汰陈旧装备，有些部队平时实行简编编制，保留技术骨干和技术装备，保持一定数量的齐装满员部队。有重点地加强特种兵部队。”

军委报告提出的具体意见是：

1. 陆军从386万人压缩到262万人，主要是减少步兵和工程、铁道部队。野战步兵从167万人压缩到122万人；守备部队从32万人压缩到26万人，主要是调整压缩沿海守备部队；边防部队现有6.7万人，拟增为7.5万人，适当加强中苏、中蒙边境的边防部队；地方部队从44万人压缩到28万人。拟在沿海和“三北”沿边各省，每省保留一个独立师，作为省军区的机动部队，执行警卫任务的地方部队，撤销师部，整编为独立团、营、连，归省军区、警备区、军分区建制

【2388】《中国人民解放军精简整编史（1949-2005）》，页289。

【2389】《邓小平军事文集》第三卷，页32。

【2390】中发〔1975〕18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1975年7月22日发至省、军级。

领导，警卫目标适当减少，有些可由民兵警卫，县、市中队是由原县、市公安队改编的，主要是逮捕、看押犯人，拟仍交归公安部门，改为人民警察；装甲兵现有13.3万人，拟编11万人；炮兵现有29万人，拟编20万人；第二炮兵现有11万人，拟保留8.3万人，主要是减少工程建筑部队，将没有装备的导弹团进行简编；工程兵现有39万人，拟压缩到15万人，主要是裁减工程建筑部队，适当加强野战工兵和舟桥部队。今后工程建筑部队主要担负特殊的重要工程任务，一般工程任务由其他部队担任；铁道兵现有40万人，拟压缩到14万人。今后主要担负边疆地区的铁路建设。

2. 海军现有3个舰队，7个基地，12个舰艇支队，9个航空兵师，37.7万人。拟撤销所辖部队不多的上海基地，淘汰除旧舰船，减少工程部队和其他勤务保障部队，充分发展舰艇和岸舰导弹部队，拟编38万人。

3. 空军现有8个军区空军和成都、昆明军区2个空军指挥所，13个军部，1个空降军，50个航空兵师，19个高炮师，65个地空导弹营，74万人。拟将2个军区空军指挥所缩编为军部，撤销机构重叠的4个空军军部和装备落后的6个高炮师，淘汰陈旧飞机，减少工程部队和其他勤务保障部队，空降军因缺乏装备拟实行简编。充分发展航空兵和地空导弹部队，拟编64万人。

4. 总部、各级军区（含人武部）机关和所属学校、医院、仓库、汽车部队等直属单位，以及国防科委、军事科学院、军政大学，现共有118万人，拟精简为78万人。主要是精简机关和勤务保障分队，裁并重叠机构。拟撤销后勤办事处、分部、兵站，部队的供应分别由军区和省军区后勤部负责；海、空军部队通用物资的供应和医疗，也由军区统一负责。国防科委二十基地机关拟撤销，其所属试验部和工区由国防科委直接领导。

军委报告又称，“为便于工作，三总部机关的体制作适当调整。将通信兵部改为总参通信部，总后装备部的装备计划部分，划归总参，恢复总参装备部，将总参军务动员部分编为军务部和动员部；总政宣传部分编为宣传部和文化部，群工部分编为群工部和联络部；总后撤销司令部，改设为办公室，恢复军械部，将供应部和企业部分别调整为财务部和军需部。军区、省军区机关部门体制也作相应调整。领导部队不多的军区兵种机关拟改为军区司令部的业务部。”“精简整编后，军队比较精干了，部队的反坦克和防空火器有所加强，机动能力有了提高。小打，现有部队就可以；中打，稍加充实也能对付；大打时，能保证部队迅速扩

编。今后如情况无大的变化，军队定额拟保持在×××万人^[2391]以内。有些特种兵部队的发展，所需员额在总定额内调整解决。”

三、军委批转总政《关于安排超编干部的方案》

军委报告第二部分为“关于妥善安排超编干部的问题”。此部分后由总政治部于7月27日细化为《关于安排超编干部的方案》。

8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转发了总政治部《关于安排超编干部的方案》。《方案》分析了人民解放军干部超编情况：根据1974年底的统计，人民解放军共有干部152.6万人，超编46.7万人，压缩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后，还要多出干部10余万人，预计超编数可达60余万。同时，各级领导班子普遍较大，大军区平均36人，最多的44人；省军区平均38人，最多的58人；陆军军、师、团亦达20至40人。而且，各级干部平均年龄较大，陆军师师长、政治委员平均49岁；步兵兵团团长，政治委员平均45岁，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除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对人民解放军组织建设的干扰破坏以外，还有：(1) 干部转业地方的工作，自1966年以后基本上停止，一大批不适合部队工作的干部没有退出现役；(2) 大量干部派出参加“三支两军”后，为了保持部队有适当数量的干部在位工作，又提拔了一批干部。《方案》提出了安排超编干部的意见，对各级各类干部的安排原则、方法以及工作和生活待遇等问题作出规定，在军内采用以下方法安排大部分师以上干部和部分团以下干部：(1) 增编副职。团以上各级领导班子，在新的编制中，多编几名副职，大军区3至5名，军、师、团2至3名；(2) 设顾问。总部、军（兵）种、各级军区、海军舰队、军区空军、院校等单位，可以根据情况设顾问若干名。顾问在同级党委领导下，对部队建设各项问题，调查研究，提出建议，并完成党委委托的任务，各级顾问配同级和高一级干部担任；(3) 做研究工作，各军区、军（兵）种和院校可以组建军事科学研究机构。抽调有一定政治思想水平，并有作战和部队工作经验，身体能坚持工作的现职师以上干部，从事军事学术、政治工作和后勤业务等研究；(4) 送学校培养。把一些年龄不大，身体较好，有作战和实际工作经验的营职以上干部，有计划地送各大单位所属军政干校、“五七”干校等学校培养、储备；(5) 离职休养。安排年大体弱基本丧失工作能力的1953年12月31日以前入伍的师职和相当师职以上干部，1942年12月31日以前入伍的团职和相当团职干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入伍的干部，暂留军队离职休养，以后再办理退出现役手续。离休干部的安置原则是大分散、小集中，安置地点一般

【2391】报告原文如此。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精简整编史》，此处应为450万人。

在中小城市。其余干部退出现役由地方安排，方法有：(1)转业。退出现役的军队干部，一般办理转业手续，由地方各部门、各地区根据工作需要和干部的具体条件，并参照他们原来在军队中担任的职务，分配适当工作，享受地方同等级别工资待遇；(2)复员。退出现役后需要复员以及本人自愿复员的连、排职干部和个别营、团职干部，经组织批准，办理复员。干部复员，一般回本人原籍省、市、自治区；(3)退休。年满55周岁以上的，或因公致残、积劳成疾，基本丧失工作能力的干部，按照国务院关于军队干部退休处理的规定办理退休。退休后，一般到干部或爱人原籍省、市、自治区安置。^[2392]

四、军委批转总参《压缩军队定额，调整体制编制方案》^[2393]

9月7日，中央军委批转了总参谋部《压缩军队定额，调整体制编制方案》，规定全军在3年内将编制定额由610万人压缩到450万人，减少160万人。其中：

陆军：步兵部队精简27.3%；工程兵、铁道兵精简最多；两者精简数占陆军兵种部队精简总人数的92.1%；有些部队实行简编，保留技术骨干，减少普通兵员。将县、市中队移交地方公安部门，改为人民警察。

海军：精简17%，调整基地、舰艇、高炮和航空兵部队的体制编制；将部分工程建筑部队改为基建工程兵性质的部队，不计军队定额。

空军：精简16.4%，主要精简机关；调整军区空军和航空兵部队体制编制；空降兵部队实行简编，撤销一部分高射炮兵部队；工程建筑部队改为基建工程兵性质的部队，不计军队定额。

总部和各军区（含人武部）机关、直属单位、院校等从113万人压缩到76.6万人。裁并重叠机构，撤销、合并保障单位，将部分修理、服务性单位改为编外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

9月28日，总参谋部下发《关于沈阳、北京、兰州、新疆、武汉、济南、南京、福州、广州、昆明、成都军区和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第二炮兵、海军、空军、国防科委机关、部队精简整编方案的通知》，各部队陆续开始精简整编。

北京军区。1976年1至5月，对军区机关及所属部队进行了精简整编。撤销了防坦克炮兵第34师师部和第411团；撤销了坦克第9师，以该师师部为基础组

^[2392] 本小节资料来源：《“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页152-153。

^[2393] 本小节资料来源：《中国人民解放军精简整编史（1949-2005）》，页292-293、298-299、310-311。

建坦克乘员训练基地；新编3个守备师；天津警备区独立师改为天津警备师；撤销了山西省军区独立师。

济南军区。1976年1月，撤销内长山要塞工区和陆军第26、第46军、青岛警备区施工办公室，其任务交军区司令部工兵处。军区命令，撤销北长山守备区机关，所辖守备第29、第30、第31团，改归要塞区直接领导。10月，济南军区命令，撤销守备第2师师部和守备第4团团部，守备第5团归守备第1师建制，守备第6团改为1个工程建筑团归海军建制。将山东省军区独立第1师改为山东省军区独立师，辖3个步兵团，1个炮兵团。撤销山东省军区独立第2师番号，将其机关与济南警备区合并，整编为济南警备区。

南京军区。1976年5月，撤销陆军第73、第74师；撤销舟嵎要塞区的定海守备区，所属各团直属要塞区建制领导；大衢守备区缩编为守备第14团，归岱山守备区建制领导；江苏、浙江、安徽省军区的独立第1师改称各省军区独立师；撤销江苏、浙江、安徽省军区的独立第2师师部，所属各团整编为省军区独立团。

广州军区。1976年1月，撤销陆军第146师；将榆林要塞区、广州警备区改编为师级；撤销广西军区独立师师部，所属3个团合编为2个团，独立第2师改称独立师。

武汉军区。1976年3月，陆军第49师调归兰州军区第19军建制，改为陆军第56师。

成都军区。1975年10月，撤销四川省独立第1、第2师。

整编后，全军陆军军、师共编119万人，比原来人数减少4.76万人。全军仍保持35个陆军军部，119个师（甲种师50个，乙种师69个）。经过这次整编，步兵师与1962年比较，自动火器增加了46%，反坦克火器增加3.2倍，汽车增加近1倍，骡马减少40.3%，陆军军、师的合成化水平有了一定提高。

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确定的精简整编任务，在1976年的政治氛围下没有完全完成便停了下来。即使如此，成绩还是有目共睹的。根据1976年12月9日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向中央军委《关于全军精简整编情况的报告》，这次精简整编：

到目前为止，陆军军师和大军区机关，除个别单位外，已按新编制进行了整编。其余单位大部分按新编制方案调整了体制，安排处理了部分超编人员。全军已由原来的610.8万人，减到529.9万，减少80.9万人。其中第一批转业干部9.9万人（占计划10.9万人的90%）；成建制移交地方的地铁、工程建筑部队和县市中队共16.4万人。按计划保留的119个陆军师，已分别编为50个满员师、69个简编师；26个军部已各调给一个坦克团；应撤销的4

个空军军部、6个城防高炮师、4个防坦克炮师师部、5个守备区机构和总后4个办事处已经撤销；应撤销的6个步兵生产师已撤销了2个；规定撤销的16个担负警卫看押任务的地方独立师师部，已撤销了11个；2个坦克师师部已改为坦克乘员训练基地。

……

精简整编中，各单位在安排超编干部的同时，遵照毛主席关于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调整了部分单位的领导班子，配备了部分青年干部。并按新编制调整了兵员，补充了装备。对各种物资和经费也进行了清理，严格贯彻执行了政策和纪律。

……

全军现有529.9万人，按原定保留450万人，还要精减近80万人。

五、班子调整配备是整顿的重中之重

邓小平、叶剑英把军队领导班子的调整配备作为整顿调整体制编制的重中之重。尤其是对高层领导班子的调整配备特别重视。早在军委扩大会议召开之前，军委就对有关大军区、军兵种领导班子的主要成员进行了调整。1975年1月2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军委通知中共总参谋部委员会，邓小平为总参党委第一书记，杨成武为第二书记，张才干、向仲华仍为副书记，彭绍辉、李达、王尚荣、胡炜、何正文为总参党委常委。同日，军委任命胡炜兼军委办公厅主任。1月27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办公厅将副总参谋长的名次排列通知如下：副总参谋长按杨成武、张才干、向仲华、彭绍辉、李达、王尚荣、胡炜、何正文排列名次。4月11日，军委任命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为副总参谋长兼总参情报部部长。^{【2394】}

军委扩大会议后，叶剑英、邓小平抓紧时机，迅速对军队各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组织调整。为了调整配备好军队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确定由叶剑英、聂荣臻、粟裕、陈锡联、杨成武、梁必业6人组成领导小组，专门负责整顿领导班子。8月30日，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审核批准后，中央军委宣布了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调整配备任命。^{【2395】}

调整后各大单位领导班子的配备如下：

总政治部，主任张春桥，副主任梁必业、徐立清、傅钟、黄玉昆、田维新。

【2394】《总参谋部大事记》（送审稿），页724、730。

【2395】《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六卷，页245。

总后勤部，部长张宗逊，副部长张震、贺诚、张令彬、张元培、李元、封永顺、张汝光、孙洪珍，副政治委员曹思明、李真、白相国（兼政治部主任）。

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政治委员曾绍山、毛远新，副司令员江拥辉、萧全夫、邓岳、刘震、孙玉国、刘德才（兼旅大警备区司令员），副政治委员邹衍、张午、甘渭汉（兼旅大警备区政治委员）、李伯秋、王淮湘、刘光涛，参谋长杨迪，政治部主任裴光，后勤部部长翟仲禹。

济南军区，司令员曾思玉，第一政治委员白如冰（兼），政治委员萧望东，副司令员范朝利、熊作芳、刘贤权、吴效闵、张峰，副政治委员任思忠、方正、左齐，参谋长王金泉，政治部主任阴法唐，后勤部部长周水朵。

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第一政治委员张春桥（兼），第二政治委员彭冲（兼），政治委员廖汉生，副司令员李水清、聂凤智、詹大南、段焕竞、张希钦、周纯麟，副政治委员刘西元、王展，参谋长邓家泰，政治部主任孙克骥，后勤部部长严光。

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政治委员李志民、廖志高（兼）、江渭清（兼），副司令员朱绍清、龙飞虎、朱耀华、张显扬、石一宸，副政治委员廖海光、宋维棻、王直，参谋长何家产，政治部主任曹普南，后勤部部长周桂生。

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第一政治委员韦国清（兼），政治委员赵紫阳（兼）、张平化（兼）、孔石泉，副司令员江燮元、黄荣海、欧致富、叶建民、吴纯仁，副政治委员姜林东、杨树根、单印章，参谋长孙干卿，政治部主任于厚德，后勤部部长靳兆西。

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王平、刘建勋（兼）、赵辛初（兼），副司令员李化民、孔庆德、林维先、周世忠、吴瑞山、张树芝（兼河南省军区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吴烈、张玉华、陈代富、王猛，参谋长郑志士，政治部主任谢镗忠，后勤部部长张书坤。

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政治委员周兴（兼）、刘志坚，副司令员查玉升、刘春山、徐其孝、张铨秀、罗坤山、鲁瑞林、张荣森，副政治委员王砚泉、李克忠、陈发洪，参谋长朱英，政治部主任史景班，后勤部部长王文成。

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第一政治委员刘兴元，第二政治委员李大章（兼），政治委员严政，副司令员韦杰、王诚汉、萧永银、王东保、梁中玉、陈明义（兼参谋长）、胡继成、谢正荣、茹夫一，副政治委员魏伯亭、段思英、罗应怀、任荣，政治部主任王焕如，后勤部部长杨以山。

兰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政治委员冼恒汉、李瑞山（兼），副司令员李书茂、刘静海、吴华夺、杜绍三、黎原、徐国珍、康健民，副政治委员高维嵩、孔俊彪、卜占亚，参谋长马友里，政治部主任孙殿甲，后勤部部长余致泉。

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第一政治委员赛福鼎·艾则孜（兼），第二政治委员郭林祥，政治委员司马义·艾买提（兼），副司令员郑三生、谭友林、张竭诚、赖光勋、李长林、艾则佐夫·哈斯木、幸元林，副政治委员颜金生、曹达诺夫·扎伊尔、何林兆，参谋长马森，政治部主任魏佑铸，后勤部部长杜海林。

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第一政治委员苏振华，第二政治委员王宏坤，副司令员刘道生、周仁杰、周希汉、马忠全、梅嘉生、王万林、孔照年、高振家，副政治委员杜义德、卢仁灿、王昕（兼政治部主任），参谋长杨国宇，后勤部部长王晓。

空军，司令员马宁，政治委员傅传作，第二政治委员余立金（兼民航总局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张廷发、成钧、邹炎、张积慧、曹里怀，副政治委员高厚良（兼政治部主任）、黄立清、杜玉福，参谋长王定烈，后勤部部长刘忍。

炮兵，司令员张达志，政治委员张池明，副司令员宋承志、高存信、孔从洲、苏进、吴信泉，副政治委员欧阳毅、钟辉、谢良。

第二炮兵，司令员向守志，政治委员陈鹤桥，副司令员廖成美、符先辉、严家安、李懋之，副政治委员刘友光、于敬山、王宗槐。

装甲兵，司令员黄新廷，政治委员莫文骅，副司令员贺晋年、程世才、宋庆生、林彬、赵杰，副政治委员姚国民、杨昆山、于丁。

工程兵，司令员谭善和，政治委员王六生，副司令员武宏、崔萍、徐国贤、唐凯、廖述云，副政治委员刘月生、严庆堤。

铁道兵，司令员吴克华，政治委员吕正操，副司令员兰庭辉、郭维城、何辉燕、别祖后、亓谦斋，副政治委员瞿修林、郭延林、李际祥。

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张爱萍，政治委员陶鲁笏，副主任陈彬、钟赤兵、钱学森、朱光亚、李光军（兼参谋长）、张震寰、马捷、胥光义（兼后勤部长），副政治委员萧向荣、栗在山。

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第一政治委员粟裕，第二政治委员萧华，副院长张翼翔、高锐、郭化若、贺光华、高体乾，副政治委员韩双亨（兼政治部主任）。

军政大学，校长萧克，政治委员唐亮，副校长段苏权、陶汉章（兼教育长）、李夫克、阳震、陈中民、孙泊，副政治委员谢明、聂济峰、何德庆、林谦。

同时，中央军委通知，经毛泽东、中共中央批准，罗瑞卿、谭政、陈士榘、陈再道、王建安为中央军委顾问。

10月1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公布了北京军区领导班子：司令员陈锡联，第一政治委员纪登奎，第二政治委员秦基伟，副司令员傅崇碧、马卫华、康林、刘海清、肖选进、尤太忠，副政治委员黄振棠、吴岱（兼政治部主任）、万海峰、迟浩田、吴涛，参谋长徐信。另外，陈先瑞调任成都军区政治委员，滕海清调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徐光友调任工程兵副政治委员。

同日，中央军委通知，刘兴元任成都军区司令员，赵紫阳兼任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同日，中央军委发出命令，经毛泽东批准，任命张廷发为空军政委、空军党委第一书记；曹里怀为空军党委第三书记；吴富善、何廷一为空军副司令员；旷伏兆为空军副政委。免去傅传作空军政委、杜玉福空军副政委职务。

12月29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公布了北京卫戍区领导班子：司令员吴忠，第一政治委员吴德，政治委员杨俊生、黄作珍（主要在北京市委工作）、刘绍文（主要在北京市委工作）。

根据中发〔1975〕18号文件精神，1975年8月-12月安排超编干部等共100人担任各大单位顾问。

第一批大单位领导班子调整配备任务完成后，中央军委从9月份开始进行军级领导班子的调整配备工作。主要是选配好作战部队的军和省军区的军政一把手，以及三总部机关的二级部、局的领导干部。这项工作，到1975年年底之前基本完成。

六、一批高级领导干部被重新起用

自1970年12月尤其是“九一三事件”之后，一批在文革初期受冲击、被打倒的大单位高级领导干部，被重新起用恢复工作。至1975年8月，全军大单位主要领导岗位基本回复至1965年文革前夕的状态。这一批人的基本情况大致如下。

张震，原南京军事学院院长，1970年12月复出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1975年6月任总后副部长。

张宗逊，原副总参谋长，1971年2月复出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1973年6月任总后勤部部长。

杨勇，原北京军区司令员，1972年5月复出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1973年6月任新疆军区司令员。

萧克，原农垦部副部长，1971年5月复出重返军队任军政大学校长。

陈再道，原武汉军区司令员，1972年5月复出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1975年8月任军委顾问，1977年9月任铁道兵司令员。

钟汉华，原武汉军区第二政委，1972年5月复出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1975年8月免职待分配，1977年12月任装甲兵政委。

李志民，原高等军事学院政委，1972年10月复出任福州军区政委。

甘渭汉，原成都军区第四政委，1972年10月复出任沈阳军区副政委。

苏振华，原海军政委，1973年1月复出任海军第一政委。

成钧，原空军副司令员，1973年5月复出任原职。

张廷发，原空军副司令员，1973年5月复出任原职。

秦基伟，原昆明军区司令员，1973年7月复出任成都军区司令员。

郭林祥，原成都军区第三政委，1973年6月复出任成都军区政委。

杜义德，原海军副政委，1973年7月复出任原职。

徐立清，原总政副主任，1973年11月复出任济南军区政委。

崔田民，原铁道兵第二政委，1973年11月复出任原职。

廖汉生，原北京军区第二政委，1973年12月复出任军事科学院政委。

谭善和，原工程兵副司令员，1973年12月复出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

杨成武，原代总参谋长，1974年11月复出任副总参谋长。

王尚荣，原总参作战部部长，1974年11月复出任副总参谋长。

余立金，原空军政委，1974年12月复出任民航总局第一政委，1975年8月任空军第二政委。

梁必业，原总政副主任，1974年12月复出任原职。

刘志坚，原总政副主任，1975年3月复出任军事科学院第二政委，1975年5月任昆明军区政委。

张爱萍，原副总参谋长，1975年3月复出任国防科委主任。

萧向荣，原军委办公厅主任，1975年3月复出任国防科委副政委。

王平，原南京军事学院政委，1975年4月复出任炮兵政委，1975年8月任武汉军区政委。

向守志，原第二炮兵司令员（未到职），1975年4月复出任原职。

吴克华，原炮兵司令员，1975年4月复出任铁道兵司令员。

傅崇碧，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1975年4月复出任原职。

罗舜初，原国防科委副主任，1975年4月复出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

贺诚，原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1975年5月复出任总后副部长。

苏进，原炮兵副司令员，1975年5月复出任原职。

欧阳毅，原炮兵副政委，1975年5月复出任原职。

陈鹤桥，原通信兵部政委，1975年5月复出任第二炮兵政委。

黄新廷，原成都军区司令员，1975年5月复出任装甲兵司令员。

谭友林，原工程兵副司令员，1975年6月复出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

莫文骅，原政治学院院长，1975年7月复出任装甲兵政委。

罗瑞卿，原总参谋长，1975年8月复出任军委顾问，1977年8月任军委常委、秘书长。

谭政，原总政副主任、福建省副省长，1975年8月复出重返军队任军委顾问。

傅钟，原总政副主任，1975年8月复出任原职。

萧望东，原国务院文化部代部长，1975年8月复出重返军队任济南军区政委。

刘震，原空军副司令员，1975年8月复出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

高存信，原炮兵学院院长，1975年8月复出任炮兵副司令员。

吕正操，原铁道兵政委，1975年8月复出任原职。

萧华，原总政主任，1975年8月复出任军事科学院第二政委。

七、一批在文革期间提拔的领导干部被降职

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前后，一批在文革期间被提拔到大单位重要职务的领导干部被降职使用。有关情况如下。

魏伯亭，原总政干部部部长，1974年1月被提为总政副主任，1975年8月降任成都军区副政委。

詹海英，原总后运输部油料供应处副处长，1973年8月被破格提为总后副部长，1975年8月降任昆明军区后勤部副部长。

栾学文，原职务不详，1973年8月破格提为总后副部长，1975年8月免职后调离总后机关，去向不明。

蓝文兆，原总参军务动员部部长，1970年12月被提为炮兵政委，1975年4月降任兰州军区副政委，1975年8月改任兰州军区顾问。

张冀翔，原总参军训部副部长，1968年6月被提为铁道兵司令员，1969年5月任第二炮兵司令员，1975年4月降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吴烈，原公安部队副司令员，1967年10月提为第二炮兵第二政委，1975年4月调任武汉军区政委，1975年8月降任武汉军区副政委。

陈发洪，原广州军区副政委，1970年3月提为第二炮兵第二政委，1975年4月降任昆明军区副政委。

陈宏，原济南军区副司令员，1969年6月提为装甲兵司令员，1971年11月降任成都军区第一副司令员，1975年5月降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同年8月免职待分配，1977年12月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

姚国民，原装甲兵副政委，1971年5月被提为装甲兵政委，1975年9月降任装甲兵副政委。

刘贤权，原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青海省军区司令员，1968年9月被提为铁道兵政委，1969年4月任军委办事组成员，1969年5月任铁道兵司令员，1971年10月任军委办公会议成员，1975年4月降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

宋维棣，原政治学院副院长、革委会主任，1969年5月被提为铁道兵政委，1975年4月降任福州军区副政委。

谢家祥，原成都军区副政委，1970年12月被提为成都军区第三政委，1971年11月改任政委，1975年8月免职待分配，1977年12月任福州军区顾问（副大军区职待遇）。

任思忠，原广州军区副政委，1971年1月被提为政委，1975年3月调任济南军区政委，同年8月降任副政委。

杨光隆，原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主任，1971年7月被提为军政大学副校长，1975年8月降任河南省军区副政委。

国光，原总政组织部处长，1970年7月调任军政大学校务部政委，1971年7月被提为军政大学副校长，1975年8月降任内蒙古军区副政委。

董超，原南京军事学院政治部主任，1970年1月被提为军政大学副政委，1975年8月后降任安徽省军区顾问。

李锡文，原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1971年7月被提为军政大学副政委，1975年8月降任黑龙江省军区副政委。

部分在文革期间越级破格提拔的大单位领导干部，即：孙洪珍（总后副部长）、毛远新（沈阳军区政委）、孙玉国（沈阳军区副司令员）、迟浩田（北京军区副政委）、陈代富（武汉军区副政委）、王万林（海军副司令员）、孔照年（海军副司令员）、高振家（海军副司令员）、王昕（海军副政委）、马宁（空军司令员）、邹炎（空军副司令员）、张积慧（空军副司令员），在1975年班子调整配备时仍保留原职，未有变动。

1975年整顿调整后的大单位领导班子，平均每单位10.6人，最多18人（均不计各军区、军兵种司、政、后机关专职首长和兼军队职务的地方领导）。各大单位党委常委原来大多在15人左右，调整后分别为9人左右。老弱病残，不能工作的，基本安排离休。大单位领导班子成员的平均年龄，由61岁下降到59岁，军级单位主要负责人的年龄也下降了几岁。^{【2396】}更为重要的是，整顿调整后的大单位领导班子名单中，重点岗位几乎全部掌握在久经考验的老干部手里，真正属于“四人帮”集团成员仅有张春桥、毛远新两人。这就使文革极左势力插手与操纵军队的可能性大为降低，对于全军以至全国局势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为日后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关键性的基础。

第一一〇节 军队在粉碎“四人帮”中的决定性作用

一、毛泽东逝世前的政治局势

1975年七八月间，邓小平与江青等“四人帮”之间的斗争进入白热化。9月，病情加重的毛泽东将毛远新从辽宁调至北京，担任他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在此期间，毛远新每隔十天就要去江青那里一次，按她的要求将其意见转告毛泽东。毛远新对毛泽东称，北京“有一股风，要否定文化大革命，是翻案”。毛远新又利用在沈阳军区与陈锡联熟悉的关系，单独找陈谈话，“一是摸他的底，一是争取他”。毛远新后来承认：“我的作用是揭盖子，‘一股风’是我提出的，局面是我打开的。当时毛主席批‘四人帮’，他们（指江青等人）处的地位不利。从对陈锡联一个人谈，到逐步扩大会议，是我把局面打开的。我的这个作用他们谁也起不了。”^{【2397】}

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后一年。也是决定中国命运最关键的一年。

1月8日，深孚众望的周恩来病逝。与人们的期待相反，毛泽东没有出席周的追悼大会。

周恩来逝世后，由谁出任国务院总理，为国内外所瞩目。此时邓小平已被再次打倒，文革派以为非张春桥莫属，上海街头已贴出拥护张任总理的标语。据后来毛远新称，毛泽东问他，张春桥怎么样？他说不行。毛问为什么，他答此人“阴。”毛又问谁合适，他提出华国锋。毛同意说，那就是华。^{【2398】}

【2396】《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六卷，页249。

【2397】毛远新的交代，1980年6月。

【2398】毛远新的交代，1980年6月。

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1976年1号文件至县团级称：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此后，邓小平不再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叶剑英不再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惟虽如此，“四人帮”亦没有在党和国家、军队中取得主导性的领导地位。

2月16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关于检查1975年7月军委扩大会议文件的报告。报告称：军委常委于2月6日开会，对去年7月军委扩大会议的文件作了检查。一、一致认为，这次军委扩大会议，遵照毛主席、党中央批准的议程，讨论通过的《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是正确的，应当继续贯彻执行。二、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两个讲话是有错误的。建议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三、当前，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正在深入发展，全军要积极参加这场伟大的斗争。这个报告当天以中共中央1976年3号文件发至省军级。3月3日，中共中央通知扩大传达范围，由各级党委逐级传达到县团级干部。

此前，经毛泽东批准，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随后，毛泽东在3月初中共中央印发的《毛主席重要指示》中又点了邓小平的名，邓被扣上“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罪名。

3月，江青对毛远新称，为了加强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领导，建议“我和（姚）文元任中央常委，陈锡联任军委副主席”。她要毛远新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说：不急。^{【2399】}

4月5日清明节前后，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了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并演变为声讨江青等文革派的事件。4月7日上午，毛泽东听取毛远新关于中央政治局处理由悼念周恩来而引发的天安门事件的情况汇报。毛泽东称：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上待三中全会审议批准。毛远新问：由中央作决议，公开发表？毛泽东称：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毛泽东要毛远新先约几个人谈一下由华国锋任总理的问题，要他快去。当天中午，毛泽东听毛远新汇报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意见，在谈到华国锋任总理的决议时，毛泽东又提议华国锋任党的第一副主席。

同日下午五时半，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任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稿，批示：“照发。”决议称：“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中共

【2399】毛远新的交代，1980年6月。

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同时，审阅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稿，批示：“照发。”决议称：“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当天分别以中共中央1976年9号、10号文件发出。

5月27日，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和夫人来访，成为毛泽东会见的最后一批外宾。这次会见只进行了十分钟，可能是毛会见外宾最短的一次。6月，中共中央宣布毛不再会见外国来访人士。

进入七、八月，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更趋恶化，已常处于昏迷状态。9月初，毛泽东再度病危，中央政治局成员们轮流在毛的住地值班。9月9日0时10分，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毛泽东逝世后，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以上尚在任的，余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四人，务实派与极左派表面上形成了2:2的局面，惟由于华国锋处于实际上的党政军第一号实权人物位置，加之叶剑英在军内外深厚的影响力，形势明显有利于务实派。据毛远新后来交代：1976年9月10日，在原毛泽东住所202房间，江青问我：“张玉凤说毛主席最后交代，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和我五个人要团结，有没有这回事？”我说有这回事，第一次是我们五个人汇报后说的，第二次是毛主席对张玉凤和我说的。^{【2400】}

可见，老谋深算的毛泽东在临终前已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点到的“五个人”中间，华国锋、汪东兴与其他三人显然不是一伙的，毛实际上是要“四人帮”与华、汪搞好团结。毛特意提到汪东兴，是极具深意的。因为，汪东兴掌控着中央警卫部队，他投向哪边，哪边就获胜。惟江青“志大才疏”（毛泽东对江的评价），看不到这一点，后来正是栽到了汪的手上。

实际上，当时“四人帮”中也有人预感要出事。姚文元于1980年7月17日在秦城监狱写了《我的政治生命的最后一页》，交代他在毛泽东逝世前后的思想及活动情况。其中写道：“1976年7月，我收到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解力夫转交的一封信，要求转给毛主席。信中反映的是纪登奎的儿子探望在北京住院的河南省委组织部某负责人的谈话，其内容：……四是政治上现在是老、新派之争，老派现在不开口，因为毛主席还活着，只要一死他们是要干的。他们准备立即宣

【2400】毛远新的交代，1980年6月。

布张春桥为叛徒，要实行全国军管，血雨腥风。还说新老派上台都要流血，但比较起来，老派比新派上台好些。……我看了这封信百感交集，我的确感到毛主席逝世后又垮台的可能。我想此信不能转给毛主席，因为毛主席已病重。不愿意转给毛远新，也没有转给华主席，因信上直接讲到他的事。王、张、江我也不想送，所以这封信一直压了下来，像一块石头一直压在我的心里。”

二、华国锋与叶剑英、汪东兴秘密谋划

华国锋对江青趾高气扬、颐指气使的骄狂早已深恶痛绝，且深怀戒惧，毛泽东甫一逝世，他即采取主动，与军队元老叶剑英和执掌中央警卫部队的汪东兴秘密谋划，达成共识，决定铲除“四人帮”。华国锋以中共一号人物的身份作决策，保证了对“四人帮”采取行动符合组织原则及合法性。叶剑英以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身份参与决策，保证了军方对华国锋的坚定支持。汪东兴以军委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处处长的身份组织实施，保证了中央警卫部队对“四人帮”采取拘捕行动的有效性。这个“铁三角”缺一不可。

据时任李先念秘书的程振声在新世纪之初著文回忆称，李先念在华国锋与叶剑英之间直到联系人的作用：

9月11日，华国锋和张春桥、王洪文、汪东兴一起在中南海值班。华国锋处理完一些事情后，说身体不好，以要去北京医院检查身体为由，出来转到西黄城根9号李先念临时住处，事先也未打电话通知。李先念对华国锋这个时候到来感到有点突然，把他让到办公室，关好门交谈。两人坐下后，华国锋说：“我在守灵，是借出来检查身体到你这里，只能坐几分钟。”接着谈了“四人帮”在政治局会议上发难的简要情况，他说：“‘四人帮’在紫光阁架了电话和各省联系，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到解决的时候了。”李先念问：“你下决心了吗？”华国锋说：“下了，现在不能再等待了。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请你考虑。如果你同意，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他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还说：“他们（指‘四人帮’）很注意我，我不能到叶帅那里，现在中南海有事，请你到叶帅那里去一次。”^[2401]李先念以惊喜的心情表示，完全支持和赞成华国锋的看法和意见，说一定尽快去见叶剑英。两人谈话不到10分钟。华国锋看了一下手表说：“我该回去了。”所以李先念在1977年1月的一次会议上说：“去

【2401】程文原注：李先念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80年11月29日。

年十月，粉碎‘四人帮’，这是经华国锋同志提议并征得中央多数同志同意后实施的。”^{【2402】}

……

华、李谈话后隔了两天，即9月14日，李先念对工作人员说，心情不好，要去香山植物园散心。车子快到植物园时，他突然对司机和警卫说，去西山叶帅处，到了门口才叫警卫人员打电话，说他要见叶帅。叶帅听说李先念来了，就叫秘书和警卫到门口去接。这个时候李先念来，叶帅感到非常突然，因为他们曾有“约法三章”。李先念进院后，叶帅正在楼前门口等他。叶帅问他，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呀？他说，我们多年老同志了，来看看你。随后，叶帅将李先念让到屋里。两人落座后，叶问李：“你来是公事奉命，还是老交情看望？”李答：“看看你，老同志嘛，说奉命也行。”这时叶剑英打开收音机，以防有人窃听。李先念问叶，“你这里还不安全呀？”叶帅说：“很难说。”李先念说，我是奉命来的，接着转达华国锋的意见。叶帅有点耳背，又加上收音机哇啦哇啦干扰，李先念说话，他听不清楚。两人商议用笔写，然后烧掉。当李先念写了“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时，叶剑英写下了“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李先念写了“请你考虑时机和方式”，叶点头表示同意。随后叶帅写了陈锡联等人的名字，打了一个问号。李先念写：“完全可靠，请放心。”并简要介绍了陈锡联两次同他谈话的情况。^{【2403】}两个人连写带谈不到30分钟。^{【2404】}

程振声称，“李先念从叶剑英处回来，当天就把同叶帅谈话的情况和叶帅的态度报告了华国锋。”

华国锋说：“我请先念同志找叶帅后，我们三人的想法完全一致了。9月16日，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参加的有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和陈永贵。我讲了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话刚落，有的同志就说，对‘四人帮’也应该区别对待，其他人没有发言。显然不能再深谈下去了。这使我感到范围大了不行，只能个别串连。”^{【2405】}

……

【2402】程文原注：《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11页。

【2403】程文原注：李先念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80年11月29日；李先念谈话记录，1981年5月6日。

【2404】程振声：《李先念与粉碎“四人帮”》。《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1期。

【2405】程文原注：蒋冠庄、程振声访问华国锋谈话记录，2000年5月30日。有的同志，指纪登奎。

据华国锋回忆说，9月21日，叶剑英到他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的方式。两人商定采取隔离审查措施后，征求李先念等人的意见。“9月26日，我和先念、吴德等人在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电影放映时，我上厕所，先念同志也跟出来了。他问我有什么事情吗？我说，看完电影，你和吴德留下，有事商量。电影放映结束后我们三人就到小礼堂旁边的小休息室，我把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问题向先念、吴德讲了……先念同志马上表示支持，吴德同志也表示支持。”^[2406]用李先念的话说“我们想到一块了，这正是我想说而未说的话，无论怎样先抓起来再说”^[2407]，并强调一定要吸取赫鲁晓夫篡夺领导权的教训，即不能开中央全会。吴德对这次谈话有详细回忆。

他说：“华国锋、李先念和我分析和估计了当时党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情况。我们认识到：在政治局开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员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没有把握……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

“我们还分析了全国的形势，认为‘四人帮’群众中是孤立的，在军队里是没有力量的。

“我们还讨论了解决‘四人帮’的时间问题……我和李先念都同意华国锋提出的‘早比晚好，愈早愈好’地解决‘四人帮’的提议。

“我们一直讨论到第二天早晨五点，认识一致了。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和李先念都对我说过，通过这次商量后，华国锋下了把‘四人帮’抓起来进行隔离审查的最后决心。”^[2408]

……

9月29日晚，华国锋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主持政治局会议，同“四人帮”就毛远新是否回辽宁的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斗争。当时具有特殊身份和地位的毛远新是“四人帮”的同伙。“四人帮”要利用他这个特殊人物帮助他们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因此，党中央不能让毛远新继续留在北京。华国锋说，会前他将毛远新写给他试探去留的信的内容告诉了叶剑英和李先念。叶、李说，这封信不能传阅，一批示传阅，“四人帮”就会闹起来，不好办了。最好的办法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讲一下，大家发表一下意见，多数同意他回去就算了。会上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多数政治局委员坚决支持华国

[2406] 程文原注：蒋冠庄、程振声访问华国锋谈话记录，2000年5月30日。

[2407] 程文原注：李先念谈话记录，1988年7月29日。

[2408] 程文原注：吴德：《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5期，第57-58页。

锋主张毛远新仍回辽宁工作的意见，唇枪舌剑，寸步不让，狠压了江青一伙的嚣张气焰。李先念说：“华国锋曾说过有什么问题，你们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我不好提。后来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毛远新已完成历史任务了，应该回去了。”^[2409]但是江青还闹，让其他政治局委员先走，只把华国锋、汪东兴留下，继续纠缠。李先念、苏振华离开会场后，转到另外一个厅，等了半个多小时，还不见华国锋出来，于是又转回东大厅。李先念说，国锋同志身体不好，这么晚了，不要再谈下去了，以后还有时间。这样才散了。江青要留毛远新的图谋未能得逞。^[2410]

根据目前所见材料，叶剑英建立了与汪东兴的直接联系。范硕在《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一书中引用了汪东兴的回忆称：

9月29日开政治局会议争论得很厉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便开始商量，分析形势，分析“四人帮”的力量，考虑对他们怎么办。当时，叶帅亲自到中南海我家来过两次（笔者注：据他后来说，交往次数还要多些），他还找华国锋同志商量。当我们了解到张春桥也两次到江青住处中南海长谈的时候，我们认为已到了很紧迫的时候了。叶帅提出要万无一失地办事。我们认为这是一件有关中国党和中国革命前途的大事。如果让“四人帮”得势，党和国家就要遭难。但当时还不是很有把握，有些提心吊胆。我们说，个人的命运就不考虑了，要考虑党和国家的命运。这是一步险棋，必须果断，更要周密。大家商量后认为，要绝对保密，范围不要大。本来计划在国庆后准备再动手。……具体工作我多做一点，因为情况我熟一点，又管一些军队和办公厅，方便一点，应该由我做，应该做好。……^[2411]

叶剑英的警卫参谋马西金回忆称：“1976年9月下旬前后，叶帅几次到中南海汪东兴同志家去，竟要求我和赵师傅每次去不要走同一个门、同一条路。比如，去时进中南海东门，走时出中南海新华门；有时还让转一圈再进去，或转一圈再出来。到东城区华国锋同志那里也是这样，要等天很黑了才走，还交待不要警卫随车（但为了安全我还是偷偷地要了警卫随车）。使我想得更多的是，叶帅突然关心起汪东兴同志住地的安全来了。那还是9月26日左右，叶帅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问我：‘马头，汪东兴住地有没有警卫？’我说：‘有，那里有个班，一个昼夜哨，

^[2409] 程文原注：李先念谈话记录，1981年5月6日。

^[2410] 《李先念与粉碎“四人帮”》。

^[2411] 《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页510-511。

一个夜间哨。’叶帅又说：‘你给汪东兴打个电话，说我对他的安全很关心。’我立即给汪东兴打电话，说：叶帅很关心你，对你的安全不放心，要你注意安全，加强警卫。汪东兴说：‘是呀，最近有人想害我。’又说：‘你们也一定要注意叶帅的安全！’紧接着他问：‘马头，你还有左轮手枪子弹吗？要有就给我送一些来。’我把给汪东兴打电话的情况立即报告了叶帅，并说汪东兴那里要子弹。叶帅说：‘你马上给他送去！’我把子弹整理好就立刻送去了。种种迹象都表明，将有重大事情要发生了！”^[2412]

三、中央警卫团执行拘捕任务

据吴德回忆称：

10月4日下午，我又被华国锋找到他的住处。我们再一次全面地检查、研究了准备工作是否就绪、解决问题的环节是否完善等问题。大概在下午的五点多钟，我回家了。我刚到家，华国锋又来了电话，要我马上到他那里。我急忙赶去，汪东兴也在华国锋家里，我们听了汪东兴汇报的具体行动方案，共同议定了中南海内外相互配合行动的措施。这是粉碎“四人帮”前的最后一次汇报了。

后来汪东兴告诉我，我们俩当时正好前后脚，我的汽车出华国锋家，他的汽车进华国锋家，是他建议华国锋再请我回来共同商量的。

我们商定：一、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已议定的方案，抓“四人帮”由汪东兴负责。具体做法是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为名，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到会，华国锋、叶剑英在中南海怀仁堂指挥，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到后，由华国锋宣布他们的罪状，随即由汪东兴组织的人分别对其实施隔离。汪东兴派张耀祠到江青住处宣布政治局对她隔离审查的决定。二、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的隔离审查，由我和北京卫戍区吴忠同志负责解决。三、中南海内如果出现了意料不到的问题，由我组织卫戍区的部队支援。四、由北京卫戍区把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电台、中央机关以及由迟群、谢静宜控制的清华、北大等单位，用内紧外松的方式戒备起来，要再检查一遍落实的情况。华国锋要求我守在电话机旁随时与他保持联系。^[2413]

【2412】马西金：《难忘的两个重要会议——粉碎“四人帮”侧记》，《叶剑英研究丛书》编委会：《叶剑英身边工作人员和亲人的回忆》，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1997年，页59。

【2413】吴德：《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刘志男、朱元石1995年访谈、记录、整理。《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9月第7卷第5期。

对于10月6日这一天的拘捕行动经过，汪东兴后来于1984年6月15日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作了详细的叙述：“下午八时，我们在怀仁堂正厅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当时，华国锋、叶剑英同志就坐在那里，事先我已写好一个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由华国锋宣布。我负责组织执行。张春桥先到，宣布决定就顺利解决了。接着来的是王洪文，他有一点挣扎，当行动组的几个卫士在走廊里把他扭住时，他一边大声喊叫：‘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边拳打脚踢，拼命反抗。但很快就被行动小组的同志制服了，扭着双臂押到大厅里。华国锋同志把‘决定’又念了一遍。还没等他念完，王洪文突然大吼一声，挣脱开警卫人员扭缚，像头发怒的狮子伸开双手，由五、六米远的地方向叶帅猛扑过去，企图卡住叶帅的脖子。因为双方距离太近，我也不能开枪。就在他离叶帅只有一两米远时，我们的警卫猛冲上去把他扑倒，死死地摁住，给他戴上手铐。随后，几个人连揪带架把他抬出门，塞进汽车拉走了。姚文元住在家里，他那地方是由卫戍区管的。因此，我事先请吴忠同志在我办公室等着，如果他不来怀仁堂，就让吴忠带人去他家解决。结果，姚文元也来了。我怕再发生意外，经请示华国锋和叶帅同意，没有让他进正厅，只让人把他领到东廊的大休息室，由警卫团一位副团长向他宣读了中央决定^{【2414】}。他听完后好像很镇静，没有争辩，也没有反抗，只说了声‘走吧’，就随行动小组的几名卫士出了门。姚文元解决后，我就打电话给吴忠，让他回家去了。与此同时，李鑫、张耀祠、武建华几位同志负责在江青、毛远新的住处采取行动，把这两个人也抓起来了。他们都没有抵抗。这次行动从八点开始，到九点半以前就全部结束了。因为准备工作做得比较细致，比较扎实，几个人都解决得很顺利。当时都是先向他们宣布中央决定：中央认为你犯了罪，决定对你进行隔离审查。”^{【2415】}

参与拘捕行动的中央警卫处副处长兼中央警卫团副团长邬吉成后来回忆称：

大约七点多钟的时候，汪东兴来到了怀仁堂前。我印象中是看着他从锡福堂、永福堂等堂院西边的路过来的，就以为他一直从南船坞，过了蜈蚣桥，经静谷，圻字廊，这么走着来的。他见守在怀仁堂外面的我，轻声问道：“怎么样，都布置好了吗？”“布置好了。”“都没有问题了吗？”“没有问题了。”

【2414】向姚文元宣读中央决定的是中央警卫处副处长兼中央警卫团政委武健华。

【2415】张树军、高新民主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档案（上卷）》，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页6-8。

汪东兴做了进一步交代：“他们来了，你把他们的随员，都放在五间房（即怀仁堂南面的来福堂等堂院的统称）。他们的车子，都停在怀仁堂西边的庆云堂。”

“孙凤山来了没有？”汪东兴又问了一句。我说：“他跟着王洪文去平谷，好像还没回来呢，只要一脱开身他就过来。”汪东兴叮嘱说：“一定打电话把他叫过来，让他管车。”说完，汪东兴就进了怀仁堂。不久，孙凤山就赶到了怀仁堂前，负责车辆调度。

在汪东兴之后，第一个来到怀仁堂的重要人物，是叶剑英元帅。他在怀仁堂前下了车。跟随他的卫士是从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调到中央军委警卫处的马锡金^[2416]；另一位是时任中央军委警卫处副处长的原中央警卫团参谋长牟乃川^[2417]；我们都认识。

叶帅见到我，一面点点头打招呼；一面握住了我的手，半天不松开；一个劲儿地摇呵摇，好像把所有的信任嘱咐，都通过这一握手传递给我。松手的时候，叶帅开口了，只一句：“好好地注意啊！”这就是我们军人的习惯，紧要的关头，就是那么简捷的片言只语，没那么多罗里罗嗦的。

我对马锡金和牟乃川说：“你们先到五间房那边歇会吧，我把叶帅送进去。”扶着叶帅上了台阶，迈过高高的木门槛，然后站在那里，看着叶帅走进怀仁堂。

第二个到来的，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此刻负责他随卫的，是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值班室的副主任东方，五六十年代，他曾经是刘少奇的卫士长。

“四人帮”这边，第一个到来的是王洪文。当天下午，他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发来的通知：今晚8点，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题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设计方案、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置。通知还有一条，是专门为不是政治局常委的姚文元加的，说是可能会涉及到毛主席文稿的改动，让姚文元列席。

接着，依次是张春桥、姚文元。他们都在怀仁堂门前下了车，我按事先的安排，把他们的随从人员，都带到了五间房。带进去后，我向这些随从人员宣布了纪律：一条是不许离开房间；二条是不许和外面通电话；三条是不能喧嚷。我要求一定要严格遵守这几条。

【2416】应为马西金。

【2417】应为牟乃传。牟任军委办公厅警卫处副处长的时间应为1973年7月到1983年7月。

因为以往开会，我也常常担当这个角色，指定这些人哪里待命，宣布纪律，他们向来都服从我的指令。这一天，我向他们吩咐的，与以往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所以这些人也没有感觉到与往常有什么异样。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先后进了怀仁堂，由华国锋依次向他们宣布：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中共中央决定对你们“隔离审查”。然后依次被抓起来一个一个地押进停在怀仁堂东面红旗车里。但后来看了在里面负责的武健华写的文章，他说对姚文元的宣布中央决定的是他。他的回忆，肯定比一直守在外面的我是更具权威的。

当时在怀仁堂外面的我看到的情景是，从怀仁堂的东侧门里，隔一会儿开出一辆红旗车，共开出了三辆，但当时开去哪里了，我就知道了。

王、张、姚的事一处理完，华国锋、叶剑英指示耿飏，立即率部队接管新华社、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等新闻单位。随后决定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

这时，武健华从怀仁堂里走出来，他对我说：“汪主任说了，要你给张耀祠打一个电话，问他那边的事搞完了没有。”我这才知道，张耀祠带领着另一个小组，执行着对江青、毛远新“隔离审查”的任务。

我马上把电话打过去，张耀祠告诉我：“我们这边的事情已经顺利结束了。”我把张耀祠的话告诉了武健华，武健华说：“都完了，那咱们也去宣布吧。”我们一起走向王、张、姚等随从人员集中的房间。

五间房里，聚集着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的警卫、秘书、医生、护士十余人。武建华对他们宣布说：“你们的首长，现在已经有别的安排了，你们原先的工作也结束了。现在你们把武器交出来。”武健华宣布完，我补充了几句。

这时，我发现跟着叶剑英来的牟乃川和马锡金，一下站起身，瞪圆了眼睛。我猜想他们可能误会叶帅也出了什么问题，马上对他们两个说：“你们两个没事，赶快去怀仁堂那边照顾首长去吧。”

武器收齐后，我就带着这一千人，上了由孙凤山调来的两个面包车，乘车到了海淀区的花园村，原来总工会的工会学院。已经入夜了，因为事先也没有通知人家，所以我们到达时，面对的是紧闭的大门。

不得已，只好派人爬进去，把门打开，才把车开进去。这个学院早已停办，我找到驻扎在这里的中央警卫团训练大队的大队长梁子臣，和他一起把

带过来的人安排进一座空楼。后来，还有一些相关的人员也集中到这里，在这里办了一段时间的学习班。^{【2418】}

拘捕江青是由汪东兴的副手——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处副处长兼中央警卫团团团长张耀祠到江青住处中南海 201 寓所执行的。据当时在现场的江青处工作人员、护士长马晓先回忆称：

我记得 10 月 6 日是个星期四，那天不是我值班。大约是下午临近黄昏的时候（按张耀祠的说法是约 8 点钟的时候），我正在宿舍里洗衣服，脚上只穿了一双拖鞋。忽然中央警卫团的团长张耀祠来到我身后。

我看见他时还说：“呦，张团长怎么来啦？”张耀祠说：“有点事，你跟我来一下。”我以为是工作上的事情就说：“今天不是我的班啊。”他说：“那也得让你去一趟。衣服就别洗啦，快去换换衣服，换换鞋。”当时不知是怎么的，这么匆匆地被他叫走，分明地感到有些异样，但内心却一点也没有感到突然和惊异。

我跟着张耀祠走到江青所住的中南海 201 寓所的外门，就看见有几位全副武装的军人，我一个都不认识，这种情况是以往在江青身边从来没有过的。我感到要有什么大事发生了，但我仍然没有产生特别意外的感觉。

当然，看到这种阵势，我心里也不是没有思考。我记得刚到钓鱼台，被安排到江青身边工作的时候，江青曾经对我说过大致这样的话：你们到我这来工作，要有思想准备。我要不就上去，干一番大事业；要不就可能成为阶下囚。我此刻下意识地感到，江青当初所预计的那第二种情形降临了。

这时，张耀祠吩咐那些全副武装的军人守在外面，而让我和高云江、黄介元、马盼秋几个人跟着他一起进到房间里面。这时，我想起了此刻在江青这里值班的护士应该是江慰琴。

进了江青的办公室后，我看见江青正坐在沙发里。通常江青在办公室的时候，就习惯这样坐在沙发里，把脚放在翘脚墩上。张耀祠走到她面前，对她说：“江青，我接到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你现在还进行分裂党中央的活动，党中央决定将你实行隔离审查，马上执行。你到另一个地方，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

【2418】 郭吉成、王凡：《红色警卫》，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 年，页 392-396。

张耀祠自己回忆说：组织上交代的说辞中，并没有“你现在还进行分裂党中央的活动……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守纪律。”这是他自己临时加进去的。

在张耀祠向江青宣布那段话的时候，江青坐在沙发里一动不动，表面上没有显出慌乱，但她的内心绝不可能是平静的。她等张耀祠把话说完，轻轻地说：“我没听清楚，你能不能再说一遍。”张耀祠就把刚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江青听完张耀祠第二次宣布了中央的决定后，才站起身来。她从裤子口袋里掏出钥匙，放入一只牛皮纸信封里，折好口，拿订书器钉好，用铅笔写上“华国锋同志亲启”，然后交给了张耀祠。

这一连串的动作，江青做得不紧不慢，看似镇定自若。在这之后，江青提出要上一下卫生间。卫生间就在办公室的边上，张耀祠同意了，江青走了进去。张耀祠立即要我把江青的东西收拾一下，准备离开这里。

因为1976年的江青曾频繁地离京外出，去天津、去小靳庄、去大寨、去昌平等地，所以我们为她准备好了一个箱子，放好了出行常用的必备用品。每次出发，只要把她身边的东西稍稍一敛，十分钟之内肯定能够动身。每次从外地回到北京，我们也是先把箱子里的东西准备好，这样那怕是第二天就再度出发，也能拿起东西就走。所以我没用多少时间，就把江青的东西都收拾好了。

然而，当我把东西收拾好了之后，江青还没有从卫生间里出来。张耀祠也觉得时间长了点，就让我进去看一看。我进卫生间一看，江青正坐在那里愣神，显然她在思考着什么。我什么也没说就出来了，江青随后也出了卫生间。

我们一起离开了江青的办公室，我和江青上了一辆大红旗轿车。我记得轿车好像在地上走了一段，就驶入了一条地下通道，我也不记得走了多长时间，最后到一个安置江青的预定地点。那是一座地下建筑，她在那里住了半年之久。^{【2419】}

拘捕“四人帮”整个过程竟料想不到的顺利。这自然是因为华、叶、汪三人配合默契，指挥得当。亦充分展现了毛泽东这一硕大无比的靠山倒下之后，“四人帮”表面是如何的张狂，实质完全不堪一击。

【2419】王凡：《马晓先女士谈江青》。《历史学家茶座》总第3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2月，页111-112。

四、中央政治局玉泉山紧急会议

10月6日晚拘捕“四人帮”之后，华国锋等决定于当晚10点在玉泉山九号楼叶剑英住地，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出席者为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倪志福、吴桂贤共11人。

据当时在场参与会议地点布置的马西金回忆称，“当时在京的政治局委员有十五位，抓起来了四个，所以摆了十一个座位。第二圈摆了两个长沙发，两个长茶几，准备给参加会议的秘书们做记录用。……会议室还没布置完，有的政治局委员已经到了。他们大多数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更不知道开会讨论的问题，有的人还以为是叶帅病了！最先进入会议室的是纪登奎，以后是陈永贵、吴桂贤和另一位委员。他们一来，看到摆的座位，谁都没有到前排就坐，都坐在为秘书作记录用的位置上。不一会儿，李先念同志赶到了，他一进九号楼大门就问：‘叶帅怎么啦？有什么病呀？’按过去的惯例，有人来开会或来看叶帅都是我在大门口迎送。那天我实在忙不过来，就请王文理秘书去迎接。王文理秘书向李先念说：‘叶帅没有病，是要开会。’李先念听后，说：‘开什么会呀？’边说边进入会议室。”“晚上10点30分，开会的人员到齐了，我一看先来的纪登奎、陈永贵、吴桂贤和另一位还坐在后排长沙发上，就请他们到前排来坐。纪登奎说：‘你的座位不够，还有四个人没有来呀！’我说：‘人到齐了，请到前边来吧。’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还是没有到前边来。这时，汪东兴同志说话了，他说：‘马头说得对，人到齐了，你们都到前边来坐。’这样，他们才坐到前排的座位上。我立即去请叶帅和华国锋同志。【2420】

据参与安排布置会议地点并列席会议的中办秘书局局长周启才回忆称：

开始，华国锋请叶剑英主持会议并讲话。叶帅说：“这次会议应该由你主持，你是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的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一直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责无旁贷，你就主持开会吧！”

华国锋说：“那我就先讲几句，再请叶帅主讲。”华国锋说：这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这样晚的时间，在玉泉山九号楼叶帅住地召开，是由于事关重大，形势非常，为了有利于高度保密，确保中央安全，决定采取这样的措施，这是十分必要的。我现在向大家宣布：今天晚上8时，中央已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和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为由，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拘捕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

【2420】《难忘的两个重要会议——粉碎“四人帮”侧记》。

不是常委，通知他来怀仁堂列席会议，做些《毛选》文字的修改工作，他来后，在怀仁堂东休息室拘捕了。江青是在中南海她的住地拘捕的。根据他们篡党夺权的严重罪行，分别向他们宣布了由我签署的中央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对王洪文、张春桥的拘捕是在怀仁堂正厅，叶帅坐镇，我分别向他们宣布的。江青和姚文元是由执行任务的有关负责人员向他们宣读的。对毛远新实行了保护审查。“四人帮”在北京的几个骨干分子，由北京市委、北京卫戍区根据中央指示解决的。

华国锋接着介绍了实施这一重大行动的过程：“叶帅亲临怀仁堂正厅现场，同我一起坐镇指挥。东兴同志按照预定方案，组织指挥参战人员具体实施。由于决策正确，精心组织，高度保密，措施得当，整个行动过程进行得很顺利。对中央新闻单位，我们选派了耿飏同志带领精干的工作组进驻，掌控情况，把好关。”

……

接着，叶剑英严正指出并分析道：“我们党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一场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斗争。在毛主席逝世不久的情况下，采取什么样的斗争策略、措施和方法，做到既要把这个反革命集团彻底打掉，又要保证首都北京和全国局势稳定。这是一步险棋，怎么走好这步险棋，非同小可，要慎之又慎，做到万无一失。经过我和国锋同志及东兴同志几次个别交谈，统一思想认识，决定采取“以快打慢”的方针，用在怀仁堂召开中央常委会的形式，对‘四人帮’采取行动，实行隔离审查。在决策和实施这一重大行动过程中，保密问题重之又重，知密范围很小，参与人员十分精干。实战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未放一枪一弹，即迅速粉碎了这个反革命集团，取得了预期的胜利。”

……

华国锋插话说：“这场粉碎‘四人帮’斗争的胜利，我们的叶帅起了最为重要的作用。”

叶剑英说：“不能这样讲。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毛主席的遗愿。毛主席逝世后，你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又是国务院总理，这件大事，如果你不下决心，你不拍板，做起来就难啊！正是因为你下了决心，你拍了板，做起来就相对容易了。”

叶剑英又说：“在这场同‘四人帮’的斗争中，东兴同志具体对行动方案组织实施，胜利完成，是出了大力、立了大功的。8341部队的参战人员也为党为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

汪东兴插话说：“叶帅过奖了。在这场同‘四人帮’的决战中，我是在国锋同志和叶帅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做了应该做的一些事情。一个老共产党员，长期从事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领导干部，为了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完成中央交给我的政治任务，是完全应该的。”

.....

华国锋说：“毛主席离开我们快一个月了。乱党、乱军、乱国，妄图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党中央及时果断地粉碎了。在此新的形势下，我向中央政治局提议，请我们叶帅担任党中央的主席，主持中央的工作。叶帅德高望重，长期在中央协助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处理国际、国内重大问题，多谋善断，有多方面丰富的实践经验，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很高，在危难时刻，两次挽救了党。”

叶剑英起来大声说：“国锋同志这个提议不妥。我年事已高，今年已79岁了，且长期从事军事工作，工作面窄。经过慎重考虑，我提议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他年龄比我小20多岁，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民主作风好，能团结同志，尊重老同志， he 现在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我认为他比较合适的人选。这个担子是不轻，我们大家可以协助。请大家考虑。”



粉碎“四人帮”后的华国锋、叶剑英与邓小平，1977年8月1日。

经过认真讨论，与会政治局成员完全赞成叶帅的意见，一致通过了由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待召开中央全会时予以追认。

.....

这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从10月6日晚10时开到10月7日清晨4时多，历时6个多小时，顺利结束。^{【2421】}

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标志着十年文革的最终落幕，其重要性无论如何评价都不为过分。因为这一天，使中国永远脱离了毛泽东时代，从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在粉碎“四人帮”这一历史性过程中，华国锋与军方代表人物叶剑英、汪东兴以及中央警卫团参与人员，同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因军方助力而兴起，终因军方出手抓“四人帮”而落幕。

【2421】周启才：《中央政治局玉泉山紧急会议》。《世纪》2006年第2期。

后记

撰写一部文革军史，从军队的角度诠释一个特殊年代的历史进程，是笔者长久以来的愿望。

为此，笔者进行了近四十年的努力，广泛收集有关史料，多方采访请教，钩沉索隐，潜心钻研。近二十年间，就有关重大历史事件和专题，编著了多部专著及百多篇文章，以为该课题作前期准备，在此基础上，又用了十多年工夫加以综合整理，终于形成了这本书。

本书的目的，是依据大量的原始资料，对文革中涉及人民解放军的史实，作出全方位的、客观真实的回顾，发掘和披露新的史料，进行必要的梳理，以求使读者看到一个比较完整和准确的历史轮廓，并能从历史的教训中得到启迪。

有关文革中人民解放军及其关联者的著作浩如烟海，回忆录不计其数，各种各样的传闻光怪陆离，许多事件至今仍扑朔迷离，令人莫衷一是。对此，本书以实事求是为宗旨，以原始书证和官方记录为主，不采信民间传说或故事，在有其他史料的情况下，尽量少采用私人回忆录，力求做到言之有据，真实可信，不加讳饰，还历史之真相，争取为读者提供一部信史。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引用的部分文本。尤其是文革时期的出版物，文字及标点符号或未尽统一，或略有讹误，笔者征引时均保留原样，未加修正。

诚然，有关文革的官方档案材料大多未能完全公布，一些事件的真相仍在云山雾罩之中，还有不少谜团未完全揭开，这不能不留下一些遗憾。惟笔者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只要我们锲而不舍，不懈努力，今日的尚余未解之谜，真相总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在本书收集素材、酝酿和写作过程中，笔者采访过众多的重大历史事件经历者：关锋、戚本禹、毛远新、程世清、王淮湘、王猛、宋维斌、刘江亭、张纪之、刘锦平、黎原、李布德、胡萍、顾同舟、解耀宗、孙凤章、关光烈、康庭梓、宋德金、于运深、李根清、陶斯亮、阎长贵、王广宇……，以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纪登奎、丁盛、罗舜初、梁兴初、李震、郭玉峰、周赤萍、唐平铸等的亲属及后人，得到了他们提供的第一手资料。笔者从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以及中国部分省级档

案馆查阅了大量珍贵的文革文献、档案资料，也得到许多专家、学者的指点和帮助。著名历史学者秦晖教授为本书撰写了序言。笔者的同学蔡小洪仔细地审读了本书稿的全文，提出了大量宝贵的补充、修改意见。同学、好友马海甸、刘小磊对全书进行了认真的校对。在此，笔者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本书若有疏漏、谬误之处，恳请读者涵谅，同道方家赐正。

余汝信

2021年5月16日

附录：1965-76年军事工作大事摘要

注：本摘要大部分条目为补充正文未有提及的要事。部分条目则为突出史实重点简略地重复了正文已有的叙述。

1965

“八六”海战及崇武以东海战

8月6日，海军南海舰队鱼雷快艇第十一大队、护卫艇第四十一大队，在东山岛东南海域与台湾海军两艘猎潜舰展开激战，以轻伤护卫艇、鱼雷艇各2艘，亡4人，伤28人代价，击沉台海军大、小型猎潜舰各1艘，毙170余人，俘33人。11月13日，海军东海舰队福建基地护卫艇第二十九、三十一大队和鱼雷快艇第六支队第三十一大队，于13日晚至14日凌晨，在崇武以东海区击沉台海军护航炮舰“永昌”号，击伤大型猎潜舰“永泰”号。经此两役，台海局势趋于平静。

彭德怀、黄克诚、谭政等挂职下放疏散外地

9月，在战备的大背景下，中央认为，曾犯有反党性质严重政治错误的彭德怀、黄克诚、谭政和习仲勋（1962年前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不宜留在北京，遂将他们挂职下放，疏散外地。9月23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谈话，彭随即到成都任西南三线建委第三副主任。随后，黄克诚到太原任山西省副省长，谭政到福州任福建省副省长，习仲勋到洛阳任一机部洛阳矿山机器厂副厂长。

罗瑞卿被解职

12月8日至1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解决罗瑞卿问题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后，罗被解除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职务。翌年5月，罗被诬指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主要成员被囚禁。罗于1975年复出。

1966

陈毅等增补为军委副主席

1月8日，中央决定，增补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为军委副主席。

毛林批准加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武装建设

2月2日，林彪批准总参提出的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加强武装建设的建议。9月15日，根据毛泽东指示，军委决定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增设10个步兵师、1个地面炮兵师、1个高射炮师、1个坦克师。后此13个师未组建成，但组建了12个步兵团、1个工程团、2个独立营，共1.9万余人，为现役军人待遇。

施工队伍整编为基本建设工程兵

3月30日，中央批转国家建委党组《关于施工队伍整编为基本建设工程兵试点意见的报告》。报告提出，我国有施工队伍共300万人（不包括集体所有制建筑企业），其中中央各部直属施工队伍为156万人，拟在5年内整编为部队。施工队伍整编后，成为解放军的一个兵种，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属军委建制，受军委和国家建委双重领导，主要担负基本建设施工任务。8月1日，国防部授予基本建设工程兵正式番号。156万施工队伍拟在5年内整编为部队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到1979年，基建工程兵总人数为49.6万人，为1966年计划的三分之一。

铁道部所属基建队伍合编为铁道兵

4月20日，军委办公会议讨论决定：铁道兵现有39万人，除拨出8万定额的建制部队归工程兵建制领导外，其余部队整编后与铁道部的基建工程队伍合并为铁道兵部队，业务上归铁道部领导。6月17日，军委作出《关于调铁道兵八万部队给工程兵的决定》，决定将铁道部所属基建队伍合编为铁道兵，并调铁道兵7.5万人归工程兵。

北京卫戍区部队扩编

5月27日，为加强首都的警卫力量，军委命令，自6月1日起，将首都警卫师和北京公安总队及陆军第六十三军第一八九师调归北京卫戍区建制；6月15日，军委又电令陆军第二十四军第七十师自6月3日起调归北京卫戍区统一领导指挥，担负首都地区的警卫任务。上述4个师的建制领导关系改变后，警卫师和北京公安总队的番号分别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卫第一、二师；第七十、一八九师番号不变。

全国公安部队整编

6月6日，中央、军委批示同意公安部队整编小组5月29日《关于全国公安部队整编的报告》。报告根据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撤销公安部队，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决定和周恩来关于全国公安部队争取在6月底整编完毕的指示，建议将全国公安部队现有36.8万余人（不包括警卫师）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成立第二炮兵领导机关并启用番号

7月1日，总参通知，根据中央、军委6月6日决定，将原中国人民公安部队领导机关与炮兵管理导弹部队的机构合并，整编为第二炮兵领导机关。自7月1日起，撤销中国人民公安部队领导机关名称，同时启用第二炮兵番号。

江青任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

9月23日，总政通知：军委决定江青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9月29日，总政通知：军委决定聘请姚文元任《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特约评论员。11月28日，谢镗忠宣布，“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决定，将北京市京剧一团（包括北京戏剧专科学校参加国庆演出的红卫兵演出队）、中国京剧院（包括中国戏曲学校参加国庆演出的红卫兵演出队）、中央乐团、中央歌剧院舞剧院的芭蕾舞剧团及其乐队，划归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列入部队序列，成为我军进行政治工作和文艺工作的组成部分。”

1967

阎红彦辞世

1月8日，中共昆明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政委、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开国上将阎红彦，在云南省军区警卫团服眠尔通含愤自杀身亡，终年57岁。

军队开始介入地方文革

1月23日，按照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3月19日，军委又根据毛指示，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自此，军队开始介入地方文革，先后派出280多万名干部战士参加三支两军工作。

1967年国防费概算及文革十年国防费开支概况

3月15日，总后财务部关于1967年国防费概算（草案）的报告称：1967年国防费，国家确定拨款为120.6亿元。而按文革结束后公开数据，1967年国防经费开支实际仅为83亿元，占财政支出比例为19.8%，占GDP比例为4.68%。1966年国防经费开支为100亿元，1968年为94亿元，1969年为126亿元，1970年为145亿元，1971年上升至文革期间最高的169亿元，1972年下降至159亿元，1973年为145亿元，1974年为133亿元，1975年为142亿元，1976年为134亿元。文革期间，军费绝对值增长并不大。

军委常委增补与常委会议简况

3月30日，中央决定：增补谢富治、萧华、杨成武、粟裕四人为军委常委。至此，军委常委共12人，即：毛泽东、林彪、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朱德、谢富治、萧华、杨成武、粟裕。

1966年11月30日军委常委第59次会议之后，军委常委会议（未包括军委常委扩大会议）自1966年12月至1967年2月三个月时间均未举行。1967年3月6日，叶剑英主持军委常委第60次会议，讨论召开全军军级干部会议问题。此后本年度共举行军委常委会议（未包括军委常委扩大会议）43次。除情况未明的7次外，其余均由叶剑英主持。

谢富治任北京市革委会主任

4月20日，北京市革委会成立。谢富治为主任，吴德、郑维山、傅崇碧、聂元梓为副主任。市革委会内设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谢富治，副组长吴德、傅崇碧、周景芳。

关于师级以上干部任免权限和审批手续的规定

5月10日，经军委常委第68次会议批准，总政作出关于师职以上干部任免权限和审批手续的规定称：一、各大军区、军种、兵种和三个总部军政第一、二把手的任免，经军委常委讨论通过，报林副主席同意后，再呈报主席、中央，经毛主席批准后公布命令。二、各总部二级部部长，各军区、军种、兵种副司令员、副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军区空军、海军舰队司令员、政委，军委直属各学院正副院长、正副政委，军长、军政委，省军区司令员、政委的任免，经军委常委讨论通过后，呈报中央，经林副主席批准后公布命令。三、师长、师政委和相当正师职干部至相当正军职干部的任免，经总政治部党委讨论通过，呈报军委常委批准后公布命令。四、副师职干部的任免，军委原授权总政治部党委审批。建议改由各军区、军种、兵种和三个总部党委讨论通过公布命令，报总政治部备案。

谢富治等任职

5月18日，根据中央决定，军委任命：谢富治（军委常委、北京市革委会主任）为北京军区政委、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刘格平（山西省革委会主任）为北京军区政委、山西省军区第一政委；张春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上海市革委会负责人）为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王效禹（山东省革委会主任）为济南军区第一政委、山东省军区第一政委；潘复生（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为沈阳军区政委、黑龙江省军区第一政委。同日，军委转中央决定：张日清

(山西省军区第二政委, 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 为北京军区副政委; 李再含(贵州省革委会主任) 为昆明军区副政委、贵州省军区第一政委。7月3日, 军委命令: 任命刘结挺(前宜宾地委书记、四川省革筹小组副组长) 为成都军区副政委。

内蒙古军区改为省级军区

5月26日, 军委决定, 为统一对华北战场的作战指挥, 将内蒙古军区改为省级军区, 划归北京军区建制。

成立军委办事组

8月17日, 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商定, 成立军委办事组, 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4人组成, 吴法宪负责。9月, 又决定增加杨成武为成员, 并指定杨为组长。

军委领导对北线设防作重要指示

11月8日, 林彪向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布置北线设防问题, 着令陈士榘组织有关部门和人员进行勘察。12月1日, 陈士榘就北线设防问题向叶剑英、徐向前作了汇报。叶剑英对阵地配置、装备防护、防空降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徐向前指示, 要到现场勘察, 确定设防部署。16日, 陈士榘又向刘伯承作了汇报。刘伯承指示, 战备工作有许多方面, 工程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部署时, 一定不要分兵把口, 要控制要空点, 控制预备队, 阵地应是要塞式、支撑点式的。

关于各级军区机关目前不搞“四大”和军以下部队坚持正面教育的通知

11月14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各级军区机关目前不搞“四大”和军以下部队坚持正面教育的通知》。通知要求, “一、各大军区、海军舰队、军区空军机关、省军区、军分区和县市人民武装部, 目前一律不搞‘四大’。已经开展‘四大’的, 可采取适当的方式结束。这些单位, 采取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开展整风的方法, 分期分批地轮训干部。学习时间每期不超过两个月。”“二、军以下部队和各基地以及中央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如总参三部, 军区三局、五局, 海军、空军的飞行航校, 总后各办事处等), 仍坚持进行正面教育。”

1968

国防科委及其研究院改变名称

2月10日, 中央军委决定, 将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 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 所属17个研究院, 按第一至第十七的顺序, 分别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研究院; 1个设计院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设计院。

杨余傅事件

3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命令，根据毛、林决定，杨成武、余立金“犯有极严重错误”，傅崇碧“犯有严重错误”，决定撤销三人所任职务。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温玉成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军委办事组下发部队调动使用权限规定

4月26日，军委办事组下发《关于部队调动使用权限的规定》。规定要求，执行各种任务的陆、海、空军部队，营（相当于营）以上部队的行动和部署变更，一律呈请毛泽东、林彪审批后才能行动；凡执行作战任务的部队，无论部队大小均报请毛泽东、林彪批准后方可行动；执行生产、施工、野营训练任务的部队和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部队换防，连以上、不足1个营，由军委办事组批准，连（含）以下分队的行动，由各军区、军兵种批准。

6月12日，军委办事组对上述规定作了补充：营的建制部队，支农劳动离开驻地30里以内，劳动时间3天；不足1个营的部队离开驻地50公里以内，劳动时间5天，均由军区、军兵种批准，报军委备案。超过上述距离和时间，营以上部队支农劳动，应预先作出计划，报军委批准。部队在紧急情况下执行抢险救灾任务时，可一面行动，一面上报军委备案。

1969年1月11日，军委办事组对部队调动使用权限规定又作了补充。即凡属部队调动，必须由各级党委集体讨论，主要军政首长签署文电才有效。对国民党军小股入窜，应将依据情况作出打击的预案和使用部队的计划报总参。当发生紧急情况时，为不失战机，军区可一面行动，一面报告；如情况来得及，应事先报总参批准后行动。遇有抢险救灾时，应先电话报告后行动，尔后再正式补报。

全军陆军部署调整

9月16日，根据毛泽东关于部队不要在一个地方驻久了，驻一个时期可调防的指示精神，军委办事组上报了从1968年秋冬至1970年上半年陆军军分批调整部署的报告。经中央批准，第一批5个军的调防，于10月25日开始至12月30日完成。

西藏军区改为省级军区

12月7日，经中央、中央文革批准，军委决定，将西藏军区改为省级军区，划归成都军区建制。

1969

成立四川省军区

1月29日，军委批复成都军区1月10日请示，为加强对军分区和独立团等地方部队的领导，同意成立四川省军区。该军区10月1日成立，隶属于成都军区建制。

成立军政大学

2月2日，军委办事组决定，将高等军事学院、南京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合并，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1970年8月6日，军政大学在北京成立，9月15日开学。

珍宝岛事件

3月2日-17日，中苏两国军队在具争议的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地区发生激烈边境军事冲突。双方均动用了正规军参战。战后据中方披露，在整个“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过程中，中方估计毙伤苏军230余人（苏俄方面公布为152人），毁伤苏坦克装甲车辆19辆。中国军队共伤亡159人，其中阵亡71人。9月11日，中苏两国总理在北京首都机场进行会谈，就两国关系问题达成了一些谅解。10月，中苏两国外交部副部长级边界谈判在北京正式举行。中苏关系其后有所缓和。

军委办事组转发军队院校调整方案

2月19日，军委办事组转发《军队院校调整方案》，对军队院校进行调整，裁减82所，保留43所。原则是：（一）指挥、政治、体育、艺术学校一律撤销；（二）技术学校，凡是在部队能学到的技术，一律在部队培养，高级技术学校（含维护修理学校）基本上保留；（三）撤销各军区的步兵学校，陆、海、空军的军、师建立小型教导队，担任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轮训部队干部的任务。

重申北京卫戍区部队调动使用权限的规定

4月10日，军委办事组重申北京卫戍区部队调动使用权限的8条规定。其中有关部队调动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卫戍区部队和民兵武装的任务、部署、兵力调遣、临时警卫勤务等，都必须报告总参谋部，经呈毛泽东、林彪、中央、中央文革、军委作出决定后，由卫戍区具体组织实施。卫戍部队的部署调整兵力调遣、执行会场路线警卫和押解勤务等，2个连以上的兵力，一律报请毛泽东、林彪、中央、中央文革、军委批准。执行训练、施工、生产、助民劳动和野营任务的部队，1个营以上的部队，由总参视情报请军委办事组或军委批准。

公布军委和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

5月27日，中央公布4月28日中共第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军委主席、副主席、委员名单和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委员有各总部、各军区和各军兵种等大单位的负责人共42名。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副组长吴法宪；成员叶群、刘贤权、李天佑、李作鹏、李德生、邱会作、温玉成和谢富治。

许光达逝世

6月3日，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国防部副部长、装甲兵司令员、开国大将许光达，在专案审查期间因病于北京逝世，终年61岁。

贺龙逝世

6月9日，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开国元帅贺龙，专案审查期间在幽禁中于北京病逝，终年73岁。

军委办事组召开“三北”地区作战会议

6月20日至7月4日，军委办事组在北京召开“三北”地区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沈阳、北京、兰州、新疆4个军区主管作战的领导和各军兵种、三总部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会议研究了防止苏军突然袭击的作战思想准备、作战设想、部署调整和边防斗争等问题。这次会议纪要于8月16日呈报毛泽东和中央审批。20日毛批示：已阅照办。九十月间，总参、总后组织联合检查组赴北京、兰州、新疆军区检查了部队落实军委办事组座谈会和“三北”地区作战会议的情况。

内蒙古“东三盟”、“西三旗”军事工作分别划归沈阳、兰州军区领导

7月5日，中央决定，将内蒙古呼伦贝尔、哲里木、昭乌达盟分别划归黑龙江、吉林、辽宁省管辖，巴彦卓尔盟的额济纳旗、阿拉善右旗和阿拉善左旗分别划归甘肃省和宁夏自治区管辖，军事工作随行政区划归所在军区、省军区、军分区领导。

新疆铁列克提战斗失利

8月13日，中方边防分队共25人（含掩护分队11人）进入新疆裕民县巴尔鲁克山西部铁列克提地区巡逻。苏边防军300多人在装甲车和直升机配合下，对中方巡逻分队突然袭击。由于中方战前缺乏周密准备，寡不敌众，后援不济，造成巡逻分队25人及随同执勤的3名民兵全部阵亡。

防化学兵部改为总参防化学部

10月17日，根据军委办事组6月13日公布的总参机关精简方案，参谋部通知，将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学兵部改为总参谋部防化学部。

军委下达建立全军战略预备队的命令

10月16日，经毛泽东批准，军委向有关军区和空军下达了建立全军战略预备队的命令。战略预备队由若干个陆军军、空降军和坦克师、地炮师、高炮师组成。

总参传达林彪的“紧急战备指示”

10月18日，遵照军委办事组指示，总参向各军区、海、空军和北京卫戍区传达“林彪副主席紧急战备指示（第一个号令）”。“指示”指出，近两天来，美国、苏联有许多异常活动情况。特别是苏联的所谓边界谈判代表团，预定19日来京，要求全军必须百倍提高警惕，防止苏联搞欺骗，尤其19、20两日应特别注意。“指示”还要求，各军区、特别是“三北”军区对重型武器要立即疏散；沿海军区也应加强战备，防止敌人可能突然袭击；要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各级都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指示”还要求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兵器的生产（此条传达给国防工办）。

同日，总参谋部还传达林彪给第二炮兵的“指示”（第二个号令），要求二炮部队要加强本身防护，同时待命，必要时参加战斗。

同日，总参谋部还传达军委办事组给各总部、各兵种、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和总参各有关部局的指示（第三、四个号令），要求按照国庆期间战备工作要求转入战备状态。

中央、军委颁发部队调动使用权限的规定

10月22日，中央、军委颁发《关于部队调动使用权限的规定》。规定指出，部队执行生产、施工、训练、助民劳动任务和正常部署调整的调动，营以下由各军区、军兵种批准，报总参谋部备案；团（不含）以下由军委办事组批准；团以上报毛泽东及林彪审批。部队执行抢险救灾任务，仍按以前规定执行。师、团机关离驻地野营训练，一周以内由各军区、军兵种批准，报军委办事组备案；一周以上报军委办事组审批。执行作战任务的部队行动，原则上仍按军委办事组1968年4月26日规定执行；对中苏、中印边境地区，无论大小部队的作战行动，均报毛泽东及林彪或中共中央常委批准后方可行动。为不失战机，可预先报告方案。对内地的平叛剿匪和东南沿海以及中缅边境的国民党军残部小股袭扰的反击作战，可边行动边报告。对执行三支两军任务部队的调动，营以下由各军区、军兵种批准，报军委备案；营以上报毛泽东、林彪或中央常委审批。

军委办事组下达做好疏散部队工作的指示

10月23日，总参向各军区、海、空军和北京卫戍区传达了军委办事组《做好疏散部队工作，继续保持良好战备状态》的指示。指示指出，疏散出去的部队，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天气逐渐转冷，要做好疏散部队的工作，减少非战斗减员，继续保持良好战备状态。指示要求，所有疏散的部队不要露营，搞好行政管理和物资保障；抓紧时间进行战备训练，保持常备不懈。

成立国防工业领导小组

12月22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在军委办事组之下，成立国防工业领导小组。由邱会作任组长，国务院国防工办副主任李如洪和总后副部长封永顺任副组长。

1970

军委发出防备苏军从海上进攻的指示

1月20日，军委向全军发出《关于防备苏军从海上进攻的指示》。指示指出，苏联军队近几年来，不断扩充海军实力，加紧对海外扩张，尤其在珍宝岛事件之后，其海、空军经常深入中国沿海海域和领空进行侦察和演习活动。为防备苏军从海上进攻，指示要求加强海上情况侦察，严密掌握动向，各主要港口和重要岛屿要加紧作战准备，各沿海主要城市要认真抓好人民防空、人口疏散等工作。

军委下达关于部队疏散的指示

4月24日，中央军委下达《关于部队疏散的指示》。指示要求对部队疏散工作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凡有条件的地区，把人、马、车、炮逐步搬进窑洞，并逐步建成能防、能工作、能生活的坚固耐用、平战结合的战斗营房；疏散地区住房拥挤的部队，原营房在山区或远离大城市、交通枢纽和重要目标的，雨季可撤回营房，有情况再就地疏散；原营房在大城市、交通枢纽或重要目标附近的，雨季期间可采取野营方法，以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轮流回营房；长江以南地区部队的一些重装备，梅雨季节可考虑回营房保养；海军舰艇疏散，采取大型的分散在港湾锚地，小型的分散在小港或轮流疏散，定期回基地、港口进行补给、维修和休整。

19日，军委办事组根据毛泽东指示精神，电话向各军区、军兵种下达了《关于部队疏散的补充指示》。补充指示指出，军委《关于部队疏散的指示》是落实“军队不要松劲”指示、保持常备不懈的重大措施，战备程度应比去年国庆节前大大加强；部队的战备思想教育、战备训练、物资准备、国防工程和一线部队、

防空作战部队以及国防工业等，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同时指出，部队战备活动要有张有弛，既要防止松劲麻痹，要防止人为的紧张。

中央调查部与总参情报部合并

5月1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中央调查部与总参情报部合并的通知》。两部合并后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情报部，隶属总参谋部。

援越部队完成任务全部回国

7月9日，中国援越部队完成任务后全部回国。1964年“北部湾事件”后，在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期间，根据中越两国政府先后签订的援助项目协议，从1965年5月26日至1968年3月15日，中国先后派出工程兵、铁道兵、高炮、通信、后勤保障等部队，共23个师、95个团另83个营，约32.32万余人。平均每年在越兵力13万余人，最高时达17万余人。在执行援助任务过程中，援越部队共伤亡5,270余人，其中牺牲1,070余人。

军委修改关于部队调动使用权限的规定

7月18日，由于部队正常执行生产、训练等任务，调动比较频繁，为了减少毛泽东、林彪批阅文件数量，经军委办事组请示毛泽东同意，中央军委下发了关于部队执行生产、施工、训练和助民劳动等任务的调动使用权限的新规定。新规定明确，部队执行上述任务的调动批准权限，由过去规定团以上改为师以上报毛泽东及林彪审批，师（含）以下责成军委办事组办理，仍以中央军委名义批复。执行作战等其他任务的部队调动批准权限不变。

谭甫仁遭枪击逝世

12月17日，昆明军区政委、云南省革委会主任、开国中将谭甫仁，在寓所内遭正在被审查的军区政治部保卫部一副科长枪击受重伤，经抢救无效在昆明逝世，终年60岁。

1971

军委下发部队调动批准权限的规定

4月14日，中央军委下发《关于部队调动批准权限的规定》。规定明确，部队调动的批准权集中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军区和军兵种三级。执行作战任务，不论大小部队的行动，均须报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批准。唯对国民党军残部小股袭扰和西藏叛匪回窜的反击作战，可边报告、边行动。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部队调动，营以下由军区、军兵种批准；营以上报毛泽东、林彪和中央审批。部队基本部署调整，团以下由军区、军兵种批准；团（守备营、边防点）以上报军委审

批。执行生产、施工、营建训练、助民劳动等任务的部队调动，团以下由军区、军兵种批准；团以上报军委审批。冬季进行野营训练的部队，师以下由军区、军兵种批准；（含）以上报军委审批。配合陆军野营训练动用海、空军部队，大队、团以下由军种批准；大队、团以上报军委审批。执行紧急抢险救灾任务的部队调动，可边行动、边报告。

九一三事件

9月13日凌晨，林彪、叶群等在海军山海关机场仓皇登上空军第三十四师的1架执行林彪专机任务的三叉戟飞机，在机组人员未到齐的情况下，强行起飞，向苏蒙方向出逃。后该机坠毁于蒙古人民共和国肯特省苏布拉嘎盆地，林彪、叶群等人及机组人员共九人被摔死。

黄吴李邱离职反省

9月29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央通知，已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离职反省，彻底交待。

成立军委办公会议

10月3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在军委领导下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军委办公会议成员还有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榘、张才干、刘贤权。

1972

陈毅逝世

1月6日，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九届中央委员、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开国元帅陈毅，因患胃癌在北京病逝，终年71岁。10日，毛泽东参加了陈毅追悼会。

张国华逝世

2月21日，成都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军区政委，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四川省革委会主任，开国中将张国华，因患心脏病在成都病逝，终年58岁。

谢富治逝世

3月26日，中共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开国上将谢富治，因患胃癌在北京病逝，终年63岁。

余洪信行凶杀人后自杀

5月18日凌晨，陆军第六十三军副军长余洪信因被审查，在太原军部大院打死该军政委曹步墀的爱人，打伤该军副政委杨兆魁，行凶持续二十分钟后，携枪逃逸后被通缉，后被发现于榆次郊外的麦田自杀身亡。

1973

全军恢复和增建 41 所院校

12月8日，军委转发经中央批准的全军院校领导小组《关于全军恢复和增建41所院校的报告》。报告指出，全军原有院校125所，1969年调整为43所。现在指挥院校只剩下1所军政大学，技术学校满足不了需要，部队的训练机构也不健全。为了提高干部的军政素质和专业技术水平，适应我军建设和战备需要，建议全军恢复和增建41所院校。

八大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

12月22日，经毛泽东、中央决定，军委命令：北京与沈阳、南京与广州、济南与武汉、福州与兰州八个军区的司令员相互对调。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调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调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调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调任济南军区司令员；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调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调任福州军区司令员。

1974

西沙海战获胜

1月19日-20日，海军南海舰队投入海军猎潜艇第七十三大队、第七十四大队，扫雷舰第十大队作战舰艇6艘，在西沙群岛海域击沉南越海军护航炮舰1艘，击伤其驱逐舰3艘，协同陆、空军收复永乐群岛中珊瑚、甘泉、金银三岛，获得了对整个西沙群岛及其周边海域的控制权。

国防工业管理体制调整

5月1日，国务院、中军委发布《关于调整国防工业管理体制的决定》，对国防工业管理体制作如下调整：第三、四、五、六机械工业部由国务院直接领导。除已成立的国务院国防工办受国务院、军委领导，以国务院为主，撤销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和航空、造船、常规兵器、电讯4个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外，国

防工业的高等院校和其他学校，下放到省、市、自治区，实行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

彭德怀逝世

11月29日，原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开国元帅彭德怀，专案审查被囚禁期间在北京病逝，终年76岁。

1975

邓小平张春桥任职

1月5日，中央任命：邓小平为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张春桥为总政治部主任。

成立军委常务委员会

2月5日，中央决定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机构，成立军委常务委员会。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和粟裕等11人为常务委员。军委常委会由叶剑英主持。总参谋部第一副总长，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总后勤部党委第二书记，军委办公厅主任列席常委会议。

通信兵部划归总参建制

3月3日，军委批复总参请示，同意将通信兵部划归总参建制，改称总参通信部。通信部对所属部队院校仍行使原来职权。

军委召开扩大会议

6月24日至7月15日，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关于“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的指示，着重讨论了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问题。

云南沙甸事件

7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圈阅的《关于沙甸问题的批示》，称沙甸（云南最大的回族聚居村寨）群众应该欢迎解放军和工作队进村，惟效果并不彰显。嗣后云南省委向中央报告提出，沙甸问题“性质变了”，“政治解决已无可能”，向中央提出采取军事解决的请示。在省委书记周兴亲自坐镇下，于7月29日凌晨开始调动陆军第十四军所属部队，对沙甸实行武力解决，以后对大庄、新寨、田心、茂克、车白尼等回族聚居村也实行武力解决。整个军事行动历时21天，至8月18日结束，造成人员大量伤亡，房屋大部被毁的极其严重后果。

军委批转总参《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的方案》

9月7日，经中央批准，军委批转总参《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的方案》。方案提出，这次精简整编主要是精简机关，裁并重叠机构，减少保障部队和普通兵员，保留技术骨干和技术装备，使我军编组更加精干。

1976

周恩来逝世

1月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因患癌症在北京病逝，终年78岁。

陈锡联负责主持军委工作

2月2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生病期间，由军委常委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朱德逝世

7月6日，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开国元帅朱德在北京病逝，终年90岁。

皮定均遇难

7月7日，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从漳州乘空军直升机去东山岛检查登陆演习情况。因气象条件恶劣，直升机在漳浦县以东20公里处撞山失事，皮定均等13人（含机组5人）全部遇难。

参加唐山抗震救灾

7月28日，唐山、丰南一带发生7.8级强烈地震。地震波及北京、天津地区，共死亡26万余人，重伤16万余人。遵照军委命令，北京军区在唐山组成抗震救灾前指，统一指挥唐山抗震救灾部队，展开救灾工作。在天津参加抗震救灾工作的，有济南、北京军区和军委各军兵种部队共3.7万余人；在北京参加抗震救灾工作的有北京卫戍区部队近0.4万人。根据军委9月23日关于救灾部队分期分批撤离唐山灾区的指示，参加唐山抗震救灾的部队于10月2日至30日，分三批撤离唐山归建。北京军区前指于11月3日撤离唐山。

毛泽东逝世

9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在患病后经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为防备敌人入侵，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布立进入一级战备的命令。命令特别强调，东北、华北、西北和东南沿海地区，要百倍提高警惕，作好各种战斗准备。10月4日，全军转入正常战备。

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

10月6日，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集团。10月7日，中央政治局决定，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